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五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五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2\frac{5}{8}$  · 插頁 12 · 字数 522,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定价(四) 2.25元

統一書号：1001·392

## 目 录

第五卷說明 .....	XI—XXI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	3—5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埃蒂耶納·卡貝的信 ——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 .....	6—7
卡·馬克思。給“黎明报”編輯的信 .....	8—9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

六 月

“新萊茵报”編輯部的声明 .....	13
法兰克福議会 .....	14—18
許澤尔 .....	19—20
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	21—24
民主派 .....	25—27
康普豪森在5月30日會議上的声明 .....	28—31
生死問題 .....	32—35
康普豪森內閣 .....	36—37
战争的喜剧 .....	38—40
反动派 .....	41
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 .....	42—43

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綱領 .....	44—48
柏林的妥协辯論 .....	49—53
妥协辯論 .....	54—59
奏摺問題 .....	60—61
对波兰的重新瓜分 .....	62—63
王朝之盾 .....	64—65
科倫在危急中 .....	66—70
法兰克福議會和柏林議會承認自己有名无实 .....	71
柏林关于革命的辯論 .....	72—89
一 .....	72
二 .....	75
三 .....	79
四 .....	85
科倫各党派的情况 .....	90—91
6月15日的妥协会議 .....	92—93
布拉格起义 .....	94—96
瓦德涅尔的被捕。——澤巴尔特 .....	97—99
6月17日的妥协会議 .....	100—105
施图普的修正案 .....	106—109
在波茲南的新政策 .....	110—111
康普豪森內閣的垮台 .....	112—113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議會的第一件事迹 .....	114—115
汉澤曼內閣 .....	116—117
“新柏林报”論宪章派 .....	118—119
“盖尔温努斯报”的威胁 .....	120—122

帕托夫贖买法案建議書 .....	123—125
起义的民主性質 .....	126—128
巴黎消息 .....	129
巴黎消息 .....	130
6月23日事件的詳情 .....	131—134
巴黎消息 .....	135
“北极星报”論“新萊茵报” .....	136
6月23日 .....	137—141
6月24日 .....	142—146
6月25日 .....	147—152
六月革命 .....	153—157

## 七 月

“科倫日报”論六月革命 .....	158—166
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經過） .....	167—176
一 .....	167
二 .....	171
德国的对外政策 .....	177—179
馬拉斯特和梯也尔 .....	180—181
妥协辯論 .....	182—188
逮捕 .....	189
逮捕 .....	190—193
妥协辯論 .....	194—201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訊 .....	202—204
柏林的妥协辯論 .....	205—211



辦事內閣 .....	212
妥協辯論 .....	213—217
內閣危機 .....	218—219
7月4日的妥協會議(第二篇論文) .....	220—229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訊 .....	230—234
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 .....	235—238
7月7日的妥協辯論 .....	239—246
福斯特曼先生論国家信用 .....	247—250
妥協辯論 .....	251—257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 .....	258—262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續) .....	263—266
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 .....	267—269
普魯士出版法案 .....	270—273
市民自卫团法案 .....	274—285
一 .....	274
二 .....	278
三 .....	282
“祖国报”論和丹麦的休战 .....	286—288
和丹麦的休战 .....	289—292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續) .....	293—298
都灵的“协和报” .....	299—300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續完) .....	301—306
强制公債法案及其說明 .....	307—317
一 .....	307
二 .....	312

关于区等級會議的妥协辯論(7月18日的妥协会議) .....	318—322
巴登各民主团体的解散 .....	323—324
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	325—331

## 八 月

“科倫日报”論英国秩序 .....	332—337
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辯論 .....	338—341
俄国的照会 .....	342—349
汉澤曼內閣和旧普魯士刑法草案 .....	350—352
“科倫日报”論强制公債 .....	353—354
蒲魯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說 .....	355—359
关于現行贖买法案的辯論 .....	360—366
“模范国家”比利时 .....	367—370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 .....	371—414
一 .....	371
二 .....	381
三 .....	389
四 .....	394
五 .....	402
六 .....	409

## 九 月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 .....	415—431
七 .....	415
八 .....	419
九 .....	426

德国公民权和普魯士警察 .....	432—433
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 .....	434—437
“科倫日报”論意大利 .....	438—441
“閱报室”报論萊茵省 .....	442—444
調停和干涉。拉德茨基和卡芬雅克 .....	445—446
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決 .....	447—450
馬克思和普魯士国籍 .....	451—454
和丹麦的休战 .....	455—459
办事內閣的垮台 .....	460—462
丹麦和普魯士的休战 .....	463—468
危机和反革命 .....	469—478
一 .....	469
二 .....	471
三 .....	474
四 .....	478
柏林的辯論自由 .....	479—481
休战協定的批准 .....	482—484
法蘭克福起义 .....	485—489
一 .....	485
二 .....	487
反革命內閣 .....	490—491
科倫的戒严 .....	492

## 十 月

“新萊茵报”复刊 .....	493
----------------	-----

維也納革命 .....	494—495
“科倫革命” .....	496—499
普富尔內閣 .....	500
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証券的全国抵押銀行 的演說 .....	501—505
“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維也納革命 .....	506—508
普魯士国王答国民議会代表团 .....	509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	510—512
“改革报”論六月起义 .....	513—514
英法在意大利的調停 .....	515—517
“模範的立宪国家” .....	518—520
国家檢察官“黑克尔”和“新萊茵报” .....	521—526

## 十 一 月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書” .....	527—530
巴黎“改革报”論法国状况 .....	531—534
維也納革命和“科倫日报” .....	535—536
維也納、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 .....	537—539
反革命在維也納的胜利 .....	540—543

## 弗·恩格斯的遺稿

从巴黎到伯尔尼 .....	549—571
一 塞納河和罗亚尔河 .....	549—564
二 勃艮第 .....	565—571

## 附 录

告全体德国工人書 .....	575—576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會議記錄 .....	577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訊 .....	578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迫害 .....	579
关于召开萊茵地区各民主团体代表大会的通知 .....	580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迫害 .....	581
1848年8月11日科倫民主协会全体會議記錄摘要 .....	582—583
科倫民主协会抗議將波茲南并入德意志联邦 .....	584—585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訊 .....	586
关于1848年8月28日馬克思在維也納民主联合会上的发言 .....	587
关于1848年8月30日馬克思在第一屆維也納工人联合会上 的演說 .....	588
辟謠 .....	589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迫害 .....	590
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 .....	591—594
沃林根民众大会 .....	595—596
科倫民众大会关于法兰克福起义的決議 .....	597
“新萊茵报”負責发行人关于报纸停刊的通知 .....	598
呼吁訂閱“新萊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	599
通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	600
黑名单 .....	601
馬克思就当选科倫工人联合会主席发表的演說(摘自1848年 10月16日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會議記錄) .....	602—603
1848年10月22日科倫工人联合会全体會議記錄摘要 .....	604

---

馬克思就維也納事件发表的談話 .....	605
注释 .....	609—651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652—666
人名索引 .....	667—697
期刊索引 .....	698—701
譯后記 .....	702

---

### 插 图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 .....	2—3
“新萊茵报”第一号的一頁 .....	12—13
1848年6月巴黎市区图 .....	142—143
載有卡·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的“新萊茵报”的一頁 .....	154—155
卡·馬克思的1848—1849年的护照 .....	452—453
弗·恩格斯的“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第一頁 .....	547
弗·恩格斯画的从奧克薩里到洛克尔的路綫草图 .....	564—565



## 第五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收集了他們在 1848 年 3 月至 11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原理，拟定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确定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确立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前的事件，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斗争阶段的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在本版第五、第六卷中反映出来了。

本卷开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具体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起草“要求”时，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从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出发的，因为德国人民以后的命运要取决于这些任务的解决。“要求”中主要的一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为了给德国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首先必须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当时德国分成 36 个大大小小的邦），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在“要求”中，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任务有机地结合着的，还有德国革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任



务：消灭封建压迫，废除农民所担负的一切封建义务，消灭反动贵族統治的經濟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階級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序幕，因此他們在“要求”中还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关于这些措施的性質，“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运动进程中它們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是：把封建領地变为国家财产并在这些土地上組織大規模的农业生产，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国家保証所有工人都有工作做，同时照顧丧失劳动力的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德国的无产階級、城市小资产階級和小农是能够用坚决斗争的办法来实现这些要求的力量。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即运用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情况的第一个范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德国之后所写的发表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萊茵报”上的那些文章构成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鮮明地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反映了他們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策略。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办的“新萊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現的，但是“这个民主派随时随地都显示出它的独特的无产階級性質”（恩格斯）。报纸的这个方針是由德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革命中階級力量的配置和德国无产階級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德国經濟上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軟弱性和无組織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祖国之后不能立即着手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階級政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二三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对于广大人民群

众是起不了什么显著作用的。因此，敌視任何宗派主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有必要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他們加入了科倫民主协会，并建議拥护他們的人也采取这种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同民主派結成联盟絕對不是对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領袖們的錯誤和幻想放弃批評，相反地，必須以對他們的錯誤和幻想进行批評为前提。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推动小資产階級民主派更坚决地行动，竭力把人民群众爭取过来。同时，他們要自己的拥护者注意工人协会的組織，注意无产階級的政治教育，注意为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階級政党創造先决条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这个旨在动员一切民主力量的策略，来对抗不了解无产階級在資产階級革命中的任务和反对同民主派結成联盟的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斥責波尔恩的机会主义策略，因为他把工人階級的斗争局限于狹隘的行会和工会的利益，并使无产階級脱离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的总的政治任务。

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新萊茵报”代表德国人民中一切进步力量的利益，首先是代表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即工人階級）的利益。由馬克思领导的“新萊茵报”編輯部是无产階級真正的战斗司令部。

“新萊茵报”評論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問題，极其巧妙地用政治上的揭发来与封建反动势力和資产階級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教育者和組織者的作用。

这个报纸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很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出色的政論性質：它所刊載的文章具有热烈的战斗精神，笔調精辟入微，諷刺敌人尖銳有力。在无产階級报纸的历史上，“新萊茵报”理应占一个光荣的地位。

“新萊茵報”對巴黎工人六月起義的態度特別清楚地表現了它的無產階級性質。在德國，而且幾乎在整個歐洲，“新萊茵報”是一開始就堅決站在起義者方面的唯一報紙。關於六月起義，恩格斯寫了一系列文章和短評，其中有“6月23日事件的詳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科倫日報’論六月革命”，“六月革命（巴黎起義的經過）”，馬克思也寫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六月革命”。在戰鬥的日子里以及在戰鬥剛結束後所寫的這些文章洋溢着鬥爭的熱情，同時對六月起義的原因和歷史意義作了深刻的分析。

關於六月起義的文章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恩格斯在闡述六月起義的軍事問題時，作出了一系列關於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街壘鬥爭的性質、意義和方法的重要結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學說關於武裝起義的原理。在“六月革命”一文中，馬克思指出六月起義同過去一切革命有着原則上的區別：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勞動反對資本的戰鬥，是無產階級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的獨立發動。就在這篇文章里，馬克思作出了一個理論上的重要結論，認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對工人階級來說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工人階級所需要的是能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的國家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為解決德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即為實現國家的民族統一而進行了不倦的鬥爭。在“法蘭克福激進民主黨和法蘭克福左派的綱領”、“‘閱報室’報論萊茵省”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把德國統一在普魯士或奧地利的霸權之下的資產階級計劃，同時也反對想建立一個象瑞士那樣的聯邦國家的小資產階級方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文章

中論証：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統一和真正民主的国家，才能彻底消灭德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国内的一切封建渣滓。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主张“从下面”来統一德国，也就是要由人民群众对德意志联邦各邦，首先对普魯士和奥地利的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猛烈的革命冲击。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德国的統一是全欧洲的問題；只有欧洲的革命力量起来向英国的反革命統治階級以及沙皇俄国这个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进行斗争，德国才能达到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战争不仅是保卫革命的手段，而且也是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 1848 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直接后果时，指出这次革命的性質是不彻底的，因为人民沒有能彻底战胜封建制度，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整个官僚机关和警察机关仍然不可侵犯，而人民群众則赤手空拳地面临武装的反革命的威胁（見“柏林关于革命的辯論”、“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等文章）。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認為德国革命的这种性質是由获得政权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所决定的，这个資產階級，如馬克思后来所說，“宁可和奴隶制妥协也不願意看到一点为自由而斗争的前景”。法国无產階級的革命斗争和德国工人階級意識的觉醒吓坏了德国的資產階級，他們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和封建反动势力勾結起来。在几篇闡述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辯論以及分析康普豪森和汉澤曼內閣的政策的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反对“妥协論”，这个“妥协論”是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們提出的，目的是要証明他們和封建君主势力妥协是正当的。为了与这种贩卖性的理論相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坚持人民政

权和革命人民的主权的思想（“法兰克福議會”、“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綱領”等文章）。他們認為人民的革命专政是胜利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危机和反革命”一文）。弗·伊·列宁分析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在这些原理中含有革命民主专政的概念。

在一系列論述全德国民議会的活动和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辯論的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批評了这些代議机关，指責它們不是把实际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去消灭反动的德国政府和取締大資產階級的叛卖政策，而只是进行毫无結果的辯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德国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議机关而斗争，这些机关应当是人民意志的忠实表达者，应当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要依靠人民的支持。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在他們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人民选出的議員必須向人民报告自己的活动和实现人民的意志；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革命的人民有权对議員施加压力，要求他們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柏林的辯論自由”等文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德国革命最初几个月的經驗得出結論說，人民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更換一切旧的行政、軍事和司法机关，彻底清洗一切国家机构（“7月4日的妥协会議”等文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證就是把人民武装起来。在“6月15日的妥协会議”、“6月17日的妥协会議”、“市民自卫团法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們維護了人民的武装的权利。馬克思和恩格斯贊成柏林人民群众在1848年6月袭击軍械庫以夺取武器的尝试。“新萊茵报”在指出这次发动是半途而废的革命时，斥責了不敢公开站在人民方面的普魯士国民議會左翼議

員的胆怯行为。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回击反革命势力的必要条件，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因素，因此，他們維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起义者，这些起义者在1848年9月起来反对法兰克福議會批准与丹麦签订的可耻的休战协定。同时，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一再着重指出，过早的和沒有准备的起义只会使革命力量受到摧残，并且使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号召科倫工人不要理睬普魯士政府的挑畔，而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科倫在危急中”和“科倫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在科倫的战友們进行了艰巨的解释工作，才使萊茵省的民主力量在九月的日子里沒有受到摧残。

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認為扩大和巩固民主陣綫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德国的封建残余的革命斗争。本卷中載有一系列关于土地問題和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的文章（如“帕托夫贖买法案建議書”、“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于現行贖买法案的辯論”等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农民起来为立即彻底地和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而斗争，他們揭露了普魯士資產阶级的政策，指出这个资产阶级背叛了农民，即背叛了“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沒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貴族”（見本卷第331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普魯士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要求抱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它力图与反革命势力妥协，它害怕废除封建所有制会使资产阶级所有制遭到侵害。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代表，热烈支持农民的革命的反封建运动，認為他們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他們欢呼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認為他們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反动势力和反对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丹麦和普魯士的休战”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坚持民族間的真正自由和友爱的思想，同时严厉地斥責德国資產階級繼續实行霍亨索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其他民族的旧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是为德国的过去贖罪的方法，而且是保證德国人民将来成为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給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見本卷第 178 頁）。

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坚决地、不調和地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他們認為德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对波兰人民爭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等文章抨击了普魯士政府的政策，因为普魯士政府挑起了波茲南的民族解放起义，然后又加以镇压，并且在“改組”的幌子下把波茲南的一大部分土地划归德国。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斥責了批准重新瓜分波兰的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中資產階級多数派的立場。

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热烈支持 1848 年夏天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弗·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和“起义的民主性質”这两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了起义具有人民的性質，并且还指出，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失敗，不仅是由于奥地利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而且还由于把捷克人推到反革命陣营中去的德国自由資產階級的叛卖政策。

卡·馬克思写給意大利民主報紙“黎明报”編輯部的信以及“新萊茵报”上发表的一些分析意大利革命斗争的文章，对于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对于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一切活动都充滿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他们对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态度，对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支持，与英国宪章派的团结，都表现出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新萊茵报”维护宪章派，反对德国反动报纸对它的攻击（“‘新柏林报’論宪章派”一文），并且表示支持宪章派的革命的机关报“北极星报”。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几篇文章是分析法国革命的进程的。这些文章对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充滿了希望，在这种新的革命高潮中法国无产阶级应当起主要的作用。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着重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他们認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这表现了他們对于欧洲大陆的經濟发展的估价过高，其实当时欧洲大陆的經濟发展还远沒有达到足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本卷的結尾部分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有关維也納十月起义的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这次起义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



因为它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决定了德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了欧洲革命的命运。馬克思把巴黎的六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而把維也納的十月起义称为第二幕（見本卷第 542 頁）。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維也納革命”、“‘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維也納革命”、“維也納革命和‘科倫日报’”、“維也納、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反革命在維也納的胜利”等文章）是論述維也納起义的經過和分析它失敗的原因的，如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它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背叛。

在“弗·恩格斯的遺稿”这部分中发表了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在这篇随笔中恩格斯以鮮明和生动的笔調叙述了他游历法国的印象。随笔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法国的农民和他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恩格斯在指出法国农民对 1848 年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同情路易·波拿巴时，說明这种情形是由法国資產階級造成的，因为它蠱惑性地利用了农民的私有天性，它的稅收政策損害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使他們脫离了革命。

載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以及其他的一些著作，为闡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的策略，闡明他們还在革命过程中就已根据人民群众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的极其丰富的經驗所作出的結論和理論上的概括，提供了极其寶貴的材料。

在本卷附录中刊載了一系列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和他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直接工作的文件。这里也收集了一些有关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領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民主协会和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众大会和民众會議的新聞报道，这些會議的組織者和主持者

是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战友們。附录中还收集了一些有关法院和警察局通緝“新萊茵报”編輯的材料；这些材料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府的迫害和“善意的”报刊的誹謗下仍然勇敢地捍卫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 \* \*

要确定登載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是出于卡·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弗·恩格斯的手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文章下面沒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証明材料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产生这种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許多文章看来好象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这一点可以由恩格斯在1885年5月写給施留特尔的信得到証实，信上这样說：“一般說来，馬克思当时写的文章和我所写的几乎是分不开的，因为我們之間是有計劃地分工的”。

在不能确定某一篇文章究竟是出于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恩格斯的手笔的情况下，在文章的末尾就不注明作者是誰。

本卷中收集了第一版中所沒有发表的39篇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其中几篇曾經用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其余的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編輯說明中注明了。刊載在附录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8年3月—11月



**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Proletariat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1. Ganz Deutschland wird zu einer einzigen, unteilbaren Republik erklärt.
2. Jeder Deutsche, der 21 Jahre alt, ist Wähler und wählen, veranlagt daß er keine Klassenstrafe erlitten hat.
3. Die Volkswirtschaft werden befreit, damit auch der Arbeiter im Parlament des deutschen Volkes sitzen könne.
4. 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 Die Armen sind in Zukunft zugleich Arbeiter-Armen, so daß das Wort nicht bloß, wehrlos, verpöht, sondern auch mehr protegiert, als jene Hungerlittenstodes bezeugen. Dazu ist außerdem ein Mittel zur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5. Die Gerechtigkeitsfrage ist unermittlich.
6. Alle Grundlasten, alle Abgaben, Steuern, Zinsen, u., die bisher auf dem Lande alle lasteten, werden ohne irgend eine Entschädigung abgeschafft.
7. Die fürstlichen und anderen feudalen Landgüter, alle Bergwerke, Gruben, u. s. w., werden in Staatseigentum umgewandelt. Kaufkraft Landgüter wird der Arbeiter im Großen und nur den modernsten Hilfsmitteln der Wissenschaft zum Vorteil der Gesamtheit betreiben.
8. Die Interessen auf den Bauerngütern werden für Staatseigentum erklärt. Die Interessen für jene Bauern werden von den Bauern an den Staat gezahlt.
9. In den Gegenden, wo das Pachtwesen entwickelt ist, wird die Grundrente oder der Pachtzins als Steuer an den Staat gezahlt. Alle diese unter 6, 7, 8 und 9 angegebenen Maßregeln werden getroffen, um öffentliche und andere Lasten der Bauern und kleinen Pächter zu vermindern, ohne die zur Bekämpfung der Staatsschulden nötigen Mittel zu schmälern und ohne die Produktion selbst zu erschweren.
- Der eigentliche Grundbesitzer, der weder Bauer noch Pächter ist, hat an der Produktion gar keinen Anteil. Seine Konsumtion ist daher ein bloßer Mißbrauch.
10. An die Stelle aller Privatlaster tritt eine Staatslast, deren Pacht der Arbeiter trägt hat.
- Diese Maßregel macht es möglich, das Kreditwesen im Interesse des ganzen Volkes zu regeln und unterwirft damit die Herrschaft der großen Geldherrscher. Zudem sie auch noch nach Papiergeld an die Stelle von Gold und Silber tritt, veranschaulicht sie das unerschöpfliche Instrument des künftigen Volkes, das allgemeine Tauschmittel, und erlaubt, das Gold und Silber nach außen hin werfen zu lassen. Diese Maßregel ist schließlich notwendig, um die Interessen der konterrevolutionären Bourgeoisie an die Revolution zu knüpfen.
11. Alle Transportmittel: Eisenbahnen, Kanäle, Dampfschiffe, Motor, Posten, u., nimmt der Staat in seine Hand. Sie werden in Staatseigentum umgewandelt und der unheimlichen Mißbrauche zur unmittelbaren Verfügung gestellt.
12. In der Bekämpfung künstlicher Staatsbanken hebt die Arbeiter Herrschaft über, als der, das diejenigen mit Kommiss, alle mit nichte Privatbanken, auch ein höherer Gehalt bezogen als die Arbeiter.
13. Beseitigung der Kirche vom Staat. Die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werden vollständig von ihrer freiwilligen Gewerbe befreit.
14. Beseitigung des Erbschafts.
15. Einführung von harten Progressivsteuern und Abschaffung der Konsumsteuern.
16. Errichtung von Nationalwerkstätten. Der Staat garantiert allen Arbeitern ihre Löhne, und versorgt die für Arbeit Unfähigen.
17. Allgemeine, unentgeltliche Volkserziehung.

Es liegt im Interesse des deutschen Proletariats, des kleinen Bürgers und Bauernstandes, mit aller Energie an der Durchsetzung obiger Maßregeln zu arbeiten. Denn nur durch Verwirklichung derselben können die Arbeiter, die bisher in Deutschland von einer kleinen Zahl ausgebeutet wurden und die man weiter in der Ausbeutung zu erhalten suchen wird, zu ihrem Recht und zu demjenigen Rechte gelangen zu ihnen, als den Produzenten aller Reichtums, gelübt.

**Das Komitee:**

Karl Marx, Karl Schapper, P. Bauer, J. Engels,  
J. Wolf, H. Wolff.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



##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sup>1</sup>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2. 凡年满 21 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5. 诉讼免费。
6. 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
7. 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 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 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实行第6、7、8、9各条中提出的这些措施,是为了減輕农民和小租佃者所担負的社会义务和其他义务,同时也不致减少抵偿国家开支所需的資金,而且不使生产本身遭受損失。

至于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租佃者的土地所有者是不参加任何生产的。因此他們的消費純粹是揮霍。

10. 成立国家銀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銀行,国家銀行发行的紙币具有法定的比价。

实行这一措施就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調节信用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資本家的統治。实行这一措施就能逐漸以紙币代替黄金和白銀,使資產階級流通的必要工具,即一般的交換工具減价,因而就有可能把黄金和白銀用到对外貿易上去。最后,为了把保守的資產者的利益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sup>①</sup>,这个措施也是必要的。

11. 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 铁路、运河、輪船、道路、邮局等等。它們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

12. 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只有有家眷的官員,即需求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別人高一些。

13. 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願組織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14. 限制繼承权。

15. 实行高額累进稅,取消消費品稅。

16.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証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資料,并且負責照管喪失劳动力的人。

<sup>①</sup> 后来在科倫印发的传单上用的不是“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而是“和革命联系起来”。——編者注



### 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8年3月21日—29日之间  
1848年3月30日左右在巴黎印成传单，并载于下列各报：1848年4月5日“柏林阅报室”第82号的号外；1848年4月6日“曼海姆晚报”第96号；1848年4月6日“特利尔日报”第97号的附页和1848年4月9日“德意志总汇报”第100号的附刊，而在1848年9月10日之前在科伦又印成传单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阅报室”，  
并照科伦的传单原文校对过

## 給埃蒂耶納·卡貝的信—— 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sup>2</sup>

卡貝先生!

我們請求您把隨函寄上的聲明發表在最近一號“人民報”上。聲明所談的問題是：共產黨對於已經在一部分德國人中間煽起了舊的反動民族成見去反對法國人民的那種事情和做法不負任何責任。德國工人聯合會，即歐洲各國各種工人協會的聯合會（英國憲章派的領袖哈尼和瓊斯兩位先生也是這個聯合會的成員）是完全由共產主義者組成的，並公開宣布自己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所謂巴黎德意志民主協會實質上是反共產主義的，因為它聲明自己不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和鬥爭。因此，這裡所談的是為了共產黨的利益而發表意見，發表聲明，正是為了這一點，我們勞駕閣下幫忙。（這封便函不必公开发表） 致以  
敬禮和兄弟般的情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

下面署名的委員會認為自己有責任向德國工人聯合會在歐洲各國的各個支部聲明：它同向法國公民要服裝、金錢和武器的那些行動、聲明和宣言毫無關係。在巴黎，德國工人俱樂部是和聯合會保持聯繫的唯一組織，它同自稱為巴黎德意志民主協會的并由

海尔維格先生和馮·伯恩施太德先生領導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

**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签名：卡·馬克思, 卡·沙佩尔, 亨·鮑威尔,  
弗·恩格斯, 約·莫尔, 威·沃尔弗**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 1848 年 3 月底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給“黎明报”編輯的信<sup>3</sup>

亲爱的先生！

由卡尔·馬克思主編的一种新的日报“新萊茵报”，从6月1日起将在科倫城开始出版。这个报纸将在我們北方为“黎明报”在意大利所提出的那些民主原則而斗争。由此可见，我們对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間爭执的問題将抱什么态度是用不着怀疑的。我們要捍卫意大利爭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統治作誓死的斗争。我們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們証明，德国人民絕不会参与那些在我国也經常反对自由的人們对你們所实行的压迫。我們要竭力使两国的伟大和自由的人民能够結成联盟并和睦相处；由于丑恶的政治制度，这两国人民至今还互抱敌意。因此，我們要求粗暴的奥地利丘八立刻撤出意大利，使意大利人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来选择他們所需要的政体。

为了讓我們能够注視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而你們能够評判我們是否忠实于自己的諾言，我們建議互相交換报纸；这样，我們就可以按期每天把“新萊茵报”寄給你們，而你們把“黎明报”寄給我們。我們殷切期望你們能同意这个建議，并且希望你們能尽速开始把“黎明报”寄給我們，以便在我們最初的几号报纸上就能够利用它的材料。

如果可能的話，請你們也寄一些其他的報道來。我們保證，在我們這方面，對於凡是有利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事業的東西，我們都予以最大的注意。 致以  
敬禮和兄弟般的情誼

“新萊茵報”編輯部

編輯 卡尔·馬克思博士

寫於 1848 年 5 月底

載於 1848 年 6 月 29 日

“黎明報”第 258 號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黎明報”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6月1日—11月7日









## “新萊茵報”編輯部的聲明

“新萊茵報”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訊員們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

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sup>①</sup>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們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我們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訊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报，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請讀者鉴諒。我們在最近一定能滿足讀者在这方面的  
一切要求。

編輯委員會：

总編輯 卡尔·馬克思

編輯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維尔  
特，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

写于1848年5月31日

載于1848年6月1日

“新萊茵報”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頒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員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規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現金稅，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現存国家制度的言論，对发表这种言論的人实行監禁和課以大量罰款。这里是指德国很快就要頒布类似的法令。——譯者注

## 法 兰 克 福 議 会

科倫 5 月 31 日。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的制宪国民議会在德国已經存在两个星期了。

德国人民几乎已經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維也納和柏林的街壘中，夺得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經在国民議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

国民議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須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

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須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現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則相抵触的东西。

国民議会在开会期間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偷襲，巩固議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

德国国民議会現在已經开过 12 次会了，然而却一事无成。

但是它用以下的伟大事迹保證了德国的安全：

国民議会認為它需要會議規則，因为它知道，只要有两三个德国人聚集在一起，他們就需要有一套規則，否則就会摔桌捋凳。有个学究已經預見到这种情况，他为最高會議草拟了一个特殊的會議規則草案。有人提議暫且通过这个学究气的草案；这个草案大多数議員連看也沒有看过，但是議會根本沒有討論就通过了。因

为如果没有會議規則，德国的代表們将成为什么样子呢？*Fiat reglementum partout et toujours!*〔會議規則随时随地万岁！〕

科倫的拉沃先生对于法蘭克福議會和柏林議会的利益在个别場合下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处理的問題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議<sup>5</sup>，但是議會却討論最終的會議規則。虽然拉沃的建議很迫切，然而會議規則毕竟是更加迫切的。*Pereat mundus, fiat reglementum!*〔讓全世界毀灭吧，會議規則万岁！〕但是，聰明透頂的庸俗的議員們并不拒絕給拉沃的建議提些意見，于是当还在談論应当先討論會議規則还是先討論拉沃的建議這個問題时，对这个建議就已陸續提出了近两打的修正意見。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討論、辯論、喧囂、磨洋工，并把表決从5月19日拖延到22日。22日恢复了对這個問題的討論，紛紛提出了新的修正意見，一再迴避主題，于是在冗長的演說和无数的爭吵之后，決定把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来的問題退回到各个单位去。这样一来，時間悠然地过去了，而議員先生們就吃飯去了。

5月23日，先是为記錄問題爭吵起来，然后又听取无数的建議，而当美因茲的齐茨提出了关于普魯士軍閥的粗暴行为和美因茲的普魯士司令官<sup>①</sup>专橫暴虐濫用職权的問題时，又想馬上轉到議事日程上去，即轉到特別受人喜爱的會議規則上去。这里曾提出了反动派公然猖狂进攻的問題，也就是提出了議會絕對有权干涉的事件。应当追究胆敢当着國民議會的面威胁要轟炸美因茲的无耻暴兵的责任；必須保护被解除了武装的美因茲市民，使他們能安居乐业，使他們不受强行駐扎在他們那里和受人唆使来反对他們

① 見本卷第19—20頁。——編者注

的暴兵的迫害。但是巴登的空談家巴塞爾曼<sup>①</sup>先生却宣布这些都是鷄毛蒜皮；讓美因茲听天由命去吧，重要的是整体的利益，这里是国民議会在开会，在为全德国的利益而討論會議規則；实在說，轟炸美因茲怎么能和这相提并論呢？*Pereat Moguntia, fiat reglementum!*〔讓美因茲毀灭吧，會議規則万岁！〕但是議會又于心不忍，于是选出一个委員會到美因茲去調查这件事情。这时休会和吃飯的时间恰好到了。

5月24日我們完全失去了議會討論的綫索。會議規則大概已經准备就緒，或者被丢在一边了；不管怎样，我們再沒有听到关于會議規則的任何消息。但是善意的建議层出不穷，自主的人民的許多代表在这些建議中表现出順民的馴服<sup>6</sup>的頑强性。然后接踵而来的是建議、請願書、抗議書等等，最后，民族污水的洪流在无数东拉西扯的发言中排泄出来。尽管如此，不能不指出，当时还选出了4个委員會。

最后，施略費尔要求发言。埃塞倫、佩尔茨和勒文施坦等3个德国公民接到了在当天下午4点鐘以前离开法兰克福的命令。聰明透頂的警察局硬說上述几个人在工人联合会中的发言引起了公民們的不滿，因此应当驅逐出境。在預备国会<sup>7</sup>宣布了德国公民的权利之后，在17个“受托人”(*hommes de confiance de la diète*)<sup>8</sup>起草的宪法草案承認了公民的权利之后，警察局竟敢作出这样的事情！情况刻不容緩。施略費尔先生要求就這個問題发言，但是遭到拒絕；他要作紧急发言，根据會議規則，他有权提出这个要求，而这一次得到的回答是：*fiat politia, pereat reglementum!*〔警察

① 俏皮話：Bassermann——德國姓，«Wassermann»——“空談家”。——編者注

局万岁，讓會議規則灭亡！〕显而易見，为什么回家吃飯的时间又到了。

5月25日，在潮水般的建議的冲击下，議員們的聪明的头又垂了下来，象成熟的麦穗受到傾盆大雨的打击一样。两个議員又想提出驅逐問題，但是不許他們发言，甚至不許他們作紧急发言。一些請願書，特别是波兰人的一个請願書，比議員們所有的建議都重要得多。后来，被派到美因茲去的委員會终于获得了发言权。它通知說，要到第二天才能提出关于調查結果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它来得太晚了。8000把普魯士刺刀已經解除了1200个市民自卫軍的武装，恢复了秩序。現在只好轉到議事日程上去。他們也正是那样作了——立刻轉到議事日程上去，即轉而討論拉沃的建議。因为在法蘭克福对这个建議的討論还没有結束，而在柏林由于奥尔斯瓦特的声明，这个建議早就沒有意义了，所以国民議會决定把这个問題延至明天討論，現在大家去吃飯。

5月26日又提出了无数的建議，接着，美因茲委員會提出了最后的极不坚决的报告。报告人是过去的“人民活动家”和 Pro tempore〔現在的〕大臣海尔根汗先生。他提了一个非常緩和的決議案，但是国民議会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后，竟認為这个胆怯的建議太尖銳了；国民議會决定讓美因茲市民去接受許澤尔指揮下的普魯士人的恩典，并且“希望当局能执行自己的职责”，于是議會就轉到議事日程上去！这个議事日程正好又是議員先生們去吃飯。

5月27日，在对記錄問題作了长久的初步討論后，终于討論拉沃的建議了。东拉西扯到两点半鐘，然后吃飯去了；但是这一次在晚上也举行會議，所以这件事情总算結束了。由于国民議會过于迟緩，奥尔斯瓦特已經使拉沃的建議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拉沃先

生便同意了威納尔先生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对于解决人民主权的問題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我們沒有关于国民議會以后开会情况的消息，但是我們完全有根据認為，国民議会在解决了这个問題后就休会吃飯去了。議員們之所以能够这样早就去吃飯，应当感謝罗伯特·勃魯姆的一个意見，他說：先生們，如果你們今天決定轉到議事日程上去，这个議会的整个議事日程就很可能用极特殊的方法来縮短！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5月31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1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号



## 許澤尔

科倫 5 月 31 日。美因茲的許澤尔先生借助于古代的农奴服役章程和德意志联邦的陈旧法律发明了一种使普魯士人及其他德国人遭受甚至在 1815 年 5 月 22 日<sup>9</sup>以前也沒有遭受过的奴役的新方法。我們建議許澤尔先生索取他那新发明的专利权，因为这个新发明无疑能給他带来大笔收入。这个新方法是：放两个或好几个喝醉酒的士兵到大街上去，他們自然会和市民吵架。当局便进行干涉并逮捕士兵；这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要塞司令宣布城市戒严，沒收全部武器，讓居民去受肆无忌惮的丘八蹂躪。这个方法在德国特別有效，因为这里的要塞多半用于反对内部敌人，而不是反对外部敌人。这个方法之所以特別有效，是因为任何一个由人民供养的要塞司令，不管是許澤尔，或者是罗特·馮·施萊根施坦之流的封建人物，都可以做出国王或皇帝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可以取消出版自由，可以禁止非普魯士人的美因茲居民对普魯士国王和普魯士国家制度表示反感。

許澤尔先生的計謀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的巨大計劃的一部分。柏林反动派企图尽速解除全部市民自卫軍的武装，特別是萊茵省市民自卫軍的武装，逐漸地彻底地消灭刚刚开始形成的人民武装，并把我們赤手空拳地交給多半由德国其他部分的居民組成的軍隊去摆布，这些居民很容易受人唆使或者已經受人唆使来反

对我们。

在亚琛、特利尔、曼海姆和美因兹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写于1848年5月31日

载于1848年6月1日

“新莱茵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sup>10</sup>

波旁王朝还没有走完它那光荣的生活道路。可是，最近它的白旗上却布满了污点，雕谢的百合花无精打采地垂下了脑袋。查理-路易·波旁出卖了一个公国，并被迫可耻地从另一个公国逃跑；斐迪南·波旁失去了西西里岛，而在那不勒斯，革命迫使他同意实行宪法。路易-菲利浦虽然是个隐蔽的波旁，但是总算走过了法国波旁王朝所有后裔的传统道路，越过海峡到英国去了。而那不勒斯的波旁则为自己王朝的荣誉出色地报了仇。

议院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有人想利用议院开幕那一天来进行坚决的反革命斗争。暗地里把臭名昭彰的德尔·卡烈托的警察局的一个警官康坡巴索从马尔他岛召了来。于是，经过长期休息之后，无数武装巡警在他们旧上司的领导下又在托列多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解除市民的武装，脱下他们的大礼服，强迫他们刮胡子。议院开幕的日子——5月14日快要到了。国王要求议院必须宣誓对他恩赐的宪法不作任何修改。议院拒绝了这个要求。国民自卫军声明它站在议员方面。双方进行谈判，国王让步，各部大臣辞职。议员要求国王下诏宣布他所做的让步。国王答应第二天公布这个诏书。但是当天夜里，所有驻在附近的军队都向那不勒斯开动。国民自卫军相信它被出卖了；它构筑起了街垒，由五六千人守卫着。但是和他们对抗的有两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一部分是那

不勒斯人，一部分是瑞士人），并且还有 18 門大炮。介乎双方之間的是两万个那不勒斯流浪汉，他們暂时还没有加入斗争。

15 日早晨，瑞士人还声明他們不反对人民。但是混在人群中的一个瑞士奸細在托勒多街上向士兵們射击；圣艾里莫要塞立即升起了紅旗，这个信号发出后，士兵便猛烈攻击街垒。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国民自卫軍虽然遭到了士兵的大炮轟击，但仍然英勇自御，反击超过自己 3 倍的敌人。战斗从早晨 10 点鐘延續到半夜；如果不是法国海軍上将勃丹的卑鄙行动使流浪汉轉到保皇党方面去，虽然暴兵占有优势，人民还是会取得胜利的。

海軍上将勃丹率領着相当强大的法国艦队守卫在那不勒斯。只要及时而简单地用炮轟威胁一下皇宮和要塞，就会迫使斐迪南讓步。但是路易-菲力浦的老奴仆勃丹已經习惯于在 *entente cordiale* [亲切协商] 时期对法国艦队的容忍态度，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而驅使已經傾向于人民的流浪汉投到軍队方面去了。

那不勒斯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一步驟預决了革命的失敗。瑞士的近卫軍、那不勒斯的常备軍和流浪汉合力向保卫街垒的战士冲去。被霰弹肃清了的托勒多大街上的宮殿被士兵的大炮弹摧毁了。狂暴的战胜者匪帮冲入住宅，杀戮男人，刺死兒童，强奸和杀害妇女，搶光所有的东西，然后把被搶劫一空的住宅付之一炬。流浪汉貪得无饜，瑞士人残酷无情。人数多出 3 倍、装备精良的波旁王朝的雇用兵以及素来以同情圣仰派<sup>11</sup> 著称的流浪汉，在战胜了几几乎被消灭的那不勒斯国民自卫軍以后所干出的那种卑鄙野蛮的行为，簡直是难以形容的。

最后，甚至海軍上将勃丹也觉得这未免太过分了。难民在他的軍艦上相繼出現，他們叙述了城里发生的事情。他的水兵們的

法国的血沸騰了。只是現在，当国王的胜利已預決了的时候，勃丹才想到实行炮击。流血漸漸停止了；大街上不再杀人了，只是还有搶劫和暴行发生；可是，不經過法庭审讯就把俘虏带到要塞去枪毙了。半夜以前一切都已結束，斐迪南的专制政权实际上恢复了，波旁王朝的荣誉受到了意大利鮮血的洗滌。

这就是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象往常一样，正是瑞士人用自己的武器解决了这场有利于波旁王朝而反对人民的斗争。在1792年8月10日，在1830年7月29日，在1820年那不勒斯的各次战斗<sup>12</sup>中，我們到处都看到特里和維凱里得<sup>13</sup>的子孙在扮演波旁王朝的雇佣兵和奴仆的角色，这个王朝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早已成了君主制度的代名詞。自然，这种情况現在很快就会結束。各个較先进的州經過长久的爭論后做到了禁止簽訂軍事条約<sup>14</sup>；自由老瑞士的健兒再也不能蹂躪那不勒斯的妇女了，再也不能在发生起义的城市中大肆搶劫了；在他們失敗的时候，人們再也不会象对8月10日死亡的将士那样，用托尔瓦德森的獅子来使他們永垂不朽了<sup>15</sup>。

但是，波旁王朝暫時又可以輕松地叹一口气了。从2月24日<sup>16</sup>起抬头的反动势力在任何地方也沒有象在那不勒斯那样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今年的第一次革命正好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开始的。但是，专制制度的阴谋和国家政变是阻止不了猛烈冲击旧欧洲的革命怒潮的。斐迪南·波旁用5月15日的反革命政变为意大利共和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卡拉布里亚已被炮火所籠罩，巴勒摩已成立了临时政府；亚普露茨很快也会奋起，所有遭到經濟破坏的省份的居民将进攻那不勒斯，并和这个城市的人民一起去向叛徒国王和他的残酷的雇佣兵报仇。而当斐迪南死的时候，起碼有

---

一点会使他心满意足，那就是他的生和死都象一个名符其实的波旁。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5月3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1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1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民主派<sup>17</sup>

科倫 6 月 1 日。平常向代表社會輿論的任何新機關報提出的要求是：對於它在原則上同意的黨派採取熱烈支持的态度，無條件地相信這個黨派的力量，時刻準備用實際力量來維護它的原則或者用原則的光輝來掩蓋實際的軟弱無力。我們將不以這個要求為滿足。我們將不用虛偽的幻想去粉飾所遭到的失敗。

民主派遭到了失敗。它在自己勝利的時候所宣布的原則成了問題；它真正奪得的基地又逐漸被奪回去了；它已經喪失了很多東西，很快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它究竟還剩下些什麼。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讓民主派認識到自己的地位。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對黨派感到興趣，為什麼我們不去考慮民主運動的目的、人民的福利和所有的人的幸福呢？

這是鬥爭的法則和慣例。在觀點、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況下，新時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協和虛偽的合作等辦法來達到的，這種幸福只有經過各個黨派的**鬥爭**才能達到。

我們要求民主派認清自己的地位。這個要求是從最近幾個月的經驗中得出的。民主派過分陶醉於最初的勝利。在狂歡之後，它終於大聲而公開地說出了自己的原則，它以為只要把這些原則一宣布，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實現。除了在第一次勝利後宣布原則和緊隨着勝利作了一些讓步以外，它什麼也沒有干。但是，當它慷慨

激昂地叙述自己的观点并把任何一个不敢立刻反驳它的人作为兄弟来欢迎的时候，那些继承有权力或者受托行使权力的人们行动起来。他们的活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对于他们的那些仅仅是为了反对已被革命所推翻的制度而提出的原则闭口不谈，他们仿佛是为了重新建立法制和建立表面秩序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地制止住了运动；他们向旧制度的朋友们作了一些虚假的让步，以便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能更可靠地依靠他们，后来他们基本上逐渐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得以在民主派和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之间占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进攻，另一方面又强行后退，在同一时间内，对专制制度来说是进步的，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反动的。

这就是谨小慎微和中庸之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狡猾地欺骗了一开始就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政党。在人们轻视地把人民政党推到一旁，把它的拥护者宣布为暴乱分子，并且把一切最坏的意图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它还在梦中；当它还没有认识到，它除了资产者先生们认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容的那种东西以外一无所得的时候，它已经被别人欺骗了。被反民主的选举法弄得自相矛盾的人民政党，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现在反对它的有两个代议机关，而且很难说，其中哪一个更坚决地反对它的要求。结果，它的热情自然象烟一样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即意识到强大的反动派已取得了政权，而且奇怪的是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民主派在遭到初次失败后（这些失败一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便灰心失望，并回到倒霉的、可惜是德国人所特有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结果把不能马上实现的原则



延擱到遙远的将来，而目前則把它交給“思想家們”去作无害的研究，那就非常危險了。

我們要公开警告这些虛伪的朋友們，他們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則，但是却怀疑它們能够实现，理由据說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則的地步，而他們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願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假如宮廷顧問盖尔温努斯非常害怕这些隱蔽的共和主义者，那末我們衷心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些危險的人。

写于 1848 年 6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6 月 2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2 号

## 康普豪森在 5 月 30 日 會議上的聲明

科倫 6 月 2 日。Post et non propter [在这个之后，而不是由于这个]，这就是說，康普豪森先生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是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了首相的。康普豪森先生(用郑重而夸大的口吻，并且为了掩盖自己的心慌意乱，表面上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sup>18</sup>) 在 1848 年 5 月 30 日把自己內閣的这种革命后的 [nachträglich] 性質通知了根据他和間接复选人的協議召开的柏林議會<sup>19</sup>。

考察历史的朋友<sup>20</sup>說：“3 月 29 日成立的內閣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組成的，它过去和現在都不否認这一事件的意义。”

康普豪森先生声明說，他在 3 月 29 日以前并没有組閣，这可以在普魯士“国家报”<sup>21</sup> 近几个月的合訂本中得到証实。那个至少可以作为康普豪森的升天节的編年起点的日期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康普豪森先生)。在街垒战中牺牲的战士們的冰冷尸体成了通向 3 月 29 日內閣的道路上的路标和指南，这对他們是个多大的安慰。Quelle gloire! [多么光荣呵!]

总之，康普豪森內閣是在三月革命后組成的。这个康普豪森內閣承認三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至少不否認这个意义。革命本身是小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重大！它的意义就是至少在 post festum [事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內閣。

“这个事件（康普豪森內閣的成立还是三月革命？）<sup>①</sup>是改造我国內部制度的最重要的促进原因之一。”

这就是說，三月革命是成立 3 月 29 日內閣，即成立康普豪森內閣的一个“最重要的促进原因”。或者这应当理解为：普魯士的三月革命使普魯士革命化了？不管怎样，可以想見“考察历史的朋友”是会庄重地重复这句话的。

“我們处在后者（即改造我国的內部制度）<sup>②</sup>的前夜，政府也認為我們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远。”

总而言之，康普豪森內閣認為，在我們面前还有很长远的道路，也就是說，它打算长期存在下去。艺术即革命是短促的，生命即在革命后产生的內閣是长久的。它照例对自己估計过高。或者，康普豪森的話也許应当作别的解释？当然，考察历史的朋友未必能发表这样一种庸俗的声明：处在新历史时代前夜的各族人民正处在前夜，每个时代前面的道路就象未来那样长远。

这就是康普豪森首相的枯燥、严肃、客气、庄重和狡猾的演說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归結为下面三点：在三月革命以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內閣；康普豪森內閣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康普豪森內閣前面有很长远的道路！

我們現在来看一看第二部分。

康普豪森教誨說：“但是，我們絕沒有这样来估計形勢，即認為似乎由于这个事件（三月革命）<sup>③</sup>而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轉变，似乎我們的整个国家制度被推翻了，似乎一切現存的东西都已失去了法律基础，似乎全部制度都应该建立在新的法律基础上。恰恰相反，內閣在一成立的时候就一致認為自己存

---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在的条件是：不管反对召开联合議会的請願書怎么說，也要使当时召集的联合議会<sup>22</sup>能真正召开起来，以便在現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而不割断新旧之間的联系。人們始終不渝地坚持了这条无疑是正确的道路；向联合議会提出了选举法，經它同意后頒布了。后来又试图迫使政府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变这个法律，即把間接选举法变为直接选举法。政府沒有同意这样做。政府沒有实行专政，它也不可能实行专政，它不願意实行专政。选举法实际上正是按照它获得合法批准的那种形式付諸实施的。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了复选人，选出了代表。根据这个法律你們有全权在这里同国王协商制定能长期存在的宪法。”

为了理論可以放弃王国！为了王国可以放弃理論！

最初出現了“事件”——革命的羞怯的标志。然后出現了理論，并用欺騙的方法把“事件”化为烏有。

不合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了負責任的首相、变成了人物，这个人物在旧条件下，在过去的制度下沒有地位，沒有任何意义。我們用翻斤斗的办法越过了旧的东西，并且順利地获得了負責任的首相，而負責任的首相更加順利地获得了理論。負責任的首相一出現，君主专制制度就死亡了，毁灭了。在和君主专制制度一块死亡的东西中，首先有已故的“联合議会”——这个令人作呕的古代玄想和現代欺騙的混合物<sup>23</sup>。“联合議会”是“亲切而忠誠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順从的小驢子”。就象德意志共和国只有越过費奈迭先生的尸体才能庆祝自己的降临一样，負責任的内閣只有越过“亲切而忠誠的”联合議会的尸体才能出現。于是負責任的首相竭力想把被遺忘的尸体挖出来，或者把亲切而忠誠的“联合議会”的幽灵召唤来。这个幽灵的确出現了，但是它在空中游蕩，东搖西晃，丑态百出，这是由于它脚下已經沒有基础的緣故，因为旧的法制和信任的基础已被地震的“事件”吞噬了。魔术师向

幽灵启示說，他把它召喚来是为了給它办理遺產手續并取得作它的合法繼承人的权利。对这种謙恭的态度是不能予以过高的估价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强迫死人在死后写遺囑的事情。受到恭維而兴高采烈的幽灵就象中国的木偶一样，連連点头表示願意听从魔术师的一切命令，在出門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消逝不見了。間接选举法就是它死后的遺囑。

可見，康普豪森先生“在現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所利用的学理主义的戏法是这样变的：

从“現存制度”的观点来看，从“旧事物”的观点来看，非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非法的人物、負責任的首相、立宪大臣。立宪大臣非法地把反宪法的、等級制的、亲切而忠誠的“联合議會”变成制宪議會。亲切而忠誠的联合議會非法地伪造間接选举法。間接选举法創立柏林議會，柏林議會創立宪法，而宪法又創立后来的一切永世长存的議會。

鵝下了鷄蛋，鷄蛋也孵出了鵝。但是，人民根据拯救了卡皮托里的鵝的嘎嘎叫声<sup>24</sup>很快就会知道，他們在革命时期放下的勒达的金鷄蛋被盜走了。甚至米尔德議員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兒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sup>25</sup>。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6月2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3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3号

## 生死問題

科倫 6 月 3 日。時間在變化，我們也隨着時間在變化。我們的大臣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對這句格言想來是不無感慨的。想當年，他們還以平凡的議員資格坐在議會的課桌后面的時候，他們受盡了政府委員和總管<sup>26</sup>的氣！在倒數第二年級中，即在萊茵省議會中，班主任佐爾姆斯-利希閣下對待他們是多麼嚴厲呵！當把他們升入畢業班，即升入聯合議會的時候，才算讓他們作了一些講演術練習。但甚至在這裡，他們的學校教員阿道夫·馮·羅霍夫先生還把陛下授給他的板子高舉在他們的頭上！他們不得不忍氣吞聲地忍受博德爾施文克的傲慢的言詞，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听取博伊恩用半通不通的德語所作的演說，他們還不得不对杜厄斯堡的那種粗暴無禮的行為表示順民的馴服！

現在一切都變了。3 月 18 日結束了政治中的這種書生氣味，聯合議會中的學生自己給自己發了畢業證書。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當了大臣，他們非常高兴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必要人物”是多麼偉大。

他們把自己想象得那樣的“必要”，以致他們一出學堂門就翹起尾巴，目空一切。每一個和他們接觸過的人都會感覺到這一點。

他們立刻從暫時恢復舊的教室——聯合議會做起。在這裡必須完全按照指示的形式舉行由官僚制的中學向立憲制的大學過渡

的伟大典礼，隆重地发給普魯士人民中学毕业証書。

人民在許多委托書和請願書中声明說，他們对于联合議會連知道也不願知道。

康普豪森回答說（如制宪議會 5 月 30 日的會議）<sup>①</sup>，召集議會是內閣的生死問題，这样就堵住了人們的嘴。

議會召开了，这是个对世界、对上帝、甚至对自己本身都丧失了信心的、被弄得体无完肤的可怜的議會。人們向它示意說，它的職責最多不过是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法，但是康普豪森先生要求它的不仅是一紙法律和間接选举，而且还有 2 500 万硬币。各选民組仓皇失措，开始怀疑自己的权限，并且語无倫次地在那里嘟嘟囔囔。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康普豪森先生的內閣决定，如果不給錢，如果拒絕給它“信任投票”，康普豪森先生就要离开这里到科倫去，讓普魯士的君主制度去听憑自己命运的摆布。議會的議員先生們一想到这里就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停止了任何反抗，带着辛酸的微笑通过了信任案。不言自明，这 2 500 万只有在空中王国才有行情的硬币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样获得通过的。

宣布实行間接选举。反对这样做的奏摺、請願書、代表团象暴风雨般涌来。大臣先生們回答說，內閣的存在和間接选举息息相关。此后，所有的人又都鴉雀无声，双方都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妥協議会在开会。康普豪森先生想强迫議會通过一个奏摺来作为对御前演說的回答。建議由敦克尔議員提出。展开了討論。对奏摺提出了相当尖銳的反对意見。軟弱无力的議会的无穷无尽

---

① 見本卷第 29 頁。——編者注

的、慌乱悵惘的廢話使漢澤曼先生厭煩了，因為這些廢話同他所喜歡的那種議會是不合拍的。于是他斬釘截鐵地聲明：這一切都毫無用處，——或者是起草奏摺，那末一切都沒有問題；或者是任何奏摺也不起草，那末內閣就提出辭職。但是辯論仍然在繼續進行。最後康普豪森先生只得親自出馬，他上台向大家說明，奏摺問題是內閣的生命問題。當這也無濟於事的時候，奧爾斯瓦特先生也起來發言，他鄭重地聲明（第三次），內閣的命運和奏摺的命運息息相關。在這之後，議會才完全被說服，自然也就通過了奏摺。

這樣一來，我們的“負責任的”大臣在兩個月內就學會了杜沙特爾先生領導議會的經驗和沉着的口吻，而杜沙特爾先生（他的作用當然不容忽視）的這種經驗和口吻只是在同倒數第二屆法國議會打了多年交道之後才學會的。當左派的冗長演說使杜沙特爾先生厭煩了的時候，他最後也總是聲明說：議會辯論結束，它可以投票表示贊成或反對；如果它投票反對，我們就提出辭職。於是胆怯的多數派（對他們來說杜沙特爾先生是世界上“最必要的”人）便向杜沙特爾緊緊靠攏，就象羊群在響雷時緊緊靠攏自己的遭到危險的牧人一樣。杜沙特爾先生是個輕率的法國人，他把這個把戲一直玩到使他的同胞討厭時才停止。康普豪森先生是個善良而穩健的德國人，他知道如何適可而止。

當然，能夠象康普豪森先生深信自己的“妥協派”那樣深信自己人，那就既省時間，又省論證。只要在討論每一項問題時提出信任案，就不難堵住反對派的嘴。因此，這個方法對於最果斷的大政治家，即對於杜沙特爾和漢澤曼之流的政治家來說，是最適合不過的了，因為他們非常明了自己需要什么，他們對於任何無目的的空談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對於喜歡在“大辯論中發表意見，就過



去、現在和將來的問題交換意見”(康普豪森在 5 月 31 日會議上的演說)的辯論英雄們來說,對於堅持原則立場並以哲學家的銳利目光來觀察目前事件的實質的人們來說,對於象基佐和康普豪森那樣高尚的思想家來說,這種微小的世俗手段是根本不適用的,我們的首相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對這點將深信不疑。讓他把這種手段授予自己的杜沙特爾-漢澤曼,而自己則留在更高的天體中吧;我們很樂意在那裡觀察他。

寫於 1848 年 6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8 年 6 月 4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4 號

## 康普豪森內閣

科倫 6 月 3 日。大家知道，在 1789 年法国国民議會之前有过一个名士會議，这个會議象普魯士的聯合議會一样，是根据等級原則成立起来的。奈克尔大臣在召集国民議会的指令中援引了名士們要求召集三級會議的願望。这样看来，奈克尔大臣比康普豪森大臣有很大的优点。他不是等待巴士底獄遭到冲击和专制王朝顛复之后再来学究式地把旧的和新的联系在一起，再来勉为其难地幻想法国似乎是在旧国家制度的合法手段帮助下建立了新的制憲議会的。奈克尔还有另外一些优点。他是法国的大臣，而不是洛林和亚尔薩斯的大臣，而康普豪森虽然是普魯士的大臣，却不是德国的大臣。尽管有这些优点，奈克尔大臣也并没有把革命运动納入平靜的改良軌道。严重的疾病是不能用玫瑰油来医治的。康普豪森先生要想用目的在于确定他的內閣和普魯士王朝旧制度之間的直接联系的虛假理論来改变运动的性質，是更难办到的。用任何陰謀詭計也絕不能把三月革命和德国革命运动变成一系列饒有趣味的插曲。路易-菲力浦是否因为他是个波旁而被选为法国人的国王？或者他虽然是个波旁，可是仍然被选为国王？在七月革命后不久圍繞着这个問題进行的热烈爭論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記的。这个問題本身証明了什么呢？証明了革命已經发生問題，証明了革命的利益并不是掌握政权的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利益。

---

康普豪森先生的声明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声明說：他的內閣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产生的，而是在三月革命之后产生的。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6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4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4号

## 战争的喜剧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我們德国目前正在对丹麦这个小国进行全民的战争，象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以武力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惊人手法，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拥有 600 个司令官、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旧帝国军队的伟大行动，1792 年联盟的司令官之间的互相倾轧，已经仙逝的帝国内廷军事顾问的出尔反尔的命令，——这一切和德意志联邦<sup>27</sup> 的新军队目前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演出的、成为全欧洲的笑柄的战争喜剧比较起来，似乎反而是意义重大、激动人心和带有悲剧性的了。

现在扼要地谈谈这个喜剧的情节。

丹麦人从日德兰出发进攻，使部队在北什列斯維希登陆。普鲁士人和汉诺威人占领伦特斯堡和埃德尔战线。丹麦人是生气勃勃和勇敢的人民，他们不理睬德国人给他们制造的坏名声，迅速地展开进攻，经过一场战斗就把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击退到普鲁士人的阵地上去。而普鲁士人却在袖手旁观。

最后，柏林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德国的联军向丹麦人发动进攻，并借助于优势的兵力在什列斯維希击溃了丹麦人。所以能取得这次胜利，主要是由于波美拉尼亚近卫军象从前在格罗斯-培伦和登内维次<sup>28</sup> 那样灵活地进行了白刃战。什列斯維希又被占领，德国为它的军队的英勇事迹而欢呼。

与此同时，为数不超过 20 艘大軍艦的丹麦艦队拦截德国的商船，封鎖德国所有的港口，掩护軍隊向各个島屿撤退。日德兰因而听憑命运的摆布，而且部分地区已被普魯士人占領，他們向日德兰索取 200 万塔勒的香料作为賠款。

但是，連一个塔勒的賠款都还没有取得，英国就提出了調停建議，主张退出什列斯維希和宣告該地中立，俄国也发出了威胁性的照会。康普豪森先生立刻落入給他設置的圈套，陶醉于胜利的普魯士人按照康普豪森的命令从菲耳撤向克尼格紹、哈德尔斯列本、阿彭拉特<sup>①</sup>和弗倫茲堡。一度消声匿迹的丹麦人立刻又出現了；他們日以繼夜地追击普魯士人，使撤退的队伍陷入混乱状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登陆，在宋德維特<sup>②</sup>打敗了联軍第十軍，只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才实行退却。5 月 30 日的战斗又是由白刃战来解决的，但这一次枪托却操在梅克倫堡人的坚强的手掌中。德国的居民和普魯士人一起逃跑了；整个北什列斯維希遭到洗劫，丹麦的旗帜又飄揚在哈德尔累本和阿彭拉特的上空。显然，普魯士的各級軍人在什列斯維希就象在柏林一样只是盲目地服从命令。

柏林又发出命令：普魯士人必須再次发动进攻。現在他們又精神抖擻地向北推进。但是这个喜剧还没有結束。我們等着瞧吧，看看这一次普魯士人又会在哪里接到撤退的命令。

总而言之，这是康普豪森內閣为了自我欣賞和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而演出的地道的卡德里尔舞和軍事芭蕾舞。

但是我們不应当忘記，这个剧場的舞台是由燃烧着的什列斯

① 丹麦称作：康格-奧、哈德尔斯列夫和奧卡罗。——編者注

② 即宋涅韦德。——編者注

維希村庄的火焰照亮的，而合唱队是由丹麦的“兵痞”和叫喊复仇的志願兵組成的。

康普豪森內閣用这个事件証明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負有代表德国的崇高使命。由于康普豪森內閣的过失而两次被弃置不理和遭受丹麦人侵略的什列斯維希，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来紀念我們“負責任的”大臣們的这个初次的外交实验。

我們可以信賴康普豪森內閣的英明和毅力！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4日

載于1848年6月5日

“新萊茵报”第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反 动 派

科倫 6 月 5 日。願死者安然升入天堂<sup>29</sup>。康普豪森先生背弃了革命，反动派竟敢建議妥協議会辱罵革命是暴乱。在 6 月 3 日的會議上有一个議員提議給 3 月 18 日死亡的士兵建立紀念碑。

写于 1848 年 6 月 5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新萊茵报”第 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

科倫 6 月 5 日。象 1793 年的巴黎一样，柏林现在有了自己的 Comité de sûreté générale [社会安全委员会]。不同的是：巴黎的委员会是革命的，而柏林的委员会却是反动的。据柏林的消息说：“负责维持治安的各个当局”认为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委员会，会址设在奥贝尔瓦尔大街。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如下：(1) 主席——内政部长普特卡默；(2) 卫戍司令及前任市民自卫团总指挥阿朔夫；(3) 警察总监米奴托利；(4) 检察官泰梅；(5) 市长瑙宁和两名市政局委员；(6) 市参议会会长和 3 名参议员；(7) 5 名军官及两个市民自卫团士兵。这个委员会将

“了解一切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安宁的事件，并将全面地和认真地研究事实。它将不采用过去种种旧的和不适用的手段和方式，它将避免多余的手续，它将和各方商谈采取适当的办法并通过各个管理机关来迅速而有效地实行必要的措施。只有采用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一致行动的办法，才能作到既迅速、坚决，又有先见之明。特别是负责保卫城市的市民自卫团将有可能在必要时使得在它参加下通过的当局的各项决定产生应有的效力。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定会受到全体居民尤其是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和(!)工人的同情和协助。同任何党派的观点和倾向没有关系的议员已经着手执行自己的艰巨任务，并希望能够主要采用使大家安宁的和平调停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



这种阿諛奉承、委婉哀求的語調使人預感到，一个反对柏林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已經在这里形成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員就証实了这一点。首先是普特卡默先生，就是那个在担任警察总监时曾以发布驅逐令聞名的普特卡默先生。完全和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一样：無論哪一个重要机关至少都要有一个普特卡默。其次是阿朔夫先生，他由于粗暴的丘八作风和反动的阴謀詭計而引起了市民自卫团的极大憎恨，以致市民自卫团决定要撤換他。他也确实辞职了。其次是米奴托利先生，他在 1846 年揭露了波兰人的阴謀，因而在波茲南拯救了祖国，不久前当排字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資而实行罢工的时候，他又用流放来威胁他們。再其次是已經变得极端反动的两个机关即市政局和市参議会的代表，最后还有市民自卫团的軍官及其反动头子布莱桑少校。我們希望柏林人民無論如何不要讓这个冒牌的、反动的委员会来保护自己。

这个委员会已經开始进行反动活动，要求取消原定昨天（星期日）举行的到三月牺牲者的陵墓去的群众游行，因为这是示威游行，而示威游行总是有害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6 号

## 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 法兰克福左派的綱領

科倫 6 月 6 日。昨天，我們向我們的讀者报道了“激进民主党<sup>30</sup>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制宪国民議会上所发表的論証性宣言”。在法兰克福新聞栏里，今天你們将看到左派的宣言。乍看起来，好象这两个宣言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激进民主党編輯的文笔拙劣，左派編輯的文笔練达。但是細看之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文件有着本質的差别。激进党的宣言要求在“不限資格的选举”的基础上“并采取直接投票的方式”召开国民議会，而左派的宣言則要求在“自由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国民議会。自由普选固然沒有資格的限制，但絕不排斥間接选举。用这种含糊其詞、模稜两可的說法的用意究竟何在呢？

我們再一次覺察到，和激进党的要求相反，左派的要求是非常曖昧、非常含糊的。左派要求“由国民議会在一定期間选出对国民議会負責的中央权力执行机关”。但这种中央权力机关是否應該象激进党的宣言所明确要求的那样从国民議会內部选出，這個問題它却沒有加以解决。

最后，左派的宣言要求立即規定、宣布并保証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防止各邦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一切可能的侵犯。而激进党的宣言并不以此为滿足。它宣布：

“国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国的一切国家权力統一于自身，并立即行使各种权力和实现它所应确立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同时也应指导整个国家的内外政策。”

两个宣言的共同点在于：它們都力图“只讓国民議會去制定德国宪法”，而不許各邦政府过問此事。两者的共同点还在于：它們“在不損害国民議會所应宣布的人民权利的原則下”，讓各邦去选择国家制度，不論是君主立宪制或者是共和制。最后，两个宣言都認為德国应成为联盟国家或联邦国家。

激进党的宣言至少反映了国民議会的革命性質。它要求适当的革命行动。难道制宪国民議會存在这一事实不正好証明了任何宪法都不存在嗎？既然任何宪法都不存在，那末任何政府也都是不存在的。既然任何政府都不存在，那末国民議會就应该自己来管理。国民議會活动的第一个表现应该是由 8 个字組成的法令：“永远解散联邦議會<sup>31</sup>”。

制宪国民議會首先应该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議會。而法兰克福議會却象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議會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會議在充分討論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經把刺刀指向議事日程，那末，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德国国民議會患着德国特有的病症，何况它还是間接选举的产物。国民議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仅仅是一个理想的中心，这个理想的中心仅仅适合于过去所理想的即想象中的德国的統一。法兰克福也不是一个拥有大量的能捍卫国民議會并推动国民議會前进的革命居民的大城市。大民

族的制宪議会在小城市召开，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德国过去发展的遗产。法国和英国的国民議会处在巴黎和倫敦的火山口上，而德国的国民議会却找到了一块中立的基地可以从容不迫、冷靜沉着地考虑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这一点它應該認為很幸运。德国当时的状况总算使国民議会有可能去克服极为不利的生存条件。国民議会本来應該处处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中間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反动势力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却眼睜睜地讓美因茲遭受暴兵們的肆意蹂躪，讓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成为法兰克福庸人的惡意挑剔的牺牲品<sup>①</sup>。这个會議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廢話連篇，使人民感到厭倦。誠然，对国民議会來說，观众是存在的，他們有时还会带着善意的幽默来观赏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国国会复活了的幽灵的有趣动作，但是对国民議会來說，人民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議会的生活中找不出人民生活的反映。到現在为止，国民議会連革命运动的回声也够不上，更不用說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

即使国民議会能从自己內部选出中央政权，但是以它現有的成員而論，再加上坐失良机，也很难期待这样的临时政府会做出什么令人滿意的事情。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权，那它就等于自动辞职，稍微有一点革命风浪就会彻底瓦解。

左派的綱領也和激进党的綱領一样，其功績就是認清了这个必然性。两个綱領和海涅一起声明：

“只要我們能深思熟慮，  
我們就根本用不着皇帝。”<sup>32</sup>

<sup>①</sup> 見本卷第15—17頁。——編者注

“誰應該当皇帝”这一难于解决的問題，以及那些替选举的皇帝或世袭的皇帝辯护的許許多多充实的論据，迫使国民議会的保守派多数也断然拒絕选举任何皇帝。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所謂的激进民主党如何能把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的**联邦**，即以共和政府为首的、由如此不同的成分所組成的联盟国家（左派所主张的中央机关正是如此）宣布为德国的最終於国家組織。

毫无疑问，国民議会所选出的德国中央政府最初必然会跟事实上还存在的各邦政府同时**并存**。但中央政府一經产生，就会同各邦政府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不是中央政府同德国的統一同归于尽，就是各邦政府同它們的立宪君主或小共和国一起消失。

我們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 a priori [預先] 宣布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們要求所謂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們的最終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統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終於确立不能依靠頒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們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問題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見，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問題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議会只應該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間切实可行的步驟。

不管民主党宣言的拟訂者如何要我們确信“每个人都乐于摆脱自己的糊塗思想”，但是他把北美联邦国家作为德国宪法的蓝本这种奇怪的思想却是再糊塗不过的了！

北美合众国所占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更不必說它的各个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結構。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相

似。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正当一些大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形成的时候，德国陷入到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义里去了，而正当世界市场为西欧开放的时候，德国又被排挤出世界市场了。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德国却贫穷下去。这些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德国却变成了农民国家。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分裂为 39 个小邦的领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现代的社会任务呢？

但是，民主党纲领的拟订者没有必要涉及据说是次要的物质经济关系。他的论证超不出联邦这个概念的范围。联邦就是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因此，德国应当成为联邦国家。难道德国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就会违背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这个概念吗？

写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7 号

## 柏林的妥協辯論<sup>33</sup>

科倫 6 月 6 日。关于妥協等等的辯論正在最愉快的气氛中在柏林进行。提案一个接着一个，为了不致在提交各部門和各委員會的漫长过程中半途擱淺，大多数提案甚至提出了五六次。一有机会，就有許許多多先決的問題、相關的問題、中間的問題、補充的問題以及主要的問題提出来。在討論每一个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的时候，总是“立即”和主席、大臣等暢談起来，在令人疲憊的“大辯論”中，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休息。那些通常被速記专家称作“票”的匿名的妥協分子，尤其喜欢在这些暢談中傾吐自己的意見。但是，这些“票”太为自己的投票权驕傲了，他們有时甚至“同时既投贊成票又投反对票”，6 月 2 日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十分不幸，在这幽閑的生活中竟爆发了一场大辯論式的斗争，参与这场斗争的不仅有講台上的发言，而且还有妥協派的合唱：他們跺脚，喧嚷，爭相喊叫，不一而足。自然，这种戏每次都以道貌岸然的右派取得胜利而結束，而且差不多每次都由保守大軍提議表決来解决。

在 6 月 2 日的会上，**荣克**先生就同俄国达成引渡逃亡罪犯的协定一事向外交大臣提出了質問。大家知道，早在 1842 年社会輿論曾迫使撕毀这一协定，但是到 1844 年反动时期又恢复了。誰都知道，俄国政府对于引渡給它的人不是活活打死，就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誰都知道，引渡刑事犯和流浪者的协定，不过是将政治流亡

者引渡給俄国当局的一种方便的借口罢了。

外交大臣阿尔宁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用說，誰也不会反对引渡逃兵，因为按一般的慣例，友邦之間是經常互相引渡逃兵的。”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大臣看来，俄国和德国是“友邦”，俄国陈兵于布格河和尼門河上，实际上无非是要尽快地使“友好的”德国摆脱革命的威胁。

“而且，引渡罪犯要由法庭作出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証被告在刑事审讯結束以前不会被引渡。”

阿尔宁先生力图使議会相信，好象普魯士法庭在审理对罪犯們的控告。其实完全相反！俄国的或俄屬波兰的司法机关只是把审讯某个流亡者的决定送交普魯士当局。普魯士当局只須查明該文件是否确实，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法庭就应作出引渡的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証”，俄国政府只需示意一下自己的法官，就可以把带着普魯士镣铐的任何流亡者弄到手里，只要对该流亡者还未提出政治性的控告。

“自己的臣民不应引渡，这是不言而喻的。”

封建的馮·阿尔宁男爵先生，“自己的臣民”早已不能引渡了，因为自从人民敢于占据街垒为自己爭取自由以来，在德国已不存在什么“臣民”了。

“自己的臣民”！就是指我們这些选举国民議会，制定国王和皇帝也得遵守的法律的人嗎？我們是普魯士国王陛下的“臣民”嗎？

“自己的臣民”！要是国民議会还有一点点革命的驕傲（国民



議會所以存在，應歸功於這種驕傲），它就應該同聲斥責卑躬屈膝的大臣，把他從講台上和大臣席位上哄走。可是它對這種侮辱的話却置若罔聞，毫不表示抗議。

雷費德先生就 Seehandlung [海外貿易公司]<sup>34</sup> 恢復收購羊毛並在票據貼現上優待英國買主而薄待德國買主一事向漢澤曼先生提出了質問。由於總危機而每況愈下的羊毛工業，原以為按照今年極低的价格收購羊毛至少能獲取一點利潤。不料來了一個 Seehandlung，它的大量收購使得價格暴漲。同時，該公司對倫敦的可靠票據的貼現大大地方便了英國買主的收購；這一措施也因招徠新的買主而引起價格上漲，使外國買主比本國買主獲得更多的好處。

Seehandlung 是君主專制政體的遺物，曾被君主專制政體用來達到種種目的。20 年來該公司把 1820 年的國債法變成了一紙空文，而且非常可惡地干預着工商業。

雷費德先生所談的問題，實際上和民主派沒有多大關係。這裡的問題是：是羊毛生產者或多或少地得到幾千塔勒的利潤呢，還是羊毛加工者得到幾千塔勒的利潤。

羊毛生產者幾乎全是大地主，勃蘭登堡、普魯士、西里西亞和波茲南的封建主。

羊毛加工者大部分是大資本家，大資產階級的代表。

所以，羊毛價格問題不是一般利益的問題，而是階級利益的問題，是誰剪誰的問題，是土地貴族剪大資產階級呢，還是大資產階級剪土地貴族。

作為現在的執政黨即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派到柏林去的漢澤曼先生，卻把大資產階級出賣給了戰敗的貴族地主。

对我们民主派来说，有意义的只是汉澤曼先生现在站到了战败者的一面，他支持的不是单纯保守的阶级，而是反动的阶级。我们的确没料到资产者汉澤曼会来这么一手。

汉澤曼先生起初证明他绝不是 Seehandlung 的庇护者，然后又补充说：不应立即停止 Seehandlung 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至于收购羊毛，那是有合同的，根据合同，今年收购一定数量的羊毛是…… Seehandlung 的义务。我认为，如果说这种收购有一年能使私人周转不受损失的话，那末这正是今年(?)……因为，不这样价格就会一落千丈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汉澤曼先生是言不由衷的。他曾答应要损害羊毛加工者的利益来讨好阿尔宁、沙夫科奇和伊岑普利茨这一类人物，而现在又不得不从对贵族十分无情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引经据典，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辩护。他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他是在愚弄整个国民议会。

“不应立即停止 Seehandlung 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因而，Seehandlung 还在收购羊毛并让它的工厂加紧生产。既然不应立即“关闭”Seehandlung 的工厂，自然也就不能中止收购。因此，Seehandlung 仍将以自己的毛制品供应市场，使本来就已饱和的市场更加饱和，使本来就很低廉的价格继续下跌。总而言之，为了使勃兰登堡和其他地方的容克地主们在他们的羊毛上发财，Seehandlung 将使目下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将夺去羊毛加工者们目前仅有的一些顾客。

至于说到英国票据问题，汉澤曼先生发表了一篇辉煌的演说，说明英国基尼落入勃兰登堡容克地主们的腰包会使整个国家得到巨大的利益。当然，我们不想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理

解汉澤曼先生当时怎么能够保持严肃認真的态度。

在这次會議上还討論了为波茲南任命一个委員會的問題。这事明天再談。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6 月 7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7 号

## 妥 協 辯 論

科倫 6 月 6 日。在 6 月 2 日的柏林妥協會議上，羅伊特先生提議任命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波茲南內戰<sup>35</sup>的原因。

帕里鳩斯先生要求立即討論這個提案。

主席正想把這個問題提交表決，康普豪森先生提醒說，帕里鳩斯先生的提案根本還沒有討論：

“從我自己方面來說，我也應該提請大家注意，通過這個（羅伊特的）<sup>①</sup>提案就意味着通過一個重要的政治原則，但是，這個原則有權（sic！〔請注意！〕）要求各部門事先加以研究。”

我們很想知道這個包含在羅伊特提案中的“重要原則”，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對這個原則一直避而不談。

當我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這方面的解釋的時候，會議主持人（副主席埃塞爾先生）和許多“票”却在准許或不准許辯論帕里鳩斯的提案這個題目上談論起來了。當時埃塞爾先生所依據的是 *soi-disant*〔所謂〕國民議會的主席口中發出的各種怪論，例如，“我本來想，凡是國民議會要解決的問題都准許討論！”

“我本來想”！人在想，而康普豪森先生在操縱，——他擬定了誰也不能理解的會議規則草案，並且強迫自己的國民議會臨時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通过。

这一次康普豪森先生是仁慈的。他需要討論。要是不討論，也許会通过帕里鳩斯的提案，会通过罗伊特的提案，也就是說，会間接通过对康普豪森先生的不信任案。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不討論，他的“重要的政治原則”会发生什么問題呢？

于是进行討論。

帕里鳩斯先生希望立即討論主要的提案，以免浪費時間，并且使委员会能够在討論奏摺以前提出自己的报告。否則，在草拟奏摺时势必对波茲南的情况一无所知。

莫伊澤巴赫先生起来反对，但是态度相当温和。

可是里茨先生接着起来发言，他迫不及待地要否决罗伊特的煽动性的提案。他是普魯士王国的諮議，不能容忍任何議會（即使是妥協議会）干預他的权限。他認為只有一个机构有这种权利，这就是总督署。在他看来，再沒有比从屬关系更高的东西了。

他大声叫道：“諸位先生，你們想怎样派遣委员会到波茲南去呢？难道你們想把自己变成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嗎？諸位先生，从提案中我看不出你們打算干什么。难道你們想向司法当局（可怕！）<sup>①</sup>的統帥或者向行政当局（諮議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說不出話来）<sup>②</sup>的統帥要文件嗎（何等狂妄！）<sup>③</sup>？难道你們想委托仓卒成立的委员会（大概沒有經過任何考試）<sup>④</sup>去調查任何人都还没有弄清楚的东西嗎？（大概里茨先生只是为了調查任何人都已經弄清楚的东西，才任命委员会的。）<sup>⑤</sup>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你們竟要越俎代庖……”（抗議。）<sup>⑥</sup>

对于这个旧式的諮議，这个微末小吏有什么可說的呢？他倒象卡姆画中的那个乡下人，二月革命后他来到巴黎，看見牆上都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着«République française»〔法兰西共和国〕的標語，就到总檢察官那里去告密，說有坏分子要推翻国王的政府。这个可怜的人过去一直在睡覺。

里茨先生也睡着了。“波茲南問題調查委員會”这句雷鳴般的話把他惊醒了，他还在睡眼矇矓中就惊叫起来：难道你們想越俎代庖嗎？

敦克尔先生認為成立調查委員會是多余的，“因为奏摺起草委員會應該要求內閣作必要的解釋”。但是要知道，成立委員會正是为了查对內閣的“解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布洛姆先生說这个提案必須立即討論。這個問題應該在討論奏摺前解决。有人談到仓卒成立的委員會。昨天汉澤曼先生的內閣信任案也是仓卒提出的，但是对這個問題进行了表決。

在进行所有这些乏味的辯論的时候，汉澤曼先生大概正在反复考虑他的新的財政計劃，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才从金色的幻梦中惊醒过来。他对談話的內容茫无所知。但是既然已經叫到他的名字，他就得講話。他还記得起来的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有两点：他的上司康普豪森的演說和里茨的演說。他在奏摺問題上說了几句空話以后，用他們二人的演說拼凑成了下面这篇雄辯的杰作：

“現在还不知道委員會到底要做什么，要派遣自己的委員到大公国去，还是要做别的什么事情。正是这种情况証明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而在这里馬上解决這個問題，就是对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采取草草了之的态度。我想国民議會不会这样做，我信任国民議會，相信它会慎重行事……”

汉澤曼先生給国民議會下这种結論，未免太輕視国民議會！我們要任命的委員會也許会派到波茲南去，也許不会派去。正是由于我們不知道委員會應該留在柏林，还是應該派到波茲南去，所

以是否應該任命一個委員會的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所以它就成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但是這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到底是什麼，漢澤曼先生現在還沒有說出來，正如康普豪森先生不肯說出自己的重要的政治原則一樣。讓我們再說一遍，我們要耐心等待！

漢澤曼的邏輯給人一種非常可怕的印象，以致立即有人起來要求中止辯論。當時就表演了這樣一幕戲：

**榮克先生**要求發言，他反對中止辯論。

**主席**：在我看來，要發言反對中止辯論是不許可的。

**榮克先生**：按通例，可以讓人發言反對中止辯論。

**泰梅先生**念了暫行會議規則第 42 條，根據這一條，**榮克先生**是對的，而**主席**是不對的。

**榮克先生**獲准發言：我反對中止辯論，因為最後發言的是大臣。大臣的發言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把大部分人都吸引到一邊去了，因為議會上大部分人都**不願意拒絕大臣……**

啊啾！啊啾！一片喊聲經久不絕。右派席位上發出可怕的喧囂聲。

法律顧問**摩里茨先生**（即席）發言：我提議叫**榮克先生**守規矩，他竟敢對整個國民議會進行人身攻擊！（！）

“右派”那一边又有人喊道：我附議，我抗議……

喧囂聲越來越厲害。**榮克**使盡了渾身力氣也無法壓倒這種喧囂聲。他要求主席讓他繼續講下去。

**主席**：既然國民議會表示了自己的意志，我的職責已經盡到了。（！！）

**榮克先生**：國民議會沒有表示自己的意志；您首先應該進行正

式的表决。

荣克先生不得不走下讲台。他不离开讲台，喧嚣声就不会平息。

主席：看来（！）刚才这位发言人是反对中止辩论的。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发言赞成中止辩论。

罗伊特先生：中止辩论还是继续辩论的辩论已经化费了15分钟；再辩论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位发言人接着又絮絮谈到必须立即讨论任命委员会的提案。这使得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次发言，阐明自己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汉泽曼先生：先生们！事情关系着一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说，国民议会是否打算走上那条会引起严重冲突的道路的问题！

果然！汉泽曼先生就象始终如一的杜沙特尔一样，又宣称所讨论的问题是信任问题了。对他来说，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说，都是信任问题，而信任问题，对他来说，自然又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看来，这次康普豪森先生对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是不满意的。他说话了。

“应当指出，要是议员愿意提出质询（要知道人们愿意亲自查明！）<sup>①</sup>，国民议会也许已经了解情况了（关于波兹南）<sup>②</sup>。这就可以成为一条使问题得到阐明（但是怎样阐明？）<sup>③</sup>的捷径。……我最后要宣布，整个提案的本质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为了某种目的而成立调查委员会；我完全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加以周密考虑和阐明，但是我不同意在这里这样仓卒地把它提出来讨论。”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这样一来，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則”就成了这样一个問題：妥協議会有权利成立調查委员会，还是它自己有意放弃这个权利！

法国和英国的議會早已成立了这类調查 (enquête, parliamentary inquiry [議會調查]) 委员会 (select committees [議會特別委员会])，而且那些循規蹈矩的大臣們从来不反对这样做。沒有这些委员会，大臣們的責任就会变成一句空話。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却否認妥協派有这种权利！

够了。說話容易表決難。辯論快要結束，表決就要进行，而无窮的困难、猶豫不決、卖弄聰明和良心譴責都产生了。但是我們不想使我們的讀者陷到这里面去。在連續不断的高談闊論之后，帕里鳩斯的提案被否決，罗伊特的提案被提交給各部門。願它安然瞑目！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8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8号

## 奏摺問題

科倫 6 月 7 日。柏林議會為了使內閣有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和證明它過去的活動是正當的，決定向國王呈遞奏摺。據說這個奏摺不應當象過去省議會的感恩書那樣，甚至也不應當成為請安的文疏：據陛下至尊的“負責任的”各部大臣承認，陛下只是提供了使多數派的原則和內閣的原則“調和”的一個“最方便的”、“最好的”機會。

既然國王這個人物（我們又要引用首相本人的話了）實際上只是象用來進行交易的貨幣一樣的交換手段，那末就商討的形式來說，他（這個人物）就遠不是無足輕重的了。首先，人民意志的代表因此便要直接同國王打交道了，由此就很容易得出結論：奏摺問題的辯論本身就是承認“妥協論”<sup>36</sup>，否認人民的主權。其次，同需要特別尊重的國家元首談話決不能象直接向大臣們說話那樣。表示意見要很謹慎，多暗示，少開門見山，此外，還要取決於內閣的決定，看它能不能接受甚至是怯懦的批評，認為這種批評可以和它的繼續存在相容。至於矛盾非常尖銳的複雜問題，則儘可能避而不談，或者只是表面上談談。這裡很容易引起害怕同國王過早破裂的心理，據說這種破裂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並且很容易用這樣的借口來掩飾：不應當操之過急，因為對各個問題還要進行認真的討論。

因此，对君主个人或君主政体的整个原則衷心敬仰，担心操之过急，害怕无政府主义的傾向，——这一切都会使內閣在討論奏摺时占很大的便宜，而康普豪森先生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这是造成穩固的多数的“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現在要問，人民代表是不是存心使自己处于这种恭順的从屬地位？制宪議會已大大地敗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它甘願放弃自己的首要职责，不去要求各部大臣报告他們在临时执政期間的一切活动。据說議會之所以提前召开，是为了要用人民的間接意志来支持政府的措施。实际上，現在在議會召开之后，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它的召开仅仅是为了“同国王協商制定可以指望长期存在的宪法”。

議會不仅沒有用适当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它的真正任务，反而辱沒了自己，在各部大臣的压力之下答应同意总结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沒有一个議員反对成立奏摺起草委员会的提案，而要求內閣除了只对它过去的活动負責以外，沒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出席議院。而这却是反对奏摺的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論据；任何其他的論据都是对各部大臣有利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7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8 日

“新萊茵报”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对波兰的重新瓜分<sup>37</sup>

科倫 6 月 8 日。馮·普富尔先生在波茲南划定的新界綫是对波兰的新的掠夺。这个新界綫把波茲南的“应当改組的”部分縮小到不及整个大公国的  $\frac{1}{3}$ ，而把大波兰的大部分并入了德意志联邦。波兰的語言和民族性只是在沿俄罗斯边界的狭长地带才得到承認。这一地带包括弗勒申和普列申<sup>①</sup> 州以及莫吉尔諾、馮格罗維茨、格內森、施罗达、施里姆、科斯滕、弗劳施塔特、克廖本、克罗托申、阿德瑙和席尔德堡<sup>②</sup> 等州的一部分。这些州的其余部分以及布克、波茲南、奧博尔尼克、扎姆特尔、比恩包姆、梅澤里茨、博姆斯特、恰尔尼科夫、荷德捷日、維尔济茨、勃罗姆堡<sup>③</sup>、舒宾、伊諾弗罗茨拉夫等州則根据馮·普富尔先生的命令，干脆全部变成了德国的領土。但是毫無疑問，就是在这一片“德意志联邦的領土上”，大部分居民講的还是波兰話。

旧分界綫至少还以瓦尔塔河作为波兰人的边界。新分界綫却把应当改組的部分又縮小  $\frac{1}{4}$ 。其理由是：一方面陸軍大臣“希望”波茲南要塞周围方圓 3—4 英里的地区不包括在改組范围以內；另

① 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普列舍夫。——編者注

② 莫吉尔諾，馮格罗維茨，格涅茲諾，斯罗达，斯列姆，科息茨雅恩，弗斯霍瓦，克罗地亚，克罗托申，奧多利亞努夫，奧斯特舍舒夫。——編者注

③ 布克，波茲南，奧博尔尼基，沙莫士雷，門茲胡德，門茲热奇，巴比莫斯特，恰尔恩庫夫，荷德捷日，維日斯克，貝德哥什。——編者注

方面各城市，例如奥斯特洛夫<sup>①</sup>等等要求并入德国。

說到陸軍大臣的希望，那是不言而喻的。起初掠奪波茲南城市和楔入波蘭內地 10 英里的波茲南要塞，然後為了毫無阻礙地享有掠奪來的東西，便承認侵占方圓 3 英里的新地區是合乎希望的。侵占了這一地區也就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小範圍的圈地，而且這是把德國邊界逐漸向俄屬波蘭邊界推進的最好的借口。

至於“德國人”住的城市希望合併的問題是這樣的：在全波蘭，德國人和猶太人是從事工商業的市民的主要核心；他們是那些主要由於宗教迫害而離鄉背井的移民的後裔。他們在波蘭土地上建立了城市，並且在數百年間和波蘭國家同命運共呼吸。這些德國人和猶太人（居民中的極小部分）卻企圖利用這個國家目前的狀況來爭奪統治權。他們借口自己是德國人，然而他們和美洲的德國人一樣，很少象德國人。把他們併入德國，也就等於抑制波茲南占半數以上的波蘭居民的語言和民族性，而且受抑制的正好是該省民族起義聲勢浩大的部分即布克、扎姆特爾、波茲南、奧博爾尼克等州的波蘭居民的語言和民族性。

馮·普富爾先生聲言，新界綫一經內閣批准，就是最終的界綫。他絲毫沒有提到妥協議會和德國國民議會，既然是關於確定德國邊界的問題，這兩個議會也應當表示自己的意見。不過，即使內閣、妥協派、法蘭克福議會批准了普富爾先生的決定，只要這條分界綫沒有得到另外兩種力量即德國人民和波蘭人民的批准，它還是不可能成為“最終的”界綫的。

弗·恩格斯寫於 1848 年 6 月 8 日  
載於 1848 年 6 月 9 日“新萊茵報”第 9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① 大波蘭的奧斯特魯夫。——編者注

## 王朝之盾

科倫 6 月 9 日。正如德國報紙所报道的那樣，康普豪森先生在 6 月 6 日向他的妥協派傾吐了心懷。他发表了

“一篇与其說是出色的，不如說是出自肺腑的演說，这篇演說令人想起了保羅<sup>①</sup>的話：‘如果我用人類和天使的語言說話而沒有愛，那我就象是一塊發出响聲的金屬！’他的演說充滿了我們稱為愛的那種神聖的激動情緒……他向被鼓舞者发表了有鼓舞力的演說，掌聲經久不息……要經過長久的歇息，才能吸收和領會这篇演說的全部印象。”<sup>38</sup>

誰是这篇出自肺腑、充滿了愛的演說中的英雄人物？誰是那樣鼓舞了康普豪森先生，使他向被鼓舞者发表有鼓舞力的演說的主要角色？誰是 6 月 6 日的这首即兴詩“亞尼雅士之歌”中的亞尼雅士<sup>39</sup>？

不是別人，而是普魯士親王！

应当讀一讀速記記錄，看一看富有詩意的首相怎樣描繪現代安契西士<sup>②</sup>的兒子的漂泊經過；他怎樣在

神聖的特洛伊城陷落，  
柏里亞<sup>③</sup>倒下，  
長槍手柏里亞的人民遭到毀滅<sup>40</sup>

的那一天，怎樣在容克地主的特洛伊城陷落之後，經過了長時期的

① 基督教原始時代的傳道者，見聖經“使徒行傳”第九章，十三章。——譯者注

② 亞尼雅士的父親。——譯者注

③ 特洛伊國王。——譯者注

漂泊流浪，终于在现代的迦太基靠了岸，受到了迪多娜女皇的亲切接待；他怎样比亚尼雅士一世走运，因为竟有康普豪森这样的人来竭力复兴特洛伊城和重新发现神圣的“法制基础”；康普豪森怎样终于使他的亚尼雅士回到了家园，现在特洛伊城的宫殿里怎样又充满了欢乐的气氛<sup>41</sup>。只有看完了这一切，看完了那些充满诗意的描绘，才能感觉到鼓舞者向被鼓舞者发表演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这整首史诗只是康普豪森先生用来赞美他自己和他的内阁的借口罢了。

他高声说道：“是的，我们以为立宪制度的精神要求我们挺身做一个崇高的人物，要求我们出来承受一切必将袭来的攻击……结果也正是这样。我们象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承受了一切危险和攻击！”

这是对“崇高的人物”、对“王朝”的怎样的赞语啊！如果没有康普豪森先生和他的6位骑士，王朝就会崩溃。康普豪森先生说这样的话，该是把霍亨索伦王朝看作多么强大、多么“深得民心的王朝”啊！其实，如果康普豪森先生不是那样“有鼓舞力地向被鼓舞者”说话，如果他不是那样“充满了我们称为爱的那种神圣的激动情绪”，或者如果他只是让他的满足于作“发出响声的金属”的汉泽曼讲话，那末对王朝也许会更有利些！

“然而，诸位先生，我这样说并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谦恭温顺，是由于意识到摆在你们和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只有在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也光临这个议会的条件下，只有在我们不仅能指望你们的正义，而且能指望你们的宽容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

康普豪森先生做得对，他向那个本身也极需要公众宽容的议会哀求宽容！

写于1848年6月9日

载于1848年6月10日“新莱茵报”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科倫在危急中

科倫 6 月 10 日。美妙的降灵节来到了，田野一片翠綠，树上花兒盛开<sup>42</sup>，所有分不清第三格和第四格的人<sup>43</sup>都开始准备在一天之內就把反动派的圣灵散发到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中去。

时机选择得很适当。在那不勒斯，近卫軍的上尉和瑞士的雇佣兵已經把年輕的自由淹沒在人民的血泊中<sup>①</sup>。在法国，資本家會議用残酷的法律来制服共和国，并任命 2 月 23 日在基佐家中下令开火的佩罗將軍为文森要塞的司令。在英国和爱尔兰，宪章派和合并取消派<sup>44</sup>被大批地投入監獄，手无寸鉄的人們的集会被龙騎兵驅散。在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現在自己确定了要实现曾經由永垂不朽的联邦議會提出而被五十人委員會<sup>45</sup>否決的三头政治。在柏林，右派靠人多勢众和跺脚喧囂而节节胜利，普魯士亲王則以进入“全民財產”<sup>46</sup>宣布了革命的毀灭。

在萊茵黑森集結着軍隊；法兰克福周围駐扎着因鎮压滨湖地区的共和派起义部队而馳名的英雄們<sup>47</sup>；柏林和布勒斯劳<sup>②</sup>周围也駐滿了軍隊，至于萊茵省的情况怎样，我們下面就会看到。

反动势力在准备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

正当在什列斯維希进行着战斗，俄国发出威胁性的通牒并将

① 見本卷第 21—24 頁。——編者注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編者注



30万軍隊向华沙集中的时候，萊茵普魯士却挤滿了軍隊，虽然巴黎議院的資產者已經又一次宣布“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

在萊茵普魯士、美因茲和卢森堡駐扎有（根据“德意志报”<sup>48</sup>的报道）整整 14 个步兵团（13, 15<sup>①</sup>, 16, 17, 25, 26, 27, 28, 30, 34, 35, 38, 39, 40），也就是說，駐扎有整整  $\frac{1}{3}$  的普魯士常备軍步兵和自卫軍步兵（全普魯士共有 45 个步兵团）。这些步兵团的一部分已按战时編制加以扩大，而其余部分則用召集  $\frac{1}{3}$  預备兵的办法来加强。此外，这里还駐扎着 3 个枪騎兵团、两个驃騎兵团和一个龙騎兵团，并且在最近还要增加一个重騎兵团。这里还应当加上第 7 和第 8 炮兵旅的大部分，其中至少有一半已进入动員状态（即每个炮兵連已配备 19—121 匹馬，或是 2—8 付火炮系架）。除此以外，还为卢森堡和美因茲成立了第 3 炮兵連。这些軍隊布置成一个大的弧形，从科倫和波恩經過科布倫茨和特利尔直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境。所有的要塞都在加强武装，塹壕都加筑了木柵排，堡垒斜堤上的树木有的地方已完全砍掉，有的地方只把炮火綫上的砍掉。

在科倫这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科倫的炮台已經装备齐全。安好了炮床，开好了炮門，大炮就安在这里并已架設在待机陣地上了。每天从早晨 6 时到傍晚 6 时都在进行这些工作。据說，为了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大炮是在夜里裹好了車輪运出城去的。

护城的工事从拜恩士姆开始，已經筑到第 6 号棱堡，即包括了一半要塞围墙。第一地段已架設了 20 門大炮。

---

① 不完全正确。第 13 步兵团只有一部分駐扎在这里，第 15 步兵团全在威斯特伐里亚，但乘火車在几小时內就可到达此地。——編者注

在第2号棱堡(塞费林托尔),大炮是架设在城門上的。只要掉轉炮口就能向城市轟击。

这里堡垒斜堤上的树木原封未动,这就最有力地証明了,这种武器不过是表面上用来对付外敌而已,实际上是对付科倫本身的。这样一来,如果军队离开城市而隐蔽到炮台里去,架设在城牆上的大炮就无法轟击炮台,可是炮台的臼炮、榴弹炮和24磅火炮却可以毫无阻碍地用榴弹和炸弹越过树木轟击城市。炮台距离城牆总共只有1400步,因此炮台可以用有效射程为4000步的炸弹轟击城市的任何部分。

现在来談談直接对付城市的措施。

区行政机关对面的軍械庫已搬运一空。枪支已包装得好好的(为了掩人耳目),并已运到了炮台。

炮弹是装在枪械箱中运到城里去的,并存放在炸弹轟击不到的沿城牆的軍需庫里。

当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炮兵正在分发上了刺刀的枪支,虽然大家知道,普魯士的炮兵根本就没有受过使用上了刺刀的枪支的訓練。

步兵已有一部分駐扎在炮台里。全科倫都知道,前天每个連队都分到了5000发子弹。

为了在发生冲突时对付人民,曾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在发出第一个警报信号时,(要塞的)炮兵第7連就开往炮台。

第37炮兵連也应随即出城。这个炮兵連已經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5和第8炮兵連暂时留在城内。这些連队的每一輛弹药車都装有20发炮弹。

輕騎兵由多伊茨开赴科倫。

步兵占領新市場、哈能托尔和埃倫托尔，以便掩护全部軍隊撤出城市，軍隊撤完后自己也要隱蔽到炮台里去。

同时，高級軍官在用一切办法教导軍隊拥护旧普魯士，仇視新制度。在目前反动势力气焰万丈的情况下，借口反对煽动者和共和主义者而对革命和君主立宪制进行最恶毒的攻击，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其实，科倫在最近恰好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靜。除了在区督察員家門前的一次人数不多的集会和干草市場上的几次斗毆之外，最近四周以来連稍微惊扰市民自卫团的事情都沒有发生过。由此可見，所有上述措施都是毫无根据的。

再說一遍：上述一切措施完全不可理解，我們收到的来信証明軍隊正在向柏林和布勒斯劳集結，反动派切齿痛恨的萊茵省充滿了士兵，根据这一切情况来判断，毫無疑問，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普遍的强大的进攻。

看样子，在科倫这里，这种进攻是计划在降灵节的第二天开始的。現在謠传紛紛，說在这一天“将要开始”。他們将竭力制造一些小糾紛，然后好立刻出动軍隊，以炮击来威胁城市，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主要的煽动者监禁起来，一句話，象对付美因茲和特利尔那样来对付我們<sup>①</sup>。

我們郑重地警告科倫的工人們不要上反动势力的当。我們坚决請求他們不要給拥护旧普魯士的政党提供任何足以被用来使科倫受到橫暴的軍法制裁的借口。我們請求他們要特別安靜地度过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9—20頁。——編者注

两天降灵节日，以便粉碎反动派的全盘计划。

如果我们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攻击我们的借口，我们就会遭到毁灭，遭到同美因兹的居民一样的命运。如果反动势力由于寻衅不成而被迫首先开始向我们进攻，如果它真的敢这样做，那末科伦人就会证明，他们将毫不动摇地决心为3月18日的胜利果实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附笔：刚刚颁布了下列命令：

在两天的降灵节日里，取消接受口令时的集合（平时宣布口令总是特别隆重的）。军队留在营房，口令也在营房里向军官传达。

在节日的两天内，要塞的炮兵连、大炮修理连以及炮台的步兵卫戍部队每天除平常的口粮外，还预领4天口粮，这样一来，他们就经常储备有8天的口粮。

炮兵在今晚7时就要举行战斗演习。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11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11号

## 法兰克福議会和柏林議会 承認自己有名无实

科倫 10 月 11 日。法兰克福議会和柏林議会都承認了自己有名无实，并把这一点郑重地記入記錄。法兰克福議会通过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的表決承認了联邦議会为上級机关<sup>49</sup>。柏林議会否決了貝倫茲議員的提案，而通过了說明理由的轉入議程的決定，这不只是背弃了革命<sup>①</sup>，而且是公开声明，它的召开不过是为了协商制定宪法而已，这样也就承認了康普豪森內閣提出的宪法草案的基本原則。两个議会都給自己做了正确的評价。它們俩都是有名无实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11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13 日  
“新萊茵报”第 12—1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75—89 頁。——編者注

## 柏林关于革命的辯論

### 一

科倫 6 月 13 日。妥協議会終於发表了肯定的意見。它背弃了革命，承認了妥協論。

妥協議会要談的問題的實質就是如此。

3 月 18 日国王答应立宪，实施必須交納押金的出版自由，并且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說，要实现德国的統一，必須把德国溶化到普魯士里面去。

3 月 18 日的讓步就是如此，讓步的实际內容归結起来就是这样。柏林人滿足于这一点，他們到皇宮前去游行，向国王謝恩，这就最明显地証明了 3 月 18 日的革命是必要的。不但国家必須革命化，而且国家的公民也必須革命化。只有在流血的解放斗争中，他們才能摆脱忠君爱国的精神。

某种“誤会”引起了革命。不过誤会确实发生了。士兵的进攻，16 小时的战斗，人民一定要軍队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証明了人民根本不懂得 3 月 18 日的讓步。

革命的結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結社的权利，实际上爭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澤曼內閣，即代表大資产階級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馳的結果。人民胜利了；他們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質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統治权并没有轉到他們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資產階級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沒有进行到底。人民讓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去組閣，可是这些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却建議和旧普魯士的貴族、官僚結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們的意图。加入內閣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資產階級，同反动派訂立了攻守同盟。

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問題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他們否認人民的胜利，捏造“17个被害士兵”的臭名昭彰的名单，千方百计地誹謗街垒战士。不仅如此，內閣还决定真正召开革命前就宣布召开的联合議會，以便 *post festum* [随即]表演从专制到宪制的合法过渡。这样，它就公开地背弃了革命。随后內閣发明了妥協論，从而再度背弃了革命，同时也背弃了人民的主权。

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了問題。它本来就可能成問題，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

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目前普魯士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然阶段，为什么大資產階級一上台就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我們在这里不可能詳細地說明。我們現在只指出事实本身。

妥協議会現在必須表示态度：它是否承認革命。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承認革命就是承認革命的民主的一面，这是和大資產階級背道而馳的，因为大資產階級力图把革命的这一面化为烏有。

承認革命在目前恰恰就是承認革命的不徹底性，從而承認為了反對革命的某些結果而掀起的民主運動。這就意味着承認德國正在發生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康普豪森內閣、妥協論、間接選舉、大資本家的統治和妥協議會本身的活動所產生的各種結果，即使可能成為不可避免的過渡階段，也決不能成為最後的結果。

在議會辯論是否承認革命時，雙方發言都非常冗長、非常積極，但是在思想上卻暴露了驚人的貧乏。很少能看到有比這種模稜兩可的辯論更枯燥無味的東西了。辯論經常被喧嚷或會議規則的細節上的爭論所打斷。不是黨派鬥爭的高度的熱情，而是時時刻刻會使辯論變為談心的冷靜的氣氛；不是击中要害的尖銳的論證，而是亂七八糟東拉西扯的冗長的空談；不是中肯的反駁，而是關於道德的本質和特性的枯燥無味的說教。

左派在這場辯論中也並不突出。它的大多數發言人都是彼此重復；誰也不敢肯定地對問題的本質發表意見，公開地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說話。他們總是怕引起別人的討厭，怕侮辱了和吓倒了什麼人。要不是3月18日的戰士們在鬥爭中比左派先生們在辯論中顯示了更大的毅力和熱情，德國的情況就糟了。



## 二

科倫 6 月 14 日。开始辯論时，柏林議員貝倫茲提出如下的提案：

“議會承認革命，宣布 3 月 18 日和 19 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

提案的形式，法国大革命从古羅馬人那里借来的这种簡要的形式，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貝倫茲先生論証他的提案的方式却是不恰当的。他的演說不是革命的，而是調和的。他本来应该在反动派的會議上把遭到誹謗的街垒战士的憤怒表达出来，可是他沒有这样做，却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进行枯燥乏味的說教，好象他还是以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一个教师的身分在說話。他本来应该为非常簡單、非常清楚的事情辯护，可是他的議論却混乱透頂。

貝倫茲先生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

“諸位先生！承認革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我們这个議會本身就是对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的明确的承認。議會就是由这次革命产生的，因此，它的存在就是在实际上承認了革命。”

第一，問題根本不在于一般地承認“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是事实，——这是毫无意义的廢話。不，問題在于承認那个被說成是叛乱的柏林巷战是真正的实际的革命。

第二，一方面，柏林議會当然“承認革命”，因为如果沒有柏林

的巷战，就不会有什么“协商的”宪法，最多也不过是钦定的宪法。但是由于议会召开的方式，由于联合议会和内阁授予它的权利，它同时也就否定了革命。因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议会不是进行妥协，而是要发号施令。

第三，议会在表决奏摺时的态度说明它已经承认了妥协论，它投票反对到阵亡战士墓去游行<sup>50</sup>说明它已经背弃了革命。它背弃了革命，因为它始终和法兰克福议会同时“开会”。

这样，贝伦兹先生的提案实际上已经两度被否决了。而这一次，议会必须公开发表意见，这个提案就更会遭到否决。

既然议会已经是反动的，既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人民对它不再抱有什么希望，那末左派就应该使支持提案的少数尽量少些，而且只包括一些最坚决的议员。

所以贝伦兹先生根本用不着拘于礼节。他应该尽量坚决、尽量以革命的精神发言。他不应该沉溺于幻想，似乎议会是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想成为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应该向这个议会说明它已经间接地背弃了革命，并且要求它现在公开地这样做。

但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左派发言人都没有遵循民主党派应该遵循的这个唯一的政策。他们沉溺于幻想，似乎能够劝议会采取革命的步骤。因此他们作了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讨论了解决的问题，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背弃了革命。

于是贝伦兹先生继续非常冷静、非常呆板地对一般的革命特别是柏林的革命作了冗长的发言。他在发挥他的思想的时候，提到这样一个反对意见：革命是多余的，因为国王早就同意一切要求了。对于这种意见他回答说：

“当然，国王陛下已赐予了**很多**……但是难道人民满足于这种赐予嗎？难道我們得到了真正实现这个諾言的保証嗎？我認为这种保証……只有經過斗争才能得到！……可以肯定，类似的国家变革只有經過斗争的大灾难才能产生，才能扎根。3月18日的一个重要的讓步还没有实现，这就是武装人民……只有人民武装起来了，他才感到自己有了保障，不致发生可能产生的誤会……因此(!)，斗争当然是一种自发的現象(!)，但它是一种必然的現象……是一种灾难，国家生活的变革是在这种灾难中成为现实，在这种灾难中实现的。”

从这段冗长、混乱、再三重复的議論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貝倫茲先生根本不明白革命的結果和它的必要性。关于革命的結果，他只知道对3月18日的諾言所作的“保証”，只知道“武装人民”；他憑空塑造革命的必要性，再一次用精細的笔法来描写“保証”，最后郑重其事地断言，任何革命沒有革命就不能实现。

革命是必要的——显然这只是說，为了取得我們現在已經取得的东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結果成正比。但是由于貝倫茲先生不明白这些結果，所以他自然只好求助于冗长的庄严的論断来塑造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的結果怎样呢？它絕對不是“保証”实现3月18日的諾言，恰好相反，是推翻这些諾言。

18日那天允許成立这样一种君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貴族、官吏、軍閥和牧师保持着政权，同时讓大資产階級通过欽定宪法和必須交納押金的出版自由来行使監督权。对人民說来，是德国的旗帜、德国的艦队代替了普魯士的旗帜和艦队，是为德意志联邦服兵役，而不是为普魯士服兵役。

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的一切势力——貴族、官吏、軍閥和牧师。它使大資产階級独自获得了政权。它給了人民不必交納押金

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給了他們結社的權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給了他們物質的武器——步槍。

但這還不是主要的結果。在街壘上進行過戰鬥並獲得了勝利的人民，已經完全不是3月18日到皇宮前遊行、只是遭到龍騎兵襲擊後才明白他們所獲得的讓步的真正意義的人民了。他們完全能夠做不同的事情，他們完全能夠以另一種態度對待政府。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

“作為一個柏林人，我完全有權利說我們飽嘗了悲痛的滋味（如此而已！）<sup>①</sup>……看到有人誹謗這個鬥爭……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首相先生的話，他……證明說，擺在偉大的人民和全體人民代表面前的任務是本着寬容與和解的精神進行工作。我也向大家呼喚要有這種寬容的態度，並以柏林代表的身分建議你們承認3月18日和19日。柏林人民在革命後的行動，一般說來，無疑一直是令人非常滿意、非常尊敬的。可能有过個別的過火行為……因此，我認為議會的聲明是恰當的等等，等等。”

對這個背棄革命的怯懦的結論，我們只補充一點：經過這樣的論證後，這個提案應該遭到否決。

---

<sup>①</sup> 括弧裏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三

科倫6月14日。針對貝倫茲的提案提出的第一个修正案之所以短命，應該归功于議員布萊梅先生。这是一个含糊的善意的声明，它(1)承認革命，(2)承認妥協論，(3)承認革命的所有参加者，(4)承認下面这个伟大的真理：

無論駿馬或騎士都不能  
保卫王公所在的頂峰<sup>51</sup>，——

这样一来，革命本身又打上了真正普魯士的烙印。可敬的老教师布萊梅先生想討好各政党，可是它們根本不想理睬他。他的修正案未經討論就被否決了，于是布萊梅先生怀着失望的博愛者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悄然下台了。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走上講台。舒尔采先生也是革命的信徒，但与其說他是街垒战士的信徒，不如說他是战斗后的人們的信徒，这些战斗后的人們是和通称为“人民”的那种“战士”不同的。他希望“战斗后的人們的行为”特別得到承認。当他听到了

“人民在已經沒有任何敌人和他們对抗时(!)的温和与审慎……他們的严肃認真的精神，和解的願望……以及对朝廷的态度…… 我們看到，人民非常懂得在这种时候**正視历史本身!!**”

这些話时，他簡直喜不自胜。

舒尔采先生之所以喜不自胜，与其說是由于人民在战斗时的革命行动，不如說是由于他們在战斗后的絕非革命的无所作为。

承認人民在革命后寬宏大量，其含义不外乎下面两种：

要就是侮辱人民，因为如果說人民的功劳在于他們在胜利后沒有发生卑鄙的行为，那就是对人民的侮辱。

要就是承認人民用武力取得胜利后无所作为，因而使反动势力得以重新抬头。

舒尔采先生“把两者結合起来”，“惊喜若狂”，因为人民不但自己行为規矩，而且使反动派得以苏醒。

“人民的行为”表现在正当他們應該去創造历史的时候，他們却兴高采烈地去“正視历史本身”；表现在他們由于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温和”、自己的“审慎”、自己的“高度的严肃認真”和“不灭的神圣的星火”，沒有能够阻止大臣們用欺騙手段陸續从他們那兒夺去已經获得的自由；表现在他們不但不繼續进行革命，反而宣布革命已經結束。而維也納人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他們一步一步地击退了反动派，他們現在爭得的不是妥協議会，而是制宪議會！<sup>52</sup>

可見，舒尔采先生（来自德里奇）是在不承認革命的条件下承認革命的。因此他應該博得震耳欲聋的“喝采”。

經過短時間的关于會議規則上的爭論后，康普豪森先生亲自上台发言。他指出，按照貝倫茲的提案，“議會應該对一种观念发表意見，應該发表自己的見解”。在康普豪森先生看来，革命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因此，他“讓”議會去决定它是否打算这样做。对問題本身，他認為“大概沒有什么严重的意見分歧”，他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个德国人发生爭論时，他們的意見 au fond [實質上]总是彼此一致的。

“如果有人想重复說……一个必然会产生……最伟大的改革（就是說还

沒有最伟大的改革)①的时期到来了,那我比誰都更同意这一点。”

“相反地,如果有人想說国家和国家政权失去了合法的基础,說发生了以暴力推翻現存政权的事件,……那我就要反对这样的說法。”

过去康普豪森先生認為自己主要的功劳在于把已經断了的那根合法性的綫又接上了;現在他認定这根綫从来也沒有断过。讓事实来揭穿他的謊言吧,——說政权从博德尔施文克轉到康普豪森是不間断的合法的过渡,这根本不是事实。

“如果有人想暗示說我們正处在事变的前夕,其結局正如我們从17世紀的英国革命史和18世紀的法国革命史中所知道的那样,政权将落入独裁者手中”,

那末康普豪森先生也一定会反对。

我們的考察历史的朋友当然不会錯過机会对柏林革命发表德国市民在罗泰克的著作中讀到的而且越讀越爱听的那种意見。柏林革命已經不能算是革命了,因为否則它就必定会产生克倫威尔和拿破仑,而这是康普豪森先生所反对的。

最后,康普豪森先生讓妥协派“对在不幸的冲突中牺牲的人表示同情”,但是指出“表达的方式”在这里“有着重要的和巨大的意义”,并認為这个問題应交給委员会去审查。

由會議規則引起的新风波平息后,一个洞察事物因而善于感动人心的演說家最后发言,这就是瓦尔劳的法师弥勒牧师先生,他贊成舒尔采提出的补充意見。牧师先生并不打算“拖延”議會,他想“只談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問題”。

抱着这种目的,牧师先生向議會提出如下的問題: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这个提案把我們引到道德上去了，如果我們不是从提案的表面(居然想从表面来看問題?)<sup>①</sup>，而是从它的內容(內容空洞，廢話連篇)<sup>②</sup>来考察它，那末不管多么困难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它涉及的恰好是在道德上承認暴动的問題；因此我要問：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不是某个政党的問題，而是一个无比重要的神学上和哲学上的道德問題。議會應該同国王协商制定的不是宪法，而是哲学上的道德体系。“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全部問題的所在。而牧师先生是怎样回答屏息凝神的議会的呢？

“但是，我想我們不應該在这里决定这个崇高的道德原則！！”

牧师先生鑽到問題里去，不过是为了声明他无法了解問題的內容。

“这是許多深思熟慮的人們思考的問題，但是他們也还没有得出任何肯定的解答。因此，我們在簡短的辯論中是无法弄得一清二楚的。”

犹如霹靂一声，使議會大吃一惊。牧师先生以必要的异常尖銳和异常严肃的态度向議會提出了道德問題；他向議會提出這個問題，为的是要立即說明這個問題无法解决。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妥協派一定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已經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了。

但是这不过是牧师先生劝人为善的手腕，好讓議會去忏悔祈禱。他已經为悲痛的議會准备好了寬心丸：

“我認为还有第三种观点，这里應該加以注意：3月18日的牺牲者是在不允許采取道德上的决定的情况下行动起来！！”

街垒战士對他們的行為是不負法律責任的。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但是如果你們問我，我認為他們有沒有道德權，那我就肯定地回答：**有！**”

我們要問：如果一个乡村传教士力图当选柏林議会的議員，只是为了用他那劝人为善的詭辯来喋喋不休地劝說全体到會議員，那末这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霍弗尔議員作为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对整个問題提出反对意見。

“因为士兵們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和兒女嗎？請你們好好想一想，如果父亲在海岸(温德語：po more, 即波美拉尼亚)①听到这里是怎样对待他的兒女的，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呵！”

就算士兵們行动随便，就算他們讓別人把自己变成了最卑鄙的背叛行为的工具，他們反正是我們波美拉尼亚的青年，因此應該为他們欢呼三次！

万茨列本的議員舒尔采說：先生們，柏林人的行动應該得到承認。他們无比勇敢。他們不只是克服了恐惧大炮的情緒。

“如果把怕被霰彈击中的恐惧和参加街头暴动的危險——要受严厉的、也許是侮辱性的懲罰——对比一下，这种恐惧又算得了什么呢！参加这种斗争所要的勇气实在太伟大了，以致連毫无掩蔽地站在炮口前的人的勇气在它面前也会完全黯然失色！”

因此，德国人在1848年前沒有进行革命是因为怕警察署长。

施韦林大臣声明，如果通过貝倫茲的提案，他就辞职。

埃尔斯納和賴辛巴赫反对舒尔采的补充意見。

迪尔施克指出，革命應該得到承認，因为“爭取道德自由的斗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爭還沒有进行到底”；因为議会也“負有实现道德自由的使命”。

雅科比要求“完全承認革命及其一切結果”。他的发言是整个會議期間最好的发言。

最后，我們滿意地看到，在这么多說教的、枯燥无味的、犹豫不决的、調和妥协的发言之后，我們的汉澤曼上台发言了。現在我們总該听到一种坚决的、肯定的东西了，——其实不然，汉澤曼先生今天的发言也是軟弱的、調和的。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沒有自己的理由，是决不会做的。他看到議会动搖不定，投票的結果还未見分晓，合适的修正案還沒有想出来。他竭力主张延期討論。

因此，他竭力把話講得簡短些。事实俱在，无可辯駁。只不过有人把它叫做革命，有人把它叫做“大事变”而已。我們絕

“不要忘記，这里沒有发生过象巴黎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那样的革命，——我們有过的是国王和人民的协商（靠霰弹和枪弹来进行的独特的协商！）<sup>①</sup>。但是正因为我們（大臣們）<sup>②</sup>就某种意义上說沒有对事情的本質发表反对意見，而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須寻找一种能够保存政府基础的論点”，——

所以應該延期討論，使大臣們能够彼此交換意見。

真是妙不可言，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們的汉澤曼作这样的轉变，值得他承認政府的“基础”如此动搖，以致任何一个“論点”都足以把它推翻！只有那种能够重新把一切問題归結为信任問題的令人高兴的事情，才能使他得到安慰。

于是，討論延期了。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四

科倫 6 月 14 日。第二天。討論又從長時間的關於會議規則的爭論開始。爭論結束後，察哈里埃先生發言。他提出一個一定能使議會擺脫困境的修正案。這是一個合乎內閣心意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鑒於偉大的三月事變——由於這個事變，也由於國王的贊同（贊同本身就是“三月事變”，雖然不是“偉大的”）<sup>①</sup>，我們這裡才確立了目前的國家法制——的崇高意義以及為它（即國王的贊同）<sup>②</sup>而鬥爭的戰士的功勞都是無可爭辯的（!!），此外，鑒於議會認為自己的任務不在於發表見解（議會應該聲明它沒有任何見解！）<sup>③</sup>，而在於和國王協商制定憲法，——議會應轉入議程。”

這個提案的目的是想使各方面都滿意；對於這個提案，察哈里埃先生引以自慰的是希望“所有的人，甚至貝倫茲先生，都能在這個提案中找到他能想到的一切東西，如果他是善意地提出自己的提案的話”。這個混亂而空洞的提案，這碗又酸又甜的稀粥，也就是康普豪森內閣所“依據”的和能夠依據的“論點”。

柏林的濟多夫牧師先生為他的同事彌勒的成就所鼓舞，也走上了講台。道德問題縈繞於他的腦際。彌勒不能解決的問題，他能夠解決。

---

① ② ③。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諸位先生，請允許我在這裡馬上（他已經進行了半小時的說教）<sup>①</sup>談談我的責任感迫使我要說的話：如果辯論還要繼續下去，那末，我認為在沒有盡到自己良心上的義務以前，誰也不應該沉默無言。（好呀！）

請允許我談談我個人的意見。關於革命，我的意見是這樣（講本題！講本題！），在發生革命時，革命只是雙方——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罪過的徵兆。這（這種庸俗的見解，這種最廉價的迴避問題的方法）<sup>②</sup>是看事物的最高的道德觀點，因此（！）我們不應該預先討論國家的基督教道德見解。”（在這些先生們看來，他們坐在那裡究竟是幹什麼的呢？）<sup>③</sup>（會場發生騷動。有人叫：回到議程上來！）

“但是，先生們”——這位勇敢地捍衛最高的道德觀點和未經預先討論的國家的基督教道德見解的人繼續說道，——“我不同意說人民由於自發的需要而不得不採取政治自衛（！）的時候不會到來，……到那個時候，我認為個人會以最道德的方式參加政治自衛。（感謝詭辯，我們得救了！）<sup>④</sup>當然，他們也可能以不道德的方式參加，——那是他們的良心問題！”

街壘戰士的問題不應該拿到 soi-disant [所謂的] 國民議會上  
去討論，而應該拿到懺悔室里去討論。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牧師濟多夫先生還聲明說他是有“勇氣”的，他從最高的道德觀點喋喋不休地談論人民的主權，他的發言又被不耐煩的叫聲打斷了三次，於是他得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認為自己已經盡了良心上的義務。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濟多夫牧師同意什麼樣的意見，不同意什麼樣的意見。

普倫尼斯先生說所有這些計謀都應該拋掉。因為提案經過了那么多的修正和再修正、經過了那樣無休無止的辯論和無謂的爭論，已經受到閹割，已經沒有任何價值。普倫尼斯是對的。但是他除了注意到這種證明雙方許多議員都很怯懦的情況以外，不可能

①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对議会表现更不友好的态度。

特利尔的賴辛施佩格先生說：

“我們在这里不是为了制造理論和頒布历史，而是應該尽可能地創造历史。”

絕對不是！議会通过那个說明理由的轉入議程的提案，就說明了議会之所以存在，恰恰相反，是为了使历史不存在。不过这也是一种“創造历史”的方法。

“我想起維尼奧的一句格言：革命喜欢毀灭自己的亲生兒女。”

唉！可惜！正好相反，倒是它的亲生兒女毀灭了它！

里德尔先生坦率地說，对于貝倫茲的提案我們“不應該只了解它的字面上的意义，——在它的后面还隱藏着原則性的爭論”。而这位“最高的道德观点”的牺牲者乃是秘密档案的顧問和教授！

上台发言的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牧师先生。这就是在柏林向妇女传道的約納斯先生。看来他真的把議会当做向有教养的阶层的女兒們說教的講堂了。他以真正的施萊艾尔馬赫尔的学生所具有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态度，对革命和改革之間的如此重大的区别发出了一連串平淡无奇的議論。他还没有結束他說教的開場白，他的发言就被打断了三回。最后，他大声地講了下面这段出色的話：

“革命是一种同我們現在的宗教意識、道德意識直接抵触的东西…… 革命，这种行动誠然被古希腊人和羅馬人認為是伟大的、光荣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刺耳的叫声，全場哄然。埃塞尔、荣克、埃尔斯納、主席及其他許多人都一齐插嘴。最后，頗孚众望的传道者才繼續講下去。）

“無論如何我不同意議会对宗教原則、道德原則有表決的权利。对这些

原則任何會議都不能投票表決（？而宗教法庭，宗教會議呢？）<sup>①</sup>。希望頒布或宣布革命是崇高的道德典范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意即随便什么东西）<sup>②</sup>，在我看来和議會希望作出关于有上帝或者无上帝或者有許多上帝的決定是一樣的。”

果然如此！婦女傳道者又順利地把問題轉到“最高的道德觀點”上去了，現在這個問題自然只有新教的宗教會議，只有這些教義問答的作者才能處理了。

謝天謝地！在所有這些最高道德的空談之後，我們的漢澤曼終於發言了。我們一接觸到這樣一個實際的人，就感到自己完全擺脫了“最高的道德觀點”的危險。漢澤曼先生只用一句鄙視的評語就把道德觀點完全清除了：

“我問問你們，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空閒時間來進行這類原則性的爭論？”

漢澤曼先生想起昨天有一位議員談到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的問題。漢澤曼先生就利用這一點來耍手腕。他談工人階級的貧困，對他們的貧困表示憐憫並且問道：

“普遍貧困的原因在哪裡呢？我認為……每個人都會感到，只要我們的國家法制還未確立，我們對整個現行制度的鞏固就沒有信心。”

這一次漢澤曼先生說出了心裡話。他大聲說道：必須恢復信任！而恢復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背棄革命。隨後這位“看不見任何反動派”的內閣的發言人就以恫嚇的口吻大談其取得反動派好感的重要性。

“懇求你們促進各階級的團結”（簡直是侮辱進行革命的階級！）<sup>③</sup>；懇求你們促進人民和士兵的團結；請你們想一想我們鞏固獨立的希望是寄托在士

---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兵身上的（！在人人皆兵的普魯士才是这样！）<sup>①</sup>；請你們想一想我們目前是处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我没有必要詳細地向你們解釋，因为仔細讀報的人（所有在座的先生当然都是这样的人）<sup>②</sup>都会同意这种情况是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我認为在这种时候发表一个会引起国内糾紛的声明是不恰当的……因此，諸位先生，請你們努力使各政党和解，請你們不要提出問題来向对方挑畔，否則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会发生的。如果通过这个提案，那末就会产生最悲慘的結果。”

反动派看到平日如此坚决的汉澤曼不仅使議會感到恐惧，而且使他本人也感到恐惧，該会怎样大笑呵！

这种引起議會里的大资产者、律师和学校教师的恐惧的办法，比所有那些“最高道德观点”的动听的詞句起的作用都要大。問題就这样解决了。德斯特尔还再度猛扑，企图冲淡已經产生的印象，但是无济于事，因为辯論已經停止，議會以 196 票对 177 票通过了察哈里埃提出的說明理由的轉入議程的建議。

議會就这样自己給自己定了罪，它表明了自己沒有主見。

弗·恩格斯写于

1848年6月13日—14日

載于1848年6月14日—17日

“新萊茵报”第14号—1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科倫各黨派的狀況

科倫 6 月 16 日。几天以前，这里曾举行补选。这种补选最令人信服地說明：从普选以来各黨派的狀況起了怎样的变化<sup>53</sup>。

法兰克福議会的后补議員、警察厅长弥勒先生被古梅尔斯巴赫市选为柏林議会的議員。

选举时提出了 3 名候选人。天主教派提出佩尔曼先生，立宪派(市民联合会)<sup>54</sup>提出律师法依先生，民主派提出民主协会(什托尔维尔卡协会)<sup>55</sup>主席、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

第一次投票时(140 个复选人投票)法依先生得 29 票，佩尔曼先生得 34 票，施奈德尔先生得 52 票。其余的票数很分散。

第二次投票时(共 139 票)法依先生得 14 票，佩尔曼先生得 59 票，施奈德尔先生得 64 票。可見民主派还是获得了多数票，而且比第一次的票数还要多。

第三次投票时(共 138 票)法依先生 1 票也沒有得到，施奈德尔先生得 55 票，佩尔曼先生得 75 票。这就是說，市民联合会的先生們因畏惧什托尔维尔卡协会会员而把自己的票投給了天主教派的候选人。

这几次投票的結果說明，这里的社会情緒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初选时，民主派处处占少数。补选时民主派成了 3 个相互斗争的党派中最强大的一个，它只是在其他两个党派反常地結成联盟的



---

情況下才被擊敗。我們不去責備天主教派同意結成這個聯盟。我們只着重指出一件事實：立憲派已經消聲匿跡了。

寫於1848年6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48年6月18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18號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6月15日的妥協會議

科倫6月17日。几天前我們對你們說過<sup>①</sup>：你們否認了革命的存在。可是第二次革命會證明革命是存在的。

6月14日的事件<sup>56</sup>不過是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道閃電，而康普豪森內閣就已經處於徹底瓦解的狀態。妥協會議會通過了對柏林人民的信任案，把自己交給柏林人民來保護<sup>57</sup>。這是在事後承認了三月戰士。議會把制訂憲法的工作從內閣手中奪了過來，企圖使憲法取得人民的“同意”，因而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審查一切有關憲法的請願書和奏摺。這是在事後撤銷了它的關於自己有名無實的聲明<sup>②</sup>。議會答應通過實際行動，即通過消滅舊建築的基礎，消滅束縛農村的封建關係來着手制訂憲法。這就許下了8月3日夜間許下的那一類諾言<sup>58</sup>。

總之，6月15日的妥協會議會否定了它自己的過去，正如它6月9日否定了人民的過去一樣。它經歷了它自己的3月21日<sup>59</sup>。

**可是巴士底獄還沒有攻下來。**

而革命的使徒卻不可遏止地、不停地從東方逼近。它已經來

---

① 見本卷第72—74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71頁。——編者注

---

到托恩<sup>①</sup>的門前。这就是沙皇。沙皇会拯救德国革命，因为他促使德国革命力量集中起来。

写于1848年6月1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18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8号

---

<sup>①</sup> 波兰称作：托倫。——編者注

## 布拉格起义

科倫 6 月 17 日。波茲南式的血腥大屠杀即将在波希米亚<sup>①</sup>重演。奥地利的軍閥把波希米亚与德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淹沒在捷克人的血泊中了。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下令在維舍格勒和格拉德申<sup>60</sup>对准布拉格架設大炮。正在集中軍隊，准备进攻斯拉夫人代表大会<sup>61</sup>和捷克人。

人民群众知道了这些作战准备，他們跑到公爵府去要武器。他們遭到了拒絕。騷动加剧了，愈来愈多的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聚集起来。从司令官官邸对面的旅館传来了枪声，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夫人应声而倒，伤势严重。于是立刻发出了攻击命令，龙騎兵冲向前去，击退了人民群众。但是到处都构筑起街垒来阻击军队。大炮推出来了，霰弹向街垒傾泻。血流成河。从 12 日晚上到 13 日早上，战斗通宵未停，13 日仍在繼續进行。最后，士兵們控制了广闊的街道，迫使人民群众退到不能使用大炮的比較狹窄的街坊。

这就是我們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外，据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許多代表在森严的警卫下被押解出城。根据这些消息，可以判

---

<sup>①</sup> 即捷克。——編者注

断军队获得了胜利，至少是获得了局部的胜利。

不管起义的结果怎样，德国人对捷克人进行歼灭性的战争现在仍然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德国人在他们的革命中必然会因自己过去的一切罪行而受到惩罚。他们已经因这些罪行而在意大利受到了惩罚。在波兹南他们又招致了整个波兰的咒骂。而现在该轮到波希米亚了。

法国人甚至在他们以敌人身份出现的地方都能博得尊敬和同情，而德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尊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同情。甚至在他们以慷慨的自由传播者的身份出现的地方，人们也总是辛辣地嘲笑他们，鄙弃他们。

理应如此。一个民族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甘愿把自己变成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具，这样的民族必须首先证明它真正成了革命的民族。但是它不应该用两三次不彻底的革命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种革命除了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先前的犹豫不决、软弱无力和互不往来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结果，因为在进行这种革命的时候拉德茨基仍然在米兰，科隆布和施泰因埃克尔仍然在波兹南，文迪施格雷茨仍然在布拉格，许泽尔仍然在美因兹，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革命的德国本来应该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特别是对于邻国的人民。它本来应该在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让一向受它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

然而革命的德国是怎样做的呢？它完全同意德国军阀过去对意大利和波兰的压迫，以及现在对波希米亚的压迫。考尼茨和梅特涅的话完全被证实了。

然而德国人却要求捷克人信任他们！

然而德国人却責备捷克人，說他們不願意同一个一方面在解放自己、另一面却在压迫和侮辱其他民族的民族联合起来！

德国人責备他們，說他們拒絕派代表参加我們那个可怜的、怯懦的、害怕自己权限的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德国人責备他們，說他們背弃了軟弱无力的可怜的奥地利政府，这个政府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确定奥地利的解体，它不仅不能預防奥地利的解体，而且造成了奥地利的解体，这个政府非常軟弱，它甚至不能使布拉格摆脱文迪施格雷茨的大炮和士兵的袭击！

但是最令人惋惜的是勇敢的捷克人自己。不管他們将获得胜利还是将被击潰，反正他們是要灭亡的。德国人4个世紀的压迫（这种压迫現在仍以巷战的形式在布拉格繼續进行）迫使捷克人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在最近（可能过几个星期）就要爆发的西欧和东欧之間的伟大斗争中，不幸的命运将把捷克人推到俄国人方面去，推到反对革命的专制制度方面去。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捷克人将首先被革命摧毁。

使捷克人招致这种灭亡的結局，仍然應該归罪于德国人，因为德国人把他們出卖給俄国人。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1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18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8号

## 瓦德涅尔的被捕。——澤巴尔特

科倫。大家知道，柏林妥協議會已經延期討論溫采利烏斯就逮捕特利尔区的議員維克多·瓦德涅尔一事所提出的質問。这有什么根据啊！因为在旧普魯士的立法档案中，是找不到任何有关人民代表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同样，在普魯士历史的廢紙堆中当然也找不到人民代表本身。既然如此，在遵守国家法律的那种口实下来抹煞一切革命成果，就不費吹灰之力了！革命所提出的明显的要求、需要和权利，当然不可能获得立法的批准，因为立法的基础正是被革命本身所摧毁的。普魯士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性，从普魯士人民代表存在的时候起就存在了。或許，整个妥協議會的存在是由某一个警察总监或某一个高等审判厅的怪脾气来决定的吧？自然，茨魏費尔、賴辛施佩格以及其他那些把每一个政治問題变为程序問題的爭論并且沒有忘記利用瓦德涅尔事件来表現細小的吹毛求疵和巨大的奴才根性的萊茵的律師們，是完全可以不受这种偶然性的影响的。

我們不妨乘这个机会来問問賴辛施佩格第二先生：是否已經預定由賴辛施佩格先生代替那位应当从1848年7月1日起領取养老金而退休的沙貝尔格先生来担任科倫議會議長的职位？

瓦德涅尔在乘郵車到将要举行法兰克福議會議員选举的美尔茨去的时候被捕了。瓦德涅尔有把握获得大多数选票。要阻挠这

次預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結果的选举，最好的办法就是逮捕候选人！为了做得彻底，政府沒有把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萊夫召来，虽然后者提出了要求，这样一来，政府不喜欢的 6 万个居民便失去了代表。我們建議格萊夫先生根据自己的代表权到柏林去。

最后，我們把御任县长和特利尔市市长、全能的澤巴尔特先生的警告轉載在下面，它最能說明特利尔的状况。

## 警 告

一連好几个晚上，在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上人們成群結队，人数特別众多；这引起了一些胆怯的人的忧虑，他們耽心有人在准备违法的发动。我并不是这十来个胆怯的人中間的一个，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我也許能忍受这种情形。可是，如果出乎意料之外，某些幼稚的人竟打算用下流的行为和侮辱性的嘲笑来破坏街道交通，那末我要坚决劝告优秀的公众立刻远离那些幼稚的人，因为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情况下会采取严肃的措施，如果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肇事者逍遥法外，粗心大意的人反而遭殃，我将感到惋惜。

御任县长和市长

参 政 官 澤巴尔特

1848 年 6 月 16 日于特利尔

这位高官表现得多么仁慈，多么象一个家长！

“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他也許能忍受这种情形。”澤巴尔特先生的容忍精神多好啊！

胆怯的人在耽心发动。特利尔的独裁者沒有具备胆怯的特性。但是，他必須表现出自己的威力，必須把胆怯的人的荒誕的幻想变成正式发表的猜疑，同时威胁說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时候要采取严肃的措施。



---

这位大人物把严肃同仁慈結合得多么令人惊异！在这种严肃而仁慈的預見的保护之下，特利尔的优秀居民可以高枕无忧了。

写于1848年6月18日

載于1848年6月19日

“新萊茵报”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6月17日的妥协會議

科倫 6月19日。“什么也沒有学到，什么也沒有忘掉”，——这一句話既适用于康普豪森內閣，也适用于波旁王朝。

6月14日，因妥协派背弃革命而憤怒的人民冲进了軍械庫。他們想获得某种保障来反对妥协議會，他們知道，最好的保障就是武器。軍械庫被攻占了，人民武装起来了。

攻占軍械庫是沒有直接結果的事件，是半途而废的革命，但它却产生了以下的后果：

(1) 吓得发抖的議會撤銷了昨天的決議，声明把自己交給柏林居民来保护；

(2) 它在非常重要的問題上背弃了內閣，以46票的多数否決了康普豪森的宪法草案；

(3) 內閣立即开始全面瓦解，大臣卡尼茨、施韦林和奥尔斯瓦特都辞职了(到現在为止，其中只有卡尼茨已决定要由施萊根施坦来代替)，而康普豪森在6月17日才向議會請求3天的期限来补充他那分崩离析的內閣。

这一切都是攻占軍械庫的后果。

正当人民自我武装的后果这样明显地表現出来的时候，政府却胆敢指責人民的这种行动！正当議會和內閣承認起义的时候，对参加起义的人却进行法庭审訊，用旧普魯士法律来对付他們，在

議会的會議上侮辱他們，把他們說成是普通的小偷！

就在吓得发抖的議會把自己交給攻占了軍械庫的戰士們來保護的那一天，**格里斯海姆**（陸軍部委員）和**泰梅**（檢察官）兩位先生却下令把這些戰士宣布為“暴徒”和“強盜”。被革命從流放中召回的“自由主義的”泰梅先生，開始對繼續革命的人進行嚴厲的審訊。**科爾恩**、**勒文宗**和**烏爾班**都被逮捕了。在全柏林進行挨家挨戶的搜查。正確地估計了局勢，立即了解到必須放棄軍械庫的**納茨梅爾**上尉用和平撤退的辦法使普魯士避免了新的革命，使大臣們擺脫了極大的危險，這個人卻被交給軍事法庭，軍事法庭根據軍法將他判處死刑。

妥協派在這一場虛驚之後也恢復了常態。他們象在6月9日背棄了街壘戰的戰士一樣，在6月17日的會議上背棄了攻占軍械庫的戰士。在6月17日的會議上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康普豪森先生向議會聲明：現在他要向議會說明全部情況，使議會能夠做出決定，是否需要因攻占軍械庫事件而對內閣起訴。

當然，要控告大臣們是有理由的，但並不是因為他們容許了攻占軍械庫，而是因為他們狡猾地把革命的一個最重要的成果——人民的武裝化為烏有而引起了這個事件。

繼康普豪森先生發言的是陸軍部委員**格里斯海姆**先生。他對軍械庫中的武器，即對“普魯士獨有的秘密，完全新式的”步槍，對“具有歷史意義的”武器和其他一切名貴的東西作了詳盡的描寫。他這樣描繪軍械庫的警衛組織：樓上有250個士兵，樓下有市民自衛團。他指出：作為整個普魯士國家主要武庫的這個軍械庫的武器收發工作，就是在三月革命的時候也幾乎沒有中斷過。

**格里斯海姆**先生說了上面這一段開場白，想以此來博得妥協

派对于軍械庫这个极其有趣的机构的同情，然后他才談到6月14日的事件。

他說，有人經常使人民注意軍械庫，注意武器的发送情况，并且提醒人民，說什么武器是屬於他們的。

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屬於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証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格里斯海姆先生“可以肯定地担保說：是人民队伍首先向市民自卫团射击的。”

这种武断簡直和三月間“17名被害士兵”的传奇一模一样。

格里斯海姆先生接着叙述人民怎样冲进軍械庫，市民自卫团怎样撤退，当时“1100支最新式的步枪怎样被窃走，这是不可补偿的损失”(!)有人劝納茨梅尔上尉撤退，即劝他“违背自己的职责”；于是軍队就撤退了。

当陸軍部委員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談到下面这一段話的时候，这位老普魯士人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人民玷污了旧普魯士的圣地。請听一听他是怎样說的：

“就在那軍械庫的楼上房間里发生了真正駭人听闻的事情：人們在那里盗窃、搶劫和破坏。新的步枪被扔到楼下，摔成碎块。无价的古物、用銀子和象牙鑲嵌的步枪以及精心制作而很难修复的炮的模型都被破坏了。用人民的鮮血换来的战利品和有关民族榮譽的旗帜也遭到了破坏和褻瀆！”(全場憤怒，喊声四起：呸，呸！)

老武士对于人民的輕举妄动所表示的这种憤怒給人留下了真正可笑的形象。人民对旧的尖頂盔、后备軍士兵的軍帽和其他“无价的”废物干出了“真正駭人听闻的事情”！他們把“新的武器”往

楼下扔！据在服役中白了头发的陆军中校看来，这是怎样一种“駭人听闻的事情”呵，因为他只能在軍械庫中以敬仰的心情靜观“新的武器”，而他的团队在操練时用的却是陈旧不堪的步枪！人民毀坏了炮的模型！格里斯海姆先生是不是要求人民在革命的时候带上柔軟的羊皮手套呢？然而最可怕的是旧普魯士的战利品遭到了褻瀆和破坏！

格里斯海姆先生在这里向我们叙述的这个事实証明柏林人民在6月14日表现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机智。柏林人民踩坏了在萊比錫和滑鉄卢战役中夺得的旗帜，从而否認了所謂解放战争。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中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自己的整个可耻的过去决裂。

可是，旧普魯士的妥协派議会当然要对这种行为大喊“呸！呸！”，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人民的第一次革命发动，意味着人民不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自己过去的美妙幻想。

尽管这种褻瀆神圣的行为引起了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勃然大怒，但是他并没有忘記指出：这整个事件“使国家損失了5万塔勒和可以装备几个营的武器”。

他接着說：

“攻击軍械庫根本不是为了要武装人民。武器以极低的价錢卖掉了。”

在格里斯海姆先生看来，攻占軍械庫不过是一些盜窃枪支来換錢买酒喝的小偷所干的事情。可是“强盜們”为什么偏偏要搶劫軍械庫，而不搶劫珠宝商的富有的店鋪来換錢呢，关于这一点，陆軍部委員認為沒有解释的必要。

“对倒霉的（！）上尉之所以表示深切的同情，是因为据说他为了不讓市民流血而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人們还把这种行为說成是值得贊揚

的和值得感謝的；甚至今天還有代表團去訪問他，並且要求承認這是一種值得全國感謝的行為。（憤慨）這就是以陪審員施拉姆為首的各個俱樂部的代表。（右派表示憤怒和發出“呸！”的喊聲）毫無疑義，上尉違背了士兵的首要職責——他違背沒有特別命令不得擅离职守的明確指示，放棄了自己的崗位。有人曾經慫恿他，說只有他撤退才能拯救王座，說全部軍隊似乎已經離開城市，國王已經從波茨坦逃跑。（憤慨）他和1806年的一個要塞司令的做法一樣，那個司令不去保衛委託給他的要塞，而把它輕易地交給了敵人。至於有人認為他以撤退防止了市民的流血，那末這種意見自然是站不住腳的；誰也不會受到絲毫的損傷，因為他正是在趕來援助他的一個營的其餘部分已經臨近的時候放棄了自己的崗位的。”（右派大喊“妙極了”，左派則發出嗤嗤聲。）

顯然，格里斯海姆先生又忘記了：正是納茨梅爾上尉的堅毅沉着的精神使柏林避免了新的武裝鬥爭，使大臣們擺脫了極大的危險，使君主政體避免了滅亡。格里斯海姆先生原來又是一個典型的陸軍中校，他在納茨梅爾的行動中只看出破壞從屬制度，胆怯地離開自己的崗位，按照著名的1806年的舊普魯士方式來說，是叛變行為，此外沒有看出任何別的東西。君主制度的救命恩人，應當被處以死刑。這對整個軍隊是一個極好的榜樣！

而在格里斯海姆先生說這一番話的時候，議會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呢？議會充當了他的憤怒的回聲。左派最後用嗤嗤聲來表示抗議。一般地說，柏林左派的态度愈來愈怯懦，愈來愈含糊了。在6月14日夜裡，當人民由於孤立無援很快就要失去他們已經爭得的優勢的時候，當人民為了獲得徹底勝利僅僅缺少領袖的時候，這些在選舉中曾經利用過人民的先生們在什麼地方呢？貝倫茲、榮克、埃爾斯納、施泰因、賴辛巴赫這些先生們當時在什麼地方呢？他們不是呆在家里苟且偷安，就是向大臣們遞交不關痛癢的呈文。不僅如此！他們甚至不敢保護人民不受政府委員們的誹謗和侮辱。

---

沒有一个演說家出來說話。沒有一个入願意对曾經給他們带来初次胜利的人民发动負責。他們只敢发出嗤嗤声！这是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呵！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20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0号

## 施图普的修正案

科倫 6 月 20 日。科倫的施图普先生对于議員不可侵犯的法律提出了修正，这种修正虽然没有在妥協議会上討論过，但是对他的科倫的同伙來說，也許并不是沒有兴趣的。我們并不打算剥夺他們充分欣賞这种立法艺术作品的乐趣。

### 施图普議員的修正案

第 1 条 “对議會議員的投票或以議員資格发表的言論和意見，不得以任何方式追究責任。”

**修正：**“刪去第一行的‘言論’两字。”

**理由：**“議員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見就够了。‘言論’还可能包含有对荣誉的侮辱，这种侮辱給了被侮辱者提出民事訴訟的权利。使議員免受这种申訴，我覺得是同議会的声誉相抵触的。”

議員根本用不着发表任何意見，他們只要跺脚和投票就够了。真的，为什么不把“意見”这两个字也勾去呢？要知道，意見必須用“言論”来表达，甚至还可能用“侮辱荣誉的”言論来表达。此外，甚至在“意見”中也可能“包含有”侮辱荣誉的意見。

第 2 条 “在議會存在期間，未經議會批准，不得因某种应受处分的行为控訴或逮捕議會的任何議員，但在當場或者在犯罪后 24 小时內被捕者除外。逮捕欠債的議員，也須經議會批准。”



**修正：**“删去最后一句话：‘逮捕欠债的議員，也須經議會批准’”。

**理由：**“在这里存在着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干涉，我认为批准这种干涉是危险的。尽管議会的利益要求在自己中間有这种或那种議員，但我仍然認為尊重个人权利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特別应当注意的是：我們采用这一法律并不是为了将来，即并不是为了将来某一个議院的議員，而是为了我們自己。假定我們中間有議員担心因欠債而被捕，在这种場合下，如果我們想要依靠我們自己所通过的法律，使我們自己免受債权人的法律追究，那末一定会給我們的选民留下不良的印象。”

或者，正好与此相反！給施图普先生留下了不良的印象：选民把那些可能因欠債而被捕的議員选派到“我們中間”来了。米拉波和福克斯是多么幸运，他們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施图普法案！使施图普先生有些惶恐不安的唯一困难，就是“議会的利益要求在自己中間有这种或那种議員”。但是，人民的利益究竟誰会去過問呢？这里所談的只是“与世隔絕的团体”的利益，这种团体希望在自己中間有某一个人，而債权人却希望在監獄中看到他。这是两种重要利益的冲突呵！施图普先生不妨把自己的修正說得更清楚些：那种負債累累的人，只有得到相当的債权人的允許才能被选为人民代表。債权人随时都可以把他們召回。在高等法院中，議會和政府必須服从国家債权人的最高决定。

**对第2条的第二个修正：**

“在議會开会期間，未經議會同意，当局不得因某种受处分的行为控訴或逮捕議会的任何議員，當場被捕者除外。”

**理由：**“首先，‘議會’这两个字是用做团体的意思，因此，‘議會存在期間’这种說法是不适当的，所以我建議改为‘議會开会期間’。”

把‘应受处分的行为’这个用語改为‘受处分的行为’更为妥当。

我坚持这样的意見：我們不应当排除因受处分的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訴訟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就会允許自己干涉个人权利。因此，也建議加上‘当局’

两个字。

如果保留‘或者在最近 24 小时内等等’补充意见，那末法官就能在犯某种罪行之后 24 小时内逮捕任何一个議員。”

法律草案保证在議會存在期間不得侵犯議員，施图普先生的修正則保证“在議會开会期間”，即在一昼夜的 6 小时内，至多在 12 小时内不得侵犯議員。多么聪明的理由呵！可以講开会期間，而不可以講**团体存在期間**！

施图普先生不想允許**当局未經議會同意而控訴或逮捕議員**。也就是說他允許自己干涉刑法。**民事訴訟**方面的控訴，却是另一回事！只是不得干涉民法！民法万岁！原来私人倒應該得到国家所不應該得到的东西！民事訴訟高于一切！民事訴訟就是施图普先生的固定观念。民法就是摩西和預言者的圣誡！对着民法，特别是对着民事訴訟发誓吧！人民，尊崇最神圣的东西吧！

沒有私法对公法的干涉，可是常常有公法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一般說来，既然我們有了 Code civil<sup>62</sup> [民法典]、民事法庭和律师，还需要宪法干什么呢？

第 3 条 “对議會議員的一切刑事控訴和一切監禁，在开会期間应一律停止，如果議會要求这样做的话。”

对第 3 条拟从措詞上作如下的修正：

“对議會議員的一切刑事控訴和一切因控訴而发生的逮捕，如果并不是根据**法庭的决定**进行的，都必须立即停止，只要議會决定这样做的话。”

**理由：**“我認为不应把那些已經根据法庭的决定判处監禁的議員从監獄中释放出来。”

“如果这个修正一旦被采用，那末它也适用于那些因欠債而被監禁的人。”

难道議會可以有削弱“法庭的决定的力量”或者甚至把那种因欠債而被“监禁”的人拉到自己中間去的犯罪意图嗎？施图普先生渾身发抖，他簡直不能容忍民事訴訟和法庭的决定受到这样的侵害。关于人民主权的一切問題現在也都得到了解决。施图普先生宣布了**民事訴訟和民法的主权**。不要这样的人司掌民法，而把他抛到立法权的从屬范围中去，这是多么残酷无情呵！有主权的人民干出了这种“危险的”干涉“私法”的事情。因此，施图普先生对人民主权和公法提出民事訴訟。

而尼古拉皇帝却能够安靜地退却。在第一次企图越过普魯士边境的时候，施图普議員就一手拿着“民事訴訟”，一手拿着“法庭的决定”出来欢迎尼古拉。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战争，什么叫做战争？是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是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

写于 1848 年 6 月 20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1 日

“新萊茵报”第 2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在波茲南的新政策

科倫 6 月 20 日。在波茲南問題上又發生了新的轉變！在崇高的諾言和熱烈的宣言的階段以後，在維利森的階段以後，是發射霰彈、打烙印和剃光頭<sup>63</sup>的普富爾階段，是血腥的屠殺和俄國人的野蠻行為的階段。現在，在普富爾的階段以後，新的調和的階段開始了！

事與願違，波茲南的總參謀長、屠殺和打烙印的主要參加者奧爾堡少校突然被調到另一個地方去了，科隆布將軍也從波茲南調到科尼斯堡去了。普富爾（硝酸銀）將軍奉召赴柏林，博伊爾曼總督已經到達柏林了。

這樣一來，波茲南就完全被那些帶着打烙印用的硝酸銀和手持剃刀的騎士所拋棄了，被那些從安全的掩護物後面在距離 1 000 步和 1 200 步的地方用榴霰彈殺害以鐮刀武裝起來的沒有自衛力的農民的勇士所拋棄了。仇恨波蘭人的德國猶太人在戰栗；象過去的波蘭人一樣，他們現在看到政府把他們出賣了。

康普豪森內閣恍然大悟了。俄國人侵犯的危險現在向它指出，它使波蘭人遭到官僚和波美拉尼亞後備軍的蹂躪，是犯了多么嚴重的錯誤。現在它想不惜任何代價重新博得波蘭人的同情，但是現在已經太遲了！

用各種殘酷手段和野蠻行為（這使德國人蒙受永久的恥辱）對

波兰人进行整个毁灭性的流血战争，波兰人对我們抱着正义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現在俄波两国必然要結成反德同盟（由于这个同盟，革命敌人的力量增加了 2 000 万勇敢的人民），——所以发生了和干出了这一切事情，难道只是为了讓康普豪森先生最后有机会来嘟囔他的 *pater, peccavi* [父亲，我犯了罪]嗎？

难道康普豪森先生認為，現在当他需要波兰人的时候，他能够用甜言蜜語和各种讓步来重新博得他們的已經淹沒在血泊中的同情嗎？难道他認為，手上打有烙印的人們会随时为他作战嗎？剃光脑袋的人們会为他把自己的脑袋放在俄国的馬刀下嗎？难道他真的認為，他随时都能率領那些幸免于普魯士的榴霰弹的人們来反对俄国的霰弹嗎？

难道康普豪森先生認為，在他毫不含糊地亲口承認自己的无用以后，他还能繼續执政嗎？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20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1 日

“新萊茵报”第 2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康普豪森內閣的垮台

科倫 6 月 22 日。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sup>64</sup>

染滿了波兰热血的 3 月 30 日<sup>65</sup>的太阳也落下去了。

康普豪森內閣曾經給反革命穿上他那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服装。現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这副累贅的假面具。

一个无生命力的中間派左翼的內閣也許可以代替几天 3 月 30 日的內閣。但是它的真正繼承者却是普魯士亲王內閣。荣誉屬於康普豪森，他賜給封建专制政党一个天然的首領，賜給自己一个繼承者。

为什么还要繼續同資產階級保护人周旋呢？

难道俄国的軍隊不是駐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普魯士的軍隊駐扎在西方边境上嗎？难道波兰人沒有准备好用霰弹和硝酸銀来替俄国宣传嗎？

难道沒有采取一切措施，准备象轟击布拉格一样，来轟击萊茵省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嗎？

在丹麦的和波兰的战争，在軍隊同人民之間的一系列小小的冲突中，难道軍隊沒有足够的可能性使自己变为橫行霸道的暴兵嗎？

难道资产阶级沒有厌倦革命嗎？难道反革命将把自己的教会建立在上面的岩石(英国)不是巍然聳立在海洋之中嗎？

康普豪森內閣还企图乞求一点声望，它断言內閣离开国家活动的舞台是由于受騙，想以此来博得社会的同情。果然，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受了騙的騙子手。为了給大资产阶级效劳，康普豪森內閣必須竭力用欺騙的手段来消灭革命的民主成果；在同民主派的斗争中，它必須同贵族政党結成联盟，并成为这个政党的反革命野心的工具。贵族政党充分壮大了，于是就抛弃了自己的保护者。康普豪森先生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这就是这个人的善意，这也就是他的厄运。对于失望的英雄，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

但是它又从东方升起。

写于 1848 年 6 月 22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3 日

“新萊茵报”第 2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議会的 第一件事迹

科倫。德国国民議会终于稍微动起来了。它终于通过了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的決議：它干預奥意战争。

而它是怎样来进行干預的呢？它宣布了意大利独立嗎？它已派遣信使把命令送到維也納，要拉德茨基和韦尔登立即撤退到伊宋佐后面去嗎？它向米兰临时政府<sup>66</sup>致过賀詞嗎？

沒有的事！它声明說，它将把对的里雅斯特的任何攻击看成是宣战的理由。

这就是說，德国国民議会，在联邦議会的欣然同意下，允許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橫行霸道，掠夺屠杀，允許他們把大量燃烧弹扔向每一个城市，扔向每一个村庄（参看本报意大利栏），然后安全地退到德意志联邦的中立地区！它允許奥地利人随时从德国的土地上派克罗地亚人和潘都尔兵<sup>67</sup>去蹂躪倫巴第，但是却要禁止意大利人追击躲避在隱蔽所中的被击潰的奥地利人！它允許奥地利人从的里雅斯特封鎖威尼斯，封鎖皮阿味、布林塔、塔腊門托各个河口，可是却严禁意大利人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任何敌对行动！

德国国民議会通过这样的決議，說明它的胆怯行为已經是无以复加了。它沒有足够的勇气公开批准对意大利作战，它更沒有勇气禁止奥地利政府进行这种战争。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它通



过了(并且发出了贊成的叫喊声,以使用震耳的喧囂声来抑制内心的不安)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決議;从形式上看,这个決議既不贊成也不譴責反对意大利革命的战争,但實質上却是贊成这个战争的。

这个決議是对意大利的間接宣战,而这种宣战对德国这样一个有4 000万人的民族說来是特別可耻的。

法兰克福議会的決議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憤怒的风暴。哪怕意大利人只有一点自豪感和毅力,他們也会用炮轟的里雅斯特和进军布倫納来回敬。

法兰克福議会在盘算,而法国人民却在部署。威尼斯向法国請援;在这个決議之后,法国人也許很快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我們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萊茵河畔看到他們。

有一个議員譴責法兰克福議会毫无作为。恰恰相反,它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使我們在北方进行一个战争,在南方进行另一个战争,而西方和东方的战争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我們面临着一幅令人愉快的景象:既进行反对沙皇的斗争,又进行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既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又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国民議会还关心讓俄国、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的士兵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中举行一次会面。可是有人还說議会毫无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23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3号

## 汉澤曼內閣

科倫 6 月 23 日。柏林的內閣危机有了新的轉变！我們的汉澤曼受命組閣；他同旧內閣的殘骸，同帕托夫、博奈曼、施来尼茨和施萊根施坦一起不胜感激地投入了中間派左翼的怀抱。洛貝尔图斯先生应当加入这个新的联合，以中間人的身分来为康普豪森內閣的悔悟的残余分子謀取中間派左翼的恩典和寬恕。

由于洛貝尔图斯先生的关照，我們普魯士的杜沙特尔看到了他那梦寐以求的願望的實現——他就要做內閣首相了。康普豪森的月桂冠曾使得他夜寐不眠，現在，他終於将要有可能来証明，当他可以舒展双翅的时候，他能够干出怎样的事迹来。現在我們可以贊美他那宏大、輝煌的財政計劃，贊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消灭一切貧困的方案——他曾向他的議員們大肆吹嘘过的那些草案。只是現在他才能把他过去以鐵路工作者的身分以及在其他活動場所光輝灿烂和卓有成效地發揮过的才干全部貢獻給国家。只是現在才紛紛提出了对內閣的信任問題！

汉澤曼先生胜过了他的原型：由于洛貝尔图斯先生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做了內閣首相，而杜沙特尔則始終沒有做过。但是我們要警告他。杜沙特尔显然是有理由經常居于第二位的。杜沙特尔知道：国内多少有教养的等級，不論在議會內或者在議會外，都需要有善于“雄辯”、长于詞令的英雄，都需要有一个象基佐或康普豪

森那样的人，这种人在任何场合都善于用相应的论据、哲学推论、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空洞词句来麻醉所有听众的良心和博得他们的同情。杜沙特尔甘愿把內閣閣揆职位的荣誉让给口若悬河的思想家。徒有其表的光辉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掌握实权。他知道：他在哪里，那里就有实权。汉澤曼先生企图采取别的行动，当然，这一点他自己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再說一遍：內閣閣揆职位对于杜沙特尔是一个不适合的位子。

然而，当我们想到汉澤曼先生很快就会从他那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位上摔下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汉澤曼內閣还在未組成之前，还在連片刻的生存乐趣都未能享受的时候，就已經注定要灭亡。

“劊子手就站在門外”<sup>68</sup>；

反动派和俄国人在叩門，不等鷄鳴三遍汉澤曼內閣就要垮台，即使有洛貝尔图斯和中間派左翼撐腰也无济于事。那末再見吧，內閣閣揆职位，再見吧，財政計劃和消灭貧困的宏伟方案；这一切都将付之流水，而汉澤曼先生如果能安然回到他那平凡的資產階級的老窠，并能細心地玩味人生若梦这句话，那倒是万幸了。

写于 1848 年 6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24 号

## “新柏林报”論宪章派

科倫 6 月 23 日。“新柏林报”<sup>69</sup> 在它的第 1 号中向我們报道了英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物以稀为贵。“新柏林报”至少有这样一个功績：它完全按新的方式来描述英国的状况。它首先这样写道：

“看来，奥康瑙尔真的是个既无智慧又无骨气的人，在这里根本不受人尊敬。”

我們不打算評比奥康瑙尔的智慧 and 骨气是否同“新柏林报”一样多。就这些优点而論，古爱尔兰国王的后裔，大不列顛无产阶级的領袖也許不如这个有教养的柏林女人；至于尊敬，你这个有教养的柏林女人当然說得很对：就象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奥康瑙尔也是名声扫地的；他从来不会象你在第 1 号报纸中那样，善于博得所有善意的人的尊敬。

这位柏林女人繼續写道：

“奥康奈尔說过：他(奥康瑙尔)<sup>①</sup>虽然有毅力，但是缺少邏輯。”

这又是妙不可言的。已故的丹<sup>②</sup>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毅力的邏輯在于：他每年从自己的穷老乡們的口袋中榨取 3 万鎊

① 括弧里的話是作者的。——譯者注

② 丹尼尔·奥康奈尔。——編者注

的地租；奥康瑙尔的鼓动的邏輯只能使一个声名狼籍的宪章主义者出卖自己的全部地产。

“宪章派中的激进派的第二个領袖琼斯先生(目前法院正在通緝他,但無論在哪里也找不到他)甚至找不到一个願意为自己花1 000 鎊的保人。”

这是极有教养的柏林女人的第三条新聞。这几句話包含着三种极其可笑的說法:第一,当法庭还在通緝某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談不上保証;第二,厄內斯特·琼斯先生已經在紐盖依特<sup>70</sup>待了两个星期,而且,不久以前,当所有的英国資產階級报刊都为琼斯的被捕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有教养的柏林女人大概被随便邀請到某一个极有教养而知識渊博的同事那里去喝了一杯茶;第三,琼斯先生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願意为他支付1 000 鎊押金的人,即找到了那个既无智慧又无骨气的奥康瑙尔,可是法院以国会議員不能当保人为理由拒絕了奥康瑙尔。

最后,“新柏林报”揚言,說什么英国小城市中的宪章派往往自相残杀。亲爱的柏林女人,你稍微浏览一下随便哪种英国报纸吧!那时你就会看到,对宪章派說来,毆打警察从来就比自相残杀痛快得多。

我們建議我們的讀者特別注意充滿智慧和骨气的“新柏林报”。

写于1848年6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24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4号

## “盖尔温努斯报”<sup>71</sup>的威胁

科倫 6 月 24 日。

“如果法兰克福議會及其宪法規定的威信能够箝制法国，那还不太要紧；普魯士将从它的东方各省恢复它的威信，同时，看来它大概不会因暂时失去莱茵省而畏縮不前。”（見 6 月 22 日“盖尔温努斯报”）

教授报的駐柏林記者說得多么巧妙！普魯士将从“它的东方各省”恢复它的威信。它在哪里恢复它的威信呢？在东方各省嗎？絕对不是，那里講的是从东方各省。在莱茵省嗎？更其不是。因为它在恢复这种威信时指望“暂时失去莱茵省”，也就是說，暂时失去它在莱茵省的“威信”。

这样看来，它将要在柏林和布勒斯劳恢复它的威信。

可是，它为什么不在它的东方的省的帮助下恢复大概在柏林和布勒斯劳失去的威信，而要从它的东方的省来恢复这种威信呢？

俄国并不是普魯士东方的省，相反地，普魯士倒是俄国西方的省。但是，俄国人将从普魯士东方的省出发，同勇敢的波美拉尼亚人并肩远征索多瑪和哥摩拉，并将重新恢复普魯士的“威信”，即恢复普魯士王朝、专制王权的威信。从专制制度被迫把一块染滿平民鮮血的“写滿字的紙片”<sup>72</sup>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間的那一天起，从宮庭被迫接受做谷物和羊毛生意的資產階級商人<sup>73</sup>的保护

和監視的那一天起，这种“威信”就已丧失了。

由此可見，朋友和救星都来自东方；为什么要把军队集中在东方边境呢？敌人来自西方，因此，军队就应当集中在西方。“科倫日报”<sup>74</sup> 駐柏林的幼稚无知的記者，不懂得波兰人的勇敢的朋友普富尔的英雄气概，他承担了到彼得堡去的使命，但在他的背后并没有 10 万大軍保护。普富尔大胆地到彼得堡去！普富尔已經到了彼得堡！普富尔不怕越过俄国国境，而德国的公众則在紛紛談論集中在德国边境上的俄国军队！“科倫日报”的記者怜悯德国的公众。可是，我們还是来談談我們的教授报！

如果俄国人迅速从东方帮助普魯士王朝，法国人就会赶忙从西方帮助德国人民。而“法兰克福議會”就能安靜地繼續辯論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規定”。“盖尔温努斯报”的記者用华丽的詞藻掩盖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法兰克福議會及其宪法規定”将要“箝制”法国。普魯士将要失去萊茵省。可是它为什么因这种損失而畏縮不前呢？要知道，这种損失不过是“暫时的”。德国的爱国主义将再一次在俄国人的指揮下远征拉丁系的巴比倫，同时将在萊茵省和整个德国南部永久地恢复“普魯士的威信”。呵，你真是个有先見之明的天使！<sup>75</sup>

如果普魯士不会“因暫時失去萊茵省而畏縮不前”，萊茵省就更不会因“永久”失去普魯士的統治而畏縮不前。如果普魯士同俄国人結成同盟，德国人就会同法国人結成同盟，并同他們一道进行西方反对东方的战争，进行文明反对野蛮的战争，进行共和制度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

我們希望德国統一，但是这种統一的因素只有从德意志大君主国瓦解中才能分离出来。这些因素只有在战争和革命的风暴中

才能結合在一起。只要事變一提出专制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口  
号，立宪主义就会自行消失。主张立宪的資产者会憤怒地向我們  
叫喊：可是，誰使德国人遭到俄国人的威胁呢？除了民主派还有誰  
呢？打倒民主派！他們說得对！

如果我們自己在本国实行了俄国的制度，我們就既可以使俄  
国人不必費力气来实行这种制度，也可以給自己节省軍費。

写于1848年6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25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5号



## 帕托夫贖买法案建議書

科倫 6 月 24 日。在本月 20 日的妥协会議上，即在那次劫数注定的會議上，康普豪森的太陽落下去了，內閣的混亂状态出現了；帕托夫先生提出了有关基本原則的建議書，根据这些原則，他打算在消灭乡村中的封建关系方面有所控制。

讀了这个建議書，簡直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旧普魯士各省中很久以来沒有爆发过农民战争。多么繁重的义务、代役租和苛捐杂稅，多么混乱的中世紀的名称，一个比一个荒謬！領主权 [Lehnsherrlichkeit]，死亡稅 [Sterbefall]，好家畜使用权 [Besthaupt]，治疗稅 [Kurmede]，屠宰什一稅 [Blutzehnt]，保护金 [Schutzgeld]，窩尔普尔吉士稅 [Walpurgiszins]，养蜂稅 [Bienenzins]，蜡租 [Wachspacht]，世袭大地主侵占的村鎮附屬地使用稅 [Auenrecht]，什一稅 [Zehnten]，租金 [Laudemien]，遺產稅 [Nachschußrenten]，——所有这一切，直到今天还在“世界上設備最完善的国家”中保存着，而且，如果法国人沒有实行二月革命的話，这一切还会永久保存下去！

是的，如果一切事情都按照帕托夫先生的願望进行，这些义务中的大部分，而且正好是最繁重的部分，就会永久保存下去。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这个部門交給帕托夫先生掌管，使他尽可能寬容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頑固的容克地主，尽可能

騙取农民的革命成果！

柏林革命已經永远結束了所有这一切封建关系。不言而喻，农民已經立即在实际上废除了这些关系。政府只应当把实际上已經由人民的意志實現的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事情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可是，在貴族决定来一个 8 月 4 日之前，他們的城堡必然要焚毀。目前的政府由一个貴族为代表出面維護貴族的利益；它向議會提出了一个建議書，要求妥协派現在也要把 3 月間在全德境內爆发的农民革命出賣給貴族。对于在乡村中实施帕托夫先生的原則所产生的后果，政府要負責任。

帕托夫先生希望农民为废除所有一切封建义务（甚至包括租金在內）而繳納贖金！只有那些由世襲的农奴依存地位、旧的捐稅制度和領主裁判权产生的义务，或者那些不給封建主提供任何价值的义务（多么仁慈呵！），換句話說，只有在所有封建重負中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的那些义务，在废除时才不需要繳納贖金。

反之，一切已由契約或判決調整过的封建义务的贖金仍然有效。这就是說，农民将得不到任何补偿。可是农民在从 1816 年，特别是从 1840 年頒布的有利于貴族的反动法律生效期間，曾經贖买过自己的义务；当时为了封建主的利益，曾經用欺騙的手段，即最初利用法律，后来利用受賄的官吏剝夺了农民的財產。

为了欺騙农民，就需要建立农业銀行<sup>76</sup>。

假如一切事情都按照帕托夫先生的願望进行，那末在他的法律下封建义务不会被废除，就象在 1807 年的旧法律下封建义务沒有被贖回一样。

帕托夫先生的計劃的真正标题是：“关于用贖金永久保持封建

---

义务的建議書”。

政府在挑起农民战争。也許普魯士甚至不会因“暂时失去”西里西亚而“畏縮不前”。

写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25 号

## 起义的民主性質

**布拉格。**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証明我們对布拉格起义（見本報第 18 号）<sup>①</sup>的性質的看法是正确的；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德国各家報紙怀疑捷克党为反动派、貴族和俄国等效劳是完全錯誤的。

人們只看到列奧·图恩伯爵和他的貴族，但沒有看到捷克的人民群众——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有人从貴族在某个时候曾經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为了音斯布魯克的权奸的利益而力图利用捷克的运动这一点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已經在 1844 年做过 3 天布拉格真正主人<sup>77</sup>的革命的布拉格无产階級，曾經維護过貴族和整个反动派的利益！

可是，所有这一类帶有誣蔑性的言論，最終都为捷克人的第一次坚决的发动所駁倒了。起义的民主性質是那样明显，以致图恩伯爵們不仅沒有起来領導运动，而且立即离开了运动，并被人民当作奧地利的人質扣留起来。起义的民主性質是那样明显，以致所有拥护貴族的捷克人都离开了它。起义的目的不仅是反对奥国的暴兵，而且也反对捷克的封建主。

奧地利人攻击人民，并不是因为他們是捷克的人民，而是因为他們是革命的人民。对于軍閥來說，袭击布拉格只不过是一个序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94—96 頁。——編者注

幕，接着必然要焚毀和袭击維也納。

“柏林閱報室”<sup>78</sup>6月20日的維也納通訊报道說：

“这里的市民委员会<sup>79</sup>派到布拉格去的代表团今天回来了。該代表团的唯一任务是督促電訊的轉达工作，使我們不要再象最近几天那样，日夜等待布拉格的消息。代表团向委员会报告了自己的旅行經過。它报道了暴兵們在布拉格橫行霸道的駭人听聞的消息。它簡直不能用言語来形容包围、炮轟和袭击这个城市的可怕情形。代表們冒着生命的危險乘馬車从布拉格前面的最后一个火車站到达城里，又冒着同样的危險穿过許多軍隊到达了布拉格宮。

士兵們到处都用这样的呼声来对待他們：‘你們在這兒，維也納的坏蛋們！你們終於落到我們的手里了！’許多士兵想攻击代表团；甚至軍官們的举动也粗暴得难以形容。最后，代表們来到宮殿，瓦尔莫登伯爵拿起委员会签发的授予代表們全权的文件，看了看上面的签字，說道：‘皮勒斯多夫？他在我們这里是毫无意义的。’文迪施格雷茨对待穿便服的坏蛋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要粗暴，他說：‘革命到处都胜利了，但是，这里的胜利者却是我們，任何民政权力我們都不承認。当我在維也納的时候，那里平安无事。我一离开那里，暴风雨就大作，把一切都給打翻了。’沒收了代表們的武器，把他們关在宮殿中的一間房里。两天以后才准許他們离开那里；但是並沒有把武器交还給他們。这就是我們的代表們所叙述的情形，这就是布拉格的梯利对待他們的态度，这就是軍隊的品行，而这里竟还有人在装模作样，仿佛确信这不过是反对捷克人的斗争！可是，难道代表們說的是捷克話嗎？难道他們不是穿的維也納国民自卫軍的制服嗎？难道他們沒有呈交內閣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立法权的市民委员会发給他們的全权證書嗎？

但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太大了。文迪施格雷茨認為他是能阻碍革命的唯一人物。有人在象枪杀狗一样枪杀捷克人，并且还在伺机反对維也納。为什么文迪施格雷茨要释放列奥·图恩，即释放那个领导布拉格临时政府、甚至鼓吹波希米亚独立的图恩伯爵呢？試問，为什么要把他从捷克人手中释放出来呢？不是由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同貴族勾結起来煽动起义的阴谋詭計，又是由于什么呢？

列車在前天已从布拉格开出了。这次列車載走的是德国避难的大学生、維也納的国民自卫軍以及一些从布拉格逃出来的家庭，显然他們感到布拉格的秩序虽然已經恢复，但毕竟不太安全。在开出布拉格后的第一个車站上，那里的哨兵要求所有的乘客一律交出武器；在这个要求被拒絕后，士兵們就向所有的車廂开火，射击沒有自卫力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从車廂里抬出了6具尸体；乘客們揩去了沾在自己脸上的死者的血。在这里被极力描繪成德国自由的天使和保卫者的暴兵，就是这样来对付德国人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4日

載于1848年6月25日  
“新萊茵报”第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在  
“历史問題”杂志1955  
年第11期

## 巴黎消息

科倫 6 月 24 日晚 10 时。23 日的巴黎邮件沒有收到。据到达这里的信差說, 当他离开巴黎的时候, 群众跟国民自卫軍的厮杀已經开始了, 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曾听到猛烈的炮声。

写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新萊茵报”第 25 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巴黎消息

科倫 6 月 25 日晚 10 时。巴黎的邮件又沒有收到。今天来的巴黎报纸还是 23 日的，要是邮局工作正常，报纸早在昨天晚上就应该送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所拥有的唯一资料就是比利时报纸上的那些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报道，以及我們自己关于巴黎的知识。据此，我們力求尽量忠实地向讀者描述一下 6 月 23 日起义的情况。

現在我們沒有時間作更进一步的評述。我們对这一事件的詳細論断以及有关巴黎議會 23 日會議的較完全的評論，将在明日报道。

写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6 日

“新萊茵报”第 26 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6月23日事件的詳情

起义带有真正工人起义的性質。工人的怒火噴向政府和議會；因为它們辜負了工人的期望，天天采取有利于資产階級而不利于工人的新措施，解散了卢森堡宮工人委員會，限制国家工厂的活动，頒布了禁止集会法<sup>80</sup>。事件的一切詳情都說明起义是具有明确的无产階級性質的。

林蔭路(巴黎的主要命脉)首先成了群众聚集的場所。从圣丹尼門往下到維耶·杜·坦普尔大街这一段挤滿了人群。国家工厂的工人声明不到索隆去，不到那里的国家工厂去；另一些人在講，他們昨天往那里去，可是在枫丹白露关卡附近便被拦住，他們在那里等待前一天晚上答应发給他們的通行証和离境令，但終归无效。

10点鐘左右，发出了构筑街垒的号召。巴黎的东区和东南区(从包松涅尔市区和包松涅尔郊区起)很快就筑起了街垒，但是看来这些街垒筑得还相当紊乱，沒有总的計劃。圣丹尼街、圣馬丁街、兰布托街、佛布尔-包松涅尔街和塞納河南岸通向圣雅克郊区和圣馬索郊区的要冲——圣雅克街、拉哈普街、拉-尤舍特街以及毗連的桥梁上大体上都修起了防御工事。街垒上豎起了旗帜，旗帜上有的写着“沒有面包，不如死亡！”，有的写着“沒有工作，不如死亡！”。

可見，起义无疑是以主要是工人居住的城市东部地区为根据

地，就是說，首先是依靠圣雅克、圣馬索、圣安东、坦普尔、圣馬丁和圣丹尼这些郊区，即依靠 «aimables faubourgs» [“可爱的郊区”]<sup>81</sup>，其次是依靠介于这些郊区之間的市区（圣安东市区、馬勒市区、圣馬丁市区和圣丹尼市区）。

街垒刚筑好，紧接着就开始了小的接触。朋努威尔林蔭路上的哨崗由別动队<sup>82</sup>把守着，这个哨崗几乎在每次革命中都是首当其冲的。群众解除了这个哨崗的武装。

但是不久，西区的资产阶级自卫軍就开来救援。他們又占領了哨崗。另一队占据了吉姆納茲大剧院前的人行道，这是一个能控制相当长一段林蔭路的制高点。群众打算解除几个前沿哨崗的武装，但是双方暂时都还没有使用武器。

最后，接到了攻取构筑在圣丹尼門附近林蔭路中間的街垒的命令。国民自卫軍在警察署长帶領下向前挺进；談判开始了；忽然响起了几下枪声，但不知道是哪一方开的枪，于是双方便立刻开始射击。

接着，朋努威尔那边的哨崗也馬上开始射击。第二軍团的那个占領着包松涅尔林蔭路的营也携带实弹的枪支前进。群众四面受敌。国民自卫軍从有利的、有些地方很安全的陣地上对工人进行猛烈的交叉射击。工人坚持了半个鐘头；最后，整条朋努威尔林蔭路以及由此直到圣馬丁門的街垒全被夺去了。到11点鐘，国民自卫軍在这个地区又夺下了坦普尔那面的街垒，并占領了通向林蔭路的要冲。

攻占这些街垒的英雄是第二区的资产者。第二区以旧皇宮<sup>83</sup>为起点，包括整个蒙馬特尔郊区。在这里居住的尽是維芬街、里舍留街和意大利林蔭路上有錢的商店老板，拉菲特街和伯热尔街上

的大銀行家和堂甸大道上的生活舒适的食利者。在这里居住的有路特希尔德和富尔德，魯日蒙·德·罗旺貝和加內龙。总之，这里有交易所、图尔托尼<sup>84</sup>以及和它們有某种关系的一切。

这些英雄們首先受到紅色共和国的威胁，而且受到最大的威胁，所以他們首先挺身而出。值得注意的是，6月23日的第一个街垒是2月24日遭到失敗的人攻下的。他們以3 000人进行攻击，用4个連攻击一輛被翻倒的公共馬車。然而，起义者似乎在圣丹尼門附近又巩固起来了，因为大約在中午的时候，拉摩里西尔將軍不得不調动一支包括別动队、常备軍和騎兵的强有力的队伍，携带兩門大炮，协同第二軍团（第二区的国民自卫軍）夺取防御坚固的街垒。別动队一个排在起义者的猛烈攻击下被迫退却。

圣丹尼林蔭路上的战斗是巴黎东部各区中搏斗的信号。这是一场血战。起义者伤亡30人以上。憤怒的工人发誓要在第二天晚上全面发动攻势，同“共和国市近卫軍”作殊死战。

11点鐘，普朗什-米布雷街（圣馬丁街向塞納河延伸的部分）上也发生了战斗；有一个人被击毙。

在中央市場、兰布托街等等地区也发生了流血冲突。地上躺着四五具尸体。

下午1点鐘，帕拉迪-包松涅尔街发生了小接触；国民自卫軍开枪射击；結果不詳。在包松涅尔郊区，經過流血冲突后有两个国民自卫軍下士被解除武装。

圣丹尼街在遭到騎兵冲击后失陷。

午后，圣雅克郊区的战斗非常激烈。圣雅克街、拉哈普街和莫別尔廣場上的街垒受到攻击，互有勝負，街垒还遭到了猛烈的霰彈射击。蒙馬特尔郊区的軍隊也开炮轟击。

总之，起义者被击退了。市政厅解围；到下午3点钟，起义的地区只剩下郊区和馬勒市区了。

此外，在拿枪的国民自卫軍中可以看到少数不穿軍服的人（即沒有錢購買軍服的工人）。可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却带着貴重的武器、猎枪等等。在步兵的行列中也有国民自卫軍的騎兵（他們常常是些富家子弟）。在包松涅尔林蔭路上，国民自卫軍乖乖地讓群众解除了武装，然后逃走。

5点钟，战斗还在繼續进行，突然傾盆大雨，斗争才暂时停止。

但是在个别地方，战斗一直繼續到深夜。9点钟，在巴黎工人的中心——圣安东郊区还能听到枪声。

直到現在，斗争还没有表现出革命决战的全部残酷性。国民自卫軍，除第二軍团外，看来多半是不敢向街垒进攻的。工人们尽管盛怒难遏，但由于处境，也只限于坚守自己的街垒。

这样，双方到晚上就散去了，决定明天早晨再交鋒。政府在斗争的第一天沒有占到任何便宜；被击退的起义者可以在一夜之間重新占領失去的陣地，他們果然这样做了。而下面两件严重的事情显然对政府不利：政府用霰弹射击，却并没有在第一天就把騷动平息。但是，在用霰弹射击以后，在黑夜（它带来的不是胜利，只是休战）过去以后，騷动就会結束，革命就要开始。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5日

載于1848年6月26日

“新萊茵报”第26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在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  
1940年第3期

## 巴黎消息

科倫 6 月 26 日。鑒于剛從巴黎得到的消息所占的篇幅太多，我們不得不把所有評論性的文章抽掉。

因此現在只向我們的讀者說幾句話。賴德律-洛蘭和拉馬丁，以及他們的部長們下台了；卡芬雅克的軍事獨裁從阿爾及利亞搬到了巴黎；馬拉斯特是內政獨裁者；巴黎淹沒在血泊中；起義發展成為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要偉大的革命，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就是我們從巴黎得到的最後消息。這次規模巨大的六月革命不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三天是不夠的，但是人民的勝利比任何時候都更有把握。法國資產階級決心去做法國歷代國王從來不敢做的事情：它自己下了賭注。法國革命的這個第二幕僅僅是歐洲悲劇的开始。

寫于 1848 年 6 月 26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7 日

“新萊茵報”第 27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 “北极星报”論“新萊茵报”<sup>85</sup>

由菲格斯·奧康瑙尔、乔·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編輯的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在最近一号中对于“新萊茵报”对英国群众运动所抱的态度和“新萊茵报”向来維護民主派利益这两点表示贊許。

我們謹向“北极星报”各位編輯表示謝意，感謝他們对本报所作的真正民主的友好的評語。同时請他們相信，在英国报纸中，唯有革命的“北极星报”的贊許才是我們所珍視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26 日

載于 1848 年 6 月 27 日

“新萊茵报”第 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6 月 23 日

我們繼續得到关于 6 月 23 日战斗的許多新的詳細情况。我們掌握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時間只允許我們报道最重要的和最突出的事件。

無論就巴黎或者就全世界來說，六月革命都是一場空前残酷的斗争。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最激烈的战斗要算是米兰的三月战斗了。在这个战斗中，17 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居民粉碎了两三万军队。但是米兰的三月战斗和巴黎的六月革命比起来，簡直是兒戏。

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沒有幻想，沒有冲动**。

如果說在二月里，人民站在街垒上高唱《Mourir pour la patrie》（“为祖国而死”），那末在 6 月 23 日，工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祖国对他们已失去了任何意义。“马赛曲”連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其他一切回忆一起消逝了。人民和资产阶级都感觉到，他們現在所参加的革命比 1789 年和 1793 年的革命更为伟大。

六月革命是拚死活的革命，它是在沉默的憤怒中，在阴森而絕望的冷靜中进行的。工人们知道，他們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残酷可怕的斗争面前，連法国人的愉快爽朗的性格都消失了。

历史上只有两个事件可以和现在大概还在巴黎进行的这个斗争相比拟，这就是古罗马的奴隶战争和1834年的里昂起义。里昂的旧口号“活着没有工作，不如战斗而死”，在14年之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口号现在又被写在旗帜上面了。

六月革命是第一个把整个社会真正分为以巴黎东区和西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革命。二月革命的团结一致，那种富有诗意的、充满了迷人的幻想和诱人的谎言的团结一致消逝了。甜言蜜语的叛徒拉马丁曾经是这种团结一致的体现者。现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使2月25日的一切伪善的诺言失去了效力。二月革命的战士现在互相厮杀起来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再存在了，每一个能够拿武器的人不是站在街垒的这边战斗，便是站在街垒的那边战斗。

在巴黎街道上作战的军队和参加莱比锡民族之战<sup>86</sup>的军队一样多。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六月革命的巨大意义。

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战斗的经过。

如果根据昨天的消息来判断，可以想象得出，街垒是筑得相当杂乱的。但是从今天的详细报道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工人的防御工事从来还没有构筑得象现在这样周密，这样有计划。

城市分为两个军营。从城市的东北郊附近开始，即从蒙马特尔往下到圣丹尼门，再从这里沿圣丹尼街，经过锡特岛，沿圣雅克街到城关，形成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的整个地区都被工人占据着，并筑有工事。资产阶级从西面进攻，并从西面得到增援。

一清早，人们就静悄悄地开始构筑街垒。这些街垒比过去任何街垒都高而坚固。在圣安东郊区入口处的一座街垒上飘扬着一面大红旗。



圣丹尼林蔭路也筑有坚固的工事。林蔭路和克列里街上的街垒以及邻近的已经变成真正堡垒的房屋，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如我們昨天已经报道的，在这里展开了第一次激战。人民以无比英勇的、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战斗。一队强大的国民自卫军由侧面向克列里街垒进攻。街垒的守卫者大部分都撤退了。只剩下七个男人和两个妇女（两个年轻漂亮的职业妇女）。其中有一个男人手拿旗子登上街垒，其余的人开始射击。国民自卫军进行反击。旗手倒下了。一个职业妇女，一个身材高大、衣着雅致、露着胳膊的漂亮的姑娘立刻举起旗子，越过街垒，向国民自卫军走去。射击继续着，国民自卫军里的资产者向这个姑娘开枪，在她走到他们刺刀跟前的时候杀害了她。另一个职业妇女马上跳了出来，抓住旗子，扶起她的女友的头，看到她已死了，就疯狂地向国民自卫军投掷石子。她也在资产者的射击下倒下了。双方的射击愈来愈激烈，从窗口射击，从街垒后面射击。国民自卫军的队伍愈打愈少了，但是援兵又立刻开了上来，街垒被攻下了。在守卫街垒的七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被解除了武装，做了俘虏。第二军团的纨绔子弟和交易所的豺狼们建立了战胜这七个工人和两个职业妇女的丰功伟绩。

两支队伍会合并夺取了街垒后，出现了短时间的可怕的沉寂。但是沉寂很快就被打破了。勇敢的国民自卫军向占据着一部分林蔭路的、手无寸铁的、平静的人群展开猛烈的射击。人们惊慌逃散。但是街垒并没有攻下来。只是在3点钟左右，卡芬雅克率领常备军和骑兵前来，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才把通向圣马丁门的那一段林蔭路拿下来。

在包松涅尔郊区构筑有许多街垒，特别是在拉斐德大街的拐

角处，許多房屋也成了起义者的堡垒。起义者由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军官指挥着。向他们进攻的有第七轻步兵团、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战斗继续了半小时。最后，军队胜利了，但这个胜利只是在死伤了约 100 人以后才取得的。这场战斗发生在下午 3 点钟以后。

在司法厅对面，在君士坦丁街，在邻近的街道上和圣米歇尔桥上，也构筑有街垒，桥上飘扬着红旗。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这些街垒也被攻下了。

独裁者卡芬雅克命令炮兵占领诺特丹桥上的阵地。他从这里向普朗什-米布雷街和锡特街射击；他可以从这里可以毫不费力地移动大炮来对付圣雅克街上的街垒。

圣雅克街为无数道街垒所切断，那里的房屋变成了真正的堡垒。这里只有炮兵才能起作用，卡芬雅克毫不迟疑地使用了炮兵。整个下午，炮声隆隆。霰弹扫荡了街道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晚上 7 点钟，只剩下一个街垒没有攻下，死亡的人很多。

在圣米歇尔桥上和圣安得烈-德斯-阿尔街上也有大炮在射击。在城东北郊的尽头，在沙托-兰登街上（有一支军队大胆地向那里推进），也有一个街垒为炮火所摧毁。

午后，在东北各郊区，双方的射击愈来愈猛烈。拉-维勒特、邦丁等郊区的居民跑来援助起义者。街垒又不断地大批构筑起来。

在锡特岛上，有一连共和国近卫军<sup>87</sup>借口和起义者联欢，冲入两道街垒之间，然后开枪射击。人民愤怒地向背信者猛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逃脱的不到 20 人。

各处的战斗愈来愈激烈。天黑以前，各处都进行炮击；后来只用步枪射击，一直继续到深夜。在 11 点钟，整个巴黎还响遍了紧

急号声，在午夜还听到巴士底獄方面的枪声。巴士底獄广场和通向广场的各个要冲都在起义者控制之下。在起义者兵力的主要中心圣安东郊区，构筑有坚固的工事。騎兵、步兵、国民自卫軍和別动队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从蒙馬特尔街到坦普尔街的林蔭路上。

晚上11点鐘，已經有1000多人伤亡。

这是六月革命的第一天，这是巴黎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日子。巴黎工人孤軍同武装的资产阶級、同別动队、同新組織起来的共和国近卫軍、同常备軍各兵种作战。他們无比英勇地坚持战斗，这种无比英勇是同敌人的无比残酷相应而生的。当你看到巴黎资产阶級怎样兴高采烈地参与卡芬雅克所組織的血腥屠杀的时候，你会觉得許澤尔、拉德茨基、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罪行簡直不值一提了。

23日夜間，于6月11日重新恢复的“人权协会”<sup>88</sup>决定为了紅旗的利益而利用起义，从这一点出发，决定参加起义。因此，該协会召开會議制定了必要的措施，选出了两个常务委员会。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28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8号

## 6月24日

巴黎整夜充滿了軍隊。在各个廣場和林蔭路上都配置有強大的前哨。

早晨4點鐘，緊急號響了。一個軍官帶着幾個國民自衛軍士兵闖入各家，尋找不願自動歸隊的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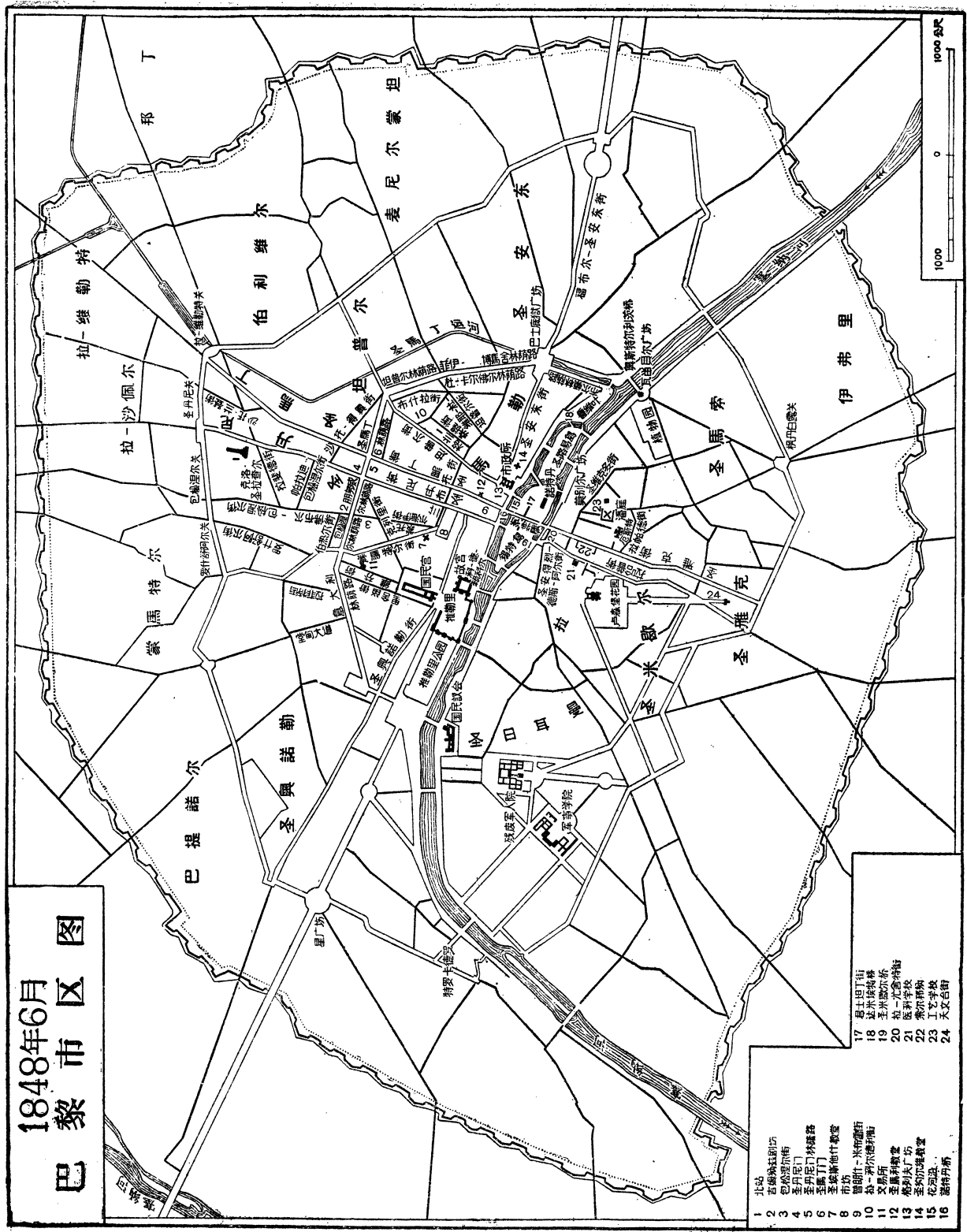
這時，炮聲又響了。聖米歇爾橋一帶響得最厲害，因為聖米歇爾橋是左岸起義者和錫特島起義者聯繫的工具。今天早晨被授予獨裁全權的卡芬雅克將軍渴望利用這種全權來鎮壓起義。昨天使用炮兵只是例外，並且使用的大部分是霰彈。今天到處都遭到炮擊，不管是街壘還是房屋。不僅用霰彈射擊，而且還用炮彈、榴彈和康格里弗火箭射擊。

在聖丹尼郊区北部，一清早就開始了激戰。在北火車站附近，起義者占領了一幢正在建築中的房屋和幾個街壘。國民自衛軍第一軍團開始進攻，但沒有得逞。他們打完了彈藥，死傷約50人。在炮兵未開來以前（約10點鐘左右），他們險些失去了自己的陣地。炮兵摧毀了房屋和街壘。軍隊重新占領了北火車站。但是，在這個地區（該區名為克洛-聖拉查爾<sup>①</sup>，“科倫日報”誤譯為“聖拉查爾宮”），戰鬥還繼續了很久，並且打得非常猛烈。“這真是一場大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49頁。——編者注

# 1848年6月 巴黎市区图



- |    |        |
|----|--------|
| 1  | 北城     |
| 2  | 吉福纳里街坊 |
| 3  | 包公里尔街  |
| 4  | 圣丹尼门林路 |
| 5  | 圣丹尼门林路 |
| 6  | 圣安德烈街  |
| 7  | 圣安德烈街  |
| 8  | 圣安德烈街  |
| 9  | 圣安德烈街  |
| 10 | 圣安德烈街  |
| 11 | 圣安德烈街  |
| 12 | 圣安德烈街  |
| 13 | 圣安德烈街  |
| 14 | 圣安德烈街  |
| 15 | 圣安德烈街  |
| 16 | 圣安德烈街  |
| 17 | 圣安德烈街  |
| 18 | 圣安德烈街  |
| 19 | 圣安德烈街  |
| 20 | 圣安德烈街  |
| 21 | 圣安德烈街  |
| 22 | 圣安德烈街  |
| 23 | 圣安德烈街  |
| 24 | 圣安德烈街  |



屠杀”，——比利时一家报纸的记者这样写道。在罗什舒阿尔关卡和包松涅尔关卡附近构筑了坚固的街垒。在拉斐德街，街垒又恢复起来了，直到午后才在大炮的轰击下被占领。

在圣马丁、兰布托和格兰-桑提各条街上，街垒也是靠炮兵才攻下的。

圣米歇尔桥对面的库兹涅咖啡馆被炮火摧毁。

但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在花河沿街发生了主要的战斗。在这里，有名的“丽人”服装店被600名起义者占领，变成了堡垒。炮兵和步兵开始进攻。一个墙角被打垮了。在这里亲自指挥射击的卡芬雅克建议起义者投降，否则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起义者拒绝投降。炮击重新开始。最后，使用了燃烧弹和榴弹。房屋被摧毁。80名起义者葬身于瓦砾之中。

在圣雅克郊区，在潘庭区附近，工人也在四周筑起了街垒。象在薩拉哥沙城<sup>89</sup>一样，每一幢房屋都必须用围攻来夺取。独裁者卡芬雅克想用突击攻占这些房屋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于是这个残暴的阿尔及利亚的丘八就威胁说，如果占领这些房屋的起义者不投降，就要把他们烧死。

在錫特街，姑娘们从窗口向兵士和市民自卫团射击。为了在这里取得某些进展，也不得不使用榴弹炮。

想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别动队第十一营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消灭了。至少据传说是这样。

到中午的时候，起义者占绝对优势。巴提诺尔、蒙马特尔、拉-沙佩尔、拉-維勒特等所有的郊区，总之，从巴提诺尔到塞纳河的所有巴黎城郊，以及塞纳河左岸的大部地区，都在起义者手中。他们在这里缴获了13门大炮，但是没有使用。在市中心，在錫特和在

圣馬丁街南端，他們曾冲到市政厅附近，那里有强大的军队防守。尽管如此，巴斯蒂德还是在众议院宣布，市政厅在一小时后很可能被起义者占领。这个消息引起了混乱，于是就决定任命独裁者并宣布戒严。卡芬雅克一接受独裁全权，便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在文明城市中从来没有采用过，甚至连拉德茨基在米兰都不敢采用。人民又太宽宏大量了。如果他們以縱火来回答燃烧弹和榴弹炮，也許到傍晚的时候他們就已經成为胜利者了。但是人民却不願意使用敌人所使用的那种武器。

起义者的弹药大部分是由棉火药制成的，在圣雅克郊区和馬勒市区大量制造着棉火药。在莫別尔广场上建立了一个弹药工場。

政府不断得到援軍。庞图阿茲、卢昂、繆兰、曼特、亚眠、哈佛尔等地的国民自卫軍整夜不停地向巴黎开来。从奥尔良調来了军队，从阿拉斯和杜埃調来了炮兵和工兵。从奥尔良还开来一个团。24日早晨，从文森运来50万发子弹和12門炮，但北面铁路上的铁路工人破坏了巴黎和圣丹尼之間的綫路，使援軍运不进来。

用了联合的兵力和空前残酷的手段，到24日下午才算把起义者击退了。

至于国民自卫軍怎样残酷地进行战斗以及他們怎样清楚地了解事情同他們的生存有关，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不仅卡芬雅克，而且連国民自卫軍本身都打算把整个潘庭区付之一炬！

进攻部队有3个指揮所：圣丹尼門，这里由拉摩里西尔將軍指揮；市政厅，杜維維耶將軍率領14个营駐扎在这里；索尔邦納廣場，达梅姆將軍从这里向圣雅克郊区进攻。

到中午的时候，通向莫別尔广场的要冲全被占领，广场本身也



被包围。下午1点钟，广场被占领，别动队有50个人当场丧命！同时，经过猛烈的、长时间的炮击，潘庭区被攻占了，或者不如说是投降了。在那里防守的1500名起义者投降了，这大概是因为卡芬雅克先生和疯狂的资产阶级威胁要把这个地区全部焚毁的缘故。

这时，“秩序的维护者”沿着林荫路不断向前挺进，占领了邻近街道上的街垒。在坦普尔街上，工人们被驱逐到拉-科尔德利街的拐角处。在布什拉街上，战斗仍在进行，林荫路那面的坦普尔郊区也在作战。在圣马丁街还能听到零落的枪声。在普昂特·圣埃斯他什，还有一个街垒在坚持。

晚上7点钟左右，从亚眠来的两营国民自卫军开到了拉摩里西尔将军那里，他们立即被派去包围沙托·得奥背后的街垒。这时，圣丹尼郊区已经失陷并且沉寂下来，整个塞纳河左岸差不多也都是这样。起义者被包围在马勒市区的一部分地方和圣安东郊区。但是这两个区中间隔着博马舍林荫路和位于其后的圣马丁运河，而圣马丁运河是完全可以被政府军队利用的。

指挥别动队的达梅姆将军在厄斯特拉帕德街垒附近被子弹打伤了大腿，但伤势不重。议员比克西奥和多尔内斯的伤势也不象最初想象的那样严重。

貝多将军也受了轻伤。

到9点钟，圣雅克郊区和圣马索郊区实际上已被攻占。战斗异常激烈。当时在这里指挥作战的是布莱阿将军。

杜维维耶将军在市政厅并未取得多大的进展。但是，这里的起义者也被打退了。

拉摩里西尔将军不愿顽强的抵抗，把包松涅尔、圣丹尼、圣马丁等郊区的关卡占领了。只有克洛-圣拉查尔的工人还在坚持；他

們在路易-菲利浦医院构筑了街垒。

这是国民議会主席在晚上九点半鐘向国民議会报告的消息。但是，他的話有几次是自相矛盾的。他承認，在圣馬丁郊区，双方仍在猛烈地对射。

总之，24日傍晚的情况如下：

起义者大約还控制着他們在23日早晨占領的地区的一半。这一半地区包括巴黎东部，圣安东、坦普尔、圣馬丁等郊区和馬勒市区。克洛-圣拉查尔和植物园附近的几个街垒是起义者的前哨陣地。

巴黎的其余部分全部落在政府手中。

在这场决战中特別引人注意的就是“秩序的維護者”在作战时所表現的那种狂暴性。这些人过去对于“市民”流的每滴“血”是那样痛心，对于2月24日市近卫軍<sup>90</sup>士兵的死甚至伤感万分，而這些資產者現在却象杀戮野兽一样地杀戮工人。在国民自卫軍队伍里，在国民議会里，对起义的工人沒有一句同情的話，沒有一句和睦的話，沒有絲毫的伤感，相反地，只有狂暴的憎恨，冷酷的敌意。資產階級是完全有意識地向工人进行斬尽杀絕的战争的。不管資產階級現在会取得短时期的胜利，还是会被击潰，工人是决心要向他們报仇的。經過六月里的这3天中所发生的战斗以后，必然会采取恐怖手段，不是这一方采取，就是那一方采取。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6月28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8号

## 6 月 25 日

斗争愈来愈紧张，愈来愈残酷，愈来愈猛烈。资产阶级愈是看到用残酷的手段不能立刻达到目的，它在战斗中以及在夜间巡逻和露营时愈是感到疲倦，它最后胜利的时刻愈是接近，它就愈加疯狂地向起义者进攻。

资产阶级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它散布这样一种谬论：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己迫使他们起义的）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强盗，因此应当象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可是，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达 3 天之久的起义者却表现得非常高尚。如果他们也采用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所采用的那种残酷手段，巴黎就会变成废墟，而起义者也许会取得胜利。

从起义的一切详细报道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得多么野蛮。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就不必说了；据证实，在大多数被攻占的街垒上，对战败者毫不留情。资产阶级把落到他们手里的人统统杀掉了。24 日晚上，在天文台街，有 50 多名被俘的起义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比利时独立报”（这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的一个记者这样写道：“这是一场歼灭战。”在所有的街垒上，人们都深信起义者将毫无例外地被就地杀死。当拉罗什雅克兰在国民议会中说，必须设法消除这种想法的时候，资产阶级甚至

不讓他說完就大吵大嚷，使得議長不得不戴起帽子宣布休會。後來，當塞納爾先生（見下面關於議會的會議報道）本人想說幾句關於仁慈和調解的偽善的話時，又大吵大嚷起來。關於寬恕之類的话，資產者連听都不願意听。即使炮击會使他們損失一部分財產，他們也在所不惜，決心要把秩序的敵人，把強盜、暴徒、縱火者和共產主義者一下子消滅干淨。

但是他們根本沒有表現出資產階級報紙所極力吹噓的那種英雄氣概。從今天關於國民議會的會議<sup>91</sup>報道中可以看出：起義一開始，國民自衛軍就吓壞了；儘管各種各樣傾向的報紙在報道時誇大其詞，但從中可以看見，在起義的第一天，國民自衛軍出來應戰的人數很少，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卡芬雅克不得不把國民自衛軍人員從床上拉起來，由一名上等兵和四名普通兵押着去作戰。資產者雖然對起義的工人切齒痛恨，但仍然克制不了他們天生的怯懦。

相反地，工人却無比英勇地作戰。雖然他們的損失愈來愈難以補償，他們被敵人的優勢力量逼得節節敗退，但是他們絲毫也不感到疲倦。25日早晨，他們一定已經看出，勝利的機會肯定已不在他們方面。新的軍隊不斷從各地大量地開來；大批國民自衛軍從郊區和其他較遠的城市向巴黎集結。參加25日戰鬥的常備軍比平時的衛戍部隊員額還要多4萬人。此外，別動隊又出動了2萬到25 000人；此外，還有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國民自衛軍以及幾千共和國近衛軍。25日，進攻起義者的武裝力量的總數不下15萬到20萬人。工人的戰士也許還不到這個數量的 $\frac{1}{4}$ ；此外，工人缺少彈藥，沒有任何軍事領導，沒有一門能用的大炮。但是他們不聲不響地、奮不顧身地同兵力占強大優勢的敵人作戰。士兵接連不斷

地向被重炮打开的街垒上的缺口冲去；但是工人不声不响地迎击他们；工人到处都是战到最后一个人，街垒才落到资产者手中。在蒙马特尔，起义者向居民宣布：不是他们消灭我们，就是我们消灭他们，我们绝不后退；愿上帝保佑我们胜利，否则我们就要把蒙马特尔全部烧掉。这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威胁当然被描写成为“卑鄙的计划”，可是卡芬雅克的榴弹和燃烧弹却被认为是“值得大为赞扬的成功的军事措施”！

25日早晨，起义者占领了下列几个阵地：克洛-圣拉查尔，圣安东和坦普尔郊区，马勒和圣安东市区。

克洛-圣拉查尔（前修道院领地）是一块很大的土地，一部分已经盖好了房屋，一部分正在建筑房屋、计划修筑街道等等。北火车站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央。这个区有许多分散的没有次序的建筑物，此外还堆放着大量建筑材料；起义者在这里筑起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它的中心是建筑中的路易-菲利浦医院。他们还构筑了一批巨大的街垒，据目击者谈，这些街垒是无法攻破的。街垒后面是被起义者所切断和占领的城墙。他们的工事从这里一直延伸到罗什舒阿尔街或者到城关区。蒙马特尔的各个关卡设有坚固的工事，蒙马特尔完全为起义者占领。40门大炮对这些工事轰击了两天，但还是没有把它们摧毁。

25日，40门大炮又对这些工事轰击了一整天；最后，在下午6点钟，罗什舒阿尔街上的两个街垒被攻下，不久，克洛-圣拉查尔也被占领了。

在坦普尔林荫路上，别动队在上午10点钟攻占了几幢房屋，起义者曾经从这里向进攻的敌人射击。“秩序的维护者”差不多已推进到菲伊·杜·卡尔佛尔林荫路。坦普尔郊区的起义者则被迫

步步后退，圣馬丁运河有些地方被攻占；比較寬闊的、笔直的大街从运河和林蔭路方面受到猛烈的炮击。战斗非常激烈。工人很清楚地知道，敌人在向他們陣地的正中央进攻。他們奋勇抵抗。他們甚至又重新夺回了以前失去的一些街垒。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斗争后，他們被兵力和武器占优势的敌人打敗了。街垒被逐一攻占；天黑时，不仅坦普尔郊区被攻占，而且敌人还沿着林蔭路和运河前进，占領了通向圣安东郊区的各个要冲和这个郊区的几道街垒。

在市政厅附近，杜維維耶將軍緩慢地但是頑強地前进。他从沿河的道路过来，由两翼包围了圣安东街的街垒，同时用重炮轟击圣路易島和以前的魯維叶島<sup>92</sup>。这里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但詳情不明。只有消息說，在4点鐘，第九区政府及其邻近的道路被占領，在圣安东街，街垒一一被猛攻夺下，通向圣路易島的要冲达米埃特桥也被占領。天黑时，这个区域的起义者被击退，通向巴士底獄廣場的各个要冲都失陷了。

这样看来，除圣安东郊区以外，城内各区的起义者都被驅逐出来了。圣安东郊区是他們最坚固的陣地。这里是巴黎各次起义的真正策源地。通向这个郊区的許多要冲都构筑有很巧妙的工事。街垒彼此形成三角形，这样可以相互掩护，此外还有从房屋里射出的交叉火力来支援。因此，这些街垒就成了进攻者的巨大障碍。要攻取这些街垒，需要有很大的牺牲。

資产者，或者确切些說，他們的走狗的营地就扎在这些工事的前面。这一天，国民自卫軍几乎沒有行动。有所行动的主要是常备軍和別动队；国民自卫軍占領着平靜无事的和早已被攻占的市区。

共和国近卫軍和別动队的行为簡直坏透了。經過改編和清洗

的共和国近卫軍非常残酷地镇压工人，他們以镇压工人为共和国近卫軍爭得了声名。

主要从巴黎流氓无产阶级中招募来的别动队，由于薪俸优厚，在短期內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軍。被組織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反对未組織起来的劳动无产阶级。果然不出所料，象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供斐迪南驅使一样<sup>①</sup>，巴黎的流氓无产阶级甘願供资产阶级驅使。只有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那部分别动队轉到起义者方面来了。

目前在巴黎发生的这一切給人留下了多么卑鄙齷齪的印象！現在的别动队的成員都是不久以前的乞丐、浪人、无賴、頑童和小偷，这帮人在三四月間被每个資产者看作一群不能容忍的、慣于为非作歹的盜賊，而現在却大受宠爱，备受贊揚，得到大量的賞賜，因为这些具有无比胆量的“青年英雄”，这些“巴黎的姑娘”以非凡的勇敢精神爬上街垒等等；因为这些在二月里糊里糊塗地在街垒上作战的人們，現在又糊里糊塗地向无产者射击，象从前射击士兵一样；因为他們被收买了并且同意以一天30苏的代价去屠杀自己的弟兄！贊美这些卖身的流氓吧，因为他們为了一天30苏的代价竟枪杀最优秀最革命的巴黎工人！

工人在战斗中表現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軍，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將軍們的“宝贵的”軍事經驗！工人被击潰了，并且大部分被残酷地消灭了。这次陣亡的战士不会受到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

---

① 見本卷第22頁。——編者注

---

牺牲者所受到的那种尊敬；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8日

载于1848年6月29日

“新莱茵报”第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40年第14期



## 六月革命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sup>93</sup>派的或“改革报”（«Réforme»）<sup>94</sup>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sup>95</sup>——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

雅克的密集的炮火。

这就是 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剝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階級之間的博愛，这就是在二月間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牆上、写在每所監獄上面、写在每所營房上面的博愛 (fraternité)。用真实的、不加粉飾的、平鋪直叙的話來說，这种博愛就是內戰，就是最可怕的國內戰爭——劳动与資本間的戰爭。在6月25日晚間，当資產階級的巴黎張灯結彩，而无產階級的巴黎在燃燒、呻吟、流血的時候，这个博愛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戶前面燒毀了。

博愛只有在資產階級利益还和无產階級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侯才繼續存在。學究們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傳統；社会主义的空談家曾为人民向資產階級乞求施舍，并且被許可做冗長的說教和敗坏自己的聲譽，直到把无產階級的獅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黨人要求全部旧的資產階級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領；王朝反对派<sup>96</sup>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內閣的更換，而是王朝的崩潰；正統主义者<sup>97</sup>不是想脫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實現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種加了冕的階級統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資本。但是人民始終是寬宏大量的，他們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間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靜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虛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詞句上和言語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則是一个丑惡的討厭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經代替了詞句，因

#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 Organ der Demokratie.

Nr. 29.

Meln, Donnerstag 29. Juni

1848.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erscheint vom 1. Juni an täglich. Bezahlungen für das nächste Quartal, Juli bis September, wolle man baldigst machen.

Alle Postämter sind durch den Postenbesorger in Köln mit dem Namen der Zeitung versehen. Der Preis ist 10 Sgr. pro Quartal. Die Expedition befindet sich in Köln, Neugasse 10. Die Druckerei ist in Köln, Neugasse 10. Die Expedition befindet sich in Köln, Neugasse 10.

Die Expedition befindet sich in Köln, Neugasse 10. Die Druckerei ist in Köln, Neugasse 10. Die Expedition befindet sich in Köln, Neugasse 10.

In Nr. 29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st am 29. Juni d. J. ein Vermerk über die Verhaftung von ...

### Frankösischer Republik.

Die französische Republik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Sie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Sie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Die französische Republik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Sie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Sie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Die französische Republik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Sie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Sie ist ein Staat, der sich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789 gebildet hat.

### Beuypalen.

Die Beuypalen sind ein Ort in der Provinz ...

Die Beuypalen sind ein Ort in der Provinz ...

Die Beuypalen sind ein Ort in der Provinz ...



为这时共和国已經摘掉了保护和掩飾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軍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議会和共和主义資产階級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階級的躯体时这样轟鳴。

在1789年以来的許多次法国資产階級革命中，沒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階級統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資产階級秩序**，尽管这种統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該万死！

在临时政府时期，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寬宏大量的工人相信，使成千上万的官方传单上所說的那些“甘願貧困3个月来讓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議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說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議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來說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烏有，把他們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連这一点都沒有做到，因为，象国王一样，任何議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国民議会极力想結束令人煩惱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詞句，可是它連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沒有实现。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參軍，就是把他們抛到街

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驅逐到索隆，并且連他們在結算时应得的工錢也不发給他們；它临时建議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軍事方式組織起来的工場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須具备一个条件：拒絕参加任何人民會議，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無論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滿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語，無論是5月15日<sup>98</sup>以后的残忍的法律，都沒有达到目的。必須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問題。坏蛋，你进行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誰，为自己还是为我們？資產階級既然这样提出問題，就必須用六月革命——霰弹和街垒来回答。

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6月25日所說，整个国民議會都惊慌失措了。当問題和回答把巴黎的馬路淹沒在血泊中时，議員們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們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一部分人是由于他們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单独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俄国的金錢，英国的金錢，波拿巴的鷹，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他們就在这些东西中間寻找他們无法理解的这一事件的解释。但是，議會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們和人民之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沒有人敢替人民講話。

他們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錯誤，不断重复博爱 (fraternité) 詞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問題正是要抛掉这种詞句以及由这个詞句的模稜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統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战敗者罪該万死！”(«Vae victis!») 的人的卑鄙行为而发怒时，議會中的大多数人便疯狂起来，好象被毒蜘蛛咬了一样。他們为了掩飾“战敗者”正是他們自己，便向工人高叫：“你們罪該万死！”不是他們現在就得死亡，就是共和国現在就得毀灭。因此他們拚命地嗥叫：“共和

国万岁！”

橫在我們面前的深淵是否能把我們民主主義者引入迷途，使我們認為爭取國家形式的鬥爭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無意義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問題。資產階級社會條件本身所產生的衝突，必須在鬥爭中加以解決，靠空想是消滅不了的。不掩蓋社會矛盾，不用強制的因而是人為的辦法從表面上制止社會矛盾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能使這些矛盾進行公開鬥爭，從而獲得解決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

有人問，難道我們對那些在人民的憤怒面前犧牲的人，對國民自衛軍，對別動隊，對共和國近衛軍，對現役軍人不流一滴眼淚，不嘆一口氣，不發一言嗎？

國家將關懷他們的孤兒寡婦，法令將頌揚他們，隆重的殯儀將送他們的遺體入土，官方的報刊將宣布他們永垂不朽，歐洲的反動派將從東方到西方到處贊揚他們。

但是平民則受盡飢餓的折磨，遭到報刊的誣蔑，得不到醫生的幫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縱火者和流刑犯；他們的妻子兒女更是貧困不堪，他們的那些幸免于難的優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給這些臉色嚴峻陰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種特權，是民主報刊的權利。

卡·馬克思寫於1848年6月28日

載於1848年6月29日

“新萊茵報”第29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 “科倫日報”論六月革命

科倫 6 月 30 日。我們介紹大家閱讀一下从“倫敦電訊”上摘录下来的几段文字，并請把它們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同勃律盖曼-杜蒙和沃尔弗斯先生关于巴黎六月革命的胡說八道对照一下，那时就会明白：英国的資产者起碼有一点和德国的小市民不同（其他許多优点姑且不談），即他們在評判伟大事件的时候，尽管从資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却毕竟还象个成年人，而不象街头的頑童。

第 122 号“電訊”这样說：

“……人們現在期待着我們談一下这个可怕的流血事件的原因和結果。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是两个阶级間的真正战斗。（这种真知灼見真是千金难买——可敬的“科倫日報”和他的“沃尔弗斯”感叹地說。）<sup>①</sup>这是工人反对他們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和反对現在支持这个政府的阶级的起义。闡明这场斗争的导火綫要比指出引起这场斗争的經常的、直到目前还存在的原因来得困难。二月革命主要是工人阶级进行的，而且曾大声宣布：这个革命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这与其說是政治革命，不如說是社会革命。具有士兵的一切性格的大批憤憤不滿的工人并不是一下子出現的。他們的貧困和不滿也不純粹是由最近 4 个月的事件产生的。在星期一，我們會引証了勒魯先生在国民議會中的声明。他說：法国有 800 万貧民和 400 万沒有固定工作的工人。这个声明也許是夸大的，但是并沒有人起来反駁。同时，他指的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是革命前的情形，他抱怨革命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这种可怕的现象。在法国形成的、如今对社会輿論起着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論，是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絕大多数人民所过的那种极端貧困的生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貧困是一个不容忽視的根本問題；这也正是革命的真正重要的原因。国民議會很快就决定剝夺革命政治活动家曾經匆忙草率地答应給工人的那些特权。带有社会性質甚至政治性質的强有力的反动势力公然抬头了。它要求曾經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支持的政权排除那些曾經賦予这个政权以生命的人們。最初奉承工人，哄騙工人，然后离間工人，用餓死来威胁工人，把他們遣散到外省去，使他們失去平常那种劳动上的联系，最后定出計劃来消灭他們的力量。既然这样，工人的憤怒难道值得惊奇嗎？当然，工人对于进行第二次更加有成效的革命的自信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根据工人至今还在反抗政府武装力量的持久性来看，他們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要比許多人所預料的大得多。从上述情况，以及从人民中間沒有政治領袖、从巴黎遣散的工人剛走到城关又立刻返回等情况来判断，可以得出結論：起义是工人階級普遍不滿的結果，而不是由政治煽动者挑起的。工人認為：他們自己的政府又背叛了他們的利益。現在，也象在二月里一样，他們拿起武器来同极端貧困現象进行斗争，因為他們长期以来都是这种极端貧困的牺牲品。

目前的斗争只是二月革命的繼續。它是爭取較合理地分配每年劳动产品的席卷全欧洲的斗争的繼續。在巴黎，这个斗争現在大概会被鎮压下去，因为新政权从旧政权那里繼承下来的力量显然占着优势。但是，不管这个斗争会被怎样順利地鎮压下去，它还会接連不断地爆发，直到政府实行較合理地分配每年的劳动产品，或者由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放弃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尝试，讓自由的市場竞争去解决问题时为止……实际上，这个斗争是为爭取充分的生活資料而进行的。領導革命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剝夺了中等階級的生活資料。中等階級变得比工人更野蛮。双方的强烈欲望燃燒起来，促使他們采取招致毁灭的行动。任何博愛都被抛弃了，双方宣布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无知的甚至是心怀叵測的政府，显然根本不了解自己在当前严重危机中的責任，它最初唆使工人去反对中等階級，現在又帮助中等階級去消灭失望的、受騙的和变得冷酷无情的工人。对于所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的責难不应当涉及革命的原則本身，即不应当涉及反对貧困和压迫的坚定意向。应

当責难的倒是那些由于自己在政治上愚昧无知而使路易-菲力浦遺留下来的貧困状况更加恶化的人們。”

倫敦的一家資產階級報紙就是这样描述六月革命的。这家報紙是維護科布頓、布萊特等人的原則的。除了被“曼徹斯特卫报”<sup>99</sup>称为英国新聞界的两大专制者的“泰晤士报”<sup>100</sup>和“北极星报”以外，它是英国銷路最广的報紙。

現在請你們把上面所引的几段話和第 181 号“科倫日报”上的說法对照一下。这家絕妙的報紙把两个階級的斗争歪曲成“正直的人”和盜賊的斗争！值得尊敬的報紙！好象这两个称号不是这两个階級彼此贈送的。正是这家報紙，在最初听到关于六月起义的傳說时承認自己对于起义的性質一无所知；以后巴黎的消息迫使它承認那里正在进行严重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不会因为遭到一次失敗而告終；最后，这家報紙看到工人遭到了一次失敗就欢欣鼓舞，認為这次起义不外是“絕大多数人”反对“一群野蛮的食人生番、强盜和杀人犯”的斗争。

羅馬的奴隶战争是什么呢？难道是“正直的人”和食人生番的战争！讓沃尔弗斯先生去写羅馬史，而杜蒙-勃律盖曼先生去向工人，向这些“不幸的人”解释他們的真正的权利和义务，“使他們了解維護秩序和培养真正公民的科学”吧！

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的神秘科学万岁！下面是这門神秘科学的一个例子：可敬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們一連两天在報紙上向輕信的讀者說，卡芬雅克似乎打算在圣安东郊区埋設地雷。不幸的是圣安东郊区比光荣的科倫城还稍微大一些。但是，博学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我們建議德国国民議會請他們来制裁德国）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能克服这种困难，他們知道，只要用一个地

雷就可以炸毀科倫城！他們對於要用来炸毀圣安东郊区的地雷的看法，同他們對於那种摧毀現代社会的地下力量的看法一样，是极为愚蠢的；在六月的日子里，这种力量使得巴黎发抖，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从巴黎的革命的火山口噴射出了血的熔岩。

但是，敬爱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們！伟大的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以登广告出名的伟人！登广告的卡芬雅克們！我們對於一度震撼世界的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危机，对于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階級斗争仅仅表示憑吊。我們並沒有捏造这个事实，我們只是指出了这个事实。我們曾經指出：象卡芬雅克自己所說的，这两个階級中的一个被战胜了。我們曾經在战敗者的墓前感叹地說：“胜利者罪該万死！”連卡芬雅克本人也在历史責任面前发抖！而国民議會却責备它的成員胆小怕事，不敢公开承担这个可怕的历史責任。难道我們向德国人打开羅馬神言集是为了讓他們把它焚毀嗎<sup>①</sup>？难道我們描写宪章派同英国資產階級的斗争是为了要求德国人也变成英国人嗎？

可是，德国，忘恩負义的德国，尽管你也知道“科倫日報”和它的广告，但是你却不了解你的最伟大的伟人們，不了解你的沃尔弗斯，你的勃律盖曼，你的杜蒙！在階級斗争中，在自由民和奴隶、貴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資本家和工人的斗争中絞了多少脑汁，流了多少血汗！而这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科倫日報”。但是，最勇

---

① “羅馬神言集”是希腊庫麦城的巫女所写的預言格言集；在羅馬把它作为官方的占卜資料。国家遇有危險时，元老院命令根据“羅馬神言集”进行占卜，預測吉凶。公元前83年“羅馬神言集”在大火时被焚，但后来部分被恢复。公元40年，“羅馬神言集”被羅馬統帥和国务活动家斯蒂利洪焚毀，据說是因为占卜不灵。——譯者注

敢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們，如果現代社会这样大量地、积极地产生着“恶棍”、“食人生番”、“杀人犯”和“强盜”，以致他們的起义能够搖撼官方社会的基础，那末这算什么社会呢！这是怎样一种腐朽的有組織的无政府状态呵！你們自以为是在結束糾紛；你們把这出可怕的悲劇的演出者和观众貶低为科采布的那个奴顏卑膝的悲劇中的角色，而你們却自以为是在抬高他們的身价。

巴黎的“总汇通报”，即政府的机关报，路易十六、罗伯斯比尔、路易-菲力浦和馬拉斯特-卡芬雅克的报纸报道說，在圣安东、圣雅克、圣馬索等郊区的国民自卫軍中总共只有 50 个人响应资产阶级号兵的召喚！对于要把人“培养”成真正的公民的科学來說，这是最輕而易举的事情！在巴黎的这 3 个最大的郊区，在这 3 个工业最发达的郊区（在它們的产品面前，达卡的凡尔紗和斯比塔尔費尔斯的天鵝絨也大为逊色），据說居住着“食人生番”、“强盜”、“暴徒”和“恶棍”。沃尔弗斯就是这样断言的！

沃尔弗斯当然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能够使盜賊进行規模这样巨大的战斗，制造出質量这样优美的产品，建立这样伟大的英雄功績，从而使得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浦、拿破仑的事迹都相形見拙，使得达卡和斯比塔尔費尔斯的織工的产品也大为逊色，那末他会为盜賊增光不少。

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过倫敦的“电訊”。讀者們可能在昨天已經知道了艾米尔·日拉丹的意見。他說：工人阶级在把自己的債戶——二月革命的还債日期延长了一个月以后，便以債主的身分去叩債戶的門，用火枪、街垒和自己的肉体去叩門！艾米尔·日拉丹？他究竟是什么人？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絕對不是！然而他是翌日的共和主义者，明天的共和主义者（républicain du lende-

main), 而“科倫日報”, 沃尔弗斯、杜蒙和勃律盖曼之流都是前天的共和主义者, 共和国以前的共和主义者, 昨天的共和主义者 (républicains de la veille)! 艾米尔·日拉丹, 难道他能够和杜蒙一起当见证人嗎?

对“科倫女人”<sup>①</sup> 來說, 流放和絞刑还不够, 它还要对流放和絞刑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它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多么值得欽佩! 本来它只需要向輕信而盲目的德国社会証明: 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强大, 有卡芬雅克和馬拉斯特参加的共和制的国民議會能够干出有梯也尔和毕若参加的立宪制的众議院所不能干出的事情! Vive la république! 共和制度万岁! ——这位斯巴达女人即“科倫女人”向血流成河、备受折磨和火焰四起的巴黎高呼。原来她是一个隱蔽的共和主义者! 由于这个緣故, 一个叫做盖尔温努斯的人, 一家“奥格斯堡报”<sup>101</sup> 才怀疑她胆小怕事, 怀疑她优柔寡断! 多么美好无瑕! 科倫的夏綠蒂·科尔黛!

請注意: 任何一家巴黎報紙, 不管是“总汇通报”、“辯論日報”<sup>102</sup>, 还是“国民报”, 都沒有講“食人生番”、“强盜”、“暴徒”和“杀人犯”。反复地講过这样的話的只有一家報紙, 即梯也尔的“立宪主义者报”<sup>103</sup>。雅科布·費奈迭曾經在“科倫日報”上大肆抨击梯也尔的不道德行为, “科倫女人”也曾經大声地反对过他:

“他們休想获得  
德意志自由的萊茵,”<sup>104</sup>

如今比利时的“独立报”以及由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体现出来的萊茵的科学却从“立宪主义者报”中为自己吸取聪明才智!

① 德文中“科倫女人”这个字有輕佻的女人的意思, 这里指“科倫日報”。——譯者注

現在你們可以稍微用批判的態度來對待“科倫日報”用來辱罵戰敗者的那些可耻謠言了。就是這一家報紙在鬥爭一開始就聲明自己根本不了解鬥爭的性質，在鬥爭過程中才承認這是“嚴重的社會革命”，而在鬥爭結束之後又說這是憲兵和盜賊打架。

他們進行了搶劫！搶劫了什麼呢？搶劫了武器、彈藥、綑帶以及生活必需品。盜賊在窗板上寫着：“Mort aux voleurs！”**消滅盜賊！**

他們“象食人生番一樣殺人放火”！食人生番，他們不甘願讓那些跟在常備軍後面向街壘進攻的國民自衛軍去打碎他們傷員的頭顱，去槍斃戰敗者，去殺害婦女。食人生番，他們只是在這種**歼滅性的戰爭中**（法國的一家資產階級報紙這樣稱呼這次戰爭）**歼滅**敵人。他們放火了嗎？然而，他們為了回答卡芬雅克的合法的燃燒彈而在第八區投出的**一個唯一的火炬**，象“總匯通報”所證明的，只不過是一種有詩意的、假想的火炬罷了。

沃尔弗斯說：“一些人贊美巴爾貝斯、布朗基和索布里埃的綱領，另一些人則為拿破侖或亨利五世的健康而干杯。”

純潔的“科倫女人”既不袒護拿破侖分子，也不袒護布朗基分子，它在起義的第二天就宣布：“這是為**紅色共和國**而進行的鬥爭”。可是她為什麼要瞎扯僭望者呢？我們不是已經說過，她是一個習慣成性的**隱蔽的共和主義者**，是穿着裙子的羅伯斯比爾，她好像覺得到處都是僭望者，這使得她為自己的真操耽心！

“他們幾乎所有的人身邊都有錢，有些人甚至有很多錢。”

工人有三四萬人，而且“他們幾乎所有的人身邊都有錢”，——據說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這樣貧困，各種事業都這樣蕭條的原因！

錢所以这样少，一定是工人把它們隱藏起来了！

巴黎的“总汇通报”竭力渲染在起义者那里发现錢的事件。这种事件总共不超过 20 起。各种报刊和記者都引用了这些事件，但是所說的数目各不相同。以攻击手段圓滑見称的“科倫日報”，把对于这 20 起事件的不同說法說成是对于不同事件的报道，而且还加上种种流言蜚語，但不管怎样也超不过 200 起。不过这样它就有权利說：几乎三四万工人身边都有錢！到現在才弄清楚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身上带着錢的正統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也許还有菲力浦主义的奸細曾經鑽到或者企图鑽到街垒战士中間去。非常保守的国民議會議員帕耶先生在起义者那里做了 12 小时的俘虏，他声明說：

“他們大多数都是被 4 个月的貧困生活弄得絕望的工人，他們說：宁肯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也不願餓死！”

可是沃尔弗斯却硬說：“在被打死的人中間，很多人身上都有社会用来定罪的標記。”

这是卑鄙的謊言，无耻的誹謗，这是被反对起义者而拥护“国民报”的拉梅耐在他的“人民制宪报”<sup>105</sup>上痛斥过，也被一向具有騎士精神的正統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在国民議会里痛斥过的一种卑鄙行为。所有这些謊言都是以一家通訊社发出的一条极不可靠的、未經“总汇通报”証实的消息为根据的。这条消息說，似乎发现了 11 具带有 T. F.<sup>①</sup> 烙印的尸体。究竟在哪一次革命中不会找到 11 具这样的尸体呢？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不会給比这多 100 倍的人打上这种烙印呢？

① T. F. 是 Travaux forcés (苦役) 的簡写。——編者注

我們看到：胜利者的报纸、宣言和彩灯都在证明他们怎样使人挨饿，怎样把人弄到绝望的境地，怎样杀戮、枪毙、活埋、流放，怎样侮辱死者。但是人们却只是引用谎言来反对战败者，这些谎言由“立宪主义者报”一手捏造，由“独立报”加以转载，而“科伦日报”则把它译成德文。黑格尔说：用谎言来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

在巴黎，妇女们坐在家门口为起义者的伤员撕扯裹伤用的棉线团，而“科伦日报”的编辑们却往伤口里加硫酸。

他们向资产阶级警察告发我们。而我们却相反，利用不朽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效劳的机会，奉劝工人，奉劝这些“不幸的人”“认清自己真正的权利和义务，了解维护秩序和培养真正公民的科学”。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3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1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31号



## 六月革命

(巴黎起义的經過<sup>106</sup>)

### 一

六月革命事件的全貌漸漸地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來了。得到的消息比較全面了，這就有可能分清事實與謠傳和謊言。起義的性質愈來愈明顯了。愈能抓住六月中這4天所發生的事件的內在聯系，就愈感到起義規模的巨大以及起義者的英雄氣概、組織迅速和同心同德是令人驚異的。

工人軍事行動的計劃據說是由拉斯拜爾的朋友、前軍官蓋爾索濟制訂的，其內容如下。

起義者應當以4個縱隊向市政廳分進合擊。

第一縱隊以蒙馬特爾、拉-沙佩爾、拉-維勒特等郊區為作戰根據地，由包松涅爾、羅什舒阿爾、聖丹尼、拉-維勒特等關卡向南挺進，占領林蔭路，通過蒙托爾海伊街、聖丹尼街和聖馬丁街接近市政廳。

第二縱隊以幾乎全是工人居住的、由聖馬丁運河掩護的坦普爾郊區和聖安東郊區為根據地，沿坦普爾街和聖安東街、沿塞納河北岸各沿河街道以及沿這兩個市區間一切平行的街道向市政廳前進。

第三縱队以圣馬索郊区为根据地，沿圣維克多街以及沿塞納河南岸各沿河街道直抵錫特島。

第四縱队以圣雅克郊区和医科学校区为根据地，沿圣雅克街前进，也到达錫特島。两个縱队会合后，沿塞納河右岸前进，从后方和側翼包围市政厅。

可見，計劃規定以純粹是工人居住的那部分市区为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市区呈半圓形，包括巴黎的整个东半部，并向东扩展。預計首先把巴黎东部的敌人彻底肃清，然后沿塞納河两岸向西部及其中心——推勒里宮和国民議會前进。

这些縱队由許多游击队支援，这些游击队在縱队的翼側和縱队之間独立行动，构筑街垒，占領小街并保持縱队間的联系。

作战根据地都設有坚固的工事，并按照一切兵法規則建成为强大的堡垒，以备撤退时使用。在克洛-圣拉查尔，在圣安东郊区和市区以及在圣雅克郊区，都构筑有这样的工事。

如果說这个計劃有缺点，那就是在作战的初期完全沒有注意到巴黎的西部。这里，沿圣奧諾勒街的两側，在中央商場和国民宮附近，有一些对起义行动非常有利的市区，那里的街道非常狹窄弯曲，住的主要是工人。在那里安置起义的第五个据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里一方面可以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另一方面可以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箝制大量的部队。起义的成功在于是否能尽快地突入巴黎的中心区，保証夺取市政厅。我們不知道盖尔索济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区域組織起义的行动。但是很清楚，如果起义者一开始不能把同推勒里宮毗連的这个巴黎的中心区拿下，任何一次起义都是不会成功的。只要回想一下拉馬克將軍出殯时的起义<sup>107</sup>就够了，当时起义者也曾成功地一直挺进到蒙托尔海伊街，

但后来被击退了。

起义者开始按照自己的計劃行动。他們立即在自己的占区，即工人的巴黎和資產階級的巴黎之間构筑了两道主要的工事：圣丹尼門街壘和錫特街壘。他們被驅逐出第一道工事，但是却成功地守住了第二道工事。第一天，6月23日仅仅是序幕。起义者的計劃，在今天早晨发生了最初的前哨战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新萊茵报”一开始就完全正确地了解到这一点，見“新萊茵报”第26号的号外<sup>①</sup>）。橫断第一縱队作战綫的圣馬丁林蔭路成了激战的場所，在那里，部分地由于地形条件的关系，“秩序的”維護者取得了胜利。

通向錫特島的各个要冲在右面被占領普朗什-米布雷街的游击队防守着，在左面被占領并加强錫特島南面3座桥梁的第三和第四縱队防守着。在那里也展开了激战。“秩序的”維護者终于占領了圣米歇尔桥，一直挺进到圣雅克街。他們聊以自慰地希望起义在傍晚就会被鎮压下去。

如果說起义者的計劃已經很清楚了，那末“秩序的”維護者的計劃就更可以这样說了。他們的計劃最初无非是用一切手段鎮压起义。他們用炮弹和霰弹向起义者宣告了这个意图。

但是政府以为它是在对付一群普通的、行动根本沒有計劃的叛乱者的烏合之众。他們在傍晚肃清了主要的街道以后，就宣称叛乱已被平定，于是他們只用极少数的部队占領已經拿下的市区。

起义者成功地利用了这个疏忽，經過6月23日的前哨战后，就开始了决战。令人吃惊的是：工人竟那样迅速地掌握了軍事行

<sup>①</sup> 見本卷第131—134頁。——編者注

动的计划,那样有计划地互相支援,那样巧妙地利用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这是因为工人在国家工厂的时候就被很好地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编成连队,因此只要把他们的企业组织运用到军事行动中,就能立即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要不是这样,上述情况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6月24日早晨,不仅完全收复了失去的地区,而且还占领了新的地区。虽然到坦普尔林荫路为止的林荫路这一线仍然被政府军队所占领,从而切断了第一纵队往市中心去的交通,但是第二纵队却由圣安东市区远远地向前挺进,几乎包围了市政厅。第二纵队把它的总部设在距市政厅300步远的圣约尔维教堂里,并攻占了圣马利教堂及其邻近的街道;它一直前进到市政厅后面很远的地方,同占领锡特岛的各个纵队一起几乎把市政厅的交通完全切断了。只有一条要冲还可以通行,那就是塞纳河右岸的沿河街。在南面,重新占领了整个圣雅克郊区,恢复了和锡特岛的联系,派去了援军,并安排好了往右岸去的渡口。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巴黎的革命中心市政厅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就一定会陷落。

## 二

惊慌失措的国民议会任命卡芬雅克为独裁者。卡芬雅克自从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以来就惯于实行“坚决的”镇压，他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

立即有 10 个营沿着宽广的科·德·赖科尔街向市政厅前进。他们截断了坚守锡特岛的起义者同右岸的联系，保证了市政厅的安全，甚至使得有可能进攻市政厅四周的街垒。

普朗什-米布雷街以及和它相连的圣马丁街被政府军队占领，由骑兵扼守着。对面通往锡特岛的诺特丹桥被重炮弹所摧毁，于是卡芬雅克直接向锡特岛前进，以便在那里实行“坚决的”镇压。起义者的主要据点，“丽人”服装店起先被炮弹破坏，后来又为燃烧弹所焚毁；在炮击之下，锡特街也被攻占；通往左岸的 3 座桥梁被攻下，左岸的起义者被猛攻击退。同时，位于格列夫广场和各沿河街道上的 14 个营也解除了市政厅的包围，圣约尔维教堂也由起义者的指挥所变成了孤立的前哨阵地。

圣雅克街不仅遭到锡特岛方面的炮击，而且也遭到左岸的侧击。达梅姆将军沿卢森堡花园向索尔邦纳突进，攻占了拉丁区，接着派自己的纵队去攻取潘庭。潘庭广场变成了森严的堡垒。虽然圣雅克街早已被占领，但是那里的“秩序的”维护者在难以攻克的堡垒面前仍然束手无策。炮兵射击和白刃冲锋都毫无效果。直到最后，四面受敌的 1 500 个工人由于精疲力尽，粮尽弹绝，并受到

资产阶级要焚毁全区的威胁，才被迫投降。同时，经过长时间的、英勇的防御以后，莫别尔广场落到了“秩序的”维护者的手中，从自己最坚固的阵地上被击退的起义者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整个塞纳河左岸。

同时，在塞纳河右岸各林荫路上，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阵地也被利用起来，以便朝两个方向行动。拉摩里西尔指挥着这些部队，下令用重炮和猛烈的冲锋肃清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郊区的各街道、坦普尔林荫路和半条坦普尔街。傍晚，拉摩里西尔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切断了第一纵队，并在克洛-圣拉查尔对第一纵队进行了半包围；他迫使第二纵队后退，自己则沿着各林荫路前进，楔入第二纵队。

卡芬雅克是怎样获得这些胜利的呢？

第一，由于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兵力，可以调动来对付起义者。24日，他不仅有2万巴黎卫戍部队、2万到25000别动队和6万到8万国民自卫军，而且有巴黎四郊和几个较远城市的国民自卫军（两三万人），此外还有从邻近的驻防军中紧急召来的两三万人。24日早晨，他手里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到晚上，人数又增加了一半。而起义者至多只有四五万人！

第二，由于他采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在这以前，在巴黎街道上用大炮轰击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即1795年葡月，拿破仑用霰弹驱散了圣奥诺勒街上的起义者<sup>108</sup>。但是，对街垒和房屋从来没有使用过炮兵，更没有使用过榴弹和燃烧弹。人民没有防备这一手；他们对于这种武器束手无策，而采取唯一的对付方法——纵火，他们又于心不忍。到现在为止，人民对于在巴黎街道上使用这种阿尔及利亚式的作战方法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后退却，而一

退却就预示了他们的失败。

25日，卡芬雅克用更大的兵力展开进攻。起义者手中只剩下一个区域——圣安东郊区和坦普尔郊区；此外，他们还留有两个前哨阵地——克洛-圣拉查尔和到达米埃特桥为止的那部分圣安东市区。

卡芬雅克又得到了拥有强大炮兵纵列的两三万援军，他命令首先向起义者的孤立前哨，特别是克洛-圣拉查尔进攻。起义者固守在这里，就象固守着要塞一样。经过12小时的炮兵轰击和手榴弹投掷，拉摩里西尔终于把起义者赶出阵地并占领了克洛-圣拉查尔；但这只是在他能够从罗什舒阿尔和包松涅尔街进行侧击以后，只是在第一天用40门大炮，第二天用更多的大炮击毁了街垒以后，才作到的。

他的纵队的另一部分通过圣马丁郊区向坦普尔郊区进攻，但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第三部分沿林荫路往下朝巴士底狱广场挺进，但是也没有前进多远，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坚固的街垒，这些街垒只是在猛烈的炮击下作了长时间的抵抗以后才投降的。在那里，房屋遭到极严重的破坏。

由市政厅进攻的杜维维耶纵队以不断的炮火把起义者愈赶愈远。圣约尔维教堂被攻占，圣安东街靠市政厅那一大段也被占领了；沿着沿河街和与它平行的街道进攻的几个纵队夺取了达米埃特桥，圣安东市区的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同圣路易岛和锡特岛的起义者进行联系的。圣安东市区受到侧翼包抄，于是起义者只能向郊区退却，他们也这样做了，他们一面退却，一面同沿着沿河街挺进到圣马丁运河河口并从这里沿运河向布尔顿林荫路进攻的纵队进行激战。少数被切断后路的起义者被打死，极少数人被俘。

这一次战斗的结果，圣安东市区和巴士底獄广场被占领了。傍晚，拉摩里西尔纵队完全占领了博馬舍林蔭路，在巴士底獄广场同杜維維耶的军队会合。

占领达米埃特桥使杜維維耶能够把起义者从圣路易島和前魯維叶島赶走。他大刀闊斧地使用了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的野蛮手段，才达到了这个目的。重炮的轟击使一些市区也象现在的圣路易島一样，变成了一片焦土。但是誰管这个呢？起义者已經击退了或击毙了，“秩序的”维护者在洒滿鮮血的废墟上庆賀胜利。

在塞納河左岸，还有一个据点沒有被攻下。在圣馬丁运河以东联结圣安东郊区和塞納河左岸的奥斯特利茨桥上筑有坚固的街垒，而左岸桥梁与瓦留貝尔广场相連接的地方，在植物园前面，筑有强大的桥头堡。这个桥头堡，也就是潘庭和莫別尔广场陷落后起义者在左岸的最后一座堡垒，經過激烈的抵抗后被攻占。

这样一来，在第二天，即 26 日，起义者手中只留下他們最后的堡垒——圣安东郊区以及坦普尔郊区的一部分地方了。这两个郊区不太适合于进行巷战；那里的街道太寬而且几乎是笔直的，炮兵行动起来很方便。在西面，有圣馬丁运河很好地掩护他們，而在北面則相反，他們是毫无掩护的。在北面有五六条寬广而笔直的街道直通圣安东郊区的中心。

主要工事构筑在巴士底獄广场和全区的主要街道——福布尔-圣安东街上。那里的街垒筑得非常坚固，有些是用馬路上的大石板筑成的，有些是用圓木筑成的。它們形成凹角，一方面是为了减弱炮弹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延长防御正面，以便能进行交叉射击。房屋的防火壁被凿穿了，这样，許多房屋就可以互相沟通，起义者就能够根据需要，或者向敌军开火，或者隐蔽在街垒后面。



各个桥梁和沿运河的街道，以及和运河平行的街道，也都筑有坚固的工事。简单地說，还被起义者占领着的两个郊区很象是真正的要塞，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政府军队都必须用战斗来夺取。

26日早晨，战斗重新开始。但是，卡芬雅克不大愿意把他的军队投入这个街垒网中。他用炮击进行威胁。他调来了臼炮和榴弹炮。谈判开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卡芬雅克下令在附近的房屋下面挖掘坑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促，由于街垒的一面有运河掩护，这个工作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他又命令凿穿已夺取的房屋的防火壁，与毗连的房屋建立内部交通。

谈判中断；战斗又起。卡芬雅克命令佩罗将军由坦普尔郊区进攻，拉摩里西尔将军由巴士底狱广场进攻。从这两个地点对街垒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佩罗前进得相当迅速，占领了坦普尔郊区的其余部分，而在某些地点甚至楔入了圣安东郊区。拉摩里西尔前进得比较缓慢。尽管郊区的前排房屋被他的榴弹焚毁了，但第一道街垒在他的炮火下仍然屹立不动。他再一次举行谈判。手里拿着表，等待着他以炮火夷平巴黎最稠密的住宅区的得意时刻。最后，一部分起义者投降了，而另一部分起义者由于受到侧击，经过短促的战斗后也退出了城市。

六月的街垒战就此结束了。虽然在城外还有步枪声，但已没有任何意义了。逃出的起义者向四郊溃散，一一被骑兵俘获。

我们所以要对这一斗争作纯军事的叙述，是为了告诉我们的读者：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4万工人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鏖战了4天，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胜利。如果稍微再加一把劲，他们也许就可以在巴黎中心区巩固起来，夺取市政厅，成立临时政府，靠占领的市区的居民和

別动队（当时只要推动一下，就会使他們轉到工人方面来）来补充人員，使自己的人数增加一倍。

德国各家报纸断言，这是紅色共和国和三色共和国之間的一場决战，是工人和資产者之間的一場决战。我們認為，這場战斗根本沒有解決問題，它只能导致胜利者的內部分裂。其次，即使从純軍事的观点来看，整个事变的过程也証明：在不久的将来，工人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說4万巴黎工人在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結果，那末全巴黎的工人群众齐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将会有多大的成就呵！

盖尔索济被俘，也許現在已被枪毙。資产者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取这样的荣誉：**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組織者**。他們能够枪毙他，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在将来的一切巷战中采用他的战斗方法。他們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阻碍他以**第一个街垒战指揮者**而名垂史册。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  
30日到7月1日

載于1848年7月1日和2日  
“新萊茵报”第31号和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德国的对外政策

科倫 7 月 2 日。自古以来，一切統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結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別明显。用不着追溯得太远，就以近 70 年来看，德国曾經为了英国的黄金而派它的雇佣兵去帮助英国人镇压爭取独立的北美洲人。第一次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又受別人唆使，象一群疯狗似的去咬法国人；他們在不倫瑞克公爵凶恶的声明中威胁說要把巴黎彻底毁灭<sup>109</sup>；他們和逃亡国外的貴族串通起来反对法国的新秩序，为此获得了英国的奖賞。当荷兰人在近两个世紀中好不容易第一次有了理智的想法（結束奧倫治王朝的昏庸統治，把国家变为共和国<sup>110</sup>）的时候，德国人又充当了戕害自由的劊子手。瑞士也可以說出不少关于它的邻居德国人的罪状，匈牙利要想很快地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朝廷給它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很困难的。德国雇佣兵甚至还被派到希腊去扶助那里的可爱的奥托<sup>111</sup>的小小王位，德国的警察甚至被派到葡萄牙去。还有在 1815 年以后召开的各种會議，奥地利向那不勒斯、都灵、洛曼尼雅的进軍，监禁伊普西朗蒂，法国在德国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的奴役性战争<sup>112</sup>，德国支持唐·米格尔<sup>113</sup>、唐·卡洛斯<sup>114</sup>，汉諾威軍隊充当英国反动派的工具；在德国的影响下比利时被分裂和热月化！甚至在俄国内地，德国人也是专制君主和小暴君們的支柱——整

个欧洲都充满了科布尔克家族的人！

波兰在德国軍閥的干涉下被掠夺和分割；克拉柯夫也是被他們奸险地窒息了<sup>115</sup>。在德国的金錢和鮮血的帮助下，倫巴第和威尼斯被奴役，并且被弄得民穷财尽；意大利各地的任何一次解放运动都是在德国的直接或間接参与下，用刺刀、絞架、監獄和划船劳役镇压下去的。它的罪行数不胜数，我們不必一一列举了！

这些卑鄙行为都是在德国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中干出来的，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們不盲目无知，沒有奴隶精神，不甘願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劊子手的角色，不甘願充当“天生的”老爷們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滿仇恨、詛咒和蔑視的罵人話，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現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羈絆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們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話，我們的年輕的、几乎是刚刚預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縛在我們用来束縛別国民族的鎖鏈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給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光明终于真正开始出现。旧政府机关报所大肆散布的关于波兰和意大利的謠言和歪曲，人为地激起仇恨的种种企图，什么事关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等言过其詞的濫調，——所有这一切魔术手法都已失去了效力。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里面包含着物質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图謀私利的大資產階級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市場。反动的政党懂得并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中間階層和工人階級的广大群众了解或者至少感覺到，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們本身自由的保障。难道奥地利反对意大利独立的战争，普魯士

反对波兰复兴的战争受人欢迎吗？难道对于这些“爱国主义的”十字军讨伐的最后幻想不是在消失吗？但是，仅仅有这种了解，仅仅有这种感觉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德国人不再违反德国本身的利益，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流血牺牲和浪费金钱，我们就应当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彻底摧毁旧的建筑。只有到那时，重新恢复起来的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才会被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所代替。当国内民主备受压制的时候，怎么能对外实行民主政策呢？但是，阿尔卑斯山的这面和那面都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措施来准备实现民主制度。意大利人一再表示对德国友好。请大家回忆一下米兰临时政府对德国人民的宣言<sup>116</sup>和意大利报刊上用同样精神写成的许多文章。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这种态度的新的证据，这就是佛罗伦萨出版的“黎明报”的编辑给“新莱茵报”的编辑的一封私人信。信上标明的日期是6月20日，其中特别讲到：

“……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们可怜的意大利的关怀。请你们相信：我们全意大利人都知道究竟谁在侵犯他们的自由，谁在压制他们的自由；他们懂得：他们的死敌并不是强大浑厚的德国人民，而是德国人民的专横的、非正义的、残暴的政府。请你们相信：每一个真诚的意大利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能够自由地向德国兄弟伸出手的日子的到来。因为他们知道：德国兄弟一旦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会保护它，尊重它，同时也会尊重自己所有兄弟的同样的权利。我们对于你们一贯遵行的那些原则深信不疑。

你们的忠实的朋友和兄弟 李·阿利纳里(签名)”

“黎明报”是意大利为数不多的坚决拥护民主原则的报纸之一。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日

载于1848年7月3日

“新莱茵报”第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馬拉斯特和梯也尔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提醒“新萊茵报”的讀者注意“国民报”派的陰謀，这种陰謀的体现者是馬拉斯特。我們已經揭露了这个派企图实行专政的詭計。同时我們也指出了：馬拉斯特的专政会导致梯也尔的专政。

从一些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胜利而受到目前和王朝反对派紧密团結的梯也尔派怎样的排挤。

任命“国民报”派的代表卡諾为部长的事在国民議會里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国民議會主席候选人馬利遭到反对，杜弗尔被提为候选人来代替馬利。而馬利之所以得到通过，是因为他（根据“辯論日报”的說法）被認為是“旧执行委员会中最賢明最穩健的委員”，就是說因为他对旧的王朝派作了最大的讓步，他起草了禁止集会的法案（这是九月法令的繼續），把这个法案提交国民議會并且为它辯护。显而易见，国民議會主席的职位是由“馬拉斯特”和“梯也尔”在互利的基础上磋商决定的。

但是“王朝反对派”对这点表示不滿。王朝反对派起草的法律中有一項关于市政委员会的法律，这项法律是直接反对巴黎市长馬拉斯特，反对他的独裁和权威的。馬拉斯特定会垮台。

不久国民議會的所有議員就会爭吵起来。反动派将繼續进攻，直到“国民报”派放弃一切权力为止。“共和派”和“王朝反对

派”又将針鋒相对。但是，如果还是象二月里那样，共和派就不会取得胜利。

人民再也不会沉溺于幻想了。他們不会把复仇的事情束諸“高閣”。正如科西迪耶尔所說的，他們再也不允許“斯底克斯河的水冲走他們的憤怒”<sup>117</sup>。Qui vivra verra [过些时候就会見分晓]。

写于1848年7月2日

載于1848年7月3日

“新萊茵报”第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妥協辯論

科倫7月2日。悲劇之后是牧歌，巴黎六月的霹靂之后是柏林妥協派的鼓聲。我們已經完全看不到這些先生了，原來正當卡芬雅克炮轟聖安東郊區的時候，康普豪森先生在發表忧伤的告別演說，而漢澤曼先生則在報告新內閣的施政綱領。

首先我們滿意地指出，漢澤曼先生接受了我們的勸告，沒有做首相<sup>①</sup>。他懂得支配首相比做首相重要得多。

新內閣儘管假借了奧爾斯瓦特的名義 (prête-nom)，實際上却仍然是漢澤曼內閣。它一方面把自己這樣偽裝起來，另一方面又吹噓自己是辦事內閣，是實踐內閣。而事實上，奧爾斯瓦特先生是沒有任何條件可以做辦事大臣的！

漢澤曼先生的政綱是人所共知的。我們不去分析它的政治論點；這些論點已經成了那些無足輕重的德國報紙的報道資料。只有一個論點，它們不敢提出來討論，為了使漢澤曼先生不受委屈，我們現在把被忽略了的东西補上。

漢澤曼先生聲明說：

“為了振興工業，從而消滅人民中的勞動階級的貧困，除了恢復人們已經動搖了的信任，使他們相信法律秩序是鞏固的，相信君主立憲制即將鞏固地

<sup>①</sup> 見本卷第116—117頁。——編者注



确立起来而外，目前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我們正以全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奋斗，因而我們是在最坚决地和失业現象、貧困現象作斗争。”

汉澤曼先生在他的政綱的一开头就声明說，为了这个目的，他将提出新的弹压的法律，因为旧的法律（警察国家的法律！）已經不够用了。

說得相当明确。旧的专制的法律已經不够用了！不是由公共工程大臣，也不是由財政大臣，而是由陸軍大臣負責消灭劳动階級的貧困！首先是弹压的法律，然后是霰弹和刺刀，——实在“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了！也許施萊根施坦先生（据一篇威斯特伐里亚的賀詞說，仅仅他的姓就能使叛乱者胆顫心惊<sup>①</sup>）已經在热望繼承他在特利尔的业迹，想当普魯士的小卡芬雅克了吧？

而除了这个“最有效的”办法以外，汉澤曼先生还有其他的办法：

“为了这一目的，依靠对国家有实际益处的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条件也是必要的。”

由此可見，汉澤曼先生答应要在这方面比帕托夫先生“做更多的工作来为人民中的整个劳动階級造福”。但是只有“在內閣解除了由騷动和煽动所造成的使国家秩序遭到破坏的忧虑以后，在內閣恢复了获得必要的貨币資金所必需的普遍信任以后”，他才会这样做。

目前，汉澤曼先生不可能进行任何工作，因为他沒有錢。只有当信任恢复以后，他才能够得到錢。但是，等到信任恢复时，工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会找到工作，那时政府就用不着給失业者以

<sup>①</sup> 俏皮話：德文中施萊根施坦这个姓（Schreckenstein）含有“恐怖”（«Schrecken»）的意思。——編者注

工作了。

汉澤曼先生的消灭貧困的措施就在这个絕无恶意而具有市民階級的善心的圈子里迴旋。現在汉澤曼先生除了九月法令和小卡芬雅克以外，不可能向工人提出什么別的东西。是的，这就是**辦事內閣**！

政綱中关于承認革命的問題，我們就不打算談了。“科倫日報”的一位以«G»为笔名的“消息灵通的記者”刚才向大家暗示，汉澤曼先生为了同我們接近的評論家的利益是如何拯救法制基础的。汉澤曼先生只把那种實質上絕非革命的东西当做了革命。

汉澤曼先生刚一說完，奥尔斯瓦特首相便站了起来，因为他也应该說几句话。他掏出了一张写滿字的小紙条，大致地朗誦了（只是不象朗誦詩的样子）如下的东西：

先生們！今天我呆在你們中間，  
感到非常幸运，  
这里有許多高貴的伙伴，  
他們热情地向我吼吟。  
我在這一瞬間的感受，  
簡直是无法計量的；  
啊！这一美好的时刻，  
我一輩子也不会忘記。<sup>118</sup>

我們将会看出，我們在这里給首相先生的那个很难理解的便条作了最有利于他的解释。

奥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念完，我們的汉澤曼又进来插嘴，为的是提出信任問題来表明他仍然和从前一样。他要求把奏摺草案<sup>①</sup>轉交委员会，并且說道：

<sup>①</sup> 見本卷第60—61頁。——編者注

“議會接受这个提案，就会使人觉得崇高的議會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新內閣的。”

但是，这已經过分了。議員魏克塞尔（他无疑是一位“新萊茵报”的讀者）憤慨地跳上講台，对这种老是提出信任問題的方式表示坚决抗議。他一直講得很好。但是德国人一打开話匣子，就不会很快收場。于是魏克塞尔先生就大发議論，談到革命，談到1807年和1815年，談到在普通的短外衣里边跳动的热烈的心，談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問題。他所以要談这一切，是因为“他認為必須談”。左派发出的惊叫声和一部分叫“好”声，使得这位可尊敬的人不得不走下了講台。

汉澤曼先生要議會相信，內閣絕不是故意輕率地提出信任問題的。况且这次提出的并不是信任問題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一点也就沒有說的必要了。

这时就展开了一場罕有的热烈的辯論。所有的人同时发言，乱扯一通。大家談信任，談日程，談會議規則，談波兰人的民族性，談延期討論；所有这一切都同叫“好”声和喧嚷声交織在一起。最后，帕里鳩斯先生指出，汉澤曼先生是代表內閣提出議案的，虽然內閣本身沒有权利提出任何議案，它只能发表通报。

汉澤曼先生回答說：他已經預先說明，議案按實質說來完全不是議案，而只是內閣的願望。

于是，庄严的信任問題只归結为大臣先生們的“願望”了！

帕里鳩斯先生从左边跳上講台，里茨先生从右边跳上講台。他們在講台上碰头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位英雄誰也不肯讓步；直到主席埃塞尔先生发言了，两位英雄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察哈里埃先生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內閣的建議，要求繼續辯論。

察哈里埃先生是本屆內閣和上屆內閣的忠實的幫手，在討論貝倫茲的提案時，他就在適當的時候起來為貝倫茲修正，因而成了貝倫茲的天使和救星，可是現在他再也找不到更多的理由來論證自己的議案了。財政大臣先生所說的已經足夠了。

於是展開了一場帶有不可避免的修正案、時斷時續、雜以喧嚷聲和叫喊聲、在會議規則上吹毛求疵的長時間的爭論。把我們的讀者引入這個迷宮是沒有必要的，只要在他們面前開辟幾條走出這種混亂狀態的最明顯的道路就行了。

(1) 議員瓦爾德克以教訓的口吻說：奏摺不可能退還委員會，因為委員會已不存在。

(2) 議員許弗爾聲明說：奏摺不是給國王的答复，而是給大臣們的答复。起草御前演說的大臣們已不存在。我們又怎能答复那些已不存在的人呢？

(3) 議員德斯泰爾以修正案形式由此做出如下的結論：議會認為必須否決奏摺。

(4) 主席埃塞爾把這一修正案說成這樣：“這個聲明似乎是新的提案，而不是修正案。”

爭論的骨架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付消瘦的骨架上長滿了肥肉，這就是大臣洛貝爾圖斯先生和屈韋特爾先生、議員察哈里埃先生和賴辛施佩格第二先生等的發言。

情況是極為奇怪的。正如洛貝爾圖斯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要內閣在討論奏摺草案以及因此而發生爭論的時候辭職，是議會史上聞所未聞的！”總的說來，普魯士是得天獨厚的，它在剛剛開始議會生活的頭6個星期裡，就發生了“議會史上聞所未聞的”事情。

汉澤曼先生和議會一样处在窘境中。作为对康普豪森-汉澤曼的御前演說的明确答复的奏摺，实际上应该成为对汉澤曼-奥尔斯瓦特政綱的答复。因此，对康普豪森諂媚的委员会，对汉澤曼先生也应该表示同样的媚态。困难只是在于要向人们解释这个“議會史上聞所未聞”的要求。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切手段。洛貝尔图斯，这位中間派左翼的风神之琴，弹起了最温柔的調子。屈韦特尔竭力安定大家的情緒；在重新审查奏摺草案时，“会得出結論說，即使在目前，也沒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的理由(!)但是，要得出这样的結論”(!!)就必须把草案退还委员会，——这难道是不可能的么！最后，对这种长时间的爭論一貫感到討厭的汉澤曼先生来了个快刀斬乱麻，直截了当地說出了应该把草案退还委员会的原因：他不希望新的修正案作为內閣的修正案从后門溜进来，——它們应该作为委员会的提案穿过敞開的大門从前門进入大厅。

首相声明說，“內閣根据宪法参与奏摺草案的起草工作”是必要的。这怎样理解，奥尔斯瓦特先生指的究竟是什么宪法，我們自己无论怎样思考，也弄不清楚。何况普魯士目前沒有任何宪法。

不过还需要提一下反对方面的两个发言——德斯特尔先生和許弗尔先生的发言。德斯特尔先生非常成功地嘲笑了汉澤曼先生的政綱，說他把自己过去的看法——鄙視抽象概念、鄙視在原則等等問題上的无謂爭論——运用于他的极为抽象的政綱中了。德斯特尔要求办事內閣“認真办事，抛开原則問題”。他的提案——整整一天中唯一合理的提案——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

比所有的人都更为明确地对奏摺表示了正确看法的許弗尔先生，也非常明确地对汉澤曼先生的要求表示了态度：內閣希望我們信任它，把奏摺轉交給委员会，并且要我們决定它的存在。但是，

內閣只能要求对它自己的行动投信任票，而不能要求对它迫使議會采取的行動投信任票。

簡單說來，漢澤曼先生要求投信任票，而議會為了解除漢澤曼先生的忧虑，間接地譴責了討論奏摺草案的委員會。辦事內閣很快就會向議員先生們指出，著名的 Treasury Whip（內閣的鞭子）是什麼人。

弗·恩格斯寫於 1848 年 7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8 年 7 月 4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34 號

## 逮 捕

科倫 7 月 3 日。辦事內閣目前的表現說明它只不过是一个警察內閣。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柏林逮捕莫內克先生和弗恩巴赫先生，第二个行动是在薩尔魯伊逮捕炮兵下士丰克。現在，这些“事情”也在科倫这兒开始了。今天早晨逮捕了医师哥特沙克先生和退伍中尉安內克先生。無論是逮捕的原因或逮捕时的情况，我們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因此暂时不发表意見。

工人們是十分理智的，他們不会因挑衅而貿然行动。

写于 1848 年 7 月 3 日

載于 1848 年 7 月 4 日

“新萊茵报”第 3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逮 捕

科倫 7 月 4 日。昨天我們就答应我們的讀者回头談談哥特沙克医师和安內克先生被捕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在我們所得到的消息中，只有安內克被捕的消息比較詳細。

早晨六七点鐘的时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內克的住宅，他們一进门就馬上粗野地把女僕推开，然后悄悄地沿着楼梯爬上楼去。3 个人留在前厅，4 个人闖进寢室。这时安內克和他的即将分娩的妻子还没有起床。这 4 个法庭的得力骨干中，有一个一早起来就喝了不少“Geist”<sup>①</sup>、白酒和伏特加酒，走起路来已經有点搖搖晃晃。

安內克問他們要干什么。“跟我們走！”——回答很簡單。安內克請求他們，至少要原諒他的有病的妻子，請他們到前室去。但是，神圣的埃尔曼达德<sup>119</sup>先生們不願离开寢室；他們要安內克赶快穿好衣服，甚至不許他同妻子說几句话。在前室里，他們不但催逼，而且动起手来，有一个宪兵把一扇玻璃門打得粉碎。他們把安內克推下楼去。4 个宪兵把他帶到新監獄，3 个留在安內克夫人那里看守着她，等候国家檢察官到来。

根据法律，在逮捕人的时候至少要有一个法警的官員——警

---

① 双关語：“Geist”意指“精神”，同时也指“烈性酒”。——編者注



察署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場。但是，既然人民已經有了两个保护自己权利的議會(一个在柏林，另一个在法兰克福)，还要这样的形式手續做什么呢？

过了半个小时，国家檢察官黑克尔和預审推事盖格尔就来进行搜索了。

安內克夫人申訴說，国家檢察官不應該讓那些粗野的宪兵在沒有任何負責人員到場的情况下就随便捕人。黑克尔先生回答說，他沒有下令对被捕者要粗野。好象黑克尔先生可以下这种命令似的！

安內克夫人：看来是有意只派一些宪兵先来，这样就可以对这些人的粗暴行动不負責任。而且逮捕是非法进行的，因为没有一个宪兵出示逮捕令；不錯，有一个宪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什么小紙条，但是他並沒有交給安內克过目。

黑克尔先生：“派宪兵进行逮捕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决定”。难道司法机关的决定可以不遵照法律的規定么？国家檢察官和預审推事沒收了大量的文件和传单，其中有安內克夫人的一大包文件，以及其他东西。这里應該順便提一下：預审推事盖格尔先生已被提名为警察厅长了。

晚上安內克被审問了半小时。他之所以被捕，似乎是由于他在居尔策尼希最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說<sup>120</sup>。Code pénal[刑法典]<sup>121</sup>第 102 条所提到的公开演說，是指那些直接号召謀叛皇帝和皇族的言論，或旨在号召用內战，即非法使用武力、公开进行杀戮或掠夺来破坏国家安宁的言論。普魯士的術語“煽动不滿”未見于該法典。由于无法运用普魯士的法律，所以在司法上完全不容許运用第 102 条的場合，也都要暫時采用第 102 条了。

就在进行逮捕的时候，城里集結了相当大的兵力；从早晨4点钟起军队就在兵营里集合了。兵营把面包师和手工艺工人放进来以后就不放他们出去了。早晨6点钟左右，驃騎兵从多伊茨开到了科倫，在全城馳騁而过。一支由300人組成的队伍已經到新監獄駐防。今天得到消息說，又有4人被捕，这4个人是严森，卡克尔，埃塞尔，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人。貼在牆上的严森号召工人保持鎮靜的告工人書，据目击者談，昨天晚上已經被警察撕去了。这样做是为了維持秩序呢，还是为了在光荣的科倫城实现早已拟好的計划而寻找借口？

据說，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先生早已問过阿恩斯貝尔格高等法院，是否能根据先前的判決<sup>122</sup>逮捕安內克，然后将他轉送幽里希。看来，国王大赦妨害了这一善良意图的实现。問題已經轉呈內閣处理。

据說，似乎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先生还声明說，他将要在一星期內在萊茵河畔的科倫城里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1848年的其他一切产物。茨魏費尔先生的确不是一个怀疑論者！

茨魏費尔先生不是把执行权和立法权集于一身了嗎？也許最高檢察官的荣誉可以用来遮盖人民代表的难堪吧？我們要再次翻一翻我們心爱的速記記錄，讓讀者看看人民代表、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活动的全貌。

总之，辦事內閣所办的事，中間派左翼內閣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貴族、旧官僚、旧普魯士的內閣过渡的內閣。只要汉澤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而柏林的左派應該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

意义的障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讓左派在議會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議會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議會里大胆地承認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議會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敗。德国的发展或許也需要这种对比吧。

办事內閣在原則上承認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写于1848年7月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5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35号

## 妥協辯論

科倫7月4日。今天我們來談談6月28日的妥協會議。議會討論的是新任主席、新的會議規則和新任各部大臣的問題。因而可以想象，那里的情況是多么混亂。

在对會議規則問題以及其他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事先醞釀之後，最後由議員格拉德巴赫發言。几天以前普魯士軍閥以強制手段解除了因信仰共和主義而被解散的、由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返回斯潘道的志願軍兵團第六連士兵的武裝；其中有些人甚至還被逮捕了起來。普魯士軍閥在法律上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和任何權力這樣做的。依照法律，軍事當局根本沒有擅自採取這種措施的權利。但是，這些志願軍中大多數人都曾參加過柏林街壘戰，因此，近衛軍先生們一定要向他們報仇。

格拉德巴赫先生就軍閥的這種專橫行為向內閣提出了質問。

陸軍大臣施萊根施坦回答說，關於這件事情他一點也不知道，他保留向有關機關質詢的權利。

原來，人民發給陸軍大臣薪俸，是因為他28日在柏林還一點不知道距柏林3小時路程的斯潘道軍事當局的行動，是因為可以說就在他眼前，在距柏林3小時路程的地方，近衛軍的中尉佔領了車站，奪取了武裝的人民在戰場上所奪得的、應歸他們所有的武器，這些中尉甚至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無須向大臣先生提出報告！但

是，作出这种英雄行动的陸軍中校施利希廷先生当然是按照波茨坦的“指令”行动的，显然，他向波茨坦也提出过报告！

消息灵通的陸軍大臣恳求說：明天，也許我就能給以回答！

察哈里埃接着問道：內閣曾答应提出市民自卫团的法案。这个法案是不是要以武装全民的原則为根据呢？

新任內政大臣屈韦特尔先生回答說：市民自卫团的法案业已提出，但是內閣还没有討論，因此，对这个問題他不能提供更詳細的材料。

原来新內閣組織得如此仓促，对基本的原則問題还十分不清楚，以致象武装人民这样紧要的問題还根本没有提出来討論！

格拉德巴赫議員質問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有关机关最后确定市长和其他官員的問題。这些机关至今仍然負着这方面的責任。因为所有旧的行政机关都只是暫時性的，所以在依据有关法律最后确定各种官員的委任条例以前，它們只能暫時填充补缺。尽管如此，但是市长和其他官員仍然被最后确定了。

屈韦特尔大臣完全贊同格拉德巴赫先生的意見，并且声明說，他将发出通知：市长的委任只是暫时的。

主席格拉博夫先生巧妙地应付了格拉德巴赫先生接着提出的关于解除許多官員职务的問題。这些官員深为他們統治下的老百姓所痛恨，其中有一些（特别是在农村）在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就被赶跑了。

在會議規則問題上进行不大的爭論以后，會議就开始討論迪尔施克議員对克茲林宣言<sup>123</sup>、对区行政机关和县长传播这个宣言提出的質問。但是，議員先生完全忘掉了，他的質問已列入議程，可是沒有必要的論証文件。因此，他只好发表一些一般的抨击反

动派的言論，接受大臣的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回答和听取主席的发言，看来，迪尔施克对回答是滿意的。

然而，迪尔施克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質問：各部大臣是不是事先就准备制止貴族和官僚的反动企图呢？

但是看来他又忘記了这个問題的証明文件。他又不列举事实，而只是夸夸其談，并且認为最好是請內閣发表宣言声討反动派。

屈韦特尔先生当然回答說，使他感到兴趣的不是貴族地主和官員們的信念，而只是他們的行动；这些人和迪尔施克先生享有同样的自由；不过迪尔施克先生應該举出事实来。他郑重地拒絕了发布声討反动派的“命令”的荒謬意見。这时迪尔施克先生引証了一个事实：在他所在的奥瑙区，县长就似乎声明过，只有霰弹使国民議會团结起来后，它才会妥协，县长又說，这个区的議員（即迪尔施克本人）好象曾說过，吊死大臣是无謂之举。

主席由此做出結論說，迪尔施克先生对第二个質問的答复也是滿意的，而迪尔施克先生也找不出反駁的东西了。

但是汉澤曼先生觉得自己并不滿意。他責备发言人避开了基本問題。他“要議會判断，个人对官員提出控告究竟恰当与否，如果控告不能立刻証实的話”。

汉澤曼先生这样傲慢地挑战之后，便在右派和中間派的响亮的贊許声中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議員埃尔斯納提出了一个紧急建議。他指出必須立刻委派一个委员会去調查紡織工人的状况和整个普魯士亚麻工业的状况。

埃尔斯納先生向議會做了一个簡短而又使人信服的报告，叙述了旧政府怎样不止一次地使亚麻工业成了王朝和正統主义的各

種利益的犧牲品，或者更正確些說，成了奇癖怪好的犧牲品。西班牙、墨西哥、波蘭、克拉柯夫便是證明。

幸亏事實是能使人信服的，而且所涉及的又只是舊政府。所以，沒有人起來反駁；政府聲明說，它早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給委員會處理了。這樣建議就一致通過了。

接着，德斯特爾對給波蘭人剃光頭一事<sup>124</sup>提出質問。

德斯特爾聲明說，他希望得到解釋的不僅是這件事情本身，而且特別是內閣對付這種行動的措施。所以，他質問的並不是陸軍大臣，而是整個內閣。

奧爾斯瓦特先生：要是德斯特爾不希望得到關於這個具體事件的回答，那末“內閣就完全沒有興趣”討論這個問題。

的確，內閣是完全“沒有興趣”討論這個問題的！真是奇聞！實際上，人們通常提出質問的正是“內閣”絕對“沒有興趣”討論的問題！正因為內閣沒有興趣回答，所以，首相先生，人們才向內閣提出了質問。

但是，首相先生也許認為，和他打交道的不是他的上司，而是他的下屬。他答复質問總是要看問題的提出是否有利於內閣而不利於國民議會！

我們現在只能用主席格拉博夫先生沒有經驗來解釋他沒有制止奧爾斯瓦特先生的這種官僚的傲慢行為。

但是，首相擔保，政府將要採取堅決措施制止給波蘭人剃光頭，不過，關於這方面的詳細情況，他只能以後再談。

德斯特爾欣然同意緩期回答，不過他希望奧爾斯瓦特指出賜復的日期。

奧爾斯瓦特先生大概聽覺遲鈍，他回答說：我認為決不能從我

的声明里做出結論說，內閣今后不願意(!)再談這個問題。但是日期他还不能确定。

可是，貝恩施和德斯特尔都坚决表示，他們要求把事实本身也解释一下。

接着，德斯特尔提出第二个質問：政府在萊茵省，特別是在科倫城进行軍事准备的用意何在？是否产生了保卫与法国接壤的国境的必要性？

施萊根施坦先生回答說：除了一些后备軍外，最近几个月来，沒有調任何軍队到萊茵去。(就算这样吧，勇敢的巴亚尔，但是要  
知道，那里的軍队早就綽綽有余了。)为了使祖国不致瀕于危險，不仅科倫城，而且所有的要塞都在加强戒备。

这就是說，如果不把科倫的軍队調到要塞(他們在那里既无事可做，居住条件又很坏)里去，如果不发給炮兵以大炮，不配給軍队以8天的粮食，如果不供給步兵以弹药，給炮兵以霰弹和炮弹，那末，祖国就会处在危險中嗎？可是，按照施萊根施坦先生的說法，只有科倫和其他大城市处在**危險中**，祖国才会处在**危險外**！

但是，“軍队的一切調动，必須交由軍事人員，陸軍大臣核准，否則他就不能負責！”

这样說来，仿佛講这种話的是一位无辜受辱的少女，而不是普魯士 pro tempore [暫時]的巴亚尔，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使人聞名喪胆的帝国男爵罗特·馮·施萊根施坦！

議員德斯特尔医生同帝国男爵罗特·馮·施萊根施坦的魁梧身材比起来确实显得矮小；如果他要詢問一下施萊根施坦先生某項措施的意义，那末伟大的帝国男爵就会認為，区区医生竟想夺取他調遣軍队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能負責的！



簡單說來，陸軍大臣先生聲明的是，不應該向他追究責任，否則他就根本不能負責。

但是，議員的質問同“軍事人員，特別是陸軍大臣的核准”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么呢！

德斯特爾聲明說，誠然他並不滿意，但是他從施萊根施坦的回答中得出一個結論：進行軍事準備是為了保衛與法國接壤的國境。

奧爾斯瓦特首相對這個結論提出了抗議。

要是國境綫上所有的要塞都加強戒備了，那末，整個國境就能“保衛住”。要是整個國境都保衛住了，那末，與法國接壤的國境也就能“保衛住”。

奧爾斯瓦特先生同意這些前提，因而“以內閣的名義不作”結論。

相反地，“根據”人們的常識，我們“要作”結論：奧爾斯瓦特先生不只是聽覺遲鈍。

德斯特爾和普法爾立刻表示抗議。賴辛巴赫聲明說，東部西里西亞的最大要塞廼伊斯<sup>①</sup>就根本沒有加強戒備，情況十分糟糕。當他開始列舉這方面的詳細材料時，右派在中間派的支持下便瘋狂地叫囂起來，於是賴辛巴赫不得不走下講台。

摩里茨先生：

“賴辛巴赫伯爵沒有指出他是根據什麼理由發言的(!)。我想，根據同樣的理由我也能發言(!)。我認為用這樣的方法……(喧聲大作)使內閣處於困難的境地，談論不應該廣泛宣傳的東西，是不符合議會制度的，是議會史上聞所未聞的……我們被派到這裡來，不是為了使祖國陷入危險的境地。”(喧聲驚人。我們的摩里茨只得走下講台。)

① 波蘭人稱之為內薩。——編者注

議員埃塞尔第一对會議規則第 28 条作了及时而严肃的解释，才結束了这场喧嚷。

摩里茨先生提出抗議，并且声明說，他根本不希望提出实际的修正案，他只想“根据賴辛巴赫伯爵发言的理由来发言”！議會中的保守派支持他，并且以大声叫“好”来鼓励他，而极左派却对此掀起抗議之声。

**奥尔斯瓦特：**

“对那些有关普魯士国家的防御能力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討論是否妥当呢？”

首先，对此應該指出的是，这里所談的不是国家的防御能力，而是它无力防御。第二，不妥当是指陆軍大臣以武力来反对国内的敌人，而不反对国外的敌人，但根本不是指提醒他注意他的职责。

右派郁闷不乐，要求停止討論。在一片吵鬧声中，主席宣布問題已經解决。

議程上列有荣克的質問。荣克先生認為缺席为佳。真是奇怪的人民代表！

这时，朔尔茨議員提出質問。他逐字逐句地說：

“質問內政大臣先生，是否能够解释，是否願意回答在各个地区不合理地采用便衣警察<sup>125</sup>的問題。”

**主席：**首先我要問，这个質問是否清楚。

（質問不够清楚，重說一遍。）

**屈韦特尔大臣：**我确实不知道，要我解释什么问题。我覺得問題提得不清楚。

**主席：**有人支持这个質問嗎？（沒有人支持）

朔尔茨：我暫時收回自己的質問。

在這場空前絕後的、“議會史上聞所未聞的”演出結束後，我們今天也“后”退了。

弗·恩格斯寫于1848年7月4日

載于1848年7月5日

“新萊茵報”第35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

科倫 7 月 6 日。昨天“〔新〕萊茵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哥特沙克医师和安內克先生被捕事件的文章(文章注明“科倫 7 月 4 日”)①；刚才我們收到了一个反駁那篇文章的声明。

“据报載，似乎安內克夫人申訴說，在逮捕她的丈夫时没有一个負責人員到場，而我給她的回答是：

**我没有下令对被捕者要粗野。**

我現在声明，这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我只声明：要是宪兵有举止不当的地方，那我表示遺憾。

其次，据报載，似乎我曾經这样說：

**‘派宪兵进行逮捕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决定。’**

我現在声明，这样的报道也是不真实的。

我只指出，逮捕是根据預审推事先生的逮捕令进行的。

依照法律逮捕令应由司法执行官或軍事当局的代表执行。任何地方都没有規定要有法警的官員到場。

这篇文章对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和执行逮捕的宪兵进行的誣蔑性的攻击和侮辱，将会在法庭审讯本案时得到应有的評判。

国家檢察官黑克尔

1848 年 7 月 5 日于科倫”

我們敬愛的讀者根据上面的引証就会相信：“新萊茵报”增加了一位新的、前途很有希望的撰稿人——檢察官。

① 見本卷第 190—193 頁。——編者注

我們只是在一个法律問題上犯了錯誤。在逮捕人的时候，應該到場的**不是“法警的官員”，而是当局的代表**。法典对人身不受侵犯表現了多么动人的关怀！

然而宪兵先生沒有出示逮捕令这一点，毕竟还是非法的。我們后来得知，他們还在黑克尔先生及其随从到来以前就动手检查文件，这种行为也是非法的。但是尤其非法的，是使黑克尔先生表示遺憾的、对被捕者的粗野态度。使我們惊奇的是，法庭要审讯的不是宪兵先生們，而是揭露宪兵先生們的无礼举动的报纸。

要說侮辱，也許只侮辱了一位宪兵先生；报道中說这位先生一早起来就喝得有几分醉意，有点“搖搖晃晃”。但是，如果审讯証实——我們毫不怀疑这一点——当局的代表先生們确曾对被捕者态度粗野，那末，在我們看来，我們当时只是以极其关怀的心情和报刊应有的公正态度，并且也是为了我們所責难的先生們自己的利益，指出了唯一“可以減輕过失的情节”；可是检察官現在却把这种为博爱精神所驅使而指出唯一可以減輕过失的情节的做法說成是“侮辱”！

最后，我們来談談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費尔先生的侮辱或者誣蔑！

我們只登載了一条消息，并且如我們自己所指出的，这条消息是以我們从可靠方面得到的傳聞为根据的。但是要知道，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們的活动。我們同时指出，茨魏費尔先生在議會里的活动使我們有理由認為，过去說他敌視人民可能是有根据的。难道有人想剝夺报刊評論人民代表的議會活动的权利嗎？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

难道报刊沒有权利認為在人民代表茨魏費尔身上有着过多的

最高檢察官的東西，而在最高檢察官身上又有着過多的人民代表的東西嗎？那末，為什麼在比利時、法國等地發生了關於兼職問題的辯論呢？

至於談到憲政的傳統，我們介紹大家看一看路易-菲力浦時代的“立憲主義者報”、“世紀報”<sup>126</sup>和“新聞報”<sup>127</sup>是怎樣評論既是檢察機關的領導人、又是議員的阿貝爾、普路古爾姆等先生的議會活動的。請你們讀一讀比利時的力主憲政的報紙——“觀察家”<sup>128</sup>、“政治家”、“解放”，看看它們早在去年就怎樣評論身兼議員和總檢察官的巴魏先生的議會活動的。

難道在基佐內閣時期、在羅日埃內閣時期就一直容許的事情，在有最廣泛的民主基礎的君主制度下反而不容許了嗎？難道任何一個法國復辟時期的內閣都不曾否認過的權利，到了原則上承認革命的辦事內閣時期却成了犯罪行為嗎？

此外，公眾從我們今天早晨發行的增刊里可以看到，我們對於事件進程的預見是多麼正確。洛貝爾圖斯退出了內閣，而拉登堡却參加了內閣。幾天功夫，中間派左翼內閣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舊普魯士的反動內閣。右派決定發動政變<sup>129</sup>，左派却以威脅的姿態退卻了。

科倫最近發生的事件是早就在辦事內閣的一個巨大的軍事行動計劃里規定好了的，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剛才我們得到通知說，“新萊茵報”被禁止送入監獄。這種禁止是根據監獄的規定呢？還是政治犯被處罰只准讀“科倫日報”呢？

卡·馬克思寫於1848年7月6日

載於1848年7月7日

“新萊茵報”第37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柏林的妥協辯論

科倫 7 月 6 日。目前在柏林，第二次內閣危机还在繼續，用梅策議員的話來說，我們又將“從這場暴風雨中”回到妥協辯論的至今還這樣“平靜的海洋里”。不管怎樣，我們在這個舒適安樂的環境中已經度過不止一小時了——

這裡還是習俗和道德的世界，  
而在我們中間，  
恬靜的歡樂卻如花盛開<sup>130</sup>。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 6 月 30 日的會議。在它開幕的時候，就發生了非常特別的重要事件。

誰沒有聽說過貝爾格區和馬爾克區的 57 個家長為了拯救祖國而去長征的事呢？誰不知道這些保守的小市民階層的英雄拋妻別子，不顧自己的事業，以視死如歸的精神去出征呢？他們向前挺進，是為了同革命作殊死的鬥爭，簡單地說，是為了到柏林去向內閣呈遞討伐叛亂者的請願書。

這 57 位騎士後來又向妥協議會呈遞了一封含有溫和而虔誠的反動願望的信。議會宣讀了這封信。一些右派先生當時就想知道在這個文件上簽名的有哪些人。秘書剛開始念，就被“夠了，夠了！”的喊聲打斷了。

議員貝爾格：

“宣讀的文件不是提案就是請願書。如果是提案，那末我想知道哪一位議員支持这个提案。如果是請願書，那末我們應該把它送交有关的委員會而不要再讓这件事來打攪我們。”

貝爾格先生以这种言簡意賅的回答把問題解决了。主席低声說抱歉抱歉，就把 57 个家長的信放在一边。

接着我們的老朋友，左派的朋友，万茨列本的議員舒耳茨走上講台：

“前天我撤回了不按宗教儀式結婚的提案以及其他的提案，并且指出我將要修改这些法律草案的条文。在速記記錄里我发现了对这件事的反应是‘笑声’。也許有人嘲笑过这件事，但是，这种嘲笑自然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又是笑声)

于是万茨列本的議員舒耳茨非常天真烂漫地說，他只想把事情做好，他乐意接受良好的意見，并且考虑了人們对他的法律草案不完善的地方所提的意見，但是他自己无法对自己的提案提出修正，因此，他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不向議會“提出”这个提案的初稿，而暫時把它收回。

“我一点也沒有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对‘笑声’两字我應該提出抗議，因为它使我的完全有根据的行动变成可笑的了。”

万茨列本的議員舒耳茨就象湯豪塞騎士一样：

只要想起这种笑声，  
就要馬上掉下泪來<sup>131</sup>。

議員布里爾指出，在向来是无懈可击的速記記錄里，这回却漏掉了汉澤曼大臣的一句話：本屆內閣的施政綱領是御前演說的繼續。这个地方他所以記得特別牢，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印刷工人，当时就想起了他經常排印的字：“待續”。



这种对待严肃問題的輕率态度使議員里茨先生非常憤慨。他急速地跑上講台声明說：

“諸位先生，我認为，为了維護議会的尊严，我們應該在发言中不用不适当的类推和不恰当的比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議會精神的。（喧声大作）上次會議我們开得太活跃了；我認为这有損議会的尊严……为了維護这个議会的尊严，我建議大家要慎重些。”

“为了”实现里茨議員的关于“慎重”的建議，我們要忠告里茨議員：“为了維護議会的尊严”，要尽量少发言，因为发言往往会带来“活跃”。

但是后来的事件明显地証明了，象万茨列本的舒耳茨先生和里茨先生这样有美德的人的善良意图，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往往受到不公正的評價。原来在主席格拉博夫先生所委派的計票人中，代表中間派左翼的是万茨列本的舒耳茨先生（笑声），代表中間派右翼的是布里尔先生。（活跃）說到布里尔先生，我們的讀者應該知道，这位屬於极左翼的議員，却坐在中間派右翼的席位上，靠近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因为他有通俗的演說才能，所以能够使反动党派的一些破坏活动沒有在这些农民中得逞。

接着，貝恩施先生就俄国的照会（据說弗兰格尔就是由于这个照会才从日德兰撤退的）提出質問。奥尔斯瓦特不顧“晨报”<sup>132</sup>和俄国的“蜜蜂”<sup>133</sup>的报道，竟否認有这样的照会。我們認为奥尔斯瓦特先生是对的；我們并没有認为俄国曾向柏林方面递交过正式的“照会”。至于尼古拉向波茨坦方面递交过什么东西，我們也象奥尔斯瓦特先生一样不大清楚。

貝恩施先生同时还就陸軍少校維登布魯赫递交丹麦政府的照会<sup>134</sup>提出質問。从这个照会可以看出，丹麦战争不过是一场虛假

的战争，不过是为了給过度的爱国狂热寻找出路而想出来的一种游戏。

**奥尔斯瓦特**先生正在寻找借口，以便不回答这个質問。

在关于专门委员会的枯燥而混乱的爭論结束后，这一次终于暴发了一场确实有趣的議會吵鬧；在这场吵鬧中，憤慨和論战的狂热一时压倒了右派慣有的喧声。我們應該把这場吵鬧归功于**格拉德巴赫**議員。陸軍大臣答应今天答复他的关于解除返国志願軍的武装并予以逮捕的問題<sup>①</sup>的質問。

主席刚一宣布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早已熟識的陸軍中校**格里斯海姆**先生立刻就起来发言。但是刺耳的叫声馬上就結束了这种官僚式的丘八的糾纏。

**主席**解释說，根据會議規則第 28 条，大臣助理只有征得議會同意才能发言。

**格里斯海姆**：我就是以陸軍大臣的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的。

**主席**：这一点我沒有得到通知。

**格里斯海姆**：既然諸位先生不願听我的发言……（啊哟！喧声）

“諸位先生！”在**格里斯海姆**看来，这些“先生”就是“崇高的議會”。主席先生應該叫**格里斯海姆**守規矩，因为他又举止失当了。

議會希望听完**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发言。**格拉德巴赫**先生为了要論証自己的質問就先发言了。但是，他首先声明說，因为他已向陸軍大臣提出了質問，所以他要求陸軍大臣出席——这是會議規則給予議會的权利。然而主席拒絕了这个要求；鉴于問題急待討論，**格拉德巴赫**先生就开始叙述他的質問的內容。他叙述志願軍

<sup>①</sup> 見本卷第 194—195 頁。——編者注

怎样由于軍事专橫制度扩展到他們的兵团而退伍回家；他們怎样在斯潘道被“突然从各个偏僻的角落里鑽出来的可恶的警察制度”烙上了“流浪者”这个侮辱性的綽号；他們怎样在斯潘道被解除武装和被扣留，而且发給通行証，强迫遣送回家。格拉德巴赫先生是第一个憤怒地叙述了这种应该受到憤怒斥責的可耻行为的議員。

格里斯海姆先生声明說，这些措施是根据柏林警察总署的請求采取的。

于是格拉德巴赫先生宣讀了一个志願軍的退伍証明書，这个証明書是由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公爵弗里德里希签署的，其中写的都是好話；格拉德巴赫先生同时又把“根据內閣的决定”在斯潘道发給这个志願軍的通行証和这个証明書对照了一下，通行証給他規定了强制性的路綫，这样就把他当做流浪者了。格拉德巴赫指出，通行証中包含着逮捕、强迫劳动和罰款的威胁；他根据官方文件証明，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关于这一措施是出自警察总监的断言是假話。接着他問道：难道在斯潘道还有一个特別的俄國內閣嗎？

內閣的明显的謊言第一次被揭穿了。整个議會群情激憤了。

內政大臣屈韦特尔先生迫不得已，終于站了起来，低声說抱歉抱歉。除了18名武装人員被繳械之外，也就是除了犯法之外，本来就沒有发生什么事情呵！决不能容許武装暴徒即22名返国的志願軍人員未經許可就在國內游蕩！（未經許可！）

議会对大臣先生的头一句話就明显地表示了不滿。甚至右派对这些雄辯的事实都还記憶犹新，以致至少也得保持緘默。但是，当他們看到他們不幸的大臣难以摆脱左派的嘲笑和埋怨的时候，

他們很快就振作起来，开始为无力替自己辩护的屈韦特尔大声叫“好”；中間派中有一个人支持他們，于是屈韦特尔先生终于又振作起精神，竟敢声明說：下令采取这些措施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前輩；但是我要声明，我完全贊成这些措施，并且打算在同样的情况下采取同样的措施。

右派和中間派都大声叫“好”，来奖励他們的英勇的屈韦特尔的这种勇敢精神。

但是格拉德巴赫并没有被吓倒。他在保守分子的喧嚷声中走上講台，再次問道：施萊根施坦先生还在斯潘道事件以前本来就是大臣，他怎么能够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呢？持有充分証明的4个志願軍人員怎么能够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呢？（这时中間派先生們提出會議規則来打断他的話）問題决不能認為已經解决了。怎么能够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流浪者强迫遣送回乡呢？（发言人的話被打断了；喧声）关于通行証的問題我还没有得到回答。簡直是侮辱这些人。为什么人們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容忍一伙好战的黑帮分子手持武器从烏培河谷来（喧声大作）侮辱首都呢？（喧声，“好啊”的喊声）

屈韦特尔终于找到了出路，他說，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可疑的証明書引起的！就是說，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司令部签发的退伍証明書在屈韦特尔先生的警官看来是“可疑的”？真是奇怪的官僚！

还有几个議員起来发言指責各部大臣，他們一直講到主席宣布停止討論，梅策議員把議會从這場辯論的暴风雨中帶到教师生活的平靜的海洋里为止；而我們也讓它留在那里，希望它得到最大的田园乐趣。

我們很高兴，因为最后竟有一个左派議員能够提出很有根据

---

的質問，发表有决定意义的演說，使得大臣先生們受到很多人的抨击，并且引起了一場象法国和英国的議會辯論那样的爭吵。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7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37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辦事內閣

科倫 7 月 7 日。我們这里又发生了內閣危机。康普豪森內閣垮台了，汉澤曼內閣倒下了。辦事內閣尽管用家用藥物来治疗，尽管使用硬膏剂，尽管对报刊案进行审讯，尽管实行逮捕，尽管以官僚的傲慢无礼的态度重新抬起了它那盖滿档案柜灰尘的脑袋，并且打算找岔子为自己的被推翻复仇，还是只存在了一个星期。“辦事內閣”是由一些庸碌之徒組成的，它毫无远見，甚至在最后一次妥协会議開幕时还确信自己的地位是非常穩固的。

到會議閉幕时，內閣就完全瓦解了。这个包藏着种种后果的會議使首相馮·奧爾斯瓦特确信，他應該呈請辞职；馮·施萊根施坦大臣也不願意再做汉澤曼的侍卫长了，于是整个內閣昨天就到桑苏西去見国王。他們在那里作出了什么决定，我們明天就会見分晓。

我們駐柏林的署名井的記者还补充报道說：

“剛才風聞，芬克、品德爾、梅維森已奉急召前去參加組織新內閣的事宜。”

如果这个傳聞被証实，那末，我們就会从調停內閣經過辦事內閣最后看到反革命的內閣。最后！即使这个內閣的反革命势力存在的時間極短，也足以使人民充分地看到那些渺小的人物，这些人只要反动势力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重新抬起自己的小脑袋。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7 日

載于 1848 年 7 月 9 日

“新萊茵報”第 3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 妥 協 辯 論

科倫 7 月 8 日。我們在得到漢澤曼內閣瓦解的消息的同時，也得到了 7 月 4 日妥協會議的速記記錄。在這次會議上宣布了洛貝爾圖斯先生退出內閣的消息，這是內閣瓦解的第一個徵兆；此外，關於波茲南委員會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表決以及左派的退出都大大加速了內閣的瓦解。

關於各部大臣先生對洛貝爾圖斯先生退出內閣的意見，速記記錄並沒有提供什麼新的情況；因此我們就不來談論這個問題了。

福斯特曼先生站了起來，據說他不得不起來抗議格拉德巴赫先生在 6 月 30 日<sup>①</sup>對“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的最可敬的人的代表”所發表的言論。

貝爾格先生：我在不久以前就根據會議規則提過意見，說在這裡宣讀請願書是不適當的，說我討厭這樣做<sup>②</sup>。（喊聲：我們討厭！）好，我們。我的發言不僅代表我自己，而且代表其他許多人，即使今天又提出一些意見來打擾我們，也不能取消我的這個意見。

中央總署的發言人土伊斯豪斯先生報告了波茲南委員會的問題。中央總署提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審查有關波茲南的一切問題，但是對委員會應該用什麼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的問題並沒有

<sup>①</sup> 見本卷第 209—210 頁。——編者注

<sup>②</sup> 見本卷第 206—207 頁。——編者注

发表意見。

沃尔弗先生、弥勒先生、賴辛施佩格第二先生和佐美尔先生都提出了修正案；所有这些修正案都得到了支持并提出来討論。

土伊斯豪斯先生給他的报告补充了几点意見，这些意見都是反对委员会的。据说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居于中間，因此，議会在听了一些冗长而互相矛盾的报告后，只得出了双方都不对的結論，也就是說，議会将保留它現在的意見。首先应当要求政府作一个詳細的报告，然后再做結論。

中央总署怎么能委派一个反对自己的报告的报告人呢？

罗伊特先生叙述了促使他提出任命委员会的問題的原因。最后，他声明說，他絕不是有意責难內閣；他是法学家，他很清楚，沒有相应的法律，內閣对事件所負的一切責任都是虛幻的。

賴辛施佩格第二先生发言。他怀着滿腔的同情向波兰起誓；他希望德意志民族不久就会偿还薩比斯基后裔那笔旧的名誉債。（要知道，这笔名誉債早已用8次瓜分波兰、榴霰弹、硝酸銀和鞭笞来偿还了！）“但是，我們也应该表现出极度的鎮靜和理智，使德国的利益永远占居首要的地位。”（德国的利益自然是要尽量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賴辛施佩格先生特別反对成立調查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或法庭才能解決的問題。”难道賴辛施佩格先生忘記了，在进行关于革命的辯論时他自己說过議員先生們的使命是要“創造历史”<sup>①</sup>嗎？他以关于議員地位的純粹法学上的詭辯結束了自己的发言。我們还是回头来談談資格問題吧。

---

① 見本卷第87頁。——編者注



可是克罗托申的鮑威尔先生(他本人就是波兰的德国人)走上講台来捍卫自己的同胞的利益。

“我恳求議會不要計較过去,而只关心人民的未来,人民是有权利指望我們的关怀的。”

多么使人感动啊! 克罗托申的鮑威尔先生这样关怀波兰人民的未来,以致希望“不要計較”他們的过去,不要計較普魯士軍閥、犹太人和波兰的德国人的野蛮行为! 为了波兰人本身的利益,我們應該拒絕討論这些問題!

“从这种痛苦的分析中又能得到什么呢? 即使你們認為德国人是有罪的,难道你們因此就不大考虑保卫他們的民族性、保护他們的个性和他們的财产了嗎?”

真是直言不諱! 克罗托申的鮑威尔先生承認德国人可能是錯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應該牺牲波兰人的利益来維護德国人的民族性!

“我真不了解,挖掘过去对于圓滿地解决目前这些复杂的問題究竟有什么好处。”

自然,对于波兰的德意志先生們和热烈支持他們的人來說是沒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他們如此頑固地反对这样做。

接着鮑威尔先生企图恐吓議會,說这种委員會又会振奋人心,煽起狂热,結果就会发生一場新的流血冲突。这些博爱的見解使得鮑威尔先生不敢投票贊成委員會。但是,为了不致造成似乎他的委托者害怕委員會这样一种印象,他也不能投票反对。为了波兰人的利益他反对委員會,为了德国人的利益他贊成委員會,为了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表示自己不偏不倚,他就干脆不投票。

另一位波茲南的議員,即格內森的布斯曼認為,仅仅他出席会

議这一点就証明波茲南也住着德国人。他想根据統計資料証明在他那个区域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他的話被打断了）而且，該地区的 $\frac{2}{3}$ 以上的財產都掌握在德国人手里。

“此外我还要証明，我們普魯士人不仅靠我們武器的威力(!?! )在1815年征服了波兰，而且靠33年的和平和我們的文化知識再次征服了它(这次會議就是証明)①。（他的話被打断了。主席建議布斯曼先生談問題的實質。）我不反对改組，但是，最合理的改組是施行附有官員选举制的地方自治条例；这个条例和法兰克福議會关于保护一切民族的決議就能給波兰人提供一切保障。但是划分界綫我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話被打断了。再次受到警告。）如果談問題的實質，我是反对委员会的，因为它毫无益处，它只会引起动乱；可是，我并不害怕成立委员会，如果必要，我也贊成……（有人打断他的話說：他說他贊成委员会！）不，我是說反对……諸位先生，为了給你們說明一下发生起义的原因，我想简单地……”（他的話被打断了。遭到反对。）

**采什科夫斯基：**別打断他！讓他講！

**主席：**我再一次要求发言人紧紧地抓住問題的實質。

**布斯曼：**“我已經說过，我反对委员会，我再沒有什么补充的！”

这位波兰的德国地主先生說了这句气話后，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講台，在与会者的哄堂大笑声中赶紧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勃罗姆堡区的議員海奈先生想挽救同乡的荣誉，給委员会投了贊成票。同时他也忍不住責备波兰人伪善、欺騙等等。

**鮑姆施塔克**先生也是波兰的德国人，他仍然反对成立委员会。理由还是那些。

波兰人拒絕参加辯論。只有波克什夫尼茨基表示贊成成立委员会。大家知道，波兰人是早就坚持要調查的，可是現在才明白，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一切波兰的德国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反对这样做。

波勒先生是很少有的波兰人<sup>①</sup>，他把整个波兹南都划入德国的版图，而把德国和波兰的疆界叫做“分隔德国的一堵墙”。

拥护委员会的人一般发言都很冗长，而且不够明确。他们和反对委员会的人一样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老一套。他们的论据多半带有好辩的迂腐的性质，因而远不如波兰的德国人的偏颇誓言那样引人注目。

关于各部大臣和官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有名的资格问题，我们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8日

载于1848年7月9日

“新莱茵报”第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① 双关语：Pohle——姓，«Pole»——“波兰人”。——编者注

## 內閣危機

科倫 7 月 9 日。漢澤曼內閣非常頑強地使自己的壽命拖延了几天。特別是財政大臣太愛國了，他竟想把國庫交給沒有經驗的人來管理。從議會的角度來說，內閣已經瓦解了，但是實際上它還繼續存在。看來，桑蘇西已經決定設法使內閣再一次苟延殘喘。時刻準備給內閣以致命打擊的妥協議會立刻就驚恐起來，害怕自己的意圖，但是這個議會的大多數顯然都在猜想，如果說漢澤曼內閣還不是合乎他們心意的內閣，那末合乎他們心意的內閣將同時是危機的內閣和收場的內閣。因此，議會動搖了，不能貫徹到底了，玩弄鬼把戲和突然後悔了。而辦事內閣卻以儼然自若的、几乎是恬不知耻的冷淡態度接受了這種作為恩惠賜予的、時時刻刻都成問題的生活，接受了這種含垢忍辱的、僅僅靠弱者的施舍來維持的生活。

杜沙特爾！杜沙特爾！這個內閣拚命拖延了几天的不可避免的結局將和它的存在一樣可耻。判斷這種存在的補充材料，讀者可以在本報今天的一篇文章中找到，這篇文章是我們駐柏林的署名井的記者寫的。我們可以用幾句話來概括 7 月 7 日的妥協會議。妥協會議嘲笑漢澤曼<sup>①</sup>內閣，它把內閣打得半敗才滿意；內閣又好

① 雙關語：Hansemann——姓，«hänseln»——“嘲笑”。——編者注

笑又好气地低下了头；在告别的时候，崇高的議会在它后面喊道：“你們可別見怪！”无动于衷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汉澤曼-屈韦特尔-米尔德喃喃地回答說：«Pas si bête! Pas si bête!»〔“我們并不那么愚蠢！我們并不那么愚蠢！”〕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7月9日

載于1848年7月10日

“新萊茵报”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7月4日的妥协会議

(第二篇論文)

科倫 7月9日。任命一个全权調查委員會是公正地对待波兰人的一种十分必要而又刻不容緩的行动，这一点从3天以前我們便已登載的那些根据正式文件写出的报道<sup>135</sup>中可以看得出来。

明目张胆地敌視波兰人的旧普魯士官員們，把允許改組看成是对他們的生存的威胁。只要对波兰人稍微公正一点，他們就認為是一种危险。因此，他們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狂怒。他們在橫行霸道的士兵的支持下，疯狂地攻击波兰人，撕毀条約，凌辱安分守己的公民，慫恿或認可最卑鄙的行动；这样做只会引起波兰人的发动，而由于力量太悬殊，这种发动无疑会遭到镇压。

康普豪森內閣不仅是一个軟弱无能、耳目閉塞的內閣，而且是一个存心毫无作为的內閣，它对于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聞所未聞的野蛮行为不断发生，但康普豪森先生却不聞不問。

关于波茲南內战我們有些什么样的报道呢？

一方面是战争罪犯們（文武官員們）的偏私徇情的报道，以及內閣根据他們的話所提供的材料。在汉澤曼先生任期内，內閣本身也是当事人一方。这些材料是偏私的，但却是官方的。

另一方面是波兰人所搜集的事实，他們对內閣的控訴，特别是大主教普什魯斯基給各位大臣的信件。这些材料在大部分場合下

都不是官方的，但提供这些材料的人是力求揭示真相的。

这两类报道根本是互相矛盾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查明真理在哪一方面。

要做到这一点，委员会只有亲自出馬（少数情况除外）到現場去，根据見証人的口供至少把最重要的事实弄清楚。如果有人禁止委员会这样做，那末它的全部活动就会带有空想的性質，因为，它也許能够进行一些历史文献的考查工作，辨別这些或那些报道的可靠程度，但是它什么問題也不能解决。

委员会的全部作用取决于它是否有权訊問見証人，正因为这一点，議會里仇恨波兰人的人們都力图用种种周密考虑的詭辯来阻碍它这样做；这也說明了为什么在會議結束时发生了政变。

議員布洛姆在7月4日辯論时說道：

“如果象某些修正案所說的那樣，真相要到政府的報告中去尋找，難道這能說是力求弄清真相嗎？當然不能！政府報告的根據是什麼呢？大部分是官員們的報告。這些官員又是從哪里來的呢？他們是舊制度的產物。難道舊官員已經消失了嗎？難道代表人民意志的新縣長的選舉工作已經進行了嗎？根本沒有。官員們向我們報告過國內的實際情況嗎？舊官員現在所提出來的報告仍然和過去一樣。因此，毫無疑問，僅僅熟悉一下內閣的文件，會使我們一無所得。”

議員李希特爾更進一步。他把波茲南官員們的行為看成僅僅是保存舊的管理制度和舊官員的一種最突出而必不可免的結果。舊官員的職務和利益之間的這種沖突，在別省的省里也是會每天發生的。

“自從革命以後，我們獲得了新的內閣，現在，甚至也有了第二個內閣。但是內閣僅僅是靈魂，它應該在各處設立劃一的機構。而在各個省里，到處都原封未動地保留着舊的管理制度。你們願意讓我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嗎？

比如說：新酒不能裝入發霉的舊囊。這也就是在大公國里發出強烈的控訴的原因。難道我們不應該根據這一點任命一個委員會來查明，無論是在波茲南還是在別的省里，以更合乎時代和環境的新制度來代替舊制度是多麼必要嗎？”

議員李希特爾是對的。革命以後撤換全部文武官員和一部分法官，特別是檢察官，這是一件首要的事情。否則，中央政權的最好的創議都會因為下級官員的抗拒而破產。法國臨時政府和康普豪森內閣的軟弱，都在这方面帶來了最可悲的後果。

在普魯士，無論是在軍事方面還是在行政方面，組織得很好的官僚等級制度的絕對權力 40 年來一直占統治地位；在普魯士，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在 3 月 19 日已經敗北）正是官僚制度。因此，普魯士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徹底更換文武官員。但是，調停內閣的使命自然不是實現革命的要求。它所理解的使命就是無所事事，因此，直到現在為止，它還是把實際的權力置於自己的舊敵——官僚之手。在舊的官僚制度和新的秩序之間，它以“調停人”的身分出現。但是在它給官僚制度進行“調停”時，卻面臨着波茲南內戰，它必須對三十年戰爭以來尚未見過的殘酷行為負責。

康普豪森內閣的繼承人漢澤曼內閣，必須繼承它的遺囑人的全部資產和債務，也就是說，它不僅繼承議會里的多數，而且繼承波茲南的事件和波茲南的官員們。因此，內閣所迫切關心的是如何使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盡量空虛一些。內閣多數派的發言人，首先是法學家們，竭盡詭辯和狡黠的能事來尋找一些周密考慮的重大理由，使委員會不能訊問見證人。如果我們在這裡對賴辛施佩格之流的法律遁辭贊美一番，那未免扯得太遠了。我們只需要研究一下屈韋特爾大臣先生的詳細發言。



屈韦特尔先生完全撇开問題的实质，一开始便声称，假如这类委员会能够以查明情况等等的方式使內閣減輕它所担負的复杂任务，內閣該多么高兴。是的，即使罗伊特先生不提出成立这种委员会的好主意，毫无疑问，屈韦特尔先生本人也会坚决主张这一点的。应当尽量給予委员会以更广泛的任务（为的是使它不能胜任！）；在这个問題上表現畏縮和犹豫是不恰当的，他完全同意这一点。委员会的活动应当涉及波茲南省的过去、現在和将来；既然問題只在于查明情况，內閣就不要胆怯地限制委员会的权限。当然，这样一来，人們也許会把事情扯得太远，但他相信委员会会明智地解决这样一个問題，比如說，它应不應該把波茲南官員的免职問題也包括在它的活动范围以內。

这就是大臣先生最初的讓步，这些讓步被相当分量的漂亮話所渲染，并且博得了热烈的“好啊”的喝采声。然而接着就是各种各样的“但是”。

“但是，既然这里有人說，关于波茲南的报告絲毫不能闡明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些报告全是来自官員，而且还是来自旧时的官員，那末，我認为我有責任来維護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假使真的有某些官員没有忠于职守，那就應該懲罰玩忽职守的个別人員，而不應該因为个別人員的失职而貶低整个官員阶层。”

屈韦特尔先生真勇敢！毫无疑问，失职的个别情况是有的，但是整个說来，官員們是光荣地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事实上，波茲南的官員們絕大多数都尽了自己的“职责”，即“对就职誓言尽了职责”，对整个旧普魯士的官僚制度尽了职责，对这个职责所带来的私人利益尽了职责。他們在尽自己的职责时根本不择手段，只要能在波茲南消灭3月19日的后果就行。正因为

这样，屈韦特尔先生，您的“职责”就在于撤换所有这些官员！

屈韦特尔先生所谈的是由革命以前的法律规定下来的那种职责，而现在所谈的完全是另一种职责，即每次革命后出现的那种职责，它的任务在于正确了解已经改变的情况并促进其发展。要求官员们改变陈旧的官僚主义的立场而转到新的立宪的立场上来，要求他们也象新任大臣一样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照屈韦特尔先生的说法，这就是贬低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

屈韦特尔先生也拒绝了一般的谴责，例如说祸首们受到庇护，罪行没有受到惩罚。他要求拿出确凿的事实来。

难道屈韦特尔先生真敢断定，普鲁士军阀在官员们的支持和同意下，在波兰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赞许下所犯下的任何一件暴行和残酷行为都已受到惩罚了吗？屈韦特尔先生说，现在他还未能全面地熟悉大量的资料。实际上，他显然是极端片面地熟悉了它们的。

现在，屈韦特尔先生接触到了“最棘手和最复杂的问题”，即委员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的问题。屈韦特尔先生希望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正象所指出的，它的基础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关于 *droit d'enquête* [调查权] 的问题”。

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后来屈韦特尔先生详尽地阐述了国家中的分权问题，这对于出席议会上的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来说，大概有许多新的东西吧。听来令人可笑的是，普鲁士大臣（而且还是“办事大臣”）竟在公元 1848 年的夏天庄重而严肃地在讲台上阐述孟德斯鸠的观点。

屈韦特尔先生和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

为了簡化和監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象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一样，这个原則只是在它符合于現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例如，在君主立宪政体中，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錯在国王身上；其次，在議院里，立法权是和对行政权的監督交錯在一起的等等。关于在一个国家里分工方面的这些必要的限制，在我們的“办事大臣”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口中得到了如下的說明：

“既然立法权是由人民代議制行使的，那末它就有自己的机构；行政权也象审判权一样，也有自己的机构。因此(!)，假如沒有专门法律的授权，一种权力直接利用另一种权力的机构是不可容忍的。”

“假如”沒有“专门法律”的指示，抛弃分权原則是不可容忍的！反之，“假如”沒有“专门法律”的指示，使用分权原則同样是不可容忍的！多么周密的考虑！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至于在革命时期不經任何“专门法律”就停止分权的問題，屈韦特尔先生却只字未提。

接着，屈韦特尔先生又不厌其烦地說，如果賦予委员会以在見証人发誓下訊問見証人的权利，如果委员会有权要求官員們提供情报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如果賦予委员会以亲眼看到一切的权利，那就是破坏分权原則，因而必須由专门的法律来决定。他举出比利时的宪法做例子，該宪法第40条特別賦予議院以 *droit d'enquête* [調查权]。

但是，屈韦特尔先生，根据法律規定，难道普魯士真的存在着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分权嗎？現存的分权难道不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适应絕對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分权嗎？所以，当这种分权还没有用宪法的精神加以改造的时候，怎

么能够把宪法的概念运用到这种分权上去呢？当宪法本身都还不存在的时候，普鲁士怎么能有这种宪法的第 40 条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照屈韦特尔先生的说法，任命一个全权委员会就是破坏宪法的分权。然而，在普鲁士还根本没有宪法的分权，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破坏。

但是，这种分权也必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暂时的革命秩序里实行，因而照屈韦特尔先生的看法，它应当算是已经存在的。如果屈韦特尔先生是对的，那末宪法上的例外也应该被认为是存在的了。而立法机关进行调查的权利恰恰也属于这种宪法上的例外！

但是屈韦特尔先生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暂时的革命秩序正是在于，分权暂时被废除了，立法机关暂时攫取了行政权或者行政机关攫取了立法权。革命的专政（不管它是通过怎样软弱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它仍然是专政）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还是掌握在议会的手里，或是掌握在这两者的手里，——这都无关紧要。如果屈韦特尔先生对这三种实例都感兴趣的话，那末这样的例子在 1789 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上是很多的。

屈韦特尔先生所求助的那个暂时的秩序，恰巧证明是反对他的。这个秩序承认议会除了有调查权以外，还有其他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力。它甚至授权议会在必要的时候变为审判庭，不经任何法律就可以做出判决！

如果屈韦特尔先生早就预见到这样的后果，他在“承认革命”的时候或许会慎重一些。然而请他放心吧：

德国是个安静的育儿所，  
它不是凶手的巢穴，<sup>136</sup>

妥协派先生们尽可以随意开会，他们的议会决不会成为“长期国

会”。

不过，如果把这位办事內閣的空談家官員拿来和他的空談方面的先驅康普豪森先生比較一下，我們仍然可以在他們之間找到重大的差別。康普豪森先生無論如何有更多的独特性，他身上有些东西是从基佐那里承受过来的；而屈韦特尔先生甚至还不能超过矮小的約翰·罗素勋爵。

我們对屈韦特尔先生演說中的国家哲学的深奥已經頌揚得够多了。現在我們来探討一下这个发霉的智慧，即孟德斯鳩关于分权的整套理論的目的，探討一下它的真正的实际基础。

現在，屈韦特尔先生恰好要从他自己的理論中得出結論。內閣以例外的形式同意命令官員們去完成委员会所需要的东西。但內閣不能同意直接由委员会来指示官員。

換句話說，和官員們沒有直接联系的委员会沒有任何高出官員們的权力，因而不能迫使官員們提供他們所不願賜与的情报。加以处理公文非常迟緩，无止境的逐級旅行！在分权的幌子下把委员会变成一付不折不扣的空架子，好高明的手段！

“把政府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委托給委员会来解决，这根本就談不上。”

似乎有人曾建議授予委员会以**管理权**！

“政府同委员会一样，應該繼續設法查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波茲南的糾紛（正是由于政府长期在查明而什么也沒有查明，所以現在有足够的理由根本不要它参与此事）<sup>①</sup>，因为同一个目的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达到，所以往往难免要白費時間和精力，而且也很难避免发生冲突。”

根据过去的例子判断，如果委员会接受屈韦特尔先生的建議，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走上无止境地逐級旅行的道路，那末它無疑是“要白費許多時間和精力的”。如果委員會能直接和官員們聯系，而且就地查明誤會并克服官僚主義的阻礙，那末就不會象走前一條道路那樣容易發生衝突。

“所以(!)很自然，委員會力求在內閣的贊同和經常參與下達到目的。”

更妙！委員會必須在內閣的贊同和經常參與下來監督內閣！屈韋特爾先生毫不羞恥地暴露了他是如何指望把委員會置于他的監督之下，而不是把他置于委員會的監督之下。

“如果委員會希望居于一個獨特的地位，那就發生了一個疑問：在這種情形下，它是不是能夠而且願意擔當內閣所承擔的責任。這裡已經如此公正如此聰明地指出，議員們的不可侵犯性是和這種責任不能相容的。”

但是，這裡所說的不是管理，而僅僅是查明事實。委員會必須得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使用必要手段的權利。仅此而已。當然，無論是這種手段運用得不足或是運用得過於廣泛，委員會都必須對議會負責。

所有這一切既和內閣的責任與議員的不可侵犯性很少關係，也和“公正”與“聰明”很少關係。

總之，在分權的借口下，屈韋特爾先生堅持請求妥協派接受這些建議來解決衝突，但他本人在這時連一個明確的建議也沒有提出來。辦事內閣感到自己的根基不穩固了。

以後的辯論我們不能再作詳盡的闡述了。投票的結果已經揭曉：政府在記名投票時遭到失敗，右派實行了政變，後來他們通過了一個已被否決的提案。關於這一切我們都已報道過了。我們只補充一點：在投票反對委員會擁有無限權能的萊茵省議員之中，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下面這些名字：

---

阿倫茨(法学博士), 鮑尔班特, 弗倫肯, 倫辛, 馮·洛埃, 賴辛施佩格第二, 西蒙斯, 以及按次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排在最后一位的、我們的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11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41号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

科倫 7 月 10 日。昨天本报的 11 个排字工人和克劳特先生接到命令，要他们在星期二（7 月 11 日）到预审推事那里去作证。事情仍然是关于查明被指控的文章<sup>①</sup>的作者。记得在旧“萊茵报”<sup>137</sup>时期，在書报检查和阿尔宁内閣时期，当局为偵察轟动一时的“婚姻法草案”<sup>138</sup>一文的投稿人，既沒有进行过搜查，也沒有审問过排字工人和印刷所的老板。从那时以来，我們经历了一次革命，不幸的是，它已为汉澤曼先生所承認。

我們應該再来談談国家檢察官黑克尔先生 7 月 5 日的“反駁”<sup>②</sup>。

黑克尔先生在这个反駁中責备我們，說我們加在他身上的各种意見都是謊言。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出材料来对这个修正案加以修正，但是誰能保証，在这場力量不均的斗争中，別人不再引用刑法典第 222 条或 367 条来报复我們呢？

黑克尔先生的反駁是以这样的話結束的：

“該文(发文日期是科倫 7 月 4 日)<sup>③</sup>对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先生和执行逮捕的宪兵的誣蔑性的攻击和侮辱，将在法庭审讯該案时得到应有的評判。”

① 見本卷第 190—193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202 頁。——編者注

③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应有的評判！难道在康普茨任大臣时期黑紅黄色曾在“法庭审讯”中得到了应有的“評判”嗎？<sup>139</sup>**

我們来查閱一下刑法典。看一看第 367 条：

“凡在公共場所，或在合法的正式的文件中，或在已刊印或未刊印的文章中（只要这些文章已經張貼、出售或分发）指責某人做过会受到刑法或违警法的追究，或至少也会引起公民对他的輕視或憎恨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屬实，提出这个指責的人也算犯了誣蔑罪。”

第 370 条 “如果控告所根据的事实按照法定手續查明是确实的，那末原告就不应受任何懲罰。只有根据法庭的判決或其他合法的文件提出来的东西，才算是合法的証据。”

为了說明这一条，我們再引証一下第 368 条：

“据此，原告要求給予机会提出証据为自己辯护的請求将不予考虑；原告也不得借口文件或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借口引起控告的指責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或者是他从外国报纸和其他刊物上抄来的等等为自己开脫”<sup>①</sup>。

帝国时代及其整个精細的专制制度都在这些条文中反映出来了。

根据一般人的理智，說一个人遭到誣蔑，就是指他受到別人莫須有的指責；但是根据刑法典的特殊理智，說一个人遭到誣蔑，是指別人指出了他确实犯过的而且能够加以証明的錯誤，不过在証明时用的不是唯一被承認的方法，即法庭的判決或正式的文件。法庭的判決和正式的文件真有奇异的力量！只有法庭确定的事实，只有正式用文件証明了的事实才算真正实在的事实。过去曾經有过如此粗暴地誣蔑一般人的理智的法典嗎？官僚机构曾經在自己和公众之間建立过一座象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的长城嗎？在

<sup>①</sup>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这一条文的保护下，官員們和代表們也和立宪君主一样**不可侵犯**了。这些先生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那些“引起公民對他們輕視和憎恨”的事情，但是你要想不被剝奪公民权、不被監禁和罰款，就决不能談論、記述和发表这些事情。受第 367、368 和 370 条束縛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万岁！別人把你非法地監禁在獄中。报刊揭露了这种不法行为。結果：在“法庭审讯”“誣蔑”那位有不法行为的可敬的官員的案件时，这次揭露便得到应有的“評判”，——竟有这样的奇迹：今天才发生的不法行为，昨天法庭已作了**判決**。

萊茵省的法学家，包括**人民代表茨魏費尔**在內，投票反对拥有无限权能的**波兰委员会**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些法学家看来，对波兰人的判決應該是剝奪公民权、監禁和罰款，因為他們“誣蔑”科隆布、施泰因埃克尔、希尔什菲尔德、施来尼茨、国防綫上的波美拉尼亚士兵和旧普魯士的宪兵。这样也許就会妥善地在波茲南实现和平。

根据刑法典这几条的規定，把关于要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sup>①</sup>的傳聞叫做**誣蔑**，真是荒唐！似乎用刑法典第 367、368 和 370 条来对付政治演說和著作并不是实际上最后地取消 3 月 19 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由！沒有言論自由，俱乐部成了什么东西呢？有了刑法典第 367、368 和 370 条，言論自由又成了什么呢？沒有俱乐部和言論自由，3 月 19 日革命的成果又成了什么呢？难道压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实际上不就是最令人信服地証明了，只有**誣蔑者**才能空談做这种事情的**意图**嗎？在昨天拟定的居尔策尼希宣言<sup>140</sup>上签名要多加

① 見本卷第 192 頁。——編者注

小心。检察机关开始“审讯”你们“诬蔑”汉澤曼-奥尔斯瓦特的案件时，就会给你们们的宣言以“应有的评判”；难道只有“诬蔑”（就法国刑法典这个用碑铭体写成的政治奴隶制法典而言）各部大臣才不受处罚吗？难道我们这里有負責任的各部大臣和不負責任的宪兵吗？

可見，問題不在于可以用关于“法律意义上的诬蔑”的条文，即关于违背常人的理智擅自捏造的诬蔑的条文，使报上被指控的文章得到应有的评判。至于說这里能找到应有的评判，这只能是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反革命势力已达到的发展程度，是官僚机构动用旧法律武庫中残存的武器来反对新的政治生活的极恶劣的行径。把关于诬蔑的条文用来对付对人民代表的攻击——真是个巧妙的方法，它可以使这些先生免受抨击，使报刊不经过陪审法庭的审讯！

我們現在从控告诬蔑轉来談談控告侮辱。我們看一看第 222 条，这一条說：

“如果行政机关或法院部門的一个或几个負責人員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任何言語上的侮辱，使他們的名譽或良好品德受到損失，侮辱他們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

在“新莱茵报”发表被指控的文章时，茨魏費尔先生是在柏林执行人民代表的职务，而决不是在科倫执行法院負責人的职务。因为他沒有执行任何本职职务，所以事实上他不可能在执行职务时或因执行这些职务而受到侮辱。而宪兵先生們的名譽和良好品德只有在它們受到言語上的 (par parole) 侮辱时才能得到这一条的保护。我們是写，而不是說，par écrit [文字上] 并不是 par parole [言語上]。那末，还有什么可說的呢？教訓在于議論最小的宪兵

比議論最大的公爵更要小心，特別是不敢触犯检察机关的极易发怒的先生們。我們再一次請讀者注意：在科倫、杜塞尔多夫、科布倫茨等地同时发生了同样的审判案。多么奇怪，一連串的偶然事件！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7月10日

載于1848年7月11日

“新萊茵报”第4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 最近发生的事件

科倫 7 月 11 日。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吼声，“新莱茵报”还是首先起来替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辩护。首先我们揭破了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这种政策由于它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就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轉移人們的視線，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为了这种目的，它挑起了自私自利的、与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并且在各民族之间的空前残酷和无比野蛮的战争中建立了一种甚至在三十年战争中都没有过的黷武主义。

正当德国人为了争取国内自由而同本国的各邦政府展开斗争的时候，却迫使他們就在这些政府的統率下从事十字軍討伐，去反对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自由。多么阴险狡猾的勾当！多么荒誕的历史奇聞！被革命风潮所席卷的德国想在外边寻找出路，即在为复辟而进行的战争中、在为巩固旧政权（而德国的革命恰好是反对这个旧政权的）的进军中寻找出路。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象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鎖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鮮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

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

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材料公布得愈多，事实就愈加有力地证实我們对于德国用以污辱自己新紀元的各民族之間的战争的觀點是正确的。为了說明我們对于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我們引証布拉格一个德国人所写的一篇迟到的报道：

布拉格 1848 年 6 月 24 日(投递就誤)

“德意志总汇报”登載了写于本月 18 日的一篇关于德国人这一天在奥西格<sup>①</sup>举行會議的文章。在这个會議上发表了許多演說，这些演說对于最近在我們这里发生的事件毫无理解，說得客气一点，是决心污辱我們的独立报纸，因此，評論員認为自己有责任来澄清这种錯誤的認識，并且为了坚决捍卫真理，挺身而出反对那些認識錯誤的人和心怀恶意的人，而这样做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是，人們象“德国人东方利益保卫同盟的創始人”一样，都向大会建議：“当斗争还在布拉格繼續进行的时候，根本談不到赦免，如果我們获得胜利，那末将来就應該利用这个胜利。”德国人究竟获得了什么胜利，粉碎了什么阴谋呢？自然，誰要是相信“德意志总汇报”的記者(显然是消息老是不很灵通的記者)，或者相信“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小征服者”的动人詞句，或者相信在巴登事件时唆使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現在又唆使德国人反对捷克人的背信弃义的“法兰克福报”的文章，誰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里的情况。显然，在德国到处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認為在布拉格街上进行的斗争仅仅是为了压迫居民中的德国人和为了建立斯拉夫共和国。关于后者我們不准备去談，因为这种看法太幼稚了。至于前者，那末，在进行街垒战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这是民族之間的竞争；德国人和捷克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样准备自卫，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請說捷克話的人把他所講的东西譯成德国話，而每一次請求从来没有遭到拒絕。据說，革命比預定日期提前两天爆发了；如果是这样，那总得有某种組織，或至少总該有弹药儲备，但实际上一无所有。凡是聚集有 10 到 12 个人的地方，街垒会突然就地而生。而且街垒多得再也无处构筑了，因为連最小的巷里也有三四处街垒。弹药按街道分配，数量很有限。当时不要說最高統帥，就是連一般的指揮也談不到。

① 捷克人称为烏斯提。——編者注

敌人从哪里向街垒的捍卫者进攻，他们就在那里作战，他们从房屋内、从街垒里毫无领导、毫无指挥地进行射击。根据这种无组织和无领导地进行抵抗的情况来看，根本谈不到什么阴谋，这无非是官方声明和调查报告中所散布的一种说法罢了。政府本身大概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宫廷没有发表能够向布拉格解释流血的六月事件的任何东西。被捕获的同盟会会员几乎已被全部释放；其余的俘虏也将被释放，只有布科阿伯爵、维拉尼和其他一些人仍被监禁着。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布拉格的墙壁上看到说明这一切仅仅是误会的告示。指挥官将军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说明这是为了必须保卫德国人免受捷克人的压迫。因为他不是用解释事件的方法把德国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是夺取街垒和保护城内“忠实的”居民的生命财产，而是扫荡旧城，转向莫尔达瓦河<sup>①</sup>左岸并向德国人和捷克人射击，因为落到旧城的炮弹和枪弹是不会专门寻找捷克人的，而是同样地杀伤一切人，不管他戴的是什么帽徽。冷静地考虑一下：如果政府直到现在还不愿意或者不能提出任何说明，那末，究竟有什么根据认为斯拉夫人在搞阴谋呢？

莱比锡的公民格申博士给冯·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写了一封谢函。但是这位将军不该赋予这封谢函以特别的意义，同时也不该把它看做民族情感的表现。公民格申是那些在二月事件之后突然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小心谨慎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曾写信表示在选举法问题上相信萨克森政府，而整个萨克森却对这个选举法一致表示愤怒，因为它的 $\frac{1}{6}$ 的居民，其中恰恰包括最有才能的人在内，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利——选举权。他是那些在“德国人协会”中坚决反对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参加萨克森选举的一个，而在（请注意这人是多么伪善！）此后不久，他又代表自己的俱乐部答应全力协助居住在萨克森的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协会选举自己的议员到法兰克福去。简单地讲，仅仅他是“德国人协会”的创始人这样一个事实，就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人给奥地利的将军寄了一封谢函，感谢他捍卫了所有德国人的祖国！我希望我在前面所讲的已足以说明，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还根本不能判定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至今对德国人的祖国的功勋究竟有多大。只有调查的结果才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要让历史去判定将军的“崇高的勇气、大胆的活动、坚毅的精神”。至于公爵夫人是被人“卑鄙地杀

<sup>①</sup> 即弗尔塔瓦河。——编者注

害”的說法，我只想指出，現在還完全不能證明受到整個布拉格一致尊敬的公爵夫人是被人謀殺的。如果這的確是事實，那末凶手也難逃法網，而公爵的悲哀大概也不會比那位看見自己的女兒身遭慘死的母親的悲哀更為深痛；她的19歲的女兒（也是一個無辜的犧牲者）的腦袋被打碎，屍體被拖走。謝函中說“勇敢的軍隊在您的指揮下多么英勇善戰”，我完全同意格申先生的這些詞句；但是如果他象我一樣親眼看到這些“勇敢的軍隊”星期一中午在策耳特涅加斯街怎樣氣勢洶洶地向毫無防禦的人群攻擊，他就會覺得這些詞句是太軟弱無力了。至於我，那末不管對於我的軍人的自尊心說來是多么沉重，我也必須承認，當我在大教堂附近在婦女和小孩們中間安然散步的時候，我就同他們一起當着三四十個皇家擲彈兵的面逃跑了，而且跑得那麼倉卒，以致我的全部行李，即我的一頂帽子，也落到了勝利者的手裡，因為我覺得當時是刻不容緩的，不然後面的炮彈就會象雨點般向我射來。但是，只是在6小時以後，我才看到那些皇家擲彈兵用霰彈和6磅重的炮彈向策耳特涅加斯街上最多只有20人守衛着的街壘轟擊了半小時，雖然如此，他們卻沒有立刻攻下街壘，直到午夜，守衛者才放棄了它。除了擲彈兵占優勢的個別場合外，一般沒有發生白刃戰。按房屋破壞的情況來看，格拉本街和新林蔭路主要受到了炮兵的掃蕩，於是我要問，為了用霰彈來掃蕩由百十個幾乎沒有武裝的人守衛着的寬闊街道，用得着什麼特別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呢？

特普利茨<sup>①</sup>的斯特拉達爾博士先生在他的最後發言中說：“布拉格的報紙為別人的利益而服務”（可以想象，這裡指的是俄國人的利益）<sup>②</sup>，我要代表獨立的布拉格報刊聲明：這種說法不是非常愚蠢無知，就是卑鄙的誣蔑。我們的報紙的立場已經充分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這種誣蔑是極端荒謬的。除了捍衛波希米亞的獨立和維護兩個民族的平等權利之外，自由的布拉格報刊從來沒有其他的意圖。但是，它非常清楚，德國反動派無論在波茲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圖使利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復活，其目的的一部分是為了鎮壓德國內部的革命，一部分是為了培養黷武主義以準備內戰。

寫於1848年7月11日

載於1848年7月12日

“新萊茵報”第42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① 即特普利茨。——編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作者的。——譯者注



## 7月7日的妥协辯論

科倫 7月12日。我們在昨天晚上才接到7月7日的妥协会議的記錄。平常我們接到速記記錄只比書面報道遲 24 小时。現在，收到記錄的時間不僅沒有提早，反而更遲了。

改变这种緩慢状态是很容易的，法国和英国的報紙報道它們立法議會消息的速度就可以証明。英国議會开会經常开到早晨 4 点鐘，可是 4 小时以后會議的速記記錄就刊登在“泰晤士報”上，傳遍倫敦的每个角落。法国議會往往要到下午一点鐘才开会，到五六点鐘才結束，可是到晚上 7 点鐘，“总匯通报”就已把會議速記記錄的版样送到巴黎各報的編輯部了。为什么可敬的“国家通报”不能以这种速度进行工作呢？

我們还是來談談 7月7日的會議，在这次会上汉澤曼內閣受到不少惡意的譏諷。我們且不談會議一开始就提出來的許多抗議，且不談德斯特尔关于取消 7月4日會議快結束时所通过的決議的提案（这个提案还依然留在議程上），也不談列入議程的其他許多提案。我們只想談談今天猛烈地攻击內閣的一些質問和令人不快的提案。

菲力浦斯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質問內閣，我們采取了什么措施來保卫我国边境以防御俄国的侵略？

奧尔斯瓦特先生：我認为在議会的这次會議上回答這個問題

是不适宜的。

我們非常願意相信奧爾斯瓦特先生。他能給我們的唯一答复是：沒有什麼措施，或者更确切些說，从德俄边境調了好几团人到萊茵。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議会对奧爾斯瓦特先生的这种可笑的答复却无动于衷，对他引用 *car tel est notre bon plaisir* [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利] 的話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只有几个議員对它“嘘”了几声，另外几个議員喊了几声“好”。

博里斯先生提議在 1848 年下半年取消下层納稅人的等級稅，并且立即取消为强制征收他們上半年的欠稅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提案被提交給专门委员会。

汉澤曼先生起来声明說：这类財政問題必須經過非常慎重的討論。而且完全有理由来等待討論這個問題，尤其是他在下星期就要把一系列有关財政問題的法案(其中也包括等級稅的法案)提出来討論。

克勞澤先生向財政大臣提出質問：能不能在 1849 年年初以前以所得稅代替磨粉稅、屠宰稅和等級稅？

汉澤曼先生不得不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解釋道：他已經說过，下星期就要把財政方面的法案提出来討論。

然而，汉澤曼先生还没有历尽艰辛和困苦。接着格雷貝尔先生起来提出一个冗长的提案，提案的每一个字都击中汉澤曼先生的要害：

只是把国庫和財政枯竭当做发行强制公債的理由無論如何是不够充分的；

要討論强制公債（格雷貝尔先生表示在实现一切諾言的宪法未通过以前，他反对发行强制公債）問題，就必须审查財政管理方

面的一切賬簿和文件，因此，格雷貝尔先生提議：

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查 1840 年以来財政和国庫管理方面的全部賬簿和文件，并且就此提出报告。

然而，格雷貝尔先生所列举的理由比他的提案还要糟。他談到許多聳人听聞的关于非法使用和揮霍国庫資金的傳聞；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要求有关方面提出关于 30 年和平时期里取之于民的一切款項的开支情况的报告；他說：在这个問題沒有得到解释以前，大会不能表决一文錢。强制公債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强制公債是对以前整个財政管理部門的最后宣判，强制公債是国家破产的前奏。强制公債还产生了特別令人惊奇的印象，因为我們过去总是听說，財政状况很好，即使在严重的战争时期国庫也不需要我們发行公債等等。其实，汉澤曼先生自己在联合議會里就計算过：庫存至少应有 3 000 万。这也是很可能的。因为象在战时那样的重稅不仅还在繼續繳納，而且其总額也在不断增加。

提議发行强制公債的消息一传播出来，一切信任就随着这种痛苦的絕望立刻变为泡影了。

恢复这种信任的唯一办法，是馬上完全真实地說明国家的財政状况。

虽然汉澤曼先生在說明强制公債的时候，試圖用种种幽默的言詞来和緩空气，但是他毕竟不得不承認，强制公債将造成不良的印象。

汉澤曼先生回答道：內閣既然要求款項，它自然要对过去的开支状况作一切必要的說明。但是在我已經提过两次的財政法案即将提交討論的时候，应当等一等。至于傳說国庫尚有巨額庫存（近几年来已不断减少），那是不可靠的。在最近这些艰难的年份里，

在由于商业的空前停滞而造成的目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最好的财政状况也会陷入困境，这是十分自然的。

“这里有人说：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的前奏。不，诸位先生，它不应当是破产的前奏，相反，公债应当使信用恢复过来。”

**（应当！应当！** 仿佛强制公债对信用的影响是取决于汉澤曼先生的善良愿望！）从国家证券行市的上涨就可以证明，这样的忧虑是多么没有根据。诸位先生，请等待财政法案的颁布吧，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向诸位保证了。

（可见普鲁士国家的信用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贷款给它，哪怕出最高的利息。于是汉澤曼先生除了采用这个使国家破产的最后一着，即发行强制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汉澤曼先生还说国家的信用提高了，因为自从3月18日以来，国家证券的价格勉强上升了2—3%！如果真正把强制公债发行出来，这些证券还不知会怎样跌价呢！）

**貝恩施先生**坚持要任命一个前已提出的财政检查委员会。

**施拉姆先生**：国家赈济贫民的拨款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说自由需要我們出钱，那末到现在为止政府从未为它破费分文。相反，政府宁愿花钱来使自由不要扩展到我們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

**梅策先生**：国库空虚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实。此外，我們现在还听说，国库早就分文无存了。这个消息更加证明有任命一个委员会的必要。

**汉澤曼先生**不得不又站起来声明：

“我从来没有说过国库里现在没有分文或者它早已分文无存；相反，我曾经说，在最近六七年以来，国库是大大地充实了。”

（如果把汉澤曼先生的这个声明和他给联合议会的报告、御前

演說對照一下，很難了解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采什科夫斯基：**“我贊成格雷貝爾的意見，因為漢澤曼先生總是只給我們許下諾言，每當會議提出財政問題的時候，他就說他即將作解釋，而這種解釋他却從來沒有作過。這種拖延態度之所以更使人感到奇怪，是因為漢澤曼先生就任大臣已經3個多月了”。

商業大臣米爾德先生最後出來幫助他的陷於窘境的同事。他請求議會還是不要任命委員會。他答應內閣方面要表示最大的坦率。他請大家仔細地研究一下既成的局面。但現在必須支持政府，因為政府目前正是要把國家這隻大船從現在擱淺的窘境中拖出來。國民議會無疑會伸出援助的手。（好啊）

**鮑姆施塔克**先生也想給漢澤曼先生以可能的援助。然而財政大臣恐怕很難找到比他更笨拙、更不機智的辯護士：

“想掩飾財政實況的財政大臣，是一個壞財政大臣。如果某個財政大臣說，他將作應有的解釋，我們就應當認為他也許是個正直的人，也許相反！！（全場活躍）諸位先生，我從沒有侮辱過誰，我是說：如果某個，而不是說：如果這位財政大臣！！！”

**賴辛巴赫：**這些高談原則和信任問題的大辯論的美好日子在哪裡呢？當初，漢澤曼先生急欲衝鋒陷陣，可是現在，這種機會來了，而且又涉及到他本人的主管機關，他却迴避了！的確，大臣們許下無數的諾言，提出種種原則，只不過是為了在幾小時後就把它們推翻罷了。（全場活躍）

漢澤曼先生等人起來替他辯護。然而，沒有人這樣做。最後，他驚恐地看到鮑姆施塔克議員站了起來，於是他自己趕快搶先發言，不讓鮑姆施塔克再一次說他是個“正直的人”。

你們是不是要等憤怒的、被諷刺和一切反對意見所折磨的獅

子—杜沙特尔最后显出他全部的威力，駁得他的敌手体无完肤，簡言之，是不是等他提出信任問題呢？可惜，他以往的坚毅和勇气已經蕩然无存，从前的威严已經消声匿迹，犹如艰苦年头的国庫庫存一样！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垂头丧气的、受了屈辱的、不为人所承認的大財政学家。事情已經到了他不得不找理由来搪塞的地步，可是我的是什么样的理由啊！

“凡是搞过財政工作，在工作中和許多数字（!!）打交道的人都会知道：对于財政問題方面的任何質問都不可能立刻作出充分的解释；稅收問題非常复杂，在立法議会上也要辯論（汉澤曼先生使我們想起了他在上次联合議会上的出色演說）<sup>①</sup>許多天甚至一个星期。”

但是，难道有人要求充分的討論嗎？开始大家要求汉澤曼先生就稅收問題作簡單的答复：“是”或者“不是”；随后又請他同意任命一个审查过去国庫管理处的賬目的委员会；当他拒絕这两件事以后，大家才指出他現在的謹小慎微和他过去的种种諾言是正相抵触的。

正因为“解释在工作中会碰到許多数字的財政問題”需要時間，所以委员会应当馬上开始工作！

“不过，我没有事先提出財政問題，是有重要原因的。我認为，我稍微拖延一下，对全国的局势会有良好的影响；我希望国内局势稍事恢复平靜，国家的信用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我想，这种希望是不会落空的。我也相信，事先不提出这些法案来审查，这样做是对的。”

好一番剖白！原来汉澤曼先生的应该巩固国家信用的財政法案，却有破坏国家信用的危險！汉澤曼先生認为还是暫時保守国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家財政狀況的秘密为好！

国家处在这种情况下，汉澤曼先生不公开宣布財政狀況，不用事实来消除怀疑和謠言，反而不負責任地发表这种含糊其詞的声明。在英国国会里，如果发表这种不妥当的声明，立即就会提出不信任案。

**济貝尔特先生：**

“直到現在，我們还一事无成。当所有的重要問題刚要解决的时候，不是停止討論，就是擱置下来。直到現在，我們还没有通过一个完善的決議，我們还没有把任何一件事进行到底。今天，难道我們还要重蹈复轍，还要去相信諾言而把問題拖延下去嗎？誰能担保內閣还能再維持一个星期呢？”

帕里鳩斯先生提出了修正案，要求汉澤曼先生在14天內，把1840年以来有关財政和国庫管理方面的必要資料提交应当立即选出的16人組成的审查委员会。帕里鳩斯先生声明說，这是他的选民給他的特殊委托，因为他們都想知道，1840年还拥有4000余万的国庫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修正案比原提案还要尖銳，按理說它会使受尽折磨的杜沙特尔暴跳起来的。現在，大概該提出信任問題了吧？

恰恰相反！汉澤曼先生虽然反对提案，但是对这个修正案和它的侮辱性的、最后通牒式的期限的要求却毫无異議！他只是說，这件事需要很多的时间，并且对承担这种令人不快的工作的可怜的委員們表示同情。

接着，关于表决問題做了一些說明，同时对汉澤曼先生又指責了几句，随即进行表决。关于轉入議程的各种提案，不管是已說明理由的和未說明理由的，都遭到否决，得到格雷貝尔先生支持的帕里鳩斯的修正案，几乎一致通过。

汉澤曼先生只是因为沒有表示任何反抗，只是因为对帕里鳩斯的侮辱采取了克己的态度，才避免了彻底的失敗。他犹如一株片叶不存的光秃秃的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受人凌辱和摧殘，連嘲弄成性的人看了也会产生怜悯之心。我們想起了一位詩人的話：

日耳曼的子孙，  
絕不应用恶意的机智  
嘲弄落魄的大人先生！<sup>141</sup>

关于會議的后一半的情况明天再談。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2日

載于1848年7月14日

“新萊茵报”第4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福斯特曼先生論国家信用

科倫 7 月 13 日。福斯特曼先生在本月 7 日的妥协会議上发表演說，他用以下鉄一般的論据来消除放肆的左派对穩固的普魯士国家信用的怀疑：

“請你們自己判断，如果在昨天的交易所里，在貼現率为 5.5% 的条件下，利率为 3.5% 的国家証券是按票面額 72% 开的盘，那末对普魯士財政的信任是不是会降低到零！”

由此可見，福斯特曼先生对交易所的投机事业和政治經濟学一样无知。假如福斯特曼先生所提供的前提——国家証券的价格总是和貨幣的价格成反比——是可靠的，那末利率为 3.5% 的普魯士証券的境况的确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貼現率既为 5.5%，那末它們就不能按票面額 72% 开盘，而只能按  $63\frac{7}{11}\%$  了。但是有誰对福斯特曼先生說过，这种倒行的对比关系不是指 5—10 年期間的平均数而言，而是說每逢商业不景气的时候都有呢？

貨幣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該时期的供求关系、由現存貨幣的多少来决定的。貨幣的多少又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該时期的工业状况、由全部交换的停滯或繁荣来决定的。

国家証券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也是由各該时期的供

求关系来决定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许许多多（尤其是在德国）非常复杂的条件来决定的。

在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一切国家，它们的国家证券是在世界市場上流通的，因此国家信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普魯士和更小的德意志各邦，它们的证券只是在小規模的地方交易所里流通，所以国家信用只起次要的作用。在这里，大部分国家证券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活动，而是为了可靠地存放資本，保证证券占有者的固定收入。只有极少一部分证券投入交易所买卖。几乎全部国債都在小食利者、孤兒寡妇、监护院等等手里。如果证券的行情由于国家信用降低而下跌，这将使这些国家債权人更加有理由不出卖他們的证券。利息只够他們糊口，要他們以相当大的牺牲出卖他們的证券，他們就会破产。在一些小的地方交易所里流通的为数不多的证券，当然不能象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中大量的证券那样受到供求、涨落等方面急剧的波动的影响，因为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证券主要是投机的对象，它們大量地在地世界證券市場上流通。

因此，資本家由于銀根紧，被迫不顧价格出售他們的证券而造成证券行情下跌的現象，在普魯士是少有的，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屡見不鮮。二月革命后，这种現象在法国国家证券空前迅速貶值中所起的作用，远比国家信用低落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此外，买空卖空（«marchés à terme»）<sup>142</sup>在普魯士是禁止的，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是交易所的主要行当。

在地方市場上流通的普魯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場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用

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很明显，普魯士的證券行情無論如何也不能象法国以及其他國家的有价證券那樣体现出本國細微的政治糾葛；普魯士的國家信用决不象在其他國家那樣能對國家證券的行情起迅速的決定性的作用。

随着普魯士和德意志各小邦卷入歐洲的政治漩渦，随着資產階級政權的巩固，普魯士的國家證券就会象地產那樣逐漸喪失不能轉讓的宗法性質而進入流通領域，變成普通的、經常轉手的交易對象，而且將來也許還能在世界市場上占個小小的地位。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得出結論：

**第一**，一般說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只要國家信用不變，國家證券行情的上升處處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過來也是一樣。這是毋庸爭辯的。

**第二**，在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這種對比關係即使在比較短的時間里也是存在的，因為那里的大部分國家證券掌握在投機商手里，而且由於銀根緊，每天都要調節證券行情和利息率之間的對比關係，所以不得不經常拋售證券。因此，在這些國家里，這種對比關係實際上往往是時時刻刻都存在的。

**第三**，在普魯士恰恰相反，這種對比關係一般來說只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才存在，因為，市場上流通的國家證券為數不多，交易所的買賣也有限，由於銀根緊所發生的拋售，其實只是為了調節這一對比關係，而這種情況也很少；同時，地方交易所的證券行情首先是取決於地方的影響，而貨幣價格却取決於世界市場的影響。

**第四**，由此可見，福斯特曼先生從貨幣價格和國家證券行情的對比關係中作出關於普魯士國家信用的現狀的結論，只能說明他

完全无知。在貼現率为 5.5% 的条件下，利率为 3.5% 的証券按票面額 72% 开盘，这种行情絲毫也不能說成对普魯士国家信用有利，强制公債就完全作了相反的証明。

写于 1848 年 7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7 月 14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44 号

## 妥協辯論

科倫 7 月 14 日。今天我們來談談 7 月 7 日的妥協會議的後半的情況。在使漢澤曼先生十分不快的關於財政委員會的辯論之後，大臣先生們還得忍受一連串不大的苦楚。這一天是提出緊急提案和質問的一天，是內閣遭受抨擊和陷於窘境的一天。

萬德爾議員提了一個提案：凡非法逮捕公民的官吏，應負責賠償受害者的全部損失，此外還要處以監禁，時間應 4 倍於受害者被監禁的時間。

這個提案沒有被認為必須立即討論，因而被移交給專門委員會了。

司法大臣梅爾克爾先生聲明，通過這個提案不僅不能加重現行立法所規定的對非法捕人的官吏的懲罰，反而會減輕它。（對啊）

司法大臣先生只是忘記提醒大家：根據現行的即舊普魯士的法律，所謂官吏非法捕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依據可敬的舊普魯士法的條款，最肆意妄為的捕人行為也可宣判無罪。

我們順便來看一看大臣先生們的非議會作風。當提案還沒有移交專門委員會或小組的時候，他們保持緘默，可是隨後他們便針對這一點發表意見。他們十分自信地以為，這樣一來誰也沒有辦法反駁他們了。在討論博里斯先生的提案<sup>①</sup>時，漢澤曼先生是這

<sup>①</sup> 見本卷第 240 頁。——編者注

样做的，现在，梅尔克尔先生也这样做。在英国和法国，如果大臣先生们在议会里采取了十分不可容忍的态度，人们就会完全用另一种方法让这些先生们规矩一些。可是在柏林呢！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提議：要求政府馬上把拟好的或尚未拟好的构成法案提交議會，以便各小組进行討論。

这个提案还含蓄地責备政府沒有把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案提交議會或者有意拖延。令人伤心的是这种責备正好发生在政府已把两个法案(其中一个是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案)提交議會討論的那天早晨。看来首相(只要他稍为有点气魄)应该坚决地駁回这个提案。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簡短地講了几句話，說政府是想竭力滿足議会的公正要求的等等。提案就以多数票通过了。

貝塞尔先生責問陆军大臣为何沒有軍律。普魯士军队是唯一沒有軍律的军队。因此，在各軍事单位，从步兵連到騎兵連，对于各种最重要的軍职問題，尤其是各級軍人的权利和义务問題，在看法上都存在着很大分歧。各种命令、指示和訓令倒是不少，可是因为它们数量多，而且混乱不堪、互相矛盾，所以它們更加无用。此外，所有这些文件都要通过层层的中間机构，而这些机构总要想方設法地加以补充、說明、解释又解释，把文件弄得面目全非。这种混乱現象自然就助长了軍官的跋扈，使士兵遭殃。結果，士兵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只知道一些义务。过去也有过軍律，人們称之为猪皮律，可是到 20 年代就禁止私人使用。从那时候起，任何一个士兵都不能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高級軍官却还是用它来制服士兵！自卫軍的軍律也是这样，它从沒有下达到全軍。士兵虽然完全不了解它，但却要受到依据这种軍律制訂出来的命令的懲罰。这种荒謬絕倫的事情对于司令部的軍官和將軍先生們

当然是很合胃口的，因为这样他們就可以飞揚跋扈，残酷地虐待士兵了。可是下級軍官、士官和士兵們却遭了殃。貝塞尔先生正是替他們着想才向施萊根施坦將軍提出質問的。

可以想象，施萊根施坦先生听到“低能作家”——正象 1813 年人們常喜欢說的那样——这番冗长的話是感到多么驚訝啊！怎么，普魯士軍隊沒有軍律嗎？真是胡說八道！說实在的，普魯士軍隊的軍律不但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最簡短的，它总共只有 4 个字：“服从命令！”在这支“不許打人”的軍隊里，如果士兵遭到拳打、脚踢，挨了枪托，或者刚从陸軍学校出来的乳臭未干的少尉揪士兵的胡子或用手指弹他們的鼻子，如果士兵对此提出意見，那末得到的回答就是：“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校官要在飯后消遣一下，命令他的部队到沼地行軍，强迫士兵在齐腰的水中摆方陣，如果士兵敢于抱怨，那末回答就是：“服从命令！”假如禁止軍官上这家或那家咖啡店，如果他們对这一点提出意見，那末得到的回答就是：“服从命令！”这是一切軍律中最好的軍律，因为它适用于一切場合。

施萊根施坦先生是所有大臣中唯一还没有灰心丧气的人。一个在拿破仑时代服役过并受过 33 年普魯士严格的軍事訓練的士兵，一个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飞弹哨声的士兵，实际上并不害怕妥協派和他們的質問！更何況在“服从命令！”这一伟大的条例瀕临危急的时候。

他說：諸位！我对这一点非常了解。我非常清楚在这方面需要改进的是什么。这里談的是破坏，而破坏是不应当进行的，因为恢复是件大难事。軍事制度是夏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博伊恩和格罗曼拟訂的，有 60 万武装人員和受訓的公民服从它，只要紀律得

到遵守，它就能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未来。我就打算遵守纪律，这就说明了一切。

**貝塞尔先生：**施萊根施坦先生根本没有回答问题。不过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军律仿佛是破坏纪律的！

**施萊根施坦先生：**我已经说过，我要做军队目前所必需的并且对勤务有益的事情。

**貝恩施先生：**我们起码可以要求大臣先生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不然他就声明：我不愿意作答。直到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含糊其词的答复。

**施萊根施坦先生**生气地说：我不认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对勤务有什么益处。

勤务，永远是勤务！施萊根施坦先生老是想着他是一师之长，他现在是在和他的军官谈话。他认为，即使作为陆军大臣，他的职责也只是关心勤务。至于军队里各级之间的法律地位，军队对整个国家以及公民的关系如何，则完全不加注意！我们还是生活在博德尔施文克时代；老博伊恩的精神笼罩着陆军部。

**皮格薩先生**就6月7日对**梅尔岑**<sup>①</sup>的波兰人采取暴力手段的问题提出质询。

**奥尔斯瓦特先生**回答：他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

可是这一事件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也就是说过了31天，而奥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收到详细的报告！真是卓越的治理方法！

**貝恩施先生**质询**汉澤曼先生**：他是不是打算在预算报告中概述一下1820年以来 Seehandlung [海外贸易公司] 和1840年以来

---

① 波兰称作梅尔任。——编者注



國庫的管理工作。

漢澤曼先生在哄堂大笑聲中說：一星期以後他才能答復！

貝恩施先生再次就政府保護僑民問題提出質問。

屈韋特爾先生回答：這是全德國的事情，他要貝恩施先生去找約翰大公。

格雷貝爾先生就軍事主管機關官員兼後備軍軍官的問題向施萊根施坦先生提出質問。軍事主管機關的這些官員在後備軍受訓時都算服現役，這樣就使別的後備軍軍官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他提議，免除這些官員在後備軍中的職務。

施萊根施坦先生回答：他將履行他的職責並研究這個問題。

費爾德豪斯先生就6月18日從波茲南到格洛高<sup>①</sup>的行軍中死亡的士兵以及為懲罰這個野蠻事件中的禍手而採取的措施問題向施萊根施坦先生提出質問。

施萊根施坦先生：這是真事。團長的報告已經送來了，確定行軍宿營問題的總指揮部的報告還沒有送來。因此，我現在還不能肯定，是不是破壞了行軍部署。此外，這裡涉及到控告司令部軍官的問題，而這種控告常常使人痛心。我希望“崇高的全體會議”（!!!）在報告沒有送來以前忍耐一下。

施萊根施坦先生並不把這種野蠻行為當做野蠻行為。對他來說，問題僅僅在於該校官“是不是服從了命令”。假如問題只是服從不服從命令，那末，18個士兵象牲口一樣極其可憐地死在大路上還有什麼意思呢？

貝恩施先生（他也提過費爾德豪斯先生所提出的那種質問）指

---

① 格洛古夫。——編者注

出：既然这个質問是多余的，那末我就收回我的質問。但是我要求陆军大臣先生指定一个答复的日期。事情已经过去3个星期，报告大概早就收到了。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們沒有放松一分鐘，总指揮部的报告已令火速送来。

**主席：**想迴避議題。

**貝恩施先生：**我只是要求陆军大臣作答，并且指定一个日期。

**主席：**施莱根施坦先生認為怎样……

**施莱根施坦先生：**預先規定答复日期是完全不可能的。

**格拉德巴赫先生：**根据會議規則第28条，大臣有义务指定答复日期。我也坚持这一点。

**主席：**我再問一下大臣先生。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不能提出肯定的日期。

**格拉德巴赫先生：**我坚持我的要求。

**泰梅先生：**我也是这样。

**主席：**也許，大臣先生过两个星期……

**施莱根施坦先生：**非常可能。刚才我提出，对于是不是服从命令我要作答。

**主席：**就这样，再过两个星期。

陆军大臣先生就是这样履行他对国民議会的“职责”的！

格拉德巴赫先生还就撤銷人民所不滿意的官吏的职务問題和临时补缺問題向內政大臣提出質問。

屈韦特尔先生的答复十分令人不滿。格拉德巴赫先生繼續发表意見。为他这种大胆行为所激怒的右派議席，发出一片怨声、叫声和喧嚷声，虽然格拉德巴赫先生英勇回击，但他的发言終於被这

些吵嚷聲吞沒了。

貝倫茲先生提議，在國內值勤的後備軍應該受市民自衛團指揮部的指揮。因為這個提案沒有被看作是必須立即討論的，所以被取消了。以後，就開始對有關波茲南委員會的各種計策問題輕鬆愉快地交換意見。接二連三的質問、陸續不斷的緊急提案沒有了；著名的7月7日妥協會議接近尾聲，它猶如和風輕拂，草原上溪水潺潺。漢澤曼先生懷着欣慰的心情離開會場，右派的喧嚷給他的荊冠上增添了一些錦花。施萊根施坦先生得意洋洋地拈着胡子，喃喃自語：“服從命令！”

弗·恩格斯寫於1848年7月14日

載於1848年7月15日

“新萊茵報”第45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

科倫 7 月 17 日。我們終于又等到了康普豪森先生所說的“大辯論”，这次辯論进行了整整两天。

这次辯論的問題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方面是政府提出的关于立即实施国民議會決議的保留条件，另一方面是雅科比的提案：承認国民議会有权不等任何人批准立即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但不同意国民議會关于中央政权<sup>143</sup>問題的決議。

这样的問題竟能引起爭論，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其他民族困惑不解。但是我們住在橡树和菩提树的国家中，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

人民派代表去参加法兰克福議會，并授以全权宣布議會是凌駕于全德国及其各邦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議會由于有了人民交給的自主权，就應該通过关于德国宪法的決議。

但是議會沒有立即宣布它的凌駕于德国各邦和联邦議會之上的自主权，反而胆怯地迴避一切与此有關的問題，而且态度始終是猶豫不决、动摇不定的。

最后，它接触到了决定性的問題，即任命临时中央政权的問題。表面上它是独立的，而事实上是听命于各邦政府的（各邦政府通过加格恩来影响它），它亲自选举了各邦政府早已給它指定的帝国摄政王。

联邦議會承認已举行过的选举，并在一定程度上強調这次选举只是得到它的批准才具有了法律效力。

但是汉諾威甚至普魯士以保留条件的形式提出了反对意見，而普魯士的保留条件正是 11 日和 12 日討論的基础。

因此，这次模糊不清的討論很难怪罪柏林議會。罪过在于动搖不定的、軟弱无力的、毫无魄力的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本身，如果它的決議只能称作廢話連篇的話。

雅科比簡短而精确地(他常常是这样)論証了自己的提案。他使左派发言人的处境非常困难；除了关于中央政权誕生的經過这一严重敗坏国民議會名譽的問題以外，他說出了关于这个提案所能說的一切。

果然，左派的議員在他发言后几乎沒有談什么新东西，而右派的情况就更糟：他們的发言不是流于空談就是流于法律上的詭辯。两派議員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別人說过的話。

第一个讓議會接触到右派論証的荣誉屬於施奈德尔議員。

他从基本的論証說起，他認為提案本身就自相矛盾。提案一方面承認国民議会的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却建議妥協議會譴責国民議會，从而使妥協議會凌駕于国民議會之上。譴責只能由个別人提出，而不能由整个妥協議會提出。

这个巧妙的論証(显然右派非常以这个論証自豪，因为它貫穿在右派的所有发言中)提出了嶄新的理論。根据这个理論，在对国民議會的关系上，妥協議會的权力比个別人為小。

繼第一个基本的論証之后是第二个即共和政体的論証。德国多半是由君主立宪的各邦所組成的，因此它應該有个立宪的不負責任的元首，而不應該有共和政体的負責任的最高元首。这个論

証在第二天就受到施泰因先生駁斥：他說德國按其中央政治機構來說一直是共和國，誠然是個善良的共和國。

施奈德爾先生說：“我們受命全權草擬關於君主立憲的協議，而法蘭克福的議員卻被授以類似的全權，即同德國各邦政府協商制定德國的憲法”。

反動派把自己的願望冒充為既成事實。顫抖的聯邦議會根據沒有絲毫法律權力的所謂預備國會的要求，召開了德國國民議會，在這樣的時候是根本談不上協商的，因為已召開的國民議會在當時是被認為有自主權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巴黎六月的日子不僅使大資產階級的希望復活了，而且使已被推翻的制度的擁護者的希望也復活了。每個頑固的容克地主都在幻想恢復自己舊時的鞭笞制度，從普斯布魯克的皇宮到亨利七十二世世襲的城堡都傳來了“協商制定德國憲法”的要求。的確，法蘭克福議會本身應該承擔這個罪過。

“所以，國民議會按照自己的職權選舉了立憲的最高元首。但是它也按照人民的意志行動；絕大多數主張君主立憲。我將認為國民議會的其他決議甚至都是不幸的。這不是因為我反對共和制：在原則上我承認共和制（這裡我並不自相矛盾）是最完善的和最高尚的國家形式，但實際上我們離它還遠得很。在我們還沒有相應的精神面貌以前，我們不可能有這種形式。當我們還沒有共和主義者，即沒有不僅在熱情奮發時而且在任何時候都能自覺地慷慨地使個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的高尚人物的時候，我們是不能盼望共和制的。”

要證明柏林議會中體現了哪些美德，還能有比施奈德爾議員的這些高尚而謙虛的話更好的東西嗎？的確，如果過去還可以懷疑德國人是否適宜於共和政體，那末現在，在我們的辛辛納圖斯—施奈德爾的真正的公民美德和異常質樸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樣面前，這種懷疑就應該煙消雲散了！但願辛辛納圖斯充滿勇氣和

信心，相信自己，相信无数高尚的德国公民；这些公民也認為共和制是最高尚的国体，但是認為自己是拙劣的共和主义者；对共和制來說他們已經成熟了，他們会象对待君主专制那样，以英雄的馴服态度来对待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将是一切曾經存在过的共和制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沒有布魯土斯和卡提利納、沒有馬拉和六月风暴的共和制，这是“飽食的美德和有購買力的道德”<sup>144</sup>的共和制。

但是辛辛納图斯-施奈德尔大錯而特錯了，他高喊：

“在专制制度下，共和主义的特性是无法培养的；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呼之即来的；我們必須首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我們的子孙！目前我認為共和制只是一种极大的灾祸，因为它是无政府主义，徒具被侮辱了的共和制之名，它是以自由为幌子的专制制度！”

相反地，德国人——正如福格特先生（从吉森来的）在国民議會中所說的那樣——是天生的共和主义者，辛辛納图斯-施奈德尔要用共和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倒不如用他自己在年輕时代严以律己时所用的那种旧时的仁慈的德国风尚、謙虛和敬畏上帝的精神来教育他們。正直人的共和制不会是无政府主义和专制制度，它只会使辛辛納图斯-施奈德尔所擅長的那种低級政客的縱談闊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正直人的共和制决不会有玷辱了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恐怖和罪行，它沒有染滿血污，它不仇恨紅旗，它将創造奇迹，会使每个正直的市民能够在极其虔誠和幸福的情况下过着宁靜的生活。誰知道，也許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甚至会把行会及其对沒有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的一切可笑的控告重新还給我們！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不是空想，而是最实际的现实。它在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和法兰克福，甚至在瑞士某儿

个州中都存在着。但在目前暴风骤雨的时代，它到处都遇到危险，到处都濒于灭亡。

因此，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振作起来吧，放下铁犁和甜菜地，抛弃啤酒和妥协，骑上马去拯救遭受危险的共和制、你的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吧！**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18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48号



##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續)

科倫 7 月 18 日。在施奈德尔先生講完話以后，瓦尔德克先生上台发言，他贊同雅科比的提案：

“現在普魯士邦的情况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实际上，不能否認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忧虑不安。”

这个論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人忧虑不安。好象我們还是在听施奈德尔議員講話。

“我們應該說，普魯士担負着領導德国的使命。”

这仍然是那旧普魯士的幻想，那甜蜜的美梦：妄想能把德国并入普魯士，宣布柏林是德国的巴黎！是的，瓦尔德克先生看到这种甜蜜的希望在他眼前消失，但他痛心地看着它，他責备过去的和现在的政府，說由于它們的过失，普魯士沒有領導德国。

可惜，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关税同盟<sup>145</sup>为普魯士統治德国开辟道路，那时当地的爱国主义能够相信“在最近 200 年中，是勃兰登堡家族决定德国的命运”，而且今后还要决定它的命运；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四分五裂的联邦議会的德国，甚至可以把普遍采用普魯士官僚制度的紧身衣当做維持互相联系的最后办法！

“早就受到輿論譴責的联邦議会消失了，而法兰克福的制宪国民議会，突然在受惊的世界面前出現！”

的确，“世界”看到这种制宪国民議會不能不“受惊”。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瓦尔德克先生还发表了长篇大論反对德国設有皇帝，然后就是賴辛施佩格第二講話。

賴辛施佩格第二声明說，雅科比提案的拥护者是共和主义者，他希望他們和法兰克福共和主义者一样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意图。后来他断言，德国还不具备“充分的公民美德和政治美德，而一位大政治思想家曾認为这一点是共和制的最重要的前提”。既然爱国主义者賴辛施佩格都这样說，那末德国的情况的确不妙！

他繼續說道，政府沒有提出任何保留条件(!)，而只是表示了自己的願望。因为要这样做的理由已經很充分，所以我也希望国民議会在通过決議时，不要总是忽視各邦政府的意見。規定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权限不屬於我們的职权范围；国民議會本身沒有为自己的职权創造理論，它实际上已經在它必須行动的地方行动起来。

换言之，这就是說，法兰克福議会在它还能左右一切的革命高涨时期，沒有一举而坚决地結束同德国各邦政府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它宁可拖延决定性的战斗，为每个个别的決議时而同这个邦的政府，时而又同那个邦的政府发生小小的冲突。它离革命时期越远，它的消极行动使它的威信在人民眼中越发扫地，这些冲突就越加使它遭到削弱。在这一点上，賴辛施佩格先生說得对：这样一个不捍卫自己本身利益的議會是不值得帮助的！

但是賴辛施佩格先生下面这段話的确动人：

“討論所有这些关于权限的問題都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現在只有一点要求：在各个个别的場合下来解决实际問題。”

是的，用一个果断的决定来永远解决这些“实际問題”都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如果不是象反动派那样力图镇压运动而是实現在街垒中诞生的任何会議的革命职能，也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当然，克倫威尔、米拉波、丹东、拿破仑，整个英国的和法国的革命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但巴塞爾曼、比德曼、艾森曼、維登曼、达尔曼等的行动却完全是“从国家方面着眼”的！革命一来，“大政治家”就都得下台，既然“大政治家”（特别是克姆彭区的議員賴辛施佩格第二这些大政治家！）現在又东山再起，显然目前革命是在打瞌睡！

“如果你們放弃这种制度，那就很难避免同德国国民議會或德国各邦政府发生冲突；无論如何你們会引起沉痛的糾紛；发生糾紛就会使无政府状态抬头，那时，誰也不能拯救我們摆脱內战，而內战将成为更大的灾难的开端…… 我認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人們談起我們时会这样說：德国的秩序靠我們的东方和西方的朋友恢复起来了！”

賴辛施佩格先生也許是对的。如果国民議會要討論权限問題，就可能引起冲突，其結果就是內战，就是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出現。但是如果国民議會和过去一样不討論这些問題，那我們就更加可能碰上內战。冲突在革命初期还比較簡單，但它会一天一天地复杂起来，而且越是迟迟不下决心，結局就越痛苦，流的血就越多。

象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得不給自己开辟一条从空前的分裂状态走向統一的道路，它在灭亡的威胁下需要有比它过去的四分五裂状态严密的革命的集中；它是一个在国内藏着 20 个万第<sup>①</sup>的国家，側身于两个最强盛集中的大陆强国之間，周围是无数的小国，并且与各国的关系都很紧张甚至处于战争状态。在現代普遍发生

革命的时候,无论是内战还是对外战争,这样的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人民及其领导者的行动越是犹豫不决,决心越是迟迟不下,这些我们完全不能避免的战争的危险性和毁灭性也就越大。如果赖辛施佩格先生的“大政治家们”继续执政,我们也许还能看到第二个三十年战争。但是,多亏事变的力量,德国人民、俄国皇帝和法国人民还要发表他们的意见。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19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49号

---

① 万第——法国西部的省名。农业地区。富农和中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19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万第”一词已经成了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

## 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 俱乐部被封

科倫 7 月 19 日。

所有的德国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而你，你相信那干杯的祝辞；  
你相信每一只烟斗  
和它那黑、紅、黃色的纓絡<sup>146</sup>！

善良的德国人呵，你又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以为你完成了革命嗎？錯了！你以为你推翻了警察的国家嗎？錯了！你以为通过三月街垒向你飞来的自由結社的权利、出版自由、武装全民以及其他种种高調，現在已經有可能兌現了嗎？錯了，完全錯了！

酒醉时，何等惬意，  
觉醒后，景物全非<sup>146</sup>。

面对你那些間接选举出来的所謂国民議會<sup>147</sup>，面对德国公民的再度被逐出德国城市，面对美因茲、特利尔、亚琛、曼海姆、烏尔姆、布拉格的屠刀暴政以及柏林、科倫、杜塞尔多夫、布勒斯劳等地的逮捕和政治审判案，你会觉得景物全非。

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俱乐部是你唯一的東西了！你可以到俱乐部去，在那里公开抨击最近几个月的政治欺詐；你可以向同道者吐露你的苦悶，你可以得到在同样的压迫下受苦难的志同道合的

爱国者的安慰!

但是现在就連这一点也没有了。俱乐部和“秩序”是不能共存的。为了“恢复信任”，绝对需要取締俱乐部的暴乱活动。

昨天我們講过維尔騰堡政府如何通过王室命令直截了当地查封了斯图加特的区民主联合会。現在要控告俱乐部的领导人甚至不用吹灰之力，只要采取旧的警察措施就行了。不仅如此，哈普雷希特先生、杜維尔努阿先生和毛克勒先生(他們曾签字确认这个命令)还更进了一步：他們以法律上没有的惩罚——监禁一年——来威胁违令者；他們不經議會討論，只是“根据宪法第 89 条”就可以頒布特別刑法!

巴登的情况也同样糟糕。我們今天报道了海得尔堡民主大学生联盟被查封的消息。在这里，一般說来結社权并没有怎样公开被否認，这里只是有人根据联邦議会的旧的早已被废除的特別法否認大学生的結社权。大学生都受到这些已失效的法律所規定的各种惩罚的威胁。

現在可以預料，在最近的将来也許連我們的俱乐部也要被封闭。我們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存在，也正是为了使政府能够毫无顧虑地采取这些措施而不引起輿論的憤慨。当然，这个議會会象它过去輕輕地越过了美因茲革命一样，将輕輕地越过种种警察迫害而轉到当前的問題上去<sup>①</sup>。

因此，我們不是希望要从法兰克福議會得到什么东西，而只是再次地迫使它的大多数向整个德国公开宣布它和反动派結成了联盟，我們号召法兰克福議會中的极左翼議員提出如下的提案；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15—17 頁。——編者注

---

这些措施的倡导者哈普雷希特先生、杜维尔努阿先生和毛克勒先生等破坏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将他們交法庭审判。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20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50号

## 普魯士出版法案

科倫 7 月 19 日。本來我們今天打算繼續評述妥協辯論來使讀者消遣，特別想向讀者介紹一下鮑姆施塔克議員的出色的演說，可是事變却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人皆先愛其身。當報紙的生存遭到威脅的時候，甚至連鮑姆施塔克議員也可以置諸腦後。

漢澤曼先生向妥協議會提出了臨時出版法案。漢澤曼先生對出版物的這種慈父般的關懷促使我們立刻來研究這個問題。

過去，人們用普魯士公法中的那些極其有教益的條款來裝飾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現在，在革命以後，一切都改變了。現在，人們用 Code [法典] 和九月法令中的那些珍貴的珠寶來裝飾普魯士公法。杜沙特爾當然不是博德爾施文克。

幾天以前，我們報道了這個出版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條文。我們剛剛利用關於誹謗的訴訟案的機會證明了：Code pénal [刑法典] 的第 367 和 368 條同出版自由<sup>①</sup> 的矛盾是非常驚人的，而漢澤曼先生就已經準備不僅把它們推廣到王國的每個角落去，而且至少還把它們加重兩倍。在新的出版法案中，我們又可以看到由於我們實際體驗過而覺得那麼喜歡和珍愛的一切。

---

① 見本卷第 230—233 頁。——編者注



在那里，我們可以看到禁止（违者处以 3 个月到 3 年的監禁）用应受法律制裁或“引起公众蔑視”的事实来控告某人的条文。在那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只准許用“經過詳尽証明的文件”来确定事实的可靠性的規定，——总之，在那里我們可以看到拿破仑专制时代对付出版物的一切典范手段。

实际上，汉澤曼先生已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已使各个旧的省份分享了萊茵省立法的好处！

出版法案第 10 条是上述一切条文的頂点，它規定：凡是在国家官員执行自己职务方面誹謗国家官員的人，罪加一等。

根据刑法典第 222 条規定，如果官員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 (à l'occasion) 执行职务而遭到言語上的侮辱 (outrage par parole)，侮辱他們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不管检察机关怎样煞費苦心，但由于一些很显然的理由，直到現在这一条还未能用来对付报纸。为了糾正这种过错，汉澤曼先生已把这一条改成上述的第 10 条。首先，用更方便的“在执行自己职务方面”的說法代替了“因”这个用語；第二，用 par écrit [在書面上] 代替了 par parole [在言語上] 这种受限制的用語；第三，懲罰加重了两倍。

从這項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普魯士的官員們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普富尔先生用硝酸銀給波兰人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而报纸要是报道这件事情，那末就要处以  $4\frac{1}{2}$  月到  $4\frac{1}{2}$  年的監禁！如果公民們沒有犯罪而被錯誤地監禁起来，而报纸要是报道这件事情，那末就要处以  $4\frac{1}{2}$  月到  $4\frac{1}{2}$  年的監禁！如果县长們变成了反动派的推銷員，并为保皇党人的奏摺征集签名，而报纸要是揭露这些先生們，那末就要处以  $4\frac{1}{2}$  月到  $4\frac{1}{2}$  年的監禁！

从這項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員們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

肆虐、橫行霸道和違法亂紀了：他們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別人打人、進行逮捕和不加審問就加以監禁。唯一有效的監督——報紙將變成無效的東西。在這項法律生效的那一天，官僚們將歡天喜地，因為他們將比三月以前變得更加強大有力，更加可以逍遙法外了。

其實，當不能讓公眾蔑視**理應**受到公眾蔑視的東西的時候，究竟還有什麼出版自由呢？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報紙至少還可以舉出事實來證明自己的一般論斷和控告。現在這種情況就要結束了。現在它將不能**陳述事實**了。它應當僅僅局限於一般的空話，使善意的漢澤曼先生和一切庸夫俗子都有權利說：報紙光會謾罵，而什麼也沒有證明！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禁止它證明的。

但是，我們建議漢澤曼先生在他那善意的出版法案中再加上一條。他不妨宣布：任何使官員先生們不僅遭受公眾蔑視、而且遭受公眾嘲笑的企圖都應受到懲罰。不然，這將是個令人非常痛心的缺陷。

在這裡，我們不準備談那些涉及違反道德的罪行的條文以及關於沒收的命令等等。它們的妙處大大勝過了路易-菲力浦和復辟時期的出版法。我們只準備指出一點：根據第 21 條的規定，檢察官不僅可以要求禁止已經印好的作品，甚至可以下令沒收剛剛付印的手稿，如果當局認為它的內容包含有應受追究的罪行和過錯的話！對於仁愛的檢察官來說，這是一種多么廣闊的活動天地！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到報紙編輯部里去要求審查已經“付印的手稿”，因為在那些手稿中可能包含有罪行和過錯，這是一種多么愜意的娛樂！

---

在宪法草案和“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有一条规定：“**書报检查永远不能恢复**”，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庄严重要的规定听起来简直是一种恶意的嘲笑！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7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20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50号

## 市民自卫团法案

### 一

科倫 7 月 20 日。市民自卫团被解散，这就是关于建立市民自卫团的法案的最主要的一条，虽然这一条只是以极不显著的形式，即被列为第 121 条而放在该草案的末尾，内云：

“鉴于本法律规定要建立市民自卫团，目前属于市民自卫团或同它并存的所有一切武装部队，一律宣布解散。”

有人已毫不客气地开始解散那些不直接属于市民自卫团的部队。而解散市民自卫团本身只能以改编市民自卫团的名义进行。

礼节感迫使立法者把宪法中的下面这一句话列入第 1 条：

“市民自卫团的使命是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定秩序。”

为了完全符合“这种使命的意义”，市民自卫团对于公共事务既不应当考虑和谈论，也不应当讨论或做出决定（第 1 条）；既不应当举行会议，也不应当拿起武器（第 6 条），总之，未经最高当局批准，不得有任何生存的标志。不是市民自卫团“保护”宪法不受当局的侵害，而是当局保护宪法不受市民自卫团的侵害。根据第 4 条规定，市民自卫团应当盲目地“遵守当局的命令”，对“村镇、行政和司法当局的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干涉，并且不得进行任何讨论。在“拒绝”消极服从的场合下，区督察员有权“解除”市民自卫团的

“职务”4个星期(第4条)。假如市民自卫团引起圣上的不满,“根据国王的命令”,可以“解除它的职务”6个月或者甚至可以把它完全“解散”,只有在6个月之后它才能重新组织起来(第3条)。因此(根据第2条),“在王国的每一个村镇中,都应当组织市民自卫团”,只要区督察员或国王认为没有必要以别的方式来管理每一个村镇的话。如果国家事务不归市民自卫团“管辖”,那末,相反地,市民自卫团就要“归内政大臣管辖”,即归警务大臣管辖,因为它是它的天然上司,同时“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他又是“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忠实的埃卡尔特<sup>148</sup>(第5条)。当市民自卫团没有被区督察员或其他官员召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就是说“执行各位上司的命令”即执行职务的时候,它的当前任务就是执行由国王的某一个上校所起草的军事条令。军事条令是市民自卫团的 magna charta [大宪章],据说市民自卫团就是为了保卫和实现这一宪章而建立起来的。军事条令万岁!最后,参加市民自卫团使“从24岁到50岁”的每一个普鲁士人都得作如下的宣誓:

“我宣誓效忠国王、宪法和王国的各种法律。”

可怜的宪法!它卑躬屈膝地处于国王和各种法律之间,充满了市僧式的谦逊,表现得多么怯懦,多么羞涩。首先是保皇派的宣誓,即殷勤的顺民的宣誓,然后是对宪法的宣誓,最后是除了正统主义的意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的宣誓,仿佛除了根据宪法产生的法律以外,还有由国王的独裁产生的其他法律。可敬的市民原来彻头彻尾是归“内政部管辖”的。

这个正直的人在首先放弃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如结社权等等的条件下得到了武器和军装。他那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任

务，“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应当这样来解决：他应当盲目服从当局的命令，用士兵的那种消极的、无意志的和无个性的服从来代替最普通的、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都承认的市民自由。正如施奈德尔先生在妥协会议上所说的，这是培养未来的共和主义者的出色的学校！我们的市民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普鲁士宪兵和英国警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但是，军事条令和他服从命令的意识应当是他遭到一切损失后的安慰。不把军队溶化到人民中去，而把人民溶化到军队中去，这不是更新奇吗？

**宪法中的话竟变成了普鲁士的现实，这真是一种奇观！**

既然普鲁士国家制度适应于立宪制度，那末，为什么立宪制度就不能适应于普鲁士国家制度呢？可怜而立宪制度呵！正直的德国人呵！他们那样长久地抱怨没有实现“最郑重的”诺言！他们马上就将感受到一种恐惧，由于这些郑重的诺言似乎已真正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恐惧！人民在 *par où il a péché* [作茧自缚]。你们不是曾要求出版自由吗？那末你们就要受到出版自由的惩罚，就要受到不经书报检查官检查的检查，即受到检察机关的检查，受到法律（这种法律认为：出版物“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应当关心所有一切东西，可是就不应当关心上级，完美无缺的上级）的检查，受到监狱的和罚款的检查。你们将象鹿渴望新鲜的水一样，哀求把受到很多辱骂而很少被重视的善良的老书报检查官归还给你们，把这个最后的罗马人归还给你们，你们曾在他的禁欲主义的审慎监视下过着那样舒服而平安的生活。

你们不是曾要求人民自卫团吗？那末你们就要遵守军事条令。你们要受当局的管辖，你们要受军事训练，有人将那样热心地教导你们消极服从，以致把你们弄得目瞪口呆。

普魯士的立法者以其特有的嗅覺发现：每一項新的宪法規定都为新的刑法、新的章程、新的懲罰措施、新的監視、新的挑剔和新的官僚制度提供絕妙的借口。

更多一些符合宪法的要求！更多一些符合宪法的要求！办事內閣大声疾呼。我們要用行动来回答每一項要求！

**要求：**每一个市民都应当武装起来保卫“宪法規定的自由”。

**回答：**从今以后每一个市民都要归內政部管轄。

瑟西把希腊人变成了假面兽，而普魯士国家制度及其办事內閣則使宪法規定具有一种幻想的面貌，但是，从假面兽来辨認希腊人比从幻想的面貌来辨認宪法規定要容易得多。

**在用普魯士方式改組波兰之后，就是用普魯士方式改組市民自卫团！**

## 二

科倫 7 月 21 日。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市民自衛團**法案的“總則”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句話：市民自衛團已不再存在。我們還要稍微談一下這個法案中的幾節，以便更好地闡明“辦事內閣”的精神，同時，我們還要在这里選擇一些關於一個名不符實的機構的原始材料。很多條文都是以關於村鎮和區的新條例、以王國新的行政劃分等等為前提的，也就是以那些暫時還在辦事內閣的秘密懷抱中過着隱蔽生活的措施為前提的。但是，為什麼辦事內閣在提出它所約許的關於村鎮、區等等的條例的草案之前就提出改組市民自衛團的法案呢？

在第 3 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張履歷表，一張是市民自衛團中優秀成員的履歷表，一張是必須在市民自衛團中服務并領取社會補助金的人的履歷表（第 14 條）。官吏們的軍隊當然不包括在領取社會補助金的人當中。大家知道，在普魯士，真正的生產階級正是由他們組成的。如同古代羅馬的奴隸一樣，窮人是“僅僅在特殊的場合下才被召去執行職務”的。然而，如果窮人因為他們的市民依賴性的關係，也象那不勒斯的流浪漢一樣很少負有保衛“憲法規定的自由”的使命，那末，他們在這種新的消極服從的機構中是否應當處於從屬地位呢？

但是，除了窮人以外，我們還發現了必須在市民自衛團中服務的有支付能力的人同無支付能力的人之間的無比重要的差別。

事先還需要指出一點。根據第 53 條的規定：



“全国市民自卫团的服装应当简朴、一致，服装式样须经国王批准。其所以要规定这样的服装，是为了不要把市民自卫团和军队混淆起来。”

当然罗！其所以要规定这样的服装，是为了把军队和市民自卫团对立起来，同时把市民自卫团和人民对立起来，以便在采用白刃战、扫射和类似的军事手段时不会发生任何混乱。但是，服装本身也同履历表、军事条令一样，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服装无非是给自由穿的一种仆役制服。这种仆役制服为大大增加市民自卫团的服装费提供了借口，而这种费用的增加又如愿以偿地在资产阶级自卫团员同无产阶级自卫团员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请再往下听吧：

第 57 条 市民自卫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设法自费购买服装（在有这种服装的地方）、服务证和武器。但是，村镇应当出资为那些实际执行职务而无力自费购买的自卫团员购置这些东西。

第 59 条 村镇对它所购置的装备品保留所有权，而且，当这些装备品不被用来执行职务的时候，村镇可以把它们保存在特定的地点。

这样，所有无力自费购买全部军备的人（包括绝大多数普鲁士居民、全体工人和大部分中间等级），“当他们不被用来执行职务的时候”，就要根据法律被解除武装，而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阶级手里则始终握有武器和服装。因为正是这个资产阶级能以“村镇”的名义把村镇“购置的”所有“装备品”“保存在特定的地点”，结果是它不仅掌握着自己的武器，而且甚至还支配着无产阶级自卫团员的武器，并且在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政治冲突中，它“能够”并且“一定会”拒绝发给武器，即使这些武器是被“用来执行职务”的。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便利用一种最难觉察同时也是最有效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恢复起来了。资产阶级对穷人享有掌握武器的特权，就象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对农奴享有掌握武器的特权一样。

为了使这种特权保持其绝对的特殊性，第 56 条规定：

“只有在乡村中和在人口不到 5 000 人的城市中，才允许用长矛和馬刀来武装市民自卫团，使用这种武器时不要求穿軍服，只要带上由上校规定的特殊服务証就行了。”

在所有人口超过 5 000 人的城市中，服装增加了实际上决定掌握武器权利的财产资格限制，同时也增加了市民自卫团中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人的数目。正如服装和武器仅仅是租借给这个无产阶级，即仅仅是租借给绝大多数居民的一样，武装的权利，即无产阶级作为自卫团而存在的权利，一般也只是租借给他们的，*beati possidentes*，有产者到底是幸福的！穿着租借的衣服、尤其是穿着这种象士兵的衣服一样轮流着穿的租借的衣服的人，精神上会感到一种压抑，而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当然也就是负有“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使命的罗马人所要求的首要东西。但是，与此相反，市民自卫团中有支付能力的成员的骄傲的优越感难道不会滋长起来嗎？除此以外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但是，为了居民中那部分有产者的利益，即为了特权资本的利益，甚至这些把大多数居民的武装权利变成了幻想的条件，又被那些新的、有更多限制的条件所约束了。

这就是：村鎮只应当为“实际执行职务”的那部分无支付能力的自卫团员儲存装备品。根据第 15 条规定，“实际执行职务”的那部分人的情形如下：

“在能够执行日常职务的人数占居民  $\frac{1}{20}$  以上的所有村鎮中，村鎮管理机关有权把实际执行职务的人数局限于这一部分居民。如果村鎮管理机关行使这种权利，那它就有责任来組織服务的次序，使所有被召来执行日常职务的人依次轮流执行这种职务。但是，每一次更换的人数不得超过  $\frac{1}{3}$ ，而且应同时召集与被替换的人数相等的各种年龄的自卫团员来服务。”

现在是否需要统计一下，村镇**实际上**究竟为多少无产者自卫团员和多少居民购置装备呢？

在我们昨天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办事内閣**怎样根据旧普鲁士的即官僚制度的国家精神来改组宪法所规定的市民自卫团的机构。今天我们看到，**办事内閣**怎样完成了它的最后使命，——我们看到，**办事内閣**怎样根据七月革命的精神，根据路易-菲力浦的精神，根据把资本捧上了宝座并

在锣鼓和喇叭声中  
对它的青春光芒<sup>149</sup>

赞赏不已的时代精神来改革市民自卫团的这种机构。

现在对汉澤曼-屈韦特尔-米尔德内閣說两句话。屈韦特尔内閣在最近把有关反动派阴谋的通令分发给所有的区督察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办事内閣**想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又与旧的、警察的和封建的国家妥协。在解决这种双重矛盾的任务的过程中，**办事内閣**随时都看到，反动派怎样用封建专制的精神来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并颠覆内閣本身，——而内閣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事先没有争取全体人民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没有为了争取人民而多少表现出一些民主精神，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统治的。

但是，企图把复辟时期同七月时期结合起来，力求使资产阶级还在同专制制度，同封建制度，同闭塞的容克地主，同军阀和官僚的统治作斗争的时候就抛开人民，奴役人民，把人民扔在一边——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任务，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甚至连**办事内閣**，甚至连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汉澤曼-屈韦特尔-米尔德也不免要遭到失败。

### 三

科倫 7 月 23 日。市民自卫团法案中有关“选举和任命首长”的一节，是真正的选举方法的迷宫。我們想扮演阿莉亚娜这个角色，并給現代的底西亚斯——可敬的市民自卫团——一团綫，把他們引出这个迷宫。可是，現代的底西亚斯也象古代的底西亚斯一样忘恩負义，他在杀死明諾托尔之后，竟背信弃义地讓自己的阿莉亚娜——报纸——坐在納克索斯島的岩石上。

我們把迷宫的各道門列举出来。

#### 第一道門：直接选举。

第 42 条 “市民自卫团的指揮官，包括大尉在內，一律由实际执行职务的自卫团員选举之。”

旁門：“实际执行职务的自卫团員”仅仅占真正“适合携带武器”的人員中的一小部分。参照第 15 条和我們前天的文章。

因此，“直接”选举也只不过是所謂的直接选举而已。

#### 第二道門：間接选举。

第 48 条 “营的少校指揮官由相应各連的大尉、排长和班长以絕對多数票选出。”

#### 第三道門：間接选举和国王任命相結合。

第 49 条 “团长由国王从相应各营的营长和排长以上的其他各級指揮官选出的 3 个候选人中任命。”

#### 第四道門：間接选举和各个指揮官的任命相結合。

第 50 条 “副官由相应的各个指挥官从排长中任命,营的文書从班长中任命,营的鼓手从鼓手中任命。”

### **第五道門: 由官僚机构直接任命。**

第 50 条 “連的司务长和文書由大尉任命,騎兵連的騎兵司务长和文書由騎兵大尉任命,班长由排长任命。”

因此,如果說这些选举方法是以伪造的直接选举而开始,那末它們便以实际停止一切选举而告終,即以各位大尉、騎兵大尉和排长先生的专橫而告終。Finis coronat opus〔事以結局为貴〕。这个迷宮有它的 *pointe*〔尽头〕,有它的頂点。

从这种复杂的化学过程中分离出来的这些結晶体,即上至鼎鼎大名的上校、下至默默无闻的上等兵,要沉淀 6 年之久。

第 51 条 “指挥官的选举和任命每 6 年举行一次。”

很难設想,为什么在提出这些預防措施之后,办事內閣还認為有必要在“一般法規”中不近人情地当面呵斥市民自卫团:你們应当由政治机构改組为純警察机构和旧普魯士軍事訓練的园地。为什么要破坏人們的幻想呢?

国王的任命是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以致在“市民自卫团法庭”一节中根本沒有提到怎样的法庭可以审判“上校”,而只是确切地指出了审判少校以下的其他各級官員的法庭。难道国王任命的上校还会犯罪嗎?

可是,对于在自卫团中供职的市民来說,只要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个首长,即上至十全十美的国王任命的上校下至被大尉任命为司务长或被排长提升为班长的随便哪个小伙子的一句話,就可以剝夺自卫团员的人身自由并把他們监禁 24 小时,这簡直是对市民这个概念的褻瀆。

第 81 条 “在服役中，每个首长都可以申斥自己的部下；如果部下在执行职务时酗酒或有别的粗暴地违背职责的行为，首长甚至有权下令立即把他们逮捕和监禁 24 小时。”

当然，首长先生本人应当断定，什么是别的粗暴地违背职责的行为，而部下则应当俯首听命。

因此，根据这个法案的导言，如果市民只有在他们不再是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构成人的使命的东西，即不再是«zoon politicon»、“社会的动物”的时候，才获得了“自己的使命的意义”和“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权利，那末，他们只有在放弃自己的市民自由，听凭任何一个上校或班长摆布的时候，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看来，“办事内阁”抱着特殊的东方的神秘观点，实行特殊的摩洛赫崇拜。为了保卫区督察员、市长、警察厅长和警察总监、警察署长、检察机关官员、高等审判厅厅长或审判长、检察官、治安法官、村长、部长、僧侣、现役军人、国境官员、海关官员和税吏、森林管理局和邮政局的官员、所有监狱的看守和狱吏、巡官，以及所有未滿 25 岁和已滿 50 岁的人（根据第 9、10 和 11 条规定，这些人并不包括在市民自卫团之列）等等的“宪法规定的自由”，为了保卫这些民族精华的“宪法规定的自由”，民族中的其余的人就应当流血牺牲，不仅要把自己的宪法规定的自由，而且要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统统献给祖国。Pends-toi, Figaro! Tu n'aurais pas inventé cela! [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①

不用说，关于惩罚的一节草拟得特别有趣和精密。而且市民自卫团的整个机构，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只应当是对可敬的市民要求宪法和人民自卫团的意图的一种惩罚。不过还需要指出—

① 博馬舍“瘋狂的日子，或費加羅的婚姻”。——編者注

点：除了根据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以外，根据新的惩罚条例（見第82条和以下各条），在**軍事条令**，即在这个由**国王的上校**在少校的协助下起草并經虛构的“**区代議机关**”批准的市民自卫团大宪章中所規定的各种情况，也要受到惩罚。不言而喻，**监禁能用罰款的办法来代替**，以便使市民自卫团中有**支付能力的人**同**无支付能力的人**之間的差別，即由“**办事內閣**”发现的市民自卫团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間的差別得到刑法的核准。

在宪法中应被办事內閣完全拒絕的**特殊裁判权**現在又被这个內閣偷偷地放到市民自卫团条例中去了。自卫团士兵和班长在軍紀上的一切过錯，应交給由两个排长、两个班长和3个士兵組成的連的法庭处理（第87条）。营的各个連里的指揮官，从排长到少校，在軍紀上的一切过錯，应交給由两个大尉、两个排长和3个班长組成的营的法庭处理（第88条）。对于少校又規定了另外一种特殊的訴訟程序，关于这种訴訟程序第88条叙述如下：“如果少校应交給营的法庭审判，那末营的法庭除了原有的成員外还需要增添两个少校”。最后，如前所說，上校先生是**不受任何法庭审判的**。

这一卓越的法案是以下面一条結束的：

（第123条）“关于市民自卫团在战时参加保卫祖国的条例，以及关于他們在战时的武装、装备和給养的条例，都是以建軍总法为基础的。”

換句話說，**后备軍繼續同被改編的市民自卫团并存**。

仅就这个法律草案以及和丹麦的休战协定草案來說，难道还不應該对**办事內閣**起訴嗎？

写于1848年7月20日—2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21、22和24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51、52和54号

## “祖国报”<sup>150</sup> 論和丹麦的休战

科倫 7 月 20 日。为了使祖国能够确信它对国民議會、帝国摄政王等进行的所謂革命，除了完全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光荣的神圣羅馬帝国以外一无所得，我們援引丹麦“祖国报”如下一篇文章。我們希望这篇文章足以使那些甚至是制度的最輕信的維護者也能相信：4 000 万德国人被 2 000 万丹麦人利用英国的調停和俄国的威胁欺騙了，正如他們在“至高无上的帝王”时代經常受騙一样。

奥尔拉·列曼大臣私人办的“祖国报”对休战发表如下的看法：

“如果只从我們的希望和願望的角度来观察休战，那末这个休战当然不能令人滿意。如果政府能够有所选择，即或者停战，或者指望靠瑞典和挪威的帮助把德国人赶出什列斯維希，迫使他們承認丹麦在公国居民的同意下管理該公国事务的权利，那末就必須承認，政府同意休战是一种不負責任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应当考虑到，無論英国或俄国（这两大强国对解决这个爭論問題最感兴趣）都要求簽訂休战协定来作为它們今后建立友好关系和进行調停的条件。瑞典—挪威政府在決定給予任何积极的援助以前，也要求我們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問題。但是瑞典—挪威政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答应給予这种援助，即这种援助不是用来占領什列斯維希，而只是用来保卫日德兰和各个島屿。因此，我們只能在下面两者之間进行选择：或者爭取時間以等待国外形势的变化和整頓国内政治和軍事机构；或者向較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单独战斗，但是这种战斗几乎一定不会取得胜利（即使占据有利陣地的联軍遭到我們这个兵力要少一半的部队的进攻），相反



地，它也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瑞典—挪威部队一旦撤退，德国人就会占领整个半岛。这种斗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許会给我们带来付出巨大代价而得不到好处的胜利，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使我们全部防御力量消耗殆尽，并带来丧权辱国的和约。”

这家丹麦报纸进而申辩休战条件有利于丹麦。担心冬天一到德国部队能从冰上开到芬宁岛和阿尔森岛<sup>①</sup>的时候军事行动会重新恢复是毫无根据的。德国人和丹麦人一样，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进行冬季远征是吃不消的。而3个月的休战对丹麦和对丹麦抱友好态度的什列斯維希居民来说是很大的机会。如果在3个月内和约还不签订，那末休战条约自然就会拖延到春季。这家报纸继续写道：

“取消封锁和释放战俘大家会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交还截获的船只也许会引起来某些人的不满。其实，我们截获德国船只仅仅是作为迫使德国不能越过我国国境的一种强制手段，决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去霸占别国的私有财产。而且这些船只的价值也决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在目前国内市场和整个欧洲贸易都处于停滞的情况下，这些船只能拍卖，而且至多也只能卖得150万，即两个月军费的总数。但是交还船只的代价是德国人退出两个公国和赔偿由于在日德兰实行征集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我们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手段现在当然就没有必要再采用了。我们觉得，使3个地区摆脱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军队的统治（我们自己决不可能迫使这种军队撤退），比国家出卖截获的船只所获得的那么点利益要大10倍。”

据说第7条引起极大的怀疑。这一条说，要继续保留公国中的特别政府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主义”；这一条规定，由丹麦国王任命的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必须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

<sup>①</sup> 丹麦称作：芬和阿尔斯。——编者注

名流中提出，这样就很难找到一个非“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然而“一切暴动”都受到严厉的斥責，临时政府的一切決議都被废除，而3月17日以前的制度又告恢复。

“这样，我們从丹麦的观点来考察了休战协定的一切基本条件。我們不妨也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一下。

德国的一切要求归结为交还船只和取消封鎖。

德国放弃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放弃由强大无敌的军队所占領的公国，这个军队能够打败比至今和它对抗过的敌人强大一倍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陣地；

第二，放弃什列斯維希加入德意志联邦，虽然联邦議會宣布过这件事情，而且国民議會也以吸收什列斯維希代表参加議會的方式承認了这一点；

第三，放弃德国承認为合法的并且与其进行过談判的临时政府；

第四，放弃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党，把这个党所提出的受到全德支持的要求原封未动地交給非德意志国家去研究；

第五，放弃援助奥古斯丁堡的王位篡夺者，虽然普魯士国王曾經亲口答应援助这些王位篡夺者，但是在休战协定中却根本没有提到他們，而且既不保証他們得到赦免，又不保証他們享有避难权；

最后，放弃公国和德意志联邦各自担負的那部分战費的賠款。但是丹麦本身所耗費的那笔战費将得到賠償。

我們覺得，我們相当强大的敌人在这个休战条約中所遭受的損失，比我們这个渺小而受人輕視的人民要大得多。”

什列斯維希莫名其妙地想做德国人。因此它自討苦吃，受到德国的任意摆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休战协定的本文我們明天发表。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0日

載于1848年7月21日

“新萊茵报”第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和丹麦的休战

科倫 7 月 21 日。我們的讀者都知道，我們對丹麥戰爭始終採取很冷靜的態度。我們既不贊同民族主義者那種大吹大擂的豪言壯語，也不贊同歌唱受海洋沖洗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那種令人厭煩和充滿廉價熱情的歌曲。我們非常了解我們的祖國，我們了解對德國的信賴究竟意味着什麼。

這些事件充分証實了我們的觀點。丹麥人毫無阻礙地占領什列斯維希；德國人重行占領這個國家，向日德蘭遠征，向什萊退却，再一次占領這個公國（直到克尼格紹<sup>①</sup>），——所有這些始終令人不解的戰爭向什列斯維希人清楚地表明，從實現了革命的强大而丑結的德國，即從似乎是有主權的 4 500 萬人民那里能得到怎樣的保護。但是為了徹底打消他們成為德國人的熱望，為了使他們感到“丹麥的鎖鏈”遠比“德國的自由”來得仁慈，普魯士代表德意志聯邦進行休戰談判，我們今天把休戰協定直譯出來發表。

按照歷來的慣例，在簽訂休戰協定時雙方軍隊保持原來的陣地，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在雙方之間劃出一塊狹小的中立地帶。可是在簽訂這個休戰協定（“光榮的普魯士軍隊”的第一次勝利）時，勝利的普魯士人要後退 20 哩，從科爾丁<sup>②</sup>撤到勞恩堡；而被打敗

① 丹麥稱作：康格-奧。——編者注

② 即柯林加。——編者注

的丹麦人却保持着科尔丁的陣地，而仅仅放弃阿尔森。不仅如此，一旦休战协定被废除，丹麦人就会重新回到他們在6月24日所占領的陣地，就是說，他們会一弹不发地占領北什列斯維希6—7哩的地帶，即他們曾两次被驅逐出来的地帶；而德国人却只能推进到阿彭拉特<sup>①</sup>和它的郊区为止。“德国軍队的荣誉”就是这样“被保卫”的，而連遭德国部队4次占領以后瀕于民穷财尽的北什列斯維希还不得不遭受第5次和第6次的侵略！

不仅如此。什列斯維希的部分地区甚至在休战的时候还将由丹麦部队来占領。按照休战协定第8条規定，什列斯維希将由在公国中招募的人員所組成的团队来占領，这个团队的人員部分由参加运动的什列斯維希士兵組成，部分由在丹麦担任警备勤务、和丹麦軍队一起反对临时政府、受丹麦軍官指揮并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丹麦部队的那种团队組成。丹麦报纸对情况的估計如下。

7月13日“祖国报”写道：“毫无疑问，只要可靠的什列斯維希部队来到公国，就会大大提高人民的情緒，因为人民历尽了战争的灾难，他們現在对制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深恶痛絕。”

而且还有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运动！丹麦人把它叫做暴动，普魯士人象对付暴动一样来对付这个运动。得到普魯士和德意志联邦承認的临时政府遭到了无情的摧残。自从什列斯維希独立以来頒布的一切法律和决定都一概无效；相反地，已被废除的丹麦法律却重新生效。简单地說，关于对著名的維登布魯赫照会的答复，即被奧尔斯瓦特所拒絕的答复就表现在这个休战协定草案的第7条上。运动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都遭到无情地破坏，革命中涌現

---

① 即奧卜罗。——編者注

出来的政府也由3个正統的当权者所任命的正統政府所代替。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維希的部队又重新受丹麦人的指揮和丹麦人的懲罰；尽管临时政府最近发布了命令，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維希的船只仍然是“Dansk-Eiendom”〔“丹麦的财产”〕。

最后，前面所說的那个新政府圓滿地結束了这一切活动。請听“祖国报”是怎样說的：

“如果我們在从中选择新政府的丹麦成員的有限的人中間，也許不能发现象普魯士在选择自己的成員时将会取得的那种毅力和才能、智慧和經驗的結合（那也万无一失）<sup>①</sup>。政府人員无疑必須从公国的人民中挑选出来，但是誰也沒有禁止我們用其他地区出生的和定居的居民中选出的秘書和助理来包围他們。在挑选这些秘書和顧問的时候，用不着考虑地区的条件，而只要注意他們的能力和才干就行了；很可能这些人对政府活动的全部精神和方針的影响很大。可以指望，甚至位居高职的丹麦官員都不惜降低級別猎取这种职位。在当前的情况下，每个善良的丹麦人都把担任这个职位看成是光荣。”

因此，內閣的報紙向各公国預言，充斥公国境內的将不仅有丹麦的部队，而且还有丹麦的官員。半丹麦政府将把位于公認為德意志联邦領土上的倫特斯堡作为自己的官邸。

这就是休战协定帶給什列斯維希的好处。德国将得到的好处也不少。对于把什列斯維希列入德意志联邦的这件事却只字未提；相反地，联邦議会的决定由于新政府的組成方式而完全遭到否定。霍尔施坦的代表由德意志联邦挑选，什列斯維希的代表由丹麦国王挑选。什列斯維希因此受丹麦的統治，而不受德国的統治。

如果德国能达到取消海峽稅<sup>151</sup>，即旧时封建掠夺的残余，那它可能真的会把这次丹麦战争看作自己的功劳。遭受封鎖和船只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被掠夺等损害的德国海滨城市还可能会甘心情愿长期忍受这种压迫，如果这种压迫能使海峡关税取消的话。政府大声疾呼地到处声明，无论如何要取消关税。从这种吹嘘中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英国和俄国想保留海峡关税，而一味顺从的德国当然是唯命是听的。

不言而喻，交还船只将以赔偿在日德兰征集的全部东西为条件，其根据是德国相当富裕，能够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

这就是汉澤曼内阁在这个休战条约草案中答应给人民的好处！这就是和 50 万人口的小国人民打了 3 个月仗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我们那些民族主义的报刊、我们那些气势汹汹地主张消灭丹麦人的刽子手大吹大擂的结果！

据说，休战协定是不会签订的。得到貝澤勒尔支持的弗兰格尔将军断然拒绝在休战协定上签字，虽然普尔塔勒斯伯爵把奥尔斯瓦特的有关命令转交给他并一再请他签字，虽然屡次提醒他不要忘记普鲁士将军的义务。弗兰格尔声明说，他首先服从德国的中央政权，但是如果军队不能保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临时政府在签订和约以前不能保住政权的话，那末中央政权就不会同意签订休战协定。

因此，普鲁士的草案可能不会得到实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草案作为普鲁士在领导德国时怎样保卫它的荣誉和利益的证据来说，是耐人寻味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21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22 日

“新莱茵报”第 5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續)

科倫 7 月 22 日。事變、法案、休戰計劃等等終於使我們又回到我們所喜愛的妥協辯論上來。上台發言的是幽里希的議員馮·貝爾格先生，這是一個使我們倍感興趣的人：第一，他是萊茵省的居民，第二，他不久前才成為內閣的擁護者。

貝爾格先生提出各種理由來反對雅科比的提案。他的第一個理由是：

“提案的第一部分要求我們反對德國議會的一個決議，這無異是以少數反對合法的多數。其次，這無異是在立法機關中遭到了失敗的一部分人想在外邊尋找支持，其後果必然會導致內戰。”

在 1840—1845 年提議廢除谷物法的科布頓先生在下院是處於少數的地位。他是“在立法機關中遭到了失敗的”人。他究竟做了些什麼呢？他企圖“在外邊尋找支持”。他不僅反對議會的決議，而且遠遠超過了這個範圍，他創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創辦了反對谷物法的報刊，——總之，他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對谷物法的宣傳活動。在貝爾格先生看來，這就是“必然會導致內戰”的企圖。

不朽的聯合議會的少數派議員也曾試圖“在外邊尋找支持”。康普豪森先生、漢澤曼先生和米爾德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表現過絲毫的動搖，可作為證據的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顯然，在貝爾格先生看來，他們的行動的後果也“必然會導致內戰”。但他們并

沒有导致內战，而取得了大臣的职位。

类似的例子我們还能举出几百个来。

总之，如果立法机关的少数派不想引起內战，就不應該到外面去寻找支持。但是“在外面”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指选民，即創立立法机关的人們。但是，既然不能用影响这些选民的方法来寻找“支持”，那末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支持呢？

难道汉澤曼先生、賴辛施佩格先生、馮·貝尔格先生等人的演講只是給議會听的嗎？或者也給那些从速記記錄来讀这些演講的公众听呢？这些演講不也就是这些“立法机关內的人企图”或希望“在外面寻找支持”的手段嗎？

一句話：貝尔格先生的原則会取消一切政治宣传鼓动。宣传鼓动无非就是把人民代表不受侵犯、出版自由和結社权，亦即以法律为基础的普魯士現有的各种自由加以运用。这些自由是否会导致內战，和我們毫无关系；只要它們存在就够了，此外我們还要看一看，如果今后这些自由遭到侵犯，将会“导致”什么結果。

“諸位先生，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的这些企图不是最近几天才产生的，它們从德国人民站起来的那天起就产生了。在預备国会里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議曾离开了会场，結果就产生了內战。”

第一，在雅科比的提案中“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議而离开会场”一事只字未提。

第二，“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影响的企图”，当然“不是最近几天产生的”，它們是从有立法机关和少数派那天起就产生了。

第三，內战不是預备国会中的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議而离开会场所导致的，而是米特迈尔先生的“道义上的信念”，即認為黑克尔



和菲克勒尔等是卖国贼，以及巴登政府为此所采取的最可耻的恐吓措施所导致的<sup>152</sup>。

在关于内战的論証(当然它能使德国市民感到极其恐惧)之后的另一个論証，是关于沒有权力的論証。

“我們的选民选举我們来制定普魯士的宪法；这些选民派了自己的另一些同胞到法兰克福去建立中央政权。不能否認，把全权委托給他人的选民也有权贊成或不贊成他的全权代表的行动；但是选民沒有委托我們在这个問題上代替他們投票。”

这个有分量的論証使議會中的法学家和法学的涉猎者贊不絕口。我們不是受全权委托的！但是，这位貝尔格先生两分鐘后就又声称，法兰克福議会的“召开是为了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未来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普魯士政府不先和妥協議会或根据新宪法选举出来的議會討論一下，难道就会批准嗎？可是，內閣却立即把它承認帝国摄政王和它的保留条件通知了議會，并建議議會发表意見！

可見正是貝尔格先生的观点、他的演講和奧尔斯瓦特先生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結論：議會无疑完全有权来研究法兰克福的決議！

我們不是受全权委托的！这就是說，如果法兰克福議會又要实行書报检查，并且在議會与国王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派遣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軍隊到普魯士去援助国王，那时貝尔格先生就沒有“权力”了！

貝尔格先生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呢？照字面上說，不过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因而他无权提出質問，无权协商制定关于代表不受侵犯的法律、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律、关于贖买以及其它在宪

法上沒有明文規定的法律。反动派每天強調的也正是这点。他自己說：“超出这些权力的每一个步驟都是不公正的，都是对自己权力的破坏甚至是叛变行为！”

可是貝尔格先生和整个議會仍然无时无刻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权力。由于暫时的革命的（或者現在更确切地說是反动的）情况，他們不能不破坏它們。由于这种暫时的情况，議会的权限扩大到一切能巩固三月革命成果的措施上，而如果这个目的通过对法兰克福議會施以道德影响就能达到的話，那末妥協議會不仅有权，而且應該施以这样的影响。

随后是萊茵—普魯士的論証，这个論証对我們萊茵省居民來說是重要的，这特別是因为它表明了我們的利益在柏林是怎样表現出来的。

“我們这些萊茵省、威斯特伐里亚以及其它各省的居民，除了归附于普魯士王国外，和普魯士就根本沒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我們破坏了这种关系，国家就会分裂。我和我省的大多数代表可能一样，完全不懂为什么我們需要柏林共和国。如果这样我們倒宁可希望有一个科倫共和国。”

这里我們不来分析这些无聊的推測：如果普魯士变成“柏林共和国”，我們“能希望得到”什么。同样也不来分析关于普魯士邦存在条件的新理論等等。我們作为萊茵省的居民只是抗議所謂“我們归附于普魯士王国”。相反地，“普魯士王国”依屬于我們。

接着起来反对雅科比提案的是爱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他把貝尔格先生所說的重述了一遍。

在他講完后走上講台的是左派发言人，然后是察哈里埃先生。他又把西蒙斯先生所說的重述了一遍。

敦克尔議員又重述了察哈里埃先生的发言。但是他也談了一

些別的東西，或者更确切地說，他十分明确地重述了別人已經說過的話，所以值得簡短地來談一下他的發言。

“如果我們，1 600 萬德國人的制憲議會，這樣責難代表全體德國人的制憲議會，那末，我們這樣是否能在人民意識中鞏固德國中央政權的威信、德國議會的威信呢？我們這樣不會破壞個別民族為了使制憲議會的行動有利於德國的統一而對它表示應有的心甘情願的順從嗎？”

按照敦克尔先生的意見，中央政權和國民議會的威信——“心甘情願的順從”——在於人民盲目服從這個政權，但個別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條件，而且一有機會就完全不服從它。

“現在，事實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某種理論上的聲明還有什麼用呢？”

就是說，“1 600 萬德國人”的代表承認法蘭克福議會的自主權只是“理論上的聲明”！？

“如果將來普魯士政府和人民代表認為在法蘭克福通過的任何決議都是行不通的，不能實現的，那末，這種決議還有執行的可能嗎？”

因此，光是普魯士政府和普魯士人民代表的意見、見解就能使國民議會的決議行不通。

“如果全體普魯士人民，如果德國有 $\frac{2}{5}$ 不願意服從法蘭克福的決議，那末不管今天我們怎樣說，它們還是無法執行的。”

這就是古老的普魯士的高傲，這就是閃耀着昔日極盛的光輝、帶着老弗里茨<sup>①</sup>的發辮和拐杖的柏林民族愛國主義！我們固然是少數，我們只占 $\frac{2}{5}$ （甚至更少），但我們已經向多數表明，我們是德國的主人，我們是普魯士人！

我們勸告右派議員先生們不要在“ $\frac{2}{5}$ ”和“ $\frac{3}{5}$ ”之間挑起這種

① 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編者注

冲突。数量上的对比毕竟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省或许还会记得，它们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而只是在30年前才变成了普鲁士的。

可是敦克尔先生能找到出路。法兰克福的議員和我們一样应该“只通过表达合理的共同意志和真正的社会輿論、并为国家的道德意識所容許的決議”，即合乎敦克尔議員心意的決議。

“如果我們和法兰克福議会的議員一样通过这些決議，那我們就会自主，他們也会自主，否則，即使我們把这決議頒布10次，也是办不到的。”

敦克尔先生在談了这个含意深刻的、符合他的道德意識的自主权的定义后，叹了一口气說：“但这是将来的事。”他就这样結束了自己的演講。

篇幅和時間都不允許我們再来談左派在那一天的发言。但是，根据我們所援引的右派的发言，看来讀者可以确信帕里鳩斯先生提出延期举行會議的建議还不至于不对，他的理由是：“天气这么炎热，在会场里要保持完全清醒的头脑是不可能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23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53号

## 都灵的“协和报”<sup>153</sup>

科倫 7 月 23 日。不久以前我們曾經提到，在佛罗倫薩出版的“黎明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我們伸出友誼的手<sup>①</sup>。可以預料，另外一家报纸，即具有相反傾向的都灵“协和报”也会发表相反而并不含敌意的意見。有一号旧“协和报”曾經說过，“新萊茵报”每次都站在“失敗者”那一边。“协和报”根据我們对布拉格事件的評价以及我們对反对反动的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民主派所采取的同情态度，做出了这个含糊不清的結論。不过，从那时起，都灵的这家报纸对于所謂捷克运动的性質也許有了較好的了解。

可是，不久以前，“协和报”却针对“Nuova Gazzetta Renana”〔“新萊茵报”〕写了一篇多少带学究气的文章。“协和报”讀了我們报上登載的关于在柏林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sup>154</sup>的綱領，对于其中应由工人討論的 8 条大为不安。

“协和报”如实地轉載了全部綱領，并发表了如下的批評意見：

“在这些建議中有許多正确和公正的地方，但是‘协和报’如果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錯誤，就可能背叛自己的使命。”

對我們來說，我們要坚决反对“协和报”的“錯誤”，这种錯誤就是：“协和报”把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起草而仅由我們轉載

---

① 見本卷第 179 頁。——編者注

---

的綱領当做我們自己的綱領。虽然如此，只要“协和报”綱領比那一大堆人所共知的博爱詞句和关于自由貿易的流行教条更充实的話，我們准备同“协和报”就政治經濟問題进行辯論。

写于1848年7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25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55号

##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續完)

科倫7月24日。几天前,世界事件的洪流使我們中斷了关于这些辯論的报道,我們毗鄰的一位評論家殷勤地代我們做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他已經把大家的視綫轉移到“这两天大辯論中多数派的講演者(特别是我們的无与伦比的鮑姆施塔克)①所提出的許多卓越的思想 and 精辟的見解上,以及他們对真正自由的正确的、合理的理解上”<sup>155</sup>。

我們應該尽快地結束我們的报道,但我們也不能放弃机会从右派所发表的“許多”卓越的思想 and 精辟的見解中挑几个例子看看,以資消遣。

辯論的第二天首先发言的是阿貝格議員,他用威胁的口气向議會声明說:要闡明与这个提案有关的一切問題,就勢必要完全重复法兰克福的全部討論,而崇高的議會显然是沒有权利这样做的!你們的选民先生們“根据他們所固有的机智和常識”也永远不会贊成这样做!此外,如果(这里表現了异常“卓越的思想”)“問題不只是一些保留条件”,而是“肯定地贊同或不贊同法兰克福的決議”,那末,德国的統一将会变成什么呢?所以只好滿足于“純粹形式上的服从”!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当然，可以把“纯粹形式上的服从”限定为“保留条件”，而在万不得已时甚至可以公开破坏，德国的统一不会因此而遭到损失；但是从文体的、逻辑的或实际的观点来赞同或不赞同这些决议，来评价这些决议，却真是史无前例的！

阿貝格先生在結束自己的发言时指出，对那些提交柏林議會而不是提交法兰克福議會审查的保留条件，应该发表意見的是法兰克福議會，而不是柏林議會。不許預料法兰克福議員的見解，因为这对他們來說是侮辱！

柏林的先生們沒有資格去判断他們自己的大臣向他們所作的声明。

我們不打算再談小人物的偶像，不再談巴尔策、肯普夫和格萊夫这些人了，我們要尽快地來談談當日的英雄，即无与倫比的鮑姆施塔克。

鮑姆施塔克議員声明：在他沒有被迫承認自己对某件事情一窍不通以前，他永远不会同意宣布自己沒有資格过問这件事情，——但是难道 8 个星期辯論的結果会是一窍不通嗎？

所以，鮑姆施塔克議員是有資格的。也就是說：

“我要問：我們以前所表現的智慧是不是賦予我們全权(即資格)<sup>①</sup>去反对国民議會，这个議會以

它的高尚的思想，

崇高的理智，

合乎道德的国家观点”，总之，

“以一切使德国在历史上备受称頌的东西，

唤起了德国普遍的兴趣，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引起了全歐洲的贊美。我對所有這些都推崇備至(即宣布自己是沒有資格的)①，並希望議會出於真理感(!)也對這些推崇備至”(即宣布自己是沒有資格的)!

“有資格的”鮑姆施塔克議員繼續說：“諸位先生，昨天的會議上有人說關於共和國等的談話帶有非哲學的性質。但是，認為民主意義上的共和國的徵兆就是國家元首的個人責任制，這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非哲學的。諸位先生，無疑地，所有的國家法的哲學家，從柏拉圖直達到爾曼(鮑姆施塔克議員的確不能再“往下”了)②說的正是這個觀點，如果我們沒有尚待提出的完全特殊的理由，我們就不能同這個千年以上的真理(!)，同歷史事實發生矛盾。”

這就是說，鮑姆施塔克先生認為這種甚至要同“歷史事實”發生矛盾的“完全特殊的理由”還是可以找到的。不過，右派議員先生們在這方面通常是不拘禮節的。

其次，鮑姆施塔克先生又宣布自己是沒有資格的，他把資格推到“所有的國家法的哲學家，從柏拉圖直達到爾曼”的身上，而鮑姆施塔克先生當然是不屬於這類哲學家的。

“諸位只要想一想這個國家大廈！一個議會和一個負責的帝國攝政王，這是以現行的選舉法為基礎的！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大家都會同意，這是違反常識的。”

在這裡，鮑姆施塔克先生說了一段深思熟慮的甚至經過最縝密的 research 也不會違反“常識”的話。

“諸位先生，共和國需要兩個東西，即人民的意見和領導人。如果我們更仔細地看看我們德國人民的意見，我們未必能在其中找到這種共和國(即上述的帝國攝政王的共和國)③的跡象！”

因而，鮑姆施塔克先生又宣布自己是沒有資格的，可是，這一次有資格過問共和國問題的不是他，而是人民的意見。因此，在這

---

① ② ③ 括弧裏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个問題上人民的意見要比鮑姆施塔克議員“理解得”透彻。

但是最后講演人証明，也有一些問題，他多少能“理解”，这首先就是关于人民主权的問題。

“諸位先生！历史給我們証明了——这点我也要談談——，在我們这里人民主权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它在变化中，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关于勃兰登堡—普魯士历史和人民主权的“异常卓越的思想 and 极其精辟的見解”，这些思想和見解使毗邻的評論家由于过分地感到立宪的幸福和学究式的狂喜而忘記了世上所有的苦难。

“当伟大的选帝侯<sup>①</sup>不理睬那些腐朽的染上了法国荒淫毒素（可是初夜权正是被“法国荒淫的”文明所逐漸埋葬的！）<sup>②</sup>的等級分子时，当他甚至（！）消灭了他們时（“消灭”无疑是抛弃某种东西的最好方法）<sup>③</sup>，具有深厚的道德感的全国人民都热烈地欢迎他；这样，德国的特别是普魯士的国家大厦就巩固起来了。”

令人贊叹的是 17 世紀勃兰登堡市僧們的这种“深厚的道德感”，他們預先就深知事关自己的利益，因而热烈地欢迎选帝侯，当时选帝侯正向他們的敌人——封建主进攻，但是却把特权出卖給他們。更令人贊叹的是鮑姆施塔克先生的“健全的理智”和“精辟的見解”，他認為“人民主权”就表現在这种热烈之中！

“当时，沒有一个人不表示自己忠于这个君主专制制度（因为，否則他就会遭到鞭笞）<sup>④</sup>，而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如果不依靠真正的人民主权，他就永远不会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鮑姆施塔克先生所謂的真正的人民主权，就是鞭笞、农奴制和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編者注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劳役的人民主权。这是坦白的承認!

鮑姆施塔克先生現在从真正的人民主权轉而談到假的人民主权。

“但是,另外一个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到来了。”

他用了一长篇“立宪的演說”証明这点,这篇演說简单地归結起来就是,从1811年到1847年普魯士人民一直要求的是宪法,而决不是共和国(!);接着又从容地指出,“人民甚至也憤怒地离弃了”德国南部的最近一次共和派起义。

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第二类的人民主权(自然,不能再称它是“真正的”)就是“立宪的”人民主权。

“这类人民主权主张国王和人民分享国家权力,这是被瓜分了的人民主权(讓“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的国家法哲学家們”給我們解释这是什么)①;它應該完全地、无条件地(!!)屬于人民,但是也要无損于国王的合法权力(3月19日以后,这种权力在普魯士是由什么法律确定的呢?)②。这里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鮑姆施塔克議員的头脑中)③;这个概念是由立宪制度的历史确定下来的,因此誰也不会对此再发生怀疑。”(遺憾得很,一讀鮑姆施塔克議員的演講,又开始产生了“怀疑”。)

最后,“还有第三类的人民主权,即民主共和的人民主权,它應該建立在所謂最广泛的基础上。最广泛的基础,这是多么倒霉的說法!”

鮑姆施塔克先生也“发言”反对这个最广泛的基础。这个基础会使国家崩潰,会导致野蛮状态!我們这里沒有能赋予共和国以道德基础的卡托分子。于是鮑姆施塔克先生开始用孟德斯鳩的古老的、破旧不堪的、布滿裂痕的号角大吹共和国的美德,使得毗邻的評論家惊喜若狂而随声附和,使整个欧洲感到惊奇的是,他卓越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地証明“共和国的美德也恰好导致……宪政”！但是，鮑姆施塔克先生馬上就改变了音調，說明沒有共和国的美德也会导致宪政。在这次二重唱中，两个声調經過一系列极伤心的不諧和之后，终于在宪政这样一个調和的和弦上融合起来了；这次二重唱的輝煌效果讀者自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經過十分冗长的議論以后，鮑姆施塔克先生終於得出結論說，在實質上各部大臣並沒有提出“任何实在的保留条件”，而只是拟定了“关于未来的无关紧要的保留条件”，最后鮑姆施塔克自己也談到最广泛的基础，他声明說，挽救德国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民主立宪制度。这时“关于未来德国的思想占据了他”，以致他高呼“人民立宪的世袭的德国王权万岁，万万岁！”

的确，他有权說：这个倒霉的最广泛的基础！

随后，双方都还有些講演者发言，但在鮑姆施塔克議員以后，我們已經决定不再向我們的讀者报道他們的講演了。不过还要指出一点：瓦克斯穆特議員声明，他的信念是基于高貴的施泰因的論点：自由人們的意志是每个王位的不可动搖的支柱。

我們毗邻的評論家簡直乐不可支，大声叫道：“这就是問題的真正实质！自由人們的意志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不可动搖的王位的庇护下这样安逸，而王位也只有建立在自由人們的有理智的热爱上才会如此巩固！”

的确，在这次辯論中，大多数講演者發揮了“許多卓越的思想 and 精辟的見解”以及“对真正自由的合理的理解”，但这些仍然不能同毗邻的評論家的深刻而又丰富的思想相提并論！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7月25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55号

## 强制公債法案及其說明

### 一

科倫 7 月 25 日。有一次，倫敦幸福的圣詹尔士区的一个著名的騙子手到陪审法庭受审。他被控告的原因是：他把全城聞名的守財奴的錢箱減輕了 2 000 鎊。

被告开始說：“陪审員先生們，我不想占很長時間來嘵嘵不休地使你們不耐煩，因此，我不准备多說。我的辯护是帶有政治經濟性質的。我从克里普斯先生那里拿了 2 000 鎊。这的确是事实。可是我拿私人的錢是为了把它們交給社会。这 2 000 鎊到哪儿去了呢？我难道自私自利地把这些錢保存起来嗎？請你們搜查我的錢袋。如果能找到一个辨士，我就把我的灵魂以一个法新賣給你們。这 2 000 鎊你們可以在裁縫那里、在小鋪老板那里、在飯館等等地方找到。那末我究竟干了什么事情呢？守財奴把金錢埋在坟墓里，‘只有强制公債’才能把‘这些无益地埋在坟墓里的錢’挖出来，而我使这些錢‘流通起来’了。我帮助了流通，而流通是創造国民財富的首要条件。先生們，你們是英国人！你們是經濟学家！你們不要給民族的恩人判罪！”

圣詹尔士区的經濟学家現在在凡迪門地方<sup>①</sup>，他有可能深思一下自己同胞的那种盲目的忘恩負义行为。

但是他並沒有虛度年华。他的原則成了汉澤曼的强制公債的

<sup>①</sup> 塔斯馬尼亞。——編者注

基础。

汉澤曼在說明这一措施的理由时说：“发行强制公債是以下面一个无可爭辯的理由为依据的：大部分現金或多或少地、无益地存在私人手中，只有用发行强制公債的办法才能使它們流通起来。”

你們消耗資本就会使資本流通起来。如果你們不使它流通起来，国家就要消耗它，以便使它流通起来。

譬如一个紡織工厂厂主雇用了 100 个工人。假定他每天付給每个工人 9 个銀格罗申，那末，每天就有 900 个銀格罗申或 30 个塔勒从厂主的口袋里轉移到工人的口袋里去，又从工人的口袋里轉移到小鋪老板、房东、皮鞋匠、裁縫等等的口袋里去。30 个塔勒的这种旅行就叫做塔勒的流通。厂主从他只有亏本才能卖出他的棉織品或根本卖不出去的时候起才停止生产和停止雇用工人，而随着生产的停止，30 个塔勒的旅行也就停止了，流通也就停止了。我們要强制恢复流通呵！——汉澤曼感叹地说。厂主为什么把錢无益地摆在他那里呢？他为什么不使它流通起来呢？在天气好的时候，許多人在街上散步。汉澤曼为了制造好天气，就把人們赶到街上去，强迫他們散步。好一个制造天气的能手！

內閣危机和商业危机使资产階級社会的資本无利可图了。国家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摆脱困境，也就要剝夺資本本身。

18 世紀著名的交易所投机商人犹太人品托在他的“关于流通”<sup>156</sup>一書中推荐有价証券的交易。有价証券的交易虽然不創造任何东西，但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財富从一个錢袋向另一个錢袋轉移。汉澤曼把国庫变成旋轉国民的財富的旋盘賭<sup>①</sup>的賭盘。汉澤

① 旋盘賭是一种賭博，以一种旋轉的圓盘置于桌中央，盘中刻有带号碼的球槽，盘中放有一球，旋轉圓盘，然后看球落入哪个槽来决定輸贏。——譯者注

曼一品托！

但是汉澤曼在說明“强制公債法”的“理由”时碰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什么自願公債沒有带来所需要的金額呢？

大家知道，現在的政府享有“絕对的信任”。大家知道，大資產階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热烈的，它只是抱怨某些煽动叛乱的人竟然不贊同它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信任。大家知道，各省都递了表示忠誠的保証書。然而“不管这一切的一切”<sup>157</sup>，汉澤曼不得不把富有詩意的自願公債变成平淡无味的强制公債！

例如，在杜塞尔多夫区，貴族認購了 4 000 塔勒，軍官認購了 900 塔勒。除了杜塞尔多夫区的貴族和軍官外，究竟在哪里能找到更大的信任呢？皇室各大公認購的情形根本不值一提。

我們讓汉澤曼本人給我們解釋这种現象。

“到目前为止，自願認購的數目并不多。也許，这种情况与其說是由于不够信任我們的制度，不如說是不了解国家的真正需要，同时，在沒有弄清楚是否真正要吸收居民的貨幣資金和吸收多少以前，每个人都認為可以观望一下。根据这种情况可以希望，只要向大家解釋清楚义务認購公債是必不可免的，所有的人都会量力自願認購。”

境遇极其悲慘的国家向爱国主义呼吁。它恳求爱国主义獻給祖国 1 500 万塔勒，而且甚至不必贈送，仅仅自願認購公債就行了。对国家的信任是不可动搖的，可是所有的人对国家求援的呼声却充耳不聞。遺憾的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不了解”“国家的真正需要”，他們都怀着无比惋惜的心情暂时不准备給国家任何东西。不錯，人們非常信任国家政权，可是可敬的国家政权却断言：国家需要 1 500 万塔勒。人們正是由于信任的緣故才不相信国家政权的声明，人們把它求助 1 500 万塔勒的号叫仅仅看做是一般的玩笑。

可敬的**宾夕法尼亚人**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从来也不借給自己的朋友一块錢。他对他們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那样信任，他对他們的殷实可靠的事业那样相信，以致他直到临死都不“了解”他們“真正需要”錢。他把他們的迫切要求仅仅看做是考驗他的信任的一种意图，而他的信任是不可动搖的。

普魯士国家政权发现整个国家內居住的全都是这种**宾夕法尼亚人**。

但是，**汉澤曼先生**还用另一种特殊的“情况”來說明这种奇怪的政治經濟現象。

人民不自願出錢，“因为他們認為可以觀望一下，看是否真正要吸收他們的貨幣資金和吸收多少”。換句話說，誰也沒有自願出錢，因为每个人都在觀望，什么时候将迫使他們出錢和出多少。小心謹慎的爱国主义呵！高度复杂的信任呵！在愜意的、热情的自願公債后面現在隱藏着的是阴暗的、忧郁的强制公債，**汉澤曼先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希望所有的人都量力自願認購公債的”。現在至少連最頑固不化的怀疑者也不会不了解，而且会深信：国家政权实在迫切需要錢，但是全部事情，象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就糟在这种令人痛心的不了解情况上。如果你們不把錢交出来，就要从你們那里索取，而这不論对你們或對我們來說，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我們希望：你們的信任将不再是那样过分，不再是娓娓动听的漂亮話，而成为叮当发响的塔勒。Est-ce clair? [明白嗎?]

不管**汉澤曼先生**对这种“情况”抱着怎样的“希望”，可是他的**宾夕法尼亚人**的多疑癖也已傳染了他，他覺得不得不采用更加强烈的刺激剂来促进信任。信任誠然存在，但無論如何不自願表現出来。必須用刺激剂来使它摆脱这种隱蔽状态。



“可是，为了更有力地刺激人們来自願認購公債（比强制公債的前途有力），在第一条中規定按  $3\frac{1}{3}\%$  的利率付給利息，并确定一个日期（10月1日）<sup>①</sup>，在这个日期以前还可以認購利率为 5% 的自願公債。”

这样，汉澤曼先生就給認購自願公債的人規定了  $1\frac{2}{3}\%$  的獎金。現在，爱国主义一定会变成現金，錢箱子馬上就可以打开，信任的金流将源源流入国庫。

当然，汉澤曼先生認為富人認購的公債的利率比穷人的高  $1\frac{2}{3}\%$  是“公平的”，因为从后者手中只能用强力才能夺取最必要的东西。此外，穷人还应当負担訴訟費用，作为对他那种不太令人滿意的財產状况的懲罰。

这样，聖經上的一个箴言正在实现。凡有的，还要加給他，叫 he 有余，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夺去<sup>②</sup>。

① 括弧里的話是作者的。——譯者注

② 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 25 章第 29 节。——譯者注

## 二

科倫 7 月 29 日。正如皮尔曾經給谷物稅发明了“調节制”<sup>158</sup>一样, 汉澤曼-品托也給非自願的爱国主义发明了“調节制”。

我們的汉澤曼在他的对法案的說明中写道：“义务認購公債的百分比按累进制計算, 因为很明显, 和財產增加的比例相比較, 拥有金錢的可能性是按照算术級数的比例增长的。”

財產增加了, 拥有金錢的可能性也随着增长。换言之: 手里拥有的金錢越多, 就越能拥有更多的金錢。这一切暫且都是正确的。但是, 甚至当財產按照几何級数的比例增加时, 拥有金錢的可能性也只是按算术級数的比例增长的。这是汉澤曼的发明。这个发明超过了馬尔薩斯認為人口按几何級数增加而生活資料只按算术級数增加的原理, 它将使汉澤曼在后代中間享有更大的荣誉。

这样說来, 如果財產增加的比例是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那末, 按照汉澤曼先生的发明, 拥有金錢的可能性的增长則是

1, 2, 3, 4, 5, 6, 7, 8, 9, 10。

尽管义务認購公債的数目表面上在增加, 可是在我們的經濟学家看来, 拥有金錢的可能性却随着財產的增加而下降。

塞万提斯在一个短篇小說<sup>159</sup>中描写过一个被关在疯人院中的非常伟大的西班牙財政学家。这个財政学家发明: 如果

“国会通过一項法律, 根据这项法律, 陛下所有 14 岁至 60 岁的臣民, 在

一个月中間必須有一天只吃面包和水(究竟在哪一天由他們自己选择),把这一天需要买水果、蔬菜、肉、魚、酒、鷄蛋和豆子的錢省下来分文不留地交給陛下,破坏誓言应受到懲罰”,

那末西班牙的國債就会償清。

汉澤曼簡化了手續。他建議他的凡是年收入为 400 塔勒的西班牙人在一年中能够有一天放弃 20 个塔勒。他建議财产少的人应按照調节制在 40 天内几乎放弃一切需要。如果他們在八九月間找不到 20 个塔勒,在 10 月里司法执行官就要去找他們。因为俗話說:只要找就可以找到。

我們来繼續探討我們普魯士的奈克尔的“說明”。

他开导我們說:“营业的从最广义上講的一切收入,即不管这种收入是否应課營業稅,同医师和律師的收入一样,在計算的时候只能扣除生产費用(包括債務的利息在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純收入。根据这种理由,如果按照收入計算出来的公債額高于按照流动資本計算出来的公債額,那就不必去注意營業流动資本。”

Nous marchons de surprise en surprise [意外的礼物給我們一件一件地送来]。确定收入时只能扣除流动資本,因为强制公債无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所得稅。可是,企业的費用和企业主的收入的关系,就同树木的干与根和树木的果实的关系一样。因此,根据上述应当課稅的是收入而不是流动資本这一理由,如果对国庫更有利,那末应当課稅的正是流动資本而不是收入。由此可見,“用什么办法計算純收入”在汉澤曼先生看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他所感到兴趣的只是,“用什么办法計算”可以使国庫“获得最多的收入”。

图謀侵犯流动資本的汉澤曼先生,象野蛮人一样,是砍树

取果。

“因此，如果（根据法案第 9 条）<sup>①</sup>按照营业流动资本计算出来的公债数额高于按照收入的 10 倍计算出来的数额，那末就按照前一种方式计算”，那时就应当“注意营业流动资本”本身。

由此可见，每当国库认为合乎自己利益的时候，它可以把财产作为自己要求的基础，而不把收入作为自己要求的基础。

人民要求调查秘密的普鲁士国库。办事内阁这样回答这个不知分寸的要求：它有权深入地审查所有账簿和编制关于全体公民财产状况的清单。普鲁士的宪政时期不是由人民检查国家的财产状况开始，相反地，而是由国家检查公民的财产状况开始。这样，就给官僚制度无耻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在比利时，国家也发行强制公债，但它仅仅满足于税收册和抵押登记簿，满足于现有的官方文件。而办事内阁却把普鲁士军队的斯巴达精神运用到普鲁士的政治经济学中去。

诚然，汉泽曼在自己的“说明”中企图用种种甜言蜜语和友好诺言来安慰公民。

他低声对他们说：“摊派公债是以自报为基础的”。“凡能引起敌意”的一切，都是不容许的。

“甚至不需要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为检查自报情况而成立的区委员会应当用善意的说服办法号召大家自愿认购公债，只有在这种办法无效时，才由区委员会确定认购的数目。对区委员会的决定有意见时可以向省委员会提出申诉等等。”

**自报！甚至不需要任何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

<sup>①</sup>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善意的說服！申訴！

难道这些你还嫌少嗎？160

讓我們立刻从末尾即从申訴开始談起。

第 16 条規定：

“征收在規定的日期內进行，而不管所提出的申訴，如果将来申訴被認為是有理由的，可以退还所繳納的款額。”

总之，首先是强制征收，而不管申訴，然后是承認申訴的理由，而不管强制征收！

不仅如此！

“在申訴被全部或部分地駁回的情況下”，申訴的“費用应由申訴者負擔。在必要时，这些費用应按行政方式征收”（第 19 条）。凡是知道在經濟上不可能精确估計財產的人，立刻就会明白申訴总可以被部分地駁回，这样一来，損失总要由申訴者負擔。因此，不管是怎樣的申訴，金錢損失始終是和它形影不离的。多么值得欢迎的申訴权呵！

讓我們再从末尾回到开头，即从申訴回到自报吧！

看来，汉澤曼是不害怕他的斯巴达人虛报产額的。

根据第 13 条的規定，“义务認購公債者的自报是摊派公債的基础”。汉澤曼的法案的結構是这样的：从房屋的基础不可能判断出它以后的輪廓。

或者，更确切些說，“自报”（它将以“报稅单”的形式交給由“財政大臣”先生“或根据他的委托而由区行政机关任命的特殊官吏”）这个基础現在得到了更深刻的論証。根据第 14 条的規定，“为了审查自报說明書，需要召集一个或几个委員會。委員會的主席及

其他委員均由財政大臣或由他授权的当局任命，其人数不得少于5人”。因此，財政大臣或由他授权的当局的任命就构成了审查的真正基础。

如果自报同这种由財政大臣任命的区委员会或市委员会的“意見”有分歧，就把“自报者”請来，讓他說明理由(第15条)。不管他是否提出这种說明，反正都一样，因为一切都要看自报是否使由財政大臣任命的委员会“感到滿意”来决定。如果自报不能令人滿意，“委员会就根据自己的公議来确定認購的数目，并把这一点通知义务認購者”。

首先由义务認購者自报，并把这一点通知官吏。現在由官吏进行公議，并把这一点通知义务認購者。“自报”的結果怎样呢？这个基础結果被彻底破坏了。自报只不过是對义务認購者进行切实的“审查”提供了理由。別人的公議則直接造成了强制征收。第16条中規定：

“区(或市)委员会的决定应交給区行政机关。区行政机关根据这些决定立即編制公債数額一覽表，并把它們交給相应的征收处，按照現行稅务条例进行征收，必要时可以采用强制手段。”

我們已經看到，申訴的道路并不是經常“薔薇遍布”，而且也荆棘丛生的。

第一，检查申訴的区委员会是由根据1848年4月8日的法律选出来的复选人所选出的代表組成的。

但是，在强制公債面前，全国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陣营——倔强者和忠順者的陣营，在区委员会中，对后者已經繳納的和答应繳納的款項不会提出任何異議。所以，代表只能从忠順者的陣营中間选举(第17条)。

第二，主席由財政大臣任命的委員擔任，并且派一个官員擔任秘書，暫時歸他領導（第 18 條）。

第三，區委員會有权對財產或收入進行特殊的公議，同時為了這個目的，還可以要求交出估價單，或者可以審查賬簿。如果這種審查還嫌不夠，可以拷問申訴者的口供，叫他宣誓。

由此可見，如果有人不是無條件地同意接受由財政大臣任命的官吏所做的“公議”，那他就應當讓 2 個官吏和 15 個競爭者去了解他的全部財產狀況，作為對他的一種懲罰。這就是荊棘叢生的申訴的道路！因此，漢澤曼在草案說明中所講的下面一段話簡直是對他的讀者的嘲弄：

“攤派公債是以自報為基礎的。為了使它不致引起絲毫的敵意，甚至可以不要關於財產各個組成部分的一般資料。”

辦事大臣在他的法案中甚至沒有忽略對“破壞誓言”的懲罰，——真是和塞萬提斯筆下的空洞計劃制訂者一模一樣。

如果我們的漢澤曼不去煞費苦心地捏造他那虛假的說明，而用喜劇角色的口吻說出以下的話，也許要更為痛快一些：

“如果你們不借給我錢，叫我怎麼去還舊債借新債呢？”

但是，在目前，當普魯士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準備背叛德國和力圖起來反對中央政權的時候，每一個愛國者的職責就是不要自願為強制公債付出一個分尼的錢。只有徹底剝奪普魯士的生活資料，才能迫使它向德國屈服。

寫於 1848 年 7 月 25--29 日

載於 1848 年 7 月 26 和 30 日

“新萊茵報”第 55 和 60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 关于区等級會議的妥協辯論

(7月18日的妥協會議)

科倫7月25日。我們今天从許多混亂的、无用的、純粹个人的文件和討論（一切會議通常都是由此开始的）中抽出两点來談談。

第一点是前任大臣洛貝爾图斯交給主席的、后来在講台上宣讀的書面声明：虽然他報名发言時說要反对雅科比的提案，但是他打算只反对这个譴責法兰克福決議的提案的第一部分，同时也反对內閣在7月4日对这个問題所作的声明。大家知道，不等洛貝爾图斯先生发言，討論就中止了。

第二点是布洛多夫斯基先生代表全体波兰議員对德籍波兰議員的沒有根据的声明所作的声明；他不贊同把波茲南的一部分并入德意志联邦，他認為这是非法的；他的根据是1815年的条約和国王所引起的省等級會議反对把这块土地划入德意志联邦的声明<sup>161</sup>。

“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步合法途径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征求国家对这件事情的意見。”

接着对奏摺进行最后的討論。大家知道，奏摺在左派的“又是信任問題！”的叫喊声中和全場的大笑声中被否决了。

随后討論了委员会关于94位議員提議取消区等級會議課稅



权的报告。

我們打算来談談这个問題。它使我們又想起了真正的旧普魯士的立法；日益强大的反动派越来越贊美这种立法是完美无缺的典型，而不想扮演过渡內閣角色的办事內閣則越来越恬不知耻地贊美博德尔斯文克內閣。

根据还在 1840 年以前就頒布的一些法律，区等級會議有权規定本区居民的稅賦。

这些区等級會議是旧普魯士“代議制”的最好的典型。在一个区里，农民中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总共可派 3 个代表；每座城市通常派一个代表；但是每个貴族地主則都是区等級會議的世袭代表。城市里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資产階級，乡村里的小私有者和外乡人，总之，絕大多数的居民都沒有代表。虽然这些階級沒有代表，但是代表們，特別是“区等級會議的世袭代表”先生們却要向他們課稅，至于为了什么目的，我們馬上就会看到。

这些区等級會議还能完全独立地支配一区的財政，但是在解决課稅問題时，必須取得总督或国王的同意。此外，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和某个等級有特殊的意見，就由內政大臣来作最后的決定。由此可見，旧普魯士国家制度是多么善于巧妙地保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合法取得的权利”和官僚制度的最高監督权。

但是，正如在中央委員會的报告中极其明确地承認的那樣，官僚制度的这个最高監督权只是为了保护地方官吏的权力，使他們不受区等級會議的任何干涉，而决不是为了保护区里的居民，特別是那些沒有代表权的居民，使他們不受区等級會議代表先生們的侵犯。

报告在結束时建議废除賦予区等級會議以課稅权的法律。

报告人布赫尔先生論証了这个提案。正是这些使沒有代表权的居民特別苦恼和非常痛恨的区等級會議的決議，首先得到了各區政府的批准。

“在原則上已經废除但是可惜在事实上至今还存在的警察国家的灾殃也就在这里，——官吏或官厅在官僚等級制度的阶梯上所占的地位越高，就越深信他們对一切問題，甚至对这些專門問題也都比別人了解得透彻，可是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們对地方上的貧困一点也不了解。”

正在討論的提案之所以特別應該認為是恰当的提案，是因为这个提案不是創造性的，而只是破坏性的；“不能否認，議会在进行創造性活动的嘗試方面到現在還沒有成功……所以，目前主要从事破坏性的活动是适当的”。因此，发言人建議废除反动法律，特別是在1815年以后頒布的反动法律。

这太过分了。报告人不仅宣布旧普魯士国家制度、官僚制度和区等級會議應該受到譴責，甚至还諷刺前几次妥協辯論的結果。对內閣來說形势好轉了。况且在朝廷方面，不容許废除的正是現在的国王所頒布的那些法律。

于是，屈韦特尔先生走上講台。

“区等級會議的成分是这样，所以它的結構无疑要改变，因为”——等級制度总是同法律上的平等相抵触？恰恰相反！只是“因为現在每个貴族地主是区等級會議的世袭代表，而城市無論拥有多少貴族領地，只有派一个代表去参加区等級會議的权利，农民的乡鎮也只有3个代表。”

在我們面前暴露了办事內閣的秘密計劃。建立了中央人民代議制，等級代議制就必然要废除，这已是无可挽救的了。但是在一些較小的代議机关中，在一些区（也許还在一些省？）中，有人还想保存等級代議制，只废除貴族所享有的、优越于市民和农民的最突出的特权。对屈韦特尔先生的声明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这至少

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中央委員會的报告恰好坚持在区代議机关中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屈韦特尔先生却用緘默来迴避这个问题。

屈韦特尔先生对提案的内容无法反对；他只問是否应该使这个提案完成“立法的手續”。

“区等級會議会濫用課稅权的危险也許不致于这么大……政府的监督权絕對不致于象有些人企图描述的那样虛妄；这种权力始終是認真地行使了的，不过是等級稅的下等納稅人尽量想免稅而已。”

当然！屈韦特尔先生曾經是博德尔施文克內閣的官員，因而他竟敢損害整个办事內閣的名譽，認為無論如何必須捍卫博德尔施文克官僚制度过去的功績。我們发觉，在汉澤曼先生的伙伴屈韦特尔用这种方法来声明汉澤曼先生和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意見一致时，汉澤曼先生并不在場。

屈韦特尔先生声称，在发布不批准区等級會議所通过的稅收的特別指示以前，他已經发指示給各区行政机关，这样，目的似乎就达到了。

晏奇先生戳穿了大臣先生的全部把戏，他說，按照等級稅（貴族的領地完全免稅）的比例征收通行稅（主要对貴族的領地有利）已是区等級會議的慣例了。

屈韦特尔先生和当事人馮·万根海姆先生企图捍卫区等級會議。特別是高等法院院长，薩奇希区等級會議代表馮·万根海姆先生发表长篇演說来贊美这个值得贊美的机构。

但是摩里茨代表又損害了全部效果。屈韦特尔先生的指示有什么作用呢？如果內閣被迫辞职，区行政机关就会不理睬这个指示。既然我們有这样一些不好的法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們不

應該廢除它們。至于在这里遭到否認的濫用職權的問題，那末

“區等級會議不僅濫用了它的課稅權，給予個人以豁免權，批准對全區居民無益的開支，而且還為了個別人的利益，為了特權階層的利益，決定修築道路……打算把區的中心魯平城和漢堡—柏林鐵路聯結起來。區行政機關不但沒有使鐵路綫通過符斯特爾豪森城（雖然該城表示願意自己出資來彌補不足的費用），而且拒絕在這個沒有絲毫資金的小城市修築公路。結果公路是通過一個貴族地主的3個領地敷設的！！”

賴辛巴赫先生注意到：內閣的指示對區的財政問題毫無影響，區的財政完全受區等級會議的支配。

大臣先生用幾句軟弱無力的話作了回答。

布赫爾先生宣稱，他決不認為大臣先生有權發布實際上是廢除現行法律的指示。只有通過立法的方式才能有助於事。

屈韋特爾先生又噁噁咕咕地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來為自己辯護，然後就開始表決。

議會通過了中央委員會的提案，廢除了授予區等級會議以課稅權和支配區財政權的法律，並附帶聲明：“根據這些法律通過的區等級會議的決議仍然有效。”

這樣，我們就看到辦事內閣所辦的“事情”就是企圖用警察手段來達到反動目的和搞垮議會。

（待續）<sup>①</sup>

弗·恩格斯寫於1848年7月25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48年7月26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56號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關於普魯士國民議會7月18日會議以後的情況，弗·恩格斯在“關於瓦德涅爾案件的妥協辯論”一文中作了評述（見本卷第338—341頁）。——編者注

## 巴登各民主团体的解散

科倫 7 月 27 日。反对結社权的反动警察措施接踵而来。首先封閉的是斯图加特民主联合会，接着就是海得尔堡民主联盟<sup>①</sup>。胜利使反动派先生們增加了勇气。巴登政府目前正在解散巴登所有的民主团体。

这正是在 soi-disant [所謂的]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討論永久保障“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結社权問題时发生的。

結社自由权的基本条件是：警察机关不能解散或封閉任何一个社团，任何一个协会。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决某一社团或它的活动和宗旨是非法的，从而要惩处有关过失人員的时候，才能采用。

当然，对于迫不及待地要实施自己的懲罰措施的馬提先生來說，这个过程未免太长了。过去他自己要以宪兵的名义逮捕“卖国賊”菲克勒尔时，曾認為逮捕前先要得到逮捕令或者至少自己要被委任为特別警察那种作法太无聊，同样，現在他認為任何法庭的、法律的途径也是不值一顧的，不切合实际的。

这个新的警察暴力行动的动机是很有教益的。据說各个团体已联合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主团体的組織<sup>162</sup>，这个組織是根据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倡議成立的。这个代表大会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267—269 頁。——編者注

“所抱的目的是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似乎这是被禁止的!)<sup>①</sup>,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从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决议中对暴动者表现了同情(从什么时候起“同情”被认为是非法的“手段”?)<sup>②</sup>,此外,这些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今后甚至将不承认德国国民议会,而且它要号召国民议会中的少数派同议会彻底分裂,以便通过非法途径成立新的议会。”

随后是代表大会关于民主党派组织机构的决议。

因此,在馬提先生的看来,巴登的各个团体应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负责,即使它们没有执行这些决议也罢。如果这些团体在法兰克福委员会的坚决要求下确实已向国民议会的左翼发出了退出议会的号召,那末馬提先生是决不会忘记宣扬这一点的。不过决定上述号召是否非法的不应该是馬提先生,而是法庭。可是,要宣布党的区級組織、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确实非有馬提先生不可!难道立宪主义者和反动分子的联盟<sup>163</sup>不也是按照这种形式組織起来的嗎?

但是,当然,“当国家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从而整个国家大厦被社团的力量所震动的时候,这是不能容許的和有害的”。

馬提先生,結社权的存在正是为了能够不受处罚地(当然是以合法的形式)“破坏”国家制度!如果社团拥有的力量比国家还大,那对国家就更糟!

我們再次向国民议会呼吁,如果议会不想失去任何尊敬的话,应立即將馬提先生提交法庭审判。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7日

載于1848年7月28日

“新萊茵报”第5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科倫 7 月 29 日。如果萊茵省的某一个居民忘記了他應該把什么事情归功于“外国的統治”和“科西嘉島暴君的压迫”，那就請他讀一讀汉澤曼先生在幸福的 1848 年提交他的妥协派“討論”的关于无偿地废除各种义务和苛稅的法案吧。領主权 [Lehnsherrlichkeit]，封地轉为自由地的贖金 [Allodifikationszins]，死亡稅 [Sterbefall]，好家畜使用权 [Besthaupt]，治疗稅 [Kurmede]，保护金 [Schutzgeld]，权利宣告稅 [Jurisdiktionszins]，訴訟罰金 [Dreidinggelder]，飼养稅 [Zuchtgelder]，盖印金 [Siegelgelder]，屠宰什一稅 [Blutzehnt]，养蜂什一稅 [Bienenzehnt] 等等，这些荒謬絕倫的名称，在我們听到过法国革命破坏了封建制度、听到过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的两只文明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陌生，多么野蛮！这一大堆中世紀的义务和苛稅，这一大堆太古时代的腐烂得发霉的废物，对我們來說，是多么不可理解！

还是把你的鞋子脫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是貫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們祖先的伟大，甚至同赫魯斯克人<sup>①</sup> 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鎖鏈的最后一环！这种令人窒

<sup>①</sup> 赫魯斯克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族，紀元前一世紀生活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中游。紀元前一世紀末至公元一世紀初被羅馬人征服。公元 9 年在領袖阿尔明

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而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当同诗人一起高呼：

这正是我的祖国的空气！  
我的脸颊感到了它那温暖而清新的气息。  
一路上的粪土，  
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祖国的污泥！ 164

当你讀这一法案时，乍看起来，似乎我们的农业大臣吉尔克先生按照汉澤曼先生的命令进行了异常“勇敢的冲击”，似乎他大笔一挥就消灭了整个中世纪，当然，这是完全无偿的！

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下法案的说明，那末就可以看出，它正好一开始就证明了任何封建义务实际上都不允许无偿地废除，即一开始就下了直接同“勇敢的冲击”矛盾的勇敢的断言。

现在，大臣先生的畏缩的实践小心翼翼地在这两种勇敢之间徘徊。左边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右边是“地主合法取得的权利”，中间是“农村关系更加自由发展的值得赞许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吉尔克先生的不好意思的茫无所措的态度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总之，吉尔克先生完全承认：一般说来，封建义务只能通过赎买来废除。因此，保存了那些最繁重、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义务，或者，因为这些义务实际上已被农民废除了，所以又把它们恢复起来。

但是，——吉尔克先生认为——

---

尼(Арминий)的领导下在多德堡森林击溃了罗马军队，从罗马统治下获得解放。——译者注



“如果某些个别的关系，由于它的内在的理由不充分，或者由于它的繼續存在同时代精神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幸福不相容，而被无偿地废除了，那末，遭到这一方面损失的人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蒙受某些牺牲，不仅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而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合理的利益，使享有特权的人和应尽义务的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从而使領地一般能在国家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来保证整体的幸福。”

农村中的革命就是在实际上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据说是承认革命的办事内閣，是这样承认农村中的革命的：暗地里把它消灭。完全恢复旧的 Status quo [秩序]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农民簡直会把封建主杀死——这一点是吉尔克先生都懂得的。因此，要废除一连串仅仅在某些地方实行的微不足道的封建义务，而恢复那些主要的封建义务，这种义务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徭役。

由于丧失了一切应该废除的权利，貴族在一年中失掉的还不到 5 万塔勒，但是得到的却有好几百万塔勒。况且，象大臣所指望的那样，貴族因此还能同农民和好，甚至以后在議院选举时能得到农民的票。的确，只要吉尔克先生的如意算盘沒有打錯，这笔交易是不坏的！

这样，就可以消除农民的抗議，而貴族如果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地位，也不会提出抗議。剩下的还有議院，还有法律上的怀疑和激进派的吹毛求疵。应该废除的义务和不应废除的义务之间的区别，不外是几乎毫无价值的义务和具有重大价值的义务之间的区别；为了使議院滿意，必須使这种区别具有虚构的法律上和經濟上的理由。吉尔克先生必須証明：应该废除的义务（1）沒有充分的内在的理由，（2）同全国人民的幸福矛盾，（3）同时代精神的要求矛盾，（4）把它们废除实际上并不是破坏所有权，并不是无偿的剝夺。

为了証明这些苛稅和义务存在的理由不充分，吉尔克先生深入到封建权利的最黑暗的領域中去。他呼吁給“整整 1 000 年来德意志各邦一开始就很緩慢的发展”以援助。但是这对吉尔克先生难道有什么好处嗎？吉尔克先生愈是深入到遙远的过去，愈是攪动陈腐的封建权利的淤泥，这种权利就愈向他証明：上述义务存在的理由根本不是很不充分，而是从封建的观点看来非常充实；不幸的大臣竭力按照現代民法的概念去闡明封建权利，并且迫使別人象議論 19 世紀的资产者那样去議論 12 世紀的封建貴族，就只能遭到別人的嘲笑。

吉尔克先生順利地繼承了馮·帕托夫先生的基本原則：无偿地废除从領主权和繼承的农奴依从地位中产生的一切义务，而其他一切义务只能通过贖买来废除。但是，难道吉尔克先生認為，需要具备特殊的洞察力才能向他証明，一般說来，一切應該废除的义务也都是“从領主权中产生”的嗎？

吉尔克先生为了貫徹到底，到处把現代的权利概念同封建的权利規定相提并論，并且在紧要关头总是訴諸現代的权利概念，这一点看来用不着多說了。但是，如果吉尔克先生用現代权利的要求去衡量某些义务，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不用这种要求去衡量所有的一切义务。当然，如果他这样做，就很难使徭役同个性和所有权的自由相一致了。

可是，当吉尔克先生用社会的幸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来論証时，他和他的关于义务的划分就更糟糕了。因为不言而喻，如果这些微不足道的义务妨碍社会的幸福，并且违背时代精神的要求，那末，象徭役、工役、租金等等义务，就更是如此了。吉尔克先生莫非認為拔掉农民的鵝毛（第 1 节，第 14 条）的权利是不合时宜的，而

拔掉农民身上的毛的权利倒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嗎？

接着就証明，法案規定废除封建义务并不是破坏所有权。这个极端荒謬的論点当然只能从外表上来証明，而且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証明：通过算細賬，貴族了解到这些权利对他們并没有什么价值，当然，这种計算只能是近似的。于是吉尔克先生非常仔細地計算第1节的所有18条，但是他並沒有注意到：他証明上述义务是毫无价值的，也就是証明他的法案是毫无价值的。好心腸的吉尔克先生！我們破坏了他那快乐的幻想，践踏了他那阿基米德的封建图样，是感到多么难受！

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困难！过去在为了取消封建义务（这些义务現在應該废除）而进行贖买时，也象在进行任何贖买时一样，农民受到了受贿的、为貴族謀利益的委员会可怕的欺騙。現在农民要求修改旧政府时代所締結的一切贖买契約，而农民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吉尔克先生对此却漠不关心。“明文規定的权利和法律”是同农民的要求“矛盾”的。但它們总是同任何一种进步矛盾的，因为每一項新的法律都是要废除旧的明文規定的权利和旧的法律的。

“可以确有把握地預言由此所产生的結果：为了采取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則相矛盾的措施（各种革命也是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則相矛盾的）<sup>①</sup>来使尽义务的农民得到好处，就得使国家中的很大一部分領地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从而（！）使国家本身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于是吉尔克先生以惊人的理由証明：这种行动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会使領地的整个法权基础发生問題和受到震动，并且由于无数的訴訟程序和訴訟費用，給領地这一国民福利的主要基础带来很难医治的創伤；”“破坏那些使契約有效的法权准則，会損害毫无疑义的契約关系，其結果是使人們对民法的穩定性的信任发生动摇，从而使整个經濟生活遭到极其可怕的危險!!!”

因此，吉尔克先生在这里看到了所有权的破坏，这种破坏会动摇一切法权准則。但是，为什么无偿地废除在法案中提到的各項义务就不是破坏所有权呢？其实在这里，不仅存在着毫无疑义的契約关系，并且还存在着从太古以来就无条件存在的无可爭辯的权利，而修改契約的要求所涉及的那些契約就决不是无可爭辯的，因为賄賂和欺詐是众所周知的，在許多場合下是有真憑实据的。

我們不能否認这一点：不管被废除的义务是多么微不足道，吉尔克先生废除它們，就是“采取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則相矛盾的措施来使尽义务的农民得到好处”，这同“明文規定的权利和法律是直接矛盾的”；他“动摇了領地的全部法权基础”，他从根本上侵犯了“毫无疑义的”权利。

其实，吉尔克先生为了达到这种微不足道的結果，是否值得犯这样严重的罪行呢？——

实际上，**吉尔克先生在侵犯所有制**，这是无可爭辯的，但并不是侵犯現代的資產階級所有制，而是侵犯封建所有制。他破坏封建所有制，借以巩固在封建所有制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資產階級所有制。他之所以不想修改贖买契約，只是因为通过这种契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經变成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关系，因为他如果修改这些契約，就要同时在条文上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而資產階級所有制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封建所有制是容易被攻破

的和可以侵犯的一样，——至于程度如何，要看大臣先生的需要和勇气。

这一項长篇大論的法律的簡要意思是什么呢？

是最令人信服地証明了 1848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對 1789 年法国革命的諷刺。

1789 年 8 月 4 日，攻取巴士底獄后过了 3 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这一切封建义务。

1848 年 7 月 11 日，三月街垒战后过了 4 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見証人就是吉尔克和汉澤曼〕。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統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創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沒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虛幻的)贖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7 月 30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60 号

## “科倫日报”論英国秩序

科倫 7 月 31 日。

“在英国，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在法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一点憎恨呢？只是对于曾经利用谷物垄断向工业课取不公平的繁重捐税的贵族一度有过这样的憎恨。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劳起家的；在法国，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者则是垄断、特权的产物。”

这种伟大的、学术性的、热爱真理的名言出现在沃尔弗斯先生给消息一向很灵通的“科倫日报”写的社论中。

真奇怪！在英国，存在有人数非常众多、非常集中和非常典型的无产阶级，它的队伍每隔五六年就要遭受一次由经济危机的毁灭性的灾难以及饥饿和伤寒所造成的浩劫，——这个无产阶级有半生时间是工业中多余的人，无法谋生；在英国，每 10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穷人，而每 3 个穷人中就有一个被关在穷人的巴士底狱<sup>165</sup>中；在英国，每年花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钱几乎等于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支出；在英国，赤贫现象被公开说成是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财富的必要因素。虽然如此，在英国，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广大无产阶级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都没有达到象英国那种程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极端贫困和巨大财富之间的这种显著的对比。虽然

如此，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这一点憎恨呢？

当然，在 1825 年以前还是秘密的、但从 1825 年起就已公开的工人联合，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一个厂主的临时性的联合，而是反对整批厂主的永久性的联合，是许多劳动部门、许多城市的联合，最后是全英国境内无数工人的联合，所有这一切联合以及它们所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无止境的斗争，它们所举行的引起了各种暴行、报复性破坏、纵火、武装攻击和杀害等等的罢工，——所有这一切都不外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爱的证明！

已经延续了 80 年之久的工人反对厂主的整个战争，从破坏机器开始，经过联合，经过对个人以及对厂主的财产和少数忠于厂主的工人的个别攻击，经过各种大小规模的发动，经过 1839 和 1842 年的起义，发展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宪章派即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的整个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象巴黎的六月战斗那样，引起极其可怕的流血冲突，可是它的顽强性、群众性以及斗争的范围都要比六月战斗大得多，——这种社会性的内战，对于“科倫日报”和它的沃尔弗斯来说，当然不过是英国无产阶级对于统治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爱的一种证明。

不久以前，大家不是热衷于把英国描绘成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典型国家，并且在同英国的所谓“不自然的状况”比较下，竭力赞扬拥有资产者国王、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和始终非常勇敢地为资产阶级而战的善良工人的法国吗！不久以前，“科倫日报”不是每天都在重弹这个旧调，并且在英国的阶级斗争中找到了预告德国要提防保护关税制度和在这种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种“不自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工业的理由吗！可是六月的日子把一切都

顛倒过来了。“科倫日报”被六月的战斗吓糊涂了，于是倫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几百万宪章主义者同巴黎的4万叛乱者比較起来，反而变成微不足道的了。

法国成了憎恨資產階級的典型国家，并且根据“科倫日报”現在的断言，法国从1830年起就已成了这样的国家。怪事！当英国的鼓动家在整个无产階級的贊同下10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大会上、小册子里和报纸上唤起对資產階級的最强烈的憎恨的时候，法国工人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則經常鼓吹同資產階級調和，当时它們所根据的恰巧是：在法国，階級矛盾还远不象英国那样尖銳！而恰好那些人（“科倫日报”听到他們当中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毛骨悚然）——路易·勃朗、卡貝、科西迪耶尔、賴德律-洛兰，在許多年当中，在二月革命以前和以后一直在鼓吹同資產階級和平，而且他們多半是 *de la meilleure foi du monde* [非常真誠地] 去做这件事情的。“科倫日报”不妨翻閱一下上述各人的全部大作，不妨瀏覽一下“改革报”、“人民报”<sup>166</sup>，甚至不妨瀏覽一下“同盟月刊”、“人民的蜂房”、“博爱月刊”<sup>167</sup> 这样一些最近几年来的工人报纸，——不然只要讀一下两部人所共知的著作，讀一下路易·勃朗的全部“十年历史”（特别是末尾）和他的两卷“革命史”也就够了。

可是，“科倫日报”并不满足于仅仅断言英国根本不存在“对于在法国被称之为資產階級”（在英国也同样有，我們的消息非常灵通的同行，請參看一下两年来的“北极星报”）的那些人的憎恨，它还解释为什么正好应当是这样，而不是另一种样子。

皮尔废除了垄断并确立了自由貿易，因而使英国資產階級免受这种憎恨：



“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在法国，资产者则是垄断的产物。”“皮尔的措施就是使英国不致遭到极其可怕的革命的措施。”

皮尔消灭了贵族的垄断，从而使资产阶级不致遭到无产阶级的带有威胁性的憎恨——，这就是“科倫日报”的奇怪的逻辑！

“英国人民，我們說：英国人民日益深信，只有实行自由貿易才能指望解决同他們当前的一切痛苦和忧虑有关的迫切問題，——而人們最近却力图在血泊中寻求解决这些問題的办法…… 我們不要忘記：自由貿易的思想最初是从英国人民中产生的。”

英国人民！但是“英国人民”从1839年以来就在所有的集会上和刊物中同自由貿易的拥护者作斗争；在反谷物法同盟<sup>168</sup>最兴盛的时期，英国人民迫使他們秘密集会，迫使他們規定持有特殊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自己集会的会场；英国人民以极其辛辣的諷刺把自由貿易論者的所作所为同他們的花言巧語加以对照，把资产者同自由貿易論者完全看作一丘之貉！英国人民有时甚至不得利用贵族、垄断者的暂时支持去反对资产阶级，例如在10小时工作日<sup>169</sup>問題上就是这样。应当把这个非常善于从公开會議的講台上赶走自由貿易論者的人民，把这个“英国人民”描繪成自由貿易思想的鼓吹者嗎？“科倫日报”幼稚无知到什么地步，它在自己的空談中不仅随着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大资本家重复他們的幻想，而且輕易地相信他們故意散播的謊話！

“资产者在英国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可是在法国却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工人來說，资产者从来就是垄断者，因为可怜的农民要給垄断者付60%的犁鉄稅，因为垄断者在出卖煤炭时进行重利盘剝，他們讓法国的所有葡萄酒酿造者活活餓死，他們在把一切东西出卖給酿造者时总要貴20、40、50%……”

可敬的“科倫日報”所知道的“壟斷”，只不过是**關稅的壟斷**，也就是**在外表上**仅仅壓迫工人但实际上却困死資產階級以及所有从保护關稅政策中得不到好处的企业主的那种壟斷。“科倫日報”除了从亞當·斯密到科布頓这些自由貿易論者老爺們所攻击的那种壟斷，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規定的壟斷以外，别的什么壟斷也不知道。

可是，**資本的壟斷**，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顧立法而存在的壟斷，对“科倫日報”的老爺們來說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壓迫工人，并且引起无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壟斷！这种壟斷正是产生現代階級矛盾的**特殊的現代的壟斷**，而解决这些矛盾是19世紀的特殊任务！

但是，**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壟斷消失得愈快**，这种**資本的壟斷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

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壟斷”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資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資產階級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資本壟斷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資產階級的“壟斷”，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資產階級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資產階級就会象英国資產者現在壓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壓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資產階級。

所有这些最起码的常識現在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了，因为这样作只会使人見怪，——只有“科倫日報”的博学多才的老爺們是例外。

这些学識渊博的思想家們認為自由貿易是使法国避免工人和

---

資產者之間的毀滅性戰爭的唯一手段。

實際上把本國的資產階級也降低到無產階級的水平，——這就是只有“科倫日報”才配採取的調和階級矛盾的手段！

弗·恩格斯寫於 1848 年 7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8 年 8 月 1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62 號

## 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辯論

科倫 8 月 1 日。我們又要报道几次妥协会議的消息。

在 7 月 18 日的會議上，討論了关于召請瓦德涅尔議員的問題。中央委員會表示同意接受这个提案。萊茵省的 3 个律师反对这个提案。

第一个发言的是前国家檢察官受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西蒙斯先生大概認為他仍是在陪审法庭或违警法庭上演說。他以国家公訴人的資格发表了一篇反对瓦德涅尔先生和維護司法的真正的辯护詞。他說：檢察院正在审理此案，而且很快就能作出决定，瓦德涅尔不是获释，便是上陪审法庭受审。在后一种情况下，“頂好不要把这个案件分割开来，并且不要拖延对他的判决”。在西蒙斯先生看来，司法的利益，即檢察院、国家檢察官和陪审法庭的特权，高于人民代表的自由和人民代表不受侵犯的利益。

其次，西蒙斯先生企图誣蔑瓦德涅尔的辯护人所提出的証人，然后再誣蔑瓦德涅尔本人。他宣称由于瓦德涅尔的缺席，議會“并没有失去什么天才人物”，后来他又說，瓦德涅尔在沒有洗清自己阴谋反对政府和以暴力反抗軍事当局的一切嫌疑以前，无权出席議會。至于天才人物，那末按照西蒙斯先生的邏輯，可以象逮捕瓦德涅尔先生那样，把可敬的議会的  $\frac{9}{10}$  的議員逮捕起来，而不使它失去什么天才人物；至于第二个論証，的确使西蒙斯先生引以为荣：他从来也沒有参加过反对专制制度的“阴谋”活动，也决不能控

告他在三月街壘上“以暴力反抗国家当局”。

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莱夫**先生确凿地証明瓦德涅尔沒有任何嫌疑，至于这里所指的行为，也不能認為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履行他的义务时，帮助了根据法律所建立的**市民自卫团**，市民自卫团是得到**市政局**的同意才占領了特利尔的街壘的）。这个声明发表后，**鮑尔班特**先生起来为检察机关辯护。

**鮑尔班特**先生也产生了极大的疑問：“**陪審員**未来的判决不会因召請瓦德涅尔而預先决定嗎？”这个深思熟虑的見解在**博尔夏特**先生发表了如下簡短的意見后更无法解决了：**陪審員**未来的判决不会因拒絕召請瓦德涅尔而預先决定嗎？两端論法的确高深莫测，甚至比**鮑尔班特**先生还高明的思想家为了解答这个問題也会白費多年的時間。也許在全体議員中只有一个人才能解决这个問題，这就是**鮑姆施塔克**議員。

**鮑尔班特**先生繼續滔滔不絕地講了相当长的時間，講得既冗长又混乱。**博尔夏特**先生对他作了簡短的回答。接着**施图普**先生上台发言，为的是也来反对瓦德涅尔，他說他对西蒙斯和**鮑尔班特**的发言“在各方面都沒有什么(!)可补充的”。这当然使他有足够的理由一直胡扯到有人要求停止辯論时为止。然后**賴辛施佩格**第二和**温采利烏斯**先生为瓦德涅尔簡短地講了几句話，于是，大家知道，議會就通过了召請瓦德涅尔的決議。瓦德涅尔先生跟議會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沒有接受这次召請。

**博尔夏特**先生建議：議會尙未对利济斯基先生的关于废除死刑的建議发表意見，为了防止即将执行死刑起見，一星期后必須对这个提議作出决定。

**里茨**先生認為这种輕率的作风不是議会的作风。

布里尔先生：既然我們（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很快就要作出关于废除死刑的決議，而如果在作出決議以前有人被杀头，那自然无疑地完全是非議会的作风。

主席想中止爭論，但亲爱的鮑姆施塔克先生已站在講台上，他目光炯炯，面容因高貴的憤怒而显得緋紅：

“諸位先生，請允許我講几句严肃的話！这里所談的問題絲毫不是这种性質的，即可以隨便上台不加思索地宣布斬首是非議会的作风！”（認為斬首完全是議會作风的右派，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叫“好”声。）“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意义的、极其重要的問題（大家知道，鮑姆施塔克先生对自己所談的每個問題都是这样講的）<sup>①</sup>。其他的議會……立法和科学界的伟人（即“国家法的所有哲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sup>②</sup>在200—300年中（每个人？）<sup>③</sup>都曾研究过这个問題，而如果你們想要別人責难我們如此輕率地解决这样重要的問題……（对呀！）<sup>④</sup>只是良心驅使我說……問題还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一点上多等一星期的确沒有任何意义！”

高貴的議員鮑姆施塔克对这样巨大的、极其重要的問題所說的严肃的話变成了最輕率的举动。看来，鮑姆施塔克先生希望关于废除死刑的爭論再繼續200—300年，而在这期間可以平靜地看着人們被杀头，的确，还能想出比这更輕率的举动嗎？“在这一点上多等一星期的确沒有任何意义”，——正如在这个时期中一些人被杀头一样！

可是首相宣称，暫時不打算执行死刑。

在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对議程发表了一些深思熟慮的意見后，大会否决了博尔夏特的提議，採納了奈特先生的修正案，他建議中央委員會加速对問題进行审查。

希登哈根議員提議，在提出相应的法案以前，主席應該以如下

①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庄严的公式来結束每次會議：

“但是，我們認為內閣應該用一切方法来加速提出新市政条例的法案。”

遺憾的是，这个异常庄严的提議不适用于我們資產階級的时代：

“我們不是羅馬人，我們都抽烟”。<sup>170</sup>

想在格拉博夫主席先生那样粗糙的石头上雕刻出亚庇·喀劳狄的古典形象和把庄严的 *Ceterum censeo* [可是，我認為]<sup>171</sup> 用来解决市政条例問題的企图，在議會“异常活跃”的情况下破产了。

巴門議員布累特用十分温和的口气向商业大臣又提出了3个質問，即关于把整个德国联合为一个关税区，联合为一个有航海稅的統一的通航联盟的問題，以及关于临时的保护关税問題。在他得到米尔德先生对这些問題的同样温和的、但令人极不满意的回答后，格拉德巴赫先生結束了辯論。利薩<sup>①</sup>的許采先生打算要格拉德巴赫規矩一些，因为他在討論解除志願部队武装問題时的发言太强硬了<sup>②</sup>，但許采先生收回了自己的提案。可是，格拉德巴赫先生极其从容地向勇敢的許采先生和整个右派挑战，他講（这使旧普魯士人十分憤怒）了关于一个普魯士中尉的有趣的笑話：这个中尉騎在馬上打瞌睡，并且就这样在志願軍中周游。志願軍唱着“睡吧，孩子，你睡吧”的小調来欢迎他，就因为这一点他們要受軍事法庭审判！許采先生嘟囔了几句語无倫次的气憤話以后，會議就閉幕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1日

載于1848年8月2日

“新萊茵报”第6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波兰叫列式諾。——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94—195頁，207—211頁。——編者注

## 俄国的照会

科倫 8 月 1 日。俄国的外交当局暂时以通告的形式給俄国駐德国的各个使館送来了一个照会，而沒有送来軍隊。这个照会首先在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的官方报纸<sup>172</sup>上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不久又受到别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刊的友好欢迎。俄国外交大臣涅謝尔罗迭先生所受到的这种借以进行正式外交活动的欢迎越是异乎寻常，这种活动也就越值得仔細研究。

在 1848 年以前的美好日子里，德国書报检查机关关心的是不許报纸刊登一句不利于俄国政府的话，甚至在希腊或土耳其的报道栏里也是这样。

在不幸的三月事件之后，可惜这个方便之門被关闭了。因此涅謝尔罗迭才成为政論家。

在他看来，“仇恨俄国的情緒似乎暫趨緩和的德国报刊”，对于俄国在边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散布了“毫无根据的推測和解释”。他用十分温和的語調說完后就提高嗓子說：“德国报刊每天都在散布极荒謬的謠言，对我们进行极卑鄙的誹謗。”接着又說什么“狂暴的叫喊”、“狂人”和“阴險的詭計”等等。

在最近的一件报刊审判案中，德国国家檢察官便可以把俄国照会当做据以控訴的可靠文件。

为什么要攻击德国的报刊，尤其是“民主的”报刊而且在可能



的时候还要消灭它呢？因为它不承认俄国皇帝的“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和“真诚爱好和平的愿望”！

涅谢尔罗迭代表他的统治者问道：“德国怎么能抱怨我们呢？当征服者在大陆上实行残酷统治的期间，俄国为了支持德国维护它的完整和独立而流过血。俄国的领土早已解放，但是俄国仍然在欧洲各个战场上继续援助自己的盟友德国。”

虽然俄国以高薪雇佣了大量的暗探，但是，如果俄国想在1848年拿所谓的解放战争来博得他人的好感，那就大错特错了。俄国真的为我们德国人流过血吗？

1812年以前俄国“支持”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不过是表面结成同盟，暗中却和拿破仑订立密约，而且后来还靠抢劫和掠夺充分地补偿了自己的所谓援助。这点姑且不谈。后来俄国帮助的是和它联合的各邦君主，支持“天赋的”专制制度的代表反对由于革命而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虽然它曾发表过卡里斯宣言<sup>173</sup>。神圣同盟和它的决非神圣的行动，在卡尔斯巴德、来巴赫、维罗那等地召开的强盗式的代表会议，俄德对一切自由言论的追究，——也就是俄国从1815年以来所执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罗曼诺夫王朝和它的外交家们可以放心，这笔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至于谈到俄国1814年和1815年的援助，那末我们别的情感都有，只是不会对这种英国经济支持下的援助有感激之情。

这件事情的原因对所有明察事理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3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涅谢尔罗迭先生所推崇备至的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33年来使我们所处的

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德国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达到莱茵河左岸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所达到的地步了；我们这里现在也许既没有乌刻马克贵族，也没有波美拉尼亚的万第人了。我们也许不必呼吸“历史的”、“基督教德意志”沼泽里的窒息空气了。

但是，俄国是宽宏大量的。即使对它不表示任何谢意，俄国皇帝仍会象从前那样对我们怀着“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的确，“尽管蛮横无礼和出言伤人，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俄国的）<sup>①</sup>感情”。

这些感情目前表现在“消极观望的政策”上。应当承认，这种政策俄国运用得非常巧妙。它善于等待，一直要等到适当的时机。虽然从3月起俄国就大量调动军队，但是涅谢尔罗迭先生却非常天真，要我们相信俄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有典型的“先生们，准备马吧！”<sup>174</sup>的说法，虽然华沙警察局长阿布拉莫维奇流露了真情，发表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毒言论，虽然（确切些说是由于）彼得堡发出了威胁性的别有用意的照会，俄国政府却仍然力争“和平与和解”。俄国仍然是“真诚爱好和平的，并且抱着防御的态度”。根据涅谢尔罗迭的通告，俄国本身是容忍而虔诚的，虽然它屡次无辜地遭到侮辱和损害。

现在我们举出照会中所提出的德国对俄国犯下的几个罪行：（1）“敌对的情绪”，（2）“要求全德实行改革的狂热”。回答沙皇这种善意的竟是“敌对的”情绪！太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内兄的情谊

---

①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了！加之还有这个可詛咒的病魔——“要求改革的狂热”！实际上它最可怕，虽然这里把它放在第二位。俄国有时还把另外一种疾病——霍乱传染给我们。这不去管它！但是这种“要求改革的狂热”不仅能传染，而且有时还非常厉害，使得高贵的先生们不得不急忙跑到英国去<sup>175</sup>。也许“德国人要求改革的狂热”就是制止俄国在三四月里侵入德国的原因之一吧？第三个罪行是：法兰克福预备国会宣布，目前与俄国作战是必要的。俱乐部和报纸上也有同样的声明，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因为根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和俄奥普三国最近签订的条约，我们德国人只应该为各国君主的利益流血牺牲，而不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流血。第四个罪行是：德国有人主张恢复旧波兰1772年时确有的疆界<sup>176</sup>。真该先挨顿鞭子，然后再发送到西伯利亚去！但是，并没有这样，当涅谢尔罗迭写他的通告时，他还不知道法兰克福议会对兼并波兹南问题<sup>①</sup>表决的结果。议会为我们贖了罪，所以沙皇口边现在露出了温和的、宽恕的微笑。德国的第五个罪行是：“它对北方的一个君主国发动了一场值得惋惜的战争”。鉴于俄国政府威胁性的照会获得了成功，德国军队根据波茨坦的命令急忙撤退，并且考虑到普鲁士驻哥本哈根大使就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所作的声明<sup>177</sup>，对于德国的这种卤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无须象没有这些情况时那样严厉。第六个罪行是：“公开鼓吹德法订立攻守同盟”。最后，第七个罪行是：“收容波兰难民，让他们免费乘坐火车到波兹南参加起义”。

要不是外交家一流的人物的舌头给他们提供了“掩盖自己的思想”的工具，那末涅谢尔罗迭和內兄尼古拉本该欢天喜地拥抱我

① 見本卷第371頁。——編者注

們，熱烈地感謝我們。因為我們用了一切優待辦法誘出法、英、比等國的波蘭人，把他們送到波茲南去，以便在那里用霰彈和榴霰彈來掃射他們、用硝酸銀來給他們打烙印、槍殺他們、給他們剃光頭等等，此外還尽可能地用克拉柯夫叛變者的炮彈把他們消滅干淨。

難道俄國對德國這 7 條滔天罪行的答复竟是保持防禦狀態而不企圖進攻嗎？是的，的確是這樣，正因為這樣，所以俄國外交家要全世界向他的皇帝的愛好和平與寬大為懷的精神跪拜。

根據涅謝爾羅迭先生的意見，俄國皇帝“至今片刻也不放棄”的行動方式是：

“當他國要改變自己的國家制度時，決不干涉其內政，並給各國人民以充分自由，不阻止他們進行任何政治的和社會的試驗。不侵犯任何強國，只要它不侵犯俄國。同時堅決回擊一切侵害俄國內部安全的企圖，並注意使領土的均勢在遭到任何破壞和改變時不要損害我們的合法利益。”

俄國的照會忘記了舉例來說明上述這段話。七月革命後，俄國皇帝把軍隊調往西部邊境，以便和他的忠實的德國朋友聯合起來用事實向法國人證明，他是多么“想給各國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來進行政治的和社會的試驗”。至於他的行動方式遇到了阻礙，這並不是他的過錯，而是 1830 年波蘭革命的過錯，這次革命使他的計劃改變了方向。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對待西班牙和葡萄牙採用的也是這種行動方式。俄國皇帝給唐·卡洛斯和唐·米格爾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援助就是證明。1842 年底，普魯士國王想賜予國家一個以非常方便的“歷史”原則（這個原則在 1847 年的詔書<sup>178</sup>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為基礎的等級憲法，大家知道，正是尼古拉堅決反對這件事，以致使我們“基督教德意志人”很多年沒有享受到詔書中所規定的種種樂事。他所以這樣做，正象涅謝爾羅迭所說的，是因

为俄国从来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克拉柯夫的事情不值得再提了。我們只提一下俄皇“行动方式”的最近的一个例子。瓦拉基亚人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他們要改变整个旧制度，并且要按照各文明国的榜样建立自己的制度。“为了給他們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試驗”，俄国軍隊侵入了他們的国家。

由此任何人都会明白，这种“行动方式”将会怎样应用在德国身上。俄国的照会不用我們費力去做結論，照会中說：

“無論盟邦采用何种新形式，只要它不侵犯邻国，不企图以武力扩张自己的版图或者把自己的合法权限扩大到約定的范围之外，本国皇帝也将同样尊重它的内部独立。”

这个問題在照会的另一个地方談得更清楚：

“如果德国真正能解决它的政体問題而不損害它的国内的安宁，使賦予德意志民族的新形式不致扰乱他国的安宁，那我們是衷心高兴的，正如在德国旧政体下我們希望它强大和統一那样。”

通告中的下面一段話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談到俄国竭力支持德国取得和諧与統一：

“当然，不是热中于平等和扩展的民主派現在所幻想的那种物質上的統一（根据民主派的沽名釣誉的理論，这种統一一旦实现，迟早一定要使德国和所有邻国发生战争），而是精神上的統一，是德意志联邦必須和其他强国进行协商的一切政治問題的看法和想法的真正一致。

支持这种統一，加强德国各邦政府相互之間的联系，——这才是我們的政策所抱的目的。

我們那时所希望的，我們現在仍然希望。”

从上述这段話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願意允許德国在精神上統一的，只是不允許在物質上統一，只是不讓迄今存在的联邦議会被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政权所代替，这个政权不是表面上的政权，

而是实际的坚强的中央政权！多么寬宏大量呵！

“我們那时(1848年2月以前)所希望的,我們現在仍然希望。”这是俄国照会中唯一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一句話。但是我們要給涅謝尔罗迭先生指出:願望和实现願望毕竟是两回事。

現在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能期待于俄国的是什麼。既然旧制度將繼續保留下来(虽然它塗了一层現代的色彩),既然由于“一时的陶醉和兴奋”而脫离了俄国和“历史的”軌道的德国又将馴順地进入这个軌道,那末俄国將是“真誠爱好和平的”。

俄国国内的情况是:霍乱猖獗,某些县发生騷动,彼得堡曾酝酿革命(但被及时制止),华沙要塞发生密謀事件,波兰王国成了火山基地<sup>179</sup>,——总之,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沙皇对德国表示既善意又“无私的感情”。

然而,德国本身在此以前所发生的各种事变,对俄国政府的“消极觀望政策”无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沒有柏林—波茨坦、音斯布魯克、維也納、布拉格、法兰克福、汉諾威以及几乎我們祖国(它又被适合俄国口味的精神上的統一所籠罩)的每一个偏僻角落里在此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难道尼古拉本人能如此順利地处理他的事务,如此迅速地实现他的意图嗎?难道波茲南的普富尔(硝酸銀)、科隆布和榴霰弹將軍<sup>①</sup>的行动,布拉格的文迪施格雷茨的行动沒有使沙皇的心里充滿欢乐嗎?难道文迪施格雷茨沒有从年輕的美延多尔夫先生的手里收到尼古拉經波茨坦寄給他的称贊的信嗎?难道柏林的汉澤曼先生、米尔德先生、施萊根施坦先生和法兰克福的拉多維茨、施梅林和利

<sup>①</sup> 指希尔什菲尔德。——編者注

希諾夫斯基之流还不会使俄国心滿意足嗎？难道法兰克福議會里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主张不是不久前的許多痛苦的安慰剂嗎？因此俄国外交当局不需派遣軍隊侵入德国。它完全可以滿足于“消极观望的政策”，滿足于上面分析的照会！

写于1848年8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8月3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64号

## 汉澤曼內閣和旧普魯士刑法草案

科倫 8 月 3 日。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过：汉澤曼內閣在竭力歌頌博德爾施文克內閣<sup>①</sup>。既承認了革命，又承認旧普魯士的制度，“这是世間的常軌”！ 180

但是汉澤曼先生爛熟諳練到如此程度，甚至将要歌頌他过去当萊茵省議會議員时曾經激烈反对过的博德爾施文克、薩維尼先生及其婁罗們的那种行为，——这对波茨坦宮廷权奸确实是一种意外的胜利。但事实却是如此！請看最近一期“普魯士国家通报”中的一篇文章：

柏林 8 月 1 日。最近一期司法部公报在“非官方栏”中援引了关于死刑的統計材料，同时还援引了从 1826 年到 1843 年期間判处和批准的死刑（不包括所謂对煽动分子的审讯的判决在內）的人数的通报。这个工作是根据司法部的案卷进行的，并且由于所涉的問題的重要性而特別值得注意。根据通报来看，在上述期間內：

(1) 在萊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189 名，批准 6 名；

(2) 在其他各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237 名，批准 94 名。

总共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426 名，批准 100 名，但在这 100 名罪犯中間有 4 名因逃跑或死亡而沒有执行死刑。

如果 1847 年新的刑法典草案在这期間生效，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19 頁。——編者注



(1) 在萊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53 名, 批准 5 名;

(2) 在其他各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134 名, 批准 76 名。

总共被判处死刑的人会是 187 名, 批准 81 名, 假定在批准的时候遵循的是过去的那些原则。这样一来, 根据现行法律被判处死刑的 237 个罪犯就不会被处死刑了, 而被判处死刑的 19 名罪犯也就不会被杀头了。

根据这个通报, 每年的平均数如下:

(1) 在萊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10\frac{9}{18}$  名, 批准  $6\frac{6}{18}$  名;

(2) 在其他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13 名, 批准  $5\frac{4}{18}$  名。

如果这个法律草案在当时有效的話, 那末每年的平均数就会是这样:

(1) 在萊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2\frac{17}{18}$  名, 批准  $5\frac{5}{18}$  名,

(2) 在其他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7\frac{7}{18}$  名, 批准  $4\frac{4}{18}$  名。

因此, 歌頌 1847 年普魯士王国的刑法草案的仁慈、优越和伟大吧! 萊茵省在 18 年內也許会整整少杀一个人! 多么优越啊!

但是这里有无数的被告不能出席陪审法庭受审而受国王的审判官的判决和被关在監獄里; 在萊茵省这里可能用旧普魯士的棍子来实行可耻的体罰 (在萊茵省我們早在 40 年前就已免除了棍子); 这里有丑恶的对违反道德的罪行的訴訟, 这种罪行在 Code [法典] 上并没有規定, 而是由普魯士法的騎士的那种病态的和脱离现实的幻想所重新引起的; 这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司法概念的混乱; 最后, 这里有无数的由于这个鄙劣的文件中的那些专横而恶毒的規定所引起的政治訴訟案, 总而言之, 整个萊茵省都普魯士化了, ——难道在柏林的那些萊茵的叛徒們認為, 如果少杀了一个人我們就能够忘掉这一切嗎?

有一点很明显: 汉澤曼先生想通过他在审判机关的代理人, 即梅尔克尔先生来实行博德尔施文克沒有实行成功的东西; 他想使令人深恶痛絕的普魯士刑法草案現在能真正生效。

同时我們知道, 陪审法庭将仅仅在柏林实行, 而且在这里也只

是試驗而已。

因此，不是在旧普魯士各省实行萊茵省的法律，而是在萊茵省实行旧普魯士的法律——，这就是三月革命的伟大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就”。Rien que ça [不过如此而已]。

写于1848年8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8月4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65号

## “科倫日報”論強制公債

科倫 8 月 3 日。在“科倫日報”第 215 号上刊載了一个号召萊茵居民愛國的呼喚書，这个呼喚書如下：

“我們剛才獲得可靠消息，得悉科倫城今天認購自願公債的數目約達 21 萬塔勒，其中有一部分已用現款繳付。應當指望，那些直到現在還沒有認購國家公債的人在最近 10 天內一定會理解並履行自己的公民職責，而且他們本身的利益也必然會促使他們最好在 8 月 10 日以前繳款，因為在 8 月 10 日以前繳款的利率是 5%，過了這個期限繳款的利率是  $3\frac{1}{3}\%$ 。特別重要的是：希望那些應當認購這種公債而直到現在還沒有認購的鄉下人不要錯過這一期限。否則，在缺乏愛國主義和缺乏正確理解的地方就不得不採取強制手段。”

$1\frac{2}{3}\%$  的獎金全是為了獎勵納稅人的愛國主義而設的，但愛國主義却“不管這一切的一切”，仍然頑強地處於隱蔽的狀態中！C'est inconcevable [這真不可思議]。區別就在  $1\frac{2}{3}\%$ ！難道愛國主義能抗拒得了  $1\frac{2}{3}\%$  這種響亮的論據嗎？

我們有責任向我們可愛的同行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

普魯士國家打算用什麼來償付即使不是按 5% 而只是按  $3\frac{1}{3}\%$  的利率付給的利息呢？用新的稅收。如果普通稅收不夠（這是可以預料的），就用新的強制公債來償付。但是又用什麼來償付第二期強制公債呢？用第三期強制公債。而第三期強制公債呢？那就只好破產了。因此，愛國主義堅決主張採取一切手段來阻礙

普魯士政府选择的道路——但是不主张用塔勒，而主张用抗議。

此外，普魯士幸亏已經拥有为了在波茲南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而借的1 000万塔勒的特別債。因而，1 500万塔勒自願公債就仅仅成了波茨坦秘密內閣<sup>181</sup> 阴谋活动的报酬，这个秘密內閣不顧軟弱无力的柏林內閣的命令而为俄国和反动派的利益进行战争。容克反革命竟卑躬屈膝地向市民和农民的腰包求助，他們事后要酬謝容克反革命的这种英勇的功績。而心如鉄石的“乡下人”是否会接受这种荣誉呢？“办事內閣”还要求維持警察所必需的經費，而你們为什么对于按照英国方式建立的普魯士警察制度的善行缺乏“正确理解”呢？“办事內閣”想捆住你們的手脚，而你們为什么不付給它买繩子的錢呢？簡直令人不能理解！

办事內閣需要錢来抗拒德国的統一而保卫自私的烏刻馬克的利益。尽管有 $1\frac{2}{3}\%$ 的奖金，而科倫地区的乡下人却无知到拒絕負擔保卫烏刻馬克-波美拉尼亚民族的費用？他們的爱国主义在哪里呢？

我們那些受“强制性罰款”威胁的爱国的同行簡直热心得忘記了妥協議会还没有对强制公債进行表决，忘記了內閣草案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和“科倫日报”的社論一样。

写于1848年8月3日

載于1848年8月4日

“新萊茵报”第6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蒲魯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說

巴黎 8 月 3 日。前天我們只能簡短地报道蒲魯东的演說。今天我們要比較詳細地來談一談<sup>182</sup>。蒲魯东先生首先宣称，二月革命无非是社会主义的发动，社会主义在以后的一切事变中，在这次革命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都力图表現自己。你們想消灭社会主义嗎？好吧，听我說，我願意向你們伸出援助的手。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取决于个人，目前的斗争絕對不是我和梯也尔先生之間的斗争，这是劳动和特权之間的斗争。可是与此相反，蒲魯东先生提出証据，說梯也尔先生侮辱和誹謗了他个人。“如果我們站在这个基础上，那末我就会对梯也尔先生說：讓我們两人忏悔吧！請你承認自己的罪过，我已准备承認自己的罪过了！”这里所談的問題是革命的問題。財政委员会把革命看作是偶然的現象，是意外的事情，而蒲魯东却是严肃地对待革命的。1793 年，私有主向共和国偿还自己的債務，交納了  $\frac{1}{3}$  的捐稅。1848 年的革命應該在这方面保持“相称的比例”。1793 年的敌人是专制制度和外国，1848 年的敌人是赤貧。“什么是劳动权 (droit au travail) 呢？”

“如果劳动供不应求，那就不需要国家的任何保障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消費量非常有限；商店里堆滿了商品，而穷人却没有衣服穿！而且哪一个国家比法国更热中于消費呢？如果給我們的不是 1 000 万法郎，而是 1 亿法郎，即每人每天 75 法郎，那我們早就給这些錢找到用途了。”(全場大笑)

利率是人民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果設立一所有 20 亿資本的国民銀行，发放无息的貸款，制定免費使用土地和房屋的規章，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全場哄动）

“如果我們遵循这个原則（笑声），如果拜金主义被消費的现实主义消灭（又是笑声），那末劳动就有了保障。取消劳动工具稅，你們就会得救。不承認这一点的人，不管他們是叫吉倫特党人或是叫山岳党人，反正都不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是共和主义者（啊哟，啊哟！）……不是私有制战胜共和国，就是共和国战胜私有制。”（喊声：够了！）

然后，蒲魯东先生开始大談利息的意义和把利率降低到零的方法。只要蒲魯东先生从經濟观点来談論問題，他就十分軟弱无力，虽然他的发言在这个資产階級議院中引起了极大的憤怒。可是当他被这种憤怒所激动而站到无产者的立場上时，議員們就好象患了神經癱瘓症一样。

“諸位先生，我的想法和你們完全不同，我站在和你們完全不同的立場上！旧社会的消灭开始于 2 月 24 日資产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这种消灭究竟用暴力还是用和平方法，完全取决于資产階級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抗拒的程度。”

随后，蒲魯东先生就轉而說明他的“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他建議不要立刻消灭私有制，而要逐步地消灭私有制，因此，在他的報紙<sup>183</sup>上宣称，地租是土地的自然礼物，国家應該逐步地把它取消。

“所以，一方面我向資产階級揭示了二月革命的意义，同时我也預告私有制：它應該准备着灭亡，私有者應該对自己的抗拒負責。”

四面八方都高声喊道：負什么責？

“我是想說，如果私有者不自願消灭，那我們就来消灭他。”

有些人問道：“我們是指哪些人？”

另一些人叫道：把他送到疯人院去，送到沙兰頓去。（全場騷动；真是一場雷鳴风嘯的暴风雨。）

“我所說的我們，是指把我自己和无产階級合而为一，把你們和資產階級合而为一！”

然后，蒲魯东先生就詳細地叙述他的稅收制度，于是他又变成“学者”了。这种“學問”本是蒲魯东的弱點，可是在这个滿是庸夫俗子的議院中，却变成了他的力量，因为它使他有勇气以自己純洁的、正直的“科学”来反对梯也尔先生的齷齪的財政学。梯也尔先生在財政問題上証实他在实践中的英明。在他任內，國庫空虛了，而他个人的財產倒增加了。

蒲魯东在議員們不大注意听他后来的議論时，就直截了当地說，他至少还想說 3 刻鐘。話一說完，大多數議員就准备离开會場，这时他就又轉过来直接攻击私有制。“你們已經用二月革命廢除了私有制！”可以說，每当蒲魯东談到（哪怕是一个字）反对私有制时，恐惧就把人們釘在凳子上了。“你們既然在宪法中承認了劳动权，那就是你們也同意消灭私有制”。拉罗什雅克兰問道，有沒有盜竊权。另外一些議員則想阻挡蒲魯东先生繼續发言。

“你們不可能消灭既成事实的 (faits accomplis) 后果。如果債務人和佃戶还納租还債，那只是他們自願这样做。”（喧声惊人。主席叫发言的人守規矩：每个人都應該偿还自己的債務。）

“我并不是說要取消債務，但是那些想在这里維護債務的人要消灭革命……”

我們这些代表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使我們取得了我們的权力的政权缺乏原則和基础。我們的全部威信就建筑在暴力、专橫和更强大的权力上。（憤怒又爆发了）普选权是偶然的東西；为了使普选权具有某种意义，首先要有組織。指导我們的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而是暴力、必

要性和天意……4月16日，5月15日，6月23、24和25日，这全是事实，而且都是被历史法定化的事实。今天我們能够做我們所向往的事情，力量在我們方面。所以我們不打算談暴动者，暴动者就是那些除了强权就没有其他权利的人，但是他們不願承認別人也有这种权利。我知道我的建議是会被採納的。可是你們的处境是这样：你們只有採納我的建議，才能免于灭亡。全部問題就在于信貸問題，在于劳动問題！信任永远也不会恢复了——不，它一去不复返了……”（多么可怕！）“你們尽可以反复地說，你們渴望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温和的共和国；資本不会冒险地在共和国中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共和国不得不装出一付样子，似乎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所以，当資本在等待适当时机来消灭我們的时候，我們也在等待时机消灭資本。2月24日已規定了劳动权。如果你們把这个权利从宪法中勾掉，那末你們就是規定了起义权。

請你們永远用刺刀来保护自己，永远宣布戒严吧。但是資本还是要感到恐惧的，因为社会主义在警惕地注視着它。”

“科倫日报”的讀者老早就知道蒲魯东先生了。蒲魯东先生（正如在轉入議程的決議的說明中所指出的，他在发言中攻击了道德、宗教、家庭和私有制）不久前成了“科倫日报”的著名的英雄。蒲魯东的“所謂社会經濟制度”受到了巴黎通訊、小品文和长篇論文的极力推崇。蒲魯东关于价值的定义被宣布为一切社会改革的起点。这里姑且不談这个对“科倫日报”有害的結識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这却是令人惊奇的事情！从前把蒲魯东看作救星的报纸，現在却对他和他的“虛伪的同党”破坏社会的行为竭尽痛罵之能事，而犹嫌不足。难道蒲魯东先生已經不是蒲魯东先生了嗎？

我們所批判的蒲魯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图用这种科学来緩和資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矛盾<sup>184</sup>。我們还要回头來談這個問題。他的整个銀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換制度无非是小資产階級的幻想。現在，当他为了实



現自己模糊的幻想而不得不以民主的精神来反对整个資產階級議院,尖銳地指出这个矛盾的时候,議院就大叫道德和私有制受到了侵犯。

写于 1848 年 8 月 3 日

載于 1848 年 8 月 5 日

“新萊茵报”第 6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关于現行贖买法案的辯論

科倫 8 月 4 日。柏林議会有时把旧普魯士的一切脏东西揭露出来，正是在目前，当黑-白騎士阶层变得日益无耻的时候，这种揭露是非常有益的。

在 7 月 21 日的會議上又談到了封建义务。中央委员会根据一个議員的建議，同意在当局的要求或有关一方的要求下，停止关于贖买問題和关于分配村社土地問題的沒有結束的談判和审判案。

迪尔施克議員談到了現行的贖买条件。首先他詳細地敘述了贖买的办法本身怎样欺騙农民。

“例如，徭役賠償(Frohndienste<sup>①</sup>)的規定是非常片面的。完全沒有注意到，在几百年以前把徭役劳动的工資規定为 1 个或 2 个銀格罗申是符合于当时的产品价格和当时的关系的；这种工資可以被認為是劳动的合理等价物，因此無論是地主或担負徭役义务的农民都沒有特別收入。可是現在每天付給自由雇佣工人的不是 2 个銀格罗申，而是 5—6 个銀格罗申。因此，如果有关的一方声明願意贖买，那就先把徭役日折算为雇佣劳动日，結果两者之間一天的差額至少是 3 个銀格罗申，——这样一来，每年中有 50 天的地租必須規定为 4—5 个塔勒，这个数目貧农是付不起的，因为他們經常只有 1/4 摩尔根<sup>②</sup>土地，又沒有干外活掙錢的可能。”

① 这是恩格斯为迪尔施克所用的“徭役”(Robotdienste)这个不大通用的詞加的說明。——編者注

② 普魯士旧面积单位，約等于 1/4 公頃。——譯者注

迪尔施克先生的这段話发人深省，而这是絕對不利于自由派极其有名的 1807—1811 年法律<sup>185</sup> 的。

首先，由此應該得出一个結論：徭役（特別是在迪尔施克先生所談到的西里西亞）絕對不是实物地租或世袭租用金，絕對不是对使用土地的补偿；和帕托夫先生、吉尔克先生的說法相反，徭役是直接“从領主权和世袭农奴的依附地位产生的”，因此，根据这些伟人們自己的原則，徭役制必須无償地废除。

什么是农民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就是：在一年中农民必須为地主服务一定的日子或做一定的工作。但决不是无偿劳动。农民因此得到工資，而且起初得到的工資完全和自由劳动的日工資相等。可見地主的利益决不在于农民的无偿的或极廉价的劳动，而在于他經常可以用一般的工資雇到他所需要的工人，而在他不需他們时，他可以对他們的工作不負責任。地主的利益并不在于徭役的貨幣价值，而在于徭役的強制性質；徭役的坏处不在于它在經濟上对农民不利，而在于它使农民处于不自由的地位。而這些义务难道不是“从領主权和世袭农奴的依附地位产生的”！

根据徭役的最初性質来看，毫无疑义，必須无償地废除徭役制，如果帕托夫、吉尔克之流真的想彻底取消封建义务，他們就应当这样作。

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徭役制現在的性質，那末情况究竟怎样呢？

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徭役制始終沒有变化，因而徭役劳动的工資也沒有变化。可是生活資料的价格却上升了，自由劳动的工資也随着上升了。起先，徭役制在經濟上对双方同样有利，甚至在农民沒有工作时，还經常給他們以有优厚工資的工作。后来，照

吉尔克先生的說法，徭役对农民來說，已逐漸成为“真正的田賦”，而对地主老爷們來說則成为直接的貨幣收入。他們除了穩有把握地經常拥有足够数目的工人外，还从这些工人的工資中撈取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几百年来，經常用这种欺騙农民的方法克扣了他們极大部分的工資，因此到最后他們仅仅拿到他們应得工資的 $\frac{1}{3}$ 甚或 $\frac{1}{4}$ 。假如一个农户必須出一个劳动力，在一年中只做50天工作，日工資在300年中平均只增加了2銀格罗申，那末地主老爷們在每个这样的工人身上可以賺到整整1000个塔勒，而按5%的利率計算，500个塔勒在300年中得到的利息为7500个塔勒，在每个工人身上总共賺8500个塔勒。而这笔賬还是按照地主实际所得总数的一半也不到的数目來計算的！

由此应得出什么結論呢？不是农民應該向地主納稅，而是地主應該向农民納稅，不是农户應該向領主繳地租，而是領主應該向农户繳地租。

但是1848年的普魯士自由派却不是这样考虑問題的。完全相反，我們的律師的普魯士良心是这样來解釋的：徭役工資和自由劳动工資的差額，不應該由貴族向农民补偿，而應該由农民向貴族补偿。正因为如此，所以地主才这样长期地窃取农民工資上的差額，正因为如此，农民應該向地主賠償被这些先生所騙去的东西。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給他，叫他有余，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夺去①！

这样，就算出了工資差額，这个差額的全年总数被当作地租而落入地主的腰包。如果农民想贖清这种地租，这种地租就变成利

---

① 見本卷第311頁注②。——譯者注

率为 4% (即使不是 5%) 的資本, 因此他就要償付这个等于地租 25 倍的資本。由此可見, 这純粹是用奸商的办法来对付农民, 因此, 我們上面所举的貴族的利潤計算法是完全有根据的。

此外, 农民使用  $\frac{1}{4}$  摩尔根貧瘠的土地常常需要繳 4—5 个塔勒地租, 其实一年只要出 3 个塔勒的地租就可租到一摩尔根肥沃的、免服徭役的土地!

贖买也可以用出讓土地的方法来进行, 但所讓出的土地的价值应和贖金相等。自然, 这只有大农才能办到。这样, 地主就可以得到这种土地, 作为对他和他的祖先一貫用狡猾的手段掠夺农民的奖賞。

贖买論就是如此。它充分地証明了在其他各个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些国家中, 首先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 封建关系是被逐步消灭的, 这就是說, 把封建所有制变为資本主义所有制, 把領主权变为資本, 每一次这种轉变总是有利于封建主, 而对于不自由的农民則是一种新的不能容忍的欺騙手段。不自由的农民每一次都要贖买自己的自由, 而且要用很高的代价去贖买。資本主义国家总是按照有錢活命无錢上吊的原則办事的。

但是, 贖买論所証明的还不止这些。

正如达奈議員所指出的, 向农民提出来的这种惊人要求的必然后果, 就是使他們都落入高利貸者的手里。正如法国、普法尔茨和萊茵省的实例所証明的, 高利貸是自由小农階級的必然的伴侶。普魯士的贖买論使那些旧省份的小农在还没有获得自由以前就尝到了高利貸盘剥的甜头。总之, 普魯士政府一向善于使被压迫的階級遭受封建关系和現代資本主义关系的双重压迫, 这样就使得羈絆加倍沉重。

此外，再补充达奈議員也注意到的一种情况：按时拿錢的專員愈好逸恶劳和愈不中用，庞大的开支就愈加增多。

“威斯特伐里亚的列士登奧城为 12 000 摩尔根土地化了 17 000 个塔勒，可是仍然入不敷出！！”

下面来談一下贖买的实际情形，它更証实了上述情况。迪尔施克先生說：地方專員 (Oekonomiekommissarien) 即办理贖买的官吏

“扮演 3 个角色。第一，他們要当調查官，他們以这种資格听取双方的意見，規定贖买的实际原則和計算賠款的数目。他們經常极其片面地处理事情，不注意現行的法律关系，有时他們簡直沒有法律知識。其次，他們是鉴定人和見証人，并且擅自規定贖买物的价格。最后，他們提出自己的結論，这种結論几乎等于決議，因为总委員會認为他們熟悉当地情况，通常总是以他們的意見为依据的。

最后，地方專員是得不到农民的信任的，因为他們經常使农民一方受到損失，他們常被地主請去吃飯（地主本人也是当事的一方）<sup>①</sup>，讓农民一等就是几个鐘头，这就更引起农民一方對他們的不信任。Dreschgärtner [打谷者] 185 在等了 3 个鐘头以后，終于被接見了，可是地方專員經常叱責他們，粗暴地駁斥他們的一切不同意見。这是我根据自己的經驗知道的，因为我曾任法庭的特派員，在贖买时維護农民的利益。因此，地方專員的独裁权必須廢除。一人身兼 3 职——調查官、見証人和审判員是极不合理的。”

摩里茨議員起来为地方專員辯护。迪尔施克先生回答說：我認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的行动是損害农民利益的；为了审理案件，我自己甚至反映过他們中間某些人的行动，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拿出証据来証明这一点。

吉尔克大臣当然又起来維護旧普魯士的制度和在这个制度的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基础上产生的法規。地方專員当然又被夸奖一番：

“我讓議會決定，是否容許利用它的講台来进行这种没有任何証据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責难！”

迪尔施克先生不是要拿出証据来証明嗎？

但是，由于吉尔克閣下大概認為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值大臣們一駁，所以我們最近将要拿出一些“証据”来証明迪尔施克先生不仅絲毫沒有夸大，而且甚至对地方專員的行动的譴責还非常不够。

討論的情况就是如此。修正案太多了，只好把报告連同修正案一起退回中央委員會。議會通过最后決議的时间因而被推迟。

在这些修正案中有摩里茨先生的一个修正案，其中談到了前届政府的另一个頗有教益的措施。他建議停止一切有关磨粉稅的談判。

在1810年决定废除专利权<sup>①</sup> (Zwangs-und Bannrechte) 的同时，任命了一个委員會来研究賠償磨粉主因投入自由竞争而遭受的損失問題。这个決議本身就是荒謬的。难道行会师傅因废除自己的特权而得到了賠償嗎？但是这里情况特殊。磨坊繳納享用专利权的特別稅，因此不是简单地废除这一切，而是給他們补偿費，可是特別稅仍旧保留下来。形式本身是荒謬的，但这里至少有一种法的外表。

然而，在从1815年起合并进来的各省中保留有磨粉稅，而废除了专利权，但是却繳納任何賠償費。旧普魯士在法律面前的平

---

① 是封建主的一种权利，根据这种权利他可以强迫农民在他的磨坊磨粉，用他的烘爐烤面包，从而收取一种特別稅；专利权是对农民进行封建剝削的一种形式。——譯者注

等就是如此。虽然手工业法废除了一切手工业税，可是按照 1845 年的手工业条例和根据赔偿法，在发生争执时，所有磨粉税不被看作手工业税，而被看作土地税。由于这种混乱状况和这些违法行为而发生了许多诉讼案件，各级法庭的判决互相矛盾，甚至最高法院也作出了一些极其矛盾的判决。从摩里茨先生所援引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过去的立法当局究竟把什么样的税当作“土地税”：萨克森有一家磨坊，它除了磨粉设备以外，还有水力，但没有田地，可是却被课 4 维斯佩尔<sup>187</sup>谷物的“土地税”！

说实在的，不管那兒講些什么，普鲁士自古以来就是管理方式最完善、最公平和最好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6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7 号



## “模范国家”比利时

科倫 8 月 6 日。我們終於又把視綫集中在比利时了。这是立宪的“模范国家”，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君主制的埃尔多拉多<sup>①</sup>，是柏林政治家的大学和“科倫日报”的驕傲。

我們先来看一看它的經濟状况，原来这样出色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經濟状况的鍍金框子而已。

比利时“通报”<sup>188</sup>（比利时有自己的“通报”）公布了关于列奥波特的最大的陪臣，即关于赤貧現象的材料。

在卢森堡省 69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那慕尔省 17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安特卫普省 16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列日省 7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灵堡省 7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海瑙省 6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东弗朗德里亚省 5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布拉班特省 4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在西弗朗德里亚省 3 个居民中有 1 人領补助金

这种赤貧現象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使赤貧現象进一步加剧。所有能靠自己資財生活的人由于負担赤貧同胞救济稅而失去了財

<sup>①</sup> 西班牙的南美开拓者虛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譯者注

产的均衡，自己也滾入官方慈善事业的深渊。赤貧現象以加速度产生着赤貧現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貧現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的源泉——青年日益墮落。

在1845、1846和1847年，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可悲的。

18岁以下的少年男女根据法庭判决被拘禁的人数共計：

	1845	1846	1847
少年.....	2 146	4 607	7 283
少女.....	429	1 279	2 069
总計.....	2 575	5 886	9 352
总数.....	17 813		

由此可見，从1845年以来，18岁以下的少年罪犯的人数每年大約增加一倍。按照这个比例，比利时的少年罪犯到1850年将达到74 816名，而在1855年将达到2 393 312名，即超过18岁以下少年的总人数，而且超过全国居民的半数。这样，到1856年比利时全国人民(包括尚未诞生的小孩在内)都要坐牢了。那时君主制能不能期望自己有更广泛的民主的基础呢？要知道在監獄里大家都是平等的。

政治經濟学的頑固分子徒劳地乞灵于他們的两种莫里逊氏丸<sup>①</sup>：一种是自由貿易，另一种是保护关税。弗朗德里亚的赤貧現象是在自由貿易制度下产生的，并在为抵制外国亚麻布和麻紗而采取的保护关税制度下增长和加剧起来。

随着无产階級中間赤貧現象和犯罪行为的急剧增长，资产階級的財源也日益涸竭，不久前出現的比利时在1846、1847和1848

<sup>①</sup>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388頁。——譯者注

年上半年的对外贸易对照统计表就证实了这点。

除了枪械制造厂和制钉工厂(在这个期间内它们的情况良好,这是例外)、呢絨工厂(它保持了以往的光荣)和鋅制造业(同总产值相比它的产量是微不足道的)以外,比利时的整个工业都处于衰退和停滞状态。

除了个别情况以外,比利时的矿产品和金属制品的输出量在大大缩减。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1847年上半年	1848年上半年
煤(以吨为单位).....	869 000	549 000
生铁.....	56 000	35 000
生铁制品.....	463	172
铁和钢轨.....	3 489	13
锻铁制品.....	556	434
钉.....	3 210	3 618
总计.....	932 718	588 237

由此可见,这3个部门在1848年上半年的产品输出量总共缩减了344 481吨,即占总输出量的 $\frac{1}{3}$ 强。

再来看一看麻纺织业的情况:

	1846年上半年	1847年上半年	1848年上半年
麻纱	1 017 000	623 000	306 000
亚麻织物	1 483 000	1 230 000	681 000
总计.....	2 500 000	1 853 000	987 000

1847年上半年的产量同1846年上半年相比缩减了657 000公斤,1848年和1846年相比缩减了1 613 000公斤,即缩减了64%。

书籍、精制玻璃器皿和窗玻璃的输出量大为缩减;原麻和梳

麻、麻屑、树皮和烟草制品的輸出量也减少了。

吞噬一切的赤貧現象、青年罪犯的空前增加和比利时工业的不断衰退，就是立宪的德政的物質基础。內閣的“独立报”共計有 4 000 多个訂戶（該报不厌其煩地对此进行报道）。年迈的梅利奈，这位唯一拯救比利时荣誉的將軍遭到了軟禁，并于日內将出席安特卫普的陪审法庭<sup>①</sup>受审。根特的律师洛兰，这个两面派的叛徒当上了公共工程大臣，他进行秘密活动，为了奥倫治王朝的利益反对列奥波特，又为了列奥波特·科布尔克的利益反对他未来的同盟者，即反对比尔时的自由派。陸軍大臣夏扎尔男爵，这位昔日的旧貨商和崇法狂者<sup>189</sup>，揮舞他的大軍刀来拯救欧洲的均衡。“观察家”为了祝賀蒙斯的 *Doudou* [杜杜]、安特卫普的 *Houplala* [烏普拉拉] 和布魯塞尔的 *Mannequin Pisse* [曼涅肯·皮斯]，在九月盛典<sup>190</sup>的节目中增添了一項娱乐，即大游行(Ommeganck General)。“观察家”（大韦尔哈根的报纸）对此作了很严肃的叙述。最后，比利时已成为柏林的孟德斯鳩（施图普、格林、汉澤曼和鮑姆施塔克之流）的大学，而且引起了“科倫日报”的頌揚，这是由于它受尽了一切苦难而給它的奖賞。幸福的比利时！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8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8 月 7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68 号

---

① 見本卷第 447—450 頁。——編者注

##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

### 一

科倫 8 月 7 日。法兰克福議会中的辯論，从来也沒有失去真正德国人的温和的性質，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刻也是如此；可是在討論波茲南問題的时候，終於群情激昂起来了。对于这个由普魯士的榴霰弹和順从的联邦議会的決議为議会准备好了的問題，議会必須作出明确的決定。議会必須拯救德国的荣誉，还是再一次使德国蒙上耻辱；这里絲毫沒有折衷的余地。議会的行动不出我們所料；它批准了对波兰的 7 次瓜分，它把 1772、1794 和 1815 年的耻辱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肩上轉到了自己的肩上。

不仅如此，法兰克福議会还把对波兰的这 7 次瓜分說成是施給波兰人的 7 次恩惠。难道犹太-德意志种族的暴力侵犯沒有把波兰提到它过去不能想象的文化高度和知識水平嗎？这些瞎了眼的忘恩負义的波兰人！如果你們沒有被分割，你們就得自己去向法兰克福議会乞求这种恩惠！

在沙福豪森附近的天国修道院里，有一个叫博納維达·布兰克的牧师馴养了 40 只椋鳥，他割掉了椋鳥的下喙，因此它們不能再自己获取食物，而只好从牧师手中得到飼料。庸夫俗子們老远地看到这些鳥向这位可敬的牧师飞来，落到他的肩上，馴順地在他

的手中啄食，因而对他这种高超的教化和修养感到惊讶。给这位牧师做传记的人说：鸟儿们爱他就象爱自己的恩人一样。

而这些受束缚、受摧残、受凌辱的波兰人却不愿意爱自己的普鲁士恩人！

为了说明普鲁士国家制度施给波兰人的恩惠，最好分析一下作为讨论基础的国际法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历史编纂学家施滕策尔执笔起草的。

这篇报告按风格来说完全是一种最刻板的外交文件，它首先叙述了1815年波兹南大公国通过“加入”与“联合”而产生的经过，接着列举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当时给波兹南人许下的诺言：保持他们的民族特性、语言和宗教，从当地居民中任命总督，把著名的普鲁士宪法<sup>191</sup>推广到波兹南人中间去。

大家知道，这些诺言哪一条也没有实现过。被分裂的3部分波兰之间的交往自由当然也没有实现过。这种自由愈是不能实现，维也纳会议也就愈是心平气和地表示同意。

接着谈到了居民成分问题。施滕策尔先生计算了一下：1843年在大公国居住的有79万波兰人、42万德国人和将近8万犹太人，总共约130万人。

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是和波兰人的说法，特别是和普什鲁斯基大主教的说法相矛盾的，照普什鲁斯基的说法，居住在波兹南的波兰人大大超过80万人，而德国人（不包括犹太人、官吏和士兵）只有25万人。

不过我们还是根据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吧。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已经足够了。为了避免今后的一切争论，我们就假定在波兹南有42万德国人。那末，这些包括犹太人在内已达50万的德国

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斯拉夫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民，不大善于从事斯拉夫各国直到現在才可能从事的那种城市手工业。当貿易只限于零售交易的时候，貿易的形式是原始的、粗糙的，从事貿易的全是犹太行商。当人口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时候，当感到需要城市手工业和城市人口集中的时候，德国人便伸展到斯拉夫各国来了。在中世紀帝国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萧条的商队的国内貿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貿易中以及在14世紀和15世紀的行会手工业中达到空前繁荣的德国人，表現了自己有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干，而且直到今天在整个东欧和北欧，甚至在美洲，他們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在佩斯、敖德薩和雅西，在紐約和費拉得尔菲亚，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捐客大部分（往往是极大部分）是由德国人或祖籍是德国的人組成的。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都有純粹講德語的街区，而其中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国人。

德国人的这种移民，特别是向斯拉夫各国的移民，从12世紀和13世紀以来几乎一直沒有間断过。此外，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由于对宗教教派的迫害，时常有大批德国人被迫逃亡波兰，他們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在波希米亚<sup>①</sup>、莫拉維亚等等国家，斯拉夫人由于德国人的侵略战争而大大减少，德国人則由于侵略而增加了。

正是在波兰这种情况特別明显。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德国小市民，在政治上早已很少倾向于德国，正象在美国的德国

---

<sup>①</sup> 即捷克。——編者注

人一样，或者象柏林的“法国移民”或蒙特維的亚的 15 000 个法国人在政治上很少倾向于法国一样。这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地方分权时代是可能的，他們成了波兰人，成了操德語的波兰人，而且早已和祖国毫无联系。

但是，不正是他們給波兰带来了文化和教育，带来了貿易和手工业嗎！的确，他們随身带来了小型貿易和行会手工业；他們以自己的消費和有限的交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至于高等教育，1772 年以前在整个波兰都很少听到，以后在奥屬波兰和俄屬波兰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普屬波兰，我們还要比較詳細地談一談。同时，德国人在波兰却妨碍了波兰城市的建立和波兰資產階級的形成！他們以自己独特的語言，以自己 and 波兰居民的疏远，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規，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尤其是在民族杂居的城市里，都存在过而且往往还繼續存在着对德国人、对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不同的法律。波兰的德国人停留在最低級的工业发展阶段，他們沒有掌握大資本，不善于从事大工业，沒有控制广泛的貿易关系。为了使工业能够在波兰扎根，需要英国人科克里尔到华沙来。零售貿易，手工业，至多不过是粮食貿易和工場手工业（織布业等等），而且規模非常小，——这就是波兰的德国人的全部活动。在評價波兰的德国人的功績的时候，也不应忽略下列情况：他們把德国的市儈习气和德国小市民的狹隘性随身带到了波兰，他們兼有两个民族的坏的特性，而沒有吸取好的特性。

施滕策尔先生企图激起德国人对波兰的德国人的同情，他說：

“当国王……，特別是在 17 世紀，越来越軟弱无力，甚至已經不能保卫当



地波蘭農民不受貴族最殘酷的壓迫的時候，德國的鄉村和城市也趨於衰落，其中有許多變成了貴族的財產。只有一些比較大的國王的城市拯救了自己舊有的一部分優惠權”（應讀作：特權）。

施滕策爾先生真的不要求波蘭人比保卫自己更好地保卫（其實也是“本地的”）“德國人”（應讀作：波蘭的德國人）嗎？可是不言而喻，移居到某個國家去的外國人除了和當地居民共憂樂而外，不能有別的要求！

現在我們來談談波蘭人應當特別感謝普魯士政府的那些恩惠吧。

177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佔領了涅茨區<sup>①</sup>，次年，開鑿了一條勃羅姆堡運河以溝通奧德河與維斯拉河之間的內河航運。

“那些幾世紀以來波蘭和波美拉尼亞爭執不下的地方，那些滿目荒涼、沼澤遍野而無人煙的地方，現在已經被開墾，而且住上了大批移民。”

這麼說來，對波蘭的第一次瓜分完全不是什麼掠奪。弗里德里希二世所佔領的不過是“幾世紀以來爭執不下的”地區。但是，能夠爭奪這個地區的獨立的波美拉尼亞究竟從什麼時候起不再存在了呢？有多少世紀這個地區實際上已不再是波蘭人所爭執的地區了呢？這種“爭執”和“要求”的生了鏽的陳腐理論，這種在17世紀和18世紀適用於掩飾擴大貿易和圈地的野心的理論究竟有什麼價值呢？在1848年，當各種“歷史的權利”和“非正義性”已經毫無根據的時候，這個理論有什麼價值呢？

不過，施滕策爾應當考慮：根據這個早已過時的理論，萊茵河的界綫是法德之間“幾千年來爭執的對象”，而波蘭人可以提出要

---

① 由涅茨河而得名（波蘭稱為諾帖茨）。——編者注

求把普魯士省甚至把波美拉尼亚作为自己的封建領地!

简单地說，涅茨区已成为普魯士的地区，从而已不再成为“爭执的对象”。弗里德里希二世向这个地区移来了許多德国人，于是出現了因波茲南問題而聞名的所謂“涅茨同胞”。以国家为出发点的德国化是从 1773 年开始的。

“根据一切值得相信的材料来看，大公国里的犹太人全是德国人，而且都願意成为德国人…… 波兰过去在宗教上采取容忍态度，以及犹太人具有某些为波兰人所缺少的特性，这就使得犹太人能够在几世紀以来扩大活动范围，深入到波兰的生活（即波兰人的腰包）<sup>①</sup>中去。他們一般都通晓两种語言，即使在家里他們和他們的孩子也从小就講德語。”

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認，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萊比錫市場的势力（投机、吝嗇和腐敗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同胞；正直的米歇尔含着喜悅的眼泪紧紧地拥抱他們，而施滕策尔先生則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們看做今后願意成为德国人的德国人。

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講德語的嗎？还要講什么样的德語呵！

但是，我們要請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語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語言。在紐約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們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講德語”，其中一部分人講的德語要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比“涅茨同胞”的“同種族的”同盟者——波茲南猶太人所講的更為正確。

這篇報告接着描述了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它說得盡量含糊，盡量有利於由波蘭的德國人、“涅茨同胞”和猶太人所組成的假想的50萬德國人。德國農民的地產，按面積來說要比波蘭農民的地產大（我們將看到這是怎麼產生的）。自從波蘭第一次被瓜分以來，波蘭人和德國人（特別是和普魯士人）之間的仇恨似乎已達到了頂點。

“普魯士由於最堅決地整頓國家制度和行政制度（什麼話！）<sup>①</sup>，由於嚴格推行這些制度，就特別明顯地破壞了波蘭人舊時的法律和固有的制度。”

可尊敬的普魯士官僚的這些“堅決整頓的”和“嚴格推行的”措施是多麼有力，它不但“破壞了”舊時的習慣和固有的制度，而且還“破壞了”全部社會生活，“破壞了”工農業生產、商業和採礦業，總而言之，毫無例外地“破壞了”一切社會關係，——關於這一點，不僅波蘭人，而且普魯士其餘的居民，特別是我們萊茵省的居民，都能說出一些驚人的事情來。但是，施滕策爾先生在這裡連1807—1848年的官僚都不談，而只談1772—1806年的官僚，談最典型的地道的普魯士國家制度下的官吏，他們的卑鄙、貪污、貪婪和殘酷，在1806年的叛變行為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些官吏似乎保護了波蘭農民反對貴族，而得到的卻是忘恩負義；當然，這些官吏一定會感到：“任何東西，甚至是強施於人的善行，都不能補償民族獨立的喪失”。

我們也熟悉那種直到最近還為普魯士官吏所特有的“把一切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强施于人”的习惯。哪一个莱茵人没有和新入口的旧普鲁士官吏打过交道，哪一个莱茵人不对这种无比的狂妄自大、这种到处多管闲事的可耻行径、这种眼光短浅和极端自信的结合、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感到惊讶！诚然，在我们这里，旧普鲁士人先生们的骄气往往很快就受到了挫折；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已经既没有“涅茨同胞”，也没有秘密审判，既没有普鲁士法律，也没有体罚；由于没有体罚，有人甚至悲痛欲绝。但是，正是在波兰，在这个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体罚和进行秘密审判的地方，他们究竟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我们不说也可以想象得到了。

总而言之，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已经给自己取得了这样一种爱：“早在耶拿战役以后，波兰人的仇恨就已表现为普遍起义和驱逐普鲁士官吏的形式”。因此，官吏的统治暂时停止了。

但是在1815年，这种统治又恢复起来了，只是形式稍微改变了一下。“经过改良的”、“有教养的”、“廉洁的”、“优秀的”官吏，又企图在这些倔强的波兰人那里取得胜利。

“但是就连建立波兹南大公国也未能取得充分的同意，因为……普鲁士国王当时决不能允许个别省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而把自己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联盟的国家。”

所以，普鲁士国王，用施滕策尔的话来说，“当时决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和维也纳条约<sup>192</sup>！！

“1830年，波兰贵族对华沙起义的同情引起了忧虑，从那时起就开始实行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这个政策归结起来就是采取一些措施（！），即采取收买、分割波兰领地并把它分给德国人的办法，来逐步地彻底地消灭波兰贵族，于是波兰贵族对普鲁士的仇恨就增长起来了。”

“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采取禁止把地产拍卖给波兰人的办法，

以及采取施滕策尔先生所竭力渲染的其他类似的措施。

如果普魯士政府在我們这里也禁止把按照法庭决定應該出賣的地产賣給萊茵省的居民，萊茵省的居民將說些什麼呢！這方面的借口是不難找到的：為了使新舊省的居民混合起來，為了把土地分割和萊茵立法的恩惠擴大到舊省居民身上；為了促使萊茵省居民通過移民而在舊省培植自己的工業等等。要使普魯士“移民”也為我們造福，理由是夠多的！我們將怎樣看待那些由於完全消除了競爭而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購我們的土地、並且還得到國家援助的居民呢？我們將怎樣看待那些只是為了使我們習慣於如醉如狂地歡呼“天佑吾王，天佑吾國！”而強行移入的居民呢！

要知道，我們畢竟是德國人，我們和舊省居民講的是一樣的。而在波茲南，這些移民經常毫不讓步地向國有地、向森林、向被分割的波蘭貴族領地移動，以便把當地的波蘭人和他們的語言攆出他們的故鄉，建立一個真正普魯士的省，這個省在普魯士狂方面甚至要超過波美拉尼亞。

為了使波蘭的普魯士農民不致沒有天然的統治者，接着就給他們派來了特雷斯科夫或呂提曉之流的普魯士貴族的傑出人物，他們在那里也同樣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購了波蘭貴族的領地，而且用的還是國庫貸款。此外，1846年波蘭起義<sup>193</sup>以後，在崇高的和最崇高的大人物仁慈的庇護下，柏林成立了一個專為德國貴族收購波蘭地产的股份公司。勃蘭登堡和波美拉尼亞貴族中的消瘦的食客，預見到對起義的波蘭人的審判會使大批波蘭地主遭到破產，而他們的地产很快就會廉價出賣。這對那些債務累累的烏刻馬克的唐·腊努多<sup>194</sup>該是多麼好的生財之道啊！差不多是不化錢的肥沃土地，可以供奴役的波蘭農民，而且還有為國王和祖國服務

的功劳，——这是多么光辉灿烂的远景啊！

这样就产生了德国人向波兰的第三次移民：普鲁士农民和普鲁士贵族定居于波兹南各地，在政府的支持下抱着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且要使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化。如果说波兰的德国小市民还可以有所辩解，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如果说“涅茨同胞”还可以夸耀，说他们开垦了若干沼泽地带，那末，近来普鲁士人的入侵是没有任何遁词的。他们甚至没有始终一贯地实行土地分割，因为普鲁士贵族紧跟着普鲁士农民来到了。

## 二

科倫 8 月 11 日。在第一篇論文里，我們分析了施滕策爾報告中的“歷史論證”，因為他的報告中有些地方涉及革命前波茲南的情況。今天，我們要談談施滕策爾先生所論述的波茲南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歷史。

“對任何不幸者充滿同情（這種同情是毫無價值的）<sup>①</sup>的德國人民，始終深切地感到他們的君主對波蘭人干下了嚴重的非正義行為。”

當然，他們是以德國人的寧靜的心“深切地感到”的，在這顆心里，感情藏得如此之“深”，以致從來也沒有在行動中表現出來！當然，他們曾經通過 1831 年的某些施舍，通過宴會和波蘭舞會來表示“同情”，但是事情也只限於跳跳舞來祝福波蘭人，喝喝香檳酒和唱唱“波蘭人還沒有滅亡！”<sup>195</sup>的歌罷了。如果真正要做一些重大的事情，真正要受一些犧牲，那就決不是德國人的事情！

“德國人誠懇地伸出了友誼之手，來補償他們的君主過去的罪惡。”

當然，如果悲天憫人的詞句和令人沮喪的廢話能夠“補償”什麼的話，那末任何一個民族在歷史面前都不象德國人那樣純潔。

“但是就在波蘭人歡迎德國人（就是握住向他們伸出的友誼之手）<sup>②</sup>的時候，兩個民族的利益和目的就不一致了。波蘭人只想恢復他們以前的國家，至少恢復 1772 年第一次瓜分前的疆界。”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真的，单是那种向来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主要装饰品的无思想、无内容、无目的的热情，就足以使德国人因波兰人的要求而感到茫然！德国人想“补偿”波兰所遭受的非正义行为。这种非正义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撇开过去的种种叛卖行为不谈，至少是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的。这怎样才能“补偿”呢？只有恢复1772年以前的 status quo [局面]，或者至少把德国人从1772年起掠夺波兰人的全部东西归还波兰。但是这和德国人的利益有没有矛盾呢？好吧，如果谈到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补偿”这一类悲天悯人的话；那你们就得用冷酷无情的实际的口吻讲话，就得抛开宴会上的言词和温厚的感情。

况且，第一，波兰人决不是“只”“想”恢复波兰1772年的疆界。一般说来，波兰人这一次所“想”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首先只要求改组整个波兹南，并且只谈到今后如果德国-波兰和俄罗斯发生战争时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只是由于革命的德国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的“利益和目的”仍然和以前专制的德国完全一样。当然，只要德国的“利益和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订立同盟，或者至少同俄国和平共处，那末波兰的一切就必须照旧。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德国的真正利益和波兰的利益是多么一致。

施滕策尔先生接着说了一段冗长、混乱和含糊的话，他详细地说明波兰的德国人是如何正确，他们虽然给了波兰应有的报答，但是同时却希望仍然做普鲁士人和德国人。在这里，“虽然”排除了“但是”，“但是”排除了“虽然”，——当然，这和施滕策尔先生是毫无关系的。



這裡所以加進這樣一段冗長混亂的歷史敘述，是因為施滕策爾先生企圖以此來詳盡地證明：在“兩個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因而使相互間的仇恨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流血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德國人堅持“民族的”利益，波蘭人則堅持純粹“領土的”利益。這就是說，德國人要求按民族來瓜分大公國，波蘭人則竭力爭取他們以前的一切地區都歸自己。

這又不合乎事實，因為波蘭人只要求改組，並且聲明他們完全同意讓出那些德國居民占大多數而且願意歸併到德國去的民族雜居的邊境地區。不過不應該由普魯士官吏隨便把居民變為德國人或波蘭人，而應該給他們表示自己的意志的機會。

施滕策爾先生繼續說：由於（虛構的，根本不存在的）波蘭人反對讓出德國居民占大多數的地區，維利森的使命自然遭到了失敗。施滕策爾先生手頭有維利森對波蘭人的聲明和波蘭人對維利森的聲明。這些已經公布的聲明證明情況恰恰相反。但是，一個如施滕策爾先生所說的“多年研究歷史並且立志永遠不說假話、永遠不隱瞞真相的人”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施滕策爾先生懷着這種永遠不隱瞞真相的誠實精神，輕輕地放過了在波茲南橫行無忌的殘暴行為，放過了背信棄義地撕毀雅羅斯拉韋茨協定<sup>196</sup>的無恥行徑，放過了在特舍美什諾、米洛斯拉弗和弗勒申<sup>①</sup>的屠殺，放過了只有三十年戰爭中的兵痞們才幹得出來的毀滅一切的暴行，他對這些事情竟只字未提。

施滕策爾先生現在談到普魯士政府4次重新瓜分波蘭的問題。最初是奪取涅茨區和其他4個區（4月14日）；再加上總人口為

---

① 波蘭稱作弗熱斯尼亞。——編者注

593 390 人的其他各区的若干部分，并将这全部地区并入德意志联邦（4月22日）。随后是夺取波兹南城和波兹南要塞以及瓦尔特河左岸的剩余部分，——因此又有273 500人，就是说，和上述数字合计，要比居住于整个波兹南的德国人（即使按普鲁士的统计）**多出一倍**。这是按照4月29日的诏书进行的，而5月2日已经接收入德意志联邦了。施滕策尔先生眼泪汪汪地要议会相信，波兹南这个重要而强大的要塞留在德国人手中是多么必要，因为居住在这里的有2万以上的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犹太人），他们拥有全部地产的 $\frac{2}{3}$ 等等。至于波兹南四周都是波兰的土地，它被迫实行德国化，波兰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德国人等等情况，对于“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人们，即对于施滕策尔先生之流的历史学家们是毫不相干的。

这样，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波兹南是决不能放弃的。既然照维利森的说法，建筑这个要塞是战略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那就可以毁掉这个要塞，而去加强布勒斯劳<sup>①</sup>。但是加强波兹南要塞曾经花了1 000万（这又不合乎事实，恐怕连500万也不到），自然，把这个珍贵的艺术品留在手里，同时占领20至30平方英里的波兰土地，是更有利的。

如果已经控制波兹南“城和要塞”，自然就给夺取更多的地方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带着得意的微笑继续说道：“但是要保住要塞，就必须保证从格洛高、尤斯特林和托恩<sup>②</sup>到要塞的通路，并且也必须保证从要塞通往东方的要塞区（只要前进1 000至2 000步就完全够了，如象马斯特里赫特要塞

① 即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即格洛古夫、科斯特森和托伦。——编者注

区到比利时和灵堡的距离那样)①。这样,同时就能够保证毫无阻碍地控制勃罗姆堡运河,而波兰居民占絕大多数的大批地区也不得不并入德意志联邦。”

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著名的硝酸銀普富尔②这位人类保护者对波兰进行了两次新的瓜分,从而满足了施滕策尔先生的一切願望,把整个大公国 $\frac{3}{4}$ 的地区并入了德国。施滕策尔先生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承認这种举动,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須看到这个路易十四的“归并議会”<sup>197</sup>的再版(而且更胜一筹)是德国人已經学会从历史教訓中取得教益的明証。

施滕策尔先生認为波兰人应该引以自慰的是,留給他們的土地比被归并地区的土地肥沃;他們的地产比德国人的地产少得多;“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認,波兰农民感到自己在德国政府管轄下要比德国人在波兰政府管轄下好过得多”!!历史已經很好地証明了这一点。

施滕策尔先生在結束时要波兰人相信,留給他們的那一小块土地对他們是足够的,同时向他們呼吁,要他們养成公民的一切美德,从而

“很好地准备走向現在还被未来的帷幕遮住的那个时刻,走向他們企图用最正当的也許是非常热烈的方式促其到来的那个时刻。他們的一位最有远見的同国籍的人說得很中肯:‘有一种王冠也能激起你的功名心,这就是公民的王冠’!德国人可以添上两句:这頂王冠虽然不是光輝灿烂的,但它却是更值得重視的!”

“它是更值得重視的!”可是普魯士政府4次重新瓜分波兰的真正原因还“更值得重視”。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② 見注釋 63。——譯者注

善良的德国人！你以为进行这几次瓜分是为了把你的德国同胞从波兰統治下拯救出来嗎？是为了用波茲南要塞来保护你不受一切侵犯嗎？是为了保护尤斯特林、格洛高和勃罗姆堡<sup>①</sup>的通路或涅茨运河嗎？多么錯誤的想法！

他們可耻地欺騙了你。他們几次重新瓜分波兰，不是由于什么別的原因，而只是为了充实普魯士的国庫。

1815年以前对波兰的最初几次瓜分是武装掠夺領土；1848年的瓜分是盜窃。

善良的德国人，現在来看一看他們怎样欺騙了你！

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了国家的利益，沒收了波兰官方的領地和天主教僧侶的領地。正如1796年3月28日沒收領地的公告中所說的那樣，教会的領地是“全部地产中最大的部分”。这些新的領地由国王管轄或者把它們出租；这些新的領地是这样大，要加以管轄，就必须建立34个国有地管理区和21个林业总管理处。每一个国有地管理区管轄很多村庄；例如勃罗姆堡区的10个管理区共管轄636个村庄，而单是一个莫吉尔諾管理区就管轄了127个村庄。

此外，在179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还沒收了奥文斯克的一个女修道院的領地和森林，并把它們卖给商人馮·特雷斯科夫（特雷斯科夫的祖先是最后一次英勇战争<sup>198</sup>中普魯士军队的勇猛的首領）；这些領地共有24个有磨坊的村庄和2万摩尔根森林，价值至少也有100万塔勒。

以后，在1819年，又把至少值200万塔勒的克罗托申、罗茲

---

<sup>①</sup> 即貝德哥什。——編者注

德腊热夫、奥尔皮舍夫和阿德璫<sup>①</sup>这几个国有地管理区讓給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公爵，作为对他讓出他在某些并入普魯士的省份中的邮务特权的补偿。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把所有这些領地攬为己有，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們。但是这些領地，即波兰民族的財產，却被分贈了，讓与了，出卖了，而由此所得的錢流到普魯士的国庫中去了。

格涅茲諾、斯科仁琴、特舍美什諾等国有地也被瓜分和出卖了。

这样，普魯士政府手中还剩下 27 个国有地管理区和林业总管理处，总值至少有 2 000 万塔勒。我們准备用手中的地图来証明所有这些領地和森林，除了极少数例外，甚至毫无例外，都在波茲南被归并的地区內。为了把这个无价之宝拯救出来，而且無論如何也不再归还波兰民族，就必须把它归入德意志联邦；但是因为它自己不能到德意志联邦来，所以德意志联邦就得到它那里去，于是波茲南  $\frac{3}{4}$  的土地就被并入德意志联邦了。

在两个月期間对波兰进行的 4 次有名的瓜分，其真正原因就是这样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某一民族的要求，也不是所謂战略上的考虑；占有領地的願望和普魯士政府的貪心，——这就是确定边界綫的唯一根据。

正当德国市民們因捏造的他們可怜的同胞在波茲南遭受苦难而悲痛欲絕的时候，正当他們热烈地希望保障德国东部边境的安全的时候，正当他們因听到捏造的关于波兰人惨无人道的消息而对波兰人深恶痛絕的时候，普魯士政府却偷偷摸摸地行动起来，干

---

<sup>①</sup> 即奧多利亞努夫。——編者注

出了它的卑鄙勾当。可见德国人的无根据的盲目热情，仅仅适用于掩饰现代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

善良的德国人，这就是你的负责任的大臣们对你所开的玩笑！

但是，实际上你事先也能够知道这一点。凡是有汉澤曼先生参加的地方，那里的问题就决不会是德意志民族和军事需要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谈，而总是关于现款和利润的问题。

### 三

科倫 8 月 19 日。我們已經詳細分析了作为辯論基础的施滕策尔先生的报告。我們已經指出他如何伪造波兰現代的和更早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波兰的历史；他如何歪曲全部問題；历史学家施滕策尔不仅有意顛倒是非，而且暴露了自己魯莽无知。

在談到辯論本身之前，我們还要粗略地探討一下波兰問題。

单独地提出波茲南問題是毫无意义的，是无法获得解决的。它只是波兰問題的一部分，只能和波兰問題联系起来，同波兰問題一起解决。只有当波兰重新存在的时候，德国和波兰之間的边界才能确定。

但是波兰能不能重新存在，会不会重新存在呢？在討論中這個問題被否定了。

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說过：il y a des peuples nécessaires——現時存在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波兰民族无疑是在 19 世紀这些不可缺少的民族之列的。

然而正是对我们德国人來說，波兰的民族生存比对任何人都更有必要。

从 1815 年开始，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魯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結成的呢？靠瓜分波兰，这 3 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

这3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綫，乃是一根把它們互相連結起来的鏈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紐带把它們联系起来了。

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賴俄国的地位。俄国命令普魯士和奥地利保持君主专制政体，普魯士和奥地利必須服从。資产階級，特别是普魯士資产階級为自己爭取統治地位的那种本来就軟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魯士的封建专制階級而落空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从三个同盟国最初企图征服波兰的时候起，波兰人就不仅举行起义来爭取自己的独立，同时还进行革命活动来反对本国的社会制度。

瓜分波兰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波兰大封建貴族和参加瓜分波兰的3个强国結成联盟。正如前詩人約丹先生所断言的，这个联盟根本不是进步的；它是大貴族摆脱革命的最后手段，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結果，波兰其他各階級，即小貴族、城市市民和一部分农民結成了联盟，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同盟既反对波兰的压迫者，也反对本国的大貴族，1791年的宪法<sup>199</sup>証明，波兰人在那时就已經清楚地了解到，他們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貴族階級，和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間的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frohnpflichtigen*〕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1789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中首先宣布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这是它的功績。1791年的宪法，是改革的第一次嘗試；1830年起义时，列列韦尔宣布土地革命是救国的唯一



方法，但是議會對這一點承認得太遲了；1846年和1848年起義時，曾公開宣布實行土地革命。

波蘭人從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來革命，從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他們迫使自己的壓迫者不僅在波蘭，而且在本國保持宗法封建制度。特別是從1846年克拉柯夫起義時起，爭取波蘭獨立的鬥爭同時也就是反對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而爭取土地民主制（東歐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鬥爭。

由此可見，只要我們還在幫助壓迫波蘭，只要我們還把波蘭的一部分拴在德國身上，我們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國和俄國政策的束縛，我們在國內就不能徹底擺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的波蘭是建立民主德國的首要條件。

建立波蘭國家和調整波蘭與德國的邊界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革命以來東歐所發生的一切政治問題中最容易解決的問題。散居和雜居在喀爾巴阡山以南的種族龐雜的各個民族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比起波蘭爭取獨立的鬥爭和確定波蘭與德國的邊界問題來，要複雜得多，要以更多的鮮血作代價，要引起更多的紛爭和內戰。

不言而喻，問題不是要建立一個虛幻的波蘭，而是要建立一個有生命力基礎的國家。波蘭至少應該擁有1772年時代的領土，它不僅應該管轄本國各大河流經過的地區，而且應該管轄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帶以及廣大的沿海地帶，至少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帶。

如果德國在革命以後，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氣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國放棄波蘭，它就可以保證波蘭實現上述一切，同時也就保衛了自己的利益和榮譽。至於德國居民和波蘭居民在邊境地區特別是沿海一帶雜居的問題，雙方應該互相作某種讓步；某些德國人會

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德国经过不彻底的革命，并没有找到勇气来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

对俄国作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以及在曇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对俄国作战是在对我们的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然而我们是市僧，而且始终是市僧。我们举行过好几打大大小小的革命，可是革命还没有完成，而自己就先害怕起来了。在我们大肆吹嘘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贯彻到底。革命没有使我们的眼界扩大，反而使它缩小了。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那种最怯懦、最狭隘、最肤浅的庸俗见解就表现出来了，而我们的一切真正的利益当然又遭到了损害。从这种打小算盘的庸俗见解出发，解放波兰的大问题自然就归结为改组波兹南省的一部分地区的无谓的空谈，而我们对波兰人的热情也就变成了榴霰弹和硝酸银。

我们再重复一遍：对俄国作战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够保卫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办法。既然不敢进行这种战争，就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柏林被击溃的反动军阀在波兹南重新抬头；

他們在挽救德国的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举起反革命的旗帜，镇压我們的同盟者，革命的波兰人，——在这个时刻，被愚弄的德国居然向它的胜利的敌人热烈致敬。重新瓜分波兰已經完成了，所差的只是德国国民議会的批准了。

要挽救这个問題，法兰克福議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認整个波茲南屬于德意志联邦，并且声明，在有可能同复兴的波兰进行 d'égal à égal [平等的] 談判以前，边界問題是有討論的余地的。

不过，这未免對我們的法兰克福国民議会中的教授、律师和牧师們提出过多的要求了！誘惑力是非常之大的：他們，从来沒有聞过火藥味的和平的市民們，應該通过簡單的投票方式为德国夺取 500 平方英里的地区，兼并 80 万“涅茨同胞”、波兰的德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虽然这是損害了德国的荣誉和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的。多么大的誘惑！他們屈服了，批准了瓜分波兰。

根据一些什么理由，我們明天就会見分晓。

## 四

科倫 8 月 21 日。我們現在把波茲南議員應否參加討論和表決這個先決問題放在一邊，而直接談談關於主要問題的辯論。

開始辯論時，施滕策爾先生以報告人的資格發表了一篇非常混亂、非常含糊的演說。他儼然以歷史學家和正人君子的姿態出現，談到要塞和戰壕，談到善與惡，談到同情心和德國人的心情；他追溯 11 世紀的情況，來證明波蘭的小貴族從來就是壓迫農民的；他利用波蘭歷史上極有限的一些事實，來為他的滔滔不絕的關於小貴族、農民、城市、君主專制政體的善行等等最膚淺最一般的議論作辯護；他證明瓜分波蘭是正確的，但是每句話都吞吞吐吐，支吾其詞；他亂七八糟地敘述了 1791 年 5 月 3 日的憲法原理，使本來就不知道這個憲法的議員，現在更莫名其妙了；他還打算把談鋒轉到華沙大公國，但是他的話立刻被“扯得太遠了！”的高叫聲和主席的指責打斷了。

弄得狼狽不堪的大歷史學家用下面這些動人的話來繼續他的發言：

“我說得簡單一點吧。現在要問：我們打算做什麼？這是一個十分自然的問題（簡直是！）<sup>①</sup>。小貴族想恢復波蘭國家。他們肯定地說，這個國家將是民主的。我不懷疑他們是真正這樣想的。但是，諸位先生，其他各階層自然（！）也會給自己造成很大的幻想。我完全相信他們的真誠，可是如果說公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爵和伯爵必須同人民融合起來，那我就不知道這種融合是如何發生的（這和施滕策爾先生有何相干！）<sup>①</sup>。在波蘭，這是不可能的”等等。

施滕策爾先生把問題說成這樣：彷彿在波蘭，小貴族和大貴族實質上是一樣的。施滕策爾先生自己也引用過的列列韋爾的“波蘭史”，以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波蘭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爭論”<sup>200</sup>，還有其他許多現代著作，也許能把“多年來研究歷史的人”教得聰明一些。施滕策爾先生所說的大多數“公爵和伯爵”，恰恰是波蘭民主派鬥爭的對象。

因此，施滕策爾先生認為，必須把小貴族和他們的一切幻想拋開，另外創立一個農民的波蘭（把波蘭一部分一部分地併入德國）。

“最好是向貧苦農民伸出手去，讓他們日益強固，使他們或許（！）能夠創立自由的波蘭，不僅能夠創立，而且能夠保持。先生們，這就是主要的任務！”

在中間派兩翼<sup>201</sup>的民族主義空談家的“很好！”、“好極了！”的歡呼聲中，為勝利所陶醉的歷史學家離開了講台。把重新瓜分波蘭說成是對波蘭農民的善行——這種荒謬絕倫的顛倒是非的伎倆，當然會使國民議會中充滿善心和博愛的一群中間派感激涕零！

走上講台的是從克羅托申來的果登，他是波蘭的真正的德國人。在他之後發言的是從伊諾弗羅茨拉夫來的曾弗，這是“涅茨同胞”的極好的典型，他不會干任何欺騙勾當，他在報名發言時說要反對委員會的提案，而在發言時卻贊成這個提案。由於這種欺騙方式，有一個要發言反對提案的人沒有輪到發言。

“涅茨同胞”在國民議會中發言的手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喜劇，它再一次表明真正的普魯士人能夠干些什麼。大家知道，波茲

<sup>①</sup> 括弧裏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南那些自私自利的犹太普魯士小人是同官僚，同普魯士王国軍官，同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总而言之，同旧普魯士的一切反动势力最紧密地团结起来，肩并肩地反对波兰人的。对波兰的叛卖是反革命的第一次断然措施，当时表现得最反动的正是“涅茨同胞”先生。

現在請看一看热爱普魯士、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为口号的学校教师和官吏；請欣賞一下他們如何在这里，在法兰克福发言，强詞夺理地把他們对波兰民主派的反革命的叛卖行为說成是革命，是为了有主权的“涅茨同胞”而进行的实际的真正的革命；他們如何蹂躪历史权利，并且在似乎已經死亡的波兰面前宣布：“只有活人才有权利”！

但普魯士人就真是这样：在斯普列伊是“上帝的子民”，在华尔特是有主权的人民；在斯普列伊是平民的騷动，在华尔特是革命；在斯普列伊是“沒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sup>①</sup>，在华尔特是填写了昨天日期的具体事实的权利，——虽然如此，誠实的普魯士人的心情是毫不虛伪的，是正直而高尚的！

我們現在来听一听果登先生的話：

“我們不得不再度捍卫那个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祖国孕育着如此重大的后果的事业，即使这个事业本身在我们看来不完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必要，我們也应该使它成为正义的(!!)。我們的权利与其說是根源于过去，不如說是根源于現代跳动很快的脉搏（更确切些說，是枪托的毆打）<sup>②</sup>。”

“波兰的农民和市民，由于归并到別国(普魯士)<sup>③</sup>，感到自己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的状态(特别是从波普战争和瓜分波兰的时候起)<sup>④</sup>。”

① 見本卷第416頁。——編者注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因瓜分波兰而发生的违反正义的行为，已經由你們（德国的）<sup>①</sup>人民的仁慈（特別是普魯士官吏的笞杖）<sup>②</sup>，由他們的勤劳（在被掠夺和被分贈的波兰的土地上）<sup>③</sup>，并在今年4月間由他們的鮮血全补偿了！”

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先生的鮮血！

“革命，这就是我們的权利，我們是根据这个权利到这里来的！”

“变成黃色的羊皮紙，現在已經不能作为証明我們加入德国的合法性的文件了；我們不是作为嫁妝或遺產、不是通过購買或交換加入德国的；我們是德国人，我們屬於我們的祖國，因此，合理的、合法的、自主的意志鼓勵我們这样做；这种意志是由我們的地理环境、我們的語言和习俗、我們的人数（！）、我們的財產，首先是由我們的德国的思想方法和对祖國的热爱决定的。”

“我們的权利是这样无可爭辯，它在現代世界觀上扎下的根子是这样深，即使不具有德国人的心情，也一定会承認它。”

普魯士犹太人的“涅茨同胞”所具有的建立在“現代世界觀”基礎上的、依靠榴霰彈“革命”的、从战地現實生活的“跳動很快的脈搏”中产生的“自主的意志”万岁！領取巨薪的波茲南官吏的德国精神、掠夺教会領地和官方領地的德国精神、弗洛特韦尔 à la [式的] 貨幣貸款的德国精神万岁！

繼大言不慚地高談最高权利的騎士之后发言的是既不知羞耻也沒有良心的“涅茨同胞”。在伊諾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看来，連施滕策尔的提案对波兰人也还是太客气了，因此他建議采取某种較強硬的措詞。曾弗先生以此为借口，厚顏无耻地以委員會提案的反对者的資格報名发言；他同样厚顏无耻地声称，取消波茲南人的表決权是极不公平的：

“我認为正是波茲南的代表負有参加表決的使命，因为这里討論的恰恰是派我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問題。”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曾弗先生接着談到第一次瓜分以来的波兰历史，他用許多有意歪曲和无中生有的材料来充实这部历史，同他比較起来，施滕策尔先生倒成了最渺小的拙劣的作者了。波茲南所有一切勉强过得去的事情，都应该飲水思源，感謝普魯士政府和“涅茨同胞”。

“华沙大公国产生了。普魯士官吏的位置被波兰人占据了，到1814年，普魯士政府为这几个省所做的一切好事，几乎連痕迹都看不見了。”

曾弗先生說得对。無論是农奴身分，無論是波兰各州預算对普魯士学校（例如对哈雷城的大学）的拨款，無論是不懂波兰語言的普魯士官吏的敲詐勒索和残暴行为，“連痕迹都看不見了”。但是波兰还没有灭亡，因为承俄国的眷顧，普魯士又兴盛起来了，而波茲南也重归普魯士了。

“从那时候起，普魯士政府又竭力改善波茲南省的状况了。”

誰想知道这方面的詳細情形，不妨讀一讀1841年弗洛特韦尔的备忘录<sup>202</sup>。在1830年以前，政府什么也沒有做。在整个大公国里，弗洛特韦尔只发现4英里的公路！可是要不要列举一下弗洛特韦尔本人的善行呢？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个狡猾的官僚，竭力用修筑公路、开辟运河、疏浚沼澤积水等等办法来收买波兰人，不过他不是用普魯士政府的金錢，而是用波兰人自己的金錢来收买他們。这些改良主要是用私人的資金或各州的經費来进行的，如果說政府也曾为某些地方拨过一些补助金，那也不过是它以征税办法从省里搜刮来的或者以收入形式从波兰官方領地和教会領地取得的那个总额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次，波兰人应当感謝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不仅是因为繼續停止（从1826年起）各州州长的选举，而且特别是因为政府用收購被拍卖的領地并将其仅仅轉卖給



可信賴的德国人(1833年的圣旨)的办法,来逐渐剥夺波兰地主的土地。弗洛特韦尔治下的最后一件善行是学校的改良。但这又是一种普魯士化的措施。中等学校必須在普魯士教师的帮助下使貴族青年和未来的天主教牧师普魯士化,初級学校則是使农民子弟普魯士化。关于学校的实質,勃罗姆堡区督察員瓦拉赫先生不知怎么在坦率直言时泄露出来了;有一次他写信給总督博伊尔曼先生說,波兰語是在农村居民中普及教育和推广福利事业的主要障碍!既然教师不懂波兰語,事情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些学校的經費是由誰負担的呢?仍然由波兰人自己負担,因为第一,多数最重要的但不是专门为普魯士化这一目的服务的专科学校,是靠私人出錢或靠各省等級會議的經費創辦和維持的;第二,即使是为了普魯士化而創辦的学校,也是靠1833年3月31日收归国有的寺院的收入来維持的,国庫拨发的經費,在10年內每年只有21 000塔勒。

不过,弗洛特韦尔先生也承認,一切改革都出自波兰人自己。而普魯士政府的最大善行,就在于搜刮高額地租和征收重稅,利用青年为普魯士服兵役,——关于这一点,弗洛特韦尔先生也和曾弗先生一样,絕口不談。

簡單說来,普魯士政府的一切善行,归結起来就是在波茲南安置普魯士的下級軍官,不管是做教官还是做教师,也不管是做宪兵还是做稅吏。

我們不能詳細分析曾弗先生对波兰人的一些无根据的猜疑和不确实的統計資料了。显然,曾弗先生說話的唯一目的是要激起議会对波兰人的仇恨。

接着发言的是罗伯特·勃魯姆。他照例要发表所謂冠冕堂皇的演說,这种演說感情多于論証,而夸张又多于感情,不过,老实

說，这种練習朗誦的演說不会比克罗托申的果登先生的“現代世界觀”产生更大的效果。波兰是反对北方野蛮行为的藩篱……，如果波兰人有某些缺点，那是他們的压迫者的罪过……，老加格恩把瓜分波兰叫做威胁着我們这个时代的一場恶梦……，波兰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們不妨把他們当作榜样……，危险是从俄国方面来的…… 如果紅色共和国在巴黎取得胜利，并且打算以武力解放波兰，諸位先生，那时候将怎么办？…… 我們將不偏不倚，等等，等等。

我們对勃魯姆先生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从所有这些絕妙的議論中刪去夸张的华而不实的詞句，那末除了最庸俗的廢話——縱然是(但願如此)范围很广、說得很高明的廢話——而外，就沒有剩下什么了。勃魯姆先生認為，如果国民議會願意始終如一，就應該用对待波茲南的原則去对待什列斯維希、波希米亚、意大利的提罗耳、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亚尔薩斯；即使是这样一个論据，也只有在和多数派的荒謬絕倫的民族主义謊言和习以为常的不彻底性作对比时才能說是正确的。如果他断言德国只有同已經存在的波兰打交道，才能很好地进行关于波茲南問題的談判，那我們也不否認这一点；但还是應該指出，他的演說中这个唯一中肯的論据，已經由波兰人自己几百次地發揮过了，而且發揮得非常好，而在勃魯姆先生的嘴里，这种論据就象修辞学上的一枝鈍箭，这枝箭“本着中庸之道和寬大为怀的精神”，徒劳无益地射到多数派石头一样的胸膛上去。

勃魯姆先生說榴霰弹不能作为理由，这是对的；但是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場上，那就不对了，并且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对的。如果說勃魯姆先生不能認清波兰問題的實質，那是他自

己的过錯。而勃魯姆先生最糟糕的是：第一，希望爭取多数派，由多数派要求中央政权至少作一个报告；第二，指望通过中央政权的那些在8月6日极其可耻地屈从于普魯士最高統率权欲望<sup>203</sup>的大臣的报告，占得一些便宜，哪怕是最小的便宜。如果想做“极左派”，首先就應該把寬大为怀的精神抛在一边，并且不要指望从多数派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东西。

一般說来，差不多所有的左派，在波兰問題上也象在平常一样，沉溺于夸张甚至沉溺于荒誕的幻想，毫不触及实际材料和問題的实質。可是恰好在这里，材料是这样丰富，事实是这样明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須研究問題，但是很明显，不这样做也行，因为既然已經通过了选举的滌罪所，就不必再对任何人負責了。

对于少数例外，我們在闡述辯論过程的时候还要回过头来談談。明天我們要簡略地談談威廉·約丹先生，他决不是例外，而这一次，由于明显的原因，他簡直是随波逐流了。

## 五

科倫 8 月 25 日。謝天謝地，我們終於離開了每天弥漫着空談的多沙的平原，走上了阿尔卑斯的大辯論的高地！我們終於攀登到白云籠罩的頂峰。鷹在這兒營巢，人在這兒和神直接見面，並且從這兒以蔑視的眼色，望着那些老远老远地在下面蠢動的可怜的小人物，望着他們用人类的平凡智慧的貧乏論据互相搏戰！在某一个勃魯姆同某一个施滕策尔、某一个果登和某一个伊諾弗罗茨拉夫的會弗搏斗以后，大会戰終於开始了，在這場會戰中，阿里欧斯托式的英雄們的唇枪舌劍的碎片布滿了戰場！

戰士們的隊伍恭敬地讓開道路，从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揮舞着寶劍一躍向前。

从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从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在德国文艺活动的黄金时代是科尼斯堡的文学家。那个时候，常在“桶匠大院”中举行半公开的會議；威廉·約丹先生参加过这种會議，在會議上朗誦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詩，并因此而被驅逐。

于是这位从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就前往柏林。柏林的大学生常常举行會議。威廉·約丹先生在會議上朗誦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詩，并因此而被驅逐。

从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于是前往萊比錫。萊比錫也举行过一些沒有害处的會議。威廉·約丹先生朗誦过“水手和他的上

帝”那篇长詩，并因此而被驅逐。

以后，威廉·約丹先生出版了很多著作：长詩“鐘和炮”，立陶宛民歌集（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創作，即他本人所編写的波兰詩歌），乔治·桑的作品的譯文，一种杂志——不可理解的“可理解的世界”<sup>204</sup>，以及使遐邇馳名的奥托·維干德（他还没有他的法国祖师巴涅尔那样大的成就）有利可图的其他譯著；随后，他又出版了列列韦尔的“波兰史”譯本，并写了一篇向波兰人表示亲善的序言等等。

革命爆发了。En un lugar de la Mancha 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rdarme<sup>①</sup>，在德国的曼彻即勃兰登堡部落的一个地方，在唐·吉訶德們生长的那个地方，在一个連名称都不值得一提的地方，从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提出自己为德国国民議会的候选人。这个地区的农民对君主立宪充滿了乐观的情緒。威廉·約丹先生发表了很多动人心弦的、充滿了最乐观的立宪精神的演說。心花怒放的农民选举了这个大人物做議員。这位高貴的“无責任心的”議員一到法兰克福，就坐在“极”左派的席位上，和共和派一起表决。以选民身分創造了这个議會中的唐·吉訶德的农民曾經寄信給他表示不信任，要他回忆他的諾言，要把他召回。可是威廉·約丹先生也象国王一样，很少認为自己应受諾言的約束，一有适当的机会，总是用他的“鐘和炮”使議會震耳欲聾。

威廉·約丹先生每次走上圣保罗教堂<sup>205</sup>的講台，实际上只是朗誦“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詩，但这并不是說，他因此就應該被驅逐。

① 拉·曼彻地方有一个乡村，它的名称根本不值得一提（塞万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的开头第一句話）。——編者注

我們現在來聽一聽偉大的威廉·約丹最近就波蘭問題發出的鐘聲和炮聲。

“恰恰相反，我認為我們應該提高到世界歷史觀點的水平，應該從這一觀點來研究波茲南問題這個波蘭大悲劇的插曲。”

強壯的威廉·約丹先生一下子就把我們高舉到雲端，高舉到白雪皚皚、直衝霄漢的“世界歷史觀點”的索波拉索<sup>①</sup>，於是我們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望無際的遠景。

但是在這以前，他還花了一些時間從事平凡的“專門”討論，而且很成功。這裡是幾個例子：

“後來，根據華沙條約（即根據第一次瓜分波蘭的條約）<sup>②</sup>，涅茨地區歸普魯士所有，從那時候起，如果不算曇花一現的華沙大公國這一段時間，它一直是屬於普魯士的。”

約丹先生在這裡把涅茨地區和波茲南其他地區對立起來了。他，這位世界歷史觀點的騎士、波蘭歷史的專家、列列韋爾著作的譯者，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材料的呢？正是從伊諾弗羅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的演說中得到的！他這樣嚴格地遵循曾弗先生的演說，甚至完全忘記了波茲南的其他部分即大波蘭部分在1794年就已“歸普魯士所有，從那時候起，如果不算曇花一現的華沙大公國這一段時間，它一直是屬於普魯士的”。但是“涅茨同胞”曾弗沒有談到這一點，因此，“世界歷史觀點”只知道波茲南地區僅僅在1815年才“歸普魯士所有”。

“其次，西部各州——比恩鮑姆州、梅澤里茨州、博姆斯特州、弗勞施塔特

① 索波拉索是南美厄瓜多爾的火山，海拔6 272公尺。——譯者注

② 括弧裏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州<sup>①</sup>——从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絕大多数來說，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

但是門茲胡德州也是这样嗎，約丹先生？——“从这个州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絕大多数來說，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嗎？

不过，門茲胡德也就是比恩鮑姆州。用波兰話來說，这个城市就叫做門茲胡德。

这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的“世界历史观点”的語源学“古玩陈列室”，会从基督教德意志的利奧先生那里得到多大的支持！不消說，Mailand、Lüttich、Genf、Kopenhagen<sup>②</sup>“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可是“世界历史观点”是否“从名称上就已”看出海孟斯-艾希赫、維爾斯-来登、耶納烏和加尔天菲尔德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呢？当然，世界历史观点是很难在地图上找到这些自古以来的德国名称的，当它知道这些名称指的就是勒-克納烏、里昂、热那亚和康波-弗列多的时候，它自然只有感謝杜撰了这些名称的利奧先生。

如果法国人在最近宣布 Cologne、Coblence、Mayence 和 Francfort<sup>③</sup> 自古以来就是法国的領土，那么世界历史观点将怎么說呢？那将是世界历史观点的不幸！

可是我們不准备在更伟大的人物也要碰到的 *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humaine* [人类生活中的渺小的不幸] 上面耽擱了。我們現在要跟着柏林来的威廉·約丹先生飞到更高的地方去。我們

① 波兰称作：門茲胡德、門茲热奇、巴比莫斯特、弗斯霍瓦。——編者注

② 米兰、列日、日内瓦、哥本哈根的德文名字。——編者注

③ 科倫、科布倫茨、美因茲和法兰克福的法文名字。——編者注

在那里会听到說：“和波兰人越疏远，对波兰人了解得越少，就越爱波兰人；反之，和波兰人越接近，就越不爱”波兰人，因此，“这种同情”的基础“与其說是对波兰性格的**真正贊美**，不如說**是某种世界主义的唯心主义**”。

但是地球上各民族对其他某个民族，無論在“同它疏远”的时候，或是在“同它接近”的时候都不“爱”它，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将作何解释呢？地球上各民族空前一致地鄙視、利用、譏笑和凌辱这个民族，“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又作何解释呢？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

世界历史观点会告訴我們：这是建立在“**世界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就这样摆脱了困境。

不过，全世界历史的鷹并没有因为这一类小小的异議而感到难堪，它越飞越勇敢，越飞越高，最后，一直飞到自在自为思想的純以太中，大唱英勇的、全世界历史的黑格尔学派的如下頌歌：

“讓人們給历史以应有的报賞吧，历史在它的为必然性所注定的道路上，总是用鉄蹄无情地践踏那个在同等民族中間已經无力支持的民族，但是看到这个民族所受的长期苦难而不表示任何同情，毕竟是残忍的和野蛮的，我决不能这样冷酷无情（上帝会奖賞你的，高貴的約丹！）<sup>①</sup>。可是，被悲剧所感动是一回事，想使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另一回事。要知道，仅仅那个使英雄屈服的鉄的必然性，就能把他的命运变为**真正的悲剧**；而要干預这个命运的行程，想用人类的同情来阻止正在轉动的历史車輪，并且还要把它倒轉过来，这就意味着他本身会遭到压死的危險。希望波兰复兴，仅仅是因为它的灭亡引起了正义的哀痛，——我把这叫做怯懦的感伤。”

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深湛的智慧！多么动人的言詞！世界

---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歷史觀點後來整理自己的演說速記記錄時這樣說。

波蘭人必須選擇：如果他們想表演“真正的悲劇”，那末他們就應該馴順地讓鐵蹄和正在轉動的历史車輪來蹂躪自己，同時告訴尼古拉：“陛下，服從你的意志”！或者，如果他們想起來造反，想試一試能否用“历史的鐵蹄”來痛擊自己的壓迫者，那末他們就不表演任何“真正的悲劇”，而從柏林來的威廉·約丹先生對他們就不要再感到興趣。在羅生克蘭茨教授那里受過美學教育的世界歷史觀點這樣說。

暫時把波蘭消滅了的那個鐵面無情的鐵的必然性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建立在農奴制基礎上的小貴族民主制的崩潰，也就是大貴族在小貴族內部的產生。這是前進的一步，因為它是擺脫過時的小貴族民主制的唯一途徑。但它的後果是什麼呢？是历史的鐵蹄即東方的3個專制君主粉碎了波蘭。大貴族為了要消滅小貴族民主制，不得不和外國結成同盟。波蘭的大貴族在不久以前，有一部分一直到今天，還是波蘭壓迫者的忠實同盟者。

使波蘭恢復自由的那個鐵面無情的鐵的必然性又是什麼呢？這就是從1815年起在波蘭，至少在波茲南和加里西亞，甚至在一部分俄屬波蘭沒有中斷過的大貴族統治，現在也象1772年的小貴族民主制那樣垮台了；這就是土地民主制的建立對波蘭來說不僅是迫切的政治問題，而且是迫切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如果農奴制的或“有義務”[robotpflichtige]的農民不能成為自由的農民，那末波蘭人民賴以為生的農業就要毀滅；最後，這就是如果不同時獲得獨立的民族生存，不占有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和波蘭各河流的出口地帶，實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

從柏林來的約丹先生卻把這說成是想阻止正在轉動的历史車

輪，并且还要把它倒轉过来！

当然，**小貴族**民主制的旧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只有約丹先生才能指望什么人來使这个波兰的“真正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却生了一个强壮的兒子，仔細地認識一下这个兒子，的确会使某个目空一切的柏林文学家胆顫心惊。这个兒子刚刚在准备演自己的戏，刚刚把自己的手放到“正在轉动的历史車輪”上去，而他的胜利却是有保証的，——这个兒子就是**农民民主制**的波兰。

有一些陈腐的小說式的虛夸，有一些装腔作势的对世界的蔑視（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勇敢，而在約丹先生看来却是不足道的平凡的蠢举），簡單說来，有一些鐘和炮，丑恶的言詞所包含的“烟霧和音响”<sup>206</sup>，加上在最普通的历史方面的难以置信的糊塗和无知，——整个世界历史观点归結起来就是这样！

世界历史观点及其可理解的世界万岁！

## 六

科倫 8 月 26 日。會戰的第二天，場面比第一天更加偉大。誠然，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從柏林來的威廉·約丹先生沒有在場，沒有用他那張巧嘴來吸引所有聽眾的心神，但是我們不要苛求，象拉多維茨、瓦滕斯累本、凱爾斯特和羅多芒特-利希諾夫斯基<sup>207</sup> 这样的人也是不應該忽視的。

第一個走上講台的是拉多維茨先生。這個右派領袖說得簡單、明了、中肯。演說的腔調是適度的。提出的一些前提是謬誤的，但是很扼要；從這些前提中迅速地作出了一個結論。利用了右派的恐懼情緒。鑒於多數派的怯懦，而冷靜地確信有成功的把握。極端輕視整個議會，既輕視右派，也輕視左派。這就是拉多維茨先生所發表的簡短演說的特點，而我們也完全理解這些不多的、象冰一樣冷的、不加修飾的樸實言論，對聽慣了華而不實的空洞詞藻的議會究竟會產生什麼效果。如果從柏林來的威廉·約丹先生用他所有的“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形象世界所產生的印象，哪怕只達到拉多維茨用簡短的實際上也是毫無內容的演說所產生的印象的 $\frac{1}{10}$ ，那他也就很幸運了。

拉多維茨先生不是“有骨氣的人”，也不是很不錯的有堅定信念的人，但他是一位具有鮮明輪廓的明確的人物；只要聽他一次演說，就可以完全了解他。

我們從來不妄想取得某個議會左派機關報的榮譽。恰恰相

反，我們認為在德國民主黨成分極端複雜的情況下，對民主黨人進行最嚴格的監督，正是絕對必要的。而在一切政黨的領袖（除了少數例外）都缺乏毅力、決心、才幹和知識的情況下，我們在拉多維茨身上發現了至少可以較量的敵人，我們只有高興。

繼拉多維茨先生之後發言的是舒澤爾卡先生。他不顧以前的一切教訓，又來用感人的詞句向心靈申訴。喋喋不休的冗長的演說，有時穿插着歷史上的事例和閃耀着奧地利人的理智的光輝。一般說來，這種演說是令人厭倦的。

舒澤爾卡先生到維也納去了，他在那裡也當選為國會議員。他在那裡是適得其所的。如果說他在法蘭克福曾置身於左派，那末他在那裡卻成了中間派；如果說他在法蘭克福還能起某種作用，那末他在維也納的第一次發言就一敗塗地了。這就是所有這些從事文學活動、愛發哲學議論、愛作無謂空談的大人物的命運，這些大人物只是利用革命來為自己創造地位；只要把他們放到真正的革命基地上去待一瞬間，他們馬上就會逃之夭夭。

接着發言的是 *ci-devant* [前] 伯爵馮·瓦滕斯累本。瓦滕斯累本先生以滿懷好意、頭腦簡單的善良人物的姿態發言。他敘述了他在 1830 年以後備軍人資格向波蘭邊境進軍的逸事，接着就扮演桑科·判札的角色，用“天上的仙鶴不如手中的家雀”這句諺語奉勸波蘭人，同時，他居然以最天真的形式插進了下面這個卑劣的意見：

“為什麼一次也沒有找到同意在波茲南的應該分離的部分負責進行改組的波蘭官吏呢？恐怕是他們自己害怕自己，他們覺得還沒有成長到能夠平安無事地組織居民的程度，同時卻以種種理由來掩飾，說什麼熱愛祖國波蘭妨礙了他們着手進行令人高興的復興工作！”

換句話說，整整 80 年來，波蘭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始終不渝地進行鬥爭，是為了他們自己也認為不可能的和無意義的那種事業。

瓦滕斯累本先生在結束時表示同意拉多維茨先生的意見。

從波茲南來的波茲南國民委員會委員雅尼舍夫斯基先生走上了講台。

亞尼舍夫斯基先生的演說是聖保羅教堂的講台上發出的真正議會辭令的第一個典範。我們終於聽到了雄辯家的言論，他不追求會場的贊許，他用真正生動活潑、熱情洋溢的語言來說話，正因為如此，他給人的印象同以前幾個發言人完全不同。勃魯姆對議會的良心所作的呼喚，約丹的微不足道的情緒，拉多維茨的始終如一的冷淡，舒澤爾卡的模稜兩可的溫厚，在這位捍衛自己的民族生存、要求恢復自己的無可爭辯的權利的波蘭人面前，都黯然失色了。亞尼舍夫斯基說得興奮而熱烈，但是並不裝腔作勢；他只是以合理的憤怒心情來說明事實，沒有這種憤怒的心情，就不可能正確地闡明這類事實，而在辯論的過程中聽到了無恥的捏造以後，這種憤怒的心情是加倍合理的。他的演說真正是辯論的中心點，他擊退了以前對波蘭人的種種攻擊，糾正了波蘭的朋友們的一切錯誤，使辯論回到它的唯一實際、唯一真實的基礎上去，並且預先剝奪了在他後面發言的右派的最有力的論據。

“你們吞下了波蘭，但是我發誓，你們決不能把它消化！”

亞尼舍夫斯基演說的這個明確的結論將使我們永志不忘，同樣使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他對波蘭的朋友們的種種哀求所作的自豪的聲明：

“我不是以一个穷人的身分向你们说话的，我所依据的是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我不是来呼吁同情，而只是来呼吁正义的。”

在亚尼舍夫斯基之后发言的是从波兹南来的凯尔斯特校长先生。在为民族的生存、为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波兰人之后，是为自己的薪金而斗争的、迁居波兹南的普鲁士教师。在被压迫者的激昂慷慨的高贵的演说之后，是靠压迫来过幸福生活的官僚的卑鄙无耻的发言。

瓜分波兰，“现在叫做耻辱”，在当时却是“极普通的现象”。

“按民族来独树一帜的民族权利，完全是一种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承认过的权利。”“在政治上，只有实际的占有才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凯尔斯特的论证所根据的那些意味深长的格言中的几个例子。再说下去就矛盾百出了。

他说：“有些地带随着波兹南归并德国，毫无疑问，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波兰的；”过了一会又说：“至于波兹南的波兰部分，它并没有要求合并到德国去，据我想来，诸位先生，你们不要违背它的意志，把这一部分合并过去！”

在发表了这些议论之后，他引用了关于居民成分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是靠“涅茨同胞”所使用的有名的计算方法获得的。根据这些资料，只有完全不懂德语的人，才算是波兰人，多少能说几句德语的人则一律算作德国人。末了，他使用了一个极端巧妙的计算方法，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兹南省议会表决时，赞成合并到德国去的 17 票对 26 票的少数，其实是多数。

“根据省的法规，毫无疑问，必须有  $\frac{2}{3}$  的多数，才有权做出决定。当然，17 票还不到 26 票的  $\frac{2}{3}$ ，但是不够的部分是很小很小的，在决定如此重要的问题时是不必加以重视的！！”

这样一来，少数既然成了多数的  $\frac{2}{3}$ ，“根据省的法规”，它就是

多数了！旧普魯士国家制度，无疑会因凱尔斯特先生的这种发明而給他加冕。实际上，問題是这样的：必須有  $\frac{2}{3}$  的票数，才能提出建議。加入德意志联邦也就是这样的建議。因此，这个建議只有得到議会的  $\frac{2}{3}$ ，即 43 票的  $\frac{2}{3}$  的票数的贊成，才是合法的。可是，几乎有  $\frac{2}{3}$  的票数表示反对。这說明了什么呢？原来，17 是“43 的  $\frac{2}{3}$  弱”！

如果說波兰人不象“理智的国家”的公民那样，他們不是“有教养的民族”，那末，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智的国家給他們派去当教师的是这样的算术专家。

从波恩来的克雷門斯先生作了一个公正的批評，他說普魯士政府的目的是不是要使波茲南德国化，而是要使它普魯士化，并且把使波茲南普魯士化的尝试同在萊茵区的类似的尝试作了比較。

奧斯滕多尔夫先生是从左斯特来的。这个“紅色土地”<sup>①</sup> 的产兒大发庸俗的政治議論，滿口可能性、或然性和假定，廢話連篇，乱扯一通，由約丹先生扯到法国人，由紅色共和国扯到北美洲的紅色人种，把波兰人和紅色人种等量齐观，而把“涅茨同胞”和美国人相提并論。只有紅色土地才能产生这样大胆的比拟！讓凱尔斯特先生、曾弗先生、果登先生扮演带着枪和鋤住在小木房里的森林垦殖者的角色，真是无与伦比的喜剧！

从列温堡来的弗兰茨·施米特先生走上講台。他說話心平气和，毫不夸张，这一点特別值得指出，因为施米特屬于一般說来最愛夸张的那个階級，即屬于德国天主教的僧侶階級。在亞尼舍夫斯基的演說之后，施米特先生的演說是整个辯論过程中較好的演

<sup>①</sup> 即威斯特伐里亚。——編者注

說，这至少是因为它最有說服力，因为它显示出对爭論的問題具有最丰富的知識。施米特先生向委员会証明，它的假学术論据（这些論据的内容我們已經分析过）包含着对实际情况的絕對无知。施米特先生在波茲南大公国住过好多年，他向委员会指出，甚至在他最熟悉的那个小州的問題上也犯了极大的錯誤。他指出，正是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の問題上，委员会沒有向議會提供必要的說明，它簡直是命令議會不需要任何材料，对爭論的問題不必有任何了解，就随便通过決議。他要求首先說明实际情况。他指出委员会的提案和委员会本身的前提是多么矛盾；他引証弗洛特韦尔的备忘录，并且要求备忘录的作者（也在这里当議員）发言，如果說这个文件是伪造的話。最后，他当众揭发了“涅茨同胞”如何去找加格恩，打算用波茲南爆发起义的假消息来迫使加格恩赶快中止辯論。不錯，加格恩否認有这回事，但是凱尔斯特先生却公开地以此自夸。

議會的多数派对施米特先生的理直气壯的演說的报答，是設法在速記記錄中歪曲这篇演說的原意。有一个地方，施米特先生曾亲自把速記稿上添加的謬論修改过3次，但它还是印出来了。对施略費尔鳴鼓而攻<sup>①</sup>，对布倫坦諾进行公开的迫害<sup>208</sup>，对施米特施展伪造文件的伎俩，右派先生們，这真是絕妙的批評！

这次會議是以利希諾夫斯基的演說来結束的。但是我們要把这位朋友留到下一篇文章中来談；对于利希諾夫斯基这一类型的发言人，三言两語是說不清楚的！

---

① 見本卷第16頁。——編者注



## 七

科倫 8 月 31 日。議会的 bel homme [美男子]、德国的巴亚尔、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前公爵(基本权利第 6 条<sup>209</sup>)馮·利希諾夫斯基含着得意的微笑，以騎士的风流姿态走上了講台。他以地道的普魯士陸軍中尉的語調和旁若无人的瀟灑态度，吐露了他打算告訴議會的一些思想片断。

杰出的騎士是这些辯論中决不可少的因素。从果登先生、曾弗先生和凱尔斯特先生这几个范例来看，还不能十分相信波兰的德国人是多么值得尊敬，而在騎士利希諾夫斯基身上，可以看到普魯士化的斯拉夫人虽然举止优美，却是一种不雅观的人物。利希諾夫斯基是和波兰的德国人同种族的人；单是他在講台上出現这一点就給文件作了补充說明。上西里西亚的小貴族变成了普魯士的落后的容克地主这一事实，向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証，說明博爱的普魯士政府打算把波茲南的小貴族变成什么。尽管利希諾夫斯基先生作了种种庄严的保証，但他决不是德国人，他是“改造了的”波兰人，并且他所說的也不是德国話，而是普魯士話。

利希諾夫斯基先生首先庄严地保証他对波兰人具有騎士的同情，然后向亚尼舍夫斯基說了一些恭維話，又对波兰人作了应有的評价，說波兰人有“伟大的殉道詩篇”，而突然之間就急轉直下了。为什么这些同情减少了呢？因为在所有的起义和革命中“波兰人总是站在街垒的第一綫”！毫無疑問，这是一种罪恶行为，只要波

兰人经过“改造”，这种罪恶行为是不会再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使利希诺夫斯基放心，使他相信在“波兰的流亡者”中间，甚至在他认为堕落不堪的波兰小贵族流亡者中间，也有人是保持清白，和街垒完全无关的。

接着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

**利希诺夫斯基：**“用脚踏踏已经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的左派先生们，以奇怪的方式呼吁历史权利。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为了波兰的事业而挑选日期。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①）

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

**主席：**“诸位先生，让发言人有可能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他的话。”

**利希诺夫斯基：**“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左边来的笑声）

**主席：**“请不要打断发言人的话，请保持肃静。”（骚动）

**利希诺夫斯基：**“对历史权利来说，能够要求比更早的日期有更大权利的那个日期是不存在的！”（左派叫“好”，活跃②）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说高贵的骑士讲的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士话吗？

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遇到了我们的高贵的骑士这个厉害的敌人：

“如果我们深入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波兹南）③许多地区曾经是西里西亚和德国的；再深入下去，我们就到了斯拉夫人建成莱比锡和德勒斯顿的时期，随后就会达到塔西伦——如果我们深入这个问题，天知道这些先生还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① 笑声是由利希诺夫斯基的文法错误引起的，他连用两个否定词（«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kein Datum nicht»），这是违反德语规则的。恩格斯在这几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利希诺夫斯基的这句话，每次都保留了文法错误的句子构造。——编者注

② 利希诺夫斯基这次的句子构造是正确的。——编者注

③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世界上的事情大概是很糟糕的。普魯士貴族的領地无可挽救地被抵押出去，猶太債主變得非常頑固，一人簽字的票據所規定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付款期限来得太快；拍賣，喪失自由，因輕率舉債而被免職，——看來，所有这一切无法解决的財政困难的慘狀，使普魯士貴族有必遭破產的危險，因為事情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有一位利希諾夫斯基竟否認他在唐·卡洛斯親信的騎士中為了獲得騎士馬刺<sup>210</sup> 而捍衛的那種歷史權利！

如果我們想深入歷史債務權利的問題，那就自然只有天知道，法庭執行吏要把憔悴的騎士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可是，難道負債不是普魯士騎士們的最好的、唯一可饒恕的<sup>①</sup> 特點嗎？

美男子在轉到本題時，認為在反對波蘭的德國人時不應該“描繪隱藏在渺茫的遠處的未來波蘭的朦朧遠景(!)”，他認為波蘭人不會以波茲南為滿足：

“如果我有榮幸做一個波蘭人，那末我日日夜夜所想的只是如何恢復以前的波蘭王國。”

但是既然利希諾夫斯基先生“沒有這種榮幸”，既然他只是上西里西亞的一個改造了的波蘭人，那末他“日日夜夜”所想的就完全是另外的、愛國精神比較少的事情了。

“談到榮幸，我必須說，幾十萬波蘭人應該成為德國人，老實說，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對他們決不是不幸。”

相反地，假如普魯士政府再建立一個苗圃，來栽培可以製造利希諾夫斯基這一類人物的木材，那該多好啊。

我們那位蓄着翹起的胡須的騎士，繼續用那種實際上是用來

① 雙關語：德文《Schulden》——“負債”，《entschuldigende》——“可饒恕的”，“可寬宥的”。——編者注

跟劇場樓座中的女士們談話的、但也十分適合議會水平的親切而瀟灑的語調胡謔了一些時候，然後以如下的話作結束：

“我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現在請你們自己決定，你們是把50萬德國人接收到我們這方面來呢，還是拒絕他們……但是那時候你們也得刪掉老民歌手的歌詞：‘哪里講德國話，那里神就在天上載歌載舞’。<sup>211</sup>請刪掉這些歌詞！”

老阿倫特在寫這首歌時，竟沒有想到波蘭的猶太人和他們的德國話，這當然是很糟糕的。但是幸而出現了我們上西里西亞的騎士。誰不知道貴族階級對猶太人負有幾世紀來都奉為神聖的老債務呢？過去平民所忽略了的事情，騎士利希諾夫斯基都想起來了。

波蘭的猶太高利貸者死不要臉地說着蹩腳的德國話，  
對所有的人進行招搖撞騙的地方，

就是利希諾夫斯基的故鄉！

## 八

科倫 9 月 2 日。辯論的第三天，大家都露出了倦意。論証是老一套，沒有什麼更好的東西，如果不是第一位可敬的發言人阿爾諾德·盧格先生拿出了他的豐富的新論據來，速記記錄就會是枯燥乏味的。

但盧格先生對自己的功績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他許下諾言：

“我要用我的全部熱情、我的全部知識。”

他提出了建議，但是這不是什麼普通的建議，不是一般的建議，而是唯一正確的合乎真理的建議，絕對的建議。

“決不能有任何別的建議、別的假定了。當然可以採取另一種行動，諸位先生，因為人是習慣於離開正確的道路的。正因為人離開了正確的道路，他也就具有自由的意志……但是正確的決不因此就不再是正確的了。而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的建議是可能提出的建議中**唯一正確的建議。**”

（這樣一來，盧格先生就使自己的“自由的意志”為“正確的”東西犧牲了。）

我們現在來仔細地看一看盧格先生的熱情和知識，看一看他的唯一正確的建議。

“消滅波蘭之所以是可恥的非正義行為，是因為這樣就壓制了這個民族的寶貴的發展，這個民族在歐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曾經樹立過巨大的功績，曾經輝煌地發展過中世紀生活的一個階段，即發展過騎士精神。專制主義妨礙了小貴族共和國實現它本身的內在的（！）消滅，而這種消滅，借助於革命時期制定的憲法是有可能實現的。”

中世紀的南方法兰西民族和北方法兰西民族，不比現在的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有更多的親屬关系。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即一般所談的〕普罗温斯民族——在中世紀时代不仅完成了“寶貴的发展”，甚至还走在欧洲发展的前面。它在新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創造了标准語言。它的詩当时对拉丁語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在創造封建騎士精神方面，它可与卡斯提尔人、北方法兰西人和英格兰諾曼人相匹敌；在工商业方面，它絲毫不逊于意大利人。它不仅“輝煌地”发展了“中世紀生活的一个阶段”，甚至使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紀末期回光返照。因此，南方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有”很大的“功績”，而且簡直有无限的“功績”。可是它終于象波兰一样，起初被北方法兰西和英国瓜分，后来又被北方法兰西人全部征服了。从阿尔比教派战争<sup>212</sup>起到路易十一止，北方法兰西人对南方法兰西人进行了連綿不断的奴役战争，結果把全国征服了，但是北方法兰西人在文化程度上低于其南方的邻人，犹如俄国人低于波兰人一样。“专制主义”（路易十一）“妨碍了”南方法兰西“小貴族共和国”（在它的繁荣时期，这个称号是完全正确的）“实现它本身的內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有可能实现的，正象波兰小貴族共和国借助于1791年的宪法来实现它的消灭一样。

南方法兰西人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了好几个世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鉄面无情的。經過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語言淪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們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北方法兰西的专制主义，在南方法兰西身上压了300年，只是在300年后，北方法兰西人消灭了南方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最后一点残余，才

补偿了自己的压迫。制宪議會把那些独立的省划分为几个部分，国民公会的鉄拳破天荒第一次把南方法兰西的居民变成法兰西人，并为了补偿他們已經喪失的民族特性，給予他們以民主。但是在3个世紀中对他們的奴役，可以一字不差地借用卢格先生关于波兰人所說的話：

“俄国的专制主义并没有解放波兰人，消灭波兰的小貴族階級以及把这样多的貴族家庭逐出波兰，——这一切既没有使俄国建立民主制度，也没有使俄国具备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

可是，从来也没有把北方法兰西人征服南方法兰西叫做“最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卢格先生？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征服南方法兰西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征服波兰决不是非正义行为。請你选择吧，卢格先生！

波兰人和南方法兰西人之間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南方法兰西象一个軟弱无力的累贅那样被北方法兰西人拖着走，直到它的民族特性完全消灭为止，而波兰人却完全有希望很快站在斯拉夫各部族的前列呢？

南方法兰西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們在这里不可能詳細分析），是法国的反动的部分。它对北方法兰西的反对立場很快就变成了对整个法国各进步階級的反对立場。它成了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并且直到現在还是法国反革命的堡垒。

波兰就恰恰相反，它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过了）（見本报第81号）<sup>①</sup>，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的革命的部分。它对它的压迫者們的反对立場同时也就是对本国大貴族的反对立場。甚至小貴族階級（一部分还站在封建的立場上）

<sup>①</sup> 指“新莱茵报”第81号，見本卷第389—393頁。——編者注

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波兰复兴的保证，波兰复兴的必然性就在这里，而根本不在于久已埋葬了的骑士精神的辉煌发展。

但是卢格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为“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必须有独立的波兰存在作辩护的论据：

“加在波兰身上的暴力，使波兰人散布在欧洲各地；他们到处流散，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充满了愤怒……波兰精神在法国和德国(!?)成了更合乎人道的精神，而且纯化了，因为波兰的流亡者成了宣传自由的人(№1)①……斯拉夫人是能够加入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的(没有“大家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②，因为……他们的流亡者真正做到了传播自由(№2)③……多亏波兰人这些自由的传播者(№3)④，所有的俄国军队(!!)才感染了新时代的思想……我尊重波兰人在全欧洲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执武器宣传自由(№4)⑤的可敬的志向……只要他们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在历史上就会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到处以急先锋(№5)⑥的姿态出现(!!!)……波兰人是投到斯拉夫民族中去的自由的因素(№6)⑦；他们把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引上了自由的道路(№7)⑧，他们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进行活动。由此可见，波兰人在现代文明中也是积极的因素，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必需，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生气的。”

卢格先生要证明：第一，波兰人是必需的；第二，波兰人不是没有生气的。他在证明时说：“因为他们必需，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生气的。”

如果从上面所引的那段把同样的意思重复了7次之多的冗长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的話中去掉幾個字——波蘭人、因素、自由、宣傳、文明、傳播，你們就可以看到這一段夸夸其談的話還剩下些什麼。

盧格先生要證明波蘭復興的必要性。他以如下的話來證明這一點。波蘭人不是沒有生氣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充滿生命力的，他們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們是全歐洲自由的傳播者。他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和可恥的非正義行為，使他們散居在歐洲各地，他們帶來了因為遭到非正義行為而產生的憤怒，正當的革命的憤怒。他們在被放逐中使自己的這種憤怒“純化了”，而這個純化了的憤怒又使他們能夠傳播自由，並使他們“站在街壘的最前列”。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要放棄可恥的非正義行為和加在波蘭人身上的暴力，要復興波蘭，——那時候“憤怒”就會消失，那時候憤怒就不要再純化，那時候波蘭人就會回家，而不再“傳播自由”。如果說“因為遭到非正義行為而產生的憤怒”是使波蘭人成為革命者的唯一原因，那末放棄非正義行為就會使他們成為反動分子。如果說反抗壓迫是波蘭人維持生命力的唯一來源，那末請放棄壓迫吧，這樣波蘭人就會沒有生氣。

這樣一來，盧格先生恰恰證明了他想要證明的反面。由他的論據引伸出來的結論，就是為了自由和歐洲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波蘭不應該復興。

而且，盧格先生的“知識”是很奇怪的，他說到波蘭人時，只提到流亡者，只看到街壘中的流亡者。我們絕對不想侮辱波蘭流亡者，他們在戰場上以及在為了波蘭的利益而進行的18年秘密工作中，證明了自己的毅力和勇氣。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凡是熟悉波蘭流亡者的人，都知道波蘭流亡者遠不象盧格先生跟在前公爵利希諾夫斯基後面信口妄談的那樣，達到了以傳道者的精神熱愛自

由和一心想置身街垒的程度。波兰流亡者为了复兴波兰，表现得很坚定，忍受了很多痛苦，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难道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做的事情就少吗？难道他们没有蔑视严重的危险吗？难道他们没有遭受麻比特和斯皮尔堡的监狱、鞭笞、西伯利亚矿场、加里西亚的屠杀和普鲁士的榴霰弹等等的惨祸吗？可是这一切在卢格先生看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很少注意到，没有流亡的波兰人和几乎所有的波兰流亡者（除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以外）比较起来，接受的一般欧洲文明要多得多，对他们常住的波兰的需要要清楚得多。卢格先生认为波兰所有的一切知识，或者用他的话说，“传播到波兰人中间的、波兰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是由于他们居住在外国取得的。我们在 №[81]① 中曾经指出：波兰人既不应当从二月以后已经由于空谈而没落的法国政治空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需要，也不应当从还没有机会没落的深思熟虑的德国思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需要；我们曾经指出：波兰本身就是研究波兰需要什么的最美的学校。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而根本不是象卢格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把“在法国成熟了的政治自由的伟大思想”这一类空话“甚至(!)把在德国产生的哲学(卢格先生陷在这种哲学中)② 搬到了波兰和俄国”。

在卢格先生发表这篇演说以后，波兰人也许要高叫：请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朋友中拯救出来吧，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能够对付！可是波兰人历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外国朋友总是用世界上一切最拙劣的论据来替他们辩护。

① 指“新莱茵报”第81号。——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在法兰克福左派方面，非常值得称贊的是：他們（除了少数例外）因卢格先生关于波兰問題的演說而欣喜若狂，这篇演說中說：

“諸位先生，我們不想爭論我們究竟要什么，要民主的君主政体，要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还是要純粹民主制的問題，——**我們的要求一般說來是相同的**，就是要求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政权！”

左派听到有人說他們的要求和右派的要求“一般說來是相同的”，說他們的要求和拉多維茨先生、利希諾夫斯基先生、芬克先生以及其他肥的或瘦的騎士們的要求是一样的，就贊美备至，难道我們應該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嗎？得意忘形的左派一听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政权”这一类空洞的高調就忘記了一切，难道我們應該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嗎？

我們且把左派放在一边，再来談談卢格先生。

“在整个地球上，还未曾有过比 1848 年更伟大的革命。”

“按它的原則來說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原則是由抹杀最对立的利益而产生的。

“按它的法令和公告來說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法令和公告是欧洲一切空虛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博爱的幻想和关于友爱的多情的詞句的撮要。

“按它的表現來說是最人道的”，——这些表現就是波茲南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拉德茨基的杀人放火的勾当、巴黎六月胜利者的野兽般的残暴行为、克拉柯夫和布拉格的屠杀、普遍的軍閥統治，簡單地說，就是在今天，在 1848 年 9 月 1 日，“表現”为这个革命的全貌的一切卑鄙行为，由于这一切卑鄙行为，4 个月来所洒的鮮血，比 1793 年和 1794 年所洒的鮮血的总和还要多。

“人道的”卢格先生！

## 九

科倫 9 月 6 日。我們跟在“人道的”卢格先生后面，沿着他的道路对波兰的必要性作了历史的考察。直到現在为止，卢格先生所說的只是令人厌恶的过去，只是专制主义的时代；他修改了不合理的事件，現在他轉到了当前的时代，轉到了光荣的 1848 年，轉到了革命，現在他踏上了故土，現在他修改“事件的理性”<sup>213</sup>。

“怎样才能实现波兰的解放呢？波兰的解放可以用締結条約的方式来实现，欧洲两大文明民族必須参与締結条約，它們必須同德国，同解放了的德国組成新的三国同盟，因为它们們的想法是一样的，它們的要求一般說来是相同的。”

在我們面前的这句大胆的話中包含着对外政策方面的事件的全部意义。“想法一样、要求一般說来相同”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之間的同盟，就是現代 3 个瑞士人——卡芬雅克、莱宁根和約翰·罗素之間的新留特利同盟<sup>214</sup>。不过，近来法国和德国依靠上帝的帮助，又后退得这样远，以致它們的政府关于一般政治原則的“想法”几乎“是一样的”，官方的英国这块在大海中屹立不动的反革命的岩石也是这样。

但是这 3 个国家不仅“想法”是一样的，而且“要求一般說来也是相同的”：德国要得到什列斯維希，英国則不願意使它有这种机会；德国要实行保护关税，英国則希望有貿易自由；德国要統一，英国則希望它分散；德国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則力求在工

業上奴役它。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它們的要求“一般說來”畢竟“是相同的”！至於法國，它頒布反對德國的關稅法；它的部長巴斯蒂德嘲弄代表德國駐法國的勞麥老師，這就很明顯，它的要求“一般說來”和德國“是相同的”。真的，英國和法國都非常確切地證明，它們的要求也就是德國的要求，同時以戰爭來威脅德國：英國是為了什列斯維希，法國是為了倫巴第！

盧格先生具有思想家所特有的天真想法，他認為各民族如果在某些政治觀念上相同，那末單憑這一點就應該結成同盟。在盧格先生的政治調色板上——一共只有兩種顏色：黑色和白色，即奴役和自由。在他看來，世界分為兩大部分：文明民族和野蠻人，自由人和奴隸。6個月以前穿過萊茵河彼岸的自由的分界綫，現在同俄國的國境綫一致了，而人們就把這個過程叫做1848年的革命。現代運動在盧格先生頭腦中的反映是這樣混亂。二月和三月的街壘戰鬥口號，譯成波美拉尼亞文<sup>215</sup>就是如此。

如果把盧格的議論反過來從波美拉尼亞文譯成德文，那末，3個文明民族，3個自由民族，雖然發展的形式和階段各不相同，原來都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民族，而處在宗法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民族，都是“奴隸和仆役”。嚴格的共和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阿爾諾德·盧格所理解的自由，是最平凡的“肤淺的”自由主義，是至多不過具有假民主形式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問題的全部實質就在這裡！

既然法國、英國和德國都是資產階級在統治，那末這3個國家是天然的同盟者，——盧格先生是這樣斷言的。可是如果這3個國家的物質利益絕對相反，如果同德國和法國進行自由貿易是英國資產階級的迫切需要，如果對英國實行保護關稅是法國和德國

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德国和法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个三国同盟实际上变成了在工业上奴役法国和德国的工具，那将怎么说呢？“目光短小的利己主义，贪吝的生意人精神”，——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卢格暗自嘟囔说。

约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曾经谈到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卢格先生给这一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子。他也象所有多少在思想上属于左派的人们一样，看到他的最宝贵最喜爱的幻想、他的思想上的最大的努力，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面前碰得粉碎了。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的计划，在贪吝的生意人精神面前碰得粉碎了，于是他不得不（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以思想上多少歪曲的形式来代表这些生意人的利益。思想家在想，而商人在操纵。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

接着，卢格先生指出，法国“声明说，虽然1815年的条约已经撕毁，但它还是愿意承认目前的领土状况”。“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卢格先生在拉马丁的宣言中找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找到的东西，即新的国际权利的基础。他用下面的话来发挥这种见解：

“从与法国的这些关系中应该出现新的历史(!)权利(№1)①。历史权利就是各民族的权利(!№2)②。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是指新的国际权利(!№3)③。这是对历史权利(!№4)④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对历史权利(!№5)⑤的任何别的理解都是荒谬的。其他任何国际权利(!№6)⑥都是不存在的。历史权利(№7)⑦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原来如此!)⑧，因为它(什么?)⑨取消和撕毁旧的条约，代之以新的条约。”

总而言之：历史权利就是修改事件的理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在德国統一的使徒行传上，即在法兰克福議會速記記錄<sup>216</sup>第1186頁第一栏中，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記載着的。可是还有人埋怨“新萊茵报”用感叹号批評了卢格先生！这种令人头暈的、疯狂的历史权利和国际权利的舞蹈，自然会使心地純洁的左派驚訝，当波美拉尼亚的哲学家以不可动搖的信念对着左派耳朵高喊“历史权利是历史所實現的、時間所批准的权利”等等时，他們自然会惊得目瞪口呆！

但是要知道，“历史所實現的”东西和“時間所批准的”东西常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時間”的批准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實現的”东西。

現在卢格先生提出了“唯一正确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議：

“建議中央政权协同英法两国召集一个恢复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會議，通过本国的大使邀請一切有关国家来参加。”

多么大胆的善良的想法！罗素勋爵和卡芬雅克應該恢复波兰；英法資產階級應該用战争来威胁俄国，以便实现目前和他們毫不相干的波兰的解放！在現在这个普遍混乱和一团糟的时代，每一个安定人心的消息把行市提高了0.8%，遇到一連串破坏性的打击又化为烏有；工业同慢性的破产作斗争；商业陷于瘫痪状态；为了使失业的无产階級不致作普遍的最后的殊死搏斗，必須耗費大量的錢来維持他們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难道3个文明民族的資產者还会制造新的糾紛嗎？什么样的糾紛呵！对从二月起就成了英国的最亲密的同盟者的俄国作战！对俄国作战，进行这个誰都知道会使德法資產階級毁灭的战争！为了什么利益呢？什么利益也不为！这实在比波美拉尼亚的天真还要天真！

但是卢格先生拿脑袋来担保，說“和平解决”波兰問題是可能

的。越来越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谈的是：

“維也納条約力求达到的东西，现在应该成为现实，应该真正实现……維也納条約力求确立一切民族反对大法兰西民族的权利……它求复兴德意志民族。”

现在弄清楚了为什么卢格先生的“要求一般说来”和右派相同。右派也要求实现維也納条約。

維也納条約是反动的欧洲对革命的法国取得巨大胜利的总结。它是欧洲反动势力在15年复辟时期进行统治的典型形式。它恢复了正统主义、天赋的王权、封建贵族、僧侣的统治、宗法式的立法和行政。但是因为这次胜利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的，所以对资产阶级也必须作若干让步。可是肥美的战利品已经被君主、贵族、僧侣和官僚们分完，资产阶级就只好满足于任何时候也不会兑现、任何人也不想兑现的未来的期票。卢格先生不去研究維也納条約的真正的实际内容，他相信这些空洞的诺言也就是条約的真实内容，而把反动的实践仅仅解释为为非作歹！

过了33年，在1830和1848年的革命以后，还相信这些期票会兑现，还以为維也納诺言的多情的词句在1848年有某种意义，这的确要有非常宽大的胸怀！

卢格先生在扮演維也納条約的唐·吉珂德的角色！

卢格先生在结束时向议会泄露了一个大秘密：1848年革命之所以发生，不过是由于1846年在克拉柯夫破坏了1815年的条約。这对于所有的暴君是一个警告！

简单地說，卢格先生自从我们在文艺舞台上同他最后会晤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sup>217</sup>



上扮演德国哲学的守門人这一角色时就記得烂熟的老一套詞句；还是那样糊塗，还是那样輕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謬的思想；还是那样缺乏“知識”；尤其是，还是那样力求得到一生中还没有听过类似的話的德国庸人們的贊許。

我們对波兰問題辯論的評論就此結束。如果还要我們談一談从波茲南来的勒弗先生以及在他以后发言的其他一些大人物，那未免要求过分了。

所有这些辯論所留下的印象都是微不足道的。长篇演說是这样多，內容是这样貧乏，对情况的了解是这样有限，才能是这样不够！过去或現在的法国議會或英国下院中最沒有意思的辯論，也要比3天来对現代政治中一个最有意义的問題的討論具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实际知識、更多的实际內容。本来可以用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些辯論，可是国民議會却把它們变成了无謂的空談！

真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开过这样的會議！

決議是大家都知道的。侵占了波茲南 $\frac{3}{4}$ 的地方；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德国人的勤勞”，不是用“犁”去侵占，而是靠无謂的空談，靠不确实的統計，靠羞羞答答的決議去侵占。

“你們吞下了波兰人，但是我发誓，你們决不能把他們消化！”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7日—9月6日

載于1848年8月9日、12日、20日、22日、26日、31日，9月1日、3日、7日“新萊茵报”第70号、73号、81号、82号、86号、90号、91号、93号、9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德国公民权和普魯士警察

科倫 8 月 11 日。大家知道，8 月 6 日普魯士軍隊曾怎样向德国的統一宣誓<sup>218</sup>。普魯士警察不能落后于普魯士軍隊。在普魯士警察看来，在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国国民議會、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和德意志帝国内閣还没有在法兰克福出現以前，在普魯士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德籍外国人或外国的德国人。

执行警察厅长职务的盖格尔先生(对他的上任我們早有預感，而且早已向他祝賀过了)显然接到了特別命令，要把科倫的德籍外国人清除出去，在这古老帝国的城市里只允許普魯士的臣民居住。假如他切实照办，那末除了警察、軍隊、官僚和土著普魯士人以外，誰还有公民权呢？盖格尔先生本人也不可能不包括在这些“最后的馬喜坎人”<sup>①</sup>之内。

对于“新萊茵报”总編輯卡尔·馬克思的普魯士国籍問題所发生的冲突，我們以后再报道<sup>②</sup>。現在来談談“新萊茵报”的撰稿人和校对卡尔·沙佩尔先生。

沙佩尔先生今天早晨曾經被所在区的警察署长传去。警察署

---

① 馬喜坎人 (Могикане) 是 18 世紀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杀絕的北美东岸的印第安人——阿尔工金人 (Алгонкины) 的部族。“最后的馬喜坎人”一語指某一民族或部族的最后代表者。——譯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51—454 頁。——編者注

长先生通知他，遵照盖格尔先生的命令，他这个外国人应在明天一早离开科倫和普魯士国境。署长先生又补充說，他由于好意，把出境期限延长了 8 天。

沙佩尔先生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拿騷人，他有 in optima forma [完备的] 拿騷身分証。沙佩尔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 3 个孩子都住在科倫。他是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又是“新萊茵报”的校对，因此他是身犯三重罪过。

业已通过的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条称：“凡是德国人皆享有全德公民权”。按照盖格尔先生的解释，这大概是說：凡是德国人皆享有被驅逐出 37 个德意志邦的权利。除了国民議会的立法还有盖格尔的立法！

但是，我們要奉告办事大臣汉澤曼先生：他可以用警察手段随意迫害議員，但是对报刊可得小心謹慎点。报刊会揭露他的一些資產階級往事并且——

假如您願意起舞，  
大人，請您示意——  
我为您伴奏！ 219——

不管盖格尔 (Geiger) 之流怎样用自己的警察局 (Violine)① 来进行威胁。

写于 1848 年 8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8 月 12 日  
“新萊茵报”第 73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俏皮話：《Geiger》是姓，《Geiger》是“提琴手”；《Violine》是“小提琴”；《Violon》是“監獄”，“警察局”。——編者注

## 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 目前失败的原因

3月間，奧地利人很快便被趕出倫巴第，現在，他們以同樣的速度凱旋歸來了，而且已經進入米蘭。

意大利人民不惜任何犧牲。他們為了完成已開始的事業和爭取民族獨立，曾準備以殊死的精神進行戰鬥。

但是這種勇氣、這種熱情、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無論如何也不符合當權者的心願。他們公開或秘密地進行種種勾當，利用他們權限範圍內的一切手段來麻痺人民的力量，儘快地恢復實質上的舊秩序，而不是使國家從奧地利的殘酷壓迫下解放出來。

教皇<sup>①</sup>日益受奧地利天主教會的政治影響，而且日益受它指揮。他同“黑色”和“黑黃色”<sup>220</sup>結成聯盟，給馬米阿尼內閣的道路上設下重重障礙。內閣本身曾經在兩院會議上發表了充滿愛國精神的演說，但是沒有表現出為實現它那些良好願望所必需的魄力。

在多斯加那，政府雖然說得天花亂墜，然而做得更少。可是在意大利的一切君主中，意大利自由的最可惡的敵人還是查理-阿爾伯特。意大利人應當時刻溫習並記住這一句格言：“請上帝把我們從我們的朋友中拯救出來，至於我們的敵人，我們自己能夠對

---

① 指庇護九世。——編者注

付!”。对于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他们是用不着特别耽心的，因为他早已被揭穿了。相反，查理-阿尔伯特硬要别人到处把他当作 «la spada d'Italia» (意大利的剑)，当作英雄来歌颂，说他的剑是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的最好保障。

他派往意大利北部各地去的特使把他描绘成唯一能够拯救而且正在拯救祖国的人。可是要他实现这一点，他们说，当然就必须建立一个北意大利王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掌握不仅能抵御奥地利，而且还能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必要力量。查理-阿尔伯特的功名心曾驱使他和烧炭党人结成了联盟（以后又出卖了他们），当时这种功名心空前强烈，他幻想能得到很大的权力和威势，这样，他很快就能凌驾于意大利的其他一切君主之上。他曾力图利用 1848 年的全民运动来达到个人目的。他对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活动家充满仇恨和猜忌。他把一些比较忠实于专制制度和倾向于支持国王的贪求功名的计谋的人安置在自己周围。他把一些就智慧或政治观点来看都可使他放心，但不得士兵信赖而且缺乏顺利指挥作战所必备的才干的将军任命为军队的首脑。他吹嘘自己是意大利的“解放者”，并且提出要以被解放的人甘受他的奴役为条件。情况对他格外有利。然而他贪得无厌，他想尽可能捞得多一些，尽可能什么都捞到，结果反而连已经得到的东西也失掉了。当伦巴第归并皮蒙特的問題尚未彻底解决的时候，当建立共和制的可能性还存在的时候，他苟且偷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抗御奥地利人，尽管当时奥地利人相当软弱。他讓拉德茨基、达斯普雷和韦尔登等人接連占领了威尼斯的許多城池和堡垒，而他自己却按兵不动。一直到威尼斯向王权求救的时候，他才認為值得一救。他对帕馬和摩地那的态度也是这样。可是拉德茨基这时却在聚集

力量，他同查理-阿尔伯特及其將軍們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相反，他为了組織进攻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結果是世人皆知的。从此，意大利人不能也不会把他們的解放事业托付給哪一位君主了。为了拯救自己，他們应尽快地把这把«spada d'Italia»（“意大利的劍”）当作废物扔得远远的。假如他們早就这样做了，假如他們早就离弃了国王、他的体制以及他的一切信徒而結成民主联盟，那末現在意大利也許就不会有一个奥地利人了。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意大利人白白地遭受了他們的敌人所进行的那个野蛮战争的种种灾祸，他們白白地忍受了极其巨大的牺牲。此外，他們这些手无寸鉄的人还經受了残忍的梅特涅-奥地利的反动分子及其軍閥們的摧残。凡讀过拉德茨基告倫巴第市民書或者韦尔登告羅馬教皇使节書的人都会懂得：阿梯拉和匈奴人对意大利人来说仿佛是温柔的小天使。反动派和复辟在庆祝胜利。綽号叫«il carnefice»（“劊子手”）的摩地那公爵也回来了，他曾經給奥地利人 120 万盾的貸款作为战争費用。人民常常由于自己的寬宏大量而自掘坟墓，直到后来他們才聰明起来，从自己的敌人那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摩地那人讓他們的公爵安然地走掉了，而这位公爵在他过去統治的年代里曾經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監獄、絞死和枪杀，因为他們的政治信仰和他不同。而現在，他又回到他們这里来了，他想以加倍的勤勉来从事他那血腥的公爵行业。

反动派和复辟在庆祝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暫时的。人民充滿了革命精神，要长期压制它已不可能了。米兰、布里西亚及其他城市已在 3 月間証明，这种革命精神能干出怎样的事情来。当苦难已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再次发生起义。最近几个月的惨痛

---

教训会预告意大利人不要堕入新的幻想，会帮助他们在统一的民主旗帜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11日

载于1848年8月12日

“新莱茵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科倫日报”論意大利

科倫 8 月 26 日。昨天，我們注定要傾听柏林的文学家威廉·約丹先生<sup>①</sup> 从世界历史观点出发对政治問題的高談闊論。命运无情地追随着我們，今天，同样的遭遇又落到我們头上了。3 月間的主要收获就是文学家包办了政治。

閔斯德的列文·許金先生（他是杜蒙先生广告机构中的无名小卒）在“科倫日报”上发表了題为“我們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文。

“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朋友列文”<sup>221</sup>說了些什么呢？

“德国从来也沒有現在这样的大好时机，它可以把对意大利的政策建立在永世不朽的良好基础上。我們光荣地（！由于查理-阿尔伯特的出卖）<sup>②</sup> 为我們的旗帜洗去了耻辱，这种耻辱是那些一有胜利便驕傲起来的人民造成的。这支不仅在战斗和胜利方面无与伦比，而且在坚忍和頑强方面也十分惊人的軍队，是一个 *barba bianca*，白鬚公帶領的，他把光荣的(!?)德国双头鷹豎立在暴动城市的塔尖上。600 多年以前，一位黃鬚公皇帝也曾在这里豎起同样的旗帜作为德国統治意大利的象征。現在这种統治权屬於我們了。”

“科倫日报”的列文·許金先生就是这样說的。

当手无寸鉄的人民經過 5 天的激战把拉德茨基的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步兵从米兰赶跑的时候，当“十分惊人的軍队”在戈伊托城下被击潰而向維罗那敗退的时候，“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

① 見本卷第 402—408 頁。——編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朋友列文”的政治豎琴竟默不作声！但是，自从得到增援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查理-阿尔伯特胆小而不光彩的叛卖行为（我們已无数次地預示过这一点）取得了不应有的胜利以后，我們相邻的政論家又登上了舞台，他們鼓吹“被洗去了的耻辱”，他們冒昧地把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薩和拉德茨基·巴巴比安相提并論；从这时起，在1848年革命中完成了最光荣的革命的英雄城市米兰，便成了一个“暴动的城市”；我們这些自古以来什么也沒有享有过的德国人，却享有了“对意大利的統治权”！

“我們的旗帜”！在維也納受人踐踏的梅特涅反动派的一堆黑黃色破布，就是“科倫日報”的許金先生的旗帜！

“光荣的德国双头鷹”！那正是紋章志上的怪物，它在热馬普、弗路留斯、密雷栖摩、里沃利、諾依維特、馬連峨、霍恩林屯、烏尔姆、奥斯特里茨和瓦格拉姆等地<sup>222</sup>被武装的革命拔光了羽毛。这就是“科倫日報”的許金先生的“光荣的”爪牙！

当奥地利人吃敗仗的时候，他們是以宗得崩德<sup>223</sup>为榜样而行动的奥地利人，甚至几乎做了祖国的叛徒。但是一旦查理-阿尔伯特陷入了圈套，一旦奥地利人向基契諾推进，他們就成了“德国人”，并且好象是“我們”完成了这一切。我們願意承認，“科倫日報”在沃尔塔和庫斯托查打了胜仗并且占領了米兰<sup>224</sup>。但是它同时也要对这支“在坚忍和頑强方面也十分惊人的”野蛮军队的惨无人道的行为（这种情况它也很了解）負責，正如它过去曾經对加里西亚的屠杀負責一样。

“現在这种統治权屬於我們了。意大利和德国，这是两个在自然和历史条件方面彼此都有联系的民族，是由天意联結起来的民族，是彼此有亲密关系的民族，正如科学和艺术、思想和感情一样”——

正如勃律盖曼先生和許金先生一样!

正是为了証明德国和意大利是“由天意联結起来的”民族，所以2 000年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經常不断地进行斗争；意大利人一再推翻德国人的压迫；米兰的大街經常被德国人的鮮血所玷污!

正是因为意大利和德国“彼此有亲密关系”，拉德茨基和韦尔登才使威尼斯的全部城市遭受浩劫和焚烧。

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朋友列文現在希望我們放弃从倫巴第到艾契河<sup>①</sup>的土地，因为人民不喜欢我們，尽管有些貧苦的«cittadini» (“市民”) (学者許金先生这样称呼 contadini——农民) 是兴高采烈地欢迎奥地利人的。但是，假如我們自己的举止象“自由的人民”那样，“意大利人民就会向我們伸出手来，讓我們把他們引导到他們单独无法走的道路——自由的道路上去”。

的确如此! 早在德国沉眠不醒的时候就已爭得了出版自由、陪审法庭和宪法的意大利，在巴勒摩完成了这一年的首次革命的意大利，赤手空拳在米兰战胜了“无与伦比的”奥地利人的意大利，如果没有德国即那个拉德茨基的引导，便不能走上自由的道路! 当然，如果为了走上自由的道路，法兰克福議會、毫无意义的中央政权、39个宗得崩德和“科倫日报”都是必需的……

于是，为了使意大利人正是請求德国人“引导他們走向自由”，許金先生控制了意大利的提罗耳和威尼斯省，以便把它們奖賞給奥地利王公，他还派了“2 000个南德意志帝国軍队的士兵到羅馬去，好讓克里斯特的地方长官在他自己的家里重建安宁”。

但是，可惜得很!

---

① 意大利称作阿迪杰河。——編者注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屬於英国人的，  
但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爭辯的。

在這兒我們掌握着領導權，  
在這兒我們緊密地溶成一片；  
而其他國家的人民，  
却是在平坦的土地上發展。<sup>225</sup>

正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意大利的統治權”是屬於我們的。對於這一點，誰也沒有許金先生清楚。他從德意志帝國的利益出發談到這個英勇的統治政策的時候感慨地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這個偉大而崇高的政策，只有德意志帝國這樣的強國才有魄力實行。遺憾的是，它在我們這裡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幻想，這種情況大概還要延續很久！”

我們推薦許金先生到施蒂爾夫山峰去擔任看門人，去擔任守衛德國榮譽的邊防哨。這位穿着鎧甲的“科倫日报”的小品文作家可以從那裡了望意大利並進行監視，使“德國對意大利的統治權”不要有半點放鬆。只有這樣，德國才能高枕無憂。

弗·恩格斯寫於1848年8月26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48年8月27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87號

## “閱报室”报論萊茵省

科倫 8 月 26 日。“柏林閱报室”发表了一篇論文，內容如下：

“不久以前我們曾經說过：长期以来把腐朽的各邦机体联結在一起的那种精神日益消失的时机已經来到了。在奥地利未必会有人怀疑这一点。在普魯士，証实我們这种看法的时代标志也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我們不能忽視这一点。現在只有一点利益还可以把德国各省和普魯士邦联合起来，这就是对发展自由主义的国家机构，对通过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新的自由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关怀。如果普魯士作为一个邦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利益的要求，那末坚定地走上政治和社会进步道路的西里西亚，对自己作为普魯士的成員这一点，未必会感到滿意。关于薩克森省的情况大家都十分清楚。自从它归并入普魯士邦之后，它对普魯士一直心怀敌意。至于萊茵省，也許大家还記得，它的議員在 3 月 18 日前夕曾經在这里发表过什么样的威胁性演說，他們对加速变革曾經起过什么作用。要求分离的情緒正在这个省里滋长。一种沒有注明出版者和出版地址的传单現在正在大量散发，这就是这种敌对情緒的新証据。”

“閱报室”所說的传单，我們的讀者大概都知道。

值得我們高兴的是：無論是对全德国來說，無論是对萊茵省來說，柏林并不是巴黎这种見解至少在柏林人中間找到了一个拥护者。柏林开始意識到，它不能統治我們，它不能贏得一个首都城市所享有的那种威望。在不彻底的三月革命中，在袭击軍械庫以及不久前发生騷动<sup>226</sup>的时候，柏林充分地暴露了它的軟弱无力。除了柏林人表現得不够果敢以外，各个党派也十分缺乏有才干的人。

自从2月起，在运动的全部进程中，柏林沒有出现一个能够领导自己政党的人。“精神”的首都的这种精神充滿了善良的意向，但是它也和肉体一样并不健壮。柏林人甚至不得不把他們的汉澤曼、康普豪森和米尔德从萊茵或者西里西亚解救出来。柏林还远不能称为德国的巴黎，它甚至連普魯士的維也納也称不上。它不是首都，而是“官邸”。

更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是：柏林的人們也开始得出在萊茵早已成为公認的結論，即只有德国各个所謂的列强的崩潰，才能产生德国的統一。我們从未掩飾过我們对这个問題的看法。無論是德国过去的光荣还是現在的光荣，無論是各次解放战争还是在倫巴第和什列斯維希“德国武装的光荣胜利”，我們都不贊賞。但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从德国得到某些有用的东西，德国的集中是必要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德国应当成为一个統一的国家。为此，首先必須使“無論是奥地利或普魯士”<sup>227</sup> 都不再繼續存在。

不过，把我們和腐朽的普魯士“长期以来联結在一起的”那种“精神”，是完全可以感觉得到的粗野的精神，即15 000把刺刀和一批大炮的精神。在萊茵建立了上西里西亚波兰人和卡舒布人的士兵駐扎区不是无目的的，我們的青年被赶入柏林近卫軍也不是无目的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使我們和其他省份和解，而是为了挑拨省与省之間的不和，为了利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間的民族仇恨以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德国省份对其邻省所抱的地域敌視态度来巩固封建宗法的专制統治。《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

的确，“各省”即烏刻馬克的和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用他們許多惊慌的呼吁强令柏林人扮演的那种虛构角色（柏林人慌忙地承担了这种角色）已經是結束的时候了。柏林不是——而且永

远也不会是——革命的中心，民主的首都。只有勃兰登堡的貴族們在面临破产而惊慌失措的时候、在因債務被捕和受絞架威胁而吓得发抖的时候所产生的幻象，才能赋予柏林这种作用。也只有那些有輕浮的虛荣心的柏林人才会把这班貴族当作真正的地方代表。我們承認三月革命，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它的真实情况。它的最大缺陷就是沒有使柏林人革命化。

“閱报室”認為，借助于自由化的机关就能使瓦解中的普魯士国家重新巩固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机关愈自由化，各种不同的因素就愈容易彼此分离；分离的必要性就愈明显，柏林各党派政客的昏庸无能也就愈加暴露无遺。

再說一遍：萊茵省并不反对和旧普魯士各省一起仍然作为德国的成員。但是要它永远作为普魯士的組成部分（不論普魯士将来是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一样），这就是說要使德国的統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是說，德国为了使普魯士保留萊茵省，也許（这里我們是反映人民的共同意見）自己要丢掉一个广大而美丽的省份。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26日

載于1848年8月27日

“新萊茵报”第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載于  
1944年版“馬克思和  
恩格斯反对德国反动  
派”文集

## 調停和干涉。 拉德茨基和卡芬雅克

由于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行为而签订的停战协定<sup>228</sup>大约再过3个星期(9月21日)就到期了。法国和英国提出調停。奥地利对这一提議至今还未置可否，——关于这一点可以看看卡芬雅克的报纸“共和主义观察家”。奥地利的这种无礼态度终于激怒了法国的独裁者，他威胁說，如果維也納政府到特定的日期不給以回答或拒絕調停，他就要进行武装干涉。奥地利是否容許那位卡芬雅克恰好在他战胜了維也納的民主派和意大利的“暴动者”以后的今天强迫它接受和平呢？奥地利很清楚：法国的资产阶级希求“和平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意大利将来是自由还是被奴役，这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來說完全一样；只要不在全世界面前公然侮辱资产阶级，因而也不强迫它违背自己的意志拿起宝剑，它就会贊同一切。据說，拉德茨基不久要到維也納去决定調停問題。但是，要决定这个問題他完全可以不必到維也納去。他的政策目前占有优势，即使他仍然留在米兰，他的意見也是一点不会减少分量的。如果奥地利接受英法所提出的媾和条件，这并不是因为它害怕卡芬雅克的干涉，而是由于更加紧要和更加迫切的原因。

意大利人也和德国人一样被三月事件欺騙了。意大利人想，現在无论如何要推翻外来的統治了；德国人認為，旧制度永远被埋

葬了。但是实际上，在意大利，外来的統治空前加强了，而在德国，旧制度在三月里受了某些打击后又恢复了常态，并且变本加厉，急待复仇。

目前意大利人的錯誤就在于他們等待当前的法国政府来拯救。实际上只有这个政府垮台以后他們才能得救。其次，意大利人認為，在法德等国的民主势力日益丧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們也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錯誤的。現在打击意大利的反动势力并不是来自意大利本国，而是来自欧洲。意大利单独不能逃出这一反动势力的魔掌，要想在法国資產階級的援助下做到这一点更加不可能，因为法国資產階級正好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真正支柱。

首先必須在法国打垮反动派，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意大利和德国消灭它。因此，法国應該首先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法国的无产階級應該首先箝制住本国的資產階級，只有这样，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民主派才能获得巩固的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31日

載于1848年9月1日  
“新萊茵报”第9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

科倫 9 月 2 日。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又一次出色地证明了它的制度的优越性。由于里斯康土的滑稽可笑的事件<sup>229</sup>，竟有 17 个人被判处死刑！一些冒失的莽汉企图撩起道德高尚的比利时民族的立宪外衣的衣角，这对她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为了洗雪这种侮辱，17 个人被判处死刑！17 个人被判处死刑，这是多么野蛮！

里斯康土事件是人所共知的。比利时的工人在巴黎聚集起来，企图向祖国实行共和主义的进军。从布鲁塞尔来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支持了这种蠢事。赖德律-洛兰尽力促其实现。“心地纯洁的”叛徒拉马丁，对待外国的民主主义者也象对待法国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向来是说话漂亮，做事肮脏；他经常吹嘘说，他曾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进行秘密活动，就象避雷针同闪电一样。就是说他最初支持比利时军团，是为了后来更好地出卖它。军团出发了。诺尔省政府委员德勒克吕兹把第一纵队出卖给比利时的铁道官员；运送第一纵队的列车被背信弃义地开进了比利时的领土，落入了比利时的刺刀丛中。第二纵队曾由 3 个比利时密探带领（巴黎临时政府的一位委员亲自对我们说过这件事，后来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密探响导把它领到了比利时领土上的一个森林中，那里有实弹的大炮在等待它。纵队的一部分人被击毙，大部分人被俘虏。

1848年革命的这个小插曲，由于背叛行为的层出不穷和在比利时对它的规模的夸大，而使它变成滑稽可笑的。它成了比利时检察机关的一块画布，比利时检察机关在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了一幅不知何时策划好的规模巨大的阴谋案的景象。安特卫普的解放者梅利奈老将军，特德斯科，巴兰——简言之，布鲁塞尔、列日和根特等地的最坚决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都被牵连到这一案件中去了。如果若特兰先生不了解那些内情和没有掌握那些文件（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就会使整个比利时政府，包括最英明的列奥波特在内，都要名声扫地），他也许会被巴魏先生牵连进去。

为什么要逮捕这些民主主义者呢？为什么要对那些象审判他们的陪审员一样同这个事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进行这种骇人听闻的审判呢？为的是要激起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并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来征收额外税和发行强制公债；强制公债好象是建筑美好的比利时国家大厦的水泥，没有它大厦就要垮台！

被告出庭受审。审判他们的是安特卫普的陪审员，是佛来米酒徒中间的优秀分子，这些人同法国政治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或庄严的英国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都是格格不入的；审判他们的是一些财迷转向、利欲熏心的鲨鱼商。伟大的巴魏知道他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于是就利用了这些人的恐惧心理。

究竟谁在安特卫普真正看见过共和主义者呢？而现在却有 32 个这样的怪物站在惊惧的安特卫普人面前；吓得直打哆嗦的陪审员竟同最英明的法官一起把 17 个被告按 Code pénal [刑法典] 第 86 条和以下各条判处，就是说处以死刑！

在 1793 年恐怖时期，就曾有过利用审判来实行镇压的情形，那时官方公布的事实并不是判决的真正原因。但是，甚至狂热的

富吉耶—丹维尔也从来没有主持过这种充满粗鲁无耻的谎言和偏颇盲目的仇恨的审判。难道比利时爆发了内战？难道半个欧洲都和叛乱分子勾结起来，并且陈兵于比利时的国境，就象 1793 年在法国那样？难道祖国已经处于危急之中？难道宝座上出现了裂缝？恰恰相反，谁也不想去奴役比利时，最英明的列奥波特直到现在还每天不带警卫从拉肯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回到拉肯。

陪审员和法官把 81 岁的梅利奈老人判处死刑，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这位法兰西共和国的老战士在 1831 年挽救了比利时的最后一点荣誉。他解放了安特卫普，因此安特卫普要把他判处死刑！他的全部罪过就在于：他曾保卫自己的老朋友贝克尔免受比利时官方报纸的攻击，当贝克尔在巴黎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他仍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梅利奈和阴谋没有丝毫关系。可是人们却要轻率地把他判处死刑。

而巴兰呢？他是梅利奈的朋友，他经常去拜访他，有人看见他同特德斯科一起进咖啡馆，——这就是把他判处死刑的充分根据。

最后，特德斯科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吗？难道他同那些被比利时警察当作暗投假匕首的对象的人<sup>①</sup>没有联系吗？难道没有人看见过他同巴兰一起进咖啡馆吗？证据确凿，里斯康士附近人们的战斗是特德斯科煽动起来的，因此把他判处死刑！

对其他人的判决的根据也是如此。

这些“阴谋家”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仅仅因为他们都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有权称自己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朋

<sup>①</sup>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沃尔弗侨居比利时期间，比利时警察为了把他逮捕，诬称他家藏有匕首、图谋不轨，实际上是栽赃陷害。——译者注

友。如果卖淫式的比利时报纸誣蔑他們，我們就要在德国民主派的面前至少替他們的声誉辯护。如果他們的祖国抛弃他們，我們就承認他們是自己人！

当审判长宣布對他們的死刑判決时，他們热烈地高呼：“共和国万岁！”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以及在宣判的时候，他們都表现出真正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現在我們来听一听卑賤的比利时报纸在說些什么。

“安特卫普报”写道：“和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的整个审判案一样，判決在城内也沒有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只有在劳动阶级中間（应讀为：在流氓无产阶级中間）<sup>①</sup>才可以看出对共和国騎士的敌意；其余居民根本没有注意审判案；在他們看来，这种挑起革命的企图，即使在死刑宣判以后，也仍然是滑稽可笑的；况且誰也不相信这个判決将会执行。”

当然，只有把以安特卫普的救星——年老的梅利奈为首的17个共和主义者綁赴刑場斬首的有趣場面实地拿給安特卫普人看的时候，他們才会对审判案发生兴趣！

似乎不應該把比利时政府、比利时陪审官和比利时法庭把死刑判決当兒戏的作法看作是他們的兽行！

“列日自由主义者”写道：“政府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但是，它表现出的只是兽行而已。”

可是，佛来米民族的命运始終就是如此。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9月2日

載于1848年9月3日

“新萊茵报”第9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馬克思和普魯士國籍<sup>230</sup>

科倫 9 月 4 日。前些日子我們曾經提到<sup>①</sup>，“新萊茵報”總編輯卡爾·馬克思為普魯士國籍問題曾和當局發生了一場糾葛。這件事情又一次證明，為了用欺騙手段把 3 月間許下的諾言化為泡影，當局採取了些什么手段。從馬克思致內政大臣屈韋特爾先生的下列文件中便可看出究竟。

大臣先生！

請允許我就本地王國區行政機關對我個人作出的決議向您提出申訴。

1843 年我離開祖國——萊茵普魯士——暫時居住巴黎。1844 年我獲悉，由於我的一些著述，王國駐科布倫茨總督指令有關的邊防警察當局逮捕我。這條消息也曾經在柏林各家受檢查的報紙上公布。從那時起，我便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政治流亡者。後來，1845 年 1 月，由於當時的普魯士政府的堅決要求，我被驅逐出法國，移居比利時。但是普魯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時內閣驅逐我，這時我無可奈何，只得請求退出普魯士國籍。為了免受諸如此類的迫害，我不得不採取這種非常措施。我申請僑居國外僅僅是從自衛的角度考慮，對這一點最好的證明就是：我沒有加入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

<sup>①</sup> 見本卷第 432 頁。——編者注

国籍，虽然在二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的委員們曾建議我加入法国国籍。

三月革命后我回到祖国，4月間我即在科倫申請公民权，当时地方市政局毫无阻难地給了我公民权。根据1842年12月31日法案的規定，事情須經王国区行政机关批准。现在我接到这里的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的公函，內容如下：

No: 2678

“馬克思博士閣下：

茲通知閣下，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您过去的情况，認為对您不能行使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5条所規定的批准外国人加入普魯士国籍的权利。因此，您今后仍然应当算作外国人(上述法案第15、16条)。

警察厅长盖格尔(签名)

1848年8月3日于科倫”

我認為王国区行政机关的这一決議是非法的，原因如下：

根据今年3月30日联邦議会的決議，凡回到德国并要求重新加入德国国籍的政治流亡者，也享有国民議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預备国会的決議，甚至已經成为**外国公民**的政治流亡者，只要他們願意重新加入德国国籍，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这一決議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是它是在革命之后馬上向德国人民許下的諾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講，它是有重大意义的。

無論如何，联邦議会的決議和康普豪森內閣依据該決議制定的选举制度在普魯士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我想重新加入德国国籍的願望在我申請科倫居住权时已經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已取得德国国民議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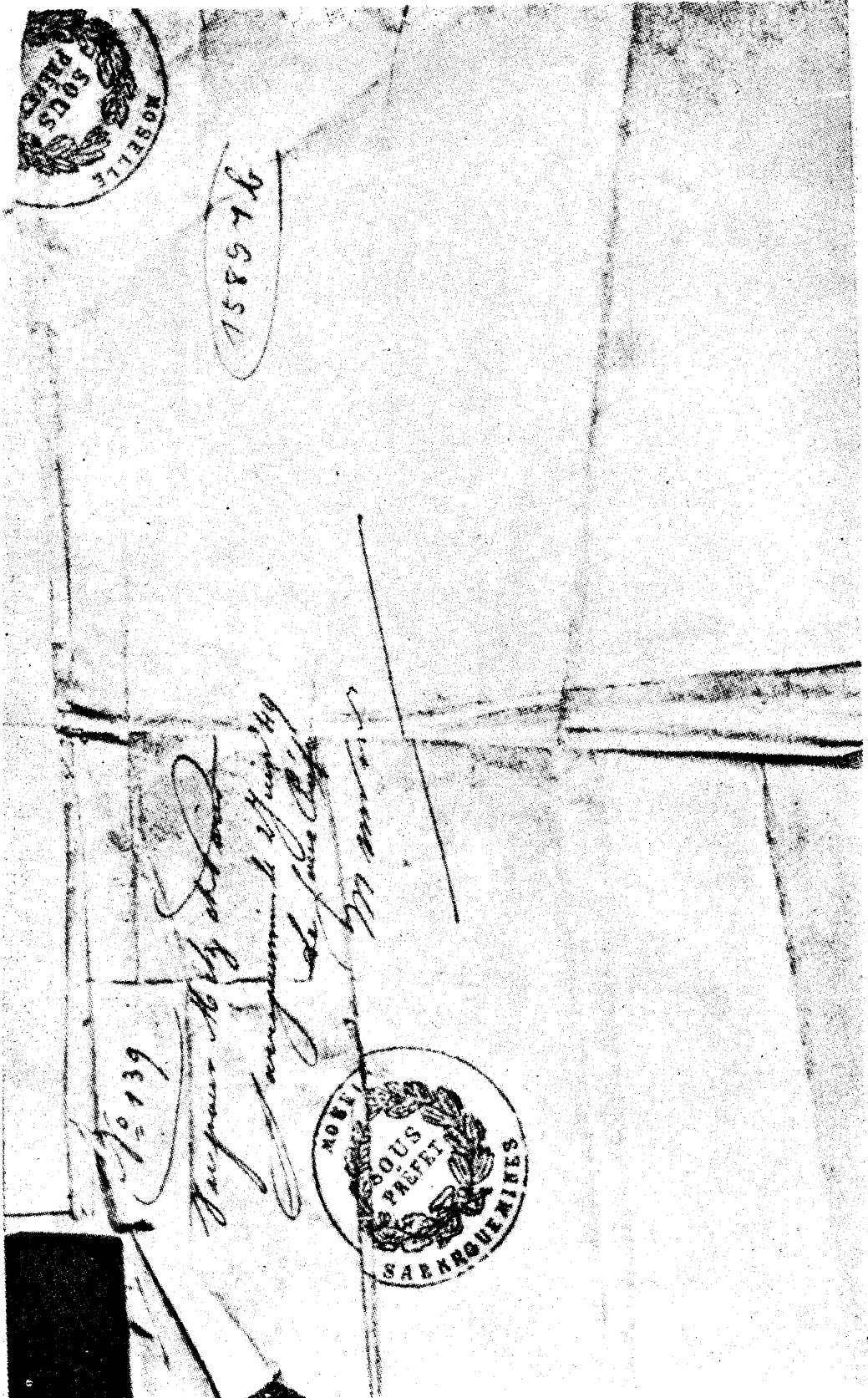




卡·馬克思的 1848—1849 年的护照

(第二頁)





卡·馬克思的 1848—1849 年的护照  
(第三頁)



权，就是說至少我享有德国公民权。

假如我享有只有德国人才享有的那种最高权利，那末無論如何也不能拒絕給我普魯士公民权这种有限的权利。

科倫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援引了 1842 年 12 月 31 日的法案。但是，由于上述联邦議会的決議，这一法案也是对我有利的。

根据第 15 条第 1、3 款，普魯士臣民凡本人申請退出或居留国外 10 年者，取消他們的普魯士国籍。在革命后回国的許多政治流亡者，他們都在国外居留过 10 年以上，根据上述法案第 15 条，他們和我一样不再是普魯士公民了。然而其中有的人，如象雅·費奈迭甚至出席了德国国民議會。所以，普魯士“警察当局”（法案第 5 条）——只要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剝夺这些德国立法者的普魯士公民权！

最后，我認為完全不能容忍的是，这里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或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在給我的通知書中都用了“臣民”的字样，而上届和本届內閣都已从所有的官方文件中取消了这一用語而代之以“国家公民”。不仅如此，他們甚至忽視我的普魯士国籍，把我这样一个德国公民叫做“外国人”。

其次，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我过去的情况”不給予我普魯士国籍，这不会是指我的物質情况，因为依据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的确切含义，只有科倫市政局才能对这一問題作出決議。而科倫市政局的決議对我是有利的。問題只能是指我作为“新萊茵报”总編輯的活动，也就是說，鉴于我的民主主义見解和我对現政府所抱的反对态度。然而，如果这里的区行政机关或柏林的內政部在这种完全符合联邦議會 3 月 30 日的決議的情况下还有权利（我否認这种权利）不給予我普魯士国籍，那末这种心怀叵測的借口只有

在旧日的警察国家里才会被采用！但絕不該在普魯士被采用，因为这里已进行过革命，并且建立了責任政府。

末了，还应当指出：我曾經向警察厅长弥勒先生声明，我不能在目前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把我全家从特利尔搬到科倫去。弥勒先生曾向我保証說，恢复公民权不会遇到任何阻难。

根据上述一切，我請求您，大臣先生，下令本地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批准本市市政局給我的居住权，从而恢复我的普魯士国籍。

謹致敬意。

卡尔·馬克思

1848年8月22日于科倫

載于1848年9月5日  
“新萊茵报”第9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和丹麦的休战

科倫 9 月 7 日。

“如果普魯士不再領導德國，如果普魯士的部隊不再保衛德國的榮譽，如果普魯士這樣一個強國的勢力向幻想的德國中央政權那種虛無縹緲的統治讓步，那末德國將成為什麼樣子呢！”

普魯士黨，“天佑吾王，天佑吾國”的英雄們的黨，東波美拉尼亞和烏刻馬克的反革命的貴族這樣大言不慚地聲明。

普魯士果然領導了德國，普魯士果然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保衛了德國的榮譽。

而結果怎樣呢？對軟弱的敵人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和不光采的勝利，在怯懦無比的外交影響下中途停戰，在潰敗的軍隊面前可恥地撤退，最後實行休戰，這種休戰對德國來說是這樣的奇恥大辱，甚至連普魯士的將軍都不願意在休戰協定上面簽字。

軍事行動和談判重新開始了。帝國的攝政王授予普魯士政府簽訂休戰協定的全權；但是這個全權沒有一個帝國大臣副署，因此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依據這個全權，第一次休戰協定得到承認，但需作以下的修改：（1）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新政府成員必須在簽訂休戰協定以前就“協商好，以便使新政府的成立及其順利的活動有充分的保證”；（2）在簽訂休戰協定以前，臨時政府所公布的一切法律和命令繼續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3）駐紮在什列斯維

希-霍尔施坦的一切部队都要服从德国总司令的命令。

如果把这个指令和第一次普鲁士-丹麦休战协定草案的条件比较一下，那末指令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了。这些条件远不能满足胜利的德国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这些条件虽然在形式上作了很多让步，实质上却拯救了许多东西。

第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方面在新政府里比丹麦占优势。而普鲁士的作法怎样呢？它同意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丹麦党首领卡尔·莫尔特克作新政府的首领，并同意丹麦在政府中拥有 3 票以对付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 2 票。

第二个条件：如果不承认被联邦议会所承认的临时政府本身，那至少也要承认临时政府以前的活动。临时政府的法令必须继续有效。而普鲁士的作法怎样呢？反革命的普鲁士借口丹麦也放弃幻想的法令（这些法令是在哥本哈根为各公国颁布的，在阿尔森<sup>①</sup>岛以外从来没有丝毫法律效力），同意废除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

最后，第三个条件：必须预先承认各公国的统一和承认它们归附德意志；一切驻扎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部队都要服从德国总司令的指挥，这必然会使丹麦人企图暗中把曾在丹麦军队中服过役的什列斯维希人派遣到什列斯维希去的企图完全破产。而普鲁士的作法又怎样呢？普鲁士同意什列斯维希的军队和霍尔施坦的军队脱离，不受德国总司令的支配，并干脆移交给  $\frac{3}{5}$  的成员是丹麦人的新政府去掌握。

此外，普鲁士只有签订为期 3 个月的休战协定（第一次草案第一条）的全权，但它却刚愎自用地签订了 7 个月的休战协定；这就

---

① 丹麦称作：阿尔斯。——编者注

是說，在冬季的几个月期間，正当海軍（这是丹麦人的主要力量）不能封鎖德国和什列斯維希沿岸的时候，正当严寒使德国人能从冰上渡过小海峡，占領芬宁<sup>①</sup>，并把丹麦的領土限制在一个西兰島上的时候，普魯士却給了丹麦人以休战的机会。

总而言之，普魯士在上述三方面都沒有完成所負的全权使命。为什么沒有完成呢？原来这个全权**沒有副署**！难道普魯士駐中央政权机关的使节康普豪森先生在9月2日給黑克舍尔先生“閣下” (!! )的信中沒有直截了当地說，普魯士政府“根据这个全权，認为自己有权簽訂不带任何保留条件的条約”嗎？

不仅如此，帝国的摄政王还派遣国务大臣助理、“自己的”馬克斯·加格恩到柏林去，再由柏林到什列斯維希去監督談判。摄政王授予他的依然是**沒有副署**的全权。加格恩先生（我不知道他在柏林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到公国去。而普魯士的进行談判的全权代表們却在馬尔摩。这一点根本沒有通知加格恩。在卢卑克互換批准書。这时才通知加格恩先生說：批准書已經交換过了，他現在可以安然回家了。負着沒有副署的全权使命的倒霉的加格恩当然只好回到法兰克福去，抱怨自己无可奈何地扮演了那个可怜的角色。

光荣的休战协定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休战协定在最有利于作战的季节捆住了德国人的双手，消灭了革命政府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民主制宪議会，废除了这个政府所頒布的得到联邦議会承認的一切法令，把公国交給由可恨的莫尔特克領導的丹麦的政府（按成員講）去統治，强迫什列斯維希的士兵脱离自己的团队，

---

① 即芬。——編者注

使他們不受德国总司令的支配，并把他們交給〔公国的〕丹麦政府（丹麦政府可以随意解散他們）；这个休战协定迫使德国部队从克尼格紹<sup>①</sup>撤到汉諾威和梅克倫堡，并把劳恩堡轉交給反动的丹麦旧政府去摆布<sup>②</sup>。

不仅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而且全德国（除了旧普魯士各省以外）都因这个可耻的休战协定义憤填膺。而帝国内閣（康普豪森先生曾把休战协定通知过内閣）开始是张皇失措，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协定。那末康普豪森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大概采取了威胁手段，普魯士官方对怯懦的反革命的帝国内閣來說，毕竟还是一种压力。但是后来問題提到了国民議會。必須取得国民議会的同意，不管国民議会的行动多么規矩，而黑克舍尔先生“閣下”在提出这个文件时仍然感到拘窘。他在宣讀文件时打躬作揖和低声下气地要求大家保持安靜和心平气和。然而群情頓然激昂起来。甚至中間派右翼，甚至一部分右派分子和达尔曼先生本人都感到非常气憤。責成委员会在24小时內提出报告。根据該报告做出了立即暂时停止撤退军队的决定。关于休战协定本身的決議还没有通过。

国民議會终于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定，虽然内閣声明，这样的决定如被通过，它就提出辞职。这个决定不是拒絕休战协定，而是破坏休战协定。这个决定不仅会使公国群情激憤，而且还会引起对实行休战协定和新政府的抗拒；它会引起新的糾葛。

但是我們对議會否决休战协定本身这一点抱的希望不大。拉

① 丹麦称作：康格-奥。——編者注

② 这个戏法是这样变的：旧政府被解散；随后由丹麦把这个旧政府中一个成員重新选入新政府，由普魯士选入另一个，再由丹麦和普魯士共同选入第三个。



多維茨先生只要把中間派的 9 票爭取过来，就能获得多数。难道他在決議通过前的几天內做不到这一点嗎？

如果議会决定批准休战协定，那末結果将是这样：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宣告成立共和国和发生內战，中央政权完全服从普魯士，整个欧洲都要鄙視中央政权和議会，同时将会造成許多糾紛，这些糾紛足以使今后任何一个帝国内閣遭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垮台。

如果議会决定废除休战协定，那末結果将是这样：发生欧洲战争，普魯士和德意志分裂，爆发新的革命，普魯士趋于崩潰和德国得到真正的統一。議会不必害怕：至少有  $\frac{2}{3}$  的普魯士人是站在德国一边的。

法兰克福的資产階級代表宁願含羞忍辱，宁願做普魯士的奴隶，也不願意在欧洲进行革命战争，使自己在德国的階級統治遭受新风暴的威胁，难道不是这样嗎？

我們認為事情一定会是这样。資产階級的本性太怯懦了。我們不相信，法兰克福議会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能够挽救已經在波兰遭到侮辱的德国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7 日

載于 1848 年 9 月 8 日

“新萊茵报”第 9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辦事內閣的垮台

科倫 9 月 8 日，晚上 10 點鐘。辦事內閣被推翻。在這以前它曾經不止一次地“搖搖欲墜”，只是由於它厚顏無恥才又支持下來。內閣貪得無厭的奢望苛求，終於使議會明白內閣之所以能夠存在的秘密。

在妥協議會昨天的會議上，討論了施泰因的提案<sup>231</sup>。該提案說：

“內閣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馬上根據 8 月 9 日的決議頒布命令以安定全國，並避免和國民議會分裂。”

內閣聲明：它不作任何讓步，任何妥協。

左派聲明：如果議會否認它 8 月 9 日的決議，他們就退出議會。

在昨天的會議上，當首相發表了空洞無物的演說之後，翁魯議員提出了下列修正案：

“鑒於 8 月 9 日的決議既不是為了探究思想方式，也不是為了壓制良心，只是為了使立憲國家的人民和軍隊之間建立必要的和睦關係，防止反動派的陰謀，預防今後有軍籍的公民和平民之間的衝突，”——

議會聲明：

“如果內閣再遲遲不根據 8 月 9 日的決議向軍隊發布命令，它就會失去全國的信任。”

和**中間派左翼**这个修正案相对立的有**塔姆璠**議員提出的**中間派右翼**的修正案。

后者称：

“国民議會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解释：国民議会在它今年8月9日的決議中所指的，是向軍队的指揮人員发布7月15日財政部和內政部向区督察員发布的那种命令。議會并不是要强迫軍队的軍官陈述他們的政治信仰，也不打算向陸軍大臣頒发这一命令的正文。議會认为为了公民的安全和新的立宪国家制度的发展，有必要頒布一項命令以防止軍官的反动意向与共和意向。”

經過相当長時間的爭論，“高尚的”**施萊根施坦**代表內閣声明同意**塔姆璠**的修正案。而在这之前他还驕傲地提出保証說：內閣不作任何妥协！

又繼續爭論了一些時間，**米爾德**先生甚至警告議會不要变成**革命公会**（**米爾德**先生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接着便举行投票。这时會議厅外面挤滿了人。

記名投票：

**翁魯**的修正案以320票对38票被否决。

**塔姆璠**的修正案以210票对156票被否决。

**施泰因**的提案以219票对152票通过。多数（多67票）反对內閣。

本报駐柏林的一个記者报道：

今天全城沸騰；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国民議會开会的那座大厦；在主席宣讀了市民自卫团的十分忠誠的賀詞之后，**賴辛施佩格**先生建議議會搬到其他城市去开，因为柏林处在威胁之下。

內閣垮台的消息刚刚传出来，聚集着的人們就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当左派的議員出来的时候，人們不断地高呼“万

岁”，一直把他们送到菩提树街。当施泰因議員（今天投票通过的提案是他提的）出現的时候，人們的情緒激昂起来了。有几个人立即把他抬起来，以凱旋的心情把他送到陶本施街旅館門口。成千上万的人随着前进，群众不断地高呼“万岁”通过了歌剧院广场。这里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欢騰热烈的場面。愈为胜利担心，胜利就愈加光輝灿烂。

投票罢免內閣的有：左派，中間派左翼（洛貝尔图斯-貝尔格派）和中間派（翁魯、敦克尔、科施）。在三次投票时主席都支持內閣。在这之后，瓦尔德克-洛貝尔图斯內閣可以指望得到絕对的多数。

因此，过些日子我們将会滿意地看到：强制公債的倡議人办事大臣汉澤曼先生“閣下”将怎样在这里閑游，将怎样重过他那“市民的<sup>①</sup>生活”并細心思考杜沙特尔和品托的言行。

康普豪森的垮台还算很体面。被自己的种种阴謀詭計拖下台的汉澤曼先生的結局却非常可悲！可怜的汉澤曼-品托！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9 月 10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99 号

① 原文《bürgerlich》，意思是：“市民的”，“資產階級的”，“質朴的”。——編者注

## 丹麦和普魯士的休战

科倫 9 月 9 日。由于国民議会的优柔寡断（它不去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决定，設法任命新的大臣，却容許委员会不慌不忙地进行討論，把內閣危机交給上帝去解决），我們現在再来談談和丹麦的休战。这种拙劣地掩盖“我們亲爱的朋友沒有勇气”<sup>232</sup> 这一事实的优柔寡断的态度，使我們有時間来談这个問題。

意大利的战争一直不受民主党的欢迎，而且甚至連維也納的民主主义者也早已对它不感兴趣了。普魯士政府利用伪造的文件和謊話只能使因波茲南的歼灭战而引起的社会上不滿的风暴延长几个星期而已。布拉格的巷战尽管被民族主义的报刊大肆渲染，但是它只能引起人民对失敗者而不是对胜利者的同情。相反地，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人民的欢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当时在意大利、波茲南和布拉格德国人曾反对革命，而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德国人則支持了革命。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战争。因此我們一开始就主张坚决和丹麦作战，但这和举杯歌頌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的热情毫无共同之处。

对德国來說，最悲慘的是，它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乃是历来战争中最滑稽的战争！

现在来談談問題的實質。丹麦人民無論在貿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絕對依賴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政府在整整一年中仿照因街垒战而垮台的普魯士政府的榜样对联合議會进行了各种試驗；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資料，正如获得物質資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

尽管德国从来軟弱无力，但是它能感到滿意的是：斯堪的那維亞的各个民族(包括丹麦在內)毕竟要仰它的鼻息，它和**这些民族**比較起来甚至还算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国家哩。

你們需要証据嗎？你們不妨了解一下自从斯堪的那維亞主义的思想出現以来在各个斯堪的那維亞民族之間所展开的激烈論战。斯堪的那維亞主义的含義是：歌頌残酷、粗暴和海盜式的古諾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閉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閉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語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經常酗酒和疯狂好战〔Berserkerwut<sup>①</sup>〕，而又多愁善感。

斯堪的那維亞主义以及与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有种族关系的理論同时出現在丹麦国王的土地上。它們彼此关联，相依为命，互相斗争，从而保存自己。

斯堪的那維亞主义是丹麦人向瑞典人和挪威人求援的形式。但是发生了在基督教日耳曼民族那里所經常发生的事情：立刻产生了一种爭論，即誰是真正的基督教日耳曼人，誰是地道的斯堪的那維亞人。瑞典人說丹麦人“德意志化了”和退化了，挪威人又說瑞典人和丹麦人才是这样，而冰島人却說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当然，

---

① Berserker 是指斯堪的那維亞傳說中兇猛的武士的形象。——編者注

一个民族越落后，它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越接近古諾曼人，它就越具有“斯堪的那維亚的”性格。

我們手头有一份 1846 年 11 月 18 日克利斯提阿納<sup>①</sup>的“晨报”<sup>233</sup>。在这份可爱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我們可以发现如下几处关于斯堪的那維亚主义的饶有趣味的地方。

这篇文章把整个斯堪的那維亚主义完全說成是丹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想激起运动的一种企图，它这样描繪丹麦人：

“这个活泼愉快的人民与古老、严峻和忧郁的战士的世界有什么共同之处 (med den gamle, alvorlige og vemodfulde Kjæmpeverden) 呢？这个性格柔弱而温和（甚至連一个丹麦作家也这样認為）的民族怎么能認為自己在精神上同坚强而精力充沛的古代人相近呢？这些操着柔和的南方口音的人怎么能以为他們講的是北方話呢？我們这个民族和瑞典民族以及古老的北方居民的主要特征是：感情涵蘊而不外溢，可是这些敏感而誠恳的人却那样容易惊慌、激动和放弃己見，他們的一切举止神情很容易表露出自己的内心感受，虽然如此，这些人却認為他們是按照統一的北方样子制成的，他們在性格上是和其他两个斯堪的那維亚民族相近的！”

“晨报”用丹麦人和德国的联系以及在丹麦推行德国风俗来解释丹麦人的这种退化。虽然德国人

“丧失了自己最神圣的財富，即自己的民族性格；但是，不管德意志的民族性多么軟弱无力和平淡无奇，而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軟弱无力和平淡无奇的民族性，即丹麦的民族性。德国語言在亚尔薩斯、瓦得和斯拉夫的境内虽然受到排斥（!! 当时“德国弟兄們的”功績还没有被宣揚出去）<sup>②</sup>，而在丹麦的境内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因此，据說丹麦人現在必須把自己的民族性和德国人对立起来，而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們才发明了斯堪的那維亚主义；丹麦

① 即奧斯陆。——編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的民族性是无力反抗的，

“因为，如上所述，丹麦民族虽然没有采用德国语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德意志化了。作者本人在一份丹麦报纸上读到过如下的自白：丹麦的民族性在本质上和德意志的民族性没有区别。”

“晨报”就是这样写的。

当然不能否认，丹麦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不幸的丹麦人！

根据法国人据以夺取了弗朗德里亚、洛林和亚尔萨斯以及迟早会侵占比利时的那种权利，德国正在夺取什列斯维希，这种权利就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权利。

只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运动保持纯粹资产阶级的、和平的、合法的和庸俗的宣传性质，那末这个运动就只能激起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的热情。因此，在二月革命前，现在的丹麦国王在登极时曾答应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公国代表和丹麦代表的人数相等，但是公国对此表示反对，这样，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地方性质就令人讨厌地出现了。当时与其说要和德国（难道当时有德国吗？）合并，倒不如说要脱离丹麦而建立一个地方性的小的独立国家。

但是革命突然爆发了，因而使运动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党应当抉择：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决心实行革命。它决心实行革命，而且正确地实行了革命：因为丹麦在革命以前所许下的慷慨诺言到了革命以后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和德国合并在过去是一句空话，而现在则有意义了；德国已经历了革命，而丹麦却照常拙劣地模仿德国的革命。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和由于这个革命而产生的临时政府，最初带有小市民的性質。但是战争很快就迫使它們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政府（它的成員仅仅是一些可敬的老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即韦尔凱尔、加格恩和康普豪森的老伙伴）給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提供了比較民主的法律，这些法律比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邦的法律都要民主。基尔會議是所有德国會議中不仅以普选权为基础，而且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的唯一的一次會議。政府向基尔會議提出的宪法草案是至今用德文起草的所有宪法草案中最民主的草案。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在政治上一直是尾随德意志的，但由于革命战争的結果，它立刻建立了比德意志其余各邦都进步的制度。

我們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革命战争。

誰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呢？欧洲 3 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国、英国和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自始至终进行的只是**虛假的战争**，只要回想一下維登布魯赫的照会<sup>234</sup>、普魯士政府根据英国和俄国的声明下令从日德兰撤退的决心以及两次休战协定就清楚了！普魯士、英国和俄国这 3 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結果——德国的統一。普魯士怕德国統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剝削德国的市場，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广到維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維納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魯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謀反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

目前由于法兰克福的决定而可能引起的战争也許会成为德国反对普魯士、英国和俄国的战争。这将是反对 3 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魯

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 1792—1815 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

讓法兰克福的资产者和容克地主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他们决定反对休战协定，他们就注定要垮台，就象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吉倫特派参加了 8 月 10 日事件并贊成把以前的国王处以死刑从而使自己在 5 月 31 日垮台一模一样。相反地，如果他们同意所提出的休战协定，他们也注定要垮台，因为他们将受普魯士的控制，他们的下场将是如此。何去何从，讓他們自己选择吧。

也許汉澤曼垮台的消息还在投票以前就已传到法兰克福了。这个消息可能对投票的结果起很大的影响，这特别是因为，象大家所知道的，众所期待的瓦尔德克和洛貝尔图斯內閣会承認国民議会的自主权。

过些时候就会見分晓！但是我們再重复一遍：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9 月 10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99 号

## 危机和反革命<sup>235</sup>

### 一

科倫 9 月 11 日。請讀一下下面刊載的本報柏林通訊，看我們過去是否完全准确地預見到了內閣危機的發展。原來的大臣們辭職了；內閣的計劃是想靠解散妥協議會，求助于戒嚴令和大炮來維持下去，看來這個計劃沒有得到權奸的贊同。烏刻馬克的容克地主渴望和人民發生衝突，渴望巴黎的六月事件在柏林的街頭重演。但是，他們永遠不會為漢澤曼內閣而奮鬥，他們是要為普魯士親王內閣而奮鬥。被召來執政的將是象拉多維茨、芬克這樣一些可靠的人，他們和柏林議會格格不入，和柏林議會毫無關係。這些普魯士和威斯特伐里亞貴族中的精華，為了擺樣子而和一些值得尊敬的極右翼資產者聯合起來，和受理乏味的國家貿易事務的貝凱拉特之流聯合起來，這就是人們打算用來給我們造福的普魯士親王內閣。而且，他們散布種種謠言混淆社會視聽，說也許會請瓦爾德克或洛貝爾圖斯來組閣，他們同時卻在進行戰鬥準備，伺機公開進攻。

我們迎接決戰。在法蘭克福和柏林同時發生的危機，以及最近兩個議會所通過的一些決議，促使反革命進行決戰。如果柏林有人胆敢踐踏多數人支持的立憲原則，如果用兩倍的大炮來對付

---

219 票的多数，如果不仅在柏林，而且在法兰克福有人竟敢嘲弄多数，組成两个議會都不能接受的內閣，从而挑起普魯士和德国之間的內战，那末，民主主义者知道他們需要做什么。

## 二

科倫 9 月 12 日。我們昨天发表的关于新的帝國內閣的消息，又从其他方面得到証实，今天白天也許就能得到它最后成立的消息，这时，柏林的內閣危机还在繼續。危机的解决大概只有两条道路：

要么是成立瓦尔德克內閣，承認德国国民議会的威望，承認人民的主权；

要么是成立拉多維茨-芬克內閣，解散柏林議會，消灭革命成果，建立虛伪的立宪政体或者甚至是联合議會。

直截了当地說：柏林所爆发的冲突不是妥协派和各部大臣的冲突，而是第一次以制宪議會的面貌出現的議會和国王的冲突。

一切都取决于有沒有勇气解散議會。

可是国王有权解散議會嗎？

当然，在立宪的国家里，国王有权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解散根据宪法召集的立法議會，并且呼吁人民重新选举。

柏林議會是立宪的立法議會嗎？

不是，它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普魯士国家的宪法”而召集的。它的成立并不是依据宪法，而是依据革命。它的职权决不是受自国王或者对国王負責的各部大臣，而是受自它的选民和它自己。議會是革命的合法体现者，它是独立自主的，康普豪森先生和联合議會以 4 月 8 日选举法的形式为它制定的职权，只不过是一

种善良的願望，其命运还要由議會来决定。

起初議會或多或少地承認了妥協論。但它看出了各部大臣和权奸都在欺騙它。它終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行动，一度以制宪議会的資格出現而不以妥協議會的面貌出現。

作为普魯士的独立自主的議會，它就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独立自主的議會是誰也不能解散的，它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

即使作为仅仅为了妥協而召集的議會，即使按照康普豪森先生本人的理論，它也和国王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締結国家条約，双方享有平等的主权，这就是4月8日的理論，康普豪森-汉澤曼的理論，即是国王本人認可的官方的理論。

既然議會和国王处于平权地位，国王就沒有解散議会的任何权利。

不然，議會(如果它坚决彻底的話)也該有废黜国王的权利。

所以，解散議會就意味着政变。至于人們給政变的答复是什么，1830年7月29日和1848年2月24日的事件就已經表明。

有人說：国王还不是可以訴諸那些选民。然而今天的选民所要选的完全是另一种議會，这种議会对国王会更不客气，这难道还有誰不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解散这届議會后只可能訴諸和4月8日的选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选民，并且除了在屠刀的威逼下进行选举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举。

因此，我們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議會取得胜利，組成了左派內閣，那末和議會并存的王权將被摧毀，国王就只能扮演一个領薪俸的人民仆人的角色。我們又会經歷3月19日，假若瓦尔德克內閣不象过去的其他內閣一样

出卖我們。

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組成了普魯士亲王內閣，那末議會将被解散，結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頒布关于选举資格的法律，也許还会象上面所說的那样，再次招回联合議会的魂灵，——而所有这些都是受到軍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

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取得胜利，将取决于人民的行动，尤其是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行动。民主派应当加以抉择。

我們正在經歷7月25日。現在正在波茨坦策划的敕令敢不敢頒布呢？是不是要驅使人民在一天里就从7月26日跃进到2月24日<sup>236</sup>呢？

当然，并不是善意不足，而是要有勇气，勇气在哪儿呢？

### 三

科倫 9 月 13 日。柏林的危机更加深了一步，和国王的冲突，在昨天还仅仅估計是难免的，現在实际上已經發生了。

本报讀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內閣呈請辞职的答复<sup>237</sup>。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就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他和內閣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議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議会邀請貝凱拉特組閣，众所周知，貝凱拉特是法兰克福极右翼的人物，他絕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奧尔斯瓦特先生副署的。奧尔斯瓦特先生这样就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飾他自己的可耻的退却，同时，他在議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則的后面践踏这一原則，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这一切責任讓奧尔斯瓦特先生都承担起来吧！

大臣們高喊：立宪原則！右派高喊：立宪原則！“科倫日报”也隱隱約約地随声附和：立宪原則！

“立宪原則！”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頂的孟德斯鳩-德洛姆的分权学說，依靠陈詞滥調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 1848 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史上遺留下来的全部机构复灭的危險嗎？！

“立宪原則！”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則的先生們首先应当知道：在这种暫時的制度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



一原則。

“立宪原則!”难道柏林議会的表決、波茨坦和法兰克福的冲突、騷扰混乱、反动派的图謀以及軍閥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們总是不顧一切空話而始終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嗎?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說我們已經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美的君主立宪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現在已經使“立宪原則”瀕于毀灭的那种冲突嗎?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們一开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实行专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軍队中巩固他們的障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議會,它和国王是平权的。一个临时机构里有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正是汉澤曼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机构里的这种分权局面,必然要导致冲突。反革命的权奸、軍閥和官僚都藏身于国王背后。資产階級站在議会的多数方面。內閣想充当調停人。但是它太軟弱,不能坚决維護資产階級和农民的利益,一举而推翻貴族、官僚和軍閥的权势;它也太笨拙,它的財政措施每一次总触犯資产階級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個尚未組織就緒的国家机构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則,而是 *salut public*, 社会安全。內閣要想防止議會和国王之間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在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險的时候也不畏縮。但是,內閣宁願成为波茨坦“所能接受的”內閣。它一直坚决地采取各种社会安全措施 (*mesures du 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

尔先生业已承認普魯士法律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犯，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这又是什么呢？

可是內閣在为了社会安全而对付反革命的时候却縮手縮脚！

正因为內閣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議會才不得不亲自提出社会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們所推崇的国王过于軟弱，議會就不得不亲自干預。它已这样作了，例如，通过了8月9日的決議。不过它还是非常緩和的，只是向大臣們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們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們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要知道8月9日的決議践踏了立宪原則，它是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干預，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妥協議会变成国民公会！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掀起了使小資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鳴般的呼号，說什么将来到处会籠罩着恐怖：断头台、累进稅、沒收財產和紅旗。

柏林議會变成了公会！ 怎样的諷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們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照旧这样做下去，我們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魯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們的20个万第的內战和来自俄国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現在，我們的确只有一幅制宪會議的諷刺画<sup>238</sup>！

但是，呼吁立宪原則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些原則的呢？

8月9日他們使議會相信各部大臣会执行議会的決議，于是

議會就安心地散會了。可是，他們却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絕執行決議的情況通知議會，也根本不準備提出辭職。

各部大臣考慮了整整一個月，最後，在許多質問的威逼下，他們才簡單明了地向議會宣布，他們不打算執行決議。

當議會針對這種聲明命令各部大臣仍然要執行決議時，他們就躲在國王後面，在國王和議會之間製造裂痕，從而激起建立共和國的要求。

然而這些先生們還在談立憲原則呢！

總起來說：

在一個臨時機構裏的兩個平等的權力單位之間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內閣不敢堅決果斷地處理政務；它沒有採取必要的社會安全措施。議會要求內閣盡忠職守只是執行了自己的職責。內閣宣布這樣做是破壞國王的權利，是在它辭職的時候損害國王的聲譽。國王和議會互相對立。“協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衝突。這種衝突也許還要用武力來解決。

誰有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毅力，誰就能取得勝利。

#### 四

科倫 9 月 15 日。內閣危機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並不是由於不受欢迎的貝凱拉特先生的到任和他的徒勞無益的努力，而是由於波茨坦和璫恩的軍事暴動。民主制和貴族制的衝突在自衛軍中間爆發了。士兵們把議會 7 日的決議看成是他們擺脫軍官的專橫暴戾的武器，他們向議會致謝，向它祝賀。

這樣就把反革命手中的屠刀奪下來了。他們現在不敢解散議會了。既然這樣行不通，他們就只好讓步，執行議會的決議，組織瓦爾德克內閣。

波茨坦的士兵暴動，可能使我們在目前暫不發動革命。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9 月 11、12、13 和 15 日

載於 1848 年 9 月 12、13、  
14 和 16 日“新萊茵報”第  
100、101、102 和 104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 柏林的辯論自由

科倫 9 月 16 日。危机一开始，反革命的报刊就不停地断言，说什么柏林議會沒有討論的自由。尤其是“科倫日报”的极为著名的、署名为 G 的記者（他也只是“在沒有委任他的接替者以前暫時”<sup>239</sup> 执行自己的职务），以毫不掩飾的恐惧情緒报道了“8 000—10 000 个俱乐部的小娄罗”在“卡斯塔宁-韦尔德兴”公园里給他們的左翼朋友以“精神”支持的消息。“福斯报”<sup>240</sup>、“施本納报”<sup>241</sup> 等也这样叫嚷，而賴辛施佩格先生甚至公然提議在 7 日把議會由柏林迁到別的地方（莫非是沙洛頓堡？）去。

“柏林閱报室”登載了一篇很长的論文，企图駁斥这种非难。它声明說，大多数人站在左翼方面这件事，虽然和議會过去的搖擺不定的行动不同，却决不能証明他們的行动前后不一致。我們可以証明

“即使从过去一向投票贊成大臣提案的人来看，7 日的投票也不可能同他們过去的行动发生矛盾，从这些議員的观点来看，这次投票甚至和他們过去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来自中間派两翼的議員們“誤解了：他們这样想象，似乎大臣們是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們認為大臣們力图恢复安宁和秩序是代表他們自己的意志，代表大多数議員的意志的，可是他們沒有看到，只是在人民的意志和国王的意志沒有矛盾的时候，而不是在和国王的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大臣們才重視人民的意志。”

“閱报室”就是这样用这些議員的想象和誤解来“解释”这么多

的議員突然改变方向这件惊人的事的。要把这件事說得更无罪，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报纸承認曾发生过威胁的事。可是它認為

“如果外界的影响起了某些作用，那就說明外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內閣虛偽的諾言的影响，抵消了它想把議員弄得莫名其妙的尝试的影响，从而使許多意志薄弱和沒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議員有可能遵循……生活的自然本能。”

“閱报室”之所以这样在公众面前从精神上为搖摆不定的中間派两翼議員辯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篇文章与其說是为公众写的，不如說是为中間派两翼的这些先生們本身写的。对于我們这些有权坦率直言以及只是在某一党派的代表发表革命的演說时才支持他們的人來說，这些原因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对我們講这些話呢？当然，中間派两翼的議員在7日害怕人民群众；他們的害怕是否有根据，这个問題我們暫且不談。

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議會，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議会的立場——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議會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据”的人們，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緒的“辯論自由”的朋友們发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們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的決議。

“辯論自由”！沒有比这更空洞的口号了。从一方面說，“辯論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說，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們手中的現存的国

家权力：軍隊、警察和所謂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轉移的法官。

辯論自由這句話向來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認的一切影响为轉移，而公認的影响——賄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議会的恐惧等——却使討論成为真正“自由的”討論。但是在革命时期，這句話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議員們只能作这样的抉择：

或者他們接受人民的保护，那末，他們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的教訓；

或者他們接受国王的保护，把議會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們作出决定，他們也不能反对。

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付武装的軍閥的威胁，讓議會来选择吧。

法国制宪議會已由凡尔賽迁到巴黎。說句老实话，假如妥协議會由柏林迁到沙洛頓堡，那倒是符合德国革命的整个性質的。

写于 1848 年 9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9 月 17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105 号

## 休战协定的批准

科倫 9 月 19 日。德国国民議會批准了休战协定。我們沒有弄錯：“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sup>①</sup>。

投票在混乱和黑暗中进行，而且閑人、外交官等都挤进了議員席。仅仅多占两票的多数派迫使議会对两个完全不同的問題同时进行表决。休战协定以 21 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做了牺牲品，“德国的荣誉”遭到了践踏，而且还决定把德国溶化到普魯士里面去。

在任何其他問題上，人民的意見都沒有象現在这样坚定。在任何其他問題上，右派先生們都沒有象現在这样坦白地承認：他們贊成不能辯护的行动。在任何其他問題上，德国的利益都沒有象在这个問題上那样明确无疑。国民議會做出决定：它給自己和由它所建立的所謂中央政权宣判了死刑。如果德国有自己的克倫威尔，那他定会立刻出現并且叫道：“你們不是国会！我以上帝的名义請你們給我滾开！”<sup>242</sup>

据說左派分子似乎打算退出議會。这些可怜的受人愚弄的左派分子，受到了多数派的打击，还要被高尚的加格恩斥責为不守秩序，可惜他們太沒有勇气！少数派从来还没有象这些法兰克福左

<sup>①</sup> 見本卷第 468 頁。——編者注



派分子那样一贯遭受高尚的加格恩及其 250 个多数派英雄们的无礼藐视。可惜左派分子太没有勇气！

德国的一切运动由于缺乏勇气而趋于衰落。反革命势力也象革命的政党一样，不敢采取坚决的打击手段。现在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是站在右派方面还是站在左派方面）都知道，当前的运动一定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引起流血的战斗（不管是为了镇压它还是为了完成它）。两派（不管是反动派还是进步派）都不是勇敢地去迎接这些不可避免的战斗，不是采取一些速战速决的办法把战斗进行到底，而是策划合法的阴谋以尽量长期地拖延战斗。正是这些一贯的卑鄙诡计，这些微小让步和姑息手段，这些谋取妥协的企图造成了这种难以忍受和暧昧不明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政治局面到处都引起无数的零星暴动，要消灭这些暴动只有采取流血手段和限制已经取得的权利的办法。正是由于害怕斗争才引起无数小规模的战斗，使 1848 年成了空前未有的血迹斑斑的一年，使各个斗争的党派的情况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最后的战斗必然特别残酷和具有毁灭性。但是“我们好心肠的朋友们却没有勇气”！

争取德国中央集权和建立民主组织的这场决定性的斗争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竭力加以掩饰和谋求妥协，可是这场斗争却日益迫近。维也纳、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本身就会使这些情况得到解决。如果由于德国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而一切必将毁灭的话，那末法国会来拯救我们。六月胜利的果实目前在巴黎正在成熟：保皇党人无论在国民议会、报刊或俱乐部中都占了卡芬雅克及其“纯粹的共和党人”的上风；正统主义者的南方有普遍暴动的危险；卡芬雅克不得不采取赖德律-洛兰的革命手段，即派特命全权代表到各省去监督；卡芬雅克及其政府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在星期六的議會會議上应付过去。再有一次这样的表决，梯也尔、巴罗及其伙伴们（六月的胜利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取得的）就会获得多数，卡芬雅克将被投到紅色共和国的怀抱中去，而爭取共和国本身生存的斗争将如火如荼。

如果德国再优柔寡断，那末法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将同时成为在德国爆发新的公开斗争的信号，可以預期，这个斗争将把我们稍微向前推进一些，至少能使德国摆脱过去传统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9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9月20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07号

## 法兰克福起义<sup>243</sup>

### 一

科倫 9 月 19 日，晚上 7 点鐘。德国和丹麦的休战引起了狂风暴雨。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的起义。德国的荣誉被国民議會出卖給可耻下台的普魯士內閣，但是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的工人以及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民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种荣誉。

斗争的結局还未見分晓。到昨天晚上为止，士兵們的战績看来并不大。除了策伊尔街以及其他几条街和广场以外，大炮在法兰克福很难使用，而騎兵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从这方面來說，时机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攻占軍械庫而武装起来的哈瑙居民赶去支援。很多郊区村庄的农民也都赶去支援。到昨天晚上为止，士兵大約有一万人，并装备有少量的大炮。夜里前去支援的农民一定非常多，而能够調遣去的士兵則非常少，因为临近郊区的軍隊全都調去了。奥頓瓦尔德、拿騷和庫尔黑森等地的农民的革命情緒非常高涨，从那里繼續調遣軍隊已經不可能；交通綫可能已被切断。只要起义者能坚持住今天这一天，那末整个奥頓瓦尔德、拿騷、庫尔黑森和萊茵黑森就会武装起来，富尔德、科布倫茨、曼海姆和阿沙芬堡之間的全体居民也会武装起来，那时軍隊的力量就不足以鎮压起义了。而誰能担保美因茲、曼海姆、瑪尔堡、加塞尔、維斯巴

登平安无事呢？在这些城市里，由于所谓的“帝国军队”的残酷暴行，人们对暴兵恨入骨髓。谁能担保莱茵河畔的农民不会行动起来呢？他们能够很容易地阻止从水路调动军队。

虽然如此，但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些勇敢的起义者的胜利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太小，而过分强大的军队和法兰克福市僧们对反革命的那种人所共知的同情占的优势太大了，以致我们不能抱过高的希望。

但是，即使起义者被打败，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革命会变得愈益蛮横无耻，它会宣布戒严，取消出版自由，封闭俱乐部和禁止人民集会，从而会使我们处于奴隶地位，但这是不会长久的。高卢雄鸡的叫声会宣布解放的时刻，会宣布报仇的时刻。

## 二

科倫 9 月 20 日。法蘭克福的消息開始漸漸証實我們昨天的忧虑。看來下面的消息是可靠的：起義者已被從法蘭克福擊退，只是在薩克森豪森他們仍在堅持，他們在那里大概構築有強大的防禦工事。法蘭克福宣布戒嚴；凡是手拿武器的人或者反抗“帝國政權”的人，都要交給軍事法庭審判。

因此，目前聖保羅教堂的先生們的處境，就象他們的巴黎同伙一樣。在充分安靜和戒嚴狀態中，他們能把德國人民的基本權利減少到“最低限度”。

通往美因茲的鐵路有許多地方被切斷了，所以郵件來得很晚，或者完全停郵了。

看來，炮兵決定了較寬闊的街道上的戰局，並為軍隊迂迴到街壘戰士背後去打開了一條道路。法蘭克福的市僧們殷勤熱心地向士兵們打開自己的家門，從而給他們創造了進行巷戰的一切有利條件，同時用鐵路迅速運來的軍隊的力量超過了緩慢地步行前去支援的農民，這一切決定了以後的戰局。

但是，即使在法蘭克福的鬥爭已經停止，這也並不意味着起義已被鎮壓下去了。怒不可遏的農民決不會輕易放下武器。即使他們不能驅散國民議會，他們也可以清除自己家鄉的許多需要清除的東西。農民在猛攻聖保羅教堂未遂後，會轉而襲擊 6—8 座小官邸和成百塊貴族的領地；從今年春天開始的農民戰爭，在沒有達

到自己的目的(使农民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前,是不会结束的。

为什么“秩序”在欧洲各地能经常取得这种胜利,但是从那不勒斯、布拉格、巴黎到米兰、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革命党派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失败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知道,目前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和过去一切革命根本不同,而且它的意义也远比过去一切革命重大。因为不管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不管是在柏林还是在法兰克福,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米兰,进行这种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了实行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的最近结果甚至会使所有殷实的和投机的资产者都心惊胆寒。

近5个月来究竟在世界上哪一个革命中心没有在街垒上飘扬起红旗——被兄弟般的情谊联合在一起的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标志?

在法兰克福,反对容克地主和资产者的联合议会的斗争也是在红旗下面进行的。

正因为当前爆发的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间接地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所以都遭到了失败。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

在法国，这种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中。

因此，我們不应当因为霰弹在最近4个月中到处战胜了街垒而灰心失望。相反地，我們的敌人的每一个胜利，同时也就是他們的失敗。胜利使得他們分裂，胜利所巩固的不是胜利了的、从2月和3月起就变得保守的那个党派的統治，而是在2月和3月中被推翻的那个党派的統治。巴黎的六月胜利只是在最初建立了小資產階級的、純粹的共和党人的統治。不到3个月功夫，大資產階級、立宪派就威胁要推翻卡芬雅克，威胁要把“純粹的共和党人”投入“紅色共和党人”的怀抱里去。在法兰克福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胜利将不是有利于中間派两翼的那些正直的人，而是有利于右派；資產階級一定会战胜那些代表軍閥、官僚和容克地主的国家的先生們，可是不久以后它就会尝到自己这种胜利的苦果的滋味。

随你的便吧！我們那时将等待巴黎吹起欧洲解放的号角。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

9月19—20日

載于1848年9月20和21日

“新萊茵报”第107号的附頁

和第10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反革命內閣

科倫 9 月 22 日。总之，大局已定！普魯士亲王內閣已經組成，反革命想冒险来一次最后的坚决的打击。

請看一个議員写的一段話：

“柏林 9 月 20 日，晚上 10 点鐘。我們剛才得到的可靠消息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內閣已經組成（下面是各部大臣的名单，我們昨天曾从“閱报室”的号外上轉載过）<sup>①</sup>。在明天的会上这个內閣将宣讀国王要解散議會的手諭。而国民議會将宣布自己的这次會議是永久的，这样就可能引起新的流血的革命。国民議會中的各党各派都在它們平常聚会的地方接連不断地开会。人民的情緒非常激昂。弗兰格尔今天檢閱了軍隊。双方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总之，大局已定！国王要求烏刻馬克貴族保护，烏刻馬克貴族就傾全力反抗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东波美拉尼亚的唐·吉訶德們、昔日的武士、負債累累的地主，最后都有可能用煽动者<sup>244</sup>的鮮血来洗滌自己生鏽的宝剑。在什列斯維希获得了廉价荣誉的自卫軍必然会給革命以坚决的打击；因为革命侵犯国王的权利，它想禁止軍官制造陰謀，想用汉澤曼財政措施的无情手段来完成极其“勇敢的行动”——鑽入本来就变空了的勃兰登堡容克地主的錢袋里去。自卫軍要洗雪 3 月 18 日的耻辱，它要解散柏林議會，而軍官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作者的。——譯者注



---

先生們將跨過革命者的屍體沿着菩提樹街前進。

好吧！前進，願天佑吾王、天佑吾國！

寫於 1848 年 9 月 22 日

載於 1848 年 9 月 23 日

“新萊茵報”第 110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科倫的戒嚴<sup>245</sup>

科倫 9 月 26 日。今天我們又出版了一號沒有標題的報紙，這是因為我們急于出報的緣故。我們從可靠的消息得知：在幾點鐘內，城市就要宣布戒嚴，市民自衛團將被解散和解除武裝，“新萊茵報”、“新科倫報”<sup>246</sup>、“工人報”<sup>247</sup>和“萊茵守護者”<sup>248</sup>將被禁止出版，同時將要建立軍事法庭並取消在 3 月里爭得的一切權利。風聞：市民自衛團將不容許解除它的武裝。

寫于 1848 年 9 月 26 日

載于 1848 年 9 月 27 日  
“新萊茵報”第 113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新萊茵報”復刊

大家為維持“新萊茵報”的存在而給予的援助（特別是在科倫），使我們得以克服戒嚴狀態所造成的財政困難，使報紙得以復刊。編輯委員會原有成員不變。不久前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參加了編委會。

“新萊茵報”總編輯 卡尔·馬克思

寫于 1848 年 10 月 11 日

載于 1848 年 10 月 12 日

“新萊茵報”第 114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維也納革命

科倫 10 月 11 日。“新萊茵報”第一号(6 月 1 日)曾报道过維也納革命(5 月 25 日)的消息。今天,本报复刊(曾因科倫戒严而停刊)的第一天,我們刊登了极其重要的 10 月 6 日和 7 日維也納革命的消息。由于要詳細地报道維也納事件,我們今天无法刊登任何評論性的文章。因此我們只能对維也納革命講几句话。本报讀者从維也納記者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由于資產階級不信任工人階級,这次革命已面临着危險:它即使不遭到失敗,至少也会陷于癱瘓。但是,不管怎样,維也納革命对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影响,打乱了反革命进攻的全盘計劃。如果維也納的資產階級不想向胜利者投降,皇帝和捷克議員逃离維也納一事<sup>249</sup>就会迫使維也納資產階級繼續战斗。維也納事件将討厌地打破法兰克福議会的幻想,这个議會現在正忙着准备賜給我們德国人

一所全国的大監獄和一条公共的鞭子<sup>250</sup>,

而柏林內閣却不大相信戒严这种万应灵藥。戒严和革命一样作了一次环球旅行。最近刚作了一次大規模进行这种实验的嘗試,把这个实验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匈牙利。但这个嘗試并没有使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反而使維也納发生了革命。經過这次打击,戒严已无法恢复旧观。它的名声已彻底敗坏了。和耶拉契奇同时,西方的戒严英雄卡芬雅克,成了他在 6 月里曾用霰弹拯救过的所有党

派的攻击目标,这是命运的嘲笑。他只有坚决地轉到革命方面去,才能繼續維持一些时候。

除了維也納的这些最近的消息,我們还刊登了10月5日的一些通訊,因为它們反应了維也納对匈牙利命运的期望和忧虑。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  
10月11日  
載于1848年10月12日  
“新萊茵报”第11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科倫革命”

科倫 10 月 12 日。“科倫日報”說得對，9 月 25 日的“科倫革命”是狂歡節的滑稽戲。“科倫警備司令部”在 9 月 26 日扮演了卡芬雅克的角色，於是“科倫日報”對“科倫警備司令部”的英明與溫和就大加稱贊。但是，究竟誰看來更可笑呢？是在 9 月 25 日構築街壘的工人呢，還是在 9 月 26 日鄭重其事地宣布戒嚴、停止報紙出版、解除市民自衛團的武裝、查封各個社團的卡芬雅克？

可憐的“科倫日報”！“科倫革命”的卡芬雅克絲毫也不可能比“科倫革命”本身偉大。可憐的“科倫日報”！它把“革命”看作開玩笑，而對這次可笑的革命的“卡芬雅克”却很嚴肅。真是一個矛盾百出而令人煩惱的難題！

關於警備司令部的權限我們不來多費唇舌，因為德斯泰爾對這個問題已經作了詳盡的說明<sup>251</sup>。況且我們是把警備司令部看作馴服的工具的。這個奇怪的悲劇的真正作者是“心地善良的公民”杜蒙及其伙伴。無怪乎杜蒙先生命令通過自己的報紙來散布反對德斯泰爾、博爾夏特和吉爾的呈文<sup>252</sup>。這些“心地善良的人”應該保護的不是警備司令部的行動，而是他們自己的行動。

科倫事件的消息已經以科倫“辯論日報”所賦予它的形式傳遍了德國報刊的撒哈拉大沙漠。因此，我們就更有理由來回頭談一談這個事件。

当局打算逮捕工人联合会<sup>253</sup>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莫尔。沙佩尔和貝克尔已被逮捕。当局选择了星期一来实行这些措施，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大多数工人休息的日子。可见，当局预先就知道这些逮捕会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怒甚至会造成武力抵抗。这些逮捕恰好都在星期一发生，真是令人奇怪的偶合！愤怒是容易预料到的，因为由于发生了施泰因式的军令问题，以及在弗兰格尔发布了军令<sup>254</sup>、普富尔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时刻都会遭到反革命的坚决的打击，因而也能期待革命的到来，而这个革命的起点一定是柏林。所以工人必然会把逮捕看作政治上的措施，而不看法庭的措施。工人认为检察机关仅仅是反革命的机关。他们觉得有人想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前夕夺去他们的领袖。工人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准逮捕莫尔。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才离开了战场。街垒只是在聚集在旧市场的工人得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的时候才构筑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攻击。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自卫。此外，他们得知，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工人在白等了敌人大半夜之后就解散了。

所以，责难科伦工人胆小怕事是最可笑不过的。

但是为了给戒严寻找理由并把科伦事件说成是小型的六月革命，对工人们又提出了其他的责难。说什么工人们原来的计划是要抢劫光荣的科伦城。这个责难的根据是似乎有一家呢绒店遭到抢劫。但是要知道，每个城市里都有一批盗贼，他们自然会利用社会骚乱的日子来行窃。或者，也许会把抢劫理解为抢劫军械库？那就派遣科伦检察人员到柏林去控告三月革命吧。如果军械库没有被抢劫，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看到汉泽曼先生做银行经理、弥勒先生做国务大臣的幸运了。

关于科倫的工人就談到这里。現在我們來談談所謂民主主义者。“科倫日报”、“德意志报”、奧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公正的”报纸是怎样責难他們的呢？

英勇的勃律盖曼分子、巴塞尔曼分子等等渴望流血，仁慈的民主主义者却似乎由于胆怯而不讓他們流这种血。

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是这样的。民主主义者在“友誼之家”旅館（在旧市場上）、在埃塞尔大厅和在街垒上向工人宣称，他們無論如何不希望发生“叛乱”。当沒有任何重大的問題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敗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內閣敢于发动反革命，那末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法庭的审理会証实我們对事件的叙述。“科倫日报”的先生們与其在“黑夜”中“两手交叉，面带愁容”，站在街垒前“考虑本国人民的将来”<sup>255</sup>，不如站在街垒的高处向被蒙蔽的群众发表英明的演說。post festum〔事后〕的英明有什么意思呢？

由于科倫事件，市民自卫团受到了“好”报刊最严厉的責难。必須分清下面的情况。市民自卫团拒絕把自己貶低到沒有意志的警察奴仆的地位，这是它的責任。但是它自动放下了武器，这也許只能由一种情况來說明。市民自卫团中的自由派知道非自由派会兴高采烈地利用机会抛掉武器。只有一部分人抵抗是无济于事的。

“科倫革命”的結果只有一个。它昭然若揭地指出由两千余名圣徒組成的行列是存在的，他們的“飽食的美德和有購買力的道德”<sup>256</sup>只有在戒严的条件下才能“自由地存在”。也許有一天会有



机会写出《acta sanctorum》〔“圣徒的事迹”〕，写出这些圣徒的传记来。那时我们的读者就会知道“无论是蠹鱼和铁锈”都不能腐蚀的“宝物”是怎样得来的，就会懂得“善良的品德”的经济背景是怎样取得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2 日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11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普 富 尔 內 閣

科倫 10 月 13 日。我們在康普豪森內閣垮台時曾經這樣寫道：

“康普豪森內閣曾經給反革命穿上他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服裝。現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這付累贅的假面具。一個無生命力的中間派左翼（漢澤曼）的內閣也許可以代替幾天 3 月 30 日的內閣。但是它的真正繼承者却是普魯士親王內閣。”（6 月 23 日“新萊茵報”第 23 號）<sup>①</sup>

果然，普富尔（紐沙特爾）內閣接替了漢澤曼內閣。

普富尔內閣醉心於憲法的詞句，正如法蘭克福中央政權醉心於“德國的統一”一樣。如果把這個內閣的 *corpus delicti* [罪行]，把它的實質同它在柏林議會上發出的聲音，即它的立憲聲明、安定人心的保證以及各種折衷妥協的論調對照一下，那末可以說只有福斯泰夫的這句話才適用於它：

“我們上年紀的人多麼容易犯這種說謊的罪惡！”<sup>257</sup>

代替普富尔內閣的只能是革命的內閣。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10 月 13 日

載於 1848 年 10 月 14 日

“新萊茵報”第 116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sup>①</sup> 見本卷第 112 頁。——編者注

## 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証券的 全国抵押銀行的演說

梯也尔先生在“立宪主义者报”上陸續发表他的著作“财产論”<sup>258</sup>。我們准备在这个典型的庸俗著作全文載完后再来詳細地論述它。可是梯也尔先生突然中断发表。所以我們暫且指出：梯也尔先生的这一著作使得比利时的“重要”报纸“观察家”和“独立报”<sup>259</sup>欢欣鼓舞。今天我們簡略地来討論一下梯也尔于10月10日在法国国民議會会里所发表的关于抵押流通券的演說。用比利时“独立报”的話來說，这篇演說給了紙币以“致命的打击”。而且正如“独立报”所說的那樣，梯也尔先生不管在論述政治、財政或社会等問題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演說家。

我們之所以对这篇演說感到兴趣，仅仅是因为它表明了旧秩序的騎士的策略，即旧秩序的騎士振振有詞地用来和新秩序的唐·吉訶德相对抗的策略。

如果你們象图尔克先生（梯也尔已回答了他的要求）那样，要求对工业和貿易关系实行局部的改革，这些人就会借口整个系統中各部門之間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协作而不宜更动来反对你們。如果你們要求对整个系統实行改革，那末你們就会被指責为破坏分子、革命家、沒有良心的人、空想家和忽略局部的改革。由此得出結論：一切照旧。

拿图尔克先生來說，他想通过国家抵押銀行使农民易于出售土地。他想不經過高利貸者的手来使农民的土地投入流通。問題在于：在法国，象在小块土地占优势的所有国家中一样，封建主的統治变成了資本家的統治，农民的封建义务变成了資產階級的抵押債務。

梯也尔先生首先是怎样回答的呢？

如果你們想通过建立国家信貸机关的办法来帮助农民，你們就会損害小商人。你們帮助这一个人，就不能不損害另一个人。

既然这样，我們是否应当改革一下整个信用制度？

絕對不能！这是空想。图尔克先生的建議就这样吹了。

梯也尔先生那样热心关怀的小商人原来是巨大的法国銀行。

讓总額达 20 亿的抵押流通券来进行竞争，会損害这个銀行的垄断权和股息，也許 something more [更有过之]。因此在梯也尔先生的这个論証里面隐藏着路特希尔德。

现在再来談談梯也尔先生的另外一个論据。梯也尔先生說，关于抵押的建議实际上和农业本身毫无关系。

梯也尔先生指出，土地不易投入周轉，土地难以銷售，資本迴避土地，这一切都是事物的“本性”。他說，土地只能提供微薄的利潤。但是另一方面，梯也尔先生不能否認，按照現在生产組織的“本性”来看，各个生产部門（包括农业在內）只有当它們的产品和工具能够迅速出售，能成为交換对象，并能投入流通的时候，才能順利地发展。可是土地的情形却相反。因此結論应当是：在現在的文明制度下，农业不能順利发展。所以必須改变現在的制度。图尔克先生的建議就是想实行这种改变的一个微小而不彻底的步驟。梯也尔大声疾呼：絕對不能！“本性”，即現在的社会关系注定

要使农业处于目前的状态。現在的社会关系就是“本性”，也就是說，它們是不可改变的。关于这些关系不可改变的說法当然是反駁一切要改变这些关系的建議的有力論据。如果說“君主制度”是本性的話，那末任何建立共和制度的企图都是违反本性的叛变。按照梯也尔先生的說法，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不管国家給土地所有者貸款的利率是3%，还是高利貸者給他們貸款的利率是10%，土地按照自己的本性总是提供同样微薄利潤。总而言之，这就是“本性”。

然而，梯也尔先生在这里不仅把工业利潤和农业地租混为一談，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和現在的社会关系，即和他称做“本性”的东西相矛盾的說法。

工业利潤一般說来在不断下降，可是地租，即土地的价值却在不断增高。因此梯也尔先生應該解释一下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农民却反而日益貧困。梯也尔先生当然是不会討論这个問題的。

此外，梯也尔先生关于法英两国农业之間的区别的肤淺論断真是使人感到驚訝。

梯也尔开导我們說，一切区别都归結为土地稅。我們交納很重的土地稅，可是英国人却根本不用交納。后一种說法的謬誤姑且不談，梯也尔先生无疑知道，在英国，貧民救济稅和其他許多在法国所沒有的捐稅都是由农业負擔的。英国拥护小农經濟的人从反面利用了梯也尔先生的論据。他們說：你們是否知道英国的谷物比法国貴的原因？因为我們要交納地租，而且是高額地租，法国人却不用交納这种地租，因为他們通常不是租佃者，而是小私有者。因此，小私有制万岁！

只有象梯也尔那样庸俗无耻，才会把土地这种劳动工具目前在英国集中的现象（由于这种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英国的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互相配合），把这些广泛发展的关系归结为英国人不交纳土地税这种无稽之谈。

梯也尔先生认为法国目前的抵押制度对农业不起作用，这种说法我们用法国一位卓越的农业化学家的话来反驳。东巴尔认真地证明说，如果法国目前的抵押制度继续按照“本性”发展下去的话，法国的农业将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sup>260</sup>。

硬说土地关系对农业无关紧要，换言之，即社会关系（生产必须在社会关系下进行）对生产无关紧要，这是多么无耻和愚蠢！

梯也尔先生既然赞成给大资本家贷款，势必就要反对给小资本家任何贷款，这是用不着进一步证明的。贷款给大资本家同时也是剥夺对小资本家的贷款。当然，我们否认在现在的制度下可以通过某种财政把戏来帮助小土地占有者。但是梯也尔却偏要这样说，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我们对梯也尔演说的这一部分还要指出一点。梯也尔反对土地流通，另一方面却推崇英国的关系，可是他忘记了英国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具有这样一种优越性：它是采取工厂方式经营的，而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也象任何其他交易所证券一样，都是活动的和流通的证券。采取工厂方式（按照大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必然会使土地流通起来，使它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

梯也尔先生演说的第二部分是攻击一般的纸币。他把发行纸币叫做发行贗造货币。梯也尔先生向我们说明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即向市场抛出大量流通手段——货币，就会使这些货币贬值，从而欺骗双方面：既欺骗私人又欺骗国家。他说这特别和抵押银

行有关。

所有这些发现在最蹩脚的政治經濟学問答中都可以找到。

应当把下面两件事情区别开来。显而易见，我們随意增加紙币或金屬货币的数量并不等于增加生产，即增加真正的財富。这正象在玩牌时把筹碼的数目增加一倍并不等于把贏牌的数目增加一倍一样。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很明显，如果由于缺乏筹碼，即缺乏交換手段和货币而妨害生产的发展，那末交換手段的任何增加和获得交換手段的困难的任何减少，都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增加。期票和銀行等都是生产需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講，抵押銀行也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

但是梯也尔先生决不是为了維護金屬货币而反对紙币。他自己就曾在交易所里投机倒把，成了陈腐的重商主义偏見的俘虏。实际上他反对的是由社会通过国家来代替垄断組織控制信貸。图尔克提出关于全国抵押銀行(抵押銀行的証券具有强制性的比价)的建議正是为維護社会公共利益而控制信貸的第一步，不管这个建議就其本身來說是多么微不足道。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10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10月14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16号

## “法兰克福总邮报” 和維也納革命

科倫 10 月 18 日。

“德国在遭受奇怪命运的摆布。正当复兴共同的祖国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人们为此用感激的目光仰望着蒼天的时候，迄今籠罩在欧洲上空的阴霾又忽然大作，雷电交加，使得献身于草拟德国宪法事业的人双手直打哆嗦。我們現在又遭到不久前才在維也納遭到过的那种雷电的袭击。”

帝国摄政当局的“总汇通报”——“法兰克福总邮报”这样抱怨說。这家值得尊敬的报纸（它的最后一个編輯<sup>①</sup>在基佐所豢养的走卒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刹那间 *au sérieux* [認真地] 采取了自己的立場。在它看来，中央政权及其議会的框架——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真正是庄严的政权。德意志 38 个邦不是直接向臣民发布自己的反革命命令，而是迫使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命令臣民来执行它們的决定。就象在美因茲审讯委员会 [Immediat-Kommission]<sup>261</sup> 时期一样，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順利。中央政权可能想象它真正是政权，而它的“总汇通报”可能想象它真正是“总汇通报”。它唱道：“大家举起双手来祈祷，感謝上帝。”

然而，我們正在“遭受”来自維也納的雷电的袭击。虽然有头

---

① 倍尔利。——編者注



戴尖頂鋼盔（這些尖頂鋼盔就象是防止革命的無數避雷針）的軍隊，雖然有懲辦批評黑紅黃色人物及其 gesta [事業] 的人的法令<sup>262</sup>（違者給以刑事處分），雖然有施梅林、默爾和加格恩這些巨人的堅決果斷的詞句，我們的萊喀古士們<sup>①</sup>的“雙手”却在“哆嗦”。革命的怪物又發出了吼聲，而法蘭克福又在“哆嗦”。“法蘭克福總郵報”慌張失措，不得不停止自己感謝上帝的祈禱。它悲痛地怨恨無情的命運。

在巴黎，操縱一切的是梯也爾派，在柏林，是普富爾內閣以及各省的弗蘭格爾，在法蘭克福，是中央憲兵隊；全德國在不同程度上都處於戒嚴狀態；在意大利，由仁慈的斐迪南和拉德茨基奠定了和平；在維也納，在匈牙利指揮過軍隊的耶拉契奇在消滅了馬扎爾人<sup>②</sup>之後和文迪施格雷茨一起宣布了“克羅地亞人的自由和秩序”；在布加勒斯特，革命淹沒在血泊中；多瑙河流域諸公國得天獨厚地受到了俄國制度的恩施；在英國，憲章派的所有領袖都被逮捕或流放；愛爾蘭被飢餓折磨得有氣無力。難道這些您還嫌少嗎？<sup>263</sup>

維也納革命還沒有取得勝利。但是，革命的第一道閃光已經足以向歐洲照明反革命的全部障地，從而使得一場总的生死決戰成為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還沒有被消滅，但是它已成了笑柄。它的一切英雄都同耶拉契奇英雄一起變成了滑稽人物，而傅阿德-埃芬蒂在血洗布加勒斯特後發表的文告<sup>264</sup>是對“憲法規定的自由和秩序”的朋友

① 萊喀古士——傳說中的古代斯巴達的立法者。據說決定了斯巴達人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法律是由他起草的。——譯者注

② 匈牙利人自稱馬扎爾人。——譯者注

---

們的一切文告（从帝国国会的文告直到抱怨派的一切无足輕重的宣言）的辛辣諷刺。

明天我們再詳細地論述直接在維也納形成的局勢和奧地利的一般情况。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10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10月19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20号

## 普魯士国王答国民議會代表团

科倫 10 月 18 日。国王总是始終如一的。陛下是从来不会自相矛盾的。他在科倫教堂奠基周年紀念会上向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代表团說：

“諸位先生！我很了解你們議會的意义，我也知道你們的議會多么重要！……”——陛下的声調这时变得非常严肃而刺耳：“但是，請不要忘記德国还有許多君主……”——这时他把手放在胸前特別着重地說：“……而且不要忘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柏林議會代表团 10 月 15 日在貝尔維宮进謁陛下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国王說：

“我們正打算建筑一座万世长存的大厦。但是，諸位先生，我請你們注意，我們还有一种頗令人羡慕的、世袭的天賦权力。”——国王以特別着重的口吻說这些話，——“这是一种具有充分威力的权力。它是这座大厦賴以建筑的唯一基础，如果我們要使这座大厦象我所說的那樣万世长存的話。”

国王是始終如一的。遺憾的是，三月事件把这张倒霉的紙片<sup>①</sup>置于陛下和人民之間，不然的話国王就会永远是始終如一的了。

看来目前陛下又要象三月事件以前那那样相信斯拉夫民族的“鉄蹄”的威力了。維也納人民也許就是把鉄变成粘土的魔术师。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0 月 19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120 号

① 指宪法。——譯者注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 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科倫 10 月 18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复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揮官林普勒尔 10 月 15 日对他的祝賀時說：

“我知道英勇的人民也就是忠实的人民。但是，不要忘記你們是从我这里得到武器的，我責成你們維持秩序、法律和自由。”

如果說立宪的国王是无責任的，他們也就是不負責任的，这自然是符合立宪精神的。他們的言行举止不是代表他們自己，而是代表各个負責任的大臣。

例如汉澤曼辞职时就通过国王发表声明說，发布施泰因式的軍令是和君主立宪政体抵触的。普富尔发布了这个命令，正是符合議會精神的。汉澤曼名声扫地，是符合立宪精神的。而国王因为什么也沒有說，所以从来也不自相矛盾，这又是符合立宪精神的。

由此可見，上面所說的国王的声明不是別的，而是內閣的声明，这个声明本身就應該遭到批判。

普富尔真的認為国王是自願建立市民自卫团的嗎？要是这样，普富尔就会断言国王是三月革命的倡導者，可是即使按立宪的精神來說，这也是胡說八道。

但是問題还不在这里。

上帝創造了宇宙和天賦的國王，把比較細小的事情交給了世人。甚至連“武器”和陸軍中尉的軍服也是用人間的方法製造的。可是人間的生產不同于天上的事情，決不能無中生有。人間的生產需要原料、勞動工具和工資，所有這些總起來說就是生產費用。這些生產費用國家靠捐稅來抵償，而稅收的來源是國民的勞動。因此，從經濟上說，一個國王究竟能夠給予人民什麼，這仍然是一個謎。首先人民應當製造武器，交給國王，然後才有可能從國王那裡取得武器。國王永遠只能把人民給予他的東西給予人民。從經濟上說情況就是這樣。但是，恰恰在人們開始識破這個經濟秘密的時候，立憲的國王就出現了。因此捐稅問題始終是推翻天賦的國王的第一個原因。普魯士的情況也是這樣。甚至無形的商品，即國王在人民的壓力下給予人民的特權，也是人民以前給予國王的，可是人民在取回這些特權時總是要付出現實的東西——鮮血和金錢。回顧一下11世紀以來的英國歷史，就可以十分準確地計算出，憲法上的每一個特權是犧牲了多少頭顱和花費了多少英鎊才取得的。看來普富爾先生要我們回到戴韋南特經濟表<sup>265</sup>流行的時代。這個表上關於英國的生產是這樣說的：

1. 生產者：國王、軍官、勳爵、鄉村牧師等。
2. 非生產者：水手、農民、織工、紡紗工等。

根據這個表，第一類人生產，第二類人領受。因此普富爾先生也斷定說國王給予了什麼。

普富爾的聲明表明了柏林期待於“克羅地亞的秩序和自由的”英雄<sup>①</sup>的是什麼。

---

① 指耶拉契奇。——編者注

---

柏林最近的事件使人想起了8月23日在維也納發生的市民自衛團和人民的沖突（也是由權奸挑起的）。緊接着8月23日的就是10月5日。

卡·馬克思寫于1848年10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10月20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121號

## “改革报”論六月起义

巴黎。除了英国的“北极星报”以外，“新莱茵报”是欧洲唯一有勇气有洞察力的报纸，它在6月29日对六月革命<sup>①</sup>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它的言论并没有遭到反驳，却遭到了告密。

事实后来证实了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一点就连最近视的人也无法否认，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利令智昏。

那时法国的新闻界蒙受了奇耻大辱。巴黎几家比较坚决的报纸被查封了。卡芬雅克准许继续存在的唯一激进派报纸——“改革报”，在为崇高的六月战士辩护时也是吞吞吐吐，它象乞丐求食一样央求胜利者给予战败者以人道待遇。自然，人们是不会理睬央求者的。只是在六月胜利的结果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不受戒严限制的各省报纸进行了几个月尖锐的批评，以及梯也尔派公然复活以后，“改革报”才领会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当极左派提出大赦草案的时候，该报在10月18日写道：

“人民在离开街垒时并没有惩办任何人。人民！那时他们是主人，是元首，是胜利者；人们吻他们的手，吻他们的脚，向他们的工作服致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的高尚情操。说句公道话，人民是宽宏大量的。

现在，他们的孩子和弟兄却在坐监牢，被流放，在军事法庭受审。人民已经饿得忍无可忍，3个月来望眼欲穿地等待共和国的救济，最后又落了一场

<sup>①</sup> 見本卷第153—157頁。——編者注

空；他們看到自己选出来的人是一群爭名夺利的野心家，这些人飞揚拔扈，出入宮庭而无視人民的疾苦。只是在这个时候，他們不忍看着讓自己挨餓的孩子和衰老的父亲死去，才不顧一切地投入了战斗。

他們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們的兒子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留下来的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給軍事法庭懲办，另一部分不經過审讯、不給予辯护的权利、不經過判決就被流放了！其他任何国家，甚至連卡拜尔族的国家也沒有采用过这种手段。

君主国在它存在的20年中从来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利用王朝来投机取巧、沉醉于尸体的臭味、准备随时无礼侮辱死者的报纸（参看6月29日“科倫日报”）<sup>①</sup>发出了各种恶意誣蔑的言論，它們还在审讯之前就污辱了人民的名誉，并且要求把战败者——不論活的和死的——一齐交給特別法庭懲处；它們把战败者交給国民自卫軍和軍隊去折磨，它們成了劊子手的搨客、断头台的奴仆。这些报纸都是疯狂的复仇心的奴隶，它們捏造罪行，加深了我們的痛苦，它們竭尽造謠誣蔑之能事！”（参看7月1日“新萊茵报”評法国“立宪主义者报”、比利时“独立报”和“科倫日报”<sup>②</sup>。）

“‘立宪主义者报’公开地開設謠言公司，出售关于卑鄙暴行的各种荒誕无稽的新聞。这个报纸明明知道它在造謠，但是，它的生意和政治正需要它这样做。它既是商人又是外交家，它就象‘論价’出售其他商品一样在‘零售罪行’。这个如意的投机买卖总会有倒閉的一天。它的言論矛盾百出，在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在流放者的名单中連一个流刑犯的名字也找不到。侮辱和嘲弄失敗者的手段已經用尽。而报纸在清算了自己的利潤后，就默不作声了。”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

10月20日左右

載于1848年10月22日

“新萊茵报”第12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見本卷158—166頁。——編者注



## 英法在意大利的調停

科倫 10 月 21 日。英法在意大利的調停中止了。在每次革命之后，主要在随着每次革命而来的反动势力的进攻之后，外交的髑髏就张牙舞爪。但是，每当新的革命发出了隆隆的雷声，外交就爬进了自己的芳香的墓穴。維也納革命就象摧毀兒童用紙牌搭成的小房一样摧毀了法英的外交。

帕麦斯頓承認自己軟弱无能，巴斯蒂德也是如此。根据这些先生們的自白，維也納革命結束了他們之間的枯燥无味的通信。巴斯蒂德已把这件事正式通知撒丁大使李奇侯爵。

在回答后者提出的“法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会拿起武器来保护撒丁”这个質問时，严肃的共和党人巴斯蒂德（屬於“国民报”）一連行了 3 次屈膝礼，并且唱道：

“信賴我，但不要自暴自弃，  
那时上帝也許会救助你們。”<sup>206</sup>

据說法国坚持不干涉原則，即坚持在基佐当权时代巴斯蒂德和“国民报”的其余的先生們多年来一直反对的那个原則。

如果沒有充滿事件的六月的話，在意大利這個問題上，“正直的”法兰西共和国要算是丢尽了脸，受到了最大的耻辱。

Rien pour la gloire! [不为荣誉化一分錢!] ——商业的朋友們总是反复地这样說。Rien pour la gloire! ——慈善的、温和的、

文雅的、体面的、正直的，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口号也是如此。Rien pour la gloire!

拉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編造的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虛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的幻想。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象从自己的皮囊中放出风来的伊奧拉斯<sup>①</sup>一样，拉馬丁也解开了自己的袋囊，放出了一陣风，輕輕地一吹就把一切空中的幽灵、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漂亮話——一切民族友好团结、法国会使一切民族获得解放、法国为维护一切民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等等輕浮的詞句吹向东方和西方。

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做！

卡芬雅克及其对外工具巴斯蒂德用行动补充了拉馬丁的漂亮話。

这些先生們对于在那不勒斯、墨西拿、米兰及其附近发生的前所未聞的情况采取冷淡的旁觀态度。

他們在国际糾紛中采取旧的、同时永远也是新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和英国，和帕麦斯顿的英国，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英国 entente cordiale [亲密协商]。这就毫无疑义地說明：在“正直的”共和国里居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在君主立宪制时期进行統治的那个阶级，因而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外交政策；在卡芬雅克执政时期实行的仍然是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的政策。

但是，历史不应当忘記这种局势的紧张性、pointe [尖銳性]。“国民报”的編輯巴斯蒂德一定会拚命抓住英国的手，因为 entente cordiale 是可怜的患有恐英病的“国民报”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內

---

① 希腊神話中的风神。——譯者注

用来反对基佐的一张主要王牌。

在“正直的”共和国的墓碑上将会刻上：**巴斯蒂德-帕麦斯顿**。

但是“正直的”共和党人甚至超过了基佐的 *entente cordiale*。法国海軍軍官竟在那不勒斯軍官举行的宴会上飽饗美味，在还冒烟的墨西拿廢墟上为那不勒斯国王——这个愚鈍的老虎斐迪南二世的健康干杯。而拉馬丁的漂亮話在他們的頭頂上空化为烏有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123 号

## “模範的立憲國家”

科倫 10 月 21 日。每當我們考察“模範的立憲國家”——比利時的時候，興趣總是愈來愈濃。

在本報過去的一號中，我們曾經證明：“列奧波特的最大的陪臣”是“赤貧現象”。我們指出了：僅就 18 歲以下的少年男女來說，如果他們中間的犯罪行為按 1845—1847 年那樣的比例自發地增長，那末，“到 1856 年比利時全國人民（包括尚未誕生的小孩在內）都要坐牢了”。同時我們也指出了：隨着赤貧現象和犯罪行為的增長，比利時工業收入的源泉也日益涸竭（“新萊茵報”第 68 號）<sup>①</sup>。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模範國家”的財政狀況：

	法 郎
1848 年的一般預算·····	119 000 000
第一次強制公債·····	12 000 000
第二次強制公債·····	25 000 000
強制比價的銀行券·····	12 000 000
總計·····	168 000 000
此外，還有國家保證的	
強制比價的銀行券·····	40 000 000
總數·····	208 000 000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67—370 頁。——編者注

罗日埃对我们说：比利时象中流砥柱一样地耸立着，世界历史的狂风駭浪在它的周围怒号，但是它却屹立不动。它站在自己的庞大机构的高峰上，稳如磐石。上面指出的2亿零800万法郎就是这些模范机构的奇异力量的最平凡的表现。使立宪的比利时遭到灭亡的将不是革命运动，使它遭到可耻灭亡的将是破产。

象一切自由派的內閣一样，比利时自由派的內閣，即罗日埃的內閣也不外是资本家、銀行家、大资产阶级的內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內閣怎样不顾赤貧现象的增长和工业的衰退，仍然采取巧妙的手段来为大銀行家的利益而剥削全体人民。

前面列举的統計表中所提到的第二次公債的发行之所以能取得議会的同意，主要是由于許下了贖回国債券的諾言。这些国債券是在巴特米·泰奥多尔·竇的天主教內閣执政时期由天主教財政大臣馬魯发行的。这些国債券的发行是用一些金融大王自願借給国家的資金来保証的。这些債券就是我们的罗日埃和他的自由派伙伴們在唠叨不休地批評竇的內閣时死抓住不放的一条小辮子。

自由派的內閣現在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它在“通报”（比利时有自己的“通报”）中宣布发行利率为5%的新国債券。

在贖回馬魯所发行的这种丢尽了脸的国債券的借口下騙去2500万法郎的强制公債以后，又发行国債券，这难道不是无耻嗎？但是这还不够。

国債券的利率是5%。而同样由国家保証的比利时証券的利率則是7—8%。在这种条件下，誰願意認購国債券呢？此外，由于国家的一般状况和发行强制公債的結果，有力量自願貸款給国家的人已經不多了。

发行这种新国債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銀行无法把自由派政府委托它发行的强制比价証券全部投入流通。在銀行的保險箱中还存有几百万这种无用的証券。显然，当这些証券还被紧鎖在保險箱中的时候是不会获得任何利息的。除了把它們交給国家換取利率为 5 % 的国債券以外，难道还能找到使它們流通的更好办法嗎？

这样一来，銀行就可以从这几百万张紙片中获得利率为 5 % 的利息。这些紙片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而它們一般說来所以有交換价值，那仅仅是因为国家賦予它們这种交換价值而已。在最近的預算中，比利时納稅的平民就会发现赤字增加了数十万法郎，他們必須尽自己的义务，完全为了穷銀行的利益来弥补这些赤字。

比利时的金融大王認为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更有利可图，这难道值得惊奇嗎？天主教內閣所宠爱和保护的主要是大地主的最神圣的、物質的利益。自由派的內閣也同样无微不至地維護大地主、金融大王和宮廷奴仆的利益。这些所謂的党派同样貪婪地搜括国民財富（在比利时毋宁說是国民貧困），同时不止一次地彼此攻訐，如果它們在內閣諳練的領導下現在又重归于好，互相擁抱起来，并且組成一个唯一的大党——“国民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123 号

##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 “新萊茵报”

科倫 10 月 28 日。在“新萊茵报”第 116 号橫綫下面<sup>①</sup>，即在报纸的非政治栏中，登載了一篇由“黑克尔”署名的“告德国人民書”。这一“历史性文件”在“新萊茵报”刊登以前，好几家德国报纸早已发表了。其余的德国报纸（萊茵-普魯士的报纸和旧普魯士的报纸也不例外）后来也都发表了这个文件。甚至“科倫日报”也有足够的历史見解来登載司徒卢威的公告，就象登載傅阿德-埃芬蒂的公告一样。

我們不了解，这也許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羨慕共和主义者黑克尔的荣誉？也許是为了讓惊愕的世界知道，德国革命的双重失败是由于共和主义者黑克尔逃往紐約和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留在科倫的緣故嗎？这完全是可能的。我們的后代将把这两个伟人看作是現代运动的种种矛盾的戏剧性的体现。未来的歌德将在新“浮士德”中一起来描写他們。至于讓哪一个黑克尔扮演浮士德，哪一个黑克尔扮演瓦格納，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来决定。

不管怎样，在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作了荒誕无稽的临別致詞之后，紧接着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就提出了同样荒誕无稽的控告。

<sup>①</sup> 根据当时書报检查法的規定，双橫綫下面为非政治栏，报纸对刊登在該栏中的文艺作品、杂文等不負責任，文責由作者自負。——譯者注

莫非是我們搞錯了？也許國家檢察官認為，“告德國人民書”是“新萊茵報”自己偽造的，而在自己的公告下面狡猾陰險地署上了“黑克爾”的名字，以便使德國人民相信：國家檢察官黑克爾僑居在紐約，國家檢察官黑克爾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國，國家檢察官正式批准革命的良好願望？

這種陰謀詭計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登載在“新萊茵報”第116號附頁上的文件下面的署名不是“弗里德里希·黑克爾”，而tout bonnement〔索性〕是“黑克爾”。黑克爾的簽名用的不是花體字，而索性是黑克爾！難道在德國不是有兩個黑克爾嗎？

而其中誰是“索性的黑克爾”呢？不管怎麼說，在這個索性中有某種模稜兩可的東西，就是說，有引起對“新萊茵報”懷疑的某種東西。

不管怎麼樣，國家檢察官黑克爾先生公然認為“告德國人民書”是“新萊茵報”自己偽造的。他把它看作是推翻政府的一種直接號召，是一種明顯的叛國行為，或者至少是參與叛國行為，按照Code pénal〔刑法典〕規定，這“索性”是叛國。

因此，黑克爾先生向預審推事建議的不是把簽署報紙的負責發行人，而是把報紙的總編輯卡爾·馬克思“確定”為叛國者。但是把某個人“確定”為叛國者，換句話說，就是立刻把這個人投入監獄，暫且先把他拘禁起來。這裡問題是“確定”單獨拘禁。因此預審推事拒絕。然而，黑克爾先生一旦被某種思想所激動，他就和這種思想難分難解。“確定”“新萊茵報”的總編輯，對黑克爾先生說來已成了固定觀念，正象他把“臨別致詞”下面的署名“黑克爾”看作是虛構的一樣。因此他訴諸高等審判廳。高等審判廳拒絕。他又向上訴法院控告。上訴法院也拒絕了。但是，國家檢察官黑克



尔先生从不放弃他的“确定”(仍然是上述意义的)“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固定观念。可见,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思想,而是具有康德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启示。

即使报纸转载革命事实或公告是一种叛国的行为,那也绝不能直接把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而首先应当追究报纸的发行人,在上述文件刊登在横线下面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一种思想产生另一种思想。人们可能按照 Code pénal〔刑法典〕第 60 条控告卡尔·马克思是报纸发行人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如果愿意,也可以把他控告为刊载任何一个声明的同谋者,即使“科伦日报”也刊载过这个声明。于是卡尔·马克思收到了预审推事的传票,他出庭并受到了审问。据我们了解,被传去作见证人的有一些排字工人、一个校对员以及印刷厂的老板。最后,被传去作见证人的还有报纸的负责发行人〔Gerant〕<sup>①</sup>。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把后者传去作见证人。

难道虚构的作者应当作证反对自己的同谋者吗?

为了把事情叙述得很全面,我们必须指出,“新莱茵报”的编辑室曾被搜查。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压倒了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一个黑克尔进行了叛乱的活动,发表了煽动叛变的公告。另一个黑克尔不顾一切地从现代历史中,从报纸中删去既成的事实。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果“坏报刊”发表了革命的事实和公告,它就犯了双重的叛国罪。它是犯罪行为的精神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叛乱活动

<sup>①</sup> 科尔夫。——编者注

就說明它內心喜欢这种活动；它又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同謀者，因为它报道这些活动就是宣传这些活动，既然宣传这些活动，它就成了叛乱的工具。不管从哪一种意义上講，它都是要“被确定”的，因此它就获得了这种“确定”的果实。相反地，“好”报刊却有报道或不报道、歪曲或不歪曲革命文件和事实的特权。拉德茨基把这种理論运用到实践中去，禁止米兰的报纸报道来自維也納的事实和公告。而“米兰报”<sup>267</sup>向公众报道的不是維也納的大“革命”，而是专门由拉德茨基所杜撰出来的維也納的小叛乱。虽然如此，据说在米兰还是爆发了起义。

大家知道，黑克尔先生——国家检察官——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sup>①</sup>。作为我們的撰稿人，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可以原諒他，只是他反对我們报纸的瀆神“精神”的罪过是不能原諒的。可是他正好犯了这种罪过，他毫无批評嗅覺地（这对一个“新莱茵报”的撰稿人来说是前所未聞的）把流亡者黑克尔的公告变成了“新莱茵报”的公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对待运动的态度是慷慨激昂的，“新莱茵报”則是批判的。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重大作用上，我們則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經濟关系引起的冲突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新莱茵报”則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規模階級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在那个合众国里，西部还根本没有階級斗争，东部的階級斗争也只是按照旧的无声无息的英国形式进行的。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看来，社会問題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

① 見本卷第 202 頁。——編者注

形式。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

例如，“新莱茵报”并没有完全背弃自己的过去，它怎么会向德国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吁：

“在高高举起和忠实保护人民主权的旗帜的人们的周围联合起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极左分子的周围联合起来；用言论和行动去帮助共和起义的英勇领袖们。”

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并不是“议会的”机关报，因此我们有时甚至不怕招惹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愤怒。我们号召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靠近人民，但从来没有号召人民靠近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而“共和起义的英勇领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大家知道，黑克尔在美国，司徒卢威在监狱里。海尔维格呢？“新莱茵报”的编辑们，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在民众大会上坚决反对海尔维格在巴黎所进行的活动<sup>268</sup>，而不怕引起激昂的群众的不满。果然，他们当时因此引起了那些自诩为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怀疑（参看“德意志人民报”<sup>269</sup>）。现在，当我们的预言不止一次地被事变所证实的时候，难道我们应当附和那些同我们意见相反的人吗？

但是我们将采取公正的态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还是我们报纸的一个年轻的撰稿人。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象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 espèce [各种各样] 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而且，黑克尔先生难道不受“确定”“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吗？这种固定观念既不能被偵察机关的滌罪火熔解，也

不能被高等审判厅和上诉法院的滌罪火熔解，因此，应当承認這是一種耐火的固定觀念。

三月革命的最偉大的成果，用布魯土斯-巴塞爾曼的話來說，無疑是“最高尚的和最優秀的人的統治”和他們沿着這種統治的階梯扶搖直上。因此，我們希望我們那位可敬的撰稿人——國家檢察官黑克爾先生的豐功偉績會把他抬上國家的奧林帕斯山<sup>①</sup>的頂峰，就象那些駕着阿芙羅狄蒂的車子的白鴿閃電般地把她拉到奧林帕斯山上去一樣。大家知道，我們的政府是實施憲政的政府。普富爾熱衷於立憲制度。在立憲國家中，都有細心聽取反對派報紙的意見的 *usus* [習慣]。因此，如果我們建議政府把杜塞爾多夫最高檢察官的空位授給我們的黑克爾，也不算是離開了憲政基地。據我們了解，杜塞爾多夫的檢察官阿蒙先生暫時還沒有獲得拯救祖國的獎章，因此，他即使有自己的奢望，但是在有更大的功勞的人面前，他也会立刻恭敬地放棄自己的奢望。如果象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海姆佐特先生成了司法大臣，那我們就建議讓黑克爾先生擔任總檢察長的助手。但是我們認為黑克爾先生能做更大的事情。只是黑克爾先生還年輕。就象一位俄國人所說的：沙皇是偉大的，上帝更偉大，不過沙皇還年輕。

卡·馬克思寫於1848年10月28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48年10月29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129號

<sup>①</sup> 希臘帕撒利之一山，傳說為眾神住地。——譯者注

##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 德国人民书”

科倫 11 月 2 日。茲將“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sup>270</sup> 告德国人民書轉載如下：

### 告德国人民書！

在漫长的可耻的岁月中，德国人民一直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呻吟。維也納和柏林的流血事件使我們有理由指望：德国人民的自由和統一將一舉實現。可詛咒的反动派的种种恶毒的陰謀却阻碍了这种发展。反动派企图騙取英雄的人民輝煌起义的成果。德国自由的主要堡垒維也納目前处在严重的危險中。它成了还很强大的权奸的奸計的牺牲品，人們又想把暴政的桎梏加在它的身上。可是高尚的維也納居民万众一心，勇敢地起来反对自己的奴役者的武装匪帮。維也納的事业就是德国的事业，就是自由的事业。維也納要是陷落了，旧的专制政治就会空前猖獗起来，而維也納要是胜利了，旧的专制政治就会被消灭。德国的同胞們，不讓維也納的自由遭到灭亡，不使維也納成为野蛮匪帮軍事胜利的牺牲品，这全要靠我們自己。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赶快帮助在危急中的兄弟城市，是德国各邦政府最神圣的職責；然而与此同时，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拯救自己而不惜任何牺牲来拯救維也納，也是德国人民最神圣的職責。在此千鈞一发之际，我們决不应可耻地袖手旁觀。因此，同胞們，我們号召你們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来挽救維也納的灭亡。我們帮助維也納就是帮助德国。自动来帮忙吧！你們为了建立自由而派遺到法兰克福去的人已經用恶毒的嘲笑拒絕了帮助維也納的号召。現在就靠你們自己了！你們應該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地要求自己的政府服从你們大多数

人的意志，拯救德国人民的事业和維也納自由的事业。赶快行动起来！你們就是力量，你們的意志就是法律！前进吧！前进，自由的人們，在全部德国的土地上和其他地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激动着高尚的心灵！前进吧，現在还不晚！拯救維也納的自由，拯救德国的自由。同代人將贊揚你們，后代人將使你們名揚千古！

### 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1848年10月29日

这个告人民書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滿了抱怨派說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隱藏的显然是貧乏的思想和感情。

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告人民書指望：維也納和柏林的三月革命將“一举实现”德国人民的“統一和自由”。換句話說，告人民書所梦想的是“一举”，这种“一举”会使得为了实现“統一和自由”所必需的“发展”成为德国人民的多余的东西。

可是这种代替了发展的、幻想的“一举”馬上就变成了被反动派所阻碍的“发展”。这是自相矛盾的空洞詞句！

我們更不用談对同一个主題的单調的重复了：維也納在危急中，德国的自由也和維也納一起在危急中；帮助維也納也就是帮助自己！这种思想并没有具体化。只是同一种詞句在变各种不同的花样，直到变成不折不扣的說教时为止。我們只指出一点：这种人为的和虛伪的热情同这一类笨拙的演說术始終是相吻合的。

“德国的同胞們，不讓維也納的自由遭到灭亡，不使維也納成为野蛮匪帮軍事胜利的牺牲品，这全要靠我們自己。”

而我們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是依靠“德国各邦政府”的責任感。C'est incroyable! [簡直不可思議!]

“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赶快帮助在危急中的兄弟城市，是德国各邦政府最神圣的职責。”

普魯士政府应当派誰去反对奥尔施佩格、耶拉契奇和文迪施格雷茨呢？派弗兰格尔或科隆布去呢，还是派普魯士亲王去？难道“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有权利稍微用这种幼稚和保守的观点来对待德国各邦政府嗎？代表大会是否有权利稍微把德国各邦政府的事业和“最神圣的利益”同“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的事业和利益区分开来呢？各邦政府将由于这种幼稚的梦想而沾沾自喜。

而人民呢？

人民一般被号召“不惜任何牺牲来拯救維也納”。妙极了！但是，“人民”期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一定的要求。誰要求一切，誰就一无所求和一无所得。一定的要求實質上是这样的：

“你們應該不屈不撓和坚忍不拔地要求自己的政府服从你們大多数人的意志，拯救德国人民的事业和維也納自由的事业！赶快行动起来！你們就是力量，你們的意志就是法律！前进吧！”

假定通过大規模的人民游行示威能使政府采取半官方措施来拯救維也納，那末我們會因“施泰因式的軍令”的再版而感到幸运。企图把現今的“德国各邦政府”当做“自由的救星”，——难道他們在执行全帝国的体刑时沒有完成“宪法規定的自由”的加甫利尔大天使們的真正使命和“最神圣的职責”嗎？“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对德国各邦政府应当保持沉默呢，还是应当无情地揭露各邦政府同奥里繆茨和彼得堡之間的秘密勾結？

虽然告人民書建議要“赶快”，实际上也迫不及待，但人道主义的空洞詞句把它带出了德国国境，带出了一切地理界綫，把它带到一般“高尚心灵”的世界主义的幻想国中去！

“赶快行动起来！前进吧！前进，自由的人们，在全部德国的土地上和其他地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激动着高尚的心灵！”

我們并不怀疑，甚至在拉伯兰也有这种“心灵”。

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告人民書”在大談这种极其曖昧的空洞詞句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实質。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这样的文件是完全不可饒恕的。“同代人”将不会“贊揚”它，而“后代人”也不会使它“名揚千古”。

不管“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告人民書”怎样，我們还是希望人民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并給予維也納以他們在目前能力所及的唯一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战胜本国的反革命。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2日

載于1848年11月3日

“新萊茵报”第1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巴黎“改革报”論法国状况

科倫 11 月 2 日。还在六月起义以前，我們就不止一次地揭露过固守 1793 年传统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即“改革报”（“巴黎的”）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在六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运动的影响下，这些空想的共和党人才渐渐睜开了眼睛。

“改革报”11 月 29 日的社論向我們表明了这个党派内部旧幻想和新事实之間斗争的情形。

“改革报”写道：

“我們这里为掌握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的战争。第一共和国产生时资产阶级和人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武装的人民在国外的自我牺牲，帝国时代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长系波旁王朝时期封建制度复辟的企图，最后，1830 年资产阶级的胜利和统治，——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改革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补充說：

“当然，我們以惋惜的心情来談論阶级，談論违背神的意志的、可恨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存在着，我們不能否認这个事实。”

这就是說：“改革报”的那种共和主义的乐观主义至今所看到的只是 «citoyens» [“市民”]。但是历史已有力地把“改革报”逼得走投无路，使它不能再用幻想来消灭“市民”分裂为 «bourgeois» [“资产者”] 和 «prolétaires» [“无产者”] 的现象。

“改革报”繼續写道：

“2月間，資產階級的專制政治被摧毀了。人民要求什麼東西呢？對人人一律公正，平等。這就是他們的第一個口號，他們的第一個願望。遭到雷殛而恍然大悟的資產階級最初除了人民的願望以外再沒有別的願望。”

“改革報”仍然用2月里的漂亮話來判斷二月革命的性質。在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的專制政治根本沒有被摧毀，而是獲得了充分完善的表現。王冠，即掩蓋着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最后一道封建的靈光圈，已被摘掉。赤裸裸的資本統治暴露出來了。在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反對共同的敵人而鬥爭。當共同的敵人一被消滅，戰場上就只剩下這兩個敵對的階級，它們兩者之間就必然要開始決戰。可是，有人會問我們，既然二月革命已建立了完備的資產階級統治，為什麼又會發生資產階級退向保皇主義這種新的轉變呢？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了。因為資產階級留戀那個時期，當時它占居統治地位而不用對自己的統治負責；當時介於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間的虛構的權力既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效勞，又替資產階級掩護；當時資產階級有個戴着王冠的替罪羊，每當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本身射擊的時候，炮彈總是落在替罪羊的身上，而一旦這個替罪羊成了資產階級的累贅以及資產階級想把自己的政權確立為專為自身服務的政權，資產階級就自動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資產階級把國王作為防備人民的避雷針，而把人民作為防備國王的避雷針。

“改革報”把路易-菲力浦失敗後第二天得到廣泛傳播的部分偽善部分誠摯的幻想看做現實，把二月事件以後發生的運動看做一系列的錯誤和悲痛的偶發事件，如果有一個適應時勢需要的大丈夫出現的話，這種錯誤和悲痛的偶發事件就可以避免。好象帶有虛幻的光輝的拉馬丁並不是適應時勢的真正大丈夫似的。

“改革报”抱怨說：可是，真正的丈夫，大丈夫至今还不想出現，而时势却在每况愈下。

“一方面，工商业的危机在加深。另一方面，仇恨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力求达到相反的目的。那些在2月24日以前受压迫的人們，在关于嶄新的社会的观念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那些在君主制度下占居統治地位的人們，只关心怎样恢复自己的权力和加倍残酷地来利用它。”

怎么，难道“改革报”竟站在这两个互相极端对立的階級之間的立場上嗎？它是否能提高到哪怕只是模糊地了解，階級对立和階級斗争只能随着階級的消失而消失呢？

不是的！“改革报”刚才承認了階級对立的存。但是，階級对立是建立在經濟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質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換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認为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視綫离开階級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說离开这些物質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虛幻高空，即奔向富有詩意的二月时期，因为六月事变用暴力把它从这个时期中揪了出来。請听吧：

“在这些內哄中，最令人悲痛的事情就是爱国的、民族的情感的消弭和丧失”，即两个階級用来給自己的一定利益、給自己的生活条件添增爱国和民族色彩的那些幻想的消弭和丧失。当这些階級在1789年这样做的时候，它們之間的真正对立还不显著。因此，現在提适合于当时状况的东西，仅仅意味着逃避承認目前状况。当时还是活着的东西，現在已变成了干尸。

“改革报”最后写道：“显然，法国在遭受一种根深蒂固的祸害的折磨，但是，这种祸害并不是不可救药的。它的根源是思想和道德的混乱，是忘記了社会关系中的公正和平等，是受了利己教育的有害影响。应当在这方面寻找改造的手段。然而人們不这样做，却訴諸物質手段。”

“改革报”把問題轉移到“良心”方面去，而关于道德的空談現在就成为根除一切祸害的手段了。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質的、經濟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不再意識到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己的真正对立，并用 1793 年那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話做鴉片来麻醉自己，对它們会有好处的。多么軟弱无力呵！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3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133 号

## 維也納革命和“科倫日報”<sup>271</sup>

科倫 11 月 3 日。我們的讀者對維也納從來不抱空幻的希望。六月革命後我們容忍了資產階級的一切卑鄙行為。還在取消戒嚴令後出版的第一號“新萊茵報”上我們就說過：“由於資產階級不信任工人階級，這次革命已面臨着危險：它即使不遭到失敗，至少也會陷於癱瘓。但是，不管怎樣，維也納革命對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國的影響，打亂了反革命進攻的全盤計劃！”<sup>①</sup>

因此，維也納的失敗對於我們不會是什麼意外。它只會提醒我們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來衡量自由的資產階級作任何妥協。它會提醒我們拒絕一切調和，堅決反對可憐的德國中等階級，這個階級在不鬥爭仍能做生意的條件下是甘願放棄自己的統治的。英法的資產階級是有榮譽心的。維也納的失敗會証實德國資產階級是寡廉鮮恥的。

總之，我們從來也沒有保證維也納人能取得勝利。他們的失敗對我們不會是意外。失敗只會使我們確信，同資產階級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甚至在過渡時期也是這樣，人民應該站在資產階級同政府的鬥爭之外，等待資產階級的勝利或失敗，以便利用它們的結果。再說一遍：讀者們只要翻閱一下本報至今所出版的各號報紙就會相信，無論維也納人的勝利或失敗，對我們都不會是什麼意外。

<sup>①</sup> 見本卷第 494 頁。——編者注

那末，什么对我们才是真正的意外呢？那就是“科倫日报”的第二次号外。这也許是政府为了消除柏林和全省的紧张状况而故意散播有关維也納的謠言？或者，杜蒙从“柏林”晨报和“布勒斯劳”晨报获得“坏报刊”所得不到的消息，而給予普魯士国家电报局以报酬？那末，杜蒙今天早晨究竟从哪里得到了我們沒有得到的“紧急电报”呢？也許是代替了維特根施坦职务的特利尔城的比尔克这个小人物已被杜蒙聘請为編輯了吧？我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不管勃律盖曼、沃尔弗斯或施万貝克是什么人，他們毕竟都不是比尔克。我們不相信杜蒙会聘請如此无能的人。

当时曾刊載了关于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虛假报道的杜蒙，今天晚上6点鐘，又在他的报纸中以显著地位刊載了一条“电讯”消息，根据这条消息，維也納向“温德人的疥疮”即向“文迪施格雷茨”<sup>①</sup>投降了。

可能是这样。然而，凡是鮮血淋淋的“勃律盖曼”<sup>272</sup>这位旧“萊茵报”的記者，这位循規蹈矩的、自己的意見始終与意見的一般“交換价值”相符合的人認為是可能的事情，其可能性都是以“普魯士国家通报”和“布勒斯劳报”<sup>273</sup>的报道为根据的。“勃律盖曼”或“科倫日报”所捏造的关于二月、三月和十月革命的謠言是对历史的一种独创的貢獻。

我們把这些什么也沒有报道的报道列举在下面。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8年11月3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133号第2附頁

① 俏皮話：《Wendische Krätze》意思是“温德人的疥疮”。《Windischgrätz》（文迪施格雷茨）是奥国姓。——編者注

## 維也納、柏林和巴黎的 最后消息

科倫 11 月 4 日。黎明。

直接从維也納來的消息仍然沒有。但就是从普魯士官方报刊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維也納並沒有投降，文迪施格雷茨故意地或由于誤会而把虛假的電訊消息傳給全世界，这条消息在“好”报刊上引起了殷勤的、紛紜的和正統的回声，虽然这个报刊竭力用虛偽的臨葬悼詞來掩蓋自己的幸災樂禍。如果把柏林和西里西亞的报道中所有那些由于自相矛盾而不攻自破的荒誕謔語去掉，那末就会弄清事情的真相：在 10 月 29 日以前，皇匪軍只占領了城郊的几个地方。从現有的报道中看不出他們已經夺取了維也納这个城市的据点。維也納的全部投降只不过是維也納市議會的一些叛变的公告罢了。10 月 30 日匈牙利軍隊的先鋒隊向文迪施格雷茨进攻，但据說被打退了。10 月 31 日文迪施格雷茨又炮击維也納，但沒有結果。他現在处于維也納人和 8 万多匈牙利軍隊之間。文迪施格雷茨的无耻声明成了各省起义或至少是威胁性发动的信号。甚至布拉格的捷克狂热者，那些斯拉夫菩提樹<sup>274</sup>的新信徒也从空虛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主张拥护維也納而反对皇帝的施因德汉斯<sup>275</sup>。反革命从来不敢如此愚蠢和无耻地宣揚自己的計劃。甚至在奧里繆茨这个奧地利的科布倫茨，戴着王冠的白痴脚下的土地也动摇

起来了。只要統率軍隊的是那位举世聞名的西彼赫-薩拉尔<sup>①</sup>耶拉契奇（他的聲望是那樣高，以致“月亮在他的馬刀的閃光下都吓得藏到云彩后面去了”，而且常常是“炮聲指給他”應該逃跑的“道路”），那末毫無疑問，匈牙利人和維也納人就會把

這一群惡棍，橫蠻的匪徒，  
受盡生活折磨的飢餓的乞丐，  
流浪漢，騙子手，可憐的奴隸，——  
把這些無恥的不速之客，  
全都趕到寬闊的多瑙河裏去。  
他們全是克羅地亞人的敗類，  
被本國拋上了瘋狂冒險之途，  
拋上了必然滅亡的道路。

以後的消息詳細地報道了關於克羅地亞人以及“法定秩序和憲法規定的自由”的其他騎士們的駭人聽聞的可恥行為。而歐洲的資產階級卻在他們的交易所和其他娛樂場所對這種難以形容的血腥場面拍手叫好。這就是那個最可憐的資產階級，它在人民司法作出個別嚴厲判決的時候會義憤填膺，齊聲呵斥，異口同聲地詛咒殺死了英勇的拉圖爾和高尚的利希諾夫斯基的“凶手”。

為了懲罰屠殺加里西亞人的暴行，**波蘭人**又成了維也納解放者的領袖<sup>②</sup>，就象他們成為意大利人民的領袖一樣，就象他們到處都是高尚的革命將領一樣。光榮，三重光榮都歸於**波蘭人**！

**柏林的權奸**沉醉於血染維也納的情景，他們的眼睛被燃燒着

① 即總司令。——編者注

② 在維也納十月起義中，維也納起義者的最能干的指揮官是波蘭革命者約瑟夫·貝姆（1793—1850），他曾參加1830—1831年波蘭革命，後來又參加過1849年匈牙利革命起義。——譯者注



的郊区的烟霧遮瞎了，他們的耳朵被克罗地亚人和海杜克<sup>①</sup>胜利的吼声震聋了，于是他們摘下了假面具。“柏林恢复了安宁”。Nous verrons [我們瞧着吧]。

最后，我們听到了从巴黎传来的預告要发生地震的最初的地下的轟隆声，这次地震将把那个正直的共和国埋葬在它本身的废墟中。

天快亮了。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4日

載于1848年11月5日

“新萊茵报”第1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

① 匈牙利雇佣兵。1605年德兰士瓦尼亚公爵斯蒂芬·博奇科伊由于他們在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1276—1918)的斗争中有功，賜給他們貴族特权，并授以大片領土。——譯者注

## 反革命在維也納的勝利

科倫 11 月 6 日。“克罗地亚的自由和秩序”勝利了，并以难以形容的丑恶罪行——縱火、鎮压、搶劫来庆祝自己的勝利。如今維也納落到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奥尔施佩格的手里了。在老卖国贼拉图尔被打死后，大屠杀紧接着把人类的牺牲者抛进了他的坟墓。

本报駐維也納記者的全部悲觀的預言<sup>276</sup>已經应驗了，現在他自己可能已成為大屠杀的牺牲者了。

有一个时期，我們曾經希望匈牙利人来帮助解放維也納，可是直到如今匈牙利軍隊的調动對我們仍然是一个謎。

各种背叛行为造成了維也納的陷落。帝国国会和市議会在 10 月 6 日以后的全部历史不外是不断背叛的历史。帝国国会和市議會究竟代表什么人呢？

資產階級。

維也納的一部分國民自衛軍在十月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公开地站到权奸那边去了。而在十月革命結束的时候，我們又看到另外一部分國民自衛軍反对无产阶级和大学生軍团，暗中和皇匪軍勾結。这些國民自衛軍归誰所有呢？

資產階級。

在法国，資產階級只是在清除了阻碍本階級进行統治的一切

障礙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領的面貌出現。而在德國，資產階級甚至連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統治所必需的起碼的生存條件都沒有來得及取得就卑賤地作了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在法國，資產階級以暴君的面貌出現，並實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德國，資產階級則以奴婢的身分出現，並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實行反革命。在法國，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是為了制服人民。而在德國，資產階級為了不讓人民勝利而自己甘願受人擺布。歷史上沒有比德國資產階級更可恥更下賤的角色了。

誰從維也納成群結隊地逃跑，把丟棄的財產交給寬大的人民來保管，可是在逃跑期間反而辱罵人民執行了看守的任務，而在回來時又觀看他們怎樣慘遭屠殺？

**資產階級。**

當維也納人民的生活稍有起色時寒暑表就下降，而當人民發出臨死的呻吟時寒暑表就上升，這種寒暑表泄露了誰的最大的秘密呢？誰用股票行市上的秘密語言說話呢？

**資產階級。**

“德國國民議會”和它的“中央政權”出賣了維也納。它們代表誰呢？

**首先代表資產階級。**

“克羅地亞的秩序和自由”在維也納的勝利是以“正直的”共和國在巴黎的勝利為先決條件的。誰在六月的日子裡取得了勝利呢？

**資產階級。**

歐洲的反革命勢力由於自己在巴黎取得了勝利以後便開始大擺人肉筵席。

在二月和三月的日子里武装力量到处都被击潰。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代表政府本身而外不代表任何人。六月的日子以后武装力量到处都得胜奏捷，因为资产阶级处处都和它暗中妥协，另一方面它又把革命运动的正式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采取了种种不彻底的措施，其结果就自然使得革命运动流产。

捷克人的民族狂热是维也纳权奸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同盟者中間已經开始了紛爭。我們的讀者会在本号报纸上看到布拉格代表团对于在奥里穆茨遇到的侮辱性的无耻行为的抗議書。

这是将在以耶拉契奇为首的斯拉夫派和以文迪施格雷茨为首的粗鄙的、凌駕于一切民族之上的权奸之間发生战争的第一个征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农民还没有被平定。在奥地利各民族的喧囂声中，他們的声音特別响亮。而第三方面，爱民的沙皇的声音传到了佩斯；他的劊子手們在多瑙河上各公国里等候敕令。

最后，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議會最近决定把德意志的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如果德国中央政权和德国国民議會并不認为自己的使命仅仅是登台讓欧洲公众嘲罵，这个决定本身就会导致巨大的冲突。不管它們多么温順，奥地利将展开史无前例的規模巨大的斗争。

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結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別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人”，他們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他們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們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錢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烏

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銳的“經濟”問題會變得象軟綿綿的燈蕊一樣。

但是，革命發展的進程將不會等待歐洲各國轉嫁給歐洲社會的債務的償還日期。在巴黎，六月革命會給以致命的反擊。隨着“紅色共和國”在巴黎的勝利，軍隊將從各國的內地調到邊境並越過邊境，而各個鬥爭的黨派的真正力量也將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那時我們會想起六月和十月，並且也會高聲喊道：

**Vae victis!**〔戰敗者罪該萬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後的無結果的屠殺，二月和三月以後的無止境的殘害，——僅僅這種反革命的殘酷野蠻行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縮短、減少和限制舊社會的凶猛的垂死掙扎和新社會誕生的流血痛苦，這個方法就是實行革命的恐怖。

卡·馬克思寫於1848年11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48年11月7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136號



## 弗·恩格斯的遺稿





Non parait sur Lyon.

Tous les jours.

La belle France! Tu en fait, les Evénements de  
son sein s'épanouissent et se développent avec une  
force immense.

Mais comment en Europe sera-t-elle au point de  
vue de la liberté individuelle et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France? Mais oui. Mais comment? Comment  
pourra-t-elle résister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Angleterre? Mais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Angleterre? Mais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Mais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Mais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Comment résistera-t-elle à la tyrannie de l'étranger?



## 从巴黎到伯尔尼<sup>277</sup>

### 一

### 塞納河和罗亚尔河

La belle France! [美丽的法国!] 的确, 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他們有权以此自豪。

不論在財富方面, 也不論在条件优越和物产丰富方面, 在各个方面, 欧洲有哪一个国家能同法国相比呢?

西班牙嗎? 可是由于荒蕪或自然条件的关系, 它有  $\frac{2}{3}$  的面积是炎热的多石的荒野, 而半島上瀕临大西洋的一部分地区——葡萄牙, 并不是它的領土。

意大利嗎? 可是自从世界貿易的航路通过海洋以来, 自从輪船橫渡地中海以来, 意大利就被遺忘了。

英国嗎? 但是在英国, 80 年来除了商业和工业、煤烟和畜牧业以外, 别的什么也沒有。英国的天气阴暗得可怕, 并且不出产葡萄酒。

而德国呢? 德国的北方是一片多砂的平原, 一道花崗岩的牆壁——阿尔卑斯山脉把德国和欧洲南部隔开; 这是一个不出产葡萄酒的国家, 这是一个出产啤酒、烧酒和黑面包的国家, 这是一个河流淤塞、革命規模狹小的国家!

法国可就好得多了！法国三面临海，境内有 5 条大河朝着 3 个方向奔流；北方的气候同德国和比利时差不多，南方的气候和意大利差不多；北方出产小麦，南方出产玉蜀黍和稻米，北方出产油菜，南方出产橄欖树；北方出产亚麻，南方出产絲綢，而且几乎到处都出产葡萄酒。

什么样的葡萄酒呵！从波尔多酒到勃艮第酒，从勃艮第酒到圣若尔日烈酒、律内尔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从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到起泡沫的香檳酒，有多少种类呵！从普提—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沙姆彼尔田酒、沙托—拉罗兹酒、索帖尔涅酒，到卢西利昂酒和起泡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种白的和紅的葡萄酒呵！妙不可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緒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輕佻的四人舞到唱“馬賽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香檳酒，又能鼓起人間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緒！

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經纖維，每隔一定的時間，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們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結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講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們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說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

当你在城市的某一高处，或者在蒙馬特尔，或者在圣克魯平台上眺望巴黎的时候，当你沿着城市的四周漫步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法国懂得巴黎对于它有什么意义，所以法

国曾不遗余力地細心撫育巴黎。就象一个宮女靜靜地躺在閃閃发光的青銅长沙发上一样，这个驕傲的城市安閑地屹立在蜿蜒曲折的塞納河河谷中沐着阳光、栽着葡萄的丘陵上。在凡尔賽的两条鉄路上从車窗下望，可以看到村落和小城市星罗棋布的一片翠綠的河谷，世界上哪兒能找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呢？象修倫、圣克魯、色佛尔、蒙莫兰錫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乡村和城市，环境是那么引人入胜，建筑是那么精致优美，布置是那么別具风味，世界上哪兒能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呢？随便走到哪一个关卡，随便沿着哪一条道路信步走去，到处都可以看到那样美丽的环境，那样別具风味地利用每一个地方，那样优美和精致。而这顆城市中的珍珠，是自己給自己創造了这样一个絕美的托盘的。

但是，当然，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創造巴黎。只有当你看到了这一美丽国家的惊人的財富时，你才懂得这个光輝灿烂、宏伟壮丽的无与伦比的巴黎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你从北方来，如果你乘火車奔馳过弗朗德里亚和阿尔图阿平原，奔馳过既无森林又无葡萄园的皮卡尔第山地，你当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在那里，你只看見一片稻田和草地，只是因为还有低窪的河谷和灌木成林的远山，才不覺得单調；当你在庞图阿茲附近进入快要呼吸到巴黎的区域的区域时，你才开始有一点觉察到“美丽的法国”本身。当你乘車通过富饒的洛林河谷，越过滿布葡萄园的白堊質的香檳山坡，沿着美丽的馬尔納河谷向首都进发的时候，你就会比較清楚地了解巴黎。当你乘車通过諾曼底，在从卢昂到巴黎这一条路上看到火車时而沿着蜿蜒曲折的塞納河前进，时而穿过塞納河奔馳的时候，你就更清楚地認識巴黎了。在塞納河上，一直到塞納河口，都散发出巴黎的大气；这里的村庄、城市 and 山崗，都使人联想到巴黎的郊区，

不过你愈接近法国中部，这一切就愈显得美丽、繁华和优雅。但是，只有当我沿着罗亚尔河岸行走，并从那里越过丛山进入遍地葡萄园的勃艮第山谷时，我才完全了解到怎么会有巴黎。

我知道巴黎是在它受君主政体统治的最后两年，当时资产阶级还在尽情地欣赏它的全部权力，工商业还能勉强维持，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青年还有足够的金钱去行乐和狂饮，甚至一部分工人的生活也还有保障，他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参加一般的娱乐。我又一次看到巴黎是在3月和4月，在它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时候，当时工人们不加考虑地相信共和国，满不在乎地下了决心，表示“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sup>①</sup>，他们白天吃干面包和马铃薯，晚上在大街上种植自由树<sup>②</sup>、放烟火和兴高采烈地唱“马赛曲”，而资产阶级则成天躲在家里，企图用五颜六色的灯盏来平息人民的怒火。在10月里，我又来到了巴黎，但是，我向黑克尔发誓，我决不是自愿来的！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和6月25日，经历了空前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000人死亡。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Chant du départ》〔“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只有资产阶级还在低吟《Mourir pour la patrie》〔“为祖国牺牲”〕<sup>278</sup>。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在戒严的学校中，鲁莽的共和国很快就变得循规蹈矩、千依百顺、考虑周到和举止稳重（sage et modérée）了。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阶级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

① 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②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巴黎工人为了纪念获得自由，在大街上种植白杨树。——译者注

空无一人；街头的流浪兒穿上了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 30 个苏为正直的共和国卖命，而且他們愈是愚蠢，就愈受到资产阶级的贊揚，——总之，这又是 1847 年的巴黎，不过沒有灵魂，沒有生命，沒有火焰，沒有工人們当时所表現出来的那种不滿情緒的因素罢了。巴黎已經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

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須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錢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願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輕易离开法国的。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間迷路了。这是可以預料到的。最后，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見塞納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遙远的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寬闊的山谷；河的两岸是連綿不断的山崗，山崗上葡萄林成蔭，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群山，群山后面有馬尔納河流过。

但是，我不想直接上勃艮第去，我想先沿着罗亚尔河岸走。第二天我才离开了这条大道，越过群山，向奥尔良城进发。当然，我又在村落之間迷了路，因为我的响导不过是太阳和与世隔絕的弄不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的农民。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一夜（从农民們的方言中，我怎么也不能弄清楚这个村子的名字），它离巴黎有 15 法里路，位于塞納河和罗亚尔河之間的分水岭上。

組成这一分水岭的是从东南向西北伸展的寬闊的山脉。山的两麓被无数的山谷割开，山谷两旁溪流交叉縱橫。在上面，在微风

拂拂的山頂上，只有麦子、荞麦、紫苜蓿和蔬菜，而在斜坡上，則到处都是葡萄树。在东面，很多石灰質的石块几乎布满了斜坡，这种石块英国的地質学家叫做 bolderstones〔圓巨石〕。这种圓巨石在丘陵起伏的地帶常有发现，它們是在第二和第三紀层形成的。在这些大块的青色的圓巨石之間长滿了翠綠的灌木和小树，同遍布山谷的草地和对面滿山坡的葡萄树相輝映，看起来非常調和。

我慢慢地走进一条狹窄的河谷，順着河谷走了一段路程。最后，我走上了大路，遇見了行人，从他們那里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据說：我已离奥尔良到巴黎途中的馬舍尔布不远了。奥尔良位于我的旅途的西边，距离太远；我的最近的目的地是涅維尔，因此，我翻过附近的一座山，又一直往南走。山上出現了一片迷人的景色：树木成林的群山之間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馬舍尔布，山坡上村落星罗棋布，在上面，在一个山頂上，則有一个沙多勃利昂皇宮。而使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在对面，在狹谷的那一边，有一条一直通向南方的省道。

原来，法国有三种道路。一种是国道，过去称为皇道，現在叫做民道，这是一些联接各个重要城市的美丽而寬闊的公路。这些民道在巴黎近郊不仅是公路，而且是真正华丽的大路，是宏伟的榆树林蔭道，有 60 多英尺寬，中間是鋪砌过的。但是离巴黎愈远，路的作用愈小，道路也就愈坏：路面愈来愈窄，两旁的树木也愈来愈少。有些地方竟坏到这样的程度：一連下了两个鐘头不大不小的雨就几乎无法通行。第二类是省道，即二級交通綫，它們是由省的經費来維持的。它們比民道狹窄、簡陋。最后，第三类是大的村道 (chemins de grande communication)，它們是靠县的經費来維持的，这些路既狹窄又簡陋，不过有的地方比起較寬的公路来还要



好些。

我穿过田野，一直向着我的省道走去，并且非常高兴，深信它是笔直通向南方的。沿途很少看到村庄和旅店。走了好几个钟头，我才到了一个大农庄，在这里，人们非常乐意地请我吃东西，为此，我给主人的孩子们画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脸谱，并且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卡芬雅克将军，这是路易-拿破仑，这是阿尔芒·马拉斯特，这是赖德律-洛兰等等，都是很象很象的。农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漫画，衷心地感谢我，并且立即把这些逼真的画像挂在墙上。同时，我还从这些可爱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我现在是在从马舍尔布到罗亚尔河畔的沙多卢的路上，离沙多卢大约只有12法里路了。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了普尤伊左和另一个小城市（它的名字我忘记了），夜晚，才到达比利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美丽的城市，我在这里过了一夜。道路通过高地，这里有许多地方长满了葡萄树，但这条路是相当单调的。

第二天早晨，我再走了5里路就到了沙多卢，从那里又沿着罗亚尔河，沿着从奥尔良到涅维尔的一条民道走去。

在绿色的罗亚尔河岸上，  
诱人的扁桃花正在怒放，  
我感受到了相爱的魔力，  
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地方<sup>279</sup>——

有些富于幻想的德国青年和温情脉脉的德国少女这样用海尔敏娜·馮·謝奇的軟綿綿的詞句和卡尔·馬利阿·馮·韦伯的动人心弦的調子来歌唱。但是，誰学习20年代德勒斯頓的时尚，在罗亚尔河岸上寻找扁桃树和甜蜜的、温存的、热情的浪漫性格，誰就

給自己造成一種可怕的幻想，這種幻想是只有德國世襲的第三代女學者才能產生的。

在從沙多盧經過勒-博爾德到達姆比埃爾的路上，就幾乎看不到這一條浪漫的羅亞爾河了。這條路在離河兩三里路遠的丘陵中穿過，從這裡遠遠地望去，只能偶而看到被太陽照得閃閃發光的羅亞爾河水。這個地方盛產葡萄酒、谷物、水果，而臨河一帶，則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這個沒有樹林的河谷，周圍盡是波浪形的丘陵，看起來總覺得相當單調。

在道路中間，在幾家農舍附近，我碰見了一個由4個男人、3個女人和幾個小孩子組成的商隊，他們趕着3輛滿載貨物的驢車。這些人就在路邊一大堆篝火旁做午飯吃。我在這裡停了一下：我沒有弄錯，他們說的是德國話，而且是非常粗野的德國南部高原的方言。我和他們談起話來；他們在法國中部聽到了祖國的語言，簡直喜出望外。可是，看來他們是斯特拉斯堡近郊的亞爾薩斯人，他們每年夏天都象現在這樣，到法國內地去靠編制籃筐謀生。我問他們能否以此為生，他們這樣回答：“當然，要買一切東西是很困難的，但我們多半是靠布施的。”從一輛小小的車子里，又有一個老頭兒慢慢地爬了出來，在車子里，他有一張實實在在的床。這一群人儼然象茨岡人，他們穿着布施來的衣服，這些衣服沒有一件是適合別人穿的。儘管這樣，他們還是表現出心滿意足的神情，滔滔不絕地向我敘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就在這裡，在這場興致勃勃的交談中，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女兒（這是一個藍眼睛的溫和的人）幾乎要互相揪住火紅色的蓬亂的頭髮打起架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由於什麼樣的力量，德國的善良和德國的誠懇竟能透過茨岡人的生活方式和茨岡人的服裝；我向他們告別，動身繼續前進，有一

个茨冈人陪我走了一段路，他本来是在午饭前骑着骨瘦如柴的小驴闲逛的。

晚上，我到了达姆比埃尔，这是离罗亚尔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大约有三四百名巴黎工人（这是以前国家工厂的剩余工人）在这里按照政府的命令修筑防洪壩。在他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工人：首饰匠，屠夫，鞋匠，木匠，直到巴黎街头捡破烂的人。在我过夜的一家宿店里，我碰见了大约 20 个这样的工人。其中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屠夫，他已担任监工的职位，他喜形于色地谈起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按照各人所做的工作，每天能赚 30 至 100 个苏；即使技巧不太高明，要赚 40 至 60 个苏也并不困难。他想马上把我编在他的小组内，并且向我肯定地说，我很快就会习惯于这项工作，从下星期起，每天一定能赚 50 个苏；说我可以好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而那里的工作至少还能维持 6 个月之久。为了使生活多样化，我并不反对在一两个月内放下笔杆，拿起铁锤。但是我身边什么证件也没有，可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巴黎工人完全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的欢乐。他们每天在谈笑风生中工作 10 小时，在玩乐中消磨休息时间，晚上则“发展”乡下姑娘作为消遣。由于在小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般说来，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看来，他们连报纸也不看。他们对政治的全部兴趣，仅仅限于互相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笨汉叫做科西迪耶尔，另一个坏工人和酒徒叫做基佐，等等。由于工作紧张，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主要由于同巴黎隔绝，被迫生活在法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的眼界就大大地缩小了。他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可是他们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两个月。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奇恩，这样，我终于来到了罗亚尔河河谷。奇恩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城内有蜿蜒曲折的街道，有美丽的河岸街，有横跨罗亚尔河的大桥，这里的河面几乎同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因河一样宽。一般说来，这条河很浅，而且砂滩很多。

从奇恩到布里阿尔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离罗亚尔河约有 $\frac{1}{4}$ 哩远。这条路通向东南，这一带地方渐渐带有南方的风味。道路两旁的榆树、榕树、洋槐和栗树连绵不断，构成了一条林荫道。绿油油的草地，收割后长满了非常繁茂的紫苜蓿的肥沃的田野，以及周围的一排排白杨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在罗亚尔河的那一边，在明亮的远处，可以看见一系列山岗；在河的这一边，在路的近旁，又有一连串葡萄树成荫的小丘。在这一带地方，罗亚尔河的河谷根本不象平常所说的那样惊人的美丽或具有浪漫的气息，但是它使人产生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有这些丰富的植物说明了气候的温和，因为植物的繁茂应该归功于温和的气候。甚至在德国最富饶的地方，我所看到过的植物也都不能同奇恩和布里阿尔途中的植物相比拟。

在和罗亚尔河分手之前，我还要谈一下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巴黎乘车至多走四五小时就可以到达的那些村庄，不可能提供关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村庄的概念。这些村庄的配置，房子的建筑方式，居民的风俗习惯，受他们赖以生存的伟大首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只是在离开巴黎10法里路的地方，在远远的山岗上，才出现地地道道的村庄，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农舍。这一带地方一直到罗亚尔河，甚至到勃艮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民们力求把自己家里的入口掩蔽起来，使它不暴露在道路面前。在山岗上，每

一个农家的院子都用石墙围着，穿过大门进入院子，在院子里才能找到进屋子的门，因为这道门几乎总是开在后面的。这些地方大部分农民都有牛有马，农舍都相当大；可是在罗亚尔河畔，种蔬菜很普遍，在这里，连富裕的农民也根本没有牲畜，即使有也很少，因为在这里，饲养牲畜是比较大的地主或土地承租人所独占的一种特殊副业，这里的农舍愈来愈小，常常小得令人感到惊奇：在里面怎么能容纳一家人以及全部家具和储藏物。但是在这里，进屋子的门也是背向道路开的，村子里几乎只有小酒馆和小铺子的门才是朝着道路开的。

这一带地方的农民虽然贫穷，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生活过得相当好。至少在山谷里，酒几乎总是土产，质量既好，价钱又便宜（今年一瓶酒值两个到三个苏），除了最高的山顶以外，到处都生产面包，好的小麦面包。此外，还出产美味的干酪和很好的水果，大家知道，在法国各地，这是同面包一块吃的。同所有的乡下居民一样，他们很少吃肉，可是他们喝很多牛奶，喝各种蔬菜汤，而且通常都吃质量很好的素食。同德国北部的农民甚至相当富裕的农民比较起来，法国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农民的生活至少要好两倍。

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们对外来的人很殷勤，很关切，虽然他们操着令人讨厌的 patois [方言]，但他们毕竟是非常真实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虽然他们对于他们的父亲们从贵族和牧师手中夺过来的一小块土地有着非常强烈的私有感，但是他们还保存着某些宗法式的美德，那些离大路很远的村子里的农民尤其是这样。

然而农民总归是农民，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

尽管法国农民具有个人美德，尽管他們的生活条件比萊茵河东部的农民好些，但是他們还是和德国农民一样，他們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

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們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們束縛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終如此；他們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們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說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們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們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們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質，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中世紀，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农民运动随着市民运动而产生，但是它經常提出一些反动的要求，它并没有給农民本身带来重大的結果，而只是支持了城市的解放斗争。

在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們只是当他們的显然可以感觉得到的迫切的个人利益要求他們进行革命的时候，他們才起来革命；只是当他們过去在封建关系下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沒有保証的时候，当这种封建关系还没有永远被消灭、外国军队还没有撤离他們的国土的时候，他們才起来革命。一旦达到了目的，他們就貪得无厌地、疯狂暴戾地回过头来反对他們所不了解的大城市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巴黎的运动。公安委员会的无数公告，国民公会的无数法令，首先是关于規定商品最高价格和處理投机分子的法令，别动队和流动断头台，都是用来对付这些頑固不化的农民的。然而，恐怖統治驅逐了外国军队，平息了內战，使农民得到

的好处比任何阶级都要大。

当拿破仑推翻了执政内阁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 Code civil [民法典] 中加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要知道，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了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 [法国] 对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他们只知道外国人是蹂躏他们的国土、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的侵略军。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农民为什么具有无限的民族感，说明了他们对 «l'étranger» [“外国人”] 为什么怀着无比的仇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 1814 和 1815 年热情地参加了战争。

1815年，当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当被驱逐的贵族又要求获得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领地的时候，农民看到这是对他们的全部革命成果的威胁。因此，他们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刻骨仇恨，而当七月革命又一次保证他们占有土地，并把三色旗交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欢天喜地了。

但是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那面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们保持胜利达 25 年之久的旗帜又在他们村子的自治局屋顶上迎风飘扬了。

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阶级立即开始拚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 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他们和

他們的債權人之間的私人關係；他們並沒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這種愈來愈帶有普遍性、愈來愈成為常規的私人關係，已漸漸發展成為大資本家階級和小土地占有者階級之間的階級關係。這種情況和封建義務完全不同，封建義務的起源早已被遺忘了，封建義務早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它已不再是對服役的報酬，它早就變成了一方面的重負。至於抵押借款，這就是農民——或者他的父親——借到了一筆 5 法郎硬幣的債，而借據和抵押賬簿一有機會就使他想到他擔負義務的原因。農民應該支付的利息，甚至他們對高利貸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義務，這種義務以同樣的方式損害着所有債務人的利益。壓迫是在完全現代化的、合乎時代精神的形式下進行的，而農民則按照僅僅保證他們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權原則受到榨取，遭到破產。他們自己的 Code civil [民法典]，他們現代的聖經，對他們來說已經成了鞭子。在抵押高利貸中，農民不可能看出階級關係，他們不可能要求消滅這種關係，因為這樣就會破壞他們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礎，高利貸的壓迫不是使他們卷入運動，而是把他們完全弄糊塗了。他們認為只有減少捐稅才能減輕他們的負擔。

今年 2 月里第一次發生了無產階級提出獨立要求的革命，農民對這一點簡直莫名其妙。如果說共和國對他們還有某種意義，那末，這不過是減少捐稅，有時也可能是某種程度的民族榮譽感，是進行侵略戰爭以及把國界推到萊茵河邊去。但是在推翻路易-菲力浦的第二天，巴黎爆發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戰爭，工商業的停滯狀態影響到了農村，在豐年本來就不值錢的農產品更加跌價，並且賣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戰鬥使法國的窮鄉僻壤都感到心驚膽戰和惶恐不安，在這個時候，農民普遍地發出了狂暴的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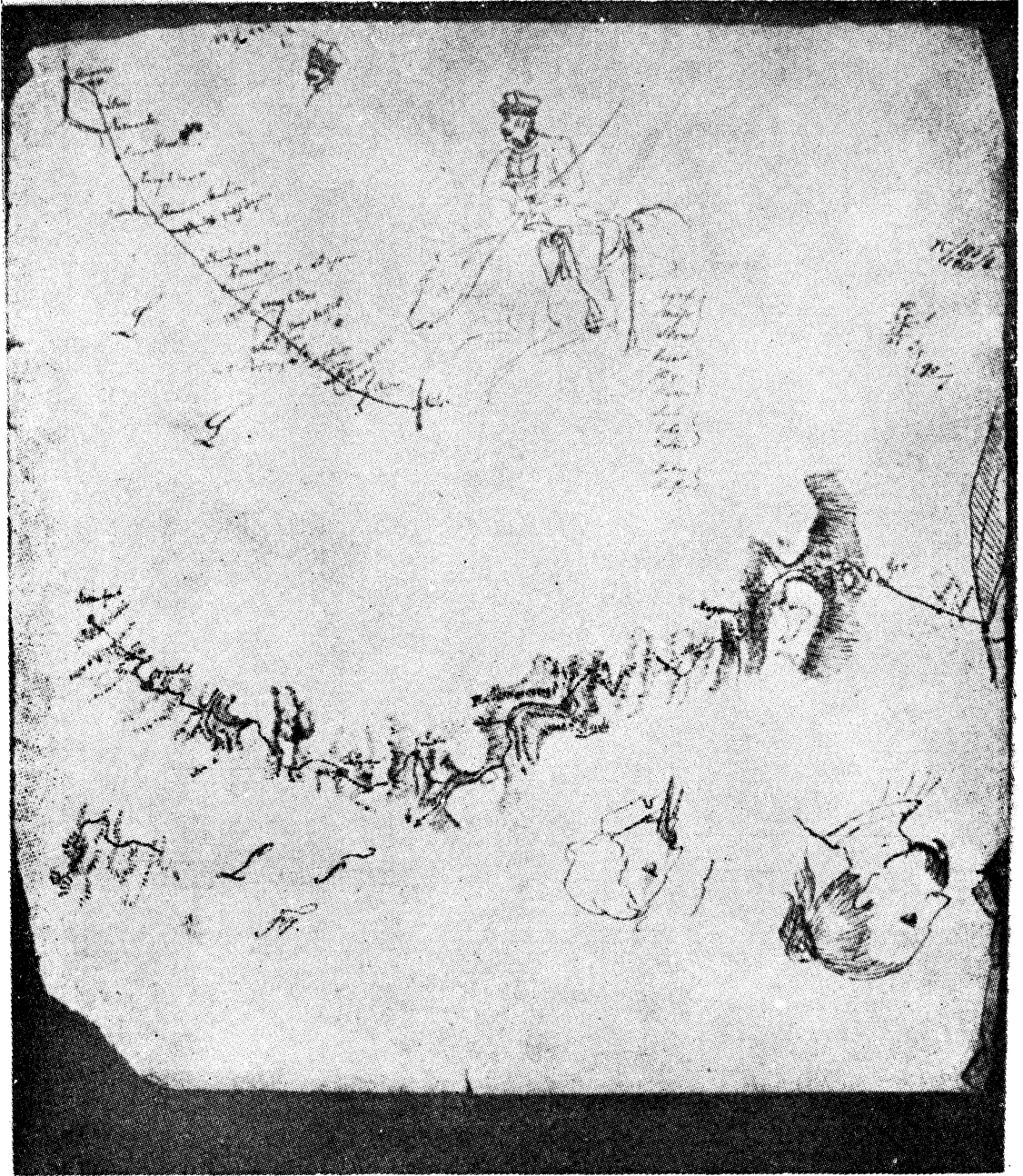


声，揚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貪得无饜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頑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組織，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而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 *ce sont les partageux* [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 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簡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話，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但愿这个万恶的巴黎明天就全部毁灭！”——这还是最温和的愿望。当然，农民本来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羊毛織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的秩序，我们农民必须把事情担当起来，——这就是经常从农民的模糊的語言中多少明确地、多少有意識地发出来的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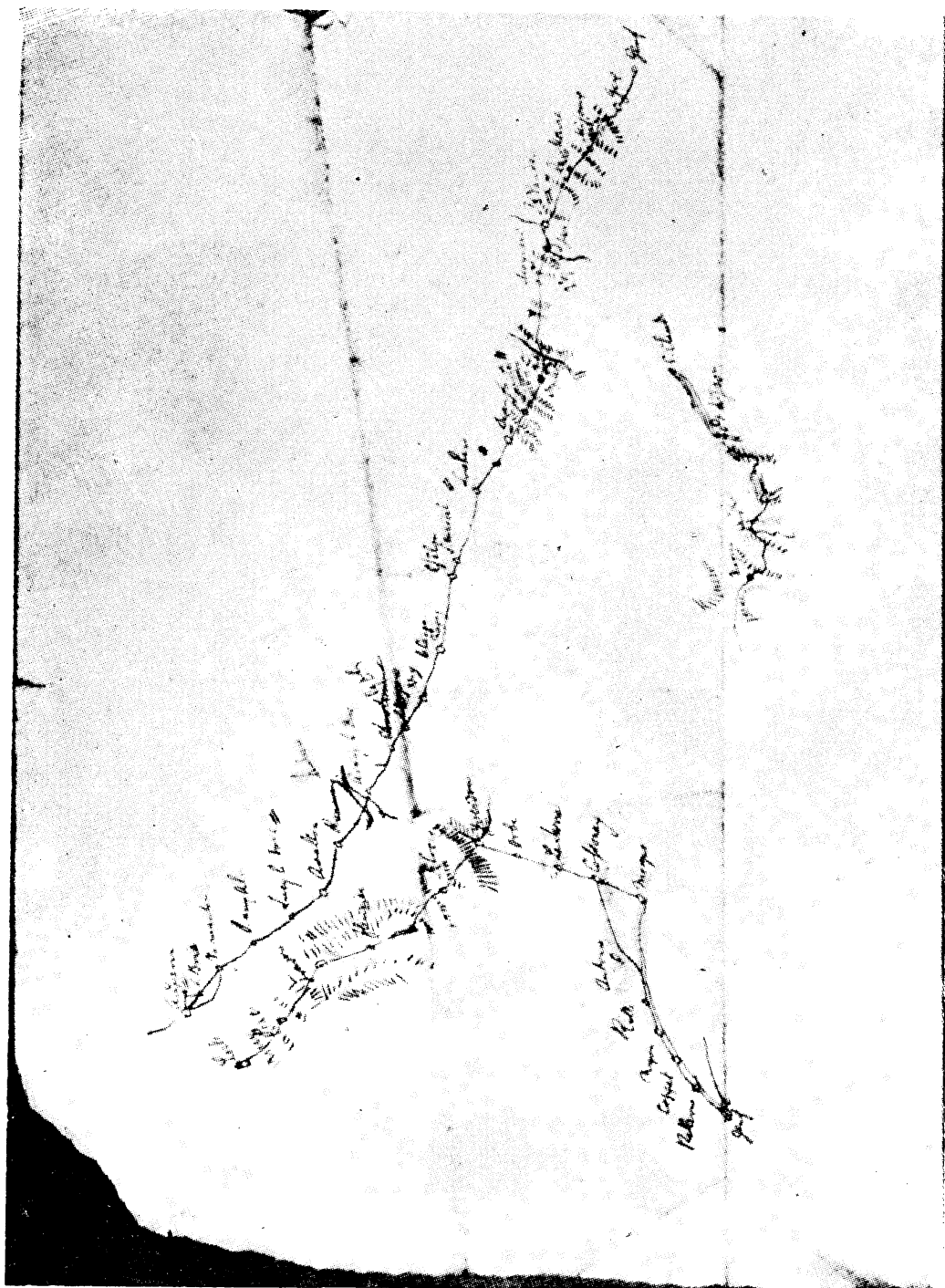
可是他们想怎样拯救法国，想用什么办法把事情担当起来呢？办法就是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承担者是一个渺小的、爱虚荣的、糊塗的傻瓜）做共和国的总统！所有同我谈过話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識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政治。可是要知道，法国农民拥有 600 多万张选票，占法国全部选票的  $\frac{2}{3}$  以上。

誠然，临时政府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革命联系起来；它主要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把土地稅增高了45生丁，因而就犯了不可原諒的和无法补救的錯誤。但是，即使它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他們也还是要脫离革命的。現在农民对1848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錯誤或偶然的失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它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們的社会地位。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首先必須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即使取消了一切抵押借款，也只能使这种战争的爆发延緩一个短短的时期。

只是因为在这两星期中几乎同清一色的农民，同各个地方的农民打交道；只是因为有机会在各地碰到了同样的情形：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妄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总之，只是因为恰好在1848年認識了法国农民，我才感觉到这种根深蒂固的迟钝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令人抑郁不安。



弗·恩格斯画的从奥克薩里到洛克尔的路綫草图<sup>280</sup>



弗·恩格斯画的从奥克薩里到洛克尔的路綫草图<sup>280</sup>

## 二 勃 艮 第

布里阿尔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市，位于沟通塞纳河和罗亚尔河的一条运河的河口。在这里我打听了前面的路程，发现到瑞士去经过奥克萨里比经过涅维尔要方便。于是我就离开了罗亚尔河，翻山到勃艮第去。

罗亚尔河河谷的一片富饶景象逐渐地但是相当缓慢地消失了。地势的上升是不知不觉的，只是在离开布里阿尔五六英里路远的地方，在圣索维尔和圣法尔若附近，才出现一片满是森林的利于经营畜牧业的山地。绵亘于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山脉，在这里已经很高了，一般说来，在云纳河省的整个西部，山是相当多的。

离土锡不远，在离开奥克萨里6法里路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了特殊的、纯朴而拉长音调的勃艮第方言——这种方言在这里和在勃艮第本地还算是相当亲切悦耳的，但是在弗兰契康帖的高地上，发音就变得难懂，笨拙，几乎带有教训的口吻。这好象纯朴的奥地利方言渐渐变成了粗野的巴伐利亚南部方言一样。勃艮第方言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的那个音节上；它把短长格的法语变成了长短律的法语，因而也就大大改变了有教养的法国人在说话时善于表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可是，我再说一遍，在勃艮第本地，发音还是

相当亲切的，而美丽的姑娘講起話来甚至是迷人的：Mais, mâ foi, monsieur, je vous demande ûn peu……〔呀，先生，你，怎么能……〕

如果允許加以比較的話，一般說來，勃艮第人就是法国的奧地利人。純朴，忠厚，非常輕信，在習慣的生活圈子里具有天生的聰明，對這一圈子以外的一切充滿了天真可笑的想法，在不習慣的情況下顯得笨拙可笑，而心情始終是無比愉快的，——這几乎是所有這些善良的人的特點。和藹可親、忠厚善良的勃艮第農民在政治上一無所知，對路易-拿破侖非常崇拜，比起其他地方的農民來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勃艮第人身上的德國血液成分無疑要比離德國西部較遠的法國人更多。他們的頭髮和臉色比較明亮，身材有點高大，特別是婦女；明察秋毫的智慧和敏銳準確的思想已經大大地減色，可是他們却具有更加天真的幽默，有時也有一點多愁善感。但是，法國人的愉快情緒在極大程度上還占優勢，而在無憂無慮的輕佻方面，勃艮第人是不落人後的。

在雲納河省西部的多山地帶，主要經營畜牧業。但法國人是不善於經營畜牧業的，勃艮第的牛羊是很瘦小的。除了畜牧業以外，還花很多時間來經營農業，到處都吃很好的小麥麵包。

這一帶地方的農舍也更象德國的農舍；屋子比較寬敞，住宅、谷倉和畜欄都在一座房子里；不過這一帶地方的門通常也都開在道路側面，或者是背向道路開的。

在通向奧克薩里的長長的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勃艮第的葡萄園，大部分葡萄都還沒有摘掉，1848年的葡萄是空前豐產的。在有些葡萄藤上，葡萄累累，幾乎連葉子都看不到了。

奧克薩里是一個小小的城市，地面坎坷不平，從內部看起來并

不美丽，在云納河畔有一条美丽的河岸街，还有几条初具規模的大街，在法国，每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街。在平时，这个小城市大概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云納河省的省长大概很少拿出錢来举办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必須給当地知名人士举办的义务舞会和晚会。但是現在奧克薩里很熱鬧，这是一年一度的熱鬧。社会民主党在土魯斯举行宴会时，整个房間都用紅色裝飾起来，人民代表唐茹瓦先生在国民議会上曾經对这一点大发雷霆；如果这位可敬的唐茹瓦先生同我一道到奧克薩里来，他一定会吓得害神經病。在这里，不是一个房間，而是整个城市都用紅色裝飾起来了。什么样的紅色呵！非常鮮明的血紅色染紅了房子的牆壁和楼梯，染紅了男人和女人的衬衣；深紅色的巨流甚至充滿了排水渠，并且染紅了馬路；一些滿脸胡子、面目凶恶的人提着大桶在街上走过，桶里装着触目惊心的起紅泡的混浊液体。看来，紅色共和国在使用一切恐怖手段来进行統治，看来，断头台、蒸汽断头台在不停地进行活动，“辯論日报”描写得那样可怕的 buveurs de sang〔杀人魔王〕在这里明目张胆地举行残忍不堪的痛飲会。但是奧克薩里的紅色共和国是完全无罪的——这是勃艮第的采集葡萄的紅色共和国，在这里津津有味地吞食这个紅色共和国的最名貴产品的杀人魔王不是別人，正是那些正直的共和党人先生們，那些巴黎的大資產者和小資產者。而可敬的唐茹瓦先生虽然滿怀善意，在这方面却充滿了紅色的貪欲。

在这个紅色共和国中，要有滿口袋的錢該多好啊！1848年葡萄空前大丰收，連裝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質量也非常好——比1846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許甚至比1834年的葡萄酒还要好！农民們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按照低得出奇的价格購

买 1847 年的剩余葡萄酒——只花 2 个法郎就可以买到 140 公升一桶的好葡萄酒；载着空桶子的大車一輛接一輛地来到每一家大門口，但是桶子还是不够。我亲眼看到奥克薩里的一个葡萄酒商人把滿滿好几桶質量很好的 1847 年的陈葡萄酒倒在街上，以便騰出桶子来装新的葡萄酒，当然，这种新的葡萄酒会給他带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投机机会。有人对我說，这个葡萄酒商人在几星期內就这样倒掉了将近 40 大桶 (fûts) 葡萄酒。

我在奥克薩里喝了几瓶陈的和新的葡萄酒，就渡过云納河，向右岸的群山走去。公路是順着河谷前进的，但是我却沿着一条比較短的旧路翻过山去。天上多云，天色阴暗，我自己也感到很累，因此就在附近的一个离奥克薩里几公里路的村子里过夜。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出来，我就动身了。这一天的太阳特別美丽。道路通过一片葡萄园，越过一个相当高的山岭。我在上山时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山上的美丽如画的景色已經给了我报酬。在我的眼前是一片一直通往云納河的崗巒起伏的斜坡，再下去是綠色的云納河河谷，河谷里綠草如茵，白楊环繞，无数村落和农舍散布其間，在后面則是灰色石头的奥克薩里，它靠着对岸峭然壁立的山岩；到处是村落，到处都看到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而耀眼的灼热的阳光（它的光芒只是在远处才被秋天的柔和的薄霧所挡住）傾瀉到这个大鍋里去，在这里，8 月的太阳在煮最名貴的葡萄酒。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法国的这种說不上特別美丽的风景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当然，并不是某一个細小的部分，而是全部景色的总和，才使它显得这样丰滿，而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的。萊茵河畔和摩塞尔河畔的悬崖峭壁比法国美丽得多，瑞士的各种景色的对照比法国雄伟壮丽，意大利的风景的色彩比法国鮮



明，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全部景色的总和都没有法国这样和谐。我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把目光从铺满了繁茂的绿草的广阔的河谷转向长满了同样繁茂的葡萄树的群山，转向淹没在果树丛中的无数村落和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一小块光秃秃的土地，看不到一个不惹人喜爱的不悦目的地方，看不到一块没有长着植物的粗糙的岩石。到处都是繁茂的植物，到处都是一片发出秋天的青铜色的美丽而鲜艳的绿色，这一切都沐着阳光，而10月中旬的阳光还很强烈，足以晒熟葡萄藤上的每一颗葡萄。

我向前走了一小段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同样美丽的景色。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比较窄的盆地里，是圣勃里，这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也只靠酿造葡萄酒为生。在这里，风景的细微末节也象前面的地方一样，不过规模较小。下面，在河谷中，小城市的周围有牧场和花园，在四周，在盆地的斜坡上种着葡萄树，只有北边，才有翻耕过的或者收割后长满了绿色的紫苜蓿的田野和草地。下面，在圣勃里的街道上，也象在奥克萨里一样，行人熙熙攘攘，到处都摆着桶子和压榨机，居民们到处都在欢天喜地地忙着压榨葡萄，把葡萄汁吸到桶子里去，或者提着装满葡萄汁的大桶在街上走。这里也有市场，在比较宽阔的街道上停着农民的大车，车上装着蔬菜、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农民们戴着白色的尖帽，农妇们围着马德拉斯布做的头巾，说说笑笑，吵吵嚷嚷，在葡萄酒酿造者中间挤来挤去；在小小的圣勃里居然也有这样热闹的场面，使人觉得好象置身在大城市中一样。

在圣勃里的那一边，道路又缓慢地通到山上去了。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登上了这个山。在这里，人们还在忙着采集葡萄，而在

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莱茵地区还要快乐得多。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在这一带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步行3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sup>281</sup>。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由于有钱，她们才能够保持清洁和衣着称身。她们知道，农村姑娘即使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承受下来法国人不喜欢而德国人却引以自豪的宽大的骨骼，但是由于在日晒雨淋下进行累人的田间操作，由于不容易保持清洁，由于无钱修饰自己，由于穿着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极不称身、极不雅致的衣服，在多数场合下，竟变成了走起路来象鸭子、打扮得鲜艳夺目的、笨拙可笑的稻草人。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德国的同胞更喜欢农家姑娘，这也可能是对的。我们尊敬健壮的女养畜人的那种龙骑兵式的步伐，特别是她们的拳头；我们给予围在她们的结实腰部的那些翠绿和火红的方格纹衣服以应有的评价；我们尊重那些从她们的颈子一直拖到脚跟的无可非议的平面，它使她们从后面看上去就象一块蒙着五颜六色的花布的木板！可是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希望不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同样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德国同胞能够原谅我，因为面孔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光亮、身材长得很匀称的圣勃里和威尔曼顿的勃艮第女人给我的印象，要比我在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遇见的那些母水牛给我的印象更加舒适；这些母水牛生来肮脏，毛发蓬乱，身体发胖，当人们在她们面前卷纸烟时，她们就瞪着两眼，当人们用地道的法国话向她们问路时，她们就叫着跑开去。

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喝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而我登上这一座不很高的山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来登上布罗肯山山峰，甚至登上少妇山。况且，每天都能把葡萄吃得饱饱的，因而在每一个葡萄园里都能找到适当的借口同这些老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男女们交往。可是凡事都有尽头，这座山也不例外。当我顺着对面的斜坡走下去，进入引人入胜的克尤腊河——云纳河的小支流——河谷，一直向环境比圣勃里还更美丽的小城市威尔曼顿走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但是，过了威尔曼顿，自然界的美很快就消失了。较高的佛锡昂山脉渐渐地迎面而来，这是塞纳河、罗尼河和罗亚尔河诸流域的分水岭。从威尔曼顿上山，走了好几个钟头的路程，并且通过了一块长长的贫瘠的高地，高地上裸麦、燕麦和荞麦多少已代替了小麦<sup>①</sup>。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0月底—11月

最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1898年  
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sup>①</sup> 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 附 录



## 告全体德国工人書<sup>282</sup>

**工人弟兄們!**

如果我們不願意再做最受欺騙的人，如果我們不願意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再受一小撮人的剝削、蔑視和蹂躪，我們就不應該錯過时机，我們絕不應該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如果我們还象过去那样是一盘散沙，尽管我們人数众多，我們也会軟弱无力。相反地，如果我們團結起来，組織起来，我們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弟兄們，在城乡各地建立起工人联合会来，在联合会里給大家說明我們目前的处境，提出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考虑和选举工人階級出席德国議会的代表，并且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維護我們的利益。此外，德国所有的工人联合会應該尽快地建立联系并且保持这种联系。

我們建議暫定美因茲为所有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并且建議大家和本委员会通信，以便磋商共同的計劃，尽快地在各联合会代表會議上最后确定中央委员会的駐地等。

我們期待着未付邮資的来信，我們也将寄这种信給各个組織。

美因茲工人教育协会委员会代表

第一主席 瓦 劳

書 記 克路斯

1848年4月5日于美因茲

**通信处：**

美因茲 弗兰契斯卡內尔街 156<sup>1</sup>/<sub>2</sub> 号

美因茲工人教育协会書記处阿道夫·克路斯先生亲收

載于1848年4月8日“德意志人民报”第8号，1848年4月10日“曼海姆晚报”第100号和1848年4月13日“湖滨小报”第89号附頁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共产主义者同盟

## 科倫支部會議記錄<sup>283</sup>

1848年5月11日會議

主席馬克思問哥特沙克對同盟有什麼意見和主張，現在打算對同盟採取什麼態度。

哥特沙克回答，他堅持他的退出同盟的聲明，因為目前局勢已經發生變化，同盟的章程也必須加以修改；因為他認為現行的章程威脅着他個人的自由。同時他聲明：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同盟需要，他都願意在上述條件下給同盟以全力支持。

主席 亨·畢爾格爾斯

書記 約瑟·莫爾

第一次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5年國際版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

科倫 7 月 7 日。預审推事昨天传訊了“新萊茵报”負責发行人科尔夫和总編輯卡尔·馬克思；他們两人被控侮辱和誣蔑逮捕安內克的宪兵和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先生。审讯从 4 点鐘开始，大約在 6 点鐘結束。接着，預审推事和国家檢察官黑克尔同被告一起前往报纸編輯部，在警察署长参与下进行搜查，他們想找到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sup>①</sup>的手稿，查出它的作者。他們找到了一篇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稿件，但它并不是引起指控的文章的副本。这篇稿件也被列入控告馬克思及其同謀者的材料中。从上述这种做法来看，显然是打算把整个編輯部 en masse [完全] 交付法庭审判，尽管負責发行人科尔夫（报纸是由他一个人签署的）也要負法律責任。

載于 1848 年 7 月 8 日  
“新萊茵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① 見本卷第 190—193 頁。——編者注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迫害

科倫 7 月 22 日。今天早晨，預审推事又把“新萊茵报”总編輯卡尔·馬克思传去，訊問他关于評論安內克先生被捕的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事。这一次，报纸負責发行人科尔夫先生沒有被传訊。

載于 1848 年 7 月 23 日  
“新萊茵报”第 5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关于召开萊茵地区各民主团体 代表大会的通知<sup>284</sup>

科倫 8 月 4 日。根据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決議 (決議确定科倫是普魯士萊茵省的中心 [Vorort], 并且委托該地民主团体召开区域代表大会, 以便組織萊茵省的民主党派), 本市各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sup>285</sup> 建議萊茵省所有民主团体派代表出席 8 月 13 日 (星期日) 在本市召开的代表大会。会场設在什托尔維尔卡餐厅楼上大厅。

科倫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

施奈德尔第二, 馬克思 (代表民主协会);

莫尔, 沙佩尔 (代表工人联合会);

貝克尔, 許岑多夫 (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

当反动派以到处召集“制宪”會議为幌子, 在全国进行視察和集中力量的时候, 民主主义者必須坚决反抗, 这是无須詳加解释的。民主主义者應該利用高呼“天佑吾王, 天佑吾国”的团体及其地方組織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載于 1848 年 8 月 5 日

“新萊茵报”第 6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迫害

科倫 8 月 4 日。我們和檢察机关的糾紛現在還沒有解決。上星期一，預審推事又把負責發行人科爾夫傳去，昨天，又把我們的編輯德朗克和恩格斯兩人傳去做証人。德朗克臨時缺席，只有恩格斯出庭，但是他沒有宣誓受訊。因為有人懷疑不久前在本報編輯部沒收的那篇稿件是他寫的，所以可能還要對他提出控告。

從這一切看來，發行人作為負責人出庭是不能使檢察机关感到滿足的。他們想把總編輯牽連進去，想找到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作者，想迫使編輯（其中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上述文章的作者）互相檢舉，可能的話，甚至自己供認。

載于 1848 年 8 月 5 日  
“新萊茵报”第 6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1848年8月11日科倫民主協會 全體會議記錄摘要

根据临时主席馬克思的指示宣讀并批准了上次全體會議的記錄之后，沃尔弗先生宣讀了就瓜分波兰問題致德国国民議会的抗議書<sup>①</sup>。會議熱烈地拥护这一文件并且一致通过。

里廷豪森先生列举許多理由，証明馬克思先生應該享有不久前普魯士政府拒絕授予他的公民权<sup>②</sup>。他認為，最好明天就派遣一个代表团，迫使区行政机关取消这项各方面都很可笑的非法措施。假如区行政机关不同意，就直接向內閣大臣抗議它的这种行为。會議宣讀了并且通过了抗議書，同时决定：如果政府不撤銷拒絕授予馬克思公民权的命令，今天晚上就动手为該文件征集签名。

馬克思先生更詳細地論証了政府对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非法性，會議一致报以掌声，認為这些論据是令人信服的。政府拒絕授予馬克思公民权的真正原因是以前政府想籠絡馬克思的企图沒有得逞。

恩格斯先生談到了警察对沙佩尔所采取的新的难以容忍的措施，即用驅逐出境来威胁他<sup>③</sup>。恩格斯說，警察的这种行动是非法

① 見本卷第 584—585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51—454 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 432—433 頁。——編者注

的，同時特別強調指出，沙佩爾作為拿騷公民，無論如何應該算是德國人，因此，根據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決議，他在德國所有的38個邦里都可以居住。

里廷豪森、施奈德爾和畢爾格爾斯當選為代表團團員，他們應該就馬克思和沙佩爾的問題與區督察員和警察廳長進行談判，力爭撤銷有關的決定。

與會者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歡迎國民議會議員格拉德巴赫；他詳細地說明了為什麼不應當對柏林議會和法蘭克福議會抱有任何希望。

恩格斯先生指出：正是格拉德巴赫經常引人注意，因為他具有自由思想和勇敢精神，特別是因為他堅決抗議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在斯潘道所受到的待遇<sup>①</sup>。與會者向格拉德巴赫3次歡呼致敬……

載於1848年8月25日  
“萊茵守護者”第2卷第2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萊茵守護者”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94—195頁。——編者注

## 科倫民主协会抗議將波茲南 併入德意志联邦<sup>286</sup>

科倫 8 月 12 日。科倫“民主协会”向国民議會呈递了一份抗議書，內容如下：

崇高的国民議會！

鉴于：

1. 爭取本身自由的德国并不打算压迫其他民族，恰恰相反，而是想帮助其他民族爭取自由和独立；
2. 波兰的解放对德国本身說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
3. 3 个暴君实际上不止一次地剝夺了波兰人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4. 从 1792 年开始，反动派对波兰的历次侵略和数度瓜分都是为了侵犯全欧洲的自由，另一方面，每当各民族解放的时机一到，复兴波兰的坚决要求也就提出来了；
5. 甚至五十人委员会<sup>287</sup> 也代表德国人民憤怒地拒絕参与任何侵犯波兰的罪行，同时明确地着重地指出：德国人民有帮助波兰恢复独立的义务；
6. 甚至普魯士国王在三月革命之后，在社会輿論的压力下也庄严地許下了改組波茲南的諾言；
7.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誠然是由間接选举产生的）无視这



一切,在今年7月27日的會議上決定把波茲南大公國的 $\frac{3}{4}$ 的領土并入尚未成立的德意志國家,這樣,它就同維也納會議和德意志聯邦議會一樣,參與了重新瓜分波蘭的勾當,侮辱了自由,因而玷污了自己;

8. 但是,有理智的一部分德國人民不想也不會為了討好反動派,為了普魯士的一小撮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參與任何鎮壓波蘭人民的行動;——

科倫民主协会在本日會議上決定:

堅決抗議今年7月27日德國國民議會通過的關於波茲南大公國的決定,從而在德國、波蘭和全歐洲面前堅決抗議這種僅僅有利於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的反動派的任意吞併的行為。

根據民主协会的委托

委員會

載于1848年8月13日  
“新萊茵報”第74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

科倫 8 月 12 日。本报和检察机关之間的值得注意的关系現在仍然在繼續发展。昨天，預审推事又把本报的一位編輯恩斯特·德朗克传去作証。宣誓沒有进行，因为有人密告，說德朗克在安內克被捕后的那个晚上訪問过被捕者的妻子，并且在她那兒打听過逮捕的情况。法庭方面对这位要被控告的証人解释說，“馬克思及其同謀者”一語应理解为：只在某种情况下才对負責发行人科尔夫起訴，而同时却准备对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假定作者总編輯卡尔·馬克思起訴。

可是，德朗克說，他沒有說出真象的义务，因为他作为編輯，可能被怀疑曾参与該文的写作，而他并不打算自己供認。

載于 1848 年 8 月 13 日  
“新萊茵报”第 7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关于 1848 年 8 月 28 日馬克思在 維也納民主联合会上的发言

(簡要报道)

維也納 8 月 29 日。在民主联合会昨天的會議上，討論了联合会应不應該向皇上或国会提出撤換施瓦策大臣，或者更确切些說，撤換整个多布尔霍夫內閣的問題。尤利烏斯·弗呂貝尔先生和馬克思先生以来宾身分出席了會議，并参与了辯論，为各种不同的观点辯护。

尤利烏斯·弗呂貝尔先生贊成联合会把这个問題提交皇上，但是馬克思先生則断言：民主的原則已体現在国会中<sup>①</sup>。柏林的所謂民主主义者中的“理論家們”在实践中力图与各邦君主“妥协”，这一点在这里誰也沒有感到奇怪。

載于 1848 年 9 月 5 日  
“新萊茵报”第 9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① 馬克思的这一段发言，維也納的民主报纸“激进报”是这样报道的：“馬克思先生說，誰当部长都是一样，因为現在在这里也象在巴黎一样，問題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斗争。他的发言非常俏皮、尖銳而有教益”。——編者注

# 关于 1848 年 8 月 30 日馬克思 在第一屆維也納工人联合会 上的演說

(簡要报道)

馬克思博士談到工人的問題，也談到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問題。

巴黎的国家工厂和最近发生的工人革命。他說：德国工人能够以大批流放者是他們的同胞而感到驕傲。

英国的宪章派，他們最近的言論。英国与欧洲工人的彻底解放。比利时……<sup>①</sup>

載于 1848 年 9 月 1 日  
“宪法报”第 1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宪法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① 維也納的民主刊物“人民之友”是这样报道馬克思的演說的：“‘〔新〕萊茵报’編輯馬克思博士向联合会會員致敬，并且說：他認為能够在維也納工人联合会发表演說是他的光榮，就象他以前在巴黎、倫敦和布魯塞爾工人联合会发表演說一样”。——編者注

## 辟 謠

“布勒斯劳报”第 201 号刊登了一篇柏林通訊，里面談到騎士施納普汉斯基<sup>288</sup>收买了大量的“新萊茵报”股票，所以描写他的小品文就不再出現了，因为报纸是不会攻击自己的股东的。假民主的“杜塞尔多夫日报”認为轉載这种誣蔑性的言論是自己的职责。在柏林，人們可以任意造謠，可是西里西亚的报纸应该知道这种言論是謊話以及为什么是謊話。这种背信弃义的誹謗可惜出現得太迟了，早在收到第 201 号“布勒斯劳报”之前就已出版的第 92 号“新萊茵报”已經登載了上述小品文的續文。此外，“新萊茵报”是党的机关报，它已經充分証明是收买不了的。

### “新萊茵报”負責发行人

載于 1848 年 9 月 3 日  
“新萊茵报”第 93 号附頁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法庭对“新萊茵报”的迫害

科倫 9 月 5 日。由于馬克思及其同謀者的案件，預审推事昨天又传訊了本报編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可是这一次被传訊不是作为証人，而是作为被告人之一。預审已經結束，如果檢察机关提不出新的罪状，高等审判厅就必須在最近期間做出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和科尔夫是否應該因被控侮辱或誣蔑最高检查官茨魏費尔先生和 6 位宪兵先生而出席陪审法庭受审。

載于 1848 年 9 月 6 日  
“新萊茵报”第 9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

科倫 9 月 14 日。我們再來談談昨天的民众大会和它的結果，因为它在本市已經引起很大的興趣。

剛過中午 12 點鐘，民众大会就在弗蘭肯廣場舉行，威·沃尔弗先生宣布开会；他扼要地報告了开会的目的，然後提議選舉亨·毕尔格尔斯先生为主席，大会一致通过；毕尔格尔斯登上講台，請沃尔弗先生繼續发言。沃尔弗先生这次提議選舉安全委员会作为科倫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沒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組織。这个提議得到了弗·恩格斯先生以及海·貝克尔先生和恩·德朗克先生的支持，并且在全場不下五六千人的暴风雨般的掌聲中通过，只有 5 票反对；虽然再三邀請，但是沒有人表示異議。隨即确定委员会的人数为 30 人，并且选出了这 30 个委員<sup>289</sup>。因为在当选人中有两个人——哥特沙克和安內克已被逮捕，所以补选了两个人来代替他們。

隨後，弗·恩格斯先生提出了下列致柏林議會書的草案：

为协商制定普魯士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議會。

我們科倫市市民鑒于：

为协商普魯士宪法而召开的議會已責成內閣執行 8 月 9 日的決議，立即針對軍官的反動意圖發布命令<sup>①</sup>，以便安定全

① 見本卷第 460—461 頁。——編者注

国,并且避免內閣和議会的分裂;

奧爾斯瓦特-漢澤曼內閣已因这一決議辞职,国王已授命刚刚解除帝国大臣职务的貝凱拉特先生組織新內閣;

貝凱拉特先生这个人無論如何不能保証执行議会的決定,相反地,由于他有某些反革命的观点,甚至可能解散議會;

人民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間的宪法事宜的議會,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議會平行,而是凌駕于議會之上;

因此,解散議會就是政变;——

我們要求:

在有人企图解散議會的时候,議員們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大会一致通过了这封呼吁書,然后就閉幕了。

虽然市民联合会<sup>290</sup>的大批代表占据着廣場上較高的地方,并且的确有許多知名的“抱怨派”竭尽全力用收买和引誘的办法来鼓动一些人鬧事,虽然有相当多的便衣警察到場,可是大会开得非常机警,使一切搗乱的企图无法实现。

同时,市民自卫团的指揮官先生們也在市自治局里开会討論对策,因为有些人确信騷乱是不可避免的。正当會議爭論得很激烈的时候,大門打开了,市民联合会的首脑們冲进大厅,他們說,成立安全委员会就是革命的第一步,科倫在危急中,紅色共和国眼看就要宣告成立,假如市民自卫团靠本身的力量不能維持秩序,市民联合会可以完全听从馮·維特根施坦先生的指揮!但是,馮·維特根施坦先生明智地拒絕了这一建議,而且拒絕号召市民自卫团拿



起武器。后来的事件证明了市民自卫团这一次的行动是多么正确。

市民联合会的先生们对此感到不满，还在民众大会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张贴出下面我们所引的“抗议书”。这种没有任何人签名的抗议书 5 分钟后就到处都不见了。傍晚，它又以传单形式出现，由“科伦日报”印刷所用黑体字印成，并且分送给该报的订户。这一次，“抗议书”还加了这样一段可笑的前言：

所谓的民主主义者竭力利用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最近的决议所引起的愤激，来夺回他们接连失去的阵地，并且无论如何要制造冲突。所以，他们利用并且故意以闻所未闻的方式来渲染本月 11 日科伦军民冲突<sup>291</sup>的危险性和重要性，是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今天早晨甚至贴出布告，说要在 12 点钟召开露天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用呐喊的方式选出一个安全委员会，而选入安全委员会的都是事先串通好列入早已拟就的名单的人。

毫无疑问，谁也不会承认这种避开现在的政府而依靠偶然集结的人群的呐喊选出来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只要敢于以这样的身分进行活动，就会立即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防止犯罪胜于事后惩罚，因为犯罪是会造成巨大牺牲的。

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警告全体公民，使他们注意这种可怕的危险。为此，特发表抗议书和呼吁书如下：

## 抗 议 书

### 成立安全委员会是革命的第一步

我们号召一切渴望真正自由和秩序的人全力支持现在的政府，反对少数人的罪恶阴谋，抗议成立安全委员会。

我们特别号召市民自卫团的全体士兵忠于职守，全力保卫法制和秩序。捏造的来自军队的危险已经消除，而真正的危险却是由于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而产生的。

科伦市民联合会理事会诸理事

1848 年 9 月 13 日于科伦

安全委员会在昨天晚上組成，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份可笑的抗議書归档，这一定会使市民联合会的先生們安心了。委员会选举了主席、書記和 3 个执行委员会委員，然后，通过了致区督察員、市卫戍司令、市政局、市民自卫团指揮官的信，这封信通知他們安全委员会已經成立，并且声明，委员会将尽量取得各机关的同意，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执行自己的任务——維持治安，同时保障人民的权利。委员会还决定張貼宣传画，把这些情况告訴科倫居民。明天，我們將公布这两个文件。

今天早晨，人心不安的情况已經稍有緩和。現在大家都感到昨天的忧虑是可笑的。昨天，人們忧虑委员会会变成临时政府，变成 Comité du salut public [公安委员会]，变成建立紅色共和国的阴谋，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变，总不会变成这个委员会本来的面目：一个由人民公开、直接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代表在合法的政权机关中沒有代表的那部分居民的利益，它只进行合法的活动，除了道义上的影响之外，决不妄想攫取任何权力，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是結社的权利、法律和选民的信任所允許的。

載于 1848 年 9 月 15 日  
“新萊茵报”第 1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沃林根民众大会

科倫 9 月 18 日。昨天，在沃林根附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民众大会。莱茵河上的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都载着数百人从科倫順流而下；船头紅旗招展。約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茵多夫等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参加。大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与会的至少有 6—8 千人。

科倫的卡尔·沙佩尔当选为主席，科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选为書記。根据主席的提議，大会以多数票对一票通过成立共和国，即成立社会民主的紅色共和国。

根据科倫的恩斯特·德朗克的提議，沃林根大会一致贊成上星期三弗兰肯广场民众大会所通过的致柏林議会書（信上要求柏林議会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能解散）<sup>①</sup>。

根据科倫的約瑟夫·莫尔的提議，承認了在公开的科倫民众大会上选出的安全委员会，并且由一个与会者带头，向委员会 3 次欢呼致敬。

根据科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提議，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心書：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議会。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591—592 頁。——編者注

在此集会的德国公民茲声明如下：

如果普魯士和德国由于普魯士政府反对国民議會和中央政权的決議而发生冲突，我們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848年9月17日于沃林根

根据希特多夫的舒尔泰的提議，作出了“科倫日报”不代表萊茵省利益的決定。

此外发言的还有：科倫的威·沃尔弗，杜塞尔多夫的斐·拉薩尔，約伊斯的埃塞尔，科倫的卫尔、瓦赫特尔、貝克尔和賴希黑尔姆，弗雷亨的瓦尔拉夫，沃林根工人联合会的會員弥勒，萊茵多夫的列文，克雷弗尔德的伊曼特。在紐約的亨利·布里茲倍恩，民主社会主义的“紐約論壇报”的著名編輯作了簡短的发言后，討論宣告結束。

开会的时候，从可靠方面得到的消息說，“第二十七团在星期二又将开入科倫，該团的其他几个营也要集中，准备挑起軍民之間的冲突，借此宣布該城戒严，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总而言之，准备把美因茲的那一套拿来对付我們”。

参加大会的科倫近郊的居民答应，只要这个消息被証实，冲突一旦发生，他們就援助科倫人。的确，沃林根人是准备一有召喚就到科倫来的。

此事請通知前市民自卫团指揮官維特根施坦先生。

載于1848年9月19日  
“新萊茵报”第10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科倫民众大会关于 法兰克福起义的決議

請翻印

### 宣 言

鉴于 16 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通过決議批准和丹麦实行可耻的休战是背叛德国人民和有辱德国武装力量荣誉的行为，参加 9 月 20 日科倫<sup>①</sup>民众大会的德国公民特作出如下的决定：

1. 法兰克福的所謂国民議会的議員，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該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

2. 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本宣言請广为散发，作为布告张贴，并公諸报端。

“新萊茵报”发行科代收援助起义者及其家屬的捐款<sup>②</sup>。

載于 1848 年 9 月 23 日  
“新萊茵报”第 1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① 在同时散发的标题为“民众大会決議”的传单上，在“科倫”两字之后加上了“由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倡議召开的”等字。——編者注
- ② 在传单上这一句是这样印的：“‘新萊茵报’发行科准备代收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及其家屬的捐款，并把捐款轉送西里西亚的代表施略費尔分发。其他的民主报纸显然也不拒絕这样做”。——編者注

## “新萊茵報”負責發行人關於 報紙停刊的通知

**我們尊敬的訂戶！**

由於科倫宣布戒嚴，筆杆不得不服從槍杆，

**“新萊茵報”**

被禁止發行了，本報目前已無法對尊敬的訂戶履行自己的義務。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非常狀態只會延續幾天。這幾天過後，在 10 月份，本報由於資金大量增加，將擴大篇幅出版，並且因為我們最近準備採用新型的快速印刷機來印刷，本報會比以往更準時地分送給訂戶。

**負責發行人**

1848 年 9 月 28 日於科倫

以傳單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傳單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呼吁訂閱“新萊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新萊茵报”在科倫戒严期間被武装的反动派极不負責地查封了几天。戒严状态自本日起解除。現在, 本报又将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維護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这正是目前特別需要的, 因为我們大家都看到, 武装的反动派最近是多么蛮横无理地侵犯人民依法爭得的自由。我們把这个情况告訴維護民主的人, 号召他們广泛訂閱刚开始的第四季度的报纸, 因为本来就遭受各方面迫害的民主报纸格外需要它的拥护者的积极支持。

科倫一季的訂費为 1 塔勒 15 銀格罗申; 普魯士其他各地为 1 塔勒 24 銀格罗申 6 分尼; 普魯士以外的地方酌加邮費。

第四版各栏八号字一行(或者相应的篇幅)广告費为 1 銀格罗申 6 分尼。

“新萊茵报”負責发行人 海·科尔夫

1848 年 10 月 3 日于科倫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通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下开人犯，犯有刑法第 87、91 和 102 条所載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茲根据科倫市檢察官緝拿該等之命令，即請各有关机关和官員，采取措施，进行查訪。一經拿获，請予逮捕，解交本人。

代理最高檢察官

国家檢察官 黑克尔

1848年10月3日于科倫

計开：I. 姓名：約翰·亨利希·蓋尔哈特·毕尔格尔斯……

II. 姓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貫：巴門；宗教信仰：新教；年龄：27岁；身長：5 英尺 8 英寸；头发和眉毛：棕色；前額：正常；眼睛：灰色；鼻和嘴：匀称；牙齿：健全；胡須：栗色；下顎和臉：橢圓形；脸色：健康；身材：匀称。

載于 1848 年 10 月 4 日

“科倫日报”第 27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科倫日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黑 名 单

科倫 10 月 13 日。一位消息极为灵通的朋友从布魯塞尔来信說：

“恩格斯和德朗克之所以被捕，并且被押上囚車运出国境，只是因为他們不慎說出了自己的姓名。一个据說曾参加营救瓦赫特尔的科倫工人施米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原来布魯塞尔警察局掌握了一大批从科倫逃来的人的名单，所以比利时警察也完全知道施米茨准备参加营救瓦赫特尔的事情。”

这份黑名单是誰写的，是誰寄来的，难道代理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不知道嗎？……

載于 1848 年 10 月 14 日  
“新萊茵报”第 1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馬克思就当选科倫工人联合会 主席发表的演說

(摘自 1848 年 10 月 16 日科倫工人  
联合会委员会會議記錄)

临时主席勒澤尔先生宣布，馬克思博士接受联合会派去的代表团的請求，同意領導本会。因此，勒澤尔先生請馬克思就任主席。

馬克思博士說，他在科倫的处境是不穩定的。前任部长屈韦特尔对他的恢复公民权的請求所作的答复，就象是一道隱蔽的驅逐令。自然，他要向国民議會抗議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他因被誣告破坏出版法，必然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此外，由于“新萊茵报”編輯委员会的工作迄今还被迫处于停頓状态，他的工作已过度繁重。但是，他願意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时滿足工人們的願望。政府和資產階級应当相信：尽管他們百般迫害，总有人願意听工人的吩咐。

接着，馬克思博士詳細地介紹了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革命活动，結束时強調指出了工人在不久前的維也納革命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因此，他提議向維也納工人联合会致敬（提議被一致通过）……

关于會議的議程，主席提議第一小时討論与联合会有關的問

---

題(即联合会的內外事务),第二小时討論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并且建議會議在 8 点半鐘开始(提議被通过)……

載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科倫  
工人联合会会刊”第 4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1848年10月22日科倫工人联合会 全体會議記錄摘要

主席馬克思博士宣布开会，接着对間接选举制发表了一些意見。

勒澤尔先生說：我們接受邀請，派代表出席本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这里产生一个問題：工人联合会单独派代表呢，还是和民主协会联合派代表？在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最近的一次會議上通过了第一个方案，即决定单独行动，可是这一决定要經過全体會議批准才能生效，而且还應該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問題，即派代表所需要的費用問題。因此我提議：

派一个代表出席，他只代表我們联合会，其費用采取自願捐助的办法来解决。

提議被通过了，并且規定捐款至少为1銀格罗申……

大家推举博伊斯特先生为出席柏林代表大会的代表。

會議批准馬克思博士为联合会主席，勒澤尔先生为副主席……

載于1848年10月29日  
“自由、博爱、劳动”第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自由、博爱、劳动”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 馬克思就維也納事件发表的談話

(摘自 1848 年 11 月 6 日科倫工人  
联合会委员会會議記錄)

……主席馬克思博士扼要地報告了維也納事件的經過，并且特別強調指出，只是由于維也納資產階級屢次叛變，文迪施格雷茨才得以奪取該城……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2 日  
“自由、博愛、勞動”第 6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自由、博愛、勞動”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注 释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 注 释

- 1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至29日之間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綱領。3月30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月初发表在“柏林閱报室”、“曼海姆晚报”、“特利尔日报”和“德意志总汇报”等民主报纸上。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綱領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倫印成了传单并分发给莱茵省一些地方的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會員。除了一些詞句上的更动外，传单的原文第10条的条文也与1848年4月所发表的原文略有不同（見本卷第4頁）。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倫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問題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議通过一个綱領，这个綱領中的措施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倫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討論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特别是第1条和第4条）。

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萊比錫由魏勒印成小册子，原文有所删节：文件开头的口号、第9条的第2段、第10条的最后一句話都被删掉了，另外，在签名中少了“委员会”这几个字。——第3頁。

- 2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埃蒂耶納·卡貝的信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是根据芒特辽(法国塞納河省)历史博物館送给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原稿的照相副本发表的。根据声明和信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这一点来判断，这两个文件是在1848年3月底，即在恩格斯到达巴黎以后写的。在这个时候，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

会的其他委員正进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斗争，因为該协会的领导人海尔維格和伯恩施太德企图利用在法国組織的軍团把共和政体輸入德国。“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的前任編輯伯恩施太德由于这种計謀于3月16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領導人的倡議，1848年3月初在巴黎建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它的章程是由馬克思起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俱乐部来竭力团結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闡明无产階級在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并且同海尔維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险計划相反，組織德国工人个别地回国去参加那里的革命斗争。——第6頁。

- 3 馬克思的这封信曾发表在1848年6月29日的“黎明报”上，信前面的編者按語中这样說：“我們发表下面这封科倫来信是为了表明高尚的德国人对意大利人的感情，他們热望受欧洲专制君主們挑拨离間而相互撕杀的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間建立友好关系。”由李·阿利納里署名的“黎明报”編輯部的回信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有引証（見本卷第179頁）。

“黎明报”（《L'Alba》）是意大利的一家民主报纸，1847年至1849年在佛罗倫薩出版，主編是拉法林。——第8頁。

- 4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倫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馬上就着手实现他們的計划，即出版一种革命的机关报，他們認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他們选定了科倫作为办报的地址，因为这是萊茵省的主要城市，也是德国政治上和經濟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萊茵省有出色的无产階級干部，而且拿破仑法典在那里还有效力，这个法典比可怜的普魯士法提供了較多的出版自由。为了強調繼承革命传统、強調这一报纸与1842至1843年由馬克思主編的“萊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之間的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新的机关报称为“新萊茵报”。他們在創辦这个机关报的时候必須克服某些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毕尔格尔斯和赫斯等人）的反对，这些人打算以类似的名稱出版一

种狹隘的地方性的科倫报纸。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与此相反，他們着手創辦一种大型的政治性报纸，这种报纸不仅会影响萊茵省，而且会影响全德国。在1848年4月到5月之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为报纸征股，挑选通訊員，同其他国家的民主报纸建立經常的联系。被派到德国各个城市去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在为报纸征股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来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从同盟的委員們，如威·沃尔弗、德朗克、沙佩尔、波尔恩等人的信中可以知道，在地方上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嘗試当时沒有成功，原因是当时德国工人缺乏組織性和政治上落后。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拥护者估計到这种情况，就以民主派的左翼即实际上是民主派的无产階級一翼的身分在政治舞台上出現。这样也就确定了“新萊茵报”的方針，报纸在出版时加上了“民主派机关报”这个付标题。

民主派无产階級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萊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們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和欧洲革命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地报道給自己的讀者，編輯部常常在一天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到四版也登載不下的时候就出附頁，收到了新的重要消息便以传单的形式出号外。决定报纸对革命最重要問題的立場的社論通常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这些社論都标有“\*科倫”和“\*\*科倫”作为記号。由于馬克思担任总的领导和組織工作（特别是在报纸創辦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当时大部分社論都是恩格斯写的。以一个小星为記号的編輯部的文章有时也登載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报道栏）。編輯除了修改通訊稿和帮助总編輯做組織工作之外，每个人都专门負責研究某一方面的問題。恩格斯写有关柏林国民議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辯論的評論，也写有关捷克、波茲南、意大利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的文章，有关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文章，而在1848年11月至1849年1月間則写了一系列有关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写关于德国革命中的土地問題、关于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特别是关于西里西亚的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的文章，并且还領導了“国内新聞”栏的工作。格奥尔格·維尔特写詩体和散文体的小品文。恩斯特·德朗克一度当过“新萊茵报”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訊員，他写了一些关于波兰的文章，1849年3

月至5月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評論。斐迪南·沃尔弗有很长一个時間担任報紙駐巴黎的通訊員。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参加報紙的工作,但是据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是經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1848年10月参加了編輯部的工作,在报上发表了她的革命詩歌。

“新萊茵报”是集股創办的。可是,当登載有弗·恩格斯写的“法兰克福議会”(見本卷第14—18頁)一文的第1号報紙問世以后,相当大一部分資产階級股東就不再支持報紙了。而“新萊茵报”捍卫巴黎的六月起义者这一行动使得剩下来的大部分股東也离开報紙。

“新萊茵报”的坚决而不妥协的立場,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魯士政府以及科倫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報紙在創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資产階級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当局以不承認馬克思的普魯士公民权来刁难他,不讓他在萊茵省居住,并且还对報紙的編輯,首先是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連串的訴訟。在科倫九月事件之后,軍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倫戒严,并且封閉了許多民主報紙,其中也有“新萊茵报”。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險,因此他們不得不暫時离开科倫;威廉·沃尔弗到普法尔茨去躲避了一个时候,后来又又在科倫藏了几个月,躲避警察局的通緝。戒严解除后,報紙从10月12日起又开始出版,这應該归功于馬克思,他以忘我的努力克服了一系列組織上和經濟上的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現款都用来办报。在1849年1月以前,由于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編輯部的重担(包括写社論)主要都落在馬克思一人的肩上。

在普魯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警察局对“新萊茵报”編輯們的控訴和迫害更变本加厉了。1849年2月政府对馬克思、恩格斯、科尔夫和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提出了控訴,結果是陪審法庭宣告被告人无罪。

尽管警察局百般迫害和阻挠,“新萊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的被驅逐和“新萊茵报”其他編輯的被迫害,造成了

報紙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紅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萊茵報，報紙的編輯在致工人們的告別書中說，“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第13頁。

- 5 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5月19日會議上，拉沃建議同時被選入柏林議會和法蘭克福議會的普魯士議員有權享受雙重資格。本文中提到的（見本卷第17頁）普魯士內政大臣奧爾斯瓦特在1848年5月22日發表的聲明中也作了同樣的說明。

在本文中以及在以後論述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辯論的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速記記錄，這些速記記錄以後以單行本出版：“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的德國制憲國民議會的會議速記記錄”1848—1849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1848—1849）。——第15頁。

- 6 順民的馴服是普魯士內政大臣馮·羅霍夫說的一句話，這句話在德國是家喻戶曉的。——第16頁。
- 7 預備國會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舉行的德國各邦社會人士會議。預備國會的絕大多數代表屬於君主立憲派。預備國會作出了召開全德國民議會的決定，並制定了“德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要求”的草案，這個草案只是一紙空文，它僅僅在口頭上宣布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但是沒有觸及當時德國半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第16頁。
- 8 代表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所謂“議會受托人”(hommes de confiance de la diète)會議是由德意志聯邦中央機關——聯邦議會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集的。在聯邦議會的主持下，“受托人”於1848年3月3日至5月8日舉行了會議，按照君主立憲的精神制定了德意志帝國憲法草案。——第16頁。
- 9 1815年5月22日普魯士國王頒布詔書，答應成立“人民代議機關”，即

- 在普魯士建立省等級會議，成立全普魯士的代議机构和实施宪法。但結果只是根据 1823 年 6 月 5 日的法律，成立了具有有限的諮議职能的省等級會議(省議會)。——第 19 頁。
- 10 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21 頁。
- 11 圣仰派(由 *santa fede* “神圣的信仰”一語而来)指 19 世紀初教皇政权为鎮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的恐怖队的成員。——第 22 頁。
- 12 1792 年 8 月 10 日 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政体的日子。  
1830 年 7 月 29 日 法国波旁王朝被推翻。  
1820 年 在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是由 19 世紀初在意大利建立的秘密組織的成員烧炭党人領導的。由于神圣同盟各国的干涉，革命被鎮压下去了。——第 23 頁。
- 13 威廉·特里和阿尔諾得·維凱里得 是关于 13 世紀末 14 世紀初瑞士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爭取解放的战争的民間傳說中的人物。——第 23 頁。
- 14 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訂立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約。这种条約从 15 世紀中叶一直存在到 19 世紀中叶；在 18—19 世紀的許多資產階級革命中，瑞士的雇佣兵曾充当保皇派反革命的工具。——第 23 頁。
- 15 指托尔瓦德森作的描繪死獅子的雕象，这个雕象建立在琉森街上以紀念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巴黎为保卫皇宫免受人民进攻而死亡的瑞士士兵。——第 23 頁。
- 16 1848 年 2 月 24 日 是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第 23 頁。
- 17 这篇文章最初是由毕尔格尔斯写的。据馬克思后来說，他在校閱这篇文章时刪去了一半，另一半由他重新改写过。——第 25 頁。
- 18 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見解”第 1 卷第 11 章。——第 28 頁。

19 指 1848 年 5 月 22 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魯士国民議會，議會的任务是“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1848 年 4 月 8 日頒布的选举法根据受間接(兩級)选举法限制的普选法确定了議會选举条例。大多数議員都是資產階級和普魯士官僚的代表。

在写这篇文章以及后面那些关于普魯士国民議會辯論的文章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后来用单行本出版的速記記錄：“普魯士制宪議会的會議記錄” 1848 年柏林版 (《Verhandlungen der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für Preußen》. Berlin, 1848)。——第 28 頁。

20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諷刺康普豪森，称他为考察历史的朋友，暗指当时有名的卡·罗泰克的著作“从历史認識的萌芽时期到現在的通史；供考察历史的朋友参考” 1813—1818 年夫賴堡和君士坦士版 (K. Rotteck,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 für denkende Geschichtsfreunde》. Freiburg und Konstanz, 1813—1818) 一書中的小標題。——第 28 頁。

21 “国家报”(《Staats-Zeitung》) 是普魯士国家总汇报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的簡称。該报于 1819 年在柏林創刊。从 1819 年到 1848 年 4 月是普魯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从 1848 年 5 月到 1851 年 7 月以“普魯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的名称作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出版。——第 28 頁。

22 第二屆联合議會是在康普豪森內閣时期于 1848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这是由普魯士各省議会的代表組成的等級机关。这屆議會通过了普魯士国民議會选举条例，并同意政府发行遭到 1847 年联合議會拒絕的公債。在这以后，議會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被解散。——第 30 頁。

23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十七章。——第 30 頁。

24 根据傳說，公元前 390 年，当高卢人进犯羅馬时，卡皮托里(羅馬城中一个設有防御工事的小丘，城市的捍卫者驻扎在这里)由于尤諾納教堂里的鵝的叫声惊醒了卫兵而得救。——第 31 頁。

- 25 根据希腊神話，斯巴达女皇勒达和宙司的子女是由鷄蛋孵出来的。  
卡斯托尔是勒达的兒子，古希腊的英雄；双子宫星座中一个星的名字也叫卡斯托尔。——第31頁。
- 26 指議會总管——普魯士省議会的議長。——第32頁。
- 27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維也納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由于沒有中央政府，保存有36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德意志邦，从而巩固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发展。——第38頁。
- 28 格罗斯-培倫和登內維次是普魯士的居民点，在柏林附近；联盟軍隊(包括普魯士部队在內)在格罗斯-培倫(1813年8月23日)和登內維次(1813年9月6日)的战役中打敗了拿破仑的軍隊。——第38頁。
- 29 引自哥·奥·毕尔格尔的叙事詩“列諾尔”。——第41頁。
- 30 在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中，除了勃魯姆、福格特等人的左翼而外，还有卢格、施略費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第44頁。
- 31 联邦議會是根据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国許多邦的代表所組成，会址設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联邦議會沒有实际的权力，它只是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議會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則和反对德国民主联合的目的。——第45頁。
- 3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十六章。——第46頁。
- 33 馬克思和恩格斯称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辯論为“妥协辯論”(«Vereinbarungsdebatten»), 普魯士国民議會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开的。柏林議會采取了这种作法，从而否認了人民主权的原則，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称柏林議會为“妥协議會”(«Vereinbarungs-versammlung»), 而把拥护这种妥协作法的議員叫做“妥协派”(«Vereinbarer»). ——第49頁。



- 34 海外貿易公司 (*Seehandlung*) 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托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部門的經紀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改为普魯士的国家銀行。——第51頁。
- 35 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波茲南爆发了波兰人反抗反动的普魯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不仅有領導起义的波兰小貴族,还有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魯士政府于1848年3月作了讓步,允許成立委员会在波茲南进行改革:組織波兰軍隊,任命波兰人担任行政及其他职务,承認波兰語为波茲南的正式語言。为了欺騙波兰人放下武器,在雅罗斯拉韦茨协定中許下了类似的諾言(見注释196)。1848年4月14日国王敕令将波茲南公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波兰,西部归“德国”,在西部不准进行“改組”。波茲南起义遭到血腥的鎮压后,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綫愈来愈向东移动,最后几乎席卷了波茲南大公国的整个領土。給波兰人許下的“改組”的諾言也就沒有兌現。——第54頁。
- 36 “妥協論”(«*Vereinbarungstheorie*»)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澤曼为代表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用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辯护的論据,它主张普魯士国民議會应当只限于“在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来确立立宪制度。——第60頁。
- 37 在該号“新萊茵报”的内容提要中本文标题为“对波兰的重新瓜分”,而正文的标题則是“对波兰的第七次瓜分”。——第62頁。
- 38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1848年6月9日第161号。  
“科倫日报”是一家德国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出版;在1848—1849年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經常激烈地反对“新萊茵报”。——第64頁。
- 39 亚尼雅士是希腊神話中特洛伊城的保卫者之一,是安契西士和女神阿芙罗狄蒂的兒子;在希腊人侵占和掠奪特洛伊城的时候,他逃了出来,經過了长时期的漂泊才在意大利登陆。詩人味吉尔的詩“亚尼雅士之歌”就是描繪亚尼雅士的漂泊經過的。——第64頁。
- 40 改写自荷馬的长詩“伊利亚特”。——第64頁。

- 41 指宫廷反动权奸的首領之一、三月革命时期逃往英国的普魯士亲王子于1848年6月4日回到柏林一事而言。——第65頁。
- 42 这是按照歌德的长詩“狐狸-萊涅克”开头几句话改写的。——第66頁。
- 43 暗指講柏林方言的人（这里是指柏林的拥护专制制度的反动派。——譯者注）。——第66頁。
- 44 合并取消派（出自 *Repeal of Union*——取消合并一語）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拥护者。合并是英国政府鎮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剝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議會。从19世紀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得人心的口号；在1840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66頁。
- 45 五十人委员会是預备国会于1848选出的。其中大部分委員属于預备国会中主张君主立宪的多数派。五十人委员会否决了联邦議會关于建立由3人組成的执政內閣作为德意志联邦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提案。在1848年6月初，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选出的委员会通过了类似的提案。經過討論，議會于1848年6月28日通过了关于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和帝國內閣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決議。——第66頁。
- 46 “全民财产”是柏林的武装工人写在逃跑的普魯士亲王的宫墙上的題詞。——第66頁。
- 47 指1848年4月在巴登由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武装起义被鎮压一事；起义的主要地区是滨湖地区(*Seekreis*)和黑森林。——第66頁。
- 48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是資产階級自由主义的日报，是主张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1847年創刊，1850年停刊，1848年10月前在海得尔堡出版(由著名的資产階級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主編)，后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第67頁。

- 49 1848年6月9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否決了未來的和丹麥和約須經國民議會批准的提案，從而放棄了解決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問題的干涉，給了聯邦議會以充分的行動自由。——第71頁。
- 50 1848年6月3日柏林國民議會討論了是否參加大學生組織的到三月革命陣亡戰士墓去遊行示威的提案；這個提案以多數票被否決。——第76頁。
- 51 引自普魯士國歌。——第79頁。
- 52 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奧國皇帝斐迪南一世被迫在1848年5月16日和6月3日的宣言中宣布奧國國會為制憲議會。——第80頁。
- 53 這篇文章把1848年6月14日在科倫舉行的法兰克福國民議會的補選結果同5月10日舉行的這個議會的普選作了比較。——第90頁。
- 54 市民聯合會 (Bürgervereine) 是三月革命後在普魯士產生的溫和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組織，其任務是在君主立憲範圍內維護“法制”和“秩序”，以及同“無政府狀態”，就是說同革命的民主運動作鬥爭。——第90頁。
- 55 科倫民主協會於1848年4月成立，它經常在什托爾維爾卡大廳舉行會議。民主協會的成員除了小資產者外，還有工人和手工業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協會，目的是影響加入該協會的無產階級分子並促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堅決行動。馬克思積極參加協會的領導工作。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萊茵報”其他編輯人員的努力下，在民主協會會議上通過了揭露普魯士政府的賣國政策，譴責柏林議會和法兰克福議會的立場不堅定的決議。1849年4月，馬克思及其擁護者採取實際行動着手創立無產階級政黨後，就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斷絕組織關係，並退出了民主協會。——第90頁。
- 56 1848年6月14日，因普魯士國民議會背棄三月革命（見本卷第72—89頁）而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業者攻佔了軍械庫，以便武裝人民捍衛革命的成果並把革命推向前進。但是柏林工人的發動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及時趕到的援軍和資產階級的市民自衛團一起迅速地擊退

- 了人民，解除了他們的武裝。——第 92 頁。
- 57 普魯士國民議會在柏林勞動群眾革命發動的影響下於 1848 年 6 月 15 日通過了一項決議，其中寫道，國民議會“不需要武裝力量的保護，而把自己交給柏林人民來保護”。——第 92 頁。
- 58 法國制憲議會在日益增長的農民運動的壓力下於 1789 年 8 月 3 日夜間鄭重地宣布廢除一些實際上已為起義的農民所取消的封建義務。隨後頒布的法令只是無償地廢除了一些個人的義務。直到雅各賓專政時期，根據 1793 年 6 月 17 日頒布的法令，才完全無償地廢除了一切封建義務。——第 92 頁。
- 59 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柏林的街壘戰所嚇倒，於 1848 年 3 月 21 日發布了“告陛下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書”，答應成立等級代議機構，實施憲法，確立內閣責任制，規定公開的和口頭的訴訟手續以及陪審制等。——第 92 頁。
- 60 維舍格勒 位於布拉格南部弗爾塔瓦河右岸，那里有一個同名的古堡。  
格拉德申（捷克人稱格拉德查尼）位於布拉格城西北部，是全城最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古代宮殿。——第 94 頁。
- 61 斯拉夫人代表大會於 1848 年 6 月 2 日在布拉格舉行。在代表大會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壓迫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運動中的兩種傾向展開了鬥爭。溫和的自由主義右派（屬於該派的有代表大會的領導者帕拉茨基、沙夫里克）企圖以維護和鞏固哈布斯堡王朝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民主主義左派（薩賓納、弗利契、里別爾特等）堅決反對這一點，他們竭力主張同德國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運動一致行動。代表大會中屬於激進派和積極參加布拉格起義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布拉格其餘的代表即溫和的自由主義派代表於 6 月 16 日宣布代表大會無限期休會。——第 94 頁。
- 62 *Code civil*——拿破侖民法典，這個法典曾在法國人占領的德國西部和西南部地區實行；在萊茵省歸併普魯士後，這個法典在該省境內繼續有效。——第 108 頁。
- 63 根據普魯士將軍普富爾的命令，給被俘的 1848 年波茲南起義的參加者

剃光头发,并用硝酸銀在他們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从此以后,硝酸銀(von Höllenstein)就成了普富尔將軍的綽号。——第 110 頁。

- 64 引自斐·賴蒙德的“来自小仙人世界的姑娘,或一个农民-百万富翁”一剧。——第 112 頁。
- 65 1848 年 3 月 30 日 是康普豪森內閣开始活动的日子。——第 112 頁。
- 66 米兰临时政府是在倫巴第人民反对奥地利統治意大利的起义获得胜利后于 1848 年 3 月 22 日成立的;奥地利軍隊被驅逐出米兰,以哈·卡薩齐为首的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参加了政府。——第 114 頁。
- 67 潘都尔兵 ——奥地利軍隊中的一种部队編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規步兵。——第 114 頁。
- 68 引自海涅的“奥拉夫騎士”一詩。——第 117 頁。
- 69 “新柏林报”(«*Neue Berlin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848 年 6 月至 10 月在柏林出版。——第 118 頁。
- 70 紐盖依特 是倫敦的監獄。——第 119 頁。
- 71 人們用“德意志报”編輯盖尔温努斯的名字来称呼該报(見注释 48)。——第 120 頁。
- 72 这是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7 年 4 月 11 日联合議会上发表御前演說时所說的話。在这个演說中,国王宣称:决不同意实施宪法,他把宪法叫做“写滿字的紙片”。——第 120 頁。
- 73 暗指康普豪森,因为他在青年时代曾做过油类和谷物生意;又暗指汉澤曼,因为他是从做羊毛生意开始他的商业活动的。——第 120 頁。
- 74 关于“科倫日报”見注释 38。——第 121 頁。
- 75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場(“瑪尔特的花园”)。——第 121 頁。
- 76 建立农业銀行的法案中規定建立抵押信貸机构,是为了在最有利于地主的条件下来贖买农民的义务。——第 124 頁。
- 77 指 1844 年 6 月下半月布拉格紡織工人的自发起义。有毀坏工厂和破

坏机器等現象的工人运动，被奥地利的政府軍隊残酷地鎮压下去了。  
——第 126 頁。

78 “柏林閱报室”(«*Berliner Zeitungs-Halle*») 是一家德国的日报。从 1846 年起由哈·尤利烏斯在柏林出版；在 1848—1849 年間是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之一。——第 127 頁。

79 这是 1848 年 3 月在維也納成立的市民、国民自卫軍和大学生委員會的簡称，这个委員會的任务是維護安全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第 127 頁。

80 指在路易·勃朗主持下在卢森堡宮召开的政府工人問題委員會；它是临时政府在工人要求成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于 1848 年 2 月 28 日成立的。这个由工人和企业家的代表組成的所謂卢森堡委員會的实际活动无非是仲裁劳工和厂主的爭执，它的仲裁常常有利于厂主，这是由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促成的。1848 年 5 月 18 日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巴黎工人在这次游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后，政府于 1848 年 5 月 16 日取消了卢森堡委員會。

国家工厂是 1848 年二月革命結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組織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軍事方式組織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階級。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階級的挑拨性的計劃沒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反而更加受到革命感情的熏陶，资产階級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如减少工人人数，把他們派到外省去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作等)。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階級的极大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鎮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禁止集会法是法国制宪議會因懼于法国无产階級日益增长的不滿情緒而在 1848 年 6 月 7 日通过的；該法令禁止一切露天的集会和群众大会，违者处 10 年以下的徒刑。——第 131 頁。

81 «*Aimables faubourgs*» (“可爱的郊区”) 是路易-菲力浦对巴黎郊区的称呼。——第 132 頁。

- 82 别动队 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1848年2月25日建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六月起义。——第132页。
- 83 指巴黎的皇宫，1643年起路易十四在这里居住，1692年起变为波旁王朝奥尔良系的财产。1848年二月革命后，宣布为国家财产，改名为国民宫。——第132页。
- 84 指意大利林蔭路上的图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停止营业的时候，証券买卖就在这家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人们称这个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为“小交易所”，以区别于正式交易所。——第133页。
- 85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由奥康瑞尔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1845年9月至1848年3月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 “北极星报”在1848年6月24日的简讯中写道：“宣布自己为‘民主派机关报’的‘新莱茵报’，在编排的技巧方面是少见的，并且以胆识过人著称；我们向它致敬，它是我们在反对各种暴政和非正义行为的坚决斗争中的敬爱的、有才干的和英勇的同志。”——第136页。
- 86 指1813年10月16—19日的莱比锡会战，参加这个战役的有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军队。结果联军获胜，拿破仑的军队败北。——第138页。
- 87 所谓共和国近卫军是根据被5月15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吓倒的法国政府的命令在1848年5月16日成立的部队。这支部队共有2600人，由警察厅长指挥。共和国近卫军在反革命军官的指挥下，曾在巴黎执行警察的职务。——第140页。
- 88 人权和公民权协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组织，由巴尔贝斯和尤伯尔等人领导，产生于七月王朝时期。协会联合了首都和各省的许多民主俱乐部，目的在于实现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协会不同于其他许多小资产阶级组织，它不放弃和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该协会的某些会员曾是六月起义的领导者。例如拟订六月起义计划的

- 退伍軍官盖尔索济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第141頁。
- 89 薩拉哥沙保卫者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統治的解放戰爭中以英勇堅毅著稱；該城曾遭法軍兩次圍攻（1808年6—8月和同年12月）；1809年2月薩拉哥沙在犧牲了4萬多人以後，才向優勢的法軍投降。——第143頁。
- 90 巴黎市近衛軍是1830年七月革命後成立的，直屬於警察局長；曾被用來鎮壓人民的起義。1848年二月革命後市近衛軍被解散。——第146頁。
- 91 指法國國民議會1848年6月25日的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告發表在6月29日的“新萊茵報”上。——第148頁。
- 92 魯維叶島與塞納河右岸之間有一條小支流，1844年該島與陸地相聯，在莫爾蘭林蔭路和亨利四世沿河街之間形成一塊陸地。——第150頁。
- 93 “國民報”（《National》）派聯合了以阿爾芒·馬拉斯特為首、以工業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同它有關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為支柱的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在40年代，這個派的信徒聚集在“國民報”（“Le National”）的周圍，該報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第153頁。
- 94 “改革報”（《Réforme》）派聯合了以賴德律-洛蘭為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主義者；附和該派的有以路易·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這個派的擁護者聚集在“改革報”（《La Réforme》）的周圍，該報自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第153頁。
- 95 指執行權委員會，即制憲議會為了代替已經卸下全權的臨時政府而在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專政確立時為止。——第153頁。
- 96 王朝反對派是在七月王朝時期法國議院中由奧迪隆·巴羅領導的議員集團。這個集團的代表們反映了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情緒，他們主張實施溫和的選舉改革，認為這種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奧爾良王朝的手段。——第154頁。



- 97 正統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第154頁。
- 98 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俱乐部。——第156頁。
- 99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貿易维护者(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創刊于曼彻斯特。——第160頁。
- 100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創刊于倫敦。——第160頁。
- 101 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它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創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163頁。
- 102 “辯論日报”(«*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称，1789年創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該报代表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163頁。
- 103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糾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163頁。
- 104 引自德国小资产阶级詩人尼·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一詩；这首詩在1840年写成后被多次譜成歌曲，曾被民族主义者所广泛利用。——第163頁。
- 105 “人民制宪报”(«*Le Peuple constituant*»)是法国共和派的日报，1848年2月至7月在巴黎出版，主編是拉梅耐。——第165頁。
- 106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和馬克思的一篇文章(見本卷第153—157頁)以同

- 一名称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本文的小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167 頁。
- 107** 指 1832 年 6 月 5—6 日的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团体，其中包括“人民之友”社；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馬克將軍的出殯是起义的导火綫；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許多街垒，非常英勇頑强地进行了保卫战。——第 168 頁。
- 108** 指 1795 年葡月 12—13 日(公历 10 月 3—4 日)拿破仑鎮压巴黎的保皇派起义。——第 172 頁。
- 109** 反对法国革命的奥普军队总指揮不倫瑞克公爵于 1792 年 7 月 25 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威胁法国人民，要把巴黎彻底毁灭。——第 177 頁。
- 110** 指 1785 年荷兰反对聚集在威廉·奥倫治总督周围的貴族天主教政党的統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資产階級共和主义者領導的，起义結果，总督被驅逐出国；但是 1787 年在普魯士军队的帮助下又恢复了他的权力。——第 177 頁。
- 111** 根据英法俄 3 国的協議，未成年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被立为希腊国王。奥托在巴伐利亚军队的护送下到达希腊。称号是奥托一世。——第 177 頁。
- 112** 指由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扮演主要角色的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在 1820 年 10 月在特劳波召开、1821 年 5 月在来巴赫閉幕的會議上公开宣布了参加神圣同盟的各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內政的原則。根据这个原則，来巴赫會議通过了奥地利派兵干涉意大利的決議；維罗那會議(1822 年)通过了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決議，其目的是鎮压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177 頁。
- 113** 奥地利和普魯士在 19 世紀 20—30 年代支持了葡萄牙的以唐·米格尔为首的封建教权派，这个派反对对专制制度的任何限制。——第 177 頁。
- 114** 在西班牙，唐·卡洛斯为了篡夺王位，以利于反动的封建教权派，1833 年在奥地利和普魯士的支持下发动了內战。——第 177 頁。

- 115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俄、普共管的克拉柯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柯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在1846年11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柯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178页。
- 116 指米兰临时政府在1848年4月6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宣言。见“临时政府出版的法令、通知、宣言和通报等汇编”米兰版第1卷第172—175页(«Raccolta dei decreti, avvisi, proclami, bullettini ec. ec. emanati dal governo provvisorio» T. I, Milano, p. 172—175)。——第179页。
- 117 引自科西迪耶尔1848年6月27日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见“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228页(«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Vol. II, Paris, 1849, p. 228)。——第181页。
- 118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二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67—68页。——译者注)。——第184页。
- 119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15世纪末叶由西班牙国王建立的城市同盟;国王当时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维护专制制度。从16世纪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的职能。后来就引伸出来称警察为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第190页。
- 120 指安内克1848年6月25日在居尔策尼希大厅科伦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会上讨论了由科伦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建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第191页。
- 121 *Code pénal* 是1810年法国通过的刑法典,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

- 于萊茵省。普魯士政府曾經力图在萊茵省推行普魯士的法律，企图用一系列的法律、命令、指示来在萊茵省恢复貴族的封建特权(长子繼承权)，实行普魯士的刑法、婚姻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了萊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 1848 年 4 月 15 日的命令取消了这些措施。——第 191 頁。
- 122 安內克曾經作为 1848 年 3 月 3 日科倫群众发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哥特沙克、維利希一起被捕。控告他們的罪名是“煽动暴乱，組織非法团体”。由于国王大赦，1848 年 3 月 21 日 3 人全部获释。——第 192 頁。
- 123 克茲林宣言是 1848 年 5 月 23 日克茲林(在波美拉尼亞)城內的反革命容克地主和官僚告普魯士居民的呼吁書，書中号召他們向柏林进军，以便鎮压革命。——第 195 頁。
- 124 指普富尔將軍对被俘的波兰起义者所采取的一种侮辱性的措施——剃光头。——第 197 頁。
- 125 1848 年夏天在柏林除了普通的警察以外，又建立了一支身穿便衣的武装部队，他們的任务是防止人民群众在街头集会和武装发动，并且进行間諜活动。这支警察队伍所以叫做便衣警察，是因为他們同英国的特別警察相似；后者在破坏 1848 年 4 月 10 日的宪章派示威游行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 200 頁。
- 126 “世紀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在 19 世紀 40 年代中，該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 204 頁。
- 127 “新聞报”(«*La Presse*»)是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 1848—1849 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在 19 世紀 40 年代，艾·日拉丹曾任該报的編輯。——第 204 頁。
- 128 “观察家”(«*Observateur*»)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比利时观察家”(«*L'Observateur Belge*»)的简称，1835—1860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在 19 世紀 40 年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第 204 頁。

- 129 普魯士国民議會 1848 年 7 月 4 日的會議繼續討論了波茲南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問題；會議結束時，議會決定授予該委員會以全權代表的權力；在這個标志着奧爾斯瓦特-漢澤曼內閣的失敗的決定通過之後，右派代表違反議會的議事規則，堅持表決限制委員會職權的提案。左派議員離開會場以示抗議。右派則利用這個機會通過了一個提案，不准委員會啟程赴波茲南，也不准它傳訊見証人和鑑定人。這樣就非法地取消了議會最初通過的決定。關於議會討論波茲南委員會問題的情況見本卷第 54—59、213—217 和 220—229 頁。——第 204 頁。
- 130 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第二十五章。——第 205 頁。
- 131 海涅“湯豪塞”第二章。——第 206 頁。
- 132 “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日報，1770 年到 1862 年在倫敦出版。——第 207 頁。
- 133 指“北方蜜蜂”；該報是俄國的政治和文藝報紙，由布爾加林和格烈奇主編，1825 年到 1864 年在彼得堡出版；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機關報。——第 207 頁。
- 134 執行普魯士國王秘密使命的陸軍少校維登布魯赫于 1848 年 4 月 8 日遞交丹麥政府的一份照會中表明，普魯士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作戰的目的似乎不是為了奪取丹麥的公國，而只是為了反對“德國的激進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魯士政府竭力迴避正式承認這個損害它的名譽的文件。——第 207 頁。
- 135 這裡指的是刊載于 1848 年 7 月“新萊茵報”上的恩·德朗克的几篇連載文章：“普魯士的鎮壓和波茲南的改組”(《*Die preußische Pacificirung und Reorganisation Posens*》)。——第 220 頁。
- 136 引自海涅的詩“安心”(參看馮至譯“海涅詩選”1956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 107 頁。——譯者注)。——第 226 頁。
- 137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倫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對普魯士專制政體抱有對立情緒

- 的資產階級人士創办的。該报會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萊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質。政府当局对“萊茵报”进行了特別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查封了。——第230頁。
- 138** 1842年10月20日“萊茵报”发表了一个由政府方面极为秘密地拟制出来的极端反动的离婚法草案。于是各报对該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的討論。“萊茵报”发表离婚法草案和編輯部坚决拒絕說出該草案的投寄人是該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第230頁。
- 139** 康普茨是美因茲中央审訊委员会(見注释261)委員，是1819年审判所謂“蠱惑家”——資產階級反对派的代表——的最热心的組織者之一。  
黑紅黃三色會是德国民族統一运动的标志。——第231頁。
- 140** 1848年7月9日在居尔策尼希大厅(科倫)召开的民众大会上，根据民主协会的建議，通过了一个告普魯士国民議會書；該書中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揭露奥尔斯瓦特-汉澤曼政府的反革命行动，并且呼吁普魯士議會宣布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失掉全国的信任”。——第232頁。
- 141** 引自海涅的“鼓手长”一詩(參看錢春綺譯“新詩集”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版第189頁。——譯者注)。——第246頁。
- 142** 指的是定期交易，进行这种交易时商品或有价証券并不易手，全部活动只是在交易所行情和商品价格之間的差价上进行投机。——第248頁。
- 143** 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通过決議，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約翰被推选担任此职)和帝國內閣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临时中央政权沒有自己的預算和軍隊，沒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国各邦君主反革命政策的传声筒。——第258頁。
- 144** 引自海涅的“1829年”一詩。——第261頁。
- 145** 确立了共同关稅綫的德国各邦于1834年成立了关稅同盟。这个同盟是由于必須建立全德市場而产生的，它逐漸地包括了除奥地利和某些

- 小邦以外的德国各邦。普魯士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第 263 頁。
- 146 引自海涅的“給格奥尔格·海尔維格”一詩。——第 267 頁。
- 147 在德国絕大多数的邦中，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选举不是直接选举。1848 年 4 月 8 日的法律規定，普魯士国民議会的选举也是兩級制。——第 267 頁。
- 148 忠实的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紀傳說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象。——第 275 頁。
- 149 海涅“哈尔茨游記”。——第 281 頁。
- 150 “祖国报”(«*Faedrelandet*»)是丹麦报纸，1834 年至 1839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最初是周报，后来改成日报；1848 年該报是丹麦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 286 頁。
- 151 海峡稅 是指 1425 年至 1857 年丹麦向通过海峡的外国船只征收的通行稅。——第 291 頁。
- 152 1848 年 4 月 2 日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为首的共和派少数为了抗議自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預备国会。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軍隊人数的決議，請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給以軍事援助，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的这些措施成了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所领导的 1848 年 4 月 12 日共和派起义的导火綫。这次起义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得不够和組織得不好，到 4 月底即被鎮压下去。——第 295 頁。
- 153 “协和报”(«*La Concordia*»)是意大利資产階級自由派的日报，1848—1849 年間在都灵出版。——第 299 頁。
- 154 工人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 日在柏林举行，該會議是根据許多工人組織的倡議而召集的。會議的綱領是在斯蒂凡·波尔恩的影响下拟定的，它給工人們規定了爭取实现許多狹隘的工会要求的任务，以使他們脫离革命斗争。这个綱領曾在“新萊茵报”上发表过，发表时沒有注明是柏林的通訊。——第 299 頁。

- 155 1848年7月21日“科倫日報”第203号。——第301頁。
- 156 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論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I.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Amsterdam, 1771)。——第308頁。
- 157 弗萊里格拉特的詩篇“不管这一切”中的叠句。——第309頁。
- 158 調节制 (Sliding-Scale) 是英国谷物法存在期間实行过的一种規定谷物稅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谷物稅的高低同国内市場的谷物价格标准成反比例。在关于調节制的法律中,有一項法律是1842年由皮尔內閣实行的。——第312頁。
- 159 塞万提斯“示范小說”。关于狗的談話的故事。——第312頁。
- 160 引自海涅的詩集“还乡曲”(«Heimkehr»)。——第315頁。
- 161 对于普魯士政府提出的关于把波茲南大公国并入德意志联邦的建議,波茲南等級代表會議于1848年4月6日表示反对。——第318頁。
- 162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民主組織和工人組織的89位代表。代表大会通过決議,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立区域委员会和它們的領導机关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設在柏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員的有弗呂貝尔、劳、克利盖,他們的助手是拜尔霍費尔、許帖和安內克。但是由于小資产階級領導的軟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即使在通过这个決議以后也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組織的。——第323頁。
- 163 德国的温和資产階級分子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联合成立了以柏林立宪俱乐部为中心的立宪主义者协会和俱乐部,并成立了市民联合会(見注释54)。普魯士的各个社团(Preußenvereine)和凶恶的容克反革命机构(維護私有制和保障各階級福利的联盟)宣布了浸透着普魯士精神的反动綱領。在萊茵省許多城市中都有天主教的組織——庇护九世联盟(Piusvereine),它們宣布了帶有社会蠱惑性的立宪綱領。——第324頁。



- 164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48页。——译者注)。——第326页。
- 165 1834年通过的英国济贫法规定,只准用一种方式救济穷人——把穷人收容到被人民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的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中。——第332页。
- 166 “1841年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1841*》)是宣传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机关报;1841年至1852年在巴黎出版;1849年以前由埃·卡貝主编。——第334页。
- 167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出版的通报”(《*L'Union. 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是1843年12月至1846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月刊,由从圣西门学派分化出来的一个工人团体出版。  
“人民的蜂房”(《*La Ruche populaire*》)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工人月刊;1839年12月至1849年12月在巴黎出版。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nisme*》)是巴貝夫派的一工人月刊;1845年1月至1848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334页。
- 168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它反对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第335页。
- 169 争取用立法手段把工作日限定为10小时的斗争,在英国早在18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而从19世纪30年代初以来就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因为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力图利

- 用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号，所以他們在国会中維護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关于童工和女工的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在 1847 年 6 月 8 日由国会通过的。——第 335 頁。
- 170 引自海涅的詩“安心”。海涅在这首詩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儈作风和因循习惯，并拿古羅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們相比照。——第 341 頁。
- 171 *Ceterum censeo* 是老卡托通常在議会中結束他的每一次講演时所慣用的一句話的开头几个字：*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可是，我認为迦太基必須被消灭)。——第 341 頁。
- 172 指“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該报是 1619—1866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国报纸，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閣——的机关报。  
涅謝尔罗迭給俄国駐德国各邦大使的通告載于 1848 年 7 月 28 日該报第 210 号。——第 342 頁。
- 173 指 1813 年 3 月 13(25)日在卡里斯城发表的“告德国人書”。俄国沙皇和普魯士国王号召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允諾給他們自由和独立以籠絡民心。——第 343 頁。
- 174 根据和尼古拉一世同时代的一些人証明，尼古拉一世在得到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向出席宮庭舞会的軍官們叫道：“先生們，准备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第 344 頁。
- 175 暗指普魯士亲王逃往英国——見注釋 41。——第 345 頁。
- 176 1772 年普魯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第 345 頁。
- 177 見注釋 134。——第 345 頁。
- 178 指 1847 年 2 月 3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开联合議会的詔書，其中援引了普魯士在 19 世紀 20—40 年代頒布的关于等級代議制的法令。国王把召开联合議会(普魯士各省等級議会的联合議会)說成是实现以前許下的立宪諾言。——第 346 頁。
- 179 1848 年的春天和夏天，严重的經濟困难(几乎各地都歉收)和天灾(发

- 生了霍乱和毁灭性的火灾)使得俄国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年的特征是农民运动高涨,彼得堡和里加霍乱“猖獗”,某些省(例如弗拉基米尔省)爆发人民起义。波兰王国当时是酝酿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第 348 頁。
- 180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二場(“花园”)。——第 350 頁。
- 181 这里指的是反动派(格尔拉赫弟兄、拉多維茨和其他等人)包围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事。——第 354 頁。
- 182 本文中蒲魯东的演說是根据通訊报道引述的。蒲魯东在 1848 年 7 月 31 日法国国民議会上的演說全文載于“国民議会會議記錄”1849 年巴黎版第二卷第 770—782 頁(«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Vol. II, Paris, 1849, p. 770—782)。——第 355 頁。
- 183 蒲魯东主編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于 1848 年 4—8 月在巴黎出版。——第 356 頁。
- 184 馬克思于 1847 年在“哲学的貧困”一書中对蒲魯东的經濟观点和哲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第 358 頁。
- 185 1807—1811 年施泰因大臣和哈登堡大臣在普魯士实施了不彻底的土地区改革。1807 年农民的人身农奴依附地位被取消了,但重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切义务仍被保留下来。1811 年給了农民贖买封建义务的权利,其条件是:向地主繳納相当于平常每年所繳納的租費的 25 倍的金額,或出讓給地主一半土地。——第 361 頁。
- 186 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別是在西里西亚,人們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称为 *Dreschgärtner* (打谷者),他們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和一間茅屋,因而必須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錢或实物。——第 364 頁。
- 187 維斯佩尔(*Wispel*)是 1872 年以前德国的谷物計量单位;在普魯士, 1

- 維斯佩尔等于 1319 公升。——第 366 頁。
- 188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Le Moniteur belge. Journal officiels*») 是以法国政府的机关报为榜样的比利时日报的名称，该报是官方的机关报，1831 年创办于布鲁塞尔。——第 367 頁。
- 189 崇法狂者是比利时对一切都崇拜法国的人的綽号。——第 370 頁。
- 190 指在比利时为庆祝 1830 年宣告独立的紀念日而举行的传统的盛典；在节日里举行狂欢游行。——第 370 頁。
- 191 恩格斯所講的普魯士宪法，是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屡次提出的关于在普魯士实行等級宪法的諾言，但是这个諾言并没有兌現。——第 372 頁。
- 192 在俄罗斯、普魯士和奥地利 1815 年 5 月 3 日在維也納簽訂的条約中以及在 1815 年 6 月 9 日維也納代表大会的最后決議案中，都包含有在波兰全境建立人民代議制和民族国家机构的諾言。在波茲南，問題归結为召开具有諮議职能的等級代表會議。——第 378 頁。
- 193 見注釋 115。——第 379 頁。
- 194 指丹麦作家路·霍尔堡的喜劇“唐·腊努多·迭·科利勃腊多斯，或称貧穷和驕傲”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妄自尊大的沒落貴族的典型。——第 379 頁。
- 195 这是波兰国歌的歌詞。——第 381 頁。
- 196 雅罗斯拉韦茨協定是 1848 年 4 月 11 日由波茲南委员会和普魯士軍事代表維利森將軍簽訂的。該協定規定，解除波兰起義部队的武装和解散他們的部队。交換条件是：答应波兰人在波茲南实行“民族改組”，即建立波兰部队，委任波兰人担任行政和其他职务，在行政和訴訟事宜中使用本民族語言。但是普魯士当局背信弃义地撕毀了这个協定；普魯士軍隊利用和起義部队所达成的協議，残酷地鎮压波茲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答应波兰人实行“改組”的諾言也就沒有实现。——第 383 頁。

- 197 “归并議會”是路易十四在 1679—1680 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來論証法国对邻国某些領土要求的合理性，論証以后，随即由法国軍隊进占这些領土。——第 385 頁。
- 198 恩格斯用諷刺的口吻这样称呼由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而引起的普魯士和丹麦的战争。——第 386 頁。
- 199 1791 年的波兰宪法 反映了波兰小貴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資產階級的意向。这个宪法废除了利別龙委多（联邦議会的決議案必須一致通过的原則）和国王的被选举权，規定政府向联邦議會負責，并給予城市資產階級以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权利。这些措施反对大貴族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1791 年的宪法由于承認地主和农民之間所簽訂的贖賣契約具有約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稍微緩和了。——第 390 頁。
- 200 約·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 年巴黎-里尔版第 1—2 卷 (J. Lelewel. «Histoire de Pologne». T. 1—2, Paris—Lille, 1844)。  
“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爭論”。該書写道，有人想什么就講什么，但也有人不能把所想的全部講出来。1848 年萊比錫版。(«Débat entre la révolution et la contrerévolution en Pologne». Par quelqu'un qui ne dit que ce qu'il pense, mais qui ne peut pas dire tout ce qu'il pense. Leipzig, 1848)。——第 395 頁。
- 201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中人数最多的一派，即自由資產階級 中間派，分裂成两个派別：中間派右翼（其中有达尔曼、亨利希、加格恩、巴塞尔曼、馬提、梅維森、施梅林等人）和 中間派左翼（其中有米特迈尔、威納尔、拉沃等人）。中間派議員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第 395 頁。
- 202 “弗洛特韦尔总督先生关于 1830 年 12 月至 1841 年年初治理波茲南大公国的备忘录”斯特拉斯堡版 («Denkschrift des Oberpräsidenten Herrn Flottwell, über die Verwaltung des Gros-Herzogthum Posen, vom Dezember 1830 bis zum Beginn des Jahres 1841», Strasburg)。——第 398 頁。
- 203 根据帝国陸軍大臣波伊克尔 1848 年 7 月 16 日的命令，德国所有各邦的

- 部队应在 1848 年 8 月 6 日的閱兵典礼上向帝国摄政王約翰大公宣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妄图由自己来掌握德意志联邦武装部队的最高統率权，所以禁止原定于 8 月 6 日在普魯士举行的閱兵典礼。——第 401 頁。
- 204 指 1845—1846 年威·約丹在萊比錫出版的月刊“可理解的世界。論述科学問題的杂志”(«Die begriffene Welt. 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Unterhaltung»)。——第 403 頁。
- 205 全德国民議会自 1848 年 5 月 18 日至 1849 年 5 月 3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第 403 頁。
- 206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場(“瑪尔特的花园”)。——第 408 頁。
- 207 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詩中的一个主人公——善于吹牛的罗多芒特的名字来称呼利希諾夫斯基。——第 409 頁。
- 208 議員布倫坦諾在法兰克福国民議会 1848 年 8 月 7 日的會議上主张对参加巴登共和起义的人們和起义的領袖黑克尔进行特赦。起初，議会的右派議員对布倫坦諾鳴鼓而攻，后来强迫他离开講台。——第 414 頁。
- 209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 1848 年 8 月 2 日通过的“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第 6 条規定，废除等級特权和一切与所担負的职务无关的貴族称号。——第 415 頁。
- 210 唐·卡洛斯 1833 年因覬覦西班牙王位而反对国王斐迪南的女兒伊薩伯拉，他援引了 1713 年关于禁止母系繼承王位的法律。利希諾夫斯基在 1838—1840 年参加了唐·卡洛斯发动的內战，获得了准将的軍銜。——第 417 頁。
- 211 引自阿倫特“德国人的祖国”一詩。——第 418 頁。
- 212 阿尔比教派战争是 1209 年至 1229 年北方法兰西的封建主和教皇对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又称阿尔比教派，因南法城市阿尔比而得名)进行的战争。阿尔比教派运动是市民和小騎士阶层反对天主教教

- 会和封建国家的一种特殊形式。战争在 1229 年以朗基多克并入法国国王的領地而結束。——第 420 頁。
- 213 在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党的选举宣言”(1848 年 4 月)中提出,国民議會的主要任务是“修改事件的理性”。——第 426 頁。
- 214 这里指的是关于瑞士联邦形成的一个传说。瑞士联邦是由 3 个山地州——什維茲、烏利和温特瓦尔頓在 1291 年締結条約而建立的。据传说,3 个州的代表于 1307 年在留特利(又称格留特利)的草原上聚会,宣誓在反对奥地利統治的联合斗争中忠实于联邦。——第 426 頁。
- 215 这是按照海涅的話改写的;海涅在 1843 年欢迎卢格时,說他是“善于把黑格爾的話譯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第 427 頁。
- 216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議会的會議速記記錄”1848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2 卷第 1186 頁(«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II, Frankfurt am Main, 1848, S. 1186)。——第 429 頁。
- 217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和“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簡称,該杂志自 1838 年 1 月至 1841 年 6 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萊比錫出版,自 1841 年 7 月至 1843 年 1 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該杂志在 1841 年 6 月以前由阿·卢格和特·厄赫帖迈耶尔在哈雷編輯,从 1841 年 7 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頓編輯。——第 430 頁。
- 218 見注释 203。——第 432 頁。
- 219 莫扎特的歌剧“費加罗的婚礼”第一幕費加罗咏叹調。——第 433 頁。
- 220 “黑色”是指天主教修道士;黑黄色是奥地利国旗的顏色。——第 434 頁。

- 221 引自弗萊里格拉特的詩篇“薔薇”。——第 438 頁。
- 222 这里所列举的是 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执政內閣时期、拿破仑执政时期、帝制时期——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的会战。1792 年 11 月 6 日在热馬普，1794 年 6 月 26 日在弗略留斯，1796 年 4 月 13—14 日在密雷栖摩，1797 年 1 月 14—15 日在里沃利，1797 年 4 月 18 日在諾依維特，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馬連峨，1800 年 12 月 3 日在霍恩林屯，1805 年 10 月 17 日在烏尔姆，1805 年 12 月 2 日在奧斯特里茨，1809 年 7 月 5—6 日在瓦格拉姆，奥地利軍隊都吃了敗仗。——第 439 頁。
- 223 宗得崩德 (*Sonderbund*) 是瑞士經濟落后的 7 个天主教州在 1843 年組織的单独联盟，目的是反抗在瑞士实现进步的資產階級改革，維護教堂和耶穌会教徒的特权。1847 年 7 月瑞士联邦議會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決議是宗得崩德 11 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軍事行动的导火綫。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軍隊被联邦政府的軍隊所击潰。——第 439 頁。
- 224 沃尔塔和庫斯托查是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小村。奥地利軍隊在拉德茨基的統率下于 1848 年 7 月 25 日在庫斯托查打败皮蒙特軍隊，7 月 26—27 日又在沃尔塔打败了它；1848 年 8 月 6 日奥地利軍隊占領了米兰。——第 439 頁。
- 225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七章(參看艾思奇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1954 年作家出版社版第 40—41 頁。——譯者注)。——第 441 頁。
- 226 1848 年 8 月 21 日，柏林为了抗議反动派組織的对沙洛頓堡(当时在柏林郊区)民主俱乐部人員的袭击，召开民众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要求罢免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懲罰沙洛頓堡肇事的官員；他們向奥尔斯瓦特以及其他大臣的住所扔石头。办事內閣用种种迫害来对付八月事件。——第 442 頁。
- 227 引自阿倫特的詩篇“狂欢之歌”。——第 443 頁。



- 228 撒丁王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停战协定是在奥地利军队占领米兰之后，于1848年8月9日签订的。原订的停战期限（6个星期）后来被延长了；1849年3月12日协定被废除后，又开始了军事行动，但不久以后撒丁军队就被击溃，查理-阿尔伯特退位，新任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于3月26日又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第445页。
- 229 1848年8月9日至30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案，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政府为了镇压民主主义者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借口是由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于1848年3月29日同守卫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里斯康土村附近的部队发生冲突。——第447页。
- 230 科伦当局不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问题引起了科伦民主主义者的愤慨。科伦民主协会曾派代表请求地方当局取消对马克思的警察措施（见本卷第582—583页）。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尔于1848年9月12日批准了区行政机构的决议作为对马克思的申诉的答复。接着，普鲁士政府就利用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这一点，把他当作“违反外人居留法”的人驱逐出普鲁士国境。驱逐马克思和迫害其他编辑便成了“新莱茵报”停刊的原因。——第451页。
- 231 1848年8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议员的提案——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违反议会的决议，没有发布这项命令。为此施泰因在国民议会9月7日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提案；提案表决结果，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被迫辞职；继任的普富尔内阁终于在1848年9月26日颁布了这项命令，但语气比较和缓，而且只是一纸空文。——第460页。
- 23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九章。——第463页。
- 233 “晨报”（《Morgenbladet》）是挪威的报纸，1819年在克利斯提阿纳（奥斯陆）创刊；在19世纪30至40年代曾是所谓“人民党”的机关报。——第465页。
- 234 关于维登布鲁赫的照会见注释134。——第467页。
- 235 这几篇连载文章的第二、第三、第四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标题是“危机”。——第469页。

- 236 1830年7月26日 法国国王頒布了废除出版自由、解散議會、修改选举法并减少  $\frac{1}{4}$  选民的敕令。查理十世政府的这些非常措施引起了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  
1848年2月24日 法国路易-菲力普王朝被推翻。——第473頁。
- 237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內閣的意見，認為普魯士国民議會1848年9月7日的決議(見本卷第460—461頁)破坏了“君主立宪的原則”，他贊同內閣以辞职来抗議議会的这种行动。——第474頁。
- 238 指1789年7月9日至1791年9月30日的法国制宪議會。——第476頁。
- 239 这句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对大臣們請求辞职的答复相似：国王同意辞职的理由，同时建議大臣們在新內閣成立以前仍然执行自己的职务。——第479頁。
- 240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是以該报創辦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在19世紀40年代，該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針。——第479頁。
- 241 “施本納报”(«*Spencer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新聞”(«*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以該报出版者施本納得名，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該报遵循的是君主立宪的办报方針。——第479頁。
- 242 这是克倫威尔于1653年4月20日在驅散长期国会的娄罗时說的話。——第482頁。
- 243 这几篇連載文章的第一篇沒有标题，因为它是在“新萊茵报”的附頁上发表的，附頁中沒有所刊載的文章的篇名。——第485頁。
- 244 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称民主共和派为煽动者

- (Wühler), 而民主共和派則称自己的敌人為 抱怨派 (Heuler)。——第 490 頁。
- 245 被科倫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漲吓得魂不附体的当局, “为了保护个人和财产”, 于 1848 年 9 月 26 日宣布戒严。卫戍司令部发布命令, 禁止一切旨在追求“政治和社会目的”的結社活动, 禁止集会, 解散市民自卫团并令其交出武器, 建立軍事法庭, “新萊茵报”以及其他許多民主报纸被禁止出版。——第 492 頁。
- 246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倫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 是德国的革命民主报纸, 1848—1849 年由弗·安內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倫出版。报纸的任务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在城乡劳动者及军队中进行宣传。——第 492 頁。
- 247 指“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 1848 年 4—10 月出版, 1848 年 7 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編, 7—9 月由約·莫尔主編。这家报纸报道了科倫工人联合会和萊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第 492 頁。
- 248 “萊茵守卫者”(«*Der Wächter am Rhein*») 是德国的民主报纸, 由卡·克拉麦尔主編, 1848—1849 年在科倫出版。除其他材料外, 报纸还发表了关于科倫民主协会會議的报道。——第 492 頁。
- 249 由于維也納爆发了人民起义, 奥国皇帝于 1848 年 10 月 7 日逃奔奧里繆茨(奥罗木茨)。奥地利帝国国会中的大部分捷克議員(捷克民族自由党党员)也由維也納逃往布拉格。——第 494 頁。
- 250 海涅“湯豪森”第三章。——第 494 頁。
- 251 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德斯特尔在 1848 年 9 月 29 日的會議上要求政府解除科倫的戒严和追查科倫警备司令部的非法行动。——第 496 頁。
- 252 科倫的一些具有反革命情緒的资产者(施图普、阿蒙等)在 1848 年 10 月 2 日向普魯士国民議會提出呈文說, 似乎得到萊茵省議員博尔夏特和吉尔支持的德斯特尔的关于解除科倫戒严的建議, “沒有反映市民們的情緒和观点”。——第 496 頁。

253 科倫工人联合会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盟員安·哥特沙克于1848年4月13日創立的。联合会起初約有會員300人，到5月初就增至5000人，他們大多數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由各种职业的代表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而从1848年10月26日起是“自由、博爱、劳动”报。联合会在城市中有許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莫尔于7月6日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科倫9月事件发生前，由于有被捕的危險，不得不逃往国外。由于工人的要求，馬克思于10月16日暫代联合会主席职务。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5月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內克、沙佩尔、莫尔、列斯納、严森、勒澤尔、諾特荣克、貝多尔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

工人联合会在初期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忽視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的意义，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議会和普魯士国民議会的間接选举的宗派策略，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詞句非常左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代表工人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請願書，只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支持染有手工业者偏見的落后工人的許多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綫的許多會員的反对。在他們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在6月底开始有了轉变。从1848年秋天起，科倫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展开了大規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联合会的會員在科倫郊区組織了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散发革命文献，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見注释1）。联合会同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工人联合会保持有紧密的联系。

1848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隨者展开了旨在分裂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的斗争。从1849年1月起，他們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动”报上对馬克思和“新萊茵报”編輯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誹謗。但是，这个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會員的支持。

为了巩固联合会，馬克思、沙佩尔和其他领导人在1849年1-2月改組了联合会。2月25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

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4月間，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討論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

工人們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經驗，他們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动摇政策的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1849年春实际提出关于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問題。因此，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組織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4月16日科倫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民主联合会总会，加入以萊比錫为中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849年5月6日召开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科倫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自从“新萊茵报”停刊和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倫后，該会就日益失去政治的性质而逐渐变成了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497頁。

- 254 勃兰登堡軍区司令弗兰格尔將軍于1848年9月17日向部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內称普魯士軍閥打算公开取消革命的成果。命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恫吓“违法分子”，并号召士兵团结在軍官和国王的周围。——第497頁。
- 255 引自“科倫街垒”一文，該文发表于1848年9月30日“科倫日报”第268号上。——第498頁。
- 256 見注释144。——第498頁。
- 257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三幕第二場。——第500頁。
- 258 梯也尔的这部著作于1848年9—10月在“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nel»）上发表，后来这部著作于1848年在巴黎以“财产論”（«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的名称出版单行本。——第501頁。
- 259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魯塞尔創刊；在19世紀40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501頁。

- 260 克·約·亞·馬蒂約·德·东巴尔“罗維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农业、农业經濟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1824—1837年巴黎版(C.-J.-A. Mathieu de Dombasle. «Annales agricoles de Roville, ou mélanges d'agriculture, d'économie rurale et de législation agricole». Paris, 1824—1837)。——第504頁。
- 261 美因茲中央审讯委员会是根据1819年德意志各邦卡尔斯巴德代表會議的決議成立的,目的是調查“蠱惑家的陰謀”,即鎮压德意志各邦的反政府运动。美因茲委员会(它的委員由德意志各邦政府任命)不受联邦議会的約束,有权在德意志各邦直接(immediat)进行审讯或逮捕。——第506頁。
- 262 指法兰克福国民議会在1848年10月9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議会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員的法律”。这个法律規定,侮辱国民議會議員或中央政权机关官員的人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議会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鎮压人民群众的措施之一。——第507頁。
- 263 見注释160。——第507頁。
- 264 1848年9月,土耳其軍隊为了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占領了瓦拉基亚。他們在布加勒斯特屠杀居民。土耳其政府專員傅阿德-埃芬蒂发表了一項文告,宣布要建立“合法的秩序”和“消灭革命的一切痕迹”。——第507頁。
- 265 見查·戴韦南特匿名出版的著作“論如何保証一國在貿易平衡中的有利地位”1699年倫敦版第23、50頁(«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London, 1699, pp. 23, 50)。——第511頁。
- 266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十二章。——第515頁。
- 267 “米兰报”(«Gazzetta di Milano»)是意大利的一家報紙,1816年創刊,1875年停刊,19世紀50年代以前是意大利北部的奧地利当局的官方机关报。——第524頁。

- 268 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該协会的領導者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海尔維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們鼓动德国流亡者組成志願軍团。他們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計劃。1848年4月，海尔維格的軍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內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軍隊歼灭。——第525頁。
- 269 “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是民主的報紙，1848年4月在曼海姆出版，主編是弗呂貝尔和佩尔茨，司徒卢威、黑克尔、卢格等人也参加了編輯工作。4月17日該报中登載了一篇巴黎通訊，其中声明德国共产主义者对海尔維格的举动持否定态度。——第525頁。
- 270 指1848年10月26到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員（德斯特尔、賴辛巴赫、赫克扎梅尔）。代表大会討論了关于宪法原則的問題，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在討論社会問題时，博伊斯特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演說（見注释1）。可是，各种不同成分的代表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发生了爭論和分歧。代表大会不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員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局限于制定毫无結果的和矛盾百出的決議。——第527頁。
- 271 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35頁。
- 272 暗指勃律盖曼过去的政治活动。由于他参加了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以及1832年在汉巴赫大典时（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注释157。——譯者注）发表了捍卫出版自由的演說，曾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勃律盖曼在1840年大赦时被释放。——第536頁。
- 273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是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創立的德文報紙，19世紀40年代奉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方針。——第536頁。
- 274 斯拉夫菩提樹是1848年4月底成立的捷克国民协会。布拉格协会的領導权掌握在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沙法里克，加烏奇）的手中，他們在布拉格起义之后轉入反革命陣营，而在各省分会中起領導作用的主要是捷克激进資產階級的代表。——第537頁。

275 施因德汉斯 (Schinderhannes) 即屠夫汉斯, 是德国强盜約翰-毕克列尔的綽号, 生于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这里指的是文迪施格雷茨。——第 537 頁。

276 这里指的是“新萊茵报”駐維也納記者捷列林格的报道, 这篇报道載于 1848 年 10 月 27 日該报第 127 号上。——第 540 頁。

277 弗·恩格斯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是按照手稿譯出的, 手稿沒有写完。在恩格斯写这篇随笔以前, 曾发生下列事件: 1848 年 9 月 26 日, 在科倫曾实行戒严, 并下令逮捕“新萊茵报”的几个編輯, 其中也有恩格斯(見本卷第 600 頁)。恩格斯逃亡到比利时, 但是布魯塞尔的警察当局把他逮捕了, 并在 10 月 4 日把他驅逐出比利时。10 月 5 日, 恩格斯到达巴黎, 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就步行到瑞士。經過日內瓦和洛桑, 約于 11 月 9 日到达伯尔尼, 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恩格斯在日內瓦开始写旅途随笔, 在手稿中, 最初的标题是“从巴黎到日內瓦”。

从附在手稿上的路綫图中的人种名称的記載和漫画可以推測到: 恩格斯中断随笔的写作工作, 是因为接受了馬克思的請求, 开始写“匈牙利的斗争”这篇文章。——第 549 頁。

278 “进军曲” (《*Chant du départ*》) 是 18 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 后来受到法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

“为祖国牺牲” (《*Mourir pour la patrie*》) 是法国爱国歌曲中的叠句, 在 1848 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第 552 頁。

279 韦伯的歌剧“欧里安特”, 海尔敏娜·馮·謝奇作詞; 第一幕第二場。——第 555 頁。

280 “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上附有两张恩格斯亲笔画的关于他所經過的路綫的草图。这两张草图画的是恩格斯从奥克薩里 (法国) 到勒-洛克尔 (瑞士) 的行程的一部分。

在第一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 (尖括弧是恩格斯的删除号, 方括弧是手稿中不大准确的地方的符号):

(1) 从奥克薩里到沙龙的行程及其記号:

《奥克薩里——圣勃里——威尔曼頓——庞特-奥-阿魯耶特——柳西-



勒-布阿——阿瓦倫——〈卢弗勒〉——索耳尧〈向第戎的方向〉——尚波〔尚波，在手稿中是尚托〕——卢弗勒——向第戎的方向——阿尔涅-勒-杜克——沙托（长长的村庄）——在这里我去过邮局——煤矿——旅店飯館——美丽的河谷，葡萄酒——同上——珊安伊——沙龙》。

（2）从博佛尔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記号：

《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拉繆尔〔拉繆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费尔涅——薩科涅——日内瓦》。

此外，在这一张草图上还有几张插图，其中有穿匈牙利制服的騎士的形象。在这里能区别出人种名称的記載：

捷 克 人	}	克 罗 地 亚 人	}	塞 尔 維 亚 人	}	波 兰 人	}
摩 拉 瓦 人		伊 利 里 亚 人		波 斯 尼 亚 人			
斯 洛 伐 克 人		斯 罗 文 人		保 加 利 亚 人		卢 西 人	

在第二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

（1）从奥克薩里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記号：

《奥克薩里——圣勃里——威尔曼頓——庞特-奥-阿魯耶特——柳西-勒-布阿——阿瓦倫——〈卢弗勒〉——索耳尧——阿尔涅-勒-杜克——长长的村庄——伊弗里——拉坎什——珊安伊——沙龙——圣馬尔謝耳——魯安——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两座山——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拉繆尔〔拉繆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日内瓦》。

（2）从穆阿兰到圣克劳第的行程及其記号：

《穆阿兰——磨粉厂——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

（3）从日内瓦到勒-洛克尔及其記号：

《日内瓦——貝尔維宮——科彼——尼翁——罗耳——奥邦——莫尔日——科索涅——拉-薩腊——奥尔勃——伊韦尔登——圣克卢阿——弗廖尔耶——特腊韦尔——勒-庞——勒-洛克尔》。——見第564頁和565頁之間的插图。

- 281 恩格斯改写的歌德的“宣战”一詩中的一节。——第 570 頁。
- 282 “告全体德国工人書”是从巴黎来美因茲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特派員、同盟中央委員瓦劳和盟員克路斯起草的。1848 年 4 月 8 日馬克思和恩格斯赴科倫途中在美因茲停留下来，他們在那里与当地的共产主义者討論了今后的行动計劃。——第 575 頁。
- 283 科倫早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安內克和哥特沙克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員，其中大部分人都处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1848 年 4 月初科倫組織增加了一批从国外回到科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从发表的記錄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倫后不久，就和哥特沙克发生了严重的意見分歧。这个文件是由毕尔格尔斯和莫尔以科倫組織的領導人的身分签署的；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出席了會議。——第 577 頁。
- 284 第一屆萊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8 月 13—14 日在科倫召开。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倫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員會(見注释 285)为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大会的决定使委員會(馬克思在其中起領導作用)的活动不仅限于萊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大会通过了必須在工厂工人中和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決議。——第 580 頁。
- 285 根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決議，6 月底成立了由科倫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該委員會在萊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直暫行区域委員會的职务。——第 580 頁。
- 286 这个決議是科倫民主协会在 1848 年 8 月 11 日的全体會議上通过的，这次會議由馬克思担任主席(見本卷第 582 頁)。——第 584 頁。
- 287 五十人委員會是 1848 年 4 月由临时国会选出的，其中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它在 4 月 6 日的“告德国人民書”中号召德国人民“协助波兰人重建祖国”。——第 584 頁。

- 
- 288 格·維尔特曾經以施納普汉斯基騎士为題在一系列小品文中嘲笑著名的反动分子利希諾夫斯基公爵。小品文“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刊載在1848年8—9月、12月和1849年1月的“新萊茵报”上,文章沒有署名。——第589頁。
- 289 选入科倫安全委員會的还有“新萊茵报”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德朗克和毕尔格尔斯,以及科倫工人联合会的領導人沙佩尔和莫尔。——第591頁。
- 290 关于市民联合会見注释54。——第592頁。
- 291 1848年9月11日,駐扎在科倫的第二十七团士兵和科倫居民发生冲突;市民自卫团中拥护民主的一部分人支持科倫居民。——第593頁。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8年3月—11月)

### 1848

- 3月下半月—4月初** 由于德国革命已經开始，在巴黎的以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組織了三四百名德国工人个别回德国去，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 3月21日左右** 恩格斯由布魯塞尔到巴黎，立即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是未到巴黎来以前就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
- 3月21至29日之間** 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中的政治綱領——“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文件以传单的形式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德国的工人。
- 3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回德国。他們在寄回德国的信里談到了他們打算出版革命的大型日报。
- 3月底—4月5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反对海尔維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險計劃，他們企图依靠武装的德意志軍团把共和制輸入德国；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們对这件事的态度通知他們在德国和法国的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給卡貝，請求他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刊登在他的“人民报”上。这个声明強調指出：在巴黎，和同盟有关的只有一个組織即德国工人俱乐部，共产主义

者同盟和海尔維格及伯恩施太德所領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处。在声明上署名的有卡·馬克思、卡·沙佩尔、亨·鮑威尔、弗·恩格斯、約·莫尔和威·沃尔弗。

在馬克思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的倡議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在美因茲建立了工人教育协会，并以該会的名义向德国全体工人呼吁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組織工人联合会。

- 4月6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參加革命。
- 4月8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逗留在美因茲，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討論今后組織和联合工人联合会的任务。
- 4月1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倫，立即准备出版大型的政治日报。
- 4月11日以后** 科倫市政委員會答应馬克思的請求，給予他在科倫居住的权利。
- 4月上半月** 馬克思所領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派代表(德朗克、威·沃尔弗、沙佩尔等)分赴德国各城市組織新的同盟支部和公开的工人协会。
- 4月15日左右** 为了給报纸募集股份和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恩格斯前往巴門、爱北斐特和萊茵省的其他城市。
- 4月下半月** 恩格斯进行“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翻譯工作。
- 4月24日左右** “新萊茵报”的出版广告問世。
- 4月** 1847年12月馬克思所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演說全文在布魯塞尔付印。由于馬克思忙于准备出版“新萊茵报”的工作，不能繼續整理原稿，該文遂停止付印。
- 4月—5月** 馬克思与德国各城市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 (德朗克、波尔恩、艾韦貝克、沙佩尔等)通信討論同盟各支部的活动情况以及报纸股份的認購情况。
- 5月6日** 为了和恩格斯討論“新萊茵报”的出版問題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問題，馬克思和維尔特一起到爱北斐特去住了几天。
- 5月11日** 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参加同盟科倫支部的會議，討論哥特沙克对同盟的态度問題。
- 5月中旬** 馬克思通过維尔特把“新萊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通知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社会辯論报”的編輯若特兰，并且提議在两报之間建立經常的联系。
- 5月20日** 恩格斯从巴門回到科倫，同馬克思一起积极准备出版“新萊茵报”。
- 5月20日以后** 由于德国政治局势的恶化和反动势力的抬头，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提前出版“新萊茵报”，原定7月1日出版，改为6月1日开始出版。
- 5月底** 馬克思写信給佛罗倫薩的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的編輯，报道“新萊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并且談到該报編輯部准备捍卫意大利人民的自由与民族独立。馬克思建議彼此經常交換报纸和消息。馬克思的这封信发表在6月29日的“黎明报”上。
-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派赴德国各城市的代表报道，同盟各支部的組織很薄弱，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产主义者必須参加民主运动，构成这个运动的左翼，即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一翼。他們参加了科倫民主协会，并建議他們的支持者除了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外，还須积极地参加民主协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結論：应当把“新萊茵报”作为传达同盟的总的指示

- 和在德国宣传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武器。
- 6月1日** “新萊茵报”創刊号問世，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报上登載了“‘新萊茵报’編輯部的話”和弗·恩格斯的文  
章：“法兰克福議会”和“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 6月** “新萊茵报”的編輯工作、选择材料、建立通訊网以及报纸出版的其他工作都由馬克思一手办理。因此該报的社論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
- 6月初** 由于发表了弗·恩格斯针对德国国民議会怯懦的妥协政策所写的文章“法兰克福議会”，“新萊茵报”的相当多的資产階級股东都不再支持該报。
- 6月2日—3日** 馬克思写了两篇关于康普豪森內閣的文章，发表在6月3日和4日的“新萊茵报”上。
- 6月5日** “新萊茵报”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論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文章“战争的喜剧”。
- 6月6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柏林的妥协辯論”的文章，发表在6月7日的“新萊茵报”上。以后，恩格斯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又对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辯論作了系統的評論，并且对該会的活动进行了批評。
- 6月7日** 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綱領”这篇社論和以后发表在“新萊茵报”的一系列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决主张必須通过革命来統一德国，認为这是德国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
- 6月8日** 恩格斯写“对波兰的重新瓜分”一文，发表在6月9日的“新萊茵报”上。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的許多文章里，热烈地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指出，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的德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 6月13日—14日** 恩格斯写“柏林关于革命的辯論”的一系列文章，这些

- 文章发表在 6 月 14 日到 17 日的“新萊茵报”上。
- 6月17日** 恩格斯写“布拉格起义”一文，表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该文发表在 6 月 18 日的“新萊茵报”上。
- 6月19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袭击柏林軍械庫的文章，题为“6 月 17 日的妥协会議”。文章着重指出了人民武装的意义，认为它是革命胜利的条件。该文发表在 6 月 20 日的“新萊茵报”上。
- 6月20日** 恩格斯写“在波茲南的新政策”一文，发表在 6 月 21 日的“新萊茵报”上。
- 6月23日左右** 科倫民主协会委员会派馬克思参加科倫各民主組織的代表會議，商討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各民主协会的合并問題。这个問題是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決議提出来的。
- 6月23日** “新萊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議会的第一件事迹”一文，批評議会对意大利革命所采取的政策。
- 6月24日** 馬克思参加科倫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代表所組成的委员会會議。委员会通过決議，认为必須建立科倫各民主团体的中央委员会，其职能相当于区域委员会；同时責成委员会在各組織之間进行經常的联系并准备在科倫召开萊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屆代表大会。
- 6月25日** “新萊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論布拉格起义的文章“起义的民主性質”。
- 6月25日—7月1日** 由于巴黎的六月起义，恩格斯写了一系列闡明巴黎无产階級第一次階級战斗的进程的文章，发表在 6 月 26 日到 7 月 2 日的“新萊茵报”上。



- 6月28日** 馬克思写“六月革命”一文，发表在6月29日的“新萊茵报”上。在該报发表了坚决地捍卫起义的巴黎工人的言論后，剩下的大部分股东都停止支持“新萊茵报”。
- 6月底—8月初**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普魯士国民議会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的討論，在“新萊茵报”发表一系列的社論（“帕托夫贖买法案建議書”、“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于現行贖买法案的辯論”），为农民辯护，对德国資产階級背叛自己的天然同盟軍农民和拒絕实行德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即完全废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的行为給予无情的批判。
- 7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約·莫尔（他从7月6日就任科倫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和卡·沙佩尔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更大的影响，对哥特沙克宗派主义政策的拥护者进行頑强的斗争。
- 7月2日** 恩格斯写“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揭露德国資产階級繼續执行霍亨索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政策，并拟定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則。該文发表在7月3日的“新萊茵报”上。
- 7月6日** 馬克思写“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一文，发表在7月7日的“新萊茵报”上。
- 由于7月5日的“新萊茵报”发表了“逮捕”一文，预审推事传訊了馬克思。馬克思和負責发行人（經理）科尔夫被控侮辱了最高檢察官茨魏費尔和宪兵。在传訊終結后在該报編輯部进行了搜查。由于搜查中查出了該文的一份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材料和馬克思拒絕指出該文的作者，便成了不仅传訊該报負責发行人科尔夫，而且也传訊馬克思、恩格斯和德朗克的借口。
- 7月7日和9日** 馬克思写了两篇关于柏林的政府危机的文章“办事內

- 閣”和“內閣危机”，发表在7月9日和10日的“新萊茵报”上。
- 7月10日** 馬克思写“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一文，发表在7月11日的“新萊茵报”上。
- 7月14日** 恩格斯在科倫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說，批評柏林的国民議會。他建議大会委托国民議會左翼领导人之一德斯特尔反对限制軍官的結社权利。
- 7月17日—24日** 恩格斯写“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辯論”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在7月18至25日的“新萊茵报”上。
- 7月21日** 馬克思出席科倫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会上选举参加科倫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馬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为民主协会的代表。会上魏特林发表演說，叙述了他对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任务的混乱的宗派主义的看法。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見改在下次會議发表。
- 7月21日—2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的一系列社論中批評市民自卫团法案。
- 7月22日** “新萊茵报”刊載了弗·恩格斯的“和丹麦的休战”一文。預审推事就“逮捕”一文再度传訊馬克思。
- 7月26日和3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批評强制公債法案。
- 7月31日** 恩格斯写“‘科倫日报’論英国秩序”一文，发表在8月1日的“新萊茵报”上。
- 8月3日** “新萊茵报”发表“俄国的照会”的社論，揭露俄国沙皇制度的反动的对外政策。

馬克思接到区行政机关的通知，拒絕給予他普魯士公民权，因而今后和过去一样，普魯士政府将把馬克思当作外国人看待。

預审推事传訊恩格斯作証，企图查出“逮捕”一文

的作者。

**8月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科倫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大会繼續討論魏特林的发言。馬克思尖銳地批評了魏特林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开来的論点，指出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密切联系的，并揭露了魏特林对德国革命的民主任务的无知。恩格斯通知大会，普魯士政府拒絕給予馬克思公民权，因此馬克思有被驅逐出境的危險。

馬克思和科倫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員通知萊茵省所有的民主团体，要它們派代表出席8月13日在科倫召开的萊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屆代表大会。通知发表在8月5日的“新萊茵报”上。

**8月6日**

馬克思写“‘模范国家’比利时”一文，发表在8月7日的“新萊茵报”上。

**8月7日—9月6日**

恩格斯写“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8月9日到9月7日的“新萊茵报”上。

**8月11日**

科倫民主协会召开全体大会，由馬克思担任主席。大会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抗議書，反对把波茲南并入德意志联邦。大会还討論了普魯士政府拒絕給予馬克思公民权的問題。馬克思揭露了政府对他采取这种措施的真正原因。恩格斯举出了警察迫害民主运动領袖(包括沙佩尔)的新材料。大会选举了一个代表团，委托他們要求科倫当局取消对馬克思和沙佩尔所采取的警察措施。

**8月13日—1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在科倫举行的萊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屆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7个民主团体的代表。大会批准了早已选出的作为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科倫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馬克思参加了

-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着重地指出了萊茵省人民群众对反动的普魯士国家制度的憎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必须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工作,在乡村中建立组织并且和这些组织保持经常的联系。
- 8月22日** 馬克思向普魯士內政大臣屈韦特尔申诉,要求取消区行政机关的非法决定,恢复他的普魯士国籍。
- 8月23日—9月11日左右** 为了巩固和各民主团体以及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促使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对普魯士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更坚决的斗争,馬克思到柏林和維也納去,同时也希望为“新萊茵报”筹集经费。
- 8月25日—26日** 馬克思在柏林。
- 8月26日** 恩格斯写“‘科倫日报’論意大利”和“‘閱报室’报論萊茵省”两文,发表在8月27日的“新萊茵报”上。
- 8月27日** 馬克思到达維也納。
- 8月28日** 馬克思参加維也納民主联合会会议,会上討論維也納8月23日巷战后的形势问题。馬克思在他的演说中着重指出,維也納事件的实质不在于內閣的更迭,而是象巴黎六月的战斗一样,在于它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 8月28日—9月6日** 馬克思在維也納停留期间会晤了各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特别是他和奥地利国会的德国捷克党团的领导人鮑洛施討論了奥地利的民族问题以及捷克工人与德国工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馬克思同时也就“新萊茵报”的经费问题进行了談判。
- 8月30日** 馬克思在維也納第一个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論述了西欧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 9月2日** 恩格斯写“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这篇为17个被判处死刑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辯护的文章发表在9月3日的“新萊茵报”上。
- 馬克思在維也納第一个工人联合会會議上做关于雇佣劳动与資本的长篇报告。
- 9月4日** 預审推事再次传訊恩格斯；但是他已經不是作为証人被传訊，而是作为“新萊茵报”“逮捕”一文案件的同案人被传訊。
- 9月7日** 科倫民主协会和“新萊茵报”編輯部在練馬場召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数千人。大会通过致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書，要求取消普魯士政府和丹麦締結的休战协定和致普魯士国民議會書，抗議反民主的市民自卫团法案。
- 9月7日—10日左右** 由于普魯士政治局勢的尖銳化，馬克思决定提前返回科倫。他路过柏林时停留下来和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繼續商談，并且出席普魯士国民議会的會議。馬克思和波兰民主主义者商量資助“新萊茵报”的問題。根据这次商談符·科斯策尔斯基于9月18日寄給馬克思2 000塔勒。
- 9月8日** 恩格斯写“办事內閣的垮台”一文，发表在9月10日的“新萊茵报”上。
- 9月8日和10日** “新萊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和丹麦的休战”和“丹麦和普魯士的休战”两篇文章。
- 至迟9月10日**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在科倫印成传单，立即在萊茵省的許多地方散发。
- 9月11日左右** 馬克思回到科倫。
- 9月11日** 恩格斯在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員會會議上做关于組織劳

动是否可能以及法国国家工厂失败的原因的詳細报告。

**9月11日—15日**

馬克思在9月12到16日的“新萊茵报”上发表的几篇連載的文章“危机和反革命”里，闡述了一个最重要的原理：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应该是人民的革命专政，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組織对反革命的坚决回击和消灭旧制度的残余。

**9月11日—25日**

馬克思、恩格斯和“新萊茵报”編輯部的其他成員在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解释工作和組織工作，竭力动员人民起来反对猖獗的反革命势力。

**9月12日**

普魯士內政大臣屈韦特尔答复馬克思的申述，認為科倫当局拒絕給予馬克思普魯士公民权的决定是合法的。

**9月13日**

“新萊茵报”編輯部、科倫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科倫弗兰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約有6000人。

大会根据威·沃尔弗的提議（恩格斯支持这个提議），选举了由30人組成的安全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致柏林議會書，要求議会的議員在政府企图解散議會、甚至在使用武力来对付他們的时候，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崗位。

**9月17日**

恩格斯参加由科倫各民主团体发起的在沃林根（在科倫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約有8000人。恩格斯被选为大会的書記。大会贊成建立社会民主的紅色共和国，宣布承認科倫安全委员会，并根据恩格斯的提議，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書，要求国民議会在普魯士和德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站在德国方面。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馬克思参加了这个

- 委员会)宣布9月24日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第二届代表大会。
- 9月19日—20日** 恩格斯写“休战协定的批准”和“法兰克福起义”两文,发表在9月20日和21日的“新莱茵报”上。
- 9月20日** 由于法兰克福议会批准和丹麦的休战,由于法兰克福的起义,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在科伦埃塞尔大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声援法兰克福起义者的决议,并且宣布同意批准休战的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为人民的叛徒。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斥责法兰克福议会的可耻的决议,并且报道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
- 9月23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9月20日群众大会的决议,并且把这个决议印成传单在全城散发。
- 9月25日** 科伦检察机关对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起訴訟,控告他们在科伦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阴谋反对现行制度。
- 帝国司法大臣命令科伦检察机关对安全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提起訴訟,同时对“新莱茵报”发行科也提起訴訟,因为該报散发了1848年9月20日科伦群众大会的决议。
- 9月25日晨** 馬克思去参加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由于警察在清晨挑衅地逮捕了科伦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领导人(沙佩尔、貝克尔等),会议未能举行。
- 9月25日上午** 馬克思出席了在旧市場“友誼之家”飯店召开的工人联合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劝告到会的工人不要理睬警察的挑衅,并向他们解释武装起义的时机还未到来,过

- 早的发动会成为一种冒险的行动，它将使工人阶级在决战的前夜丧失战斗力。
- 9月25日下午3时** 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埃塞尔大厅举行的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联席會議上警告到会的人要防止过早的发动。
- 9月26日** 科倫戒严。警备司令部命令“新萊茵报”和其他的一些民主派报纸停止出版。
- 9月26日以后** 恩格斯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离开科倫。恩格斯在巴門隱藏几天后就到布魯塞尔去。
- 9月28日** “新萊茵报”的負責发行人以一种特殊的传单形式通知訂戶該报停刊，并且相信短期內即将恢复出版。
- 9月30日** “新萊茵报”的負責发行人宣布科倫的戒严即将解除，該报自10月5日起复刊。
- 9月底—10月上半月** 馬克思为“新萊茵报”的复刊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克服了报纸因被封而引起的經濟上和組織上的巨大困难。为了偿付債款和維持报纸的开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現金。
- 10月1日** 科倫检察机关控告馬克思、恩格斯和“新萊茵报”的其他編輯在报上发表匿名的小品文“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是格·維尔特写的）并且怀疑1848年9月20日科倫群众大会的決議是他們草拟的。
- 10月3日** 由于科倫的戒严业已解除，“新萊茵报”的負責发行人科尔夫发了一个特別的通知，宣布該报即将复刊，并且号召訂閱第四季度的报纸。
- 国家檢察官下令采取措施搜捕恩格斯。命令上还开列了恩格斯的特征。
- 10月3日以后** 馬克思建議弗萊里格拉特加入“新萊茵报”編輯部，弗萊里格拉特同意。



- 10月4日左右** 恩格斯和德朗克(他也是从科倫逃出来的)一起到达布魯塞尔。
- 10月4日** 布魯塞尔警察逮捕恩格斯和德朗克,把他們解到監獄,以后又押送到法国边界,他們前往巴黎。
- 10月5日** 恩格斯和德朗克到达巴黎。
- 10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后,就徒步到瑞士去,打算一有机会即回科倫。途中恩格斯和法国的农民进行了交談,了解了他們的生活情况和他們的情緒。
- 10月12日左右** 科倫工人联合会派代表去見馬克思,要求他領導联合会。
- 10月12日** “新萊茵报”第114号,即科倫戒严解除后的第一号出版。在报纸总編輯馬克思署名的通知中指出,編輯部的人員增加了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报纸刊載了卡·馬克思的文章“維也納革命”。
- 馬克思写“科倫革命”一文,发表在10月13日的“新萊茵报”上。
- 10月13日** 馬克思写“普富尔內閣”和“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証券的全国抵押銀行的演說”两篇文章,发表在10月14日的“新萊茵报”上。
- 10月下半月—11月初** 馬克思对維也納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反革命的斗争給以很高的评价,他給“新萊茵报”写了一系列关于維也納起义經過的文章。
- 10月16日** 馬克思在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會議上宣布,他同意暂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馬克思在会上发表了演說,論述了德国工人的革命作用,特别是在維也納起义时所起的革命作用。根据馬克思的提議,會議通过了向維也納工人联合会致敬的信。
- 10月18日** 馬克思写“普魯士国王答国民議会代表团”和“弗里德

- 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两篇文章，发表在10月19日和20日的“新萊茵报”上。
- 10月22日** “新萊茵报”发表馬克思的“‘改革报’論六月起义”、“英法在意大利的調停”和“模范的立宪国家”3篇文章。
- 科倫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批准馬克思为联合会主席。馬克思在大会上发表演說，論德国現行的間接选举制。大会选举博伊斯特为出席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博伊斯特在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坚持了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基础的綱領。
- 10月24日左右** 恩格斯到达日內瓦。
- 10月26日左右** 馬克思写信給日內瓦的恩格斯，告訴他“新萊茵报”复刊的消息，并要求他給报纸寄通訊和文章来。
- 10月28日** 馬克思写科倫检察机关迫害“新萊茵报”編輯部的文章，題为“国家檢察官‘黑克尔’和‘新萊茵报’”。該文发表在10月29日的“新萊茵报”上。
- 10月底—11月** 恩格斯写“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旅途随笔。这篇随笔未写完。
- 11月初** 恩格斯在日內瓦逗留了几天后，就前往洛桑。他在那里和洛桑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 11月2日** 馬克思写“巴黎‘改革报’論法国状况”和“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書”两篇文章。在后面一篇文章里他批評这个文件空洞而不彻底。这两篇文章发表在11月3日的“新萊茵报”上。
- 11月6日** 馬克思写“反革命在維也納的胜利”一文，发表在11月7日的“新萊茵报”上。
- 馬克思在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會議上报道了維也納陷落的消息，他着重指出，奥地利軍隊之所以能占領該城，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

## 人名索引

### 三 画

万德尔(Wander)——德国牧师,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左派。——第251頁。

万根海姆(Wangenheim)——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左翼。——第321頁。

士伊斯豪斯(Tüshaus)——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右派。——第213、214頁。

卫尔,巴托洛繆斯·約瑟夫(Weyll, Bartholomäus Joseph)——德国法学家,1848年是科倫民主协会會員和科倫公安委员会委員,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1848年10月)代表。——第596頁。

### 四 画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m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的首領;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领导依靠反革命君主派集团的內閣。——第484頁。

巴兰,費里克斯(Ballin, Felix 約生于1802年)——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会员,里斯康士案的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1854年被释放。——第448、449頁。

巴魏,沙尔·維克多(Bavay, Charles Victor 1801—1875)——比利时法官;1844年起任布魯塞尔总檢察官。——第204、448頁。

巴尔策,威廉·爱德华(Baltzer, Wilhelm Edouard 1814—1887)——德国传教士,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左派。——第302頁。

巴亚尔,比埃尔(Bayard, Pierre 約1475—1524)——法国騎士,同代人称頌他是勇敢和高貴的榜样,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第198、415頁。

巴巴罗薩——見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薩。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編輯之一(1836—1846);曾任外交部长(1848年5月—12月)。——第144、427、515、516、517頁。

巴塞爾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自由主义者,巴登議会议員;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議會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右翼。——第16、265、349、498、526頁。

比尔克(Birk)——普魯士官吏,1848年9月起在科倫执行区督察員的职务。——

第 536 頁。

比德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論家, 溫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 后来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265、349 頁。

比克西奥, 雅克·亚历山大 (Bixio, Jacques Alexander 1808—1865)——法国政論家, 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国民报”編輯之一, 1848 年为制宪議会的副主席, 1849 年是立法議会的議員。——第 145 頁。

韦伯, 卡尔·馬利阿 (Weber, Karl Maria 1786—1826)——杰出的德国作曲家。——第 555 頁。

韦尔登, 弗兰茨·路德維希 (W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男爵, 奥地利將軍, 1848 年向革命的意大利進軍的参加者; 在鎮压了 1848 年 10 月起义后任維也納卫戍司令; 1849 年 4 月—5 月指揮鎮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軍隊。——第 114、435、436、440 頁。

韦尔凯尔, 卡尔·泰奥多尔 (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 自由派政論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467 頁。

韦尔哈根, 比埃尔·德奥多 (Verhaegen, Pierre Theodor 1800—1862)——比利时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第 370 頁。

丰克 (Funk)——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倫民主协会的會員。——第 189 頁。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 Jacques 1759—1794)——18 世紀末法

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的右派領袖。——第 265 頁。

巴涅尔, 洛朗·安都昂 (Pagnerre, Laurent 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家, 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1848 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第 403 頁。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 de 1806—1881)——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 30—60 年代曾多次担任“新聞报”編輯; 以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第 162 頁。

毛克勒, 保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伊根 (Maucler, Paul Friedrich Theodor Eugen 1783—1859)——維尔騰堡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1818 年起任司法大臣, 后来是秘密會議的主席 (1831—1848 年 4 月)。——第 268、269 頁。

不倫瑞克公爵, 卡尔-威廉-斐迪南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Karl-Wilhelm-Ferdinand 1735—1806)。——第 177 頁。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 奥地利元帅, 1848 年指揮鎮压布拉格和維也納的起义; 1848—1849 年率領奥地利軍隊, 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94—96、127、128、141、299、348、507、529、536、537、540、542、605 頁。

## 五 画

卡姆 (Cham 1819—1879)——著名的法国漫画家, 幽默的“喧声报”的固定撰稿人。——第 55 頁。

卡諾, 拉查尔·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

- 共和主义者; 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 制宪议会的議員。——第180頁。
- 卡貝, 埃蒂耶納 (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論家, 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 “伊加利亚旅行記”一書的作者。——第334頁。
- 卡洛斯, 唐 (Carlos, Don 1788—1855)——西班牙王位的僭望者, 1833年至1840年在西班牙进行內战, 目的是要夺取王位, 恢复封建僧侶集团的无限权力。——第177、346、417頁。
- 卡尼茨, 奧古斯特 (Kanitz, August 1783—1852)——伯爵, 普魯士將軍, 1848年5月—6月是康普豪森內閣的陸軍大臣。——第73、100頁。
- 卡克尔, 約翰·威廉 (Kalker, Johann Wilhelm)——1848年是科倫工人联合会書記。——第192頁。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侵占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 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 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 从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陸軍部长, 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曾任执行机关的首領 (1848年6月—12月)。——第135、139—145、153、161—163、171—173、175、182、183、184、426、429、445、483、484、489、494、496、513、516、552、555頁。
- 卡提利納, 魯齊烏斯·賽爾吉烏斯 (Cati-lina, Lucius Sergius 公元前約108—62)——羅馬政治活动家, 貴族, 反对貴族共和国密謀的組織者。——第261頁。
- 瓦勞, 卡尔 (Wallau, Karl 1823—1877)——布魯塞爾的德国流亡者, 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美因茲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后来是美因茲市长。——第575頁。
- 瓦拉赫 (Wallach)——普魯士官吏, 勃罗姆堡 (貝德哥什) 区督察員。——第399頁。
- 瓦赫特尔 (Wachter)——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科倫公安委员会委員。——第596、601頁。
- 瓦拉夫 (Wallraf)——德国民主主义者。——第596頁。
- 瓦德涅尔, 維克多 (Valdenaire, Victor 卒于1859年)——普魯士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左派。——第97、98、338、339頁。
- 瓦尔莫登, 卡尔 (Wallmoden, Karl 1792—1883)——伯爵, 奥地利將軍, 1848—1849年曾参加镇压捷克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127頁。
-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奧 (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 职业是律師;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副主席和左派領導人之一; 后为进步主义者。——第186、263、264、462、468、469、471、472、478頁。
- 瓦克斯穆特, 弗兰茨·魯道夫 (Wachsmuth, Franz Rudolf 生于1810年)——普魯士官吏,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左翼。——第306頁。
- 瓦滕斯累本, 亚历山大 (Wartensleben, Alexander 生于1807年)——伯爵, 普魯土地主,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 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409、410 頁。
- 布斯曼 (Bußmann) ——波茲南地主，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206、207、340 頁。
- 布里尔 (Brill) ——德國民主主義者，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 206、207、340 頁。
- 布萊梅 (Brehmer) ——德國教師，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79 頁。
- 布累特 (Bredt) ——普魯士官吏，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後來屬於中間派。——第 341 頁。
- 布洛姆，安東 (Bloem, Anton 1814—1885) ——德國律師，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後來屬於中間派。——第 56、221 頁。
- 布萊特，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國工廠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從 60 年代末起為自由派政黨的領袖之一；歷任自由黨內閣的大臣職務。——第 160 頁。
- 布赫爾，洛塔爾 (Bucher, Lothar 1817—1892) ——普魯士官吏，政論家；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後來成為民族自由主義者，支持俾斯麥。——第 320、322 頁。
- 布蘭克，約瑟夫·博納維達 (Blank, Joseph Bonavita 1740—1827) ——德國天主教牧師；維爾茨堡大學自然科學的教授；專研動物學。——第 371、372 頁。
- 布萊阿，讓·巴蒂斯特·菲德爾 (Bréa, Jean Baptiste Fidèle 1790—1848) ——法國將軍，曾參加鎮壓 1848 年的六月起義，為起義者槍決。——第 145 頁。
- 布萊桑，路德維希 (Blesson, Ludwig 1790—1861) ——德國軍事著作家，反動分子，1848 年 6 月任柏林市民自衛團司令。——第 43 頁。
- 布倫坦諾，羅倫茲 (Brentano, Lorenz 1813—1891) ——巴登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職業是律師；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1849 年領導巴登臨時政府，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失敗後流亡瑞士，後來流亡美國。——第 414 頁。
- 布魯土斯 (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約 85—42) ——羅馬政治活動家，反對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國密謀的發起人之一。——第 261、526 頁。
- 布里茲倍恩，阿伯特 (“新萊茵報”上是：亨利) (Brisbane, Albert 1809—1890) ——美國記者，傅立葉派。——第 596 頁。
- 布洛多夫斯基，亞歷山大 (Brodowski, Alexander 1794—1865) ——波蘭地主，1848 年是波茲南民族委員會委員和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 318 頁。
- 弗倫肯 (Frencken) ——普魯士官吏，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229 頁。
- 弗恩巴赫 (Fernbach) ——德國大學生，民主主義者。——第 189 頁。
- 弗呂貝爾，尤利烏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 ——德國政論家和進步著作的出版者，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後來是

- 自由主义者。——第 587 頁。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將軍, 普魯士反动軍閥的主要代表之一; 1848 年 11 月参加柏林反革命政变, 驅散普魯士国民議會。——第 207、292、497、507、529 頁。
- 弗洛特韦尔, 爱德华·亨利希 (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魯士的貴族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財政大臣 (1844—1846), 波茲南的總督, 后为威斯特伐里亚的總督;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右派。——第 398、399、414 頁。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國詩人, 开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詩人,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50 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438—440、493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 297、375、376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帝侯 (1640—1688)。——第 303、304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魯士国王 (1786—1797)。——第 386、387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 372、378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 346、474、509、510、584 頁。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薩 (Friedrich I Barbarossa 約 1123—1190)——1152 年起是德国国王,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1155—1190), 曾不止一次地远征意大利, 企圖兼并意大利。——第 439 頁。
-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奧古斯特 (Friedrich-Christian-August 1829—1880)——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公爵。——第 209 頁。
- 弗兰契斯科第五 (Francesco V 1819—1875)——摩地那公爵 (1846—1859)。——第 436 頁。
- 皮格薩 (Piegsa)——波兰教师,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左派。——第 254 頁。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41—1846), 在自由党的支持下, 廢除了谷物法 (1846)。——第 312、334、335 頁。
- 皮勒斯多夫, 弗兰茨 (Pillersdorf, Franz 1786—1862)——男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1848 年任首相 (5 月—7 月)。——第 127 頁。
- 加格恩, 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男爵, 德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議員和主席, 屬於中間派右翼; 曾任帝国首相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3 月)。——第 258、400、414、467、482、483、507 頁。
- 加格恩, 馬克西米利安 (Gagern, Maximilien 1810—1889)——男爵, 德国官吏,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議員; 亨利希·加格恩之弟。——第 457 頁。

- 加内龙, 奥古斯特·伊波利特 (Ganne-ron, Auguste Hippolyte 1792—1847) ——法国工业家, 銀行家, 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第 133 頁。
- 卢格, 阿尔諾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于左派; 1866 年以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419、421—430 頁。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109、207、344—348、407、542 頁。
- 汉澤曼, 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 ——大資本家, 萊茵省自由资产階級領袖之一; 1848 年 3 月至 9 月任普魯士的財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協的叛卖政策。——第 32、34、35、51、52、56—58、65、72、84、88、89、116、117、120、182—188、192、206、212、213、219、220、222、230、233、240—246、251、254、257、270—272、281、292、293—294、307—317、321、325、326、331、348、350、351、370、388、433、443、462、468、469、472、490、497、500、510、592 頁。
- 东巴尔, 克利斯托夫·約瑟夫·亚历山大·馬蒂約·德 (Dombasle, Christophe Joseph Alexandere Mathieu de 1777—1843) ——法国著名的农学家。——第 504 頁。
- 司徒卢威, 古斯达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 ——德国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新聞記者; 1848 年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离开德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21、525 頁。

## 六 画

- 安内克, 瑪蒂尔达·弗兰契斯卡 (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 ——德国女作家, 1848—1849 年曾为民主报刊撰稿; 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的妻子。——第 190、191、586 頁。
-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 ——普魯士的炮兵軍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軍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6 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創始人之一, “新科倫报”編輯,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委員; 1849 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中校; 后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方的一边。——第 189—192、202、578、579、586、591 頁。
- 毕若·德·拉·比貢利, 托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 ——法国元帅; 七月王朝时期的下議院議員, 奥尔良党人, 1848—1849 年是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 立法議會議員。——第 163 頁。
- 毕尔格尔, 哥特弗利德·奥古斯特 (Bürger, Gottfried August 1747—1794) ——德国著名詩人。——第 41 頁。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urgers, Heinrich 1820—1878) ——德国激进政論家, “萊茵报”的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盟員, “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从 1850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 (1852) 中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自由党人。——第 13、577、583、591、600 頁。
- 达奈 (Dane)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



- 会的議員，屬於右派。——第363頁。
- 达梅姆，爱德华·阿道夫 (Damesme, Edouard Adolf 1807—1848) ——法国將軍，反动分子，在鎮压1848年六月起义时指揮別动队。——第144、145、171頁。
-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 ——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265、458頁。
-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 (D'Aspre, Constantin 1789—1850) ——男爵，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意大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435頁。
- 米格尔，唐 (Miguel, Dom 1802—1866) ——葡萄牙国王 (1828—1834)。——第177、346頁。
- 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 (Milde Karl August 1805—1861) ——西里西亚的大厂主，德国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的商业大臣 (1848年6月—9月)，普魯士国民議会的主席，屬於右派。——第31、219、243、281、293、341、348、443、461頁。
- 米拉波，奥諾萊·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e Gabriel 1749—1791) ——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貴族的利益的代表者。——第107、265頁。
- 米特迈尔，卡尔 (Mittermaier, Karl 1787—1867) ——德国法学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中間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第294頁。
- 米努托利，尤利烏斯 (Minutoli, Julius 1805—1860) ——普魯士官吏和外交家；1847—1848年是柏林警察总监。——第42、43頁。
- 列文 (Leven) ——德国民主主义者。——第596頁。
- 列曼·奥尔拉，彼得·馬丁 (Lehmann Orla, Peter Martin 1810—1870) ——丹麦的資產階級国家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祖国报”編輯 (1839—1842)，1848年是不管部部长。——第286頁。
- 列列韦尔，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 ——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参加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民主派領袖之一，1847—1848年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員。——第390、395、403、404、424頁。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 ——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367、370、448、449、518頁。
- 多尔內斯，奥古斯特 (Dornès, August 1799—1848) ——法国政論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1848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第145頁。
- 多布尔霍夫，安东 (Dobhoff, Anton 1800—1872) ——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商业大臣 (5月) 和內政大臣 (7月—9月)。——第587頁。
- 吉尔，烏尔利希·弗兰茨 (Kyll, Ulrich Franz) ——德国法学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科倫出席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左派；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496頁。
- 吉尔克 (Gierke) ——普魯士官吏，自由主

- 义者；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奧爾斯瓦特-漢澤曼內閣的农业大臣（1848年6月—9月）。——第326—331、361、362、364頁。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約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搖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奴隶主階級的思想家。——第284頁。
- 亚尼舍夫斯基，楊·赫利佐斯托姆(Janiszewski, John Chrysostom 1818—1891)——波兰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第411、412、413、415頁。
-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师，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来是政治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的支持者。——第596頁。
- 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Ypsilanti Alexander 1792—1828)——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莫尔达維亞1821年起义的組織者，起义失敗后逃往奥地利，被捕，一直監禁到1827年。——第177頁。
- 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說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403頁。
- 齐茨，弗兰茨(Zitz, Franz 1803—1877)——德国律师，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左派；1848—1849年革命失敗后流亡美国。——第15頁。
-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政論家，医生；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后来屬於左派。——第265頁。
- 考尼茨，温采尔·安东(Kaunitz, Wenzel Anton 1711—1794)——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所謂文明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凶恶的敌人。——第95頁。
- 西蒙斯，路德維希(Simons, Ludwig 1803—1870)——德国法学家，反动分子；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右派，后来担任司法大臣（1849—1860）。——第229、296、338、339頁。
- 老卡托(馬可·波尔齐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149)——羅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貴族特权的維護者；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監察官，他監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第305、341頁。
-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Thorvaldsen, Bertel 1768—1844)——著名的丹麦雕刻家。——第23頁。

## 七 画

- 貝多，瑪麗·阿尔丰斯(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將軍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温和的共和主义者。——第145頁。
- 貝克尔，尼古劳斯(Becker, Nicolaus 1809—1845)——德国小資產階級詩人。——第163頁。
- 貝克尔，費里克斯(Becker, Felix)——法国詩人和革命家，曾参加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1848年2—3月在巴黎发起組織比利时軍团。——第449頁。
- 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科倫工人業主联合会

- 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编辑（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被告之一（1852）；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97、580、591、596页。
- 貝恩施 (Behnsch)——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198、207、242、254—256页。
- 貝塞尔 (Besser)——普鲁士官吏，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252—254页。
- 貝尔格，菲力浦 (Berg, Philipp 1815—1866)——普鲁士天主教牧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05、213、293—296、462页。
- 貝倫茲，尤利烏斯 (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柏林一印刷厂厂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71、75—77、79、80、83、85、87、104、186、257页。
- 貝凱拉特，海爾曼 (Beckerath, Herman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月—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第469、474、478、592页。
- 貝澤勒尔，威廉·哈特維希 (Beseler, Wilhelm Hartwig 1806—1884)——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临时政府的首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292页。
- 杜蒙，約瑟夫 (Dumont, Joseph 1811—1861)——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温和自由主义者；从1831年起是“科伦日报”的发行人。——第158、160—161、163、438、496、536页。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 (Dufaure, Jules Armand 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8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1848年10月—12月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内政部长。——第180页。
- 杜沙特尔，沙尔 (Duchâtel, Charles 1863—1867)——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曾任内政部长（1839，1840—1848年2月）。——第34、58、116、117、218、244、245、270、462页。
- 杜厄斯堡，弗兰茨 (Duesberg, Franz 1793—1872)——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46年到1848年三月革命期间是财政大臣。——第32页。
- 杜維維耶，弗兰西阿德·弗略呂斯 (Duvivier, Franciade Fleurus 1794—1848)——法国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年的六月起义。——第144、145、150、173页。
- 杜維尔努阿，亨利希·古斯塔夫 (Duvernoy, Heinrich Gustav 1802—1890)——维尔腾堡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自由派内阁的内政大臣（1848—1849）。——第268页。
- 沃尔弗 (Wolff)——德国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14页。
- 沃尔弗，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教师，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囚于普鲁士的监狱中；1846—1847年是布

- 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從1848年3月起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與戰友。——第5、13、582、591、596頁。
- 沃尔弗，斐迪南 (Wolf, Ferdinand)——德國政論家，1846—1847年是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1848—1849年革命後離開德國；1850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支持馬克思；後來放棄了政治活動。——第13頁。
- 沃尔弗斯 (Wolfers)——德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原籍比利時，1848年是“科倫日報”撰稿人和編委；後來成了波拿巴主義者的奸細。——第158、160—166、332、333、536頁。
- 里茨 (Ritz)——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55、56、185、207、339頁。
- 里德爾，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約翰 (Riedel, Adolf Friedrich Johann 1809—1872)——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87頁。
- 里廷豪森，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國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撰稿人，科倫民主協會會員；第一國際的成員，後來 (1884年前) 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第582、583頁。
- 克勞澤 (Krause)——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第240頁。
- 克勞特，威廉 (Clouth, Wilhelm)——科倫一印刷廠老板，“新萊茵報”從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該廠印刷。——第230頁。
- 克路斯，阿道夫 (Cluß, Adolph 卒於1889年後)——德國工程師，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8年是美因茲工人教育協會的書記，1849年流亡美國；在50年代和馬克思、恩格斯經常通信，為德國、英國和美國的許多民主報紙撰稿。——第575、576頁。
- 克倫威爾，奧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領袖；1653年起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攝政大臣。——第81、265、482頁。
- 克雷門斯，弗里德里希·雅科布 (Clemens, Friedrich Jacob 1815—1862)——德國哲學家 and 神學家，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第413頁。
- 利奧，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極端反動的政治觀點和宗教觀點的辯護人，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405頁。
- 利濟斯基 (Lisiecki)——波茲南的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339頁。
- 利希諾夫斯基，費里克斯 (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公爵，普魯士軍官，反動分子，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在1848年9月法蘭克福起義期間為人民所殺。——第348—349、409、414、415、416、417、418、538、589頁。
- 佐美爾，約翰·弗里德里希·約瑟夫 (Sommer, Johann Friedrich Joseph

1793—1856)——普魯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右派。——第214頁。

佐尔姆斯-利希，路德維希 (Solms-Lich, Ludwig 1805—1880) ——公爵，普魯士地主，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萊茵省省議會主席 (1837—1845)，后来是1847年第一届联合議會主席。——第32頁。

李奇 (Ricci) ——撒丁王国的外交官，駐法国大使。——第515頁。

李希特，卡尔 (Richter, Karl 1804—1869) ——德国牧师，神学教授；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左派。——第221、222頁。

希登哈根 (Hildenhagen) ——德国牧师，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第340頁。

希尔什菲尔德，亚历山大·阿道夫 (Hirschfeld, Alexander Adolf 1787—1858) ——普魯士將軍，1848年极端残酷地鎮压波兹南起义。——第232、348頁。

严森，約翰·約瑟夫 (Jansen, Johann Joseph 1825—1849)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年是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之一，哥特沙克的支持者；因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第192頁。

沙佩尔，卡尔 (Schapper, Karl 約 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委員，1848年9月25日至11月15日被監禁在獄中；和馬克思、施奈德尔第二等同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

案的被告；1849年2—5月是科倫工人联合会的主席；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是倫敦的“左”傾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1856年又和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5、432、433、497、580、582、583、595頁。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羅馬教皇 (1846—1878)。——第434頁。

辛辛納圖斯，魯齊烏斯·昆克提烏斯 (Cincinnatus, Lucius Quinctius 公元前5世紀) ——羅馬政治活动家，貴族，根据传统他是朴实和剛毅的化身。——第260、261、262頁。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艾貝斯道弗 (Heinrich LXXII Reus-Lobenstein-Ebersdorf 1797—1853) ——德意志一小邦弟系罗伊斯的大公 (1822—1848)。——第260頁。

## 八 画

采什科夫斯基，奧古斯特 (Cieszkowski, August 1814—1894) ——波兰哲学家和經濟学家；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左派。——第260、261頁。

阿蒙 (Ammon) ——普魯士官吏，1848年任杜塞尔多夫檢察官。——第526頁。

阿朔夫 (Aschoff) ——普魯士將軍，柏林卫戍司令；1848年4月—5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揮官。——第42、43頁。

阿梯拉 (Attila 卒于453年) ——匈奴領袖 (433—453)。——第436頁。

阿貝尔，米歇爾·比埃爾·阿列克西斯 (Hébert, Michel-Pierre-Alexis 1799—1887) ——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奧爾良党人，議會議員 (1834—1848)；1841年起是王国法庭的总檢察长，曾任司法大臣 (1847年—1848年

- 2月)。——第204頁。
- 阿尔宁-苏科夫, 亨利希·亚历山大(Arnim-Suckow, Heinrich Alexander 1798—1861)——男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3月21日—6月19日)。——第49、50、73頁。
- 阿倫特, 恩斯特·摩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 历史学家, 語言学家; 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統治的解放战争; 受民族主义的束縛; 主张君主立宪;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右翼。——第418頁。
- 阿貝格, 布魯諾·埃尔哈特(Abegg, Bruno Erhard 1803—1848)——普魯士官吏,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第301、302頁。
- 阿倫茨, 埃基迪烏斯·魯道夫·尼古劳斯(Arntz, Aegidius Rudolf Nicolaus 1812—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左翼。——第229頁。
- 阿尔宁-博伊岑堡, 阿道夫·亨利希(Arnim-Boitzenburg, Adolf Heinrich 1803—1868)——伯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反动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內政大臣(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日—29日)。——第230頁。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公元前約287—212)——古希腊的伟大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329頁。
- 阿基比阿德(Alcibiades (Ἀλκιβιάδης)約在紀元前451—404)——雅典政治活动家和統帥。——第550頁。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維科(Ariosto, Lodo-
- 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杰出的詩人, “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402、409頁。
- 阿布拉莫維奇, 伊格納策(Abramowicz, Ignaz 1793—1867)——波兰軍官, 1844年起任华沙警察局长。——第344頁。
- 拉沃, 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政治活动家,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科倫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代表, 属于中間派左翼; 瑞士的帝国委員, 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巴登临时政府委員,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离开德国。——第15、17頁。
- 拉薩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和律師, 1848—1849年曾参加萊茵省的民主运动; 60年代初倾向于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的奠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統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596頁。
- 拉图尔, 泰奧多尔(Latour, Theodor 1780—1848)——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1848年是陸軍大臣; 1848年10月为維也納起义者所杀。——第538、540頁。
- 拉梅耐, 費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父, 政論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165頁。
- 拉馬丁, 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詩人, 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 40年代是資产階級共和主义者; 1848年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

- 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第 135、138、153、428、447、516、517、532 頁。
- 拉登堡,阿达尔貝特 (Ladenberg, Adalbert 1798—1855) ——普魯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文化、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 (1848—1850)。——第 204 頁。
- 拉馬克,馬克西米利安 (Lamarque, Maximilien 1770—1832) ——法国將軍,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第 168 頁。
- 拉多維茨,約瑟夫 (Radowitz, Joseph 1797—1853)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宫廷奸党的代表人物;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右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348、409—411、425、459、469、471 頁。
- 拉德茨基,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 年起指揮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軍隊,1848—1849 年残酷鎮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 95、114、141、144、425、435—436、438—440、445、507、524 頁。
-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 ——卓越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論家和社会主义者,接近革命无产阶级;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制宪議会的議員。——第 167 頁。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萊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 Louis Leon 1806—1865)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 年积极参加鎮压六月起义,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陸軍部长 (6 月—12 月),制宪議会的議員。——第 133、144、145、172、173、175 頁。
-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 Auguste George 1805—1867) ——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貴族院議員,正統派领导人之一,1848 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 后来是第二帝国的參議員。——第 147、156、165、357 頁。
- 罗素,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袖,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第 227、426、429 頁。
- 罗伊特 (Reuter, 大約卒于 1860 年) ——普魯士官吏,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左派。——第 54、55、58、59、214、223 頁。
- 罗泰克,卡尔 (Rotteck, Karl 1775—1840)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第 81 頁。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 (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 ——比利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7—1852 年任內政大臣。——第 204、519 頁。
- 罗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 (Rochow, Gustav Adolf 1792—1847) ——反动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普魯士的內政大臣 (1834—1842)。——第 32 頁。
- 罗生克兰茨,卡尔 (Rosenkranz, Karl 1805—1879) ——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和文学史家。——第 407 頁。
- 罗伯斯比尔,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18 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領 (1793

- 1794)。——第162、164頁。
- 罗曼諾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俄国沙皇的王朝(1613—1917)。——第343頁。
- 帕耶,讓·巴蒂斯特(Payer, Jean Baptiste 1818—1860)——法国学者,1848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第165頁。
- 帕托夫,艾拉茲穆斯·罗伯特(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男爵,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国家活动家,康普豪森內閣的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4—6月)。——第116、123、124、183、328、361頁。
- 帕麦斯頓,亨利·約翰(Palmerston, Henry John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1830年起是輝格党領袖之一,依靠該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 1835—1841和1846—1851),內政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515—517頁。
- 帕里鳩斯,魯道夫(Parrisius Rudolf 1818—1905)——普魯士法官,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左翼;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54、55、59、185、245、246、298頁。
- 波勒(Pohle)——普魯士法官,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第217頁。
-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1589—1792, 1814—1815和1815—1830)。——第21、36、100、561頁。
- 波旁王朝——那不勒斯的王朝(1735—1806和1814—1860)。——第21—24頁。
- 波克什夫尼茨基(Pokrzywnicki)——普魯士官吏,原籍波兰,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左派。——第216頁。
- 图恩,列奥(Thun, Leo 1811—1888)——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原籍捷克,反动分子,弗兰茨-約瑟夫的最亲近的顧問之一,文化教育大臣(1849—1860)。——第126—128頁。
- 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卡尔·亚历山大(Thurn und Taxis, Karl Alexander 1770—1827)——德意志一邦的君主,享有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組織邮政的世袭特权。——第387頁。
- 图尔克,列奥彼特(Turck, Leopold 1797—1887)——法国医生和政論家,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第501、502、505頁。
- 佩罗,本扎曼·比埃尔(Perrot, Benjamin Pierre 1791—1865)——法国將軍,1848年曾参加鎮压六月起义。——第66、175頁。
- 佩尔曼,安东(Pellmann, Anton)——德国法学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第90頁。
- 佩尔茨,爱德华(Pelz, Eduard)——德国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領導人之一,“德意志人民报”和“工人总汇报”的編輯。——第16頁。
- 弥勒(Müller)——德国牧师,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第81、82、85頁。
- 弥勒(Müller)——1848年是沃林根(在萊茵省)工人联合会會員。——第596頁。
- 弥勒,弗里德里希(Müller, Friedrich 生于1811年)——普魯士官吏,科倫警察厅长,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右翼。——第90、454、



497 頁。

奈特(Nethe)——普魯士官吏,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第 340 頁。

奈克尔, 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在 18 世紀 70—80 年代數度被任命为財政總管,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夕曾企圖进行某些改革。——第 36、313 頁。

果登, 阿道夫(Goeden, Adolf)——波茲南的德国医生,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395、396、400、402、413、415 頁。

劳麦, 弗里德里希(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1848 年是帝國駐巴黎的使節,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427 頁。

法依, 盖尔哈特(Fay, Gerhard)——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第 90 頁。

芬克, 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1811—1875)——男爵,普魯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右派领导人之一。——第 212、325、469、471 頁。

味吉尔(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64 頁。

肯普夫(Kämpf)——德国教师,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第 302 頁。

迪尔施克(Dierschke)——普魯士法官,1848 年为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 83、195、196、360、361、364、365 頁。

孟德斯鳩, 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經濟学家和作家,18 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制的理論家。——第 224、227、305、370、474 頁。

林普勒尔, 奥(Rimpler, O.)——普魯士退伍的炮兵軍官,1848 年 7 月起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揮官。——第 510 頁。

屈韦特尔, 弗里德里希(Kühlwetter, Friedrich 1809—1882)——普魯士資產階級国家活动家,奧爾斯瓦特-汉澤曼內閣的內政大臣(1848 年 6 月—9 月)。——第 186、187、195、196、200、209、210、219、222—228、255、256、281、320—322、451、602 頁。

## 九 画

施米茨(Schmitz)——科倫工人。——第 601 頁。

施泰因, 卡尔(Stein, Karl 1757—1831)——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1804—1808 年期間担任过一系列的高級职务,曾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統治的解放斗争;倡議在普魯士进行不彻底的資產階級改革。——第 306 頁。

施泰因, 尤利烏斯(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亞的教师,政論家,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 104、260、460、461、497、510、529 頁。

施梅林, 安东(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奧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1848 年是帝國內政大臣(7 月—12 月),首相和外交大臣(9 月—12 月)。——第 348、507 頁。

施图普, 亨利希·約瑟夫(Stupp, Hein-

- rich Joseph)——普魯士官吏,教權派; 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106—109、339、370頁。
- 施米特,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弗蘭茨(Schmidt, Ernst Friedrich Franz)——德國牧師,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413、414頁。
- 施韋林,馬克西米利安(Schwerin, Maximilien 1804—1872)——伯爵,普魯士貴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文化、教育和衛生事務大臣(1848年3月—6月),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後來成了民族自由主義者。——第73、83、100頁。
- 施利希庭(Schlichting)——普魯士軍官。——第195頁。
- 施奈德爾(Schneider)——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後來屬於中間派左翼。——第259—263、276頁。
- 施瓦爾策,恩斯特(Schwarzer, Ernst 1808—1860)——奧地利官吏和政論家,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月—9月)。——第587頁。
- 施萊尼茨,亞歷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魯士國家活動家,反動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116、232頁。
- 施略費爾,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西里西亞的廠主,民主主義者;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16、414、567頁。
- 施滕策爾,古斯塔夫·阿道夫(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第372、374—379、381—385、389、394、395、398、402頁。
- 施萬貝克,阿列克西斯(Schwanbeck, Alexis)——德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科倫日報”編委。——第536頁。
- 施萊根施坦,路德維希,羅特·馮(Schreckenstein, Ludwig, Roth von 1789—1858)——男爵,普魯士將軍,封建貴族的代表,1848年6月—9月是陸軍大臣。——第19、100、116、183、194、195、197—199、208、212、253—257、348、461頁。
- 施奈德爾第二,卡爾(Schneider II, Karl)——德國法學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年是科倫民主協會主席和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委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新萊茵報”案中的辯護人。和馬克思、沙佩爾一起同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案的被告;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1852)的辯護人。——第90、580、583頁。
- 施泰因埃克爾,克利斯提安·卡爾·安東·弗里德里希(Steinäcker, Christian Karl Anton Friedrich 1781—1851)——男爵,普魯士將軍,反動分子,1848年是波茲南的要塞司令。——第95、232頁。
- 施納普漢斯基(Schnapphahnski)——見李希諾夫斯基,費里克斯。
- 施萊爾馬赫爾,弗里德里希(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1768—183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神學家和傳教士。——第87頁。
- 科施,拉法埃爾·雅科布(Kosch, Raph-

- ael Jacob 1803—1872)——德国医生，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左翼。——第462頁。
- 科尔恩 (Korn) ——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第101頁。
- 科布頓，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論者，反谷物法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第160、293、335頁。
- 科尔夫，海尔曼 (Korff, Hermann)——普鲁士軍官，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軍职；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新萊茵报”的負責发行人；后流亡美国。——第523、578、579、581、586、590、599頁。
- 科尔黛，夏綠蒂 (Corday, Charlotte 1768—1793)——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陰謀的参加者，杀害馬拉的凶手，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163頁。
- 科采布，奥古斯特 (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論家。——第162頁。
-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Colomb, 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普鲁士將軍，反动分子，1843—1848年是波茲南的普鲁士軍队司令。——第95、110、232、348、529頁。
- 科克里尔，約翰 (Cockerill, John 1790—1840)——英国工业家。——第374頁。
- 科西迪耶尔，馬尔克 (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巴黎警察局长，制宪議会的議員，1848年6月流亡英国。——第181、334、557頁。
- 科布尔克家族 (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178頁。
- 勃丹，沙尔 (Baudin, Charles 1784—1845)——法国海軍上将。——第22、23頁。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的主席；站在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場。——第334、550頁。
- 勃魯姆，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記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維也納的保卫战；反革命軍队占领維也納后把他杀害。——第18、399、400、402、411頁。
-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論家，自由主义者；1845—1855年为“科倫日报”主編。——第158、160、161、163、166、440、498、536頁。
- 約翰 (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255、455、457頁。
- 約丹，威廉 (Jordan, Wilhelm 1819—1904)——德国资产阶级作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左派，在波兰問題辯論后轉到中間派方面。——第390、401—409、411、413、428、438頁。
- 約納斯，路德維希 (Jonas, Ludwig 1797—1859)——德国神学家，柏林的牧师；

- 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87頁。
- 洛埃(Loë)——男爵，普魯士地主，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229頁。
- 洛蘭，伊波利特(Rolin, Hippolyte 1804—1888)——比利時律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黨首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0)。——第370頁。
- 洛貝爾圖斯，約翰·卡爾(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期間是溫和自由主義的政治活動家，普魯士國民議會的中間派左翼領袖；後來宣傳反動的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第116、117、186、187、204、213、318、462、468、469頁。
- 威納爾，約翰·彼得(Werner, Johann Peter)——德國律師，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第18頁。
- 威廉一世(1797—1888)——普魯士王儲，普魯士國王(1861—1888)，德國皇帝(1871—1888)。——第64、66、112、469、490、500、529頁。
- 品托，伊薩克(Pinto, Isaac 1715—1787)——荷蘭的大證券交易商，經濟學家。——第308、312、462頁。
- 品德爾，尤利烏斯·海爾曼(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1805年)——普魯士官吏，溫和自由主義者；1848年是西里西亞總督，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212頁。
- 濟多夫，阿道夫(Sydow, Adolf 1800—1882)——德國牧師和神學家；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85、86頁。
- 濟貝爾特(Siebert)——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245頁。
- 查理-阿爾伯特(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國王(1831—1849)。——第434—436、438、439、445頁。
- 查理-路易(Charles-Louis 1799—1883)——路加公爵(1815—1847)，1847年起是帕馬公爵，1849年退位。——第21頁。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國國王(1824—1830)。——第162頁。
- 哈尼，喬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國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憲章運動左派領袖之一；“北極星報”的編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聯繫。——第136頁。
- 哈普雷希特，亨利希(Harpprecht, Heinrich 卒于1859年)——維爾騰堡的律師，反動官吏。——第268頁。
- 若特蘭，律西安·列奧波特(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時法學家和政論家，40年代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曾任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主席。——第448頁。
- 耶拉契奇，約瑟夫(Jellačić, Joseph 1801—1859)——伯爵，奧地利將軍，克羅地亞總督，積極參加鎮壓匈牙利和奧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494、507、511、529、538、540、542頁。
- 美延多爾夫，彼得·卡季米羅維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沙皇俄國的外交官，駐柏林大使(1839—1850)。——第348頁。

## 十 画

馬拉,讓·保尔(Marat, Jean Paul 1743—1793)——法国政論家, 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領袖之一。——第 261 頁。

馬提, 卡尔 (Mathy, Karl 1807—1868)——巴登政論家, 官吏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右翼。——第 269、323、324 頁。

馬魯, 茹尔·爱德华 (Malou, Jules Edouard 1810—1886)——比利时的資產階級国家活动家, 天主教派的拥护者, 1844—1847 年是財政大臣。——第 519 頁。

馬利, 亚历山大 (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1848 年是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 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 180 頁。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传记材料)。——第 5—7、9、432、451—454、493、522、523、525、577—580、582、583、586—588、590、602、604、605 頁。

馬拉斯特, 阿尔芒 (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 “国民报”編輯; 1848 年是临时政府委員和巴黎市长。——第 135、153、162、163、180、555 頁。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 經濟学家, 資產階級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宣传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第

312 頁。

馬米阿尼, 托倫西奧 (Mamiani Torenzio 1799—1885)——伯爵, 意大利詩人和政論家, 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教皇領的内务大臣 (1848 年 5 月—8 月)——第 434 頁。

海奈 (Heyne)——勃罗姆堡 (在波茲南) 市市长, 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左翼。——第 216 頁。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46、117、184、205、206、226、246、267、281、315、326、341、441、494、515 頁。

海姆佐特, 亨利希 (Heimsoeth, Heinrich)——普魯士官吏, 1848 年是科倫律師。——第 526 頁。

海尔維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詩人,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第 525 頁。

海尔根汉, 奥古斯特 (Hergenhahn, August 1804—1874)——德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拿騷的大臣,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右翼。——第 17 頁。

埃塞尔, 克利斯提安·約瑟夫 (Esser, Christian Joseph 約生于 1809 年)——德国工人, 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 1849 年是“自由、博爱、劳动”的編輯。——第 192、596 頁。

埃塞倫, 克利斯提安 (Essellen, Christian 1823—1859)——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和政論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領導人之一, “工人总汇报”的編輯; 后流亡美国。——第 16 頁。

埃尔斯納,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亞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激進主義者，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50年代是“新奧德報”的編輯之一。——第83、87、104、196頁。
- 埃塞爾第一，約翰·亨利希·泰奧多爾 (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 ——普魯士官吏，律師，教權派，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副主席，屬於中間派。——第54、87、185、186、200頁。
- 勒弗 (Löw) ——德國教授，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1873—1876年是帝國國會議員，民族自由主義者。——第431頁。
- 勒澤爾，彼得·格爾哈特 (Röser, Peter Gorhardt 1814—1865) ——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職業是制雪茄煙工人；1848—1849年是科倫工人聯合會副主席，“自由、博愛、勞動”的發行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 (1852) 的被告之一；後來傾向於拉薩爾派。——第602、604頁。
- 勒文宗，摩里茨 (Löwinson, Moritz) ——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柏林人民俱樂部的領導人之一，柏林第二屆民主代表大會代表 (1848年10月)。——第101頁。
- 勒文施坦 (Löwenstein) ——德國民主主義者，學者，東方學家；1848年是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工人聯合會主席，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第一屆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代表 (1848年6月)。——第16頁。
- 勒奧尼達斯 (Leonidas 公元前約488—480) ——斯巴達國王；在希臘波斯戰爭期間統率斯巴達人的隊伍，在德摩比利峽谷英勇地抗击波斯人。——第550頁。
- 格林，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杰出的德國語文學家，柏林大學教授，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第370頁。
- 格萊夫 (Gräff) ——普魯士法官，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98、302、339頁。
- 格羅曼，卡爾·威廉·格奧爾格 (Grolmann, Karl Wilhelm Georg 1777—1843) ——普魯士軍官，參加過德國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鬥爭；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侖打敗後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軍事改革的原則。——第253頁。
- 格雷貝爾 (Grebel) ——普魯士官吏，治安法官，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240、241、245、255頁。
- 格拉博夫，威廉 (Grabow, Wilhelm 1802—1874) ——普楞茨勞市市長，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會主席，屬於右派。——第195—197、200、201、207、208、341頁。
- 格奈澤瑙，奧古斯特·威廉·安東 (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1760—1831) ——普魯士將軍、元帥和軍事政治活動家；在德國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侖打垮後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軍事改革的原則。——第253頁。
- 格里斯海姆，卡爾·古斯塔夫 (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 ——普魯士軍官，反動分子，1848年是陸軍部在普魯士國民議會中的代表。——

- 第 101—104、208、209 頁。
- 格拉德巴赫, 安东 (Gladbach, Anton 卒于 1873 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繆尔海姆(在莱茵省)出席普魯士国民議会的代表, 属于左派, 曾任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第 194、195、207—210、213、256、257、341、583 頁。
- 特雷拉, 烏利斯 (Trélat, Ulysse 1795—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 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 公共工程部部长 (1848 年 5 月—6 月)。——第 155 頁。
- 特德斯科, 維克多 (Tedesco, Victor 1821—1897)——比利时律师,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創始人之一; 1847—1848 年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 里斯康士案的被告,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 30 年徒刑; 1845 年释放。——第 448、449 頁。
- 特雷斯科夫, 海尔曼 (Treskow, Hermann 1818—1900)——普魯士軍官, 1848 年和 1849 年曾参加反对丹麦的軍事行动。——第 386 頁。
- 特雷斯科夫, 西吉茲蒙特·奧托 (Treskow, Sigismund Otto)——德国商人, 1796 年起在奧文斯克(波茲南)置有产业。——第 379、386 頁。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第 81、162、172、253、265、270、271、325、343、344、561 頁。
- 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亲王, 拿破仑第一的外甥,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第 555、563、566 頁。
- 夏扎尔, 比埃尔·艾曼紐尔·費里克斯 (Chazal, Pierre Emmanuel Felix 1808—1892)——男爵, 比利时將軍, 1830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任陸軍大臣 (1847—1850, 1859—1866); 以前是布魯塞尔的呢絨商人。——第 370 頁。
-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 (Scharnhorst, Gorhard 1755—1813)——普魯士將軍; 1806 年普魯士軍隊为拿破仑打败后任制訂軍事改革原則委员会的主席; 在 1813 年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起到了卓越的作用。——第 253 頁。
- 倫辛 (Lensing 生于 1783 年)——德国牧师,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右派。——第 229 頁。
- 晏奇 (Jentzsch)——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第 321 頁。
- 朔尔茨 (Scholz)——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第 200、201 頁。
- 唐茹瓦, 讓·弗朗斯瓦·波利尼斯 (Denjoy, Jean François Polynice 1809—1860)——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1848—1849 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 后为立法議會議員。——第 567 頁。
- 倍尔利, 卡尔·彼得 (Berly, Karl Peter 1781—1847)——德国新聞記者, “法兰克福总邮报”編輯 (1829—1847), 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政府的密探。——第 506 頁。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傳記材料)——第 5、6、7、13、552—558、563、565—571、581、582、583、590、591、595、600、601 頁。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萊茵报”負責发行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左派。——第49、57、58、87、104、200頁。

翁魯, 汉斯·維克多 (Unruh, Hans Victor 1806—1886)——普魯士的工程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中間派的领导人之一, 10月起担任国民議會的主席; 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的政党的創始人之一, 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60—462頁。

泰梅, 約多庫斯·多納图斯·胡貝尔图斯 (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德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左派; 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第42、57、101、256頁。

烏尔班 (Urban)——德国兽医; 1848年3月柏林街垒战的领导人之一, 1848年6月14日袭击軍械庫的参加者。——第101頁。

茨魏費尔 (Zweiffel)——普魯士官吏, 反动分子, 科倫的最高檢察官,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右派。——第97、192、203、229、232、233、578、590頁。

納茨梅尔 (Natzmer 卒于1890年)——普魯士軍官; 1848年6月14日指揮守卫柏林軍械庫的部队, 拒絕向人民射击; 被判处15年徒刑, 1849年逃走, 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起义失敗后流亡瑞士, 后来到英国, 1852年起又流亡到奥地利。——第101—104頁。

哥特沙克, 安得列阿斯 (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8年4月—6月为科倫工人联合会主席; 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場来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189、190、202、577、591、602頁。

涅謝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 沙皇俄国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外交大臣 (1816—1856)。——第342—348頁。

## 十一画

梅策 (Mätze)——德国教师,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左派。——第205、210、242頁。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95、436、439頁。

梅維森, 古斯达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銀行家, 萊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領袖之一;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右翼。——第212頁。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將軍, 原籍法国,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魯塞爾民主协会的名誉主席, 里斯康士案的被告之一,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30年徒刑; 1849年9月被赦免。——第370、448、449、450頁。



梅尔克尔 (Maercker)——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奧爾斯瓦特-漢澤曼內閣的司法大臣(1848年6月—9月)。——第251、252、351、476頁。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維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波蘭政治軍事活動家，1830—1831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曾參加1846年波茲南起義的準備工作；1848年的三月革命才把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1848年領導波茲南起義，後來領導西西里島起義者的鬥爭；1849年在巴登-普法爾茨起義期間指揮革命軍；在50年代和波拿巴主義者集團有聯繫；1863年波蘭起義期間被任命為波蘭民族政府的執政，起義失敗後流亡法國。——第395、424頁。

莫爾，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傑出活動家，職業是鐘表匠；正義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1848年7月—9月是科倫工人聯合會的主席，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委員；1848年科倫九月事件後流亡倫敦，改名後很快就回到德國，在德國各地區進行宣傳鼓動；1849年參加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在牟爾克之戰中陣亡。——第5、497、577、580、595頁。

莫內克，愛德蒙 (Monecke, Edmund)——德國大學生，民主主義者。——第189頁。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亞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偉大的奧地利作曲家。——第433頁。

莫爾特克，卡尔 (Moltke, Karl 1798—1866)——伯爵，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

的國家活動家，丹麥反革命派的首領，1848年9月起為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臨時政府的主席。——第456、457頁。

莫伊澤巴赫 (Meusebach)——普魯士官吏，保守派，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55頁。

許采 (Schütze)——普魯士法官，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341頁。

許金，列文 (Schücking, Levin 1814—1883)——德國作家；1845—1852年是“科倫日報”的撰稿人；曾寫過大量的小品文。——第438—441頁。

許弗爾，約翰·海爾曼 (Huffer, Johann Hermann 1784—1855)——閩斯德市市長，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186—187頁。

許澤爾，約翰·漢斯·古斯達夫·亨利希 (Hüser, Johann Hans Gustav Heinrich 1782—1857)——普魯士將軍，反動軍閥的代表之一，1844—1849年是美因茲的衛戍司令。——第15、17、19、95、141頁。

許岑多夫 (Schützendorf)——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年是科倫工人業主聯合會的會員。——第580頁。

蓋格爾，威廉·阿爾諾德 (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魯士警官，1848年任預審推事，後為科倫警察廳長。——第191、432、433、452、453、601頁。

蓋爾索濟，約阿希姆·勒奈·泰奧菲爾 (Kersausie, Joachim René Teophile 1798—1874)——法國革命家，1830年七月革命的參加者，秘密社會的卓越活動家；1848年領導人權和公民權協會

行动委员会,是六月起义的軍事計劃的制定者;后来参加加里波第运动。——第167、168、176頁。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1847年至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編輯,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第27、163頁。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創始人。——第523頁。

康普茨,卡尔(Kamptz, Karl 1769—1849)——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司法大臣(1832—1842)。——第231頁。

康坡巴索(Campobasso)——1848年革命前是那不勒斯的警官。——第21頁。

康格里弗,威廉(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英国发明家。——第142頁。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年3月—6月任普魯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普魯士駐中央政权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第28—37、39—41、54—57、58—61、64、65、71、72、74、80、81、85、92、100、101、110—113、116、117、123、182、187、212、220、222、227、258、293、443、452、457、458、462、467、471、472、475、500頁。

梯利,約翰(Tilly, Johann 1559—1632)

——伯爵,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統帥,指揮天主教联盟的軍隊;1631年5月梯利統率的軍隊向馬格德堡发起进攻,搶劫了該城。——第127頁。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1840);1848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奥尔良党人;曾任共和国总統(1871—1873),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劊子手。——第163、180、355、357、484、501—505、507、513頁。

荷馬(Homerus)——傳說中的古希腊叙事詩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賽”的作者。——第64頁。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实际上操縱了法国的內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35、66、116、155、204、227、506、515—517、557頁。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500頁。

## 十二画

博里斯(Borries)——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右派。——第240、251頁。

博馬舍,比埃尔·奧古斯丹(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284頁。

博伊恩,海尔曼(Boyen, Hermann 1771—1848)——普魯士將軍,原籍捷克;和

- 拿破仑作战期間負責組織后备軍；曾任陸軍大臣（1814—1819，1841—1847）——第32、253、254頁。
- 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維希（Bornemann, 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1798—1864）——德國法學家，自由主義者，司法大臣（1848年3月—6月），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右派。——第116頁。
- 博尔夏特，弗里德里希（Borchardt, Friedrich）——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科倫的律師，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339、340、496頁。
- 博伊尔曼，摩里茨（Beurmann, Moritz）——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波茲南總督。——第110、399頁。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魯士軍官，因政治信仰退職，1848年是科倫工人聯合會委員會委員，“新科倫報”編輯之一（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8年10月代表科倫工人聯合會出席柏林的第二屆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在会上捍衛了幾乎和“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完全一致的綱領；1849年參加巴登-普法爾茨起義；革命後流亡瑞士。——第604頁。
- 博德爾施文克，恩斯特（Bodelschwingh, Ernst 1794—1854）——普魯士國家活動家，反動分子，1842年起任財政大臣，1845年至1848年3月任內政大臣。——第32、81、254、270、319、321、350、351頁。
- 黑克尔（Hecker）——普魯士法官，1848年是科倫檢察官。——第191、202、203、230、294、521—526、552、578、600頁。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卡尔（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巴登的共和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年4月巴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後流亡美國，參加美國內戰，站在北部方面。——第521—526頁。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國最大的哲學家，客觀唯心主義者，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第166、408、523頁。
- 黑克舍尔，約翰·古斯達夫（Heckscher, Johann Gustav 1797—1865）——德國法學家；曾任帝國司法大臣（1848年7月—8月）和外交大臣（1848年8月—9月），帝國政府駐意大利大使；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457、458頁。
- 普法尔（Pfahl）——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左派。——第199頁。
- 普富尔，恩斯特（Pfuel, Ernst 1779—1866）——普魯士將軍，反動軍閥的代表人物之一；1832—1848年是紐沙特爾省長；1848年3月是柏林警備司令；5月指揮鎮壓波茲南的起義；1848年9—10月任首相和陸軍大臣。——第62、63、110、121、271、348、385、497、500、507、510、511、526頁。
- 普倫尼斯（Plönnis）——普魯士官吏，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副主席，屬於右派。——第86頁。
- 普特卡默，奧伊根（Puttkamer, Eugen 1800—1874）——普魯士官吏，1839—1847年是柏林警察總監。——第42、

- 43 頁。
- 普魯士親王——見威廉一世。
- 普什魯斯基, 萊昂(Przyluski, Leon 1789—1865)——曾任格尼茲諾和波茲南的大主教(1845—1865)。——第 220、372 頁。
- 普路古爾姆, 比埃爾·昂勃魯阿茲(Plougoum, Pierre Ambroise 1796—1863)——法國官吏, 法學家, 議會議員(1846—1848)。——第 204 頁。
- 普爾塔勒斯, 阿伯特(Pourtalès Albert 1812—1861)——伯爵, 普魯士外交家。——第 292 頁。
- 舒爾泰 (Schulte) ——德國民主主義者。——第 596 頁。
- 舒爾茨 (Schultz)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左派。——第 83、206、207 頁。
- 舒爾采-德里奇, 海爾曼(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 60 年代是資產階級進步分子政黨的領袖之一, 企圖以組織合作社的方式來使工人離開革命鬥爭。——第 79—81、83、252、340 頁。
- 舒澤爾卡, 弗蘭茨 (Schuselka, Franz 1811—1889)——奧地利政論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動家, 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左派; 奧地利國會議員。——第 410、411 頁。
- 菲利浦斯, 阿道夫(Philipps, Adolf 1813—1877)——普魯士官吏,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副主席, 屬於中間派。——第 239 頁。
- 菲克勒爾, 約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國新聞記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1849 年的巴登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第 295、323 頁。
- 費奈迭, 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國激進政論家, 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後成為自由派。——第 30、163、453 頁。
- 費爾德豪斯 (Feldhaus) ——德國教師,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右派。——第 255 頁。
- 富爾德, 阿希爾 (Fould, Achille 1800—1867) ——法國銀行家和政治活動家, 奧爾良黨人, 後來成為波拿巴主義者, 1849—1867 年曾數度擔任財政部長的職務。——第 133 頁。
- 富吉耶-丹維爾, 安都昂·剛丹(Fouquier-Tinville, Antoine Quentin 1746—1795) ——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動家, 1793 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訴人。——第 449 頁。
- 斯密, 亞當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336 頁。
- 曾弗, 艾米爾 (Senff, Emil) ——波茲南的普魯士法官, 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第 395、397—399、402、404、413、415 頁。
- 瓊斯, 厄內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杰出的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無產階級詩人和政論家, 憲章派左翼領袖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19、136 頁。
- 敦克爾 (Duncker) ——普魯士官吏,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中間派左翼的領導人之一。——第 33、56、296、297、

- 298、462 頁。
-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 德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左派領導人之一, 70 年代傾向於社會民主黨人。——第 84、258、259、263、264、293、294、296、301、318 頁。
- 萊寧根, 卡爾 (Leiningen, Karl 1804—1856) —— 公爵, 巴伐利亞的將軍, 反動分子, 曾任帝國首相 (1848 年 8 月—9 月)。——第 426 頁。
- 傅阿德-埃芬蒂, 穆罕默德 (Fuad-Effendi, Mehemet 1814—1869) —— 土耳其的國家活動家, 1848 年是多瑙河公國的政府委員, 血腥地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組織者之一; 50—60 年代任外交大臣, 大維齊 (封建時代近東某些國家的高級官吏——譯者注)。——第 507、521 頁。
- 凱爾斯特, 賽米爾·哥特弗利德 (Kerst, Samuel Gottfried 1804—1875) —— 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 後來成為進步主義者。——第 409、412—415 頁。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 那不勒斯國王 (1830—1859)。——第 17—24、151、435、507、517 頁。
- 溫采利烏斯 (Wencelius) —— 德國法學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左派。——第 97、339 頁。
- 十三 画**
- 奧爾堡 (Olberg) —— 普魯士軍官, 1848 年參加鎮壓波茲南的民族解放運動。——第 110 頁。
- 奧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 —— 巴伐利亞王子, 希臘國王 (1832—1862)。——第 177 頁。
- 奧康奈爾, 丹尼爾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 愛爾蘭律師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家, 民族解放運動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 118 頁。
- 奧康諾爾, 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 —— 憲章運動左翼領袖之一, “北極星報”的創辦人和編輯; 1848 年後成為改良主義者。——第 118、119、136 頁。
- 奧倫治家族 (Orange) —— 1572—1795 年曾數度擔任尼德蘭總督, 1815 年起為尼德蘭王國的王朝。——第 177、370 頁。
- 奧爾斯瓦特, 魯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 —— 普魯士國家活動家, 接近資產階級的自由貴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6 月—9 月)。——第 17、34、100、182、184、187、197、199、200、208、212、233、239、240、254、290、292、295、460、474、592 頁。
- 奧爾施佩格, 卡爾 (Auersperg, Karl 1783—1859) —— 伯爵, 奧地利元帥, 1848—1849 年革命時期在下奧地利指揮軍隊, 1848 年 10 月積極參加鎮壓維也納起義。——第 529、540 頁。
- 奧斯滕多爾夫, 尤利烏斯 (Ostendorf, Julius 1823—1877) —— 德國教育家, 溫和自由主義者; 1848—1849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413 頁。
- 塞納爾, 安都昂·瑪麗·茹爾 (Sénard, Antoine Marie Jules 1800—1885) —— 法國法學家,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1848 年 6 月任制憲議會主席, 1848 年 6 月—10 月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內政部長。——第 148 頁。

塞万提斯·德·薩維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312、317、403、410、430、490、501 頁。

塞巴斯提昂尼, 奧拉斯 (Sébastieni, Horace 1772—1851) ——伯爵, 法国元帅, 外交家; 曾任外交部长 (1830—1832), 駐倫敦大使 (1835—1840)。——第 155 頁。

路易-拿破仑 (Louis-Napoléon) ——見拿破仑三世。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 ——公爵, 奥尔良党人,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21、22、36、153、154、160、162、204、272、281、516、532、562、567 頁。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 ——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420 頁。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385 頁。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 ——法国国王 (1774—1792), 在 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刑。——第 162 頁。

路特希尔德, 詹姆斯 (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 ——巴黎路特希尔德銀行行长。——第 133、502 頁。

瑙宁 (Naunyn) ——1848 年任柏林市长。——第 42 頁。

塔姆瑙 (Tamnau)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第 461 頁。

雷費德 (Rehfeld)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 后来屬於右派。——第 51 頁。

## 十四画

維利森, 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 ——普魯士將軍和軍事理論家; 1848 年任王室駐波茲南專員, 1850 年統率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軍隊对丹麦作战。——第 110、383、384 頁。

維干德, 奧托 (Wigand, Otto 1795—1870) ——德国的出版家和書商; 在萊比錫开有書店, 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 403 頁。

維尔特, 格奧尔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 ——德国无产階級詩人和政論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3、589 頁。

維登曼, 克利斯提安 (Wiedenmann, Christian) ——普魯士官吏,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第 265 頁。

維登布魯赫, 路易 (Wildenbruch, Louis 1803—1874) ——普魯士外交官, 駐貝魯特的总領事, 1848 年任駐哥本哈根公使。——第 207、361、345、467 頁。

維特根施坦, 亨利希 (Wittgenstein, Heinrich 1800—1868) ——普魯士官吏, 1848 年任区督察員 (5 月—9 月) 和科倫市民自卫团司令。——第 536、592、596 頁。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 6 月是帝国王攝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 261 頁。

福克斯, 查理·詹姆斯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第 107 頁。

福斯特曼 (Forstmann) ——德国商人,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右派。——第 213、247、249 頁。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121、521、570 頁。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論家, 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 1848 年是制宪議会的議員。——第 355—358 頁。

察哈里埃 (Zachariae)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第 85、89、186、195、296 頁。

## 十五画

德尔·卡烈托, 弗兰切斯科·薩韦里奧 (Del Carretto, Francesco Saverio 約 1777—1861) ——意大利反动的政治活动家, 那不勒斯王国的警務大臣 (1831—1848 年 1 月)。——第 21 頁。

德洛姆, 讓·路易 (Delolme, Jean Louis 1741—1806) ——瑞士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辯護士。——第 474 頁。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德国政論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第 13、581、586、591、

595、601 頁。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維希·約翰 (D'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 ——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左派;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員, 在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后来流亡瑞士。——第 89、186—187、197—199、239、496 頁。

德勒克呂茲, 路易·沙尔 (Delescluze, Louis Charles 1809—1871) ——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1848 年是杜諾尔省的政府委員; 1871 年是巴黎公社的卓越活动家, 傾向于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 在街垒战中陣亡。——第 447 頁。

賴蒙德, 斐迪南 (Raimund 1790—1836) ——奧地利的演員和剧作家。——第 112、113 頁。

賴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領袖之一, “改良报”編輯, 1848 年是临时政府委員。——第 135、334、447、483、555 頁。

賴辛巴赫, 爱德华 (Reichenbach, Eduard 1812—1869) ——伯爵, 卓越的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左派;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員; 后来成为进步主义者。——第 83、104、199、243、322 頁。

賴希黑尔姆 (Reichhelm) ——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倫公安委员会委員。——第 596 頁。

賴辛施佩格第一，奧古斯特 (Reichensperger I, August 1808—1895)——德國法學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87 頁。

賴辛施佩格第二，彼得·弗蘭茨 (Reichensperger II, Peter Franz 1810—1892)——德國法學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奧古斯特·賴辛施佩格之弟。——第 97、186、214、229、264—266、339、461、479 頁。

摩里茨 (Moritz)——普魯士法官，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第 57、199、321、364、365 頁。

摩地那公爵 (duca di Modena)——見弗蘭契斯科第五。

魯日蒙·德·羅旺貝 (Rougemont de Lowenberg)——法國銀行家。——第 133 頁。

## 十六 画

鮑威爾 (Bauer, 約卒于 1850 年)——克羅托申 (在波茲南) 的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第 215 頁。

鮑威爾，亨利希 (Bauer, Heinrich)——德國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職業是鞋匠；1851 年流亡澳洲。——第 5 頁。

鮑爾班特，約翰·約瑟夫 (Bauerband, Johann Joseph 1800—1878)——德國法學家，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229、339 頁。

鮑姆施塔克，愛德華 (Baumstark, Edou-

ard 1807—1889)——德國教授；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216、243、270、301—306、339、340、370 頁。

霍弗爾 (Hofer)——德國農民，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右派。——第 83 頁。

霍爾堡，路德維希 (Holberg, Ludwig 1684—1754)——丹麥的最大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第 379、464 頁。

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勃蘭登堡選帝侯 (1415—1701)、普魯士國王 (1701—1918) 和德國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第 65 頁。

默爾，羅伯特 (Mohl, Robert 1799—1875)——德國法學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帝國司法大臣 (1848—1849)。——第 507 頁。

澤巴爾特 (Sebaldt)——普魯士官吏，1848 年是特利爾的縣長和市長。——第 97、98 頁。

## 十七 画

謝奇，海爾敏娜 (Chézy, Helmine 1783—1856)——德國浪漫派的女作家。——第 555 頁。

戴韋南特，查理 (Davenant, Charles 1656—1714)——英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重商主義者。——第 511 頁。

## 十八 画

薩維尼，弗里德里希·卡爾 (Savigny, Friedrich Karl 1779—1861)——德國法學家，反動的法的歷史學派的首領，1842—1848 年間任修訂法律大臣。——第 350 頁。



薩比斯基, 楊 (Sobieski, John 1624—1696) ——波兰国王 (1674—1696), 1683 年統率波兰和德国奥地利联軍在維也納打败了土耳其軍隊。——第 214 頁。

魏克塞尔 (Weichsel)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左翼。——第 185 頁。

## 二十画

竇, 巴特米·泰奧多尔 (Theux, Barthélemy Theodor 1794—1874) ——伯爵, 比利时国家活动家, 天主教派的首領, 曾任首相 (1846—1847)。——第 519 頁。

## 期刊索引

### 一 画

- “1841年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1841)  
——巴黎出版。——第334頁。
-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nisme)——巴黎出版。——第334頁。

### 二 画

- “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巴黎出版。——第356頁。
- “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文娱性杂志”(Der Volksfreund. Zeitschrift für Aufklärung und Erheiterung des Volkes)——維也納出版。——第588頁。
- “人民的蜂房”(La Ruche Populaire)——巴黎出版。——第334頁。
- “人民制宪报”(Le Peuple Constituant)——巴黎出版。——第165頁。

### 三 画

- “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見“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

### 四 画

-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204頁。
- “比利时观察家”(L'Observateur Belge)

——布魯塞爾出版。——第204、370、501頁。

-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Le Moniteur belge. Journal officiel)——布魯塞爾出版。——第367、519頁。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魯塞爾出版。——第147、163、166、370、501、514頁。

### 五 画

-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倫敦出版。——第136、160、334、513頁。
-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彼得堡出版。——第207頁。
-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536、589頁。
- “可理解的世界。科学問題論丛”(Die begriffene Welt. 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Unterhaltung)——萊比錫出版。——第403頁。
-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163、166、204、501、514頁。
-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倫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第492頁。

### 六 画

- “米兰报”(Gazzetta di Milano)——第524頁。

- “协和报” (*La Concordia*)——都灵出版。  
——第 299、300 頁。
- “安特卫普报” (*Le Journal d'Anvers*)——  
第 450 頁。
- “列日自由主义者” (*Le Libéral · Liégeois*)  
——第 450 頁。
- “自由、博爱、劳动” (*Freiheit, Brüderli-  
chkeit, Arbeit*) ——科倫出版。——第  
604、605 頁。
-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編輯和发行的通  
报” (*L'Union. 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巴  
黎出版。——第 334 頁。
- “共和主义观察家” (*Le Spectateur répub-  
licain*)——巴黎出版。——第 445 頁。

### 七 画

- “改革报” (*La Réforme*) ——巴黎出版。  
——第 153、334、513、531—534 頁。
- “杜塞尔多夫日报” (*Düsseldorfer Zei-  
tung*)——第 589 頁。

### 八 画

- “国家报” (*Staats-Zeitung*)——見“普魯  
士国家通报”。
- “国民报” (*Le National*) ——巴黎出版。  
——第 153、163、165、180、515、516  
頁。
- “国家通报” (*Staats-Anzeiger*)——見“普  
魯士国家通报”。
- “法兰克福报” (*Frankfurter Journal*)——  
第 236 頁。
- “法兰克福总邮报” (*Frankfurter Oberpos-  
tamt-Zeitung*)——第 342、506、507 頁。

### 九 画

- “柏林閱报室” (*Berliner Zeitung-Halle*)

——第 5、127、442、444、479、480、490  
頁。

-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新聞”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第 479 頁。
-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 (*Kö-  
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第 479 頁。
- “科倫女人” (*Kölnerin*) ——即“科倫日  
报”。
- “科倫日报” (*Kölnische Zeitung*) ——第  
121、142、158、160、161、163—166、184、  
204、332—336、353、354、358、367、370、  
438—441、474、479、496、498、514、521、  
523、535、536、593、596、600 頁。
- “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 (*Zeitung des Ar-  
beiter-Vereines zu Köln*) ——第 492、  
603 頁。
- “总汇报” (*Allgemeine Zeitung*) ——奧格  
斯堡出版。——第 163、498 頁。
- “总汇通报” (*Le Moniteur Universel*)——巴  
黎出版。——第 162—165、239、506 頁。
- “政治家” (*Le Politique*) ——布魯塞尔出  
版。——第 204 頁。
-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 (*Journal des Dé-  
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巴黎  
出版。——第 163、180、496、567 頁。
- “施本納报” (*Spencersche Zeitung*) ——見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新聞”。
-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問題日报”  
(*Die Constitution. Tagblatt für Cons-  
titutionelles Volksleben und Belehrung*)  
——維也納出版。——第 588 頁。

### 十 画

- “祖国报” (*Fædrelandet*) ——哥本哈根出

- 版。——第286、287、290、291頁。
-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第5、576頁。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160頁。
- “閱报室”(Zeitungs-Halle)——見“柏林閱报室”。
-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版。——第160、239頁。
- “倫敦電訊”(The London Telegraph)——第158—160、162頁。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第5頁。
-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第596頁。

### 十一画

- “晨报”(Morgenbladet)——克利斯提阿納出版。——第465頁。
- “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207頁。
- “盖尔温努斯报”(Gervinus-Zeitung)——見“德意志报”。

### 十二画

- “萊茵守卫者”(Der Wächter am Rhein)——科倫出版。——第492、583頁。
-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230、536頁。
- “湖滨小报”(Seeblätter)——君士坦士出版。——第576頁。
- “普魯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28、239、350、536頁。

### 十三画

- “新聞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204頁。
- “新柏林报”(Neue Berliner Zeitung)——第118、119頁。
-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8、13、18、20、24、27、31、35、37、40、41、43、48、53、59、61、63、65、70、71、89、91、93、96、99、105、109、111、113、115、117、119、122、125、126、128—130、134—136、141、146、152、157、166、169、176、179—181、185、188、189、193、201、202、204、211、212、217、219、229、230、234、235、238、246、250、257、266、269、273、285、288、292、298—300、306、317、322、324、331、337、341、349、352、354、359、366、370、421、424、429、431—433、437、441、444、446、450、451、453、454、459、462、468、478、481、484、489、491—495、499、500、505、508、509、512—514、517、518、520—526、530、534—536、539、543、578—581、585—590、594、596—599、601、602頁。
-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評論”(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斯图加特出版。——第571頁。
- “解放”(L'Emancipation)——布魯塞爾出版。——第204頁。
- “奧格斯堡总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見“总汇报”。

### 十四画

-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見“柏

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

### 十五画

“德意志报” (*Deutsche Zeitung*)——1847—1848年在海得尔堡出版; 1848—185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67、120、121、498頁。

“德意志总汇报”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萊比錫出版。——第5、236頁。

“德意志人民报” (*Deutsche Volkszeitung*)——曼海姆出版。——第525、576頁。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萊比錫出版。——第430頁。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第430頁。

“黎明报。政治和文学性报纸” (*L'Alba. Giornale politico-letterario*)——佛罗倫薩出版。——第8、9、179、299頁。

### 十六画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 (*Der Radikale. Deutsche Zeitung für In- und Ausland*)——維也納出版。——第587頁。

### 二十一画

“辯論日报” (*Débats*)——即“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

## 譯 后 記

本書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譯的，有些文章在譯校时参考了德文原文。“6月23日事件的詳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經過)”几篇文章，在譯校过程中还参考了曹汀同志的中文譯文(見“恩格斯軍事論文集”第一分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

参加本書翻譯工作的有朱中龙、徐云程、湯鈺卿、苏錦元、馮如馥、江显藩等同志。譯文最后是由易惠群、张文煥、樊以楠三同志校訂的。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